

共产国际
第六次
代表大会
文件

I

共产国际 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

1928年7—9月

I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

I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编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 6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29.375 插页 3
1991 年 9 月第 1 版 199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656 000 册数:精装本 1000**

*

**ISBN 7-300-01103-9
D·160 定价:14.20 元**

参加本卷翻译的有：马宝华、乌传袞、章任贤、江永澄、胡树林、高和平、沙端一；马宝华、乌传袞校译。

全书由文献编委会共产国际组杨光远、宋洪训审订。

参加本卷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王颖；陈丹（责任编辑）；祝东平（封面设计）；徐力坚（技术设计）。

60797/30

出版说明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 1928 年 7 月 17 日至 9 月 1 日在莫斯科召开,共举行了 46 次会议。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根据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 1929 年出版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VI Коминтер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29) 编译,分 4 卷出版。

第 1 卷——《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包括代表大会第 1—16 次会议的记录,即布哈林的报告、代表发言和总结,青年共产国际许勒的报告和总结,以及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总结。

第 2 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包括代表大会第 17—23 次会议的记录,汇集了关于战争危险问题的报告和发言;《世界革命的纲领》,包括第 24—28 次会议的记录,即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和讨论发言。

第 3 卷——《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包括第 29—40 次会议的记录,即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问题的五个报告和副报告以及讨论发言。

第 4 卷——《联共(布)党内状况》,以及代表大会的各项结束工作的报告和发言,包括第 41—46 次会议的记录;汇集了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的所有最重要的文件,包括提纲、决议、决定和呼吁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文献

GUOJI GONGCHANZHUYI
YUNDONGSHI WENXIAN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

目 录

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第一次会议(1928年7月17日)	3
布哈林致开幕词	3
选举主席团	8
确定议程	8
致贺词	9
李光(中国共产党)	9
片山潜(日本共产党)	11
拉塞尔达(南美洲代表团)	12
卡里略(墨西哥共产党)	12
怀特曼(美国黑人工人和农民代表)	14
西坎杰尔·苏尔(印度代表团)	15
莫斯科无产阶级的祝词	16
加香致答词	23
台尔曼(欧洲各国共产党代表)	25
施内勒尔宣读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贺信	28
宣读并通过《告中国工人和劳动人民书》	30
宣读并通过《支援中国无产阶级的双周运动》的呼吁书	34
宣读并通过《代表大会致各国共产党和全世界劳动人民	

呼吁书》.....	35
宣读并通过《告苏联劳动人民书》.....	36
第二次会议(1928年7月18日).....	40
致贺词.....	40
茹拉夫廖夫(斯大林铁路修配厂工人代表).....	40
雅库边科(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特派员会议代表团).....	4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报告人:布哈林).....	41
第三次会议(1928年7月19日).....	7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继续)(报告人:布哈林).....	75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报告人:许勒).....	97
第四次会议(1928年7月19日).....	144
致贺词.....	144
别尔乌辛(老布尔什维克协会).....	144
勒麦列宣读德国的两封贺电.....	145
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报告人:斯图契卡).....	145
选举纲领起草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大会秘书处.....	151
第五次会议(1928年7月20日).....	154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	154
明岑贝尔格.....	154
第六次会议(1928年7月23日).....	162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162
塞马尔(法国).....	162
德维塞尔(荷兰).....	171

罗吉奇(南斯拉夫)	174
福特(美国)	178
瓦西里也夫	184
特格森(丹麦)	191
西坎杰尔·苏尔(印度)	195
勃登曼(瑞士)	197
科普林尼格(奥地利)	202
墨菲(英国)	206
麦克唐纳(加拿大)	216
贝津(南非)	223
第七次会议(1928年7月24日)	232
致贺词。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232
邓恩(美国)	232
奥尔布里希(德国红色前线战士同盟代表团)	237
加香(法国)	240
伊万诺夫(军事经济工作者)	241
司图亚特(英国)	242
勒麦列宣读柏林革命工人的贺电	242
拉贾(印度)	243
科拉罗夫(保加利亚)	244
佩珀(美国)	254
布伦克勒(德国)	272
汉宁顿(英国)	278
第八次会议(1928年7月25日)	287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287

琼斯(美国)	287
格拉哈姆(捷克斯洛伐克)	293
黑克尔特(德国)	303
萨穆埃利松(瑞典)	310
多列士(法国)	317
西弗内奥斯(希腊)	327
瓦尔加	330
拉塞尔达(巴西)	339
卡里略(墨西哥)	341
塞莱(乌拉圭)	345
第九次会议(1928年7月25日)	351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351
贝津(南非)	351
克麦尼(匈牙利)	354
坎农(美国)	360
伊列克(捷克斯洛伐克)	368
沙尔吉(波斯)	382
毕特尔曼(美国)	385
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	394
温斯顿(美国)	403
帕迪(印度尼西亚)	412
第十次会议(1928年7月26日)	416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416
维克斯(美国)	416
海德尔(巴勒斯坦)	421

加藤(日本)	425
哥尔斯基(捷克斯洛伐克)	429
彼得鲁列斯库(罗马尼亚)	439
卢(南非)	443
拉柯蒙(法国)	446
片山潜(日本)	451
甘津(挪威)	456
加兰迪(意大利).....	465
萨波托斯基(捷克斯洛伐克)	471
皮奥(法国)	478
第十一次会议(1928年7月26日)	484
致贺词。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484
奈焦诺夫(卡希拉国家发电站)	484
扎罗娃(《农民报》印刷厂)	484
狄克逊(美国)	485
赫尔舍利(青年共产国际)	491
台尔曼(德国)	496
斯佩克特(加拿大)	517
希塔罗夫(青年共产国际)	525
曼纳(芬兰)	530
第十二次会议(1928年7月27日)	540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540
莱姆利(英国)	540
尼施维茨(德国).....	545
库斯特齐瓦(波兰)	549

埃韦特(德国)	566
斯特拉霍夫(中国)	581
赖斯特(英国)	590
第十三次会议(1928年7月27日)	597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597
麦利哈尔(捷克斯洛伐克)	597
洛佐夫斯基(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党党团)	601
李光(中国)	626
连斯基(波兰)	630
福斯特(美国)	642
东巴尔(农民国际共产党党团)	657
第十四次会议(1928年7月28日)	672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672
张彪(中国)	672
乌布利希(德国)	679
罗明纳兹(苏联)	689
洛夫斯顿(美国)	708
布兰特(波兰)	737
艾尔科利(意大利)	742
贝内特(英国)	763
米科洛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771
雷曼(捷克斯洛伐克)	779
蒂特尔(德国)	783
第十五次会议(1928年7月28日)	794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致贺词	794

皮佑(法国)	794
马哈茂德(印度).....	799
格尔维克(波兰).....	801
克鲁格利亚舍夫(国际主义工厂).....	807
马斯洛夫(“红旗”工厂)	808
赫里普诺夫(捷多夫斯克织布厂).....	808
科先科娃(克拉拉·蔡特金工厂).....	808
梅尔策(莫斯科共青团组织积极分子)	809
奥皮茨(德国)	811
格林鲍姆(西乌克兰)	818
什捷恩(捷克斯洛伐克)	823
申费利杰尔(奥地利)	828
米茨凯维奇·卡普苏卡斯(立陶宛)	831
陈宽(中国)	840
科尔奇克(西白俄罗斯)	844
别涅基克特(奥地利)	850
少先队员(中国).....	854
台尔曼(德国)的声明	856
希塔罗夫(青年共产国际)的声明	857
乌布利希(德国)的声明	857
佩珀(美国)的声明	858
罗明纳兹(苏联)的声明	860
第十六次会议(1928年7月30日)	862
许勒作总结发言.....	862
布哈林作总结发言.....	880

埃韦特(德国)	923
科拉罗夫	924
格尔维克(波兰)	925
许勒	925
台尔曼	925
斯特拉霍夫(中国)	926
洛维茨基	928

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第一次会议

(1928年7月17日)

代表大会于晚7时在联盟大厦开幕

布哈林致开幕词

同志们！在庆祝了在原沙皇帝国爆发的伟大十月革命十周年之后，在共产国际这一真正革命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十周年前夕，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召开了。这些年来，举行过形形色色的集会，召开过各种各样的会议，进行过多次外交的和非外交的谈判，被国际资产阶级的工具——国际联盟这个对人类最危险的组织牵着鼻子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更是掀起了一阵阵虚假的和平主义喧嚣。我们的国际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则与我们的敌人召开的上述种种会议和代表大会大相径庭，它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代表大会，是对国际共产主义大军各支队伍的司令部进行严峻的检阅的大会。

同志们！我们是在无产阶级国家的红色首都第六次聚会。我们首先悼念我们无数的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抛却头颅、献出生命的战友。（全体起立。）欧洲无产阶级失去了成百上千优秀的、最忠实的儿子。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在凶恶的白色波兰之鹰的

利爪下，在毕苏斯基元帅的蹂躏下，已经牺牲和正在死亡；在意大利，他们死于社会民主运动的叛徒墨索里尼的皮鞭下；在保加利亚，他们因信奉保加利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而遭杀害。但是，有一个国家，一个巨大的、遥远的、富于古老文化而现在工人和农民被投入血泊之中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中国，那里的广大群众已奋起反对帝国主义蠹贼，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同帝国主义的走狗们搏斗。我们成千上万的中国同志在插竹签、剜眼睛的酷刑折磨下死去，在绞索架上就义。他们高呼着“共产主义胜利万岁！无产阶级的党胜利万岁！”的口号倒下去了。

从波兰到日本，从意大利到中国，从印度尼西亚到美洲，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们被戴脚镣、坐电椅，在刽子手的屠刀下，在严刑拷打中就义。现在我们满怀激愤之情，同声哀悼他们。他们永垂不朽！他们无数伟大的名字在无产者心中永存！（全体代表起立，乐队奏《葬礼进行曲》。）

值此会议开幕之际，我们向意大利、波兰、中国、保加利亚和许多其他国家身陷囹圄的工人革命战士及其统帅们致以衷心的敬意。在这里，我们向中国、波兰、保加利亚、光荣的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同志们致以敬礼。让他们知道，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他们。

同志们！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的年代里，我们的运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发展。“共产主义”一词、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原则，以及列宁的透彻而准确的论述破天荒第一次传播到辽阔的疆域，传播到新的大陆，传播到更多国家的人民中间，传播到工人阶级新的阶层中去，南美洲破天荒第一次广泛地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正形成为真正的战斗的革命党，高举革命的马

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旗帜前进。

日本共产党人数虽少,但已开始成为一个战斗单位,首次登上了历史舞台。印度是大英帝国这个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在那里我们正处于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取得显著发展的前夕。

与此同时,我们运动的任务也变得极其繁重而艰难了。一度席卷欧洲的初次迸发和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已经以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失败而告终。资本主义直接崩溃的前景,它即将灭亡的前景,已为略有不同的形势所代替。我们有机会检验了列宁关于资产阶级并非毫无出路的论断的正确性:在许多深受革命运动影响的国家里,资产阶级依然摆脱了困境,现在,资本主义正急匆匆地修筑自己的堡垒。现在,资本主义正在急迫地武装自己。它正在双管齐下,一面修筑堡垒,一面进行武装。资本主义的衰落,走的不是径直的道路,而是曲折的道路,在它衰落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个别部分会有局部的改善,会出现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而这种情况给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新的巨大困难,向共产国际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迫使整个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各党不得不周密思考并制订出极为复杂的策略以训练和动员工人阶级的力量,迫使共产国际不得不根据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矛盾发展的情况,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寻求动员群众的新途径,以便掀起新的浪潮,给资本主义以新的、更大的毁灭性打击。

再说在我国,在无产阶级的联盟国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在四面受敌包围的国家中,在经济贫困落后的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项宏伟的任务,它使我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我们战斗的共产党面临一系列极其巨大的困难和极其复杂的任务: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

主义体系的心脏地区,由于形势日益复杂而使各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变得复杂起来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国家和我们的党同样遇到了这种情况。

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将持续若干年,而苏联在新技术基础上进行改造的时期和建设已经过去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说,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还是在我们这个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都还没有充分学会把工作开展到应有的水平。譬如说,共产国际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提出过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工会、争取群众的任务。但是,我们的敌人——社会民主党人依然强大,我们还没有学会怎样妥善地解决这项任务。在我们苏联,我们也不是一次两次拟订过我们建设的总路线。但是,我们感到,在过去的恢复时期把建设搞上去是一回事,而采用新的组织原则去建设新的工厂则是另一回事。从总体上讲,我们对我们的阶级敌人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完全学会如何工作。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西欧各国和美洲我们的主要敌人——社会民主党正在走向何方,可是,我们没有学会应该怎样出色地开展工作,以便更坚决,更有效地打击我们的敌人。

同志们!正因为如此,现在任何一个大的共产党都不可能单纯地依靠鼓动性口号去应付一切,现在对我们共产党的领导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现在摆在共产国际面前的一项巨大的任务,可以说是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使我们的工作向深度发展,就是要改善我们党的骨干队伍的状况,改善党的领导。

所以,我们现在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任何问题,从殖民地问题

纲领到较为次要的策略问题，都比三四年前复杂得多。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要求我们大家，要求整个共产主义思想界给予更多的关注，作出更大的努力，付出更辛勤的劳动，以便不仅把握住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的总的轮廓，而且看到每一个细节，包括不甚引人注目的细节，正确地制定每一个策略步骤，正确地表达纲领的每一个原则。

这是我们在其中生活、工作并同我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战斗的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现在，之所以更迫切地需要更加精心、更加娴熟和更加紧张地开展工作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之间对抗的加剧正确无疑地引起国家之间的严重冲突，引起大规模的阶级搏斗，这场搏斗的结局将决定人类今后的整个命运。

我们正在迎接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阶级搏斗，正在迎接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搏斗。面对这样的前景，面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我们应当开好我们的代表大会，通过大会学习到我们集体创造的全部国际经验，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制定出纲领，以回答千千万万工人、千千万万劳动农民的最迫切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该经过深思熟虑，制定切实的、适用于包括从中国到美国在内的一系列国家的策略路线。我们应当开好这次代表大会，使大会的活动能为所属各共产党支部整个近期的工作奠定基础并给它们增添巨大的力量，从而使我们的全部工作更富有成效，使我们各党在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中更有活力，更加忠诚、更加清醒地认识形势，更具备策略上的睿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在列宁学说的旗帜下，在国际革命的旗帜下不断前进。

选举主席团

布哈林同志致开幕词以后，大会选举主席团。下列同志当选为主席团委员：

克拉拉·蔡特金；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曼努伊尔斯基，皮亚特尼茨基（联共）；贝尔，墨菲（英国）；台尔曼，勒麦列（德国）；加香，塞马尔（法国）；李光，斯特拉霍夫（中国）；福斯特，洛夫斯顿，卡尔顿（黑人）（美国）；塞拉，加兰迪（意大利）；萨里斯（希腊）；伊列克，萨波托茨基（捷克斯洛伐克）；库斯特齐瓦，连斯基（波兰）；库西宁（芬兰）；安贝尔—德罗（瑞典）；基尔博姆（瑞士）；片山潜（日本）；西坎杰尔（印度）；马纳瓦尔（印度尼西亚）；拉塞尔达（南美）；斯托伊科（巴尔干）；洛佐夫斯基（工会国际）；希塔罗夫，许勒（青年共产国际）。

当选的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当斯大林同志在主席台上出现时，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主席团全体成员和我们一致起立欢迎斯大林同志。然后，全体高唱《国际歌》。

确定议程

根据主席团的建议，大会通过了下列议程：

1. (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报告人：布哈林）；(2) 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报告人：斯图契卡）；(3)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报告人：许勒）。

2. 共产国际纲领（报告人：布哈林）。

3. 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斗争的措施(报告人:贝尔(英国);副报告人:施内勒尔(德国),加兰迪(意大利),洛夫斯顿(美国),巴贝(法国))。

4. 殖民地革命运动问题(报告人:库西宁;艾尔科利(意大利);三位副报告人:斯特拉霍夫(中国),萨明(印度尼西亚)和西坎杰尔(印度))。

5. 苏联和联共(布)党内状况:(1)苏联的经济状况(报告人:瓦尔加);(2)联共(布)党内状况(报告人:曼努伊尔斯基)。

6. 选举。

致 贺 词

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光^①同志的祝词: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战斗敬礼。

共产国际,这个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被压迫人类的领袖和解放者,正在列宁主义的领导下,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

共产国际自建立以来,在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心脏——莫斯科,始终高举着革命的大旗。共产国际把所有国家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民集结在自己周围,并引导他们进行斗争。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经把一切被奴役的人们动员起来。我们正在

^① 滕代远的化名。——译者注

阔步前进，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运动，在苏联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援下，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共产国际在中国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这支力量在最近几年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去年的革命高潮时期，给了世界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1925年的上海事件导致了全国性的反帝群众运动，英勇的省港大罢工在16个月期间几乎使香港变为一座荒岛，广州革命军北伐，上海工人三次举行武装起义，汉口和九江爆发占领英租界的事件，武汉成立左派政府，所有这一切使帝国主义在中国陷于窘境，屡受打击，不得不节节败退。

中国的大革命，由于不利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的无耻背叛，更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严重机会主义错误，终于遭到惨重失败。为了不惜一切代价以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上的偏差，共产国际直接向党员群众发出了呼吁，改组了中共领导，并且毅然决然地提出了通过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我们党才能将数十万、数百万劳动者聚集在自己的口号下，以便在必要的时刻向反动派发动反攻。中国革命运动过去是而现在依然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前，中国党的任务首先是争取群众，准备掀起新的革命高潮。广州苏维埃起义，目前正在广泛开展的反日运动、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农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不断发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新的革命浪潮正在到来。

同志们！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处境空前困难。它正在国际反动派施行骇人听闻的恐怖手段的情况下开展活动。它比任何时候都

更加需要同共产国际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更加需要得到各兄弟党最有力的支持。党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为中国革命锻造出更加有力的武器。我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名义高呼：

中国革命胜利万岁！

国际革命胜利万岁！

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日本共产党代表片山潜同志的祝词：

我代表日本共产党和日本革命工人向你们致敬。

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资本家向无产阶级，向农民，向全世界共产党的猖狂进攻。

法国帝国主义正在叙利亚肆虐。美国帝国主义正企图镇压尼加拉瓜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在中国，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正力图消灭那里的革命。荷兰在镇压爪哇的起义。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野蛮地压迫和剥削朝鲜和福摩萨^①。

但是，跟随共产国际前进的工人和农民，革命斗志更加昂扬。英国矿工的总罢工、殖民地各国人民的指路明星——中国革命、向全世界显示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气概的维也纳工人起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同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无产阶级为反对帝国主义而结成的统一战线，这一切都可作为例证。

我们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是为了讨论和解决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种种问题，讨论和解决同图蒙包爾我們的社会主义國苏联的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种种问题。我谨代表日本共产党向僑

^① 指我国领土台湾省。——译者注

表大会致以敬礼。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万岁！

中国革命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南美洲代表团代表拉塞尔达同志的祝词：

我以南美洲各国代表团的名义，代表你们在美洲大陆这一地区的战友，向你们致以敬礼。

我以这些代表的名义，向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各国共产党表示敬意。我们南美洲年轻的共产党的代表，向在同无产阶级压迫者的英勇斗争中诞生的欧洲老党致敬，首先向苏维埃俄国英雄的党致敬。是它完成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在解放全世界工人的事业中作出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我还要向共产国际致敬。对于全世界的工人来说，共产国际是保护他们，使他们免遭社会党叛徒叛卖行径的侵害，使他们得以摆脱形形色色的压迫者，摆脱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唯一力量。

深受美英帝国主义压迫的拉丁美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寄全部希望于这次代表大会，期望这次大会能给各党输入新的活力，把反对反对派机会主义倾向的思想斗争进行到底。毋庸置疑，第六次代表大会必将成为国际工人运动最重要的阶段之一。

南美大陆年轻的革命运动一向以欧洲共产党老战士们为师，代表这个大陆工人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要我向在这里聚会的各国无产阶级的代表致敬，他们相信，第三国际的火焰必将越烧越旺，必将取得越来越多的胜利，这也是世界一切工人、一切贫苦农民、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希望所在。

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卡里略同志的祝词：

我代表墨西哥共产党向你们致敬。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在国际无产阶级的红色堡垒、反帝运动的首都莫斯科召开了。这次大会将讨论全世界共产党当前面临的革命任务。摆在第六次代表大会面前的是具有国际意义的伟大任务。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帝国主义列强正在疯狂地策划新的世界大战和反苏战争。

我们的国际通过一次又一次代表大会，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切被压迫者的国际，成为所有国家工人和农民的国际，成为世界各大洲受帝国主义者剥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际。

拉丁美洲国家现在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后院，成了它在未来战争中的后备军。应当把这些在目前组成帝国主义后备力量的国家变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变为苏联的同盟军，这正是墨西哥及中美、南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我们进行的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斗争，就其实质而言，也就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反对强大而凶狠的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

拉丁美洲觉醒了。最近几年，是开展革命斗争的几年，是建设革命组织和创立共产党的几年。现在，拉丁美洲各国都已建立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我们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响应列宁的号召，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加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墨西哥持续不断的斗争，尼加拉瓜桑地诺的英勇奋斗，玻利维亚的农民起义，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革命骚动，都告诉人们，拉丁美洲工人和农民奋起打破帝国主义桎梏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满怀深切的信念：在一场反对苏联的战争中，拉丁美洲必将站在苏联一边。拉丁美洲工人和农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大国，首先是英国和美国，同样也是苏联的敌人。“把战争指向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强盗！”这就是现在响遍墨西哥到阿根廷各

地的口号。

我们数以百计的优秀同志在斗争中牺牲了。在马卡多斯铁蹄下的古巴，在正在对教会、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墨西哥，在戈梅斯将军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以及在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和巴西（在那里，我们的共产党正不顾种种迫害，坚持地下斗争），到处都有最勇敢、最优秀的工人和农民在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值此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之际，我们向大会保证，我们将毫不懈怠地工作，把牺牲者为之奋斗而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我们将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高举世界革命的红旗，引导千百万群众去同我们的敌人斗争。

向为我们指明胜利道路的俄国无产阶级致敬！

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先锋队——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万岁！

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怀特曼代表美国黑人工人和农民向代表大会致贺词：

同志们！美国存在着涉及数百万黑人的严重的种族问题。这些黑人在生产部门受着残酷的剥削，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并遭到各种形式的限制和迫害。从摆脱奴隶制度、获得解放之时起，黑人就在各种各样不同的组织和运动的旗帜下，为争取真正的自由而不间断地开展斗争，可是，得到的结果却是更大的压迫。

现在，黑人投向共产党一边，把共产党看成是不分种族，代表美国劳苦大众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党。我们正在努力把美国数百万黑人工人团结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之下。我们懂得，唯有共产

国际能解放黑人；给黑色人种以真正的自由，帮助他们摆脱资本主义的压迫，而且我们正在作出努力，使所有的黑人都懂得这一点。共产国际给黑人带来新的希望。在我们运动的旗帜下，我们正在向南部各州，向我们最落后的地区渗透和发展，我们正力图将革命的火种传播到黑色人民当中去。

黑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却受到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极大的不公正待遇。不管他们是在美国，在东印度，还是在非洲，他们到处都是国际资本和剥削的牺牲品。

美国共产党已深入到南部各洲。深入到那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黑人中间。美国共产党的目标是要为黑人赢得政治上的平等和社会平等。

同志们！我代表美国正在斗争中的群众向你们致敬。我这次已经是第二次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了，我可以说，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的四年中，共产国际在争取黑人站到共产主义一边的事业中已经取得了成果。这一事业正在向前发展，而且我们清楚地知道，黑人成为北美合众国革命运动队伍中人数众多的重要集团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印度代表团代表西坎杰尔·苏尔同志的祝词：

印度代表团代表印度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向你们致敬，我们向苏联无产阶级致以敬礼，并向大家保证，印度工人和农民将同苏联无产阶级和全世界的工农一起同帝国主义展开斗争。

你们大概已经知道，印度现在正经历着深刻的危机，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席卷了全国。曾在1920—1921年期间遭到严重失败的印度工农，再次掀起了革命运动，并且接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学会了采取更有效的方法同帝国主义，同英国工党及其麦克唐

纳之类的领袖（这些人不过是资本主义控制的傀儡而已）等等进行斗争。

印度的工人和农民是在 1920 年才知道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的。俄国革命的消息深深地打动了印度农民的心，所以，印度农民目前思想上有很大的进步。英国帝国主义和我们本国的资产阶级曾企图使印度农民永远处于愚昧无知的落后状态。英国帝国主义耗费巨资，进行反布尔什维主义和反苏宣传。但是，印度无产阶级通过失败和胜利的实际教训，学会了许多东西。它已具有深刻的阶级觉悟，懂得世界上唯一的工农共和国才是它的朋友。

你们都知道，现在发生于印度的冲突是深刻的危机引起的，英国帝国主义者正在竭尽全力镇压印度的工人和农民运动。帝国主义采取野蛮的手段对印度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报复，但是，它所实行的骇人听闻的迫害只能更加激发劳动群众的阶级觉醒。

印度工人已经清楚地了解国际形势，他们已经认识到国际团结的意义，正力求同全世界的工人建立合作关系。我们在地理上是同其他国家，包括同先进的国家及苏联，相互隔绝的。这种地理上的障碍至今仍妨碍着我们同在共产国际出色的领导下奋起斗争的世界无产阶级建立牢固的联系。不过，英国共产党已经给我们派去了组织工作者，帮助我们开展对英国帝国主义和印度资产阶级的斗争。

工农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国际团结万岁！

打倒资本主义！

莫斯科无产阶级的祝词：

科托夫同志代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无产阶级

发言，他说：

“莫斯科的无产者深信，代表大会正确地指出了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途径。莫斯科的无产者和莫斯科的党组织知道，第六次代表大会将采取它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以保卫世界革命的发源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不止一次地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同所有国家无产者的团结一致，莫斯科的工人阶级和无产者将举行游行，欢迎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实际行动再次表明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

莫斯科无产者坚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到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米特罗科夫代表红军向代表大会致贺词：

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莫斯科卫戍区全体指战员向你们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红军敬礼！（鼓掌，高呼：“红军万岁！”）你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研究进一步推动革命前进的世界大事。你们将对世界革命运动及其在第五次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取得的成就作出总结。你们还将在这一经验基础上为全世界各共产党制订出总路线，以便使千百万工人阶级更快走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两个阵营——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阵营和资产阶级阵营及其走狗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代表大会。前一个阵营怀着希望注视着大会，期待大会能给他们进一步开展英勇的斗争作出指示。后一个阵营则暴跳如雷，想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

同志们！你们在这里作出的一切决议，我们都将认真学习，刊登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和报道大会进展情况的所有报纸，我们红军战士都会反复地阅读，因为我们始终在培养自己的国际主义情感。（鼓掌，高呼：“万岁！”）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是我们的

事业。我们为世界工人运动的每一次成功而感到欢欣，为它的任何一次失败而深感痛苦。

革命运动正在全世界发展，资产阶级匪徒对革命的仇恨也在加深。它想把世界革命运动镇压下去，想摧毁这个运动的发源地，摧毁苏联，策划新的战争。

你们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任务是，要研究如何实行反击，以打破世界资本的进攻。如果帝国主义者策划发动一场战争，那么，我们应当把这场战争变为国内战争，使工人阶级能在战争中获得胜利。

我们不要战争，我们不需要大炮和坦克，我们需要耕犁和拖拉机。但是，如果需要，我们就应当做好准备，而且已经做好防御的准备。一旦时刻到来，作为联盟的儿子，工人革命中诞生的孩子，我们工农红军是决不会让自己的母亲受欺侮的！（鼓掌，高呼：“万岁！”）与一切资产阶级的愿望相反，飘扬在苏联的红旗正在燃起革命的火焰，并将继续燃起革命的火焰，直到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腐朽的残余焚烧干净。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代表起立，向发言者欢呼并高唱《国际歌》。）

索科洛夫同志代表航空工厂工人向第六次代表大会致贺词：

他在代表工厂工人向代表大会敬献礼物——该厂工人制造的飞机部件模型时，说道：

“我厂工人现在制造的飞机部件是沙皇时期从未制造过的。但是，身在劳动岗位，我们工人并没有忘记，国际资本强盗正在包围着苏联。我们工人在坚持和平生产的同时，随时准备给苏联的

一切敌人以应有的回击。”

塔拉索娃同志向代表大会宣读了红霞工厂工人给代表大会的贺词，贺词写道：

“我们工厂是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请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向各国工人讲一讲，我们这个小厂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我们工厂成长的事实，也和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样，它再次证明，联共（布）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引导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让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去继续叫喊我们似乎已经蜕化变质了吧！我们依然坚信并且断言，联共（布）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

叶夫季希耶夫同志代表鲍马诺夫区莫斯科电器厂工人致词说：

“同志们！我代表莫斯科电器厂4 000名男女工人向你们致以敬礼。我们正在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建设我们的工厂，并将继续这样做。我厂工人以自己顽强的劳动，组织起了灯泡、探照灯及变压器和钨丝的生产，还建立了绝缘材料车间。许多人不相信我们的建设成就。在我们的上层领导中，也不乏这种缺乏信心者。他们企图分裂我们党的队伍。但是，我们工人十分清楚，通向社会革命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厂的男女工人同样清楚地知道，你们那儿也有信心不足者。但是，我们坚信，你们一定会像我们彻底清除我国的反对派那样，把你们那里的缺乏信心者清除干净。我厂工人请我转告，他们十分关注你们的斗争，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他们向中国共产党致以热烈的敬礼。我厂工人还请我向你们转达他们的邀请，欢迎你

们到我们工厂来看看我们的劳动情况。我们曾经立志为你们准备一份礼物——建成一座拥有 4 000 工人的工厂，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现在又提出要在下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把我们的工厂建设成不是拥有 4 000 人，而是拥有 12 000 名五金工人的工厂。
(鼓掌。)

我们深信，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你们也将为我们准备好一份礼物——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外，再增添几个苏维埃共和国！”

科利佐夫同志代表索科尔尼基区工人向代表大会致贺词，他说：

“工人阶级坚信，在共产国际和谐而积极的指导下，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一定能够有组织地给资本家及其走狗以坚决的回击。工人们深信，在苏联的支持下，所有国家无产者在本国升起红旗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伊万诺夫同志代表哈莫夫尼克区工人致词

他说：哈莫夫尼克区各工厂的工人在同苏联全国无产阶级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牢记着共产国际面临的任务。哈莫夫尼克区的共产党员和工人们永远忠于卡尔·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忠于共产主义思想。

戈尔什科夫同志代表三山纺织厂男女工人致词，他在向代表大会表示祝贺时说：

纺织厂的工人已使劳动生产率超过了战前水平，工人的工资在不断提高。但是，和平生产遇到了帝国主义设置的巨大障碍。一场矛头指向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进攻正在策划之中。发言者以三山纺织厂代表团的名义宣布说，我们工人决不会允许对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动突然袭击。(鼓掌。)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义务在回到各地以后，制止威胁着苏联的危险。这不仅是兄弟共产党的义务，而且是它们的责任。

罗戈日-西蒙诺夫区工人代表普里亚尼奇尼科夫同志致词说：

“罗戈日-西蒙诺夫区的工人和职员通过我们这些代表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致以衷心的、热烈的敬礼。我们工人时刻注视着资产阶级的种种阴谋活动，因为它们正力图破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并以此扼杀世界革命。我们工人随时都作好准备在共产国际这个列宁主义的参谋部领导下奋起保卫被压迫的人民。”

阿班金同志代表莫斯科河南岸区工人致贺词，他说：

五金工人懂得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面临的任务的严肃性和困难程度。他们深信，代表大会一定能够坚决地、毫不含糊地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按照列宁主义的方式解决这些任务。

五金工人们请我们转告自己的西方朋友和东方朋友，他们的俄国兄弟正紧握手中的锤子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也决不会放下手中的枪。他们将同自己的外国兄弟一起，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肩并肩地走向世界的十月。

卡尔塔绍娃同志代表伏龙芝纺织厂发言：

“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伏龙芝工厂 3 500 名红色纺织工人向你们表示敬意。我们红色纺织工人是革命的纺织工人。当我们代表团前来参加大会时，我们的女工们对我说，她们保证，不管多么艰巨，他们都将排除万难，沿着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前进。”

同志们！我们满怀信心和希望，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都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红色的旗帜，列宁同志的旗帜将飘扬在

全世界！”（鼓掌。）

戈尔季延科同志代表莫斯科县各工厂致贺词，他在向代表大会代表发言时说：

“祝愿今天的夜晚成为各国无产阶级同革命苏维埃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进行历史性会见和兄弟般会见的夜晚。

派我们来的同志们要我向你们转达，我们将随时注视你们大会的进展情况。我们将会考虑你们的每一个发言和指示，并把它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接受，以便沿着列宁指明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这种领导应当是地地道道的列宁主义的领导，应当是真正革命的领导。我们作为劳动者的阶级，作为无产者的阶级，只有这样的领导我们才会接受。

同志们！你们听到了莫斯科市无产阶级代表对你们代表大会历史性工作热情洋溢的贺词。但愿这些贺词能成为你们的指路明灯，而且我深信，你们一定能够正确地指明各国无产阶级应走的道路。

你们将在这里，在各国无产阶级的祖国，解决伟大的任务。恕我冒昧地表示，我同意在这里致贺词的莫斯科各工厂代表们所说的话：我们的基本任务及我们的愿望就是，将来不仅能在这里，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欢迎你们，而且能在其他三四个国家去向你们表示祝贺。”

乌鲁莫夫同志代表乌兹别克工人和农民致词，他说：

十月革命前，乌兹别克一直处于埃米尔统治之下，处于俄罗斯官僚压迫之下。十月革命才使乌兹别克获得解放。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乌兹别克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出色地实行了土地改革，雇农们获得了土地，全国劳动者的福利大为改善。封建主义

被消灭了，大规模解放妇女，使妇女摆脱受奴役地位的工作正在进行。

乌鲁莫夫同志代表乌兹别克工人和农民向第六次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敬礼，并说，乌兹别克的工人和农民随时准备帮助其他国家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活动。

切尔尼科夫同志代表红色普列斯尼亚工厂党的积极分子向代表大会致贺词：

发言者指出，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新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召开的；我们党员工人始终密切地注视着共产国际各支部开展的大规模的活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纲领将成为红色普列斯尼亚工厂每个党员必备之书。

发言者还讲到，党员工人不仅注意同经济困难作斗争，而且关心国外的革命运动，他接着说：

“现在，我们红色普列斯尼亚工厂正在开展国际周活动。我们正在学习射击，只要红色参谋部——共产国际一声令下，我们会向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伸出兄弟般的援助之手。我们普列斯尼亚工厂的共产党员时刻准备着。”（鼓掌。）

在莫斯科无产阶级代表致贺词之后，法共代表加香同志以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名义致答词，他说：

“在这个讲台上向大会表示祝贺的有红军以及莫斯科和苏联各地的许多代表团的代表。主席团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我们要告诉那位红军士兵，他在这里发出的声音将会得到出席大会的代表的支持并由他们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我们说，这位年轻的普通工人士兵的声音将压倒世界帝国主义一切将军、元帅、外交官和他们的其他奴仆的高谈阔论。这位士兵说，他不

仅是苏联红军的一名战士，而且是国际红军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士兵。请告诉这位士兵，世界上的一切无产者将把这些话铭记在心。他向苏维埃革命——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母亲发出呼吁时所讲的话，使我们极其兴奋，极为激动。

在这个讲台上发表讲话的莫斯科各工厂的男女工人们，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所取得的出色成绩，讲述了他们付出的艰巨劳动。一个濒临危机深渊的国家现在伸直了腰杆，完全站立起来并充分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几年不来莫斯科的人，现在来到这里，都对苏联经济奇迹般的发展惊叹不已，对苏联面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和帝国主义世界的反对，在毫无任何外援情况下赢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惊叹不已。我们参观过一些工厂，看到了莫斯科一些五金厂和纺织厂的生产情况。所以，同志们，我可以告诉你们，就生产率而言，你们的某些工厂现在绝不比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的企业逊色。能亲眼看到你们在短短几年内，依靠自己的努力，如此大规模地发展生产，我们是感到无比高兴的。我们还听说，你们制订了宏伟的设想，听说你们要彻底重建整个俄国。你们打算把你们创造性的努力扩展到农村去。你们的计划是要使全世界的生产力来一次革新，这一宏大计划确实令人惊叹不已，但我们认为它不是不可能实现的。

确实，我们中间不少人对俄国革命从未失去过信心。但是，现在我们是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目睹我们的希望首次获得实现的情景。四年，同志们，四年时间，你们就使我们大喜过望了。

而且，在这个讲台上，在共产国际开幕式上，我们听到了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民的声，听到最受屈辱的种族和几个世纪以来备受命运折磨的人们的呼声。第三国际感到自豪的是，它正以

自己的旗帜庇护这个深受压迫的世界。共产国际正发挥着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深切关注着备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令人诅咒的整个旧世界蹂躏的人们，号召全世界的奴隶们起来举行暴动。

在这里聚会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代表们，在向红色莫斯科致以衷心祝贺的同时，也不会忘记第一个发出起义信号的列宁格勒。代表们向俄国工人致敬，向红军士兵们致敬，向苏联农民致敬，向第三国际致敬！”（热烈鼓掌。）

会议主席请德国共产党代表台尔曼同志代表欧洲各国共产党致贺词：

我代表共产国际各欧洲支部，向出席这次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向俄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致以革命的敬礼。我首先要讲的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即反对日益严重的反苏战争的危險。从第五次代表大会到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看到连续发生了多起把矛头指向苏联的事件，看到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可以看到帝国主义正集中力量，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活动，由于德国帝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采取了比过去更为坚决的态度，加入为进行反苏战争而建立的阵线，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革命联盟正在完成其策划战争的进程。中国军阀建立的残暴的反革命制度是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战争准备活动有直接联系的。只需指出若干外部征兆，即可看出从第五次代表大会至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战争危險日益严重的程度：如英国通过了劳工法，法国实行了保罗·邦古军事法，中国和日本对革命阵线采取了残酷的恐怖手段，印度的革命运动遭到镇压。再如各国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制订加紧军备的计划；此外，还有最近发生在波兰—立陶宛战线的

大规模演习，英国舰队在波罗的海炫耀武力以及日本在中国的进攻等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反苏战争的危险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了。在1925年马赛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在讨论“东方的战争危险”问题时，公开表示赞成其代表在国际联盟中所持的资本主义立场，提出了明显的不怀好意的说法，诬称苏联正为新战争的爆发推波助澜。我们知道，社会民主党之所以需要散布这种无耻谎言，需要耍弄如此令人吃惊的伪善手法，为的是阻挡和破坏无产阶级群众革命意识的成长，因为这些群众十分经常地表现出对苏联的同情，密切地注视着十年来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壮大情况，并且同俄国无产阶级一道经历着这一专政发展的各个阶段，他们渐渐地相信，同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的苏联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和平堡垒。第二国际和靠拢它的阿姆斯特丹国际以及卢塞恩国际继续扮演着它们在世界大战时期所扮演的反革命角色，无论出现何种革命形势，它们都十分忠实于这一角色，现在，为了反对革命的反帝阵线，它们采取了更为尖锐和更富侵略性的方式来扮演这一角色。

我们看到，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如今正转向更坚决地支持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沆瀣一气，进行反苏的战争准备。

发生于不久前的最新事例是，由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斯特莱斯曼和格尔曼·米勒联合政府已宣告成立。这个社会民主党政府是一个策划反苏战争的内阁，也是推行反动的企业政策和对本国无产阶级实行迫害政策的内阁。

共产国际毫不含糊地宣布，它将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以反对欧洲的任何社会民主党政府，它将竭尽全力率领无产阶级群众开展斗争，以推翻这些政府。

第二国际及其组织渗透了民族主义思想，毫无顾忌地推行反苏路线，从而加深无产阶级队伍的分裂。因此，共产国际所属各共产党，尤其是它的西欧支部的中心任务应当是，同新的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威胁作斗争。与此相联系，还应加强斗争，以反对改良主义者在全世界工人阶级队伍中推行的分裂主义政策。除此之外，共产国际所属各欧洲支部还应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国际任务并以切实的行动实现这些任务。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当懂得，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采取团结一致的国际行动，去支持我们那些正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同日、英、美、法、意等国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兄弟们。但是，与此同时，各国必须首先组织并开展反对本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从第五次代表大会到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共产党和革命运动在世界各地均有发展。随着战争危险的增长，共产国际领导的革命阵线也逐步壮大。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加紧反苏斗争的同时，它正到处加强对共产主义的进攻。在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有一个力量很弱的革命阵线和几个不大的共产主义团体。现在，已经有一个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强大的革命阵线，它随时都作好战斗准备。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庞大的群众组织，如德国的红色前线战士同盟。这些组织也将以革命的精神履行自己的任务。战争时期，整个世界的工人阶级及工人阶级的革命队伍未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未能将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以推翻资产阶级，有了1914—1918年及其以后一段时期的经验，群众的革命情绪再次出现上升趋势。苏联正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开展了国防周活动，动员苏联工人和农民起来保卫全世界无产者的唯一祖国。我们希望共产国际各支部都仿效这一榜样。在全世界开展

一次国际性的国防周活动，以保卫苏联和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及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共产国际的任务在于，一旦阻止不了整个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反苏战争的爆发，那就应当动员和教育群众起来把这场战争变为推翻资本主义政府的国内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就是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日常性斗争。在这战争日益临近的历史时刻，共产国际应当像俄国党和俄国无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经受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战斗考验。在上次战争期间，列宁领导推翻了血腥的沙皇统治，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出现了苏维埃政权——全世界劳动者唯一的堡垒。在未来的战争中，毫无疑问，一系列资本主义政府将会崩溃，在凶狠残暴的资本主义废墟上将耸立起一个个苏维埃共和国。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知道，世界大战的可怕情景至今在劳动者心目中仍记忆犹新，他们不会轻易地忘却这场大屠杀。社会民主党对他们对手（这个对手正在进行反对新战争威胁的斗争）的强大感到害怕，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感到害怕。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巨大矛盾、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东方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些都是伟大进程的重大征兆，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应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应做好准备，在资产阶级企图将群众推入世界大战的时刻，立即将巨大的革命力量动员起来，各支部应在列宁提出的口号下，在布尔什维克党 1917 年提出的口号下，在推翻本国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保卫苏联、争取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口号下，率领这些群众投入国内战争。（热烈鼓掌。）

施内勒尔同志宣读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贺信

莫斯科

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代表收

1928年7月11日于柏林

亲爱的同志们！

德国红色前线战士同盟中央委员会向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各国共产党代表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革命敬礼。

值此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全世界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工人都将目光转向了莫斯科，德国红色阶级阵线的战士们也以极其关注的心情和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代表大会的活动。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全世界劳动者国际阶级阵线革命意志的生动体现，是这一阵线日益强大的表现。

世界各地、世界各国人民都向无产阶级祖国的首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以便讨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方法和策略，为各国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创造前提条件。

根据列宁的精神召开的共产国际总参谋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必将激励全世界的劳动者奋起反对矛头指向苏联的帝国主义威胁，必将使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获得犀利的武器，去向改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展开斗争。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是在共产主义和革命力量日益发展壮大的标志下召开的。同时，它也是在帝国主义势力和无产阶级的敌人聚集力量反对苏联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时期召开的。

因此，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应当紧密团结共产国际所属各党，把它们溶合为一支统一的、团结的钢铁队伍，使它们能胜任伟大艰巨的任务，能克服他们所面临的困难，胜利地将斗争进行到底。

德国红色前线战士热切希望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自己的工作，能促进全世界劳动群众聚集到共产国际旗帜的周围。我们以兄弟般的情意紧握你们的手并再次宣读联盟的誓言：

无论何时何地，永做革命战士！

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为苏联，为世界革命而斗争！

谨向你们致以革命敬礼！

红色阵线万岁！

红色前线战士同盟

代主席 维利·莱奥夫

红色青年阵线

代主席 韦尔纳·尤尔

片山潜同志宣读共产国际英国支部、美国支部和日本支部提出的告中国工人农民书。

“告中国工人和劳动人民书”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向伟大革命的先进队伍——中国无产阶级及其率领下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战斗的亿万劳动者致以热烈的敬礼。

中国工人和农民们！各国无产阶级怀着沉痛的心情分担你们遭受惨重损失的痛苦，为你们获得胜利而欢欣鼓舞。为了在中国推翻帝国主义，为了在世界帝国主义阵线的重要地段打开缺口，需要有自我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而中国劳动人民以其大无畏精神、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以及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震惊了全世界。

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在反对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倒下去了，在卑鄙的国民党刽子手的屠刀下牺牲了，但是革

命依然存在，而且革命队伍日益壮大。烈士们永垂不朽！光荣归于高举革命斗争红旗继承先烈事业的战士们！

中国工人们！领导反对整个资产阶级阵营的民族革命斗争，需要有高度的阶级觉悟，能够准确地估计革命的动力和革命征途上的艰难险阻，正确地选择斗争每一阶段应采用的手段。中国革命只有奉行经过斗争实践检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才能取得胜利。为了开展土地革命，为了领导千千万万分散的农民，而不是把自己混同于农民之中，为了警觉地注视不可靠的小资产阶级同盟者的一切动摇现象，并在发觉他们试图实行叛变时就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清除出去，中国工人应当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能认清自己历史使命的阶级，建立起有群众基础的人数众多的共产党。

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已从备受帝国主义走狗残酷剥削和愚弄的涣散群众，变成为极其重要的国际革命因素。

大会宣布，它为有中国这支队伍而感到自豪，为中国共产党空前迅速地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在斗争前列所表现的英雄气概而自豪，为中国共产党在揭发和纠正自己队伍中的错误时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而自豪。

没有一个被压迫国家听不到革命中国敲响的警钟的回声。上海和汉口，海陆丰和广州的范例不仅召唤人们奋起斗争，而且教会人们去夺取胜利。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已成为东方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财富。印度无产阶级正进入革命斗争的新时期，它不仅记取了1922年本国资产阶级无耻投降的教训，而且也记取了国民党形形色色背叛行径的教训。印度尼西亚劳动群众的起义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他们正在聚集新的力量，以中国为榜样重新武装自己的战士。

在朝鲜、埃及以及其他地方，农民群众通过中国革命的范例看到，只有同无产阶级结成紧密的联盟并接受其领导，才能从征服者和地主手中夺得土地。在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无产阶级在自觉地规划各阶段的革命斗争时，往往总以闪耀在广州英雄们旗帜上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帝国主义者的国际反间谍机构到处在跟踪中国革命工人。企图以腐朽的改良主义毒化民族革命斗争的第二国际也最害怕中国革命者的揭露。上海、广州、汉口的工人，是整个被压迫东方胜利的反帝革命斗争的代表。

亲爱的同志们，国际无产阶级清楚地认识到，你们的斗争动摇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突击队。你们面临的任务是十分伟大而又极其艰巨的，因为你们要在帝国主义大炮和中国政府疯狂镇压的交叉火力下重振自己的队伍，动员新的力量，吸收新的阶层，以准备向尚为敌人所控制的阵地发起另一次攻击，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职责，将不惜一切牺牲，支持你们进行这一斗争。

共产国际认为有必要声明，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尽管它的个别代表人物表现了英雄主义精神，但未能十分有力地保卫中国的工农革命。第六次代表大会认为它的一项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国际力量去支持中国的民族革命斗争，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劳动群众的心目中，广州起义是中国工人最伟大的英雄气概的典范。但愿广大工农群众未来的起义能按照始终一贯的、经过彻底检验的列宁主义原则加以组织，并取得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成为中国的胜利的十月革命。

独立统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各国被压迫人民胜利的起义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告工农书获得一致通过。）

福斯特同志（美国）：

同志们！我想向代表大会提出一项关于开展保卫中国革命的国际双周运动的议案。这个运动由红色工会国际出面组织。中国工人和农民正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反对他们。中国资产阶级在不断地杀戮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优秀代表。各国工人必须联合起来支援中国革命。在完成这一任务——组织全世界工人保卫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来自第二国际方面的暗中破坏。

世界帝国主义的走狗社会民主党正竭尽全力，阻挠我们动员无产阶级去帮助中国劳动群众。

应当指出，尽管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各党作了一切努力，工人们仍未能充分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意义，未能给予中国革命以应有规模的支持。双周运动的任务首先在于毫不迟疑地向中国无产阶级提供物质援助，与此同时还要给中国革命以积极的援助。运动自今日起，将持续两周。它将在世界各国开展起来。在莫斯科，已由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青年共产国际、农民国际、国际工人救济会、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组成双周运动中央委员会，有些国家建立了工作组来领导这一运动。红色工会国际正在利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条件，广泛开展这一运动。它的杂志已出版一期专刊，强调这项活动的必要性，它还在为这一运动开展广泛的专题宣传。这项运动的内容应包括为中国工人筹款（苏联工会已捐献 10 万卢布），组织游行示威，在“不许干涉中国！”

的口号下组织声援委员会，以及开展广泛的保卫中国革命的群众运动。

现在请允许我宣读这个决议案，提请代表大会批准：

“支援中国无产阶级的双周运动”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向一切工人和农民呼吁，向一切同情中国无产阶级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人们呼吁，全力支持红色工会国际于7月17日至31日开展的支援中国工人运动的国际双周运动。”

(呼吁书一致通过。)

汉宁顿同志 (英国)：

同志们！在就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议案发表意见时，我想首先指出，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将意大利共产党的斗争摆到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显著位置上来，意大利共产党的斗争堪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英勇搏斗之一。在墨索里尼的专制制度下，数以万计的优秀无产阶级战士被投入监狱，备受酷刑，横遭杀害。如今，当最可靠的革命战士在意大利的刑讯室惨遭折磨之时，当数以千计的无产者被流放到荒岛之时，当成千上万的其他人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逼得发疯和折磨致死之时，职工大会总委员会——英国工会竟然与公开颂扬法西斯主义的阿弗里德·蒙德先生进行合作。我们英国共产党人坚决同职工大会总委员会这种背叛行为作斗争。我们同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意大利共产党心心相印，紧密团结。意大利共产党为反对法西斯主义，为建立社会主义开展了六年的斗争。我们深信，它一定能够冲破一切疯狂的迫害，赢得胜利，引导意大利工人和农民彻底摧毁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专政。

谨向大会提出如下议案：

“代表大会致各国共产党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呼吁书

六年来意大利工人阶级一直受着法西斯制度的压迫。被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逼得走投无路的法西斯主义正在加紧进行压榨。工人和农民经过50年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取得的成果正被法西斯主义消灭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建立的贪得无厌的剥削制度。阶级组织被公司所取代，工人和劳动者被强行赶入行会。这种行会是对广大群众进行法西斯监督的工具，因为有了这种行会，工厂和乡村的生活到处都带有苦役般强制劳动的性质。

然而，这种依靠残酷的暴力和迫害来维持的制度，一刻也未能阻挡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反抗。被流放到荒岛或被投入监狱的革命工人达6 000人之多，这就证明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斗争一刻也未停止，证明了他们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和对法西斯制度的英勇反抗。法西斯资产阶级感到共产党是对它的直接威胁，于是疯狂地向落入他们手中的受害者扑将过去，残酷地折磨他们，卑鄙而怯懦地将他们杀害于监狱的刑讯室中。索齐、里瓦和其他无产阶级英雄的惨死，激起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无比愤怒。法西斯刽子手们的镇压制度正威胁着成千上万名战士的生命。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对意大利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表示钦佩，向它们表示无限声援之情。

代表大会热烈地号召普遍地、不懈地开展工作，将无产阶级力量动员起来，同墨索里尼政权进行斗争；在全世界革命群众中掀起反对墨索里尼政权的抗议浪潮。法西斯政权正在疯狂地准备

挑起战争。

意大利工业部门的 2/3 在为战争进行生产。法西斯意大利——这是一所巨大的监狱，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一座巨大的军火库。

同志们！

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神圣职责。要把你们的力量动员起来，反动法西斯主义和国际反动派的罪恶图谋。把无产阶级群众发动起来去援助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

打倒血腥的法西斯专政制度！

打倒特别法庭！

打倒屠杀意大利工人和农民的刽子手！

意大利共产党万岁！

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国际团结万岁！”

（呼吁书一致通过。）

塞马尔同志（法国）宣读《告苏联劳动人民书》：

“告苏联工人、农民、红军和红海军战士书

同志们！

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代表在共产国际旗帜下进行斗争的千百万革命工人和农民，向世界革命的强大的、勇敢无畏的先锋队——苏联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农民、红军和红海军战士们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十年多来，你们为捍卫和巩固你们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初年代，为了反击和粉碎白匪雇佣军及企图以铁拳扼杀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资本的军队，你们

进行过英勇的搏斗，你们还同图谋破坏和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国内反革命分子进行过无情的斗争，后来，时代变了，你们又以同样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同样高昂的热情和同样的革命信念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尽管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遗留给苏联无产阶级的破败经济伤痕累累，尽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的社会主义创造怀有刻骨仇恨，并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可是却不能阻挡无产阶级革命继续胜利地向前发展。

你们恢复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工业，你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从而对整个经济实行了改造，越来越多地排挤了私人资本主义成分。你们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作，以实现在集体化道路上改造农民经济的实际任务。

总而言之，你们自力更生，克服一部分与反革命白匪相勾结的专家的罪恶性破坏，一次又一次动员力量与残存的官僚主义祸害进行斗争，终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对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者来说，你们的成就是证明你们创造的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的生动事例和形象化教材。全世界工人通过自己生活与苏联劳动人民生活的对比，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别正在日益加深。

在那边，资本主义生产的合理化正日益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使劳动人民的物质条件不断恶化！给剥削者带来惊人的利润。在苏联，情况相反，技术的一切发展均为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而服务。

在那边，实行的是 10—12 小时工作日。而在实行 8 小时工作日的某些地方，则始终有人企图取消它或延长工作日。而在苏联，

无产阶级政权已着手实行7小时工作日。

在那边，对少数民族和殖民地人民的迫害和暴力正在不断升级。在苏联，昔日深受沙皇制度压迫而现今自愿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各族人民，正在互助合作的环境中自由地发展。

你们的经济实力在增长，无产阶级专政阵地为加强，你们的事业得到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支持，这就使资本主义世界更加仇恨，更加暴跳如雷。

因此，国际反动势力正在组织自己的力量，策划对苏联的武装进攻。

所有帝国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正聚集一起，组成联盟，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周围形成严密的包围圈。

外交官们和将军们正在耍弄阴谋，训练武装匪徒，加速种种反苏挑衅活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更力图在诽谤苏联方面超过自己的帝国主义主子。

同志们！

共产国际对日益严重的反苏战争威胁的回答是，号召开展声势浩大的动员，发动无产阶级力量起来保卫苏联——所有劳动者的祖国和他们同世界资本主义斗争的堡垒。如果帝国主义强盗胆敢将其罪恶图谋付诸实施，世界各国亿万无产阶级和农民一定站到你们一边，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者的后方，将会有你们千百万同盟者。你们的同志和兄弟一定会奋起保卫苏联，他们将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发扬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同资本主义展开殊死的斗争。

成千上万的无产者和农民将在你们的资本主义敌人的大工厂里，在交通运输部门，在他们的军舰上和军队里，挺身捍卫苏联

的红旗，捍卫国际无产阶级的旗帜。我们将为捍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祖国而斗争。我们将开展斗争，争取把罪恶的反苏战争变为反对本国剥削者，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战争。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苏联工人和农民的胜利万岁！

捍卫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堡垒的红海军和红军战士万岁！

全世界工人、农民和被压迫人民同苏联的团结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

(呼吁书一致通过。)

会议休会。

第二次会议

(1928年7月18日)

主 席：塞马尔

致 贺 词

会议主席向与会代表介绍《国际歌》的作曲者狄盖特同志。会议代表向狄盖特同志热烈欢呼并高唱《国际歌》，以示敬意。

茹拉夫廖夫同志代表斯大林铁路修配厂工人致贺词。发言者表示，修配厂的工人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代表大会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他们向大会保证，只要世界革命参谋部——共产国际一声令下，他们就将和世界无产阶级一道投入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战斗。

雅库边科同志以现在正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特派员会议代表团的名义致词。他说，苏联消费合作社在联共（布）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苏联消费合作社是全世界工人合作组织的一部分，它所取得的成就证明，只有在苏维埃条件下，合作社才有可能繁荣昌盛。

致词完毕后，由布哈林同志作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报告人：布哈林)

一、现代资本主义的一般分析和 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形式

战后发展的三个时期

从上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以来，我们经历了许多事件。为了更好地认识所经历的事件，为了更正确地规划未来，必须把我们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同它以前的各阶段联系起来考察，而不是单独地、孤立地加以考察。对整个战后发展的一般估计，自然而然地要把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尖锐的革命危机的时期，尤其是在欧洲各国。在这个时期，革命发展达到了最高阶段，强大的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这个时期的顶点是 1920—1921 年。

第一个时期包括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18 年 3 月芬兰的工人革命；1918 年 8 月日本的米骚动（因米价上涨引起）；1918 年奥地利和德国的十一月革命；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1919 年 3 月朝鲜的暴动；1919 年 4 月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建立；1920 年 1 月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1920 年 9 月意大利工人占领工厂的行动；红军向华沙的进攻也划入这一阶段；最后，还有 1921 年德国的所谓三月发动。

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充满了规模巨大而且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事件。这些事件极其尖锐地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过程，首先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瓦解过程。

应当认为，第一时期到1923年底已经结束。1923年9月保加利亚起义以严重失败告终，1923年秋德国无产阶级再度遭到了失败。

西欧无产阶级的失败成了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前提。这些失败，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是中欧乃至整个欧洲的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的起点。这个时期是资本进攻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进行一般防御斗争，特别是防御性罢工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形成某种局部稳定的时期。必须指出，无产阶级的某些防御性战斗也曾达到非常巨大的规模。英国的总罢工和煤矿工人罢工就属于此类规模巨大的防御性战斗。第二个时期给欧洲资本主义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带来了更多的“平静和秩序”。直接的革命事件从欧洲大陆转到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1925年摩洛哥发生暴动，1925年8月叙利亚发生暴动，同年，中国的伟大斗争趋向尖锐化。在第一个时期，直接革命形势具有明显的欧洲性质，而在第二个时期，直接革命形势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外围的特点了。

从经济的观点，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来看，第二个时期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恢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依靠自己政治上的胜利，依靠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力求达到并且已经达到某种经济上的稳定。

紧跟这个时期到来的是第三个时期，即资本主义改造时期，这种改造在质和量上都超过了战前的规模。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是由于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联系进行了广泛的改组。但是，随着这种技术改组和经济改组，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托拉斯化，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力量也在增长，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以极快的速度在发展着。

这里首先必须提到苏联的发展。同资本主义改造时期“相应”的是苏联的改造时期，即建立新的技术基础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在社会经济方面（如扩大我国经济的公有化部分）和逐步加强我国生产机构的联合方面进行某种经济改组的时期。苏联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发展，印度一类国家的骚动，现代世界经济资本主义成分内部矛盾的迅速增长以及与这一切相联系的日益严重的战争危险，——这就是世界发展的另一面，即它的“反面”的情况。

对于第三个时期正在形成的世界形势，必须仔细地予以研究。不认识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一切基本变化，我们将无法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并正确地对待当前的策略问题。

一开始就应当毫不含糊地肯定，现在所说的资本主义稳定与几年前相比，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在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对这个问题提法上的变化。

现在就来进行分析。

先谈谈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我们应当承认，一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电气化已有相当大的发展。在应用化学方面有很重要的发明。生产合成燃料和原料的新方法，汽车制造方面的贝尔鸠斯方法以及人造丝的生产，等等，这些都是当前资本主义工业具有代表性的特点。此外，还须指出下列事实：轻金属，特别是铝的广泛运用；新机器和新工具，包括新式农业机械（如北美合众国生产的十分复杂的联合农业机械）的推广；汽车运输业的发展；传送系统的普遍采用；工厂中新的劳动组织；标准化，定型化，规格化，大规模的“成批”生产，等等。这一切都是目前资本主义技术发展的最突出的特点。

现在列举有关北美合众国电力生产状况的某些资料如下：

1912年.....	175.72 亿千瓦时
1922年.....	476.59 亿千瓦时
1926年.....	737.91 亿千瓦时
1927年.....	797.24 亿千瓦时

可以举出大量令人信服的实例来说明，从数量和质量的观点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曲线，我们就会看到它的某种进步。

从下面几个数字中可以看到不同金属的生产增长变化情况及其在世界产品中所占位置的再分配情况。以1913年总产量为100，1926年不同金属产量增长的情况分别为：

钢.....	122
铜.....	150
铅.....	107
铝.....	310

在美国和德国的电力工业、铁路建设和电车车厢制造中，铝在同其他金属的竞争中成功地战胜了对手。

关于人造丝生产的几个数字也颇引人注目。世界人造丝产量（万公斤）如下：

战前.....	1 100
1921年.....	3 000
1925年.....	8 400
1927年.....	12 500

如以战前产量为100，则：

1921年.....	173
1925年.....	668
1927年.....	1 036

至于最新发明及其对生产的影响，我们可以举贝尔鸠斯方法为例：在德国按照这种方法人工提炼的汽油已占汽油总消费量的12%。

现在，许多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都在制订进一步开展技术革新的广泛计划，就经济效果而言，这些革新是有极高价值的，如德国的远距离输送天然气，英国的电气化，等等。不难理解，这些技术成就，即使我们给它打上“引号”，它也无可置疑地表明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例如，洪特尔·施泰因在《柏林日报》写道，在美国，加工工业的总产量与1923年度平均定额相比增长了4.5%，而工人人数减少了5%。这说明工人的人均生产率提高了将近30—40%。

化学工业的发展，无论从一般经济观点来看，还是从另外两个观点，即从（1）战备观点（因为化学工业是头等重要的军事工业）和（2）农业种植技术领域可能发生的巨大变化的观点来看，都是值得注意的。世界化学产品战前的产值为100亿马克^①，1923—1924年度为180亿马克，在此期间物价指数分别为100和140。由此可见，化工产品的生产大幅度地增长了。在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亚硝酸产品消费量的变化情况如下：

战前(万吨)	1926年(万吨)
德国.....26	43
英国.....5.4	6.1
法国.....7.9	15.2
意大利.....2.2	5.4
美国.....16.7	34.1

^① 指1948年币制改革前的德国旧马克。——译者注

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倾向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意义

我想，对于上述数字无需再评论了，因为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这些技术上的变化在某些国家，首先是在美国和德国，已接近于技术上的变革，是以一定的方式同国民经济的托拉斯化，与大银行团的形成，而在目前的战后时期，还与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倾向的增长相联系的。我举几个例子。例如，谁都知道存在着像德国染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等这样的大托拉斯。谁都知道，英国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化学工业托拉斯（如所谓蒙德康采恩，声名狼籍的“蒙德主义”即由此得名）。同志们都知道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仅是庞大的企业主组织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产生并获得迅速发展的时代，而且是国际大托拉斯形成的时代。我手头有一份大托拉斯统计的清单，不过，现在来念这份清单将会是枯燥无味的。

不久前，我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过这样的论点：我们现在看到国家资本主义倾向有某种发展，而且采取的形式不是从前那种实行配给制和带有战争因素所决定的特点的那种“战时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社会骗子厚颜无耻地把这种苦役般的战时资本主义称作“战时社会主义”！）。现在，托拉斯、卡特尔、银行团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日益结合以致融合的过程，正以一种或者不如说以几种新的形式发展着。至于这一过程究竟套上何种外壳，是采取国家出面控制工业企业并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形式，还是采取如自由派所说的由所谓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自上而下”“征服国家”的形式，这一点并不十分重要。当然，对

于后一种说法我们应当予以坚决驳斥：既然国家机关已经掌握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那么再去征服国家也就毫无必要了。这里所说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因此，这种过程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是次要的。我在这里只想肯定这一过程的既定事实并加以强调。我们看到，这种过程在意大利、日本、美国和德国所采取的形式虽各不相同，但是，毫无疑问，这一过程是存在的。有些同志以前曾对这一点有所怀疑。但是，从那时以来，从事这一研究的同志出版了一些专著。我指的是乌尔姆同志和拉品斯基同志的著作，他们是从国家预算及其结构的观点，从国营和市有工业的发展的观点，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企业主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的。这方面的全部资料都证实，在当代帝国主义经济的发展中确实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倾向。

这一过程产生的政治后果如何呢？我们可以由下面的例子中看出：美国有个西奥多·克纳宾，他在1928年5月19日《华尔街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主要总统候选人的实业家素质》的文章中写道：

“如果我们说，他（胡佛）把自己看作是并且确实是美国实业界的主要领导人，这种说法决不是夸大其词。政府机关同实业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像是实业的一个主管部门，这在以往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未曾有过的……他对大资本（大实业）毕恭毕敬，对大实业家（资本家）赞赏不已。他认为，一个能干大事业的人比十个崇尚空谈而从不想做也做不成什么事情的科学幻想家要强得多。毋庸置疑，胡佛作为总统，将不同于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他将是一位处于动态的实业家总统，而柯立芝则是一位

处于静态的实业家总统。与迄今为止的政治总统不同，他将是我国的第一任实业家总统。”

由此可见，既然胡佛被描写为托拉斯的总经理，那么，这个事实也就从政治上清楚地表明了资本的托拉斯组织同国家政治组织相结合的过程。

结构的 变化

现在产生了下面这样的问题：假设所有这些事实都与实际相符，那么，应当怎样看待我们关于资本主义稳定性的分析呢？应当怎样看待我们关于局部的、暂时的……稳定——加了各种定语和修饰语的稳定——的论断呢？如果我们自己承认技术确有成就，承认托拉斯和资本的其他组织确有发展，如果我们确认资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已大大加强，那么，究竟怎样认识关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问题呢？应当怎样认识我们对于稳定所作的专门的特殊的表述呢？我认为，必须把这个问题明确地提出来并给以明确的回答。否则，就有陷入思想混乱的危险。

让我们先引用一些政治文献资料，引用一点与这一问题相关联的政治资料。几年前我们是怎样认识资本主义体系进一步发展或进一步瓦解的过程的呢？首先，我要提到我们制定第一个纲领草案的时期。当时，我们对于资本主义所处的状况作了如下的表述：资本主义体系正处于瓦解过程——绝对的瓦解过程之中。当时我们对于资本主义今后命运的看法，可以用持续下降的曲线予以表示。

但是，在再次讨论这个草案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作出某种修改。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关于资本主义

经济所处的状况和今后命运的论点的表述即已有所不同。后来在使用“稳定”一词的时候，又加上了“局部的”、“暂时的”等等限制词。

现在我们提一个问题：在目前，这些定语和限制词有什么意义呢？一般说来，它们是否有某种意义呢？如果说它们有意义，那么这是从前的那种意义呢，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另有意义呢？在我看来，这些定语现在的意义和以前是有所不同的。

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说，对我们以前的有关观点可以比较通俗地表述如下：

我们曾认为，我们所看到的生产的某些增长只是发生在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现象，而且几乎是一种例外。这种增长被看作是不十分典型的现象，被认为是一种偶然产生的“特定的”情况。明天或者后天就会出现另一种过程。我们今天在某个国家看到的技术进步、生产力的增长和景气现象，只是“经济上的昙花一现”，不值得认真对待。

可以而且必须说，当时对形势的这种估计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是这种关于稳定，关于相对稳定的估计，在许多方面已经不符合当前的形势了。

现在分别谈一些国家的情况。

美国正在前进。有这样或那样关于美国将出现危机的说法，这些预言也许是正确的。这一点不能排除，甚至是非常可能发生的，但是，发展的总趋势确实是工业增长了，生产也增长了。在那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V”（可变资本——劳动力的价值）不仅同“C”（不变资本——生产资料的价值）相比正在减少，而且绝对值也在减少，这在世界史上，在工人运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产业

工人的人数正在减少。这在世界历史上，在工人运动史上是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的情况。

也许有些同志会说，这是悲观的估计。不对。我们要把乐观和愚蠢区分开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如果我们不愿意当蠢汉，那么我们就应当考虑事实。

这是制定任何一种不愚蠢的策略所必需的最先前提。

现在谈另一个国家——德国。不久前，当我写到德国技术和生产力均有发展的时候，“极左派”反共分子马斯洛夫曾大骂过我。现在，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当迅速，所以，关于新帝国主义的议论决非出自偶然，急切希望获得“委任统治权”，渴望获得殖民地绝非偶然现象，建造装甲舰等等也决不是偶然产生的现象。

以法国为例。谁都了解，战前的法国和战后的法国有着很大的区别，旧的靠放债过日子的法国也获得了新的特点，现在正变为具有相当实力的工业国家。

以英国而论。总的来说，英国正处于衰落时期，元气大伤，帝国的威力江河日下。但是连英国也正在振作起来。在某些部门，如所谓的新兴工业部门，英国资产阶级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取得了成功。

假如这些都是事实，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这就意味着承认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消失了呢？或者说这些事实意味着别的什么呢？我甚至想以更尖锐的政治形式提出同样的问题：这样分析是否就是与社会民主党同唱一个调子了呢？

我认为，事物的真实状况是容易理解的。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继续存在，而且在发展，虽然危机的形式现在

有所不同。以前，我们研究危机重要症状的方法是：依次研究各个国家，并且说：甲国的资本主义正处于衰落之中，乙国、丙国也处于同样的过程之中，丁国的衰落过程也许没有这样快，但却是必将发生的。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我们关于危机的观点也是产生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德国当时的状况是已处于经济衰退的最低点。其他许多国家，尤其是中欧各国，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因此，以前的说法对**实际情况**多少有些夸大。现在，危机的旧形式已被新形式所代替——这就是问题所在。

不应当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想象为资本主义几乎在一切国家或者在大多数国家都在走向没落。情况并非如此。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经过上次的直接战争和战后时期，现在**整个世界经济发生了根本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千百倍地**加剧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矛盾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

以苏联的存在这一事实为例。苏联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是战后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果，其次，是危机在继续的表现。因为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的一种发展着的、敌对的、根本相对抗的异体。确是一种异体！难道这不是世界经济中发生的根本性结构变化吗？

力量分布上的变化

我已经指出，直接的革命形势已经转移到东方和整个殖民地外围地区。这也是战后危机产生的结果。资本主义外围地区发生的这种强大的革命震动难道不是深刻危机的表现吗？

其次，美国和力图摆脱美国霸权的欧洲之间的所谓不平衡现

象意味着什么呢？这同样意味着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的结构变化。最后，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的缩小，殖民地经济的凋敝和赤贫化也以另一种方式，而远不是像在“正常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提出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问题。结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资本主义体系只得在前几个阶段危机时期形成的形式中谋求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不可能把苏联看作似乎不存在那样去求得发展。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把中国革命看作似乎没有发生，美国和欧洲之间似乎不存在不平衡现象，国内市场似乎没有缩小等等那样去求得发展。

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个发展，对于前景的估计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以资本主义自身始终存在的种种矛盾为例，争夺市场，生产机构的发展超过购买力的增长以及我们所熟知的其他种种矛盾都在发展着。在世界经济发生上述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认为必然会得出下面这样的答案：既然殖民地正在发生风潮，既然那里的阶级斗争在激烈地展开，这就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正在激化。如果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不把中国革命当回事儿，那么当然就不存在资本主义的任何严重危机了。如果不存在苏联，那么，资本主义的危机同样也就不存在了。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竟然认为资本主义的现阶段并不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同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紧密相联系的观点已经过时，那么，不言而喻，在他们看来，形势自然如同田园诗般的宁静，不存在任何危机！但是，如果这一切是存在的话，——而这是确实存在的！——那么，问题的提法就该不同了，答案也就会不同了。

如果我们说，稳定正在遭到破坏，那么我要问：根据什么观

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不是根据一个、两个、三个国家中资本主义正处于直接崩溃的状态这一观点得出来的。稳定正在遭到破坏的原因在于，在目前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新的、由前一阶段形成的范围内进行的，这就反过来促使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而矛盾的这种尖锐化则导致大崩溃，导致大灾难。这就是资本主义不稳定的原因。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稳定只能是相对的稳定原因。这就是资本主义危机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深化和更加可怕地发展着的原因。但是，不应当从单独一个国家的角度，而应当从所有国家的普遍联系中，从世界经济范围中去研究这种危机。同时，必须考虑到帝国主义者之间、资本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各种“资本主义”和苏联之间等等诸如此类的相互关系。

资本主义的矛盾正以最尖锐的形势发展着

只能这样提出关于稳定的问题。我想，问题的这种提法是十分明确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许多国家正在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在战争危机的形势下，是在存在着苏联、东方革命等等情况下进行的。内部矛盾愈演愈烈。稳定确实已遭到破坏。这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在所有国家都在走向没落，而是因为世界经济发生的结构性变化造成了一种新的形势，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当然，这些矛盾也是同各个国家的内部矛盾，同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激化，同革命形势的诸要素的成熟相联系的。但是，这个过程现在不是同个别国家中资本主义直接的经济破产的过程相联系，而是同稳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即那些因资本主义危机普遍存在而极端尖锐化的种种矛盾的发展过程相联系的。

我只是概括性地谈到世界经济的某些结构性变化。请允许我对我们敌人营垒中危机现象的提法发表一点意见，而且我将涉及所谓“德国问题”，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别的问题，而是美国和欧洲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想举出英国著名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佩什在去年出版的《地缘政治杂志》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为例。佩什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现在全世界的债务国都无力按照所需要的规模去销售自己的商品，即既能偿付本身的债务，又能用出售商品所获之款去采购必需的商品来满足本国的迫切需要。因此，这些国家只好同过去一样，继续同外国签订巨额借款协定。但是，债权国也无法按前几年那样的数额提供新的贷款了。如果在近期内不出现松动，那么，整个体系很快就会崩溃……”

佩什接着写道：

“由此可见，国际信贷体系的垮台已成为咄咄逼人和十分迫切的事了。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使债务国有可能依靠本身商品的销售，而不是依靠继续借贷去偿付其债务，那么，这种信贷体系的垮台将是不可避免的。出现危机的症状积累得已经够多的了：市场商品的过剩；美国失业人数的增长；最重要的工业国，首先是德国的贷款业务数额十分庞大。”

这位作者预言将出现全面性的灾难。我对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表示某种程度的怀疑。这里自有其他的利益考虑，而究竟是什么样的利益，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确有某种根据作出此类判断。

但这个德国问题毕竟是在现代世界经济的危机形式的基础上出现的一个局部性问题。我们现在看到许多极其尖锐的矛盾。这

些极其尖锐的矛盾正沿着极其不同的方向发展着，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法国**，等等。从资本主义内部平静和秩序的观点来看，这都是不平衡的现象，而所有这些不平衡现象还表现于，战后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某些国家的真正经济实力与它们拥有殖民地的状况已不相符合。例如，以美国为一方和以英国为另一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资本有了巨大的增长，而美国迄今为止并不是一个殖民大国。版图扩向全球的英国帝国是一个殖民帝国，可是对于英国恰恰可以说，尽管它握有强大的殖民霸权，它却正处于衰落时期。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可以看到。以现在的德国为例，从经济技术观点来看，它可是首屈一指的国家，然而，它却既无殖民地，又无委任统治地和保护国。将意大利与西班牙作一比较也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由于这些矛盾与生产力的增长相联系，由于争夺投资领域的斗争愈演愈烈，所以这只能意味着严重的帝国主义问题——**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或别的领域**——的“重现”，而这就意味着战争。从对当今世界经济进行的这种经济分析来看，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特有的关系来看，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观点来看，总之，从所有这些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来看，战争已是当前的**中心问题**。我们必须**在策略上和政策上将这个问题摆在首位**，其原因就在于此，让社会民主党先生们去叫喊什么战争是我们的纲领吧！？简直是可耻到极点的胡话，不是一般的扯谎，而是地道的胡诌！这个问题是客观上存在的中心问题，而我们大家的主观任务是，**不按帝国主义的方式，而是按无产阶级的方式去解决这项任务；不是用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办法，而是采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的**

途径去解决这项任务。

国家之间的矛盾

显而易见，经济发展过程决定着国与国之间的相应关系，并使之定型化。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一整套政治关系的时候，不同的国家形态之间的严重矛盾十分引人注目，如资本主义国家同殖民地，特别是同中国之间的对抗，资本主义国家同苏联之间的对抗，欧洲（尤其是英国）同北美合众国之间的对抗。至于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它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德国帝国主义又复活了。我已经指出过，美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日益增长，而它拥有的殖民地相对地说却微不足道，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一矛盾产生的影响就是，北美合众国的侵略意向日益严重。“和平渗透”的口号渐渐为公开的政治占领和军事占领所取代。尼加拉瓜发生的事件便是美国政策这种变动的明显的反映。美国在中国的政策也与所发表的一切开明的宣言大相径庭，实质上同军事占领已相去不远了。

美国的侵略性政策遇到了对手——英国的抵制。英美之间的对抗在目前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切矛盾的中心。美英之间的冲突渗透到各个领域。在争夺橡胶的一场相当大的冲突中，英国打输了，不得不签订协议。在争夺石油的较量中，英国也被击败了。现在，又面临着一场棉花争夺战。我指的是美国资本正图谋向非洲扩展——向阿比西尼亚并经阿比西尼亚向埃及渗透。北美合众国已把自己的魔爪伸向了印度。

在南美大陆，美国原先已从经济上控制了拉丁美洲的北部地

区，现在它在拉丁美洲南部地区同英国的竞争中也相当顺手。我再重复并强调一遍，美英之间的冲突已成为世界经济资本主义成分内部一切矛盾的中心。

德国帝国主义的复活和凡尔赛和约的危机

德国（从欧洲各国之间特殊的关系的观点来看它是相当重要的）正在发生独特的“复兴”现象，德国帝国主义正在复活。这意味着什么呢？德国还不拥有自己的陆军，也没有海军，但是，它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曾被打败。经过一场战争“游戏”，德国垄断资本遍体鳞伤。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民族方面，德国都陷入了绝境。但是，德国资本依靠贷款，首先是美国的贷款，振兴了自己的事业。德国资本的技术或者更确切地说，德国技术进步的发展创造了欧洲创纪录的数字，在某些领域中，德国甚至创造了世界记录。至于说到经济方面的改组，那么，德国的托拉斯化过程采取的是传统的形式。规模庞大的托拉斯、这些托拉斯在国际范围内拥有的巨大势力、德国资本在世界市场控制的强大阵地、比较低廉的商品价格、德国资本竞争能力的日益增长，——这些都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事实。

显而易见，日益强固的经济基础总会在政治上反映出来：凡尔赛和约的部分条款实际上已失去效力，德国资本的政治地位比前几年大为加强，在西欧国家的共同行动中，德国现在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起着左右他人的作用。不难理解，这种发展特点，或者更确切地说德国整个发展的这种趋向，也就是德国垄断资本对外政策欲望不断增长的表现。追求“委任统治地”、保护国和殖民地，在德国已成为一种政治上的时髦。然而，

这不单单是一种“时髦”，而是一种更为实际性的东西了。这种“时髦”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在各种对抗的演变和力量的搏斗中，在法意、法英、法德、德波等等相互交错的关系中，即在欧洲各国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德国一方面是行动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是行动的客体，在某些情况下，一系列国家都会支持德国。与德国资本发展中这一趋向相联系的还有一种现象，即以德国资本的“亲西方方针”为标志的现象。几年以前德国曾处于协约国资本的威胁之下，法国把枪口对准了它，它丧失了牢固的阵地，一段时期内，与苏联结盟成为德国资本的唯一出路。拉帕洛条约和当时德国奉行的对外政策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现在情况变了。随着德国垄断资本的发展，它的殖民主义贪欲也在滋长，德国资本的亲西方倾向愈益明显。不言而喻，在进行分析时不应当简单地看待现有的形势。德国资本发展中这种基本趋向决不排除它去耍弄种种计谋和手腕，决不排除它利用其在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所处的中间地位等等。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这些计谋和手腕不可能掩盖德国资本（它自愿让人“强奸”并与其同伙一起反对苏联）发展的基本趋向。

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变更和反对苏联的斗争

资本主义的危机也表现于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眼花缭乱的变化之中。没有一个联盟是牢固而持久不变的，相反，我们大家看到的是力量的组合经常发生变更。但是，欧洲国家的一切重新组合、变化和形形色色的凑合都贯穿着一个基本倾向——部署力量以反对苏联。我们不止一次地谈及这个命题。我不打算在这里详谈有关组织种种所谓小协约国的联盟的问题以及各边缘国家之间和较

大的国家之间的种种协定问题，等等。这是连3岁小孩也都知道的事实。

如果我在报告第一部分对经济基础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十分显然，国与国之间这种相互关系乃是反苏战争的准备活动在政治上的表现。据此我们当然也应该制订我们的策略。

为了准备战争

由于上述原因，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发展同样也是在备战的标志下进行的。这种发展过程与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和平主义已体现于生活之中及“超帝国主义”时代等废话是大相径庭的。下列事实是大家都十分清楚的：扩充军备，通过各种战争法规（如法国的保罗·拜古法），以及资产阶级到处都在疯狂地为一旦爆发战争时维护所谓国内的“安宁和秩序”进行准备等等。英国的臭名昭著的反工会法，墨索里尼发布的“劳动宪章”，在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以及整个巴尔干各国和意大利等一系列国家中骇人听闻的恐怖统治，精心策划收买某些农民阶层的计划，所谓的“工业稳定”，“蒙德主义”，美国式的收买无产阶级的手段（一面依靠法西斯主义，一面依靠社会民主党），——凡此种种，都属于战时维持国内“安宁和秩序”的手段之列。

国家政权在组织上的变化也是与此相联系的。我已经提到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提到企业家组织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关直接融合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具有一般的经济意义和一般的政治意义，而且从准备战争的观点来看也是意义重大的。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是因为看到了企业家组织同资本的政权组织融合是准备

战争的手段，从而有意识地去实行这种融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一过程带有较浓厚的自发性。但是，在客观上，国家政权的这种演变和国家资本主义倾向的增长毫无疑问是为准备战争的目的服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经历过涂上独特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用德国学者的话来说，那叫做“强制性管理”。作出这种严格规定的基本原因是：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力图在“被围困的堡垒”中采用适当办法合理调节消费。但是，这种努力毫无结果。现在的国家资本主义倾向则是在新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基础上，在资本集中和不采取专门的强制性定额的基础上发展的。毫无疑问，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以及在战争过程中，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倾向将被用来动员整个国民经济去适应战争目的的需要。

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这种演变，资产阶级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的这种高度集中，对于后来的整个发展进程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从无产阶级现时的阶级斗争观点来看，这些现象也是十分重要的。还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懂得，无产阶级现在与之打交道的不仅仅是个别的企业主或甚至个别的托拉斯，而是作为一个阶级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整个组织，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在每次经济战争中的处境才如此艰难，如此复杂。由于无产阶级直接面对着同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勾结在一起的大托拉斯和卡特尔，因此，任何一次罢工都有可能发展为政治性罢工，任何局部性冲突都有可能发展为工人阶级的全面斗争。关于这个主题，我将联系其他问题一起来谈。

现在，我来讲一讲最主要是欧洲国家，首先是讲一讲北美合众国中的阶级状况问题。

二、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内政治进程

内部矛盾加剧

在分析稳定状态时我曾指出过，这种稳定的相对性表现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表现于战争危险之中，表现于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对抗以及帝国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对抗。然而，这种状况绝不意味着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不在激化。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正在激化，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不断激化。但是，这些矛盾的性质已经有所不同。这些矛盾是每个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现在发生激化则有其特殊原因，它正在加剧着阶级斗争。从局部的、暂时的稳定的发展前景来看，它孕育着战争的因素。

稳定过程对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内部状况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局部稳定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过程。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在技术经济上得到某种程度的加强，另一方面——而这是一刻也不能忘记的——矛盾在加剧，阶级斗争在激化，失业现象日益严重。

北美合众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速度最快，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失业也越来越严重。这种失业本身就是与生产力的增长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十分清楚，这就说明阶级斗争在激化，美国失业工人人数达400万，这不是区区小数。失业的存在也影响到无产阶级的其他阶层。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负担。与此同时，稳定也为改善无产阶级某些阶层的物质状况提供了可能。有鉴于此，我们对于无产阶级内部的社会关系也应当加以分析。这里我是以一般方式提出社会民主党问题的。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说，社会民主党和机会主义均已破产，这种论断完全正确，然而，可恶的社会民主党依然存在。在某些国家中，社会民主党的数量和作用还有所增长。共产国际在德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遭受了那次失败之后，这些成就显得更加伟大。然而，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仍获得 900 万张选票，这可不能等闲视之。在我们的发展和斗争的现阶段，我们应当提出一个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何在？

社会民主党继续兴旺的根源

我们通常把产生机会主义的根源问题同殖民地问题，同资本家从殖民地获取超额利润并借此收买工人中上层分子的问题联系起来。德国并无殖民地，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势力有所加强或者说它的阵地还相当牢固，其原因何在呢？为什么这个搞叛卖活动的社会民主党还没有从舞台上消失呢？为什么它还具有如此灵活的周旋能力呢？用狡猾奸诈和善于应付来解释这种现象是不行的，因为这些都起不了决定性作用，不能起左右局势的作用。社会民主党的兴旺与稳定过程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这一问题的经济内容是相当复杂的。迄今为止，我们讲到超额利润时，指的总是这个或那个国家直接从殖民地榨取的超额利润。美国不拥有如此数量的殖民地，那么它是否获得超额利润呢？是的，它是在获取这种利润。我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个问题。我想提醒的是，马克思早就分析过许许多多事例，说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工业国凭借其技术上的优势获取级差利润，而这些超额利润在目前正起着巨大的作用。可见，产生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不仅仅是直接从殖民地获取的超额利润，而且还有通过整个世界商品流

转渠道获得的超额利润，即不是单纯依靠向“本国”殖民地和一般地向殖民地输出资本所获取的超额利润，等等。

试以美国为例。美国虽然不拥有领土归它管辖的大块殖民地，但是，凭借着美国资本的霸权地位，它却不断获取数额庞大的超额利润。

再以英国而论。其发展曲线处于下降状态，但是，它并没有丧失殖民地霸主地位。英国帝国的基地日益缩小，但终究还存在。在英国国内，无产阶级左倾化的过程还在继续，共产党等组织的影响也在增长，但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垄断统治不会像我们原先估计的那样很快就会崩溃。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垄断地位依然为英国改良主义的生存提供着相当广阔的天地。

有关德国的情况我已经讲过了。

为了弄清社会民主党势力犹存的原因，还须研究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因素，其中包括许多国家在内政方面发生的相当重大的变化。数量相当可观的一批原社会民主党干部或工会干部，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官员、市政机关负责人和企业主组织的职员。这方面的变化是十分令人瞩目的。这种情况发生于许多国家，首先是德国。改良主义工人组织同企业主团体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相结合，这在实际上就意味着把工会和党的官僚局部地变为国家和企业主组织的职员。这也是资产阶级搞收买政策的一种独特的方法。

关于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我认为在法西斯国家中也局部地存在着同样的过程。我们不妨以波兰这样的国家为例，毕苏斯基在这个国家建立了军事恐怖

组织“射击兵”。这个组织是一种“志愿性”组织。名义上当然是志愿人员自己建立的，然而它却是一种半国家性质的组织。其中有没有波兰社会党工人呢？有，而且他们的数量相当可观，组成了国家结构中的一部分。概而言之，总而言之，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我上面描述过的那些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当然，社会民主党的灵活应变能力，它所具有的一定的经验和巧妙的政治手腕等等也不无作用。这一切自然起着相当巨大的作用。但是，单凭这一点是难以说清问题的。可以这样说，一方面稳定的过程给社会民主党建立了经济支柱；另一方面，稳定中的矛盾又为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因此，常常可以看到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势力同时得到增长的情况。当然，其他种种原因也要看到，而且不能忽视。以处于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各个阶层中发生的社会分化为例。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有时依靠的就是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还利用资产阶级政党受削弱的机会，把小资产阶级的选票拉到自己一边。必须看到，在一系列国家中，包括在德国和法国，到目前为止，甚至在大企业中，在社会民主党力量比较强的大托拉斯的工人中，我们争取到的骨干分子还是极为有限的。

阶级斗争的激化

稳定中的内部矛盾加剧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在现代国家和现代资本主义发生我所说的那些组织结构变化的情况下，这些内部矛盾使各种大大小小的罢工都变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英国的罢工如此，德国五金工人的罢工如此，今后的罢工同样将会如此。产生这种经济罢工转变为政治罢工现象

的原因在于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资本托拉斯化，企业主组织同国家融为一体。

这就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正在加剧的情况。一国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是，阶级斗争日渐激化，共产党的影响日益扩大。这一点可以通过许多事实得到说明和证实。我指的是下列种种事实：许多国家，如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出现罢工浪潮；无产阶级日益“左倾化”；对苏联的同情不断增长；无产阶级曾追随过的资产阶级政党，如德国的中央党和意大利的天主教组织发生分裂等等。法国和德国的选举结束也表现阶级斗争正在加剧。稳定的过程充满着矛盾，所以，我们也有所发展，即使不是在数量方面，至少是在政治影响方面几乎总是有所发展的。去年，希法亭在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就曾预言说：“同志们，共产党迟早要完蛋。我十分清楚，多年来人们备受可诅咒的失业之苦，我知道通货膨胀期间人们因丧失自己的财产而深感绝望，人们对一切都感到失望，只相信暴力。由于一时的激烈情绪，这些人会去投共产党的票。但是，共产党不会在政治运动方面起任何作用。它时来运转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共产党正在不可阻挡地发展着。德国的斗争就足以证明这一点，那里的共产党得到 325 万选民的支持。希法亭如此可悲地失算了！只要不按照社会民主党那种不伦不类的观点，用在国会中所得当选证书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影响的话，那么，法国的选举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随着资本主义稳定中各种矛盾的加剧，我们的政治影响正在日益扩大。但是，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社会民主党本身也在不断增强。

最近几年来，社会民主党发生了深刻的演变。在谈论社会民

主党的时候，如果仍以过去的，譬如说，1914年对它的看法来评价它，那将是错误的。1914年8月4日的社会民主党只是现代社会民主党的雏形和幼芽。社会民主党现在的意识形态连类似马克思主义的言词都已丧失殆尽了。现在，社会民主党的精神食粮是由英国供给的麦克唐纳式的胡言乱语，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还十分起劲地力图尽可能把这道菜烹调得美味可口一些。

社会民主党的君主专制面目

前几天，梁赞诺夫同志在我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公布了拉萨尔和俾斯麦的来往函件。俾斯麦是何等人物，现在一清二楚的了。斐迪南·拉萨尔在给俾斯麦的信中写道，最好建立以“王权”为中心的社会君主政体。这一思想使拉萨尔与俾斯麦亲近起来，激起了他搞政治阴谋的念头。而社会民主党还提出口号：“回到拉萨尔时代去”。这种本能地想回到拉萨尔时代去的倾向包含何种内容，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它包含了使诺斯克信徒们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相互接近的某种思想基础。建立王朝统治下的“社会君主专制”，这种意识形态是颇合现在的社会民主党的胃口的。1914年8月，社会民主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表示拥护保卫资本主义的祖国。在我们的时代，社会民主党是一支自觉地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的活跃力量。社会民主党的对外政策也是与它的对内政策相一致的。现在，它不仅是在保卫资本主义祖国，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它已经是本国侵略贪欲的最突出的体现者。现在，在德国难道没有要求为德国取得殖民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吗？不言而喻，这种人多得很，而且他们完全不加掩饰地提出了这种要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一起希尔

德布兰德事件，他在一本书中贩卖了这类思想，结果在开姆尼茨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而在今天的社会民主党队伍中，一些享有荣誉、受人尊崇的党员竟公开宣扬殖民主义思想。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事例。就以第二国际最近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为例，这个决议可能经过鲍威尔的润色，增添了似是而非的马克思主义基调。我们看到，这个决议把殖民地作了如下分类：某些殖民地应当获得独立；另一些殖民地应置于委任统治之下；还有一些殖民地则现在仍处于必须保留原状的发展阶段。其实，据我所知，在国际联盟的文件中也是这样讲的。由此可见，虚伪的社会党人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阵营中那些狡猾奸诈之徒毫无二致。

不妨再以战争问题、对国联的态度问题和对苏联的态度问题为例。把1914年的考茨基同现在的考茨基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判若两人，现在的考茨基已是带有露骨的反革命倾向的人了。

社会民主党的反苏活动

一切共产党人都应懂得，在未来的战争中，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就其卑鄙无耻的程度而言，将出乎我们的一切意料之外。当然，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和社会民主党中的无产阶级必须加以区别，在后者的队伍中将会出现严重的危机、分裂、纷乱、改组等等。但是，它的上层集团将同帝国主义阵营中罪大恶极的分子沆瀣一气，共同行动。对这一点我们不应有任何疑问。希法亭先生现在就大言不惭地宣扬下述观点：欧洲也存在着失业，产生这种失业现象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搞得不够好，如果能把苏联拉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中来，那么情况将会好得多，障碍在于它在对外

贸易方面实行垄断。由此自然而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产阶级对打破苏联对外贸易的垄断似乎甚为关切。我要向你们提个问题，这种提法是什么意思呢？这不啻是从思想上为公开发动反苏进攻战争作准备。在希法亭的论点中，暂时还是学究气较重，议论较多。但是，这种经济观点发展下去就会成为十分现实和具体的政治观点。起先只是在理论上形成的东西，尔后就会变为行动。希法亭先生这种说法付诸实践，就意味着反苏战争，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

不言而喻，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演变应当引起我们方面相应的反应。同志们都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扩大全会规定了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所有的党）在政策上应作的策略转变。这是根据我们的倡议，是根据执委会的倡议提出来的。有些同志把这种转变同种种次要因素连在一起。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决定实行策略转变的因素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因素即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演变。认为我们是在受到反对派的指责之后竭力表现得“左”一点等等，这种想法是很幼稚的。这种说法不值得认真对待，不值得答复。决定我们策略的唯一理由是，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各种阶级力量和各种政党力量的对比起了变化，等等。对这个问题应有的态度是，问一问，我们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回答是，已经发生了变化。由此是否会引出某种结论呢？是的，是会引出某种结论的。为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会和其他组织中对我们的进攻比以往更加激烈呢？因为我们的政治路线不仅在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上，而且在任何其他问题，其他领域，都是同他们的路线截然相反的。就拿一个工厂来说吧。社会民主党在工厂的政策是怎样的呢？国内和

平，不搞罢工，工厂委员会与资本家组织合并，全面推行“蒙德主义”，——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对工厂工作的方针，而且不仅是对工厂，对托拉斯，对国家，对国际联盟，到处都推行这种方针。这条路线并不是一下子就定型的，它是逐步形成的。但是，既然它已形成，我们应不应该由此得出一定的结论呢？当然应该从中得出有实际意义的结论，否则，我们将被敌人所击败。

三、我们的策略方针

实行转变——是对客观变化作出的正确回答

客观形势的变化迫使我们作这样的策略转变。这是对形势变化作出的正确反应。英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工党过去是一个缺乏党纪的、涣散的组织，现在却变成了大陆型的名副其实的社会民主党。它有党纲，有党的纪律，它正力图用党的纪律来约束我们，企图扩大自己在工会中的势力，从政治上来束缚我们。它正在排除我们的人，向我们发起攻击。如果我们现在仍然墨守过去的陈旧口号，为了不使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共同阵线发生破裂而维持原先的相互关系，那我们就完蛋了，那样我们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面貌，从而丧失独立存在的权利。我们将被敌人所击败，所以，不从这种形势中得出结论将是愚蠢的。我们应当说：英国党作出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工党采取了新的组织方法，工党和我们党之间出现了新的关系。所有这些才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政治因素。

法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社会民主党现在的代表人物保罗·邦古和阿尔贝·托马，前者提出过战争法案，后者则吹捧过墨索里

尼，这一切决非偶然。托马和邦古分子不但没有被开除，相反，还有人寻找理由为他们辩解，“左派”弗里茨·阿德勒写过一篇不像样的文章，实际上就是为托马给法西斯主义唱赞歌之事进行辩护的。这就是第二国际最“左”倾分子的所作所为，这就是在战争时期为反对战争曾打死过一名部长的人的杰作！

至于谈到法国共产党，那么，还有一系列因素迫使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的策略。众所周知，法国共产党内部一直残留着对议会的幻想。不久前举行的选举成为法国党的一个转折点，对于这次转折，不仅应当从选举本身，而且应当从法共今后政策的角度加以评价。既然我们已经断定，我们面临着规模巨大的阶级搏斗，在这场搏斗中，议会主义（就其贬意而言）可能起很坏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应当尽自己所能，同这种积习实行决裂。

综上所述，我们在策略上的转折是根据形势的客观变化作出的，这种转折成为各个大的共产党实行转变的信号。改变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是实行这种转折的中心政治内容。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问题，是带关键性的政治问题。加紧开展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这就是共产国际目前的政治方针，而且我认为，我们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应当接受这个口号，接受这个政治方针。与此同时，我要强调指出，在方法上加紧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决不是像某些同志想象的那样，就是放弃统一战线的策略。相反，我们越是激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反对它的政治路线，我们就愈要坚决地提出争取群众的问题，包括争取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和追随它的工人群众的问题，我们就更要有力地为争取这些群众而开展斗争。为了顺利地开展争取这部分群众的斗争，我们应当采取适当的方法来接近他们。只有那些头脑不健全的傻子才会认为，既然

我们同社会民主党势不两立，又何必去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打交道呢？对于这样一种双重性的任务，还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弄清楚了。还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认真地深入思考了这一问题。但是，这却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和基本的任务之一。

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问题

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和在中国执行中的错误

在转入从总体上分析我们的基本任务之前，我想再说一下殖民地运动问题。我要谈谈中国和印度，但是只讲几点意见，因为这些问题在讨论纲领时，特别是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还要部分地涉及到。

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我们同我们的反对派有过范围十分广泛的原则性争论。现在，我们可以再来回顾一下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是事实。试问，这次失败是否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实行的错误策略有关系呢？也许同资产阶级结盟果真是不明智之举？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失策之处，就是这个基本错误引出了所有其他错误，从而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导致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大概要在大会专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十分详细地加以分析，因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有必要以批判的态度认真地加以阐述和探讨。但是，我想，分析一定会证明，错误完全不在这里。

总而言之，错误并不在于基本的策略方针，而在于政治行动和在中国实际贯彻的路线。第一，在中国革命初期，即与国民党合作时期，错误在于我们党缺乏独立性，在于我们党对国民党批

评不力。我们党有时由同盟者变成了国民党的附属品。第二，错误在于我们的中国党不理解客观形势的变化，不理解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例如，在某一段时间内可以和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道前进，但在某一阶段又要预见到行将发生的变化。对此应有所准备。在缔结任何联盟时，都应当预料到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从而作好斗争的准备。在对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时，我们看到，中共中央，部分地还有我们驻中国的代表，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没有考虑到，也没有看到这个转折，因此，当以往的同盟者变成凶恶的仇敌时，他们未能及时地实行转变。第三，还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党有时起了阻碍群众运动，阻碍土地革命和阻碍工人运动的作用。这些错误是无可挽回的致命性错误，当然也就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在经历了一系列失败之后，党纠正了，而且相当果断地纠正了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但是，这次也同往常一样，有些同志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不经认真准备就仓促举行起义，暴露出明显的盲动主义倾向、最低劣的冒险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策略上的变动，但是变动的方向不同于西方。

如果运用“左”、“右”之类的术语，我们可以说，法国和英国发生的变动是“向左转”，而中国则是“向右转”。不过，我要事先声明，我并不推崇这种术语。因为它既不太合适，又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进行分析，并不只是为了弄清策略“左”的或“右”的性质，而是要查明策略正确与否，与客观形势是否符合。

中国的革命高潮必然到来

我们对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估计是：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高

峰时期已经结束，以联合群众、积蓄力量、准备迎接伟大革命高潮为主要任务的时期已经开始。

种种客观迹象证明，革命高潮是必然要到来的。以往斗争的全部经验证明，没有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就不可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而现在已具备胜利完成这项革命的客观前提。但是，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项中心任务：必须把群众团结成一个整体，使敌人无法逐步地、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来消灭我们这支无产阶级大军。这是一项必须坚决完成的任务，它要求党从立刻举行起义的立场转变为准备起义的政策，即发动群众准备举行最有胜利把握的起义的政策。我认为，第九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帮助的。我希望代表大会的决议将符合那次全会决议的精神。

印度的新进程

在印度是另一种情况，那里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与中国不同。在中国，在整个一个时期内，在许多年内，资产阶级一直是手拿武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这是事实。印度则不然。在印度，不可能存在印度资产阶级发挥同样革命作用的一个长时期。当然，这并不涉及印度现存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党或恐怖组织。我指的是资产阶级的核心组织，即自治运动党。

我不可能再从经济上来分析印度的形势了，但是我想指出一点，我不同意那种认为印度已不再是殖民地国家，印度正在发生非殖民化进程的观点。这种论断是片面的。与此相反，最近时期以来，即在帝国主义作出某种让步的时期以后，英国帝国主义对整个印度，特别是对印度资产阶级的殖民压迫变得更厉害了。这

迫使自治运动党再次对英国帝国主义表示不满。它进行了反抗。但这与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相去甚远。群众运动稍有露头，自治运动党就会转向与英国帝国主义妥协。我讲的群众运动是指群众独立地提出诸如没收土地或保护工人利益等激进口号的那种运动。我认为，当群众独立地进行发动，提出某种程度的革命口号时，自治运动党中那部分资产阶级必将迅速地同英国帝国主义实行妥协。现在，它是在反抗。在某些时候它甚至可能在客观上起一种革命的作用，但是，它绝不可能在较长时期内起革命的作用。毋庸置疑，只要一出现群众运动，资产阶级就会倒向反革命阵营。这一点是必须强调指出的。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应当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提出尖锐的口号，从一开始就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使工人群众看清印度资产阶级今后的动向。把对中国的策略机械地搬用于印度是极端危险的。这里必须作专门的分析，根据印度的特殊环境制定特殊的策略。

会议休会。

第三次会议

(1928年7月19日)

主席：福斯特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继续）

（报告人：布哈林）

五、我们的基本任务和我们的缺点

要多一点国际主义观念

同志们！现在我讲一讲关于我们的基本任务和我们的缺点问题。从我上面所作的关于世界形势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们在策略问题方面的基本方针。首先要说的是关于我们运动的国际主义观念问题。不言而喻，在大范围的政策问题已成为各国共产党注意的中心和战争问题已成为中心问题的目前时期，有关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和与此相关联的各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问题，应当置于共产国际活动的首位。用这个观点来考察我们党的活动，那么，必须指出，尽管各国共产党人数还比较少，但毫无疑问我们在加强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面毕竟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绩，我们赢得了相当伟大的胜利，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影响已经增长，我们从思想上为共产主义占领了新的地区，等等。但是，同共产国际及其支部面临的任务相比，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观念毕竟太

少了。最近几年来的实践已经暴露了这些缺点，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责任是把这一点完全公开地讲出来。同时，只有公开承认这个事实，才有克服这个缺点的最重要的前提。

在英国罢工期间，我们就曾指出许多党对英国工人阶级支持不力。关于这一点，共产国际几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均有记载。除了不多的几个党，首先是联共（布）以外，所有其余的党给予英国无产阶级的支持实在太少了。

在中国发生事变期间也暴露了几乎同样的问题。保卫中国革命的国际运动的规模，与这一时期的客观要求和各党的革命责任是不十分相称的。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报刊方面没有充分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中国工农运动布尔什维克化的情况。没有看到在这方面作过多少较为深刻而系统的工作，也没有在相应的规模上开展广泛的政治运动。各党虽作过种种努力，试图克服这些缺点，但缺乏坚持不懈和有条不紊的工作。因此各党在重大运动期间往往表现得不够理想。

保卫苏联和中国革命

下面我们谈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我这里指的不仅仅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我想略为广泛地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谈一谈关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波兰的法西斯主义和整个法西斯主义问题。各国共产党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以及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都是极其不够的。像北美合众国进攻尼加拉瓜这样的事件，首先在英国共产党方面就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应。对于兄弟的美国共产党来说，这个问题本应成为其整个工作中的中心问题，连它都不能在应有的规模上开展相应的运动，那么，对

于其他党来说更是未予重视了。尼加拉瓜远离欧洲。但是，地理条件不应左右各国共产党的工作。在某些党内，特别是在欧洲，无论是在小党还是大党内，还可以看到某种地方主义的残余，可以看到在对重大国际政治问题的理解方面还存在某些问题。如果我们真想认真地准备应付诸如未来战争这样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那么，我们在目前时期就应当把侧重点放在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上，否则，我们就无法认真地作好应付战争的准备。不言而喻，为了顺利地开展这一运动，为了使这一运动获得应有的活力，我们应当把大范围的国际政治问题与有关国家中的日常生活问题和革命工作问题联系起来。这里又会遇到战争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的党内问题，其中包括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问题，都要牵连到这个问题。资本的进攻是与资产阶级准备战争的活动相联系的，引起这种进攻的原因是它需要巩固自己的阵地，需要国内和平，为对付工人造成可靠的条件，等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既要从各种日常问题出发，又要把日常问题作为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共同口号和任务的基础。这是政策策略上的一种艺术。但这是有利于提出重大政治问题的依据，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艺术恰恰就在于：从日常的细小事情出发，提出重大的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懂得这种艺术，如果我们不能对重大的国际问题作出充分的反应，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防止战争的工作。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并把它写到我们决议中去。战争问题、保卫苏联和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些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问题。系统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是各党、共产国际各支部在各自国家内的中心任务。

各国共产党的总路线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目前形式的资本

主义和采取何种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而在这个领域中，一些小问题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发展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以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方针（我在前面已概略地谈到这点）为例，它就是一条系统的路线。这是一条同企业主组织联合的路线。这条路线从工厂一直通到国际联盟。社会民主党人正在宣扬“工业稳定”和所谓的“美国式”劳资合作方法。这就是当前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方针也反映在对外政策方面。但是，我们同社会民主党的冲突是在对内政策问题上，是在同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以及在关于联盟和如何对待所谓“雇主”组织，即托拉斯资本巨头的组织的态度问题上。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同托拉斯资本实行联合的口号。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问题已不复存在。在经济领域中，他们反对罢工，反对经济斗争，用“工业稳定”取代罢工和经济斗争，用强制性的仲裁代替强化罢工斗争。关于工人组织要不要独立性的问题也被他们偷梁换柱，变成了如何使这些工人组织和企业主组织合作的问题。这是一套完整的策略。按照改良主义的观点，工人组织应当放弃自己的阶级独立性，阶级斗争对这些“老爷们”来说已经“过时了”。社会民主党的路线是要把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与垄断资本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组织机构相结合的路线。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社会民主党坚持推行的这种策略。

下层统一战线策略

我们的策略方针到底是怎样的呢？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从基层生产组织到国际联盟，我们所持的策略方针完全与此相反。这是同社会民主党的方针彻底相对抗的方针。我们的方针不是工业

稳定，而是阶级斗争，不是仲裁，而是反对强制性的仲裁，打破资本家组织或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的一切羁绊，冲破束缚罢工运动手脚的种种限制，等等。这就是我们的策略方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以前曾多次讨论过，在我看来，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清楚的。从这条策略路线得出的最后一个结论是，实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方针，实行革命的方针。我们的这一路线绝不意味着我们摒弃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是，随着我们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的加剧，我们应当给这一斗争增添下面一点变化：现在，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贯彻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决不向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发出任何呼吁，在极少数情况下也许可以允许向社会民主党的个别地方组织发出呼吁。但是要在面向社会民主党群众、面向社会民主党普通工人的基础上发出这种呼吁。

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与我们开展系统的工作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工会工作——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这里的问题不单单是偶而发动几次运动的问题，所有这些策略性问题首先是系统的工作问题。大家都知道，在共产国际的许多决议中都写有一个论点，即工会工作是这个领域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看到各党在这方面都存在许多缺点。所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将讨论工会工作问题，将对各党的经验进行细致的研究，力求对它进行认真的分析并弄清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缺点的根源。如果说我们需要作自我批评的话，那么，我认为，在我们进行斗争和工作的战线上，很少有哪个部门比工会工作更需要和更值得进行自我批评了。我们在工会内部的思想影

响也有所增长。但是，我们的同志作为工会工作者来说，至今仍然威信不高。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充当政治领袖，充当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发起人，充当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的参加者和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利益捍卫者时，他们的威信是不断提高的。但是，作为工会工作者，作为罢工运动的领导人，他们就不享有很高的威望了。我们的同志在充当政治领袖和充当工会工作者时，其所享有的威信是大不相同的，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是，我们在工会工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点。我想在这里举几个实例。以法国为例，我们可以看到那里的共产党员在工会运动方面犯了一系列错误。党员与非党员工会会员之间的关系不够正常，因为共产党员指手划脚多，而说服教育少，系统的工作开展不够。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些工会工作者在工会中干得“很出色”。但可惜这种工会工作都是按社会民主党的方式干的，专门按照布尔什维克方式提出工会问题和专门按共产主义方式提出问题的情况几乎没有。这种工会工作者也可能在广大会员群众中享有很好的声誉，但从共产主义观点来看，他是不值得赞许的。正如德国发生的某些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有些同志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方式是如此的习惯，竟然置党的指示于不顾，在选举中不发表党发出的任何号召，如此等等。为了保持其“出色的”工会工作者的名声，他们竟对一般的改良主义工会纪律也俯首听命。这是共产党员在工会工作方面不能令人满意的又一种表现。在罢工运动（这是工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期间，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会工作者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相当严重的失误。有时我们会遇到所谓尾巴主义的表现，也就是缺乏首创精神，不善于在罢工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举行罢工时，我们往往被群众拖着走，而不是率领群众前进。最近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还看到这样一些例子，譬如在法国，有些罢工竟与我们完全无关。

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同志在罢工运动中经常玩弄革命的词藻，却很少注意扎扎实实地去准备与罢工有关的各项运动，不能充分地、准确地估计形势和罢工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不善于选择开始举行罢工和结束罢工的时机，也不善于巧妙地领导罢工斗争，等等，而上述种种品质恰恰是现在所绝对需要的品质，因为在领导罢工方面的情况是极其令人担忧的。从潜在力量来看，几乎任何一次罢工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转化为重大政治事件的可能。只有深刻认清形势，善于考虑到运动的各个方面，才能很好地进行筹划，如何在这种条件下举行罢工。这里需要的不单单是革命的热情，这种热情当然是需要的，但仅有革命的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熟悉斗争所处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任何时候的工会运动问题都不像现在这样复杂。而在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中，资本的力量和工人阶级的联合力量之间的关系又是最基本的问题。可是，同志们，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些带有特殊性的条件至今常常不为人们所认识。例如，按托拉斯系统实行工厂委员会的联合问题至今仍未获解决，在一些共产党内，甚至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对实行这种联合也宣传得不够。而宣传这种联合和对斗争实行集中的领导，正是我们对托拉斯资本实行联合作出的回答。现在，我们在工会工作方面开展的斗争不仅仅是针对个别的企业主，而且更多地是针对联合起来的托拉斯资本。“托拉斯”一词应当加以强调，对它应特别加以重视。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特殊情况。

青年问题——主要课题之一

同志们，我们在群众组织工作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尽管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不小。我想以这方面工作的一个领域——我们的青年运动为例。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确有相当大的成绩，首先是在反帝斗争和各次军事战局中。法国青年组织在摩洛哥战争期间的表现，我们的共青团员在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中所开展的整个工作，都是这方面的例证。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又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加入组织的青年同志的人数不是有所下降，就是仍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上。毫无疑问，青年运动存在着宗派主义倾向，我们的青年国际未能渗透到一切有工人青年群众的组织中去，并在其中扩大自己的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对青年组织的策略方针还存在着某些狭隘观点。而且这些缺点在最近一个时期可能还有所发展。这是我们工作中一个极其危险的倾向。有些同志意识到出了很大的差错，存在很大的缺点，力图使工作活跃起来，可是却又做过了头，以致几乎使共青团失去其特殊的政治面貌和共产主义面貌。我认为这是不对的。青年组织仍然应当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当然，它不应该生搬硬套党的工作方式，但是，在斗争中，总的共产主义方向今后也应当成为共青团发展的基础。

充分发挥工作方法上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那么，我们缺少点什么呢？我们应做到的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工作方法的多样化。我们应当努力使青年组织不仅仅对重大的政治问题和重大的政治运动作出反应，而且要让它对各种政治文

化问题，对青年们感兴趣的一切问题都作出反应。在所有的领域中，从体育活动到中国革命，我们的青年同志应当按照有关指示（如关于将我们的影响扩大到一切有青年工人的组织中去的指示）的要求，表示自己的意见，有组织地作出政治上的反应。不要搞宗派主义，也不要那种狭隘的、实际上是取消青年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

同志们，青年问题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西欧、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已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资产阶级发狂似地在争夺青年，而且做得十分巧妙，比我们巧妙得多。被某些人说成是资产阶级文明方式的各种体育组织一般来说都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体育组织的意义与政治的中心问题，首先是战争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青年进行的军事训练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虽然这种军训有时采取不引人注目的，甚至是与政治不相干的形式，但是，只要从总的发展观点，而不是从孤立的观点来考虑这些事态，就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时代，这种军训是含有深远的政治意义的。青年工人兴致勃勃地讲述踢足球如何如何痛快，他无形中就落入了资产阶级织的罗网。形形色色的军体活动代替了强制性的军事训练，这不仅从技术观点来看是如此，从政治观点，从战争问题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在注重研究重大政治问题的同时不能下功夫渗透到各种群众组织中去（我不是说非要在组织上渗透进去，我指的是我们的影响和政治威望），那么，我们的事业将失去广大的青年人材。

为什么我说青年问题是中心问题之一呢？首先是因为我们对工会问题讲得很多，而对青年运动过分忽视。你们不妨注意一下这方面的某些基本事实。现在，青年的组织程度比成年无产阶级

的组织程度差得多，社会党方面的情况如此，我们方面也是如此。

这是一种严重的反常的历史现象：战后的一代人，即在战争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反比战前一代人组织得差。这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种状况部分地说明，在青年一代中，相当广泛的阶层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或者说青年中存在着严重的不问政治的情绪。而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依然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因为资产阶级只要能使青年不发挥作用，它就达到了全部目的。

由此可见，改进我们在青年组织方面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对此我们应当大声疾呼，我们的大会应当就这方面工作给青年国际发出相应的指示。

更多地注意农民问题

下面我们谈一谈关于对我们抱同情态度的组织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断定，灾难性事件究竟何时、何年、何月将会来临，而且事先猜想发生灾难的时间也是荒谬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对所面临的灾难性事件的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应该懂得，正因为存在着这种发展前景，关于辅助性组织的问题应当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不得不单独地分析有关农民运动和农民国际这类组织的问题。德国和法国的选举结果向我们表明，我们在农业地区的影响不是增长了，而是下降了，法国的情况如此，德国也是如此。这是一个严重的征兆。当然，我们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中开展工作并非易事，但是，应当考虑到，正是这批农民队伍往往被利用来反对我们，此外，还不能忽视资产阶级正在拼命地做这方面的工作。为了争取农民群众，资产阶级正趁共

产党对农民工作有所忽视之机，拼命开展各种活动。在某些国家中，我们完全丧失了时机。我们不妨回忆一下罗马尼亚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诚然，我们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当时被搞垮了，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提到过：我们正处于罗马尼亚爆发如此重大事件的前夕。整个共产国际和执委会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态，没有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虽然当时的情况很困难，而且几乎缺乏任何联系，但是，这仍然是一次重大的失误。当时，事态的发展几乎完全脱离了我们党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由此而对巴尔干各国的农民运动——不仅对罗马尼亚的农民运动，而且对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以及波兰的农民运动，得出某种结论。

我们应该集中更大的注意力于农民问题，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应该帮助农民国际成为一个真正活跃的组织。我无法向你们详细报告这一组织的活动，但是应当说，这个组织多少带有宣传的性质，它的工作归结起来主要是出版发行各种各样的资料，它在组织方面的联系是很不够的。这个组织在人数上虽有所增长，但成员总数是微不足道的。我认为这不单单是农民国际的过错，而且是共产国际的过错，是我们大家的过错。我们没有为这个组织调拨足够的人力，也没有对它的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罗马尼亚的事件及法、德两国的选举的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应当在最近的将来就提出这个问题并作出一切努力使它得到改善。

我认为，我们对诸如反帝同盟这样的组织也支持得不够。某些同志认为，这个同盟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有生机的组织。实际的经验却表明，这个组织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前途，而我们为真正帮助这种潜在力量得到发展所作的努力却是何等的微薄。据说，同盟代表大会盛况空前，成了一次政治力量的大示威。须知，

这不是偶然的。这次“盛会”之所以成为一次政治大示威，是因为客观上存在着对这种盛会的要求，是因为革命力量真正需要实行联合。从我们总的战略观点来看，我们也应当指出，在我们和同情我们的力量的战线上，共同的据点建立得愈多（但愿在欧洲、亚洲、非洲或其他某个国家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付灾难性动荡的准备就愈充分，被我们团结到革命阵营里来的真正有活力的组织就会愈多。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抱取消主义的观点呢，这一点我真不明白。有时人们往往企图把责任推到客观条件上去，推到非我们所能支配的力量和事件上去。这是一种极坏的做法。过错首先在于我们，因为我们对这个组织的帮助实在太少了。

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

现在我谈另一个问题——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分析大体上还算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开展秘密工作，现在就应该提出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的任务。至于谈到秘密工作，我们在许多国家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在波兰有这种经验，在巴尔干各国，在意大利，现在在日本也有这种经验，在中国积累的经验更为丰富。某些党，首先是西欧无产阶级的党，还没有这种经验。但是，同志们，我们党遭到的进攻正有增无已。我们兄弟的法国党已感到进攻迫在眉睫。对各国党的攻击必将日益加剧。毫无疑问，在战争爆发前夕，甚至在这之前的若干时间内，我们党就会遭到一系列特别法的袭击。这是毫无疑问的。应当预见到这种情况。因此，现在就必须为我们的地下组织打好基础，特别是在陆军和海军中。否则，一旦发生事变，我们将措手不及，我们将因自己缺乏准备

而遭受重大的损失。现在，建立秘密组织的问题，包括在陆、海军中建立公开和秘密联系的问题，已是十分尖锐的问题。你们一定会理解，为什么我不展开来讲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不能详谈种种细节，提出建议和下达指示。但是，这项任务已经提到了首位，应当采取种种措施使它突出出来。不能泛泛而论，这里需要为我们的地下组织的实际工作制定具体的指示，而且必须把这些指示一一记录在案。

如果我们在工会工作中，在青年组织中以及在与我们关系亲近的组织中能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那么，我们一定能够消除我们的政治影响增长和组织发展之间那种众所周知的不适应状态。

官僚主义弊病

鉴于这种情况，我还想就我们的某些缺点谈几句。我认为——而且我要公开讲明这一点——最近以来，不仅在我们党内，即在联共（布）内，而且在许多党的内部，官僚主义的毛病日益严重。它有时反映于领导的过分集中，而地方组织完全缺乏任何主动精神，等等。不言而喻，集中是需要的，集中领导也是需要的。这是极其普通的道理。但是，我们的地方组织常常不能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基层支部不是经常能够感觉到政治生活脉搏的跳动，开展工会斗争的问题在基层支部很少占有地位，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和普通党员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开展工作，真正过党内生活的往往只是一部分担任职务的党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同其他缺点是有联系的。我们再三再四地宣传，要使干部队伍活跃起来，吸收新人参加领导工作，把新的人材充实到党的干部队

伍中来。可是，要知道，这些新人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不可能是现成的实践家。他们是在党员干部和党员群众紧张工作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这些缺点，那么，挑选干部的工作将会遇到严重困难，因为在党的基层生活脉搏跳动得不甚活泼的情况下，是很难保证顺利地挑选党的领袖和党的干部的。回顾一下党的各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就可以看到，参加代表大会的普通工作人员的比重并未增加。这里也暴露出一种倾向，即专门派党的官员，派党的专职干部和领取工资的干部当代表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存在的。当然，不应该过分夸大这种倾向。但是，必须确认它的存在。这是与一系列相当复杂的党内生活问题有联系的。必须指出，党内生活，特别是基层和生产支部的党内生活脉搏是跳动得不够活跃的。应当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从而改变它。

为改善干部队伍的状况而奋斗

再就我们党和党的干部的文化政治水平，就党内争论问题讲几句。这里仍然存在着党的干部的能力和素养与党员群众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忽视了许多理论课题，我们党的干部对学习抓得太少，党的读物写得太差，不能适应时代的客观要求，我们所花的学习时间太少，对问题的研究不深不透，这也反映到进行辩论的方法上。我在上次代表大会和全会上就说过，我们的党内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恶言相对，互相攻击，暴露出辩论参加者对所讨论的问题缺乏深思熟虑的态度。开展反对各种倾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至于如何做到扎实地去研究问题，寻求真正的论据，而不是机械地开展对对手的斗争，这一点

我们就没有学到家了。

然而，我们党在发展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求我们从政治上进行更深入的考虑，要求我们缜密地机断行事，灵活应付并对每一新形势作出反应。这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加倍注意我们的理论水平，更加搞好我们的出版物，组织好我们各个党的学习。

六、共产国际中的倾向

右倾和“左”倾。右倾是主要危险

同志们！现在就共产国际内部种种倾向说几句。不久前，共产国际中的主要危险来自所谓“极左分子”，他们企图另建国际组织。在联共（布）党内反对派被击败以后，这种企图也化为乌有了。但是，从反对派的覆灭（所谓的“列宁崩得派”的垮台标志着它已发展到了顶点）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得出某些结论。我们肯定地说，托洛茨基主义就是一种社会民主党倾向。有的同志在内心深处认为，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但是，列宁崩得派的历史表明，反对派的核心人物已经跑到社会民主党人一边去了。这件事是偶然的吗？不，并非偶然。我们清楚地看到所谓“极左分子”和右倾分子之间关系发展的辩证规律。从整个共产国际来看，现在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我在前面分析过的稳定时期以及议会主义的残余、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工会工作的某些特点，乃是使这种危险得以滋长发展的主要因素。这种危险在各个党内具有各不相同的形式。它表现在哪里呢？首先表现于一心追求合法化，表现于各党甚至在必须冲破资产阶级合法化框框时也不敢冲破这种

框框，对资产阶级的法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右倾还表现在，譬如说，罢工时忽视加强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在应该举行罢工的地方不去举行罢工。这种右倾还表现在对社会民主党采取了错误的路线，对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导斗争不力。还表现在各党缺乏国际主义精神。我们看到，甚至大体上执行了正确方针的党，往往也把履行国际主义的义务置之脑后，如同过去对待中国革命那样。这毫无疑问是明显的右倾。这种倾向在工会工作中也有所表现，在那里，有时竟把一般的工会纪律看得高于党的纪律。还有其他各种形式的表现，我在后面还要讲到。由于不了解党与工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时也发生党以共产主义先锋队的身分去直接指挥群众，而不努力采取说服的方法，不去做系统而细致的工作。还暴露出某些根本违背统一战线策略的倾向。

中国在极其严重的右倾时期结束后，又出现了“左”倾。这里的“左”倾的表现形式是盲动主义情绪，盲动主义策略等等。但是，总的来说，现在脱离正确路线的倾向右比“左”更甚。以法国为例，我们的党迄今依然明显地存在着议会主义传统，我这是指其贬意而言。这种传统在最近举行的选举中就有所表现，出现了抵制实行我们的策略转变和抵制这种策略的倾向。这自然与某种十分严重的议会主义倾向和某些脱离正确政治路线的机会主义倾向有关。法国党内存在这些倾向的原因在于它有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不言而喻，我们兄弟的法国党今后也应当为反对这种现象而斗争，而且要开展系统的斗争并首先说服自己的党员。这里所说的斗争不是仅指反对某个个人的斗争，而是要同法国社会生活和原社会党（其成员不少已加入共产党）生活中根深蒂固的老传统作斗争。

法国党在讨论所谓镇压问题时就出现过这种倾向，一些同志和整个党都犯了错误，到后来才去纠正这些错误。我们看到，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党也犯过这种错误。捷克斯洛伐克党是真正的群众性的党，但是，它犯有相当严重的“合法化”的毛病。捷克党有时犹豫不决，不敢发动群众去反对矛头指向它的种种法案。如果经常向政府让步，不采取有力措施去发动群众反对那些矛头指向共产党的政府法案和命令，那么，十分自然，就不可能创造任何条件去发动规模更大，但与资产阶级合法化概念截然抵触的群众性行动了。某些同志对事态将如何发展毫无概念。他们的推论是这样的：到某月某日之前，譬如说，到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将在合法范围内开展工作，在这之后我们再改变策略。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准备工作要早做。群众行动应被看作是我们开展斗争的犀利武器之一。把群众发动起来，走上街头，轮番地向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制发动攻击，打破它，采取革命的方法（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占领街头，然后一步步前进，只有经过一系列这样的群众行动并在开展这种行动过程中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只有在这种过程中我们才能做好迎接更大规模、更激烈和更艰苦的群众性战斗的准备。

至于罢工运动和对罢工运动领导不力的例子，比比皆是，有时某个大工厂在酝酿罢工，可是党组织却一无所知。我们在法国就看到过这种情况。

在对待社会民主党的不正确态度方面，我们也有许多例子说明，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不少党都犯了错误。这些不正确的政治倾向有时表现为提出不确切的口号，德国就是一个主要例子，那里有一些同志在并不存在革命形势的情况下，提出

什么监督生产的口号，这在客观上等于是按照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民主”策略办事，是在参加“工业稳定”体系道路上跨出了一步。可见，在缺乏革命形势的条件下，一个完全正确的革命口号也会转向它的反面。到那时，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不正确的口号而已，它将预示着一一条彻头彻尾错误的政治路线。这种右的危险现在已成为我们面临的首要危险，因此，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之后，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采取十分明确的立场，去反对这些倾向和右倾反对派小集团。

现在，我们应该用批评的态度，用放大镜来看待我们其他的缺点。某些党，甚至可以说相当多数的党，对已经出现的新形势不了解，甚至根本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新情况。普恩加来在法国执政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在英国工党和总理事会实行急转弯时，我们也看到过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发生在英国，那是在社会力量对比出现了新阶段的时候。在德国组织所谓“平民联盟”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也很迟钝。

对具体情况估计不足

由此可见，几乎每一个党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对形势变化反应过迟的问题。形势变化了，而党却未能作出反应或反映太慢，下达指示性口号过迟等等。我认为，共产国际及其领导机构也有这种表现。共产国际也不总是迅速而及时地对新情况、新事件和新出现的形势作出反应的。指示性口号的下达也不是每次都很及时。当需要提出共同的基本口号时，我们往往跟不上工作的需要。有时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同一个党内一下子提出了20个各不相同的口号，而同时提出20个口号，这就使这些口号失去了一切意义，

因为党的注意力完全分散了。党的领导机关有时不善于将这些口号统一起来，围绕中心口号提出次要的口号，这是领导方面的一个严重缺点。有时我们却又看到，某些口号本来是正确的，可是在实践中却敷衍了事，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贯彻。

谈到我们各党的工作，就必然要提到弹钢琴，我们党能够而且应当学会弹钢琴，可是，我们却弹得不好。一方面是我们往往提出过多的口号，却没有一个中心口号。另一方面是我们有时光讲一般性的革命道理，忘记和忽视了日常的“琐碎的”斗争口号。我们说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要采取多种形式，因此，加强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对话又是错误的。而这种倾向在我们党内是存在的。我们对社会民主党的错误揭露得越多，我们对社会民主党工人就越要多做说服工作，使他们确信我们政策的正确性。

迄今为止，我们的党还没有学会把日常工作问题与我们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联系起来。我们往往大讲特讲世界性问题而对解决日常问题毫无作为，或者只顾日常问题而忘记了要把这些问题与重大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而且我们各党在许多场合下不能及时地正确阐明当前形势及其特点。我们各党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迅速地对具有特殊性的新局势作出反应，不能较快地把握局势和比较清楚地阐明局势，往往不善于提出能概括局势特点的中心口号。对于上述这些缺点我讲得比较多，为的是使我们能够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而且我认为，从上次代表大会至今，已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们也有必要指出并强调我们共产国际方面存在的这些缺点和弱点。以组织工作方面的缺点，即对我们的决议执行情况检查不力的问题为例，我们发出过各式各样的通告、公

开信和秘密信函，却不去查一查，这些东西是否都得到贯彻执行。我们为此而耗费了许多纸张，可是却不大检查和很少检查我们的决议的实际执行情况。我们不止一次地作出决议，强调我们这里的领导机构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性领导机构，各党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出自己最优秀的代表参加常务工作。但是实际上我们依然未能实现这一决定。

反对派别活动

下面我还想强调指出另一件事，固然这件事多少有些脱离本题，但对各共产党的生存却有着重大的意义。我指的是派别活动，这种活动是没有充分的政治根据和充分的政治理由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极其复杂，部分原因在于历史传统。在某些党内，派别纠纷十分严重，以我之见，必须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与之进行斗争。请允许我举两个这样的例子。

以南斯拉夫党内的情况为例。严重的派别斗争持续了七年之久，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害。在最近几次国际会议、代表大会和扩大全会上，我们曾一致肯定，政治分歧已经越来越小了。但是，尽管发表了一个个关于立即停止派别活动的庄严声明，这种斗争却愈演愈烈，结果是党受到了严重破坏——这种情况与其说是警察恐怖活动造成的结果，不如说是党内派别活动造成的恶果。现在，南斯拉夫党正在彻底调整党内力量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改组，换上了新人，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谢天谢地，虽然不得已而采取了这种办法，但党总算得到了挽救。不过我认为，要想从中汲取某种教训，有必要再谈一谈这个问题。通过上述种种极端手段和方法，南斯拉夫党内持续多年的危机现在总算有所克服了。

现在，我们又面临新的巨大危险，它正威胁着一个相当大的党——波兰共产党。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谈某个具体的党，而只是概括地阐述我们各党的不同缺点并且只是作为例子加以列举，但我认为有责任来单独谈一谈波兰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我们的波兰党所处的地位极其重要。一旦爆发战争，我们兄弟的波兰党将起何等巨大的作用，这是十分清楚的。那时，它将是共产国际可以掌握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毕苏斯基政变时期，波兰党犯了极其严重的和极其有害的机会主义错误。当时党内各派的领袖毫无例外都犯了这种错误。我们的共产国际早已指出过，决不能把犯这一主要错误的责任推到任何一派身上。波兰共产党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因为两派之间在任何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分歧和争论。共产国际的代表则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一致肯定，波兰党内部的政治分歧实际上几乎已经烟消云散了。而波兰党这次代表大会之所以没有以党的分裂而告终，原因在于执委会和共产国际在会后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如果我们不干预此事，波兰共产主义运动现在早就会出现两个党了，即使政治上的分歧（我声明对自己所讲的话负完全的责任）缩小到最低限度，情况也会是如此。这都是发生在最近的事情，即在毕苏斯基分子赤裸裸地准备发动战争的气氛甚嚣尘上之时。谁都应当明白，对议会的种种攻击绝非神智失常者的胡言乱语，这是一条完整的专制路线，一条把主要矛头指向苏联的路线，而且这个专制政策搞得颇为巧妙，相当灵活。毕苏斯基分子在分裂某些反对党方面确实相当得手，它分裂了乌克兰的党，分裂了白俄罗斯村社大会党反对派，等等。毕苏斯基分子在国际方面推行的灵活政策也颇成功，（场内有人高喊：“它还向工人阶级灌输自己的

政策。”) 它已渗透到工人阶级之中。在波兰，获胜的不仅仅是我们党，因为还有大批华沙工人投了毕苏斯基的赞成票，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虽然我们党在既定形势下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简直可以说是出色的成就，但是，我们从三天前收到的最新报告中得知，华沙的党组织中已经出现了两个委员会。我看，这不能算是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的光彩。(鼓掌)。同志们，我还认为(虽然我不是提纲起草人)，这次代表大会一定会完全一致地同意专门授权执委会采取一切措施以维护我们的团结。(热烈鼓掌。)如果我们能有一个以普通工人为首的党，一个以战争时期能像革命战士那样勇敢战斗的工人为首的党，而不是一个由平时争吵不休，危急时刻会断送我们的党的领袖人物的组织，情况将会好些。

七、前景良好

奋起斗争，夺取胜利!

同志们! 我对我们的缺点讲得这么多，不是因为我们的总形势和我们活动的总的前景不能令人满意或十分不妙。恰恰相反。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在关于战争危险的问题上，在如何摆脱由于资本主义稳定中的矛盾日益尖锐而造成的窘境的问题上，我们在整个工人阶级中的基础越来越好。我们在殖民地国家中享有压倒一切的影响，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这种影响也是无可置疑的，在印度这样的国家中，我们也已处于享有这种影响的前夜，在全面广泛地提出关于战争危险这种重大问题后，我们还将在西欧国家的工人阶级中获得同样的影响。因此，随着总的矛盾的激化，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阶级斗争的激化，换句话说，随

着当前客观上它充分显露出来的种种条件的产生，我们开展工作的条件和前景是良好的，我们获得胜利的前景也是良好的。没有任何根据说，技术进步、资本主义机体的局部性巩固以及资本主义出现稳定的进程会像社会民主党人所预料的那样，将使我们碰得头破血流。相反，目前形势出现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这些矛盾越尖锐，我们的立足点就越广泛，越牢固。当我们学会了——而我们最终当然能学会——把日常工作同重大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团结起西欧各国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使资本主义大国的工人运动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我们就能把这些与真正强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殖民地人民的运动联系在一起。这样，当帝国主义举起好战旗帜的时刻到来时，我们的共产国际，我们所有的党和全世界无限广泛的劳动群众便将表示自己的意见。这个意见将是掀起国内战争，将是同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它将成为共产国际的胜利召唤！（长时间热烈鼓掌，转为欢呼。代表们起立，高唱《国际歌》。）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报告人：许勒）

战后时期和青年

我今天的报告要解决两项任务，一是我们应当弄清楚，布哈林同志谈到的那些国际局势问题对于青年和青年的特殊利益产生何种影响，其次是，我们应当着重研究一下青年共产国际作为一个组织，它的状况和发展趋向如何。

布哈林同志在其报告中指出，战争年代出生的青年给他的印

象是，在政治方面的组织性不如战前的青年一代。他认为，这也是一种反常现象。我想，在我报告的开头，应当较为认真地加以研究的正是这些问题。毫无疑问，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现在的工作对象是新的人材。不作任何说明是不能把这种人材同战前的工人青年等量齐观的，但是，也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同直接经历过战争和革命的那些工人青年相比。不言而喻，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现在想组织和争取过来的青年出生于战争时期。这些青年生于战前还是生于战争时期，这一点本身当然并不会给青年打上革命的烙印。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些青年，在他们达到对青年运动有特殊意义的年龄，即 13—14 和 18—19 岁的时候，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育成长的。必须指出，近几年来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条件已经有所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普通成员，还是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干部，在组成成分上都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几年前都还没有参加进来，相反，一年以前还在我们组织内的成员，现在有许多人已经退出了组织。怎么会发生这种现象的呢？我在下面还要讲到这一点。

所以，同志们，我们一开始就应当肯定，共青团在最近几年中已经更新了组织，而且这种更新不仅涉及普通团员，而且涉及到大部分领导干部。我想举一个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组织，即柏林—勃兰登堡地区共青团组织为例来说明这种现象：1927 年我们对这个组织的团员的团龄进行一次相当准确的调查统计。我们获得的结果是怎样的呢？调查结果表明，该组织 65% 以上的团员入团只有一年，18% 的团员入团两年，3.5% 的团员团龄为三年。这就是说，该组织 87% 的成员是在 1924—1927 年期间入团的。

1924—1927年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年代，是稳定状态首次以合理化这种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年代，是革命暂时趋于低落的年代。这个浪潮后来再次高涨起来，但总的说来，那几年正是目前稳定时期的开端。上面提到的占该组织成员总数87%的青年，即1924—1927年期间入团的青年多数不是20岁以上的工人，而是16—19岁的青年。这些青年或是在战争爆发前刚刚出生，或在战争时期和第一次伟大革命浪潮高涨时期还是孩子，所以，他们不能像在这之前参加团组织的青年那样，亲身感受到革命的影响。这些工人青年多数是在稳定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个时期虽不无革命因素，但是它对新的青年工人产生的影响不如战后最初几年产生的影响那么强烈，对青年工人的鼓舞和对青年工人认识自己的力量所起的促进作用也不如战后最初年代那么大。我们不应当忽视这一情况，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必定会影响到我们开展青年工作的条件，也会帮助我们得出某种有利于青年工作的结论。过分重视这个问题是不正确的，但必须顺便提到它，以便对我们共青团开展活动所处的环境有一个较为明晰的概念。

这种情况无疑地起着某种作用，但我认为，其他一系列主客观条件对我们判断共青团目前的状况和任务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事实是，尽管存在着相对的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所特有的种种矛盾对青年工作也有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指青年工人与整个工人阶级一样，深受最近时期稳定之害，而且指青年工人在稳定时期所受的特殊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最近几年以来，青年工人越来越左倾。

现在我想谈几个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有关和与整个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有关的问题。

首先谈一谈关于资本主义合理化和青年的问题。使成年工人深受其害的资本主义合理化，其后果也波及青年工人——工资降低，工作日延长，失业增加，对劳动力的剥削更为残酷，现有的劳动保护条件进一步恶化，等等。可以认为，这些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十分明显，合理化造成的这些恶果在青年工人身上反映尤为突出。

但是，除此之外，合理化还给青少年带来特殊的恶果。总的来说这些恶果是两重性的，一方面在实行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中力图用未受过训练或训练很差的工人来取代熟练工人，从而使熟练工人的作用缩小到了最低限度。这样做的结果又使学徒工进一步缩减。但是，这种现象只见之于大型工业，因为手工业的情况相反，现在正加紧同实行合理化的工业进行竞争，所以它力图以使用学徒工的名义，进一步加紧对青年工人劳动的剥削。由此可见，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合理化所造成的对青年工人的特殊恶果，学徒工将进一步减少，对于大批年轻的工人来说，他们成为熟练工人的机会将会更少。

不过，第二个后果比上面提到的第一方面的后果更为明显：由于实行资本主义合理化，青年在生产中的作用提高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应当重视这一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为各国共产党吸收远未枯竭的青年工人后备力量入党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在许多场合下成年工人正在被青年工人所排挤（这一点也是可以用许多数字来证明的），因为实行合理化的结果，生产过程愈益简化，同样的工作使用年轻工人或半熟练工人即可完成。但是，不仅要注意到某些工业部门和某些工厂青年工人人数的百分比超过成年工人，还要看到下面一种情况：现在，青年工人在实行合理

化的工业中的比重也已有所增加。很明显，现在站在流水作业线旁同成年工人完成同样工作的青年工人，比过去的学徒发挥的作用大，不仅在手工业行业如此，在大型工业中也是如此，因为过去学徒干的活同整个生产过程不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过去，学徒工放下手中的工作，这对整个生产过程不会产生特别的影响。但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如果在流水作业线上工作的青年工人突然中断工作或提出可能导致工作停顿的要求，那么，这个企业的整个生产就会因此而出现比过去严重得多的问题。由此可见，由于实行合理化，青年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无论是在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的人数比例方面，还是在它所占的比重方面，都大为增长了。但是，尽管如此，青年工人失业人数仍相当可观。

共产国际由此应当得出何种结论呢？首先，它应当考虑到青年工人在经济斗争中，在工人阶级的罢工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应当考虑到共产党和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利用现有后备力量的可能性，因为这一后备军至今很少被我们利用或者根本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事实上，从事生产的青年工人，特别是在实行合理化的企业里工作的青年工人，由于劳动强度日益剧烈，他们比成年工人更愿意参加经济战斗和罢工。这一点必须加以利用。

所以我们要吸收青年工人参加到同托拉斯资本的斗争中去，要利用共产党的这些后备军。为此，就必须开展争取实现青年工人要求的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青年工人吸引到经济斗争中来，进而达到在工会内部将他们组织起来的目的。

但是，我们应当肯定，各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妨以青工和学徒工参加同托拉斯资本的经济斗争和参加罢工的问题为例。关于这个问题，主要在德国和挪威，我们

已经谈论得很多，也进行过许多辩论。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在大多数国家，学徒工，甚至包括在实行合理化企业中工作的学徒工，是从不参加成年工人签订的集体合同的。他们同企业主另有专门的合同关系，大都按单个签订合同的原则接受工作，即使不按单个签订合同的原则，而按集体合同参加工作，那种集体合同也因包含有种种限制性规定而与成年工签订的集体合同大不相同。他们签订的劳动合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禁止学徒工参加罢工。资本家把学徒工参加罢工视为违反合同规定，他们有权开除这些青年工人。

从资本主义法制观念来看，情况就是如此。那么，从阶级斗争观点来看，情况如何呢？从阶级斗争观点来看，情况的特点是：第一，在工业企业中，学徒工成千上万，他们毕竟起着很大的作用；其次，学徒工本身也希望参加斗争。如果在事态发展到工人阶级举行罢工和经济斗争的地步，而又不把学徒工吸收到斗争中来，这无异是对罢工的破坏，换句话说，就是让学徒工被利用去反对成年工人。成年工人举行罢工，而学徒工却照常干活。不言而喻，他们在客观上就起着工贼的作用。我们青年共产国际对此究竟应作何表示呢？我们宣布，我们要把学徒工也吸收到经济斗争中来。必须让学徒工也举行罢工。在这一斗争中，我们当然还要刻不容缓地提出学徒工也参加签订集体合同、享受充分的平等权利和废除个人合同等要求。

那么，德国党和挪威党内发生的争论是什么性质呢？在挪威党内，这个问题是联系当前建筑工人的罢工进行争论的。挪威的情况所以十分糟糕，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建筑工人的罢工本身是与法律相抵触的。可以认为，既然整个罢工是违法的，那么，我

们共产党人就不必过分地去考虑法律上的细节，过分地担心青年工人有没有罢工的权利。可是，实际情况相反。未参加组织的和非党学徒工提出要求让他们参加罢工，而共产党和在工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却宣布说，为了遵守合同规定，学徒工不应当参加罢工，他们只要不搞工贼活动就行了。于是，在权威组织和权威人士的压力下，共青团不得不放弃让学徒工参加罢工的口号。德国中部爆发罢工期间，德国出现的问题也与此相类似。那里的共青团建议吸收学徒工参加罢工，而党内同志，特别是哈勒地区的党员却仍坚持不让学徒工参加罢工的观点，认为这样会违反他们与企业主签订的合同。他们提出的口号规定，对学徒工只要求他们不搞工贼活动。然而，这个口号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显然，学徒工即使不搞工贼活动，也决不可能避免同企业主的冲突，相反，他们的处境会更困难，因为工厂工人都不上工了，学徒工就更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采取大规模镇压、开除和迫害的手段，比在学徒工直接参加罢工的情况下要容易得多。由此可见，不让积极参加罢工的口号是一个危险的口号，而且这种口号在许多场合下是实现不了的，不管怎么说，学徒工反正是要采取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的，不过，在直接参加罢工的情况下，他们更易于开展斗争罢了，因为在直接参加罢工的情况下，所有工人团结一致，就会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保护。我们看到过许多实例，一些学徒工因参加成年工人的罢工而被开除，后来，由于成年工人提出了要求，他们又恢复了工作，不仅如此，成年工人还争取改变了学徒工的劳动条件。

但是，整个问题在于，许多同志并不赞成青年工人参加经济斗争，或者过低估计他们参加战斗的意义。这些同志不愿得出吸

收青年工人参加斗争后必然得出的结论，即必须让青年工人参加签订集体合同，必须为实现青年工人的要求而斗争。

我们已经说过，在许多场合下，当成年工人，甚至共产党员都反对青年工人参加罢工时，青年工人仍坚持要求参加斗争，这就证明了青年的战斗精神。这一点已为其他许多事实，如青年工人的罢工所证实。最近一个时期，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波兰、挪威、英国、荷兰、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在突尼斯，青年工人举行罢工的事例越来越多。仅在德国一个国家内，冬季几个月间发生的青年工人罢工事件就不下 18 起。其中一次罢工，参加的青年工人达 900 名。这类罢工取得的成果多半不甚显著，而且大多数是绕过工会领导机关或在违背工会领导机关意志的情况下举行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能否绕过工会组织或甚至违背它们的意志去举行这类罢工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较为详细地谈一谈青年共产国际与工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共青团与工会

我不了解，是否所有的同志都充分地意识到，工会在反对青年工人加入工会组织和放弃对他们的领导方面已走到何种地步。许多国家的立法机构禁止工会吸收 16—17 岁以下的青年工人入会。而许多工会自己也规定最低入会年龄，此外，有些工会组织不把青年工人看成享有平等权利的会员，也就是说认为他们不享有充分的权利。由于这个缘故，工会中青年工人所占比例少得可怜。如果不是为了避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的话，我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例子来证明这一点。青年工人所占比例数低得惊人，就足以

说明了。

与此同时，青年工人则要求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保护。他们常常等不及工会和共青团采取某种措施去维护他们的利益，自发地举行罢工。所以现在问题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我认为，整个无产阶级，包括青年工人在内，都应当组织到工会里来。我们认为，工会应当为争取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同样认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种情况下应在工会组织中发挥鼓动和促进作用。共青团应当推动工会研究如何维护青年工人利益的问题。但是，必须使共产主义青年团本身也本着这一方向开展工作。必须使共青团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能推动工会组织为实现青年工人的要求而同企业主展开斗争。当然，党在这方面应给共青团以一定的支持。诚然，党的支持只能是有限度的，只能在特殊情况下作为一种例外提供这种支持。但一般来讲，不应当忽视这种可能性。共青团独立地开展经济斗争，是把我们的青年组织变为群众性组织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共产党总的工会策略问题相联系的。在一些党内，特别是在德国党内，有些人竟说未经工会允许，不应举行罢工，只有在斗争确有胜利把握时，他们才同意开展斗争。

持这种右倾主张的人自然也反对我们去组织或领导青年工人的罢工，反对共青团违反工会的意愿或同工会同时组织青年工人的罢工活动。十分明显，与工会策略相联系的争论问题，其最尖锐的表现就在这一方面。因为改良主义者正是在工会如何对青年开展工作的问题上最明显地暴露出他们的改良主义本质。如果我们也站到那种立场上去，认为只有在得到工会的批准或大多数工

人事先的同意，或事先肯定有获胜把握的情况下，我们才去领导青年工人的罢工，那么，我们就会犯社会民主党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负起责任，对所发生的每一次青年工人的罢工实行领导并且力求保证成年工人能支持参加罢工的青年。共青团也应当尽力将青年工人组织到工会中去。如果形势有利，如果工人阶级的多数支持我们，如果我们有希望使大多数青年工人参加到斗争中来（而青年在该企业生产过程中又起着重大作用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就应当去组织这种罢工。

但是，共产主义青年团自己去组织青年工人罢工和开展独立的经济斗争的问题仍然是第二位的。在反对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斗争中，共青团的基本任务是把青年工人组织到工会中去并在工会内部开展工作，以便迫使这些工会进行斗争。

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是共青团必须在工会中开展工作。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的工作犯有很大的错误，那就是1921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规定，共产主义青年团不应当在工会内部建立自己独立的组织。这项规定不仅涉及工会工作，而且带有普遍规定的性质。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依靠某些辅助性的青年组织也照样能维护青年工人的总体利益。大会所指的辅助性组织包括下述形式的青年工会组织，如按革命原则组织起来的青年支部、工会中的青年委员会、“少年突击队”组织以及无产阶级自由思想者组织，等等。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有关青年支部和工会中的青年组织问题。近两年来，我们纠正了原先在这个领域中所犯的错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不少改进。我们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在工会内部建立某些形式的组织，而且我们所需要的组织是不使青年工人和成年工人相脱离的组织，

是建立在真正的革命原则之上，执行革命任务但又确是具有特色的青年组织。工会内部按革命原则组织起来并受革命领导的青年支部就属于这类组织。我已说过，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成果，我们在许多国家建立了这类组织。我们有了青年委员会和青年组织，但我们还要同改良主义者歪曲青年支部作用的行为作斗争，同滥用青年支部，把它当成与共产主义青年运动进行较量和把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隔离开的组织等行为作斗争。

我们已经在一些国家，首先是法国、英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挪威建立了这样的组织，结果，我们的工会工作得到了显著改善。为了更多地吸引青年工人参加工会，为了促使工会更多地关心与青年工人有关的问题，上述这种组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还应当作出更多的努力，比迄今为止更积极地开展活动。

战争危险和青年工人

现在我讲当代国际形势的第二个大问题——关于战争危险的问题。我将尽量联系青年问题来谈这个问题。战争危险问题现在对青年来说具有新的、更大的意义。我不想重复众所周知的关于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掌握了军队的一般道理，我将尽量具体地、以新的方式来提出问题。从什么方面讲这个问题对我们具有新的意义呢？首先是从资产阶级军队实行改组产生的后果来讲是如此。

大多数国家正在改组资产阶级军队。这种改组的实质归结起来就是，在和平时期，正规军将只保存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基干队伍，而且不言而喻，它的补充将采取全民军事化的方式。全民军

军事化的任务是给训练有素的基干队伍提供必要的后备军，而这支后备军首先来自青年。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某些国家正在采取形形色色的方法实行或即将实行青年的军事化。正如布哈林同志所说，这种军事化往往采取极其狡猾的方式，以建立各种体育组织的名义进行掩护。不过有些国家已经公开传出种种建议，要把青年的军事化变为一种必尽的义务。学校的每个儿童、工厂的每个青年工人，厂办学校中的每个学生和青工，所有在学青年和做工的青年都得接受义务军训。对青年实行军事化，这就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全新的任务。

迫使我们再次重视战争危险问题的另一个情况是，青年工人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发生了变化。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军队的改组计划不仅仅在于改组军队本身和建立必要的后备力量，而且还要使工业适应战争的需要，对工业实行军事化。与过去的战争相比，未来的战争更将是一场技术的战争，因此，青年工人问题将起巨大的作用。因为青年工人在工业和生产中的比重日益提高，所以很清楚，青年工人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和在军事工业部门开展青年工作方面的作用也提高了。

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关于在军队和与军队有关的组织中开展工作方面，共产主义青年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这是无可争辩的，也是为许多事实所证明了的。至于说到军事工业部门的青年工作，虽然也有所开展，但十分遗憾，我们所做甚少，决不比我们的党做得多。

资产阶级的战争准备和它在这方面对青年的工作并不是局限于对青年进行体力和军事技术的训练。资产阶级正千方百计地在思想上影响青年。他们采取的手段有两种：一是宣扬沙文主义和

法西斯主义，二是散布和平主义。我们应当加紧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对青年实行法西斯化的企图。十分显然，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进行和平主义宣传，是资产阶级用来对付有组织的青年工人的一种危险的工具。

青年的反军国主义斗争

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斗争，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最重要和紧要的任务。我们的天职就是要广泛地开展顽强的斗争。我们肩负的责任是重大的，因为青年在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中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为什么布哈林同志把关于战争危险的问题作为他报告的中心问题呢，这是十分清楚的。为什么据此而提出关于青年国际和争取青年的问题如此重要呢？这同样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个问题是和战争危险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已经说过，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在这方面开展认真踏实的工作，首先是在军队内部开展了鼓动和宣传工作。但是，有些团组织在这方面还刚刚起步。

在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方面，我们还要根据已积累的经验，研究制订出一套采取多种形式在军队中开展斗争和组织工作的办法。几乎在所有国家中，我们都曾制定过相当广泛的计划，以反映陆海军士兵、预备役军人、新兵的局部要求；我们也曾提出过一系列局部性要求并为之在军队中开展过宣传和鼓动。这项工作不仅涉及长远的要求，还涉及一些极为普通的事情。例如，士兵在军营外穿着制服的权利问题，但是，这些事情与更为重大的问题，如服役期限问题是有联系的。从瓦解军队的观点来看，所有

这一切都曾产生过影响并取得过一定的结果。我们不仅为在军队内部开展工作制定了一整套方法，譬如，法国的同志还为开展对新兵和预备役士兵的工作研究出了特殊的工作方法，而且现在我们还面临着一项任务，要研究如何对雇佣军士兵开展工作的问題。随着资产阶级军队的改组，如何对职业士兵开展工作，确实具有巨大的意义。

至于报刊在战争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根据法国陆军的《军营报》、海军的《让勒古恩报》和有关新兵的机关报《新兵报》作出判断。

近一年来，法国发生了70次武装暴动事件。参加暴动的有陆海军士兵，有预备役军人。在征召新兵过程中爆发过60次示威游行。此外，陆军和海军监狱中也发生过多次示威事件。卡萨布兰卡（摩洛哥）的飞行营下级技术军职人员的“罢工”就是值得指出的一个事例。这一事件表明，反战运动已渗透到殖民地军队之中。那次罢工，准确地说是那次暴动，参加者达到300人。海军举行各种检阅时屡屡发生示威事件，这同样是值得一提的。

在反对军国主义的活动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所以我们要毫不掩饰地宣布，当事情涉及青年共产国际的国际政策和国际活动的基本问题的时候，我们特别痛切地感觉到自己缺点的存在。现在还有某些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实践中十分忽视这项工作，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应当把反对军国主义的活动从时断时续的鼓动工作转变为有计划的经常性的工作。我们要在这方面勇往直前地走下去。

我们的经验不是偶然的、点滴的经验，因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分认真地抓了陆海军中的工作。而在未来的战争中，在反对战

争危险的斗争中，共青团很可能将是共产国际用来瓦解帝国主义军队和资产阶级军队的主要武器。在摩洛哥和叙利亚战争期间，我们不仅在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在殖民地国家都开展了鼓动工作。当法国军队在摩洛哥同当地军队发生冲突时，共青团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活动，而且实际上对当地军队表示了友好和同情的态度。在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时，共青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共青团为反对各种分舰队进入别国港口开展的活动也是值得一提的。众所周知，帝国主义大国经常派遣自己的舰队进行互访。英国舰队每年远航波罗的海并进行反苏示威，这已成为一种惯例。但是，无论是在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但泽、赫尔辛福什，还是在雷瓦尔，在波罗的海的任何一个港口，英国舰队只要一停靠，水兵们就会受到各种各样传单的热情欢迎，这些传单是在有关国家共青团配合下印刷的，传单揭露英国海军远航的真实目的，讲述水兵们应负的阶级责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和青年共产国际还在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军队中开展了一定的工作，但我要强调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至于我们在军队内部工作的组织问题，从最近了解的情况来看，许多事情尚待改进。我们发现，不能仅仅限于建立一批共产主义小组，除了共产主义小组以外，还必须同时建立另一些形式的革命士兵组织，当然是秘密的组织。

但是，我们要为这些组织得到承认和合法地位进行斗争。这类广泛的组织有：士兵俱乐部、预备役军人委员会、新兵委员会、新兵联合会、士兵委员会，等等。还必须提出并宣传在雇佣军中组织职业士兵工会的口号。大家知道，英国有4名共青团员被判处长期徒刑，原因仅仅是他们鼓动士兵组织职业工会（英国的士

兵是职业军人)。资产阶级对我们新的工作方法作出的反应，可以证明上述工作方式对于争取士兵转到革命方面来是有益的。我们应当进一步支持这些新的组织形式。

现在谈一谈青年的军事训练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以列宁论裁军的名著中主要阐明的观点为依据的。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对青年实行军事训练，但是，我们并非以和平主义思想去反对青年的军训，我们是同这种军事训练的阶级实质进行斗争。我们要与资产阶级对青年实行的军训针锋相对，对青年进行无产阶级的军事训练，就像列宁所要求的那样，在无产阶级的组织中对工人阶级进行自愿的军事训练。我们还要更进一步。我们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瓦解资产阶级对青年施行军事训练的组织。义务军训组织实质上是军队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对这类组织的态度，与我们对军队中工作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将经常不断地要求青年工人（如我们在服兵役问题上所做的那样）参加这类组织，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去学会使用武器；然后，我们再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在这些组织的内部开展工作以瓦解它。对于志愿性质的军事组织，我们不能对不同国家采取千篇一律的策略。但是，通常都应当开展瓦解这类组织的工作。我们应当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去开展这项工作。但是，我们并不号召青年工人群众去参加这些志愿军事组织。我们只限于向这些组织派遣共产党员，同时号召该组织中的青年工人团结一致，开展革命的鼓动工作。我们还将宣传和建立无产阶级的自卫组织和工人战斗队。

鉴于上述情况，建立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和青年突击队的问题将具有巨大的意义。把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单纯地看成是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组织，那就大错特错了。红色前线战士同盟要比这

广泛得多。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是符合列宁关于工人阶级应当建立自己的组织，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对无产阶级进行自我军事教育的指示的。当然，红色前线战士同盟不可能像资产阶级的组织和联盟那样公开地、充分地实现自己的任务。因此，我们的工作自然也要根据不同的时机采取不同的方式。但是，就实质而言，红色前线战士同盟首先是与列宁的指示相符合的。列宁的指示要求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组织，以便对无产阶级进行自觉的阶级军事教育。

现在谈谈和平主义问题。我们应当有计划地在青年中开展强有力的反对和平主义的工作。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参加在荷兰举行的青年和平主义国际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由全世界许多和平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以及部分资产阶级的青年组织召集的，目的是讨论和平主义问题、战争问题、殖民地问题，等等。我们接到了会议发起单位的邀请。他们邀请我们直接参加代表大会，我们则利用这一机会，从这个代表大会的讲台上进行宣传，反对和平主义，主张用共产主义观点分析战争问题、殖民地问题，等等。我们决定以青年共产国际和几个共青团的名义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这次代表会议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和平主义把戏，对此，我们是毫不怀疑的。

主张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原因是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方面是整个和平主义运动内部的反对派思潮不断增长；仍然信奉和平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和部分青年工人日益左倾；希望听取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了解共产党的观点的倾向日益强烈。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主要是英国正在耍弄手腕。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是，在参加这一国际联合组织并在召开世界大会方面起主要作用

的英国和平主义组织中，原英国驻国际联盟的代表塞西尔勋爵起着十分令人注目的作用。显然，这些人，特别是英国人必将竭尽全力把青年工人的同情引向国联一边。

但是，同志们，这些人也向我们发出了邀请，向苏联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出了邀请。这一事实反映出小资产阶级青年和平主义运动内部反对派施加的某种压力，而青年工人中的某些阶层是靠拢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的。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机会，从工农青年群众能听到我们声音的讲坛上去宣传共产主义的主张，宣传我们对战争和殖民地等问题的共产主义观点。

殖民地的青年运动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在殖民地的工作问题。这是我们联系国际局势应当提出来的第三个主要问题。

首先讲一讲殖民地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问题。组织形式问题绝非简单问题。我们认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先进的，比较发达的；另一类是落后的，比较不发达的。发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主要特点是：在阶级分化方面已经迈开步子；国内有了工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界线相当清楚。而比较落后的殖民地在工业发展、无产阶级的成长和阶级划分等方面都无多大进展，封建主义，甚至氏族社会的经济方式在这些地方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我们设想，我们的任务是要在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起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是，我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除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外，可以允许某些更广泛的组织形式的存在，共青团可以利用这些形式来开展自己

的活动。

在比较发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我们应当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外，虽非必需，但可以在共青团之外，组织在其领导下的、更广泛的青年组织，以支持民族革命斗争。在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则应把这种可能性看成是一种可以加以利用的机会。在大多数非洲殖民地国家，在我们开展工作的最初阶段，除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外，我们在多数情况下还需要更广泛的民族革命组织。

关于我们在中国和印度的工作情况，我还要专门谈到。

迄今为止，青年共产国际的活动主要在较发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影响有所扩大和发展。我们在中国、朝鲜、北非、巴勒斯坦、加拿大、南非（我们的工作开展得较弱）、澳大利亚（在这里也做得不多）和印度（我们刚刚在那里开展工作）建立有自己的组织。如上所述，这些国家多半是较先进的殖民地。在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非洲，我们的活动几乎毫无进展。

蒙古占有特殊的地位，我们已在那里建立了同情青年共产国际的革命青年联盟。同一度与共产国际有某些联系的蒙古共产党一样，这个革命青年联盟对共产国际也抱着同情的态度。不过，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此处不必去详谈），这种联系现在中断了。

我们在南美建立的组织主要是在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我们在智利的地位相当虚弱）。

从我上面介绍的情况中可以看出，青年共产国际已经渗透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已在重要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但是，我们所做甚少，在我们面前还有广阔的活

动余地，还有绝对不能低估的重要工作要去完成。除了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以外，这就是青年共产国际近期内必须予以重视的主要问题。让我们看一看南美大陆的情况，在南美，从委内瑞拉到阿根廷南海岸，骚动事件时有发生，工农群众运动日益广泛，同情共产国际并准备加入共产国际的群众性政党已经存在，但是，只有少数国家建立有青年组织。这是青年共产国际工作中的一大缺陷。如果我们能认真地开展工作和组织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们有可能在最短时期之内便在那里掀起强大的青年共产主义运动。但迄今为止，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技术上的困难，这项工作的开展一直受到干扰。

但是大家要知道，这里讲的是整个东方，是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以，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正是青年一代在那里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革命的现阶段，这种作用比他们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起的作用还大。

我想较为详细地谈一谈我们在中国和印度的工作经验。

先说中国。总的说来，我们在中国的青年共产主义运动方面获得了良好的、有益的经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经历了蓬勃发展的阶段。我可略举数例，以资证明。

中国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建于 1920 年，初建时是一种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人数很少。到 1925 年 5 月爆发上海事件时，这个团体发展到了 2 900 人，其中 90% 是学生，1926 年 9 月，该组织成员增至 9 000 人，其中 49% 是学生。最后，到 1927 年 7 月，成员达到 35 000 人，其中学生占 38%。由此可见，该组织成员逐年增加，学生所占比例下降，而工农青年比例不断增长。1927 年 7 月，即所谓武汉时期，我们的组织在武汉政府辖区内享有一定的合法

地位。当时，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共青团势力的增长，但是，我认为，下面一些数字可能会更使你们感到惊讶。1927年7月，我们有团员35 000人。接着是可怕的恐怖时期，我们的同志成千上万地被绞死、被砍头和被活埋，我们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人数大减。至1927年8月只剩下了15 000人。有些同志断定当时共青团只有10 000人，反正当时团员数在10 000—15 000名之间。1927年11月，共青团组织有所恢复，成员数增至20 000名，到1928年3月，在继续处于绝对秘密的状态下，我们的中国共青团组织拥有33 000名成员。（鼓掌。）这个数字（33 000）还不包括广东省共青团组织的成员。广东省某些地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和革命的地方自治机构，此外，还有45 000名共青团员。因此，我们在中国拥有的团员数超过了70 000名。即使不把广东省的45 000名团员计算在内，中国在目前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下仍拥有33 000名青年共产主义者，这应该说是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它表明，即使是处于地下，我们也有巨大的可能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殖民地国家中把青年争取过来。

还有一个问题：在这7万名成员中究竟有多少学生。不超过22%，而绝大多数是工农青年。以上就是中国共青团在数量上发展的统计资料。

现在就中国共青团的政治路线说几句。我想十分简要地介绍一下共青团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所持的立场。北伐时期，共青团完全拥护党的政策。它和党一道支持了北伐战争，它与党之间不存在任何重大的分歧。但是，在北伐后期，即1927年初，当发现党的领导犯了错误，国民政府也犯了错误并出现偏向时，共青团提

出了警告。在1927年3月上海爆发工人占领该市的斗争中，共青团像在反对蒋介石叛变的斗争中一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表现了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当然，共青团也不可能做更多的事了，因为一切都决定于党的领导。在武汉时期，我们即已觉察到共青团和党之间的矛盾在加剧。这个时期，青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青团发出的各项指示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由于中国远在万里之外，所以中国共青团一切都自行其是，只是向青年共产国际报告一下情况罢了。不言而喻，工作重担压在共青团的肩上，但是，我们同中国共青团的联系从未中断过。我们在中国派有代表，而中国共青团也有代表常驻这里，可以说，合作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特别是在所谓武汉时期。以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为一方和以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为另一方之间矛盾激化也正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当中国的共青团员看到党的领导越来越向国民党和资产阶级分子投降的时候，共青团和我们的代表提出了警告，反对策划中的投降行为，还发表了相应的声明。声明提出了警告并要求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实行革命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对共青团提出的警告和要求是怎样作出反应的呢？陈独秀声称，共青团不必多管闲事。后来，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亲自要求在政治局发表意见，可是，不仅不让他讲话，而且想尽各种办法不让共青团明朗的态度和革命声音传进由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造成的一团糟的气氛中去。这种机会主义策略造成的后果绝不是党和共青团的紧密合作，恰恰相反，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分裂。因此，我们有权声明，武汉时期的末期，中国共青团不仅没有参与中国党领导的叛卖政策和它的投降活动，而且相反，它做了它

权力范围内能做的一切，以求实现共产国际的政策。在共产国际清除中国党领导层和党本身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时刻，共青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共青团不仅在政治方面提供了帮助，而且向党输送了年轻的新生力量，从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基本骨干和领导层的充实和改善。

但是，我们也应当指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存在的错误。由于中国当时的形势和中国共青团缺乏足够的经验，中国共青团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极端。这种极端主义的倾向有两种表现，一是“冒险主义”，一是“盲动主义”。我们所说的“冒险主义”，是指一种取代党，不承认党的领导，企图由它来实现对有组织的工人的领导的倾向。出现过一种思潮，认为党已经无所作为了，它从上到下都是机会主义那一套，共青团应当把全面领导的责任担当起来。我们批驳了这种倾向并且克服了这种偏向。至于“盲动主义”，这并非共青团独有的错误，而是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近一个时期，即今年冬季所犯的共同性错误。这个错误无疑是会造成危害的，但现在也已得到纠正。

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发展是相当不错的：它已经由学生运动发展为无产阶级运动，它已由一个年轻的、无经验的派别成长为有良好组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一个人数不多的团体发展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徬徨之后学会了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策略。

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实践中获得重要的经验，那就是，对于我们共产主义青年团来说，在殖民地国家同样有可能建立群众性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迄今为止，这个问题一直只是进行辩论的对象，而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我们看到，在殖民地也可以

建立起共产主义青年团，即使在秘密状态下，也有可能使共青团发展为群众性的组织。

有鉴于此，我想简单地提一下有关国民党的青年组织的状况问题。在国民党内建立青年组织的建议，是几位国民党人在 1925 年提出来的。中国共青团曾反对这一建议，认为这是国民党中某些机会主义分子企图建立机会主义的组织，来对付共产党在青年运动中享有的影响。这个问题曾在莫斯科进行过讨论，而且不少同志认为，这种组织有助于更广泛地团结青年。当时没有就这个问题通过任何决议，建议由中国共青团自己作出最后决定，而中国共青团坚持其反对的立场。现在，我们可以说，不在国民党内建立青年组织是对的，因为这种组织对我们毫无助益，反而会给我们带来危害。这种组织恰恰可能成为国民党领导层中机会主义者在殖民地国家青年运动这个棘手问题上同我们进行较量的工具。现在，国民党没有青年组织，也许正是由于不存在这种组织，我们才发展成为群众性的青年团。

现在再说印度。我们同意布哈林同志在其报告中提出的总路线。我们认为，印度资产阶级不起革命作用，这个资产阶级目前还保持着奉公守法的反对派立场，但以后一定会转而背叛革命。我们认为，工、农和知识分子联盟应当进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由此出发，我们认为，我们在印度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建立这种组织的基础已经存在，但是，现在就说印度已经有了共青团，还为时过早。有人向我们建议，不要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只需建立一个青年联盟。这个联盟不应当成为共产主义联盟，首先不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联盟，而应当是一个学生组织。有人向我们声称，印度的学生

在青年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建立学生组织。还有人对我们说，在印度不应当在共产主义旗帜下深入到青年群众中去。我们否定了这种建议、那种非共产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而主要由学生组成的资产阶级组织，只能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对我们有害。我们认为，我们应当着手在印度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

然而，我们认为，单靠共青团还不可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运动。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我个人认为，在印度，除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外，还应当建立另一个靠拢工农政党的、公开的工农青年组织。当然不是建立一个靠拢统一国民党的国民党青年组织，而是要建立一个靠拢工农政党并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青年组织。但是，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综上所述，关于殖民地青年运动的问题，归纳起来可以肯定以下几点：一、我们在殖民地有着开展活动的广阔天地；二、在殖民地可以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使它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三、我们应当加强我们在殖民地的工作。

共青团和群众运动

如果我在这里不提到青年参加最近的选举之事，那就难以充分地说明国际形势对青年经济地位的影响。通过法国和德国的选举，我们看到了青年的积极参与和共青团活动的活跃。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在德国这样的国家，根据新的法律，有 250 万达到 20 岁的青年参加了选举，这是前所未有的。250 万人，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它是可以对选举的结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的。因

此，极为重要的一点是，要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出发来看待这一问题。我们手头暂时还没有关于德国青年参加选举的准确统计数字。但是，根据来自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阵营的传闻，青年参加选举的态度越来越积极，特别是年轻工人中的共产党员选民相当多。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需要加以肯定的，这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仅首次给予党以支持，而且力图在党的鼓动工作范围内以独立组织的身分向青年提出自己的口号。德国的共青团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列入共产党的候选人名单，而且这些候选人向青年开展鼓动工作，向青年发表维护青年特殊要求的演说。效果很不错。在德国来说，这种活动的效果往往令人十分满意。我们看到，共青团在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中创造了青年十分愿意接受的新方法，从而把青年选民吸引到党的一边来，使我们有可能利用选举运动来扩大共产主义青年的影响。结果，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布伦克勒同志以共产党代表身分被选入国会，我们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希望勃伦克勒同志利用议会的讲坛来代表被剥削的、斗争中的青年工人群众讲话。巴贝同志（法国）只是因为左翼社会民主党的出卖，缺少6票，否则也被选进了议会。总之可以说，青年参加选举，对于我们加强群众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同社会民主党斗争中的共青团

现在我来讲一讲我们同社会民主党进行面对面斗争的问题。我想，在这方面我们取得的成绩是相当大的。我不清楚，是否所有的同志都了解这方面的事实。青年社会主义国际现正处于严重

的危机之中，处于低落时期，我们这样说绝不是夸大事实，而只是确认赤裸裸的事实。这种危机一方面表现在青年社会主义国际人数的减少，另一方面表现在青年社会主义国际所属支部不断出现反对派集团。

我可以列举几个极为典型的数字，来说明青年社会主义国际成员人数的情况。拿青年社会主义国际 1924 年的人数同现在的人数作一比较。1924 年，青年社会主义国际的人数达到了最高点，而我们青年共产国际当时的人数则有所下降。同志们，请看下列几个颇具代表性的数据。

德国 1923—1924 年度，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青年工人为 11 万名，现在，根据该组织自己的统计，只有 5 万名。但我们知道，这个 5 万名的数字也是被夸大了的，实际上德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现在人数不超过 4—4.5 万人。

奥地利 1923—1924 年度，社会主义青年团中青年工人人数为 3.4 万人，根据该组织的资料统计，1927 年为 2.4 万人。然而，我们知道连目前这个数字也是被严重夸大了的，奥地利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人数最多只有 1.5—1.6 万名。

比利时 1923—1924 年度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人数为 2.4 万名，1928 年下降到 1.3 万人。

英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危机尤为严重。1926 年，该青年团声称它拥有 9 000 名成员。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谎话，实际上它的成员数不超过 5 000 人。根据该组织的统计资料称，现在人数最多只有 1 000 人。这里还要补充一句，英国的社会主义工人青年组织是靠拢独立工党，也就是靠拢马克斯顿的党的，而马克斯顿一向是不惜进行左的蛊惑宣传的家伙。尽管如此，英国的

社会主义青年团依然处于灾难性的衰落过程之中。

青年社会主义国际的成员总数已由 25 万下降到 12.5 万人。四五年间人数减少了一半。

综上所述，可见青年社会主义国际现在的危机是深重的。社会党人自己也不隐瞒和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产生危机的原因何在？我们认为，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工人青年的左倾化，其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展活动的结果。

说到工人青年的左倾化，那么，十分清楚，而且越来越明显，改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潮流，正在失去其对青年工人的吸引力。最近以来，这一点变得更为明显了。我不是说，改良主义不再企图采取别的形式，例如，采用体育组织或纯文化组织的形式来扩大它的影响了，但是，事实总归是事实，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改良主义正越来越丧失其在工人青年中的影响。渴望参与政治活动的青年工人已经不满足于改良主义，他们或转向共产主义青年团，或干脆脱离改良主义组织。

只要看一看青年工人的经济状况，上述情况就可以理解了。布哈林同志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党本身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靠的是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的形成，而工人贵族和工人中官僚的出现，一是因为实行合理化，二是由于改良主义联盟的上层和国家机构勾结到了一起。但是，社会民主党赖以存在的这些经济基础不可能同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发生关系。社会民主党的青年还可能提供若干个官僚，但要形成一个在经济上享有特权地位的青年工人阶层却是不可能的。

造成这种特权阶层的经济基础已不存在，改良主义在政治上对青年的影响正在下降，改良主义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原先跟随它

的群众。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共青团的工作在青年社会主义国际遭遇的危机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十分重视这次危机。我们把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支持青年社会主义国际各支部内真正的工人青年反对派团体联系在一起。首先我们实行了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是，我们并不局限于统一战线策略，我们还支持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革命反对派，开展了瓦解改良主义组织的工作。

我们在英国的工作，堪称为运用这些方法的范例。我们可以看到，在那里，凡是靠拢青年社会主义国际的独立工党所属青年行会组织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况。青年共产国际的支部则是英国第一个青年组织。改良主义者看到这一点，于是也想建立一个同我们相抗衡的组织并为此而调动了独立工党和英国全部工人报刊机构的力量。然而，却劳而无功，一无所获。我们的组织与那种行会截然不同，公开地主张捍卫青年工人的利益，此外，还结合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巧妙地开展了瓦解社会主义国际所属青年组织的工作。无怪乎英国独立工党青年行会组织的领袖们说，他们对统一战线策略的害怕甚于对魔鬼的恐惧，他们惊呼，“这个统一战线夺走了我们的成员”。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的话是对的。正如实践所证明，统一战线策略是我们争取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群众的一种主要手段。与此同时，还需指出的是，全国行会组织内部正在出现左派组织，而且这些左派组织脱离了行会，转向了我们。

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会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所遭受的危机，正在寻求挽救的方法。第二国际也对青年运动的问题十分担心。但是，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面临的任务比我们

共产党人面临的任务，要困难得多。

那么，为了挽救青年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党人究竟把力量集中于什么方面呢？首先，社会民主党人力图把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残存的组织（如英国）相应地变为各社会民主党的青年支部。其次，社会民主党正在建立大批辅助性的青年工人组织，如青年体育组织、纯文化性质的组织、工会的青年支部、学生支部，等等，并要求这类组织同社会主义青年工人联合行动。这样一来，所有这些体育组织、青年文化或自学组织、学生组织和工会青年支部都得与社会主义青年实行联合并共同形成社会民主党的青年运动。甚至还炮制了一种新的理论。当社会民主党人看到社会主义青年政治运动的分裂已不可阻挡的时候，他们匆匆忙忙地声称，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应当是优秀青年的组织，应当是对青年进行政治教育的组织，同时，又应与其他一切青年组织，如体育组织和文化组织以及工会的青年支部等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一个代表整个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共同组织。我们不能低估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新的动向。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社会民主党人无疑地有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诚然，这种改善更多的是扩大它对青年工人的影响，使所有这些群众性组织归它领导，而不是青年政治运动总的状况会得到改善。这就再次证实，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在这所有这些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

我们应当继续贯彻我们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支持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内部的反对派，我们必须同那种利用辅助性组织、工会青年支部等等为社会主义青年本身的党派利益服务的现象作斗争。

我不想隐瞒下述事实：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在某些国家是有所

发展的。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但是，我所描绘的情景确实说明了青年社会主义国际总的状况。

现在再来谈一谈资产阶级组织中的工人青年问题。参加资产阶级组织的工人青年和一般劳动青年，其数字一定很大，但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发掘这些分散在资产阶级组织内部的巨大潜在力量，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进展甚微，说得准确些，我们还没有真正着手开展这项工作。只有在英国，为和童子军运动作斗争而作过一些尝试，在德国为反对天主教青年运动做过一些工作，以及最近时期在国际范围内开展了反对对青年工人实行法西斯化的斗争。全面开展对资产阶级组织的工作任务正摆在我们面前。这项任务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些组织的一大半成员可望成为适合加入我们组织的人才。在资产阶级的联合会中，有许多工人、农民劳动分子，以及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组织内部已出现某种反对派思潮，因此，可以肯定，这些组织本身将出现左倾化，而这一点也证明了工人青年的左倾化。

我已经说过，在我的报告的第一部分，我想着重讲一讲当前国际形势的关键问题对工人青年运动的影响以及青年共产国际在这方面面临的任务。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极端重要的问题是：合理化问题和同托拉斯资本进行斗争的问题，同战争危险作斗争的问题，殖民地问题以及同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青年运动作斗争的问题。

青年共产国际影响日增

通观国际局势及其对青年运动的影响，我们得到的基本结论

是：工人青年的左倾化已成不可阻挡之势，而且这种左倾化表现在各个方面，尽管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开展工作的条件比对那些经历过战争和革命的青年开展工作时困难一些。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政治活动正日益加强，这不仅表现在青年更为积极地参与党的生活，而且表现在他们善于将青年感兴趣的特殊问题同一般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但是，青年工人的左倾化是发生在稳定时期，这就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这种左倾化的特点是，这项工作在组织方面给共产主义青年带来的成果是很不显著的。

现在谈一谈青年共产国际的实际状况和它的发展趋向，在此必须提出并确切地回答一个问题：青年工人现在总的态度究竟如何。

我们可以肯定，青年共产国际无可争辩地扩大了影响，并不断取得政治上的成果，这是第一位的积极因素。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影响的扩大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转化为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组织上的发展壮大。需要我们着重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我们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而青年共产主义运动总的人数却停滞不动，两者完全不相适应。

有关我们影响扩大的问题，我现在不准备详谈，因为我在报告的第一部分已经阐明了这个问题。我只想指出一点，我们在英国挫败了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我们夺得了对新的工人体育运动的领导权，现在仍控制着这种领导权。其次，我们还在英国职工运动方面占据了重要的阵地。在德国和法国，我们在选举中获得的成功是意味深长的；德国开姆尼茨青年日取得的光辉战果也是引人注目的，这是无产阶级青年在共青团影响下举行的一次史无前

例的群众性示威活动。我们在法国陆海军中的工作成绩很大。在中国，我们的共青团已成为青年群众的领袖。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取得的成果表现在组织反战运动和成功地开展了反对青年社会主义国际的斗争，等等。但是，我们不能安于现状，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我们要承认，尽管我们的影响日益扩大，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成果，现在的基本问题仍然是：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在组织方面毫无收获或所获甚微。

在分析青年共产国际迄今为止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应以事实为依据，既不能估计过高，也不要估计过低。确切地了解各种数字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将择其最主要者介绍如下。

在判断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在数量上的发展状况时，仅仅把我们所有的组织（包括苏联共青团和中国已建立苏维埃地区的共青团）的总人数加以研究是不够的。必须先作好一定的分类：假设把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除外，而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青团分为三类，那么，第一类是大的公开活动的共青团，主要存在于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第二类是小的公开活动的共青团，主要活动于较小的国家；第三类是不公开的组织。此外，我们还有苏联和中国的苏维埃地区。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现有数据，我们将得出什么样的概念呢？

以第一类大的公开的共青团，如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瑞典、北美、希腊、加拿大以及奥地利的共青团为例，我们在那里看到的现象是：大约在1925年，我们的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顶点。但1925年冬至1926年初，运动无疑出现了下降趋势。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我们未能及时找到适合于稳定时期新情况的工作方式。不过，我们的团组织在经历了

1926年初那次数量上最严重的下降之后，第一类共青团组织总的数量仍然是持续上升的。1926年3月初，第一类团组织人数为57 000名，现在计有69 000名。看起来，增长数不特别显著，如果把现有团员数与1924/1925年度3月份的团员数相比，这种增长就显得更小了。诚然，那个时期的统计数字有所夸大，不过，60 000—62 000名的数字是达到过的。与这个数字相比，现在我们拥有69 000名团员，这当然是一种发展，但增长幅度相当小。总而言之，第一类共青团组织的团员数大致上同1925年的水平不相上下，也可以说处于某种稳定状态。但是1926年以后，直到最近时期，我们确实看到了一种较为迅速的发展趋势。

再说第二类组织，即较小的共青团。这一类团员数在1925年约为3 000名。现在，又增加了数百名，所以总人数无多大变化。

第三类是不公开的共青团。毫无疑问，这一类组织有较显著的改善，当然主要是靠中国共青团的出色活动。但是，这一类里不包括中国已建立苏维埃的地区。还应记住，在中国开展秘密活动的条件是极其艰苦的，可能比其他国家更为艰苦。1925年，这类秘密活动的共青团拥有团员数略超过24 000人。可见，这类共青团的发展是很大的，这当然主要是靠中国，但也并不是只靠中国一个国家。

据此，有必要就开展秘密活动的共青团讲几句。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肯定地说，这类共青团组织不仅在中国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开展了十分出色的工作。波兰、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共青团首先就属于这类组织。尽管存在白色恐怖，波兰和保加利亚的共青团组织仍然有所发展，意大利共青团也保住了原有的阵地。正因为这样，地下共青团组织成员人数有所增加。我们向英勇战斗在

地下团组织中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敬礼。我们应当比过去更有力地支持他们。

如果不包括苏联和中国的苏维埃地区，整个青年共产国际的人数 1925 年初为 94 000 人，现在是 102 000 人。增长不甚显著，可以说是保持稳定。但在这种数量的稳定中，又可以看到某种成长和发展的趋向，因为在 1926 年 3 月间，即 1925 年和现在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团员数比现在少，只有 88 000 人。如果不把苏联包括进去而把整个中国包括进去，那么，与 1925 年 94 000 人相比，得出的数字是 127 000 人。如加上苏联，我们在 1925 年 3 月拥有团员数为 130 万，现在拥有团员数为 215 万名。

为了说明这些庞大的数字，我简要地讲一下由这些数字得出的政治结论。

与我们上一次代表大会相比，所有三类共青团组织，包括公开的、秘密的和小的共青团组织，总的说来在数量上保持了稳定，甚至有小小的增长。但是，最近两年以来，又可以看到持续增长的趋势了。

由此可见，虽然团员总数变化不大，但确实存在着增长趋势。当然，这种增长的趋势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而且在团组织团员人数保持稳定的问题上还须指出，我们一些重要的团组织，如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国的团组织人数最近几年来几乎毫无变化。因此，我们面前摆着一项任务，那就是要弄清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但是，不能认为，现在在团组织中的团员就是几年前在团组织中的那些团员。柏林共青团组织的成员 87% 的团龄不超过 3 年，奥地利 60% 的共青团成员是 1927 年 7 月 15 日以后加入团组

织的。由此可见，近几年来，在总的团员数几乎无变化的情况下，大批涌入团组织的是新的成员。这就是说，我们的组织成员存在着很大的流动性。这种大幅度的流动是值得我们密切注意的严重问题。

为组织上的发展，为组织的群众性而奋斗

布哈林同志指出，对青年工人的组织发展工作做得不够，他讲得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没有根据说，近几年来共产主义青年团有组织的成员人数已经减少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宣布，从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共青团的人数几乎没有变化。但不能说人数减少了。相反，近几年来我们组织的成员人数还有增长的趋势。固然，如我所说，现实情况不足以使我们感到高兴，如果我们以此为满足，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无条件地运用自我批评的武器。我们绝对不想夸大我们影响的增长和政治成果的发展程度。正因为如此，我们把人数稳定不变的事实看成是十分不妙的情況。我们认为，这一事实是我们存在严重弱点的征兆，克服这一薄弱环节是我们最为重要的任务。

我想联系这个问题再举几个其他的数字。

青年工人一般的组织状况如何呢？我已说过，青年社会主义国际已丧失其半数成员。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问题：脱离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人到哪里去了呢。转到我们一边的是很小一部分。多数人加入了工会和体育组织，甚至参加了资产阶级组织，还有一部分人索兴对青年运动抱消极态度。

我们当然是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一现象的。令人注目和

十分重要的事实是，青年社会主义国际的成员人数减少了一半，而在这一时期中，我们组织的人数没有下降，只是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上。但是，必须指出，从青年社会主义国际人数的缩减中，我们所得甚少。试比较下列数字：青年共产国际（不包括苏联）计有成员 12.7 万名，如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包括进去，成员数超过 200 万名。这个数字之外，还有属于同情组织的成员 6.7 万名。在我们的队伍中（包括同情组织而不算苏联）约有 20 万名成员。青年社会主义国际则只有 12.5 万人。

青年共产国际和青年社会主义国际合计共有成员 32.5 万名（不包括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天主教青年国际拥有成员 240 万，而且其成员中的一半人，即 120 万人，毫无疑问也是我们可以发展的对象，即工人和小农等等。福音教派青年组织拥有成员 115 万，其中半数，即 60 万人是有可能成为我们组织的成员的。由此可见，在天主教和福音教派青年运动中，有 180 万名成员是我们发展的对象，而青年共产国际（不包括苏联）和青年社会主义国际加在一起总数也只略微超过 30 万人。这一点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大多数青年工人参加的组织还不是改良主义联盟，而是资产阶级组织。

这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项任务，一项我们至今对其意义估计不足的任务。对于我们来说，主要的危险当然在于社会民主党，因为这个党不仅建立有政治组织，而且建立有工会、体育组织等等。但是，同志们，我们已经学会了成功地与社会民主党作斗争。而对于如何同刚才提到的青年组织作斗争，我们却毫无经验。不过，我们面前有着广阔的活动天地。从国际范围来讲，我们比青年社会主义国际的力量强大，但却远远落在资产阶级组织之后。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情况，我想举法国和德国运动中的几个例子。法国是在青年工人政治组织方面缺乏深厚传统的国家。德国则具有较悠久的传统。所以法国几乎不存在改良主义的青年运动。法国的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成员不超过1500人，改良主义工会只有1.8—2万青年工人。但是，在资产阶级组织中却有大批青年：资产阶级体育组织中20岁以下的青年工人超过9万人，而在我们影响之下的有组织的工人青年人数少得多。如果我们把整个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参加红色工会、红色体育联合会的所有青年都加在一起计算，20岁以下的成员人数也不超过11万人。把这个数字与资产阶级组织成员总数100万人作一比较，就可见到，其成员大多数是在体育组织中。改良主义者几乎根本不把青年工人计算进去。

我们在德国看到的情况略有不同。问题在于德国的青年政治上比较成熟。德国资产阶级体育组织起着巨大的作用。此外，我们在德国的强大对手是改良主义青年组织。在德国的工人体育组织中，20岁以下的青年工人不少于32.5万人。工会中20岁以下的青年工人将近25万人。可见，在德国，参加阶级组织的青年群众数量是相当庞大的，超过了55万人（参加体育组织和工会者），而这些青年是可以置于我们的直接影响之下的。但是，更大量的青年参加了资产阶级组织，而且体育组织也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根据我们的计算，约有190万20岁以下的青年工人参加了各种资产阶级组织。

我列举上述几个数字，目的是想说明当前青年工人的组织状况，指出我们面临的那些任务。

但是，说青年工人现在政治上的组织程度还不如战前，那是

错误的。战前，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成员数勉强达到 9 万人，尽管当时只有一个国际，而不是现在这样有两个国际。现在有了两个国际，两个国际都算是工人组织，不过一个是光明正大的开展活动，另一个是采取欺骗的手段。两个国际（不包括苏联在内）拥有 30 万青年工人。当然，我们不能认为这种状况已经令人满意了。

青年共产国际存在弱点的原因何在呢？我指的是主观上的原因，指我们可以克服的那些错误和缺点。首先，青年共产国际的活动不完全适应青年人的需要。我们不是想以此说明，共产主义青年不应当研究政治问题，或者应当使自己的政治活动有所限制。我指的是，我们在各方面的工作方法还不太适应青年人的心理，我们的方法还过多地类似一个青年党的工作方法。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是有我们运动发展历史上的原因的，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是产生在还不存在共产主义政党的年代里。但是，不言而喻，我们又必须在各方面适应青年人的需要。

在适应青年需要的生动活泼的“新”方法与政治性活动之间，不应当存在矛盾。关键在于要采取朴实的、更便于青年理解并接受的方法去开展政治活动。

我们存在缺陷的第二个原因是，没有充分地利用辅助性青年组织，如“青年突击队”、自由主义者同盟等等。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有许多辅助性组织为其作后盾，他们把这些组织看作是使濒于灭亡的青年运动复苏的源泉。我们也应当学会在这方面积极开展工作。过去我们曾在这方面犯过很大错误。但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我们采取了争取辅助性组织的坚定方针。

第三个原因是成员流动性大，也就是说，在大批新的成员加入我们组织的同时，也有许多人脱离组织。此外，我们各共青团

的工作不甚适应青年的需要。流动性大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组织在内部组织工作上存在着弱点，干部缺乏良好的训练。正因为我们组织的成员流动性很大，所以我们需要富有经验的专职干部。

鉴于上述种种考虑，我们认为，即将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应当在我们共青团的工作方面实行相应的转变。

这种转变究竟应当包括那些内容呢？

这种必要的变化应当包括：使我们共青团的一般工作方法更多地适应青年特点；经常不断地开展工作以争取群众，争取辅助性组织；克服业已出现的成员流动过大和我们组织工作上的弱点。但是，基本的任务当然是使我们的一切工作方法更适应青年的需要。

为了实现上述转变，我们已经辛辛苦苦地工作了好几年了。例如，从1926年起我们就开展了强有力的工作，在我们共青团内部生活中推行新的更有效的工作方法，采用更为生动活泼的方法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德国的共青团在这方面取得较大的成绩。大多数共青团组织依然模仿党的工作方法，所以内部生活一直十分单调。几次代表大会都曾通过决议，要求成立辅助性青年组织，首先是青年职业组织和青年委员会。我们对体育问题也越来越重视。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即将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除了听取有关青年共产国际的基本工作报告，讨论纲领问题（而且这两点也都是在进行必要的转变的前提下提出的）以及殖民地问题以外，还将提出有关宣传鼓动和体育的问题以及关于实行新的工作方法的问题。

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草案和我们提交第五次代表大会

的纲领，都强调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发挥列宁曾经指出过的那种极其重要的作用，即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成为群众性的共产主义学校。所以，我们应当贯彻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个学校应当是以列宁的战斗精神进行教育的学校。列宁说过，不能把青年工人的共产主义教育同对剥削者进行有效的斗争分割开来，斗争是这种教育的基本内容。我们的不幸就在于，我们还不善于把我们纲领提出的原则指示真正贯彻到实践中去，原因要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发展中去寻找，因为共青团过去起的是先锋队组织的作用。我们现在要根据我们的纲领更认真地在我们的方法上，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些转变。我指的绝不是进行原则的改变，但是，必须使我们的世界代表大会坚定地强调实现工作中这种转折的必要性。

这种转折究竟内容如何呢？正如布哈林同志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某些同志根据青年运动的一般状况提出了建议，但这些建议是我们应当坚决摒弃的，因为他们想象中的转折也包括在原则问题上的转折，而那种转折将把我们推向社会民主党对青年运动的观点上去。他们建议我们限制共青团的政治色彩和政治活动。我们对此表示拒绝，因为我们面临的任务不是在这方面。当然，我们在开展政治活动时应当采取适合青年需要的方法，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工作同青年因一般政治问题而产生的真正的、具体的利益结合起来，但是，我们组织活动的主要内容和过去一样，应当是开展政治斗争。

还有人给我们提出另一种建议，他们的理由是，我们的组织不是原地踏步，就是发展十分缓慢。以此为根据，他们断言，像这样的共青团不可能变成群众性的组织。讲这种话的人实际上想

讲的意思是，工人青年的共产主义政治组织不可能成为群众性组织。这些人对我们说，我们不该努力使我们的共青团变为群众性组织，而应当建立一个广泛的半共产主义的、无党派的青年工人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则在这个组织中团结青年工人中的优秀分子，起一种内部派别的作用。我们同样拒绝了这种建议，因为它是悲观估计形势和惊慌失措的产物。我们之所以否定这种建议，是因为这种意见的主要之点是认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最近几年进展不大，不大可能变为群众性的组织。我们认为，共青团能够并且应当成为群众性组织。我们清楚地知道而且现在还想再次强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当然也需要建立类似的辅助性组织。我们决不认为，共青团应当一花独放。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的同志既要在独立存在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工作，又要在辅助性组织中开展活动，为共青团从中招募成员，以便通过这种途径使共青团也变为群众性的组织。但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继续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斗组织，成为教育共青团员的组织，并以这种姿态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

当有人对我们讲，应当对自己的政治积极性有所限制的时候，对于我们青年国际来说，重要的是不仅要确定，我们的积极性是否适应青年们的利益，还要弄清，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如果发现青年共产国际的政治积极性到目前为止果真不符合正确的路线，那么，希望限制共青团政治工作的想法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了。

我们认为，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政治积极性未能经常地与青年的特殊问题充分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应当予以纠正的错误。但是，我们认为，青年共产国际各支部和整个青年共产国际的政治

路线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这是又一个证明，说明共青团应当保持自己的政治性质。

以共产国际最近时期产生的政治问题，如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为例。有一点是毫无争论的，即在共青团组织内部，反对派是微不足道的。有的地方出现过这种反对派，也被迅速地清除了，而且共青团还帮助党本身去清除了反对派。例如，比利时和法国，那里的共青团在克服托洛茨基危险和加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个重要政治问题涉及我们对待社会民主党采取的新的策略路线问题，即首先在法国和英国采用的策略问题。在我们党内，这条新的路线曾遇到激烈的抵制，又是共青团组织和青年共产国际表现了最大的毅力去实现这条路线，并以此给有关的党，给共产国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法国共产党中，共产主义青年团无论是在提出和实际解决自我批评问题方面，还是在纠正错误方面，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法国党最近进行的辩论中，共青团采取了比较正确的立场，同极“左”错误进行了斗争，同时又认为，主要危险仍然是右的倾向。我们的法国同志承认，共青团在这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共青团在英国党实行新的策略时期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活动，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看到，希腊的共青团也积极参加了本国进行的斗争，共青团组织反对了极“左”和右倾倾向。

奥地利的情况相当严重，原因是七月事件以后，社会民主党虽然遭到失败，但共产党不仅没有巩固下来，而且变得更弱了，因为它犯了各种各样十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总之，它与社会民

主党的区别实在太小了。7月15日以后，共青团与共产党之间立即在一系列口号是否正确的问题上，如警察归市管辖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现在，奥地利党的大多数人在为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反对右倾倾向而斗争，共青团也坚定地支持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在德国的共青团员中，我们也较少看到“左”的倾向，更少看到右的倾向。右派集团多次企图渗透到共青团中去，但至今毫无所获。

波兰是存在着派别斗争的，因此，不能说共青团的工作没有错误。争论的双方都犯有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意见：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建立一个统一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以结束这种耻辱的局面。布哈林同志已经提到，波兰党在华沙有两个中央委员会，我还想告诉大家一件闻所未闻的事实，一个所谓的党的书记处竟然蛮横地解散了共青团中央并指定另一批人组成了共青团中央。由此可见，这个集团采取了何等严重的分裂步骤。我们应当在这里，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上，以最最坚决的态度表示对这种行为的抗议。这种方法是完全不适合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机关的，我们要求得到迅速的援助并惩办肇事者。（鼓掌。）

至于捷克党，那儿的共青团组织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政治积极性。过去，我们的共青团曾犯了过多参与对党的政策问题研究的错误。我们对这种活动进行了限制，结果，共青团又走向另一面，犯了很少去过问党的政策问题的错误。尽管在“红色节”之后捷克共青团表示过抗议，但据了解，它事先并未进行充分的努力，以避免“红色节”的错误，而“红色节”的错误只是捷克斯洛伐克

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中的一个错误。“红色节”以彻底的失败，以捷克党和整个捷克无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与其在消极被动中挨打，不如在战斗中流血牺牲。

但是，总的说来，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和活动是正确的。我们当然不能掩盖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可是，一般来说，我们没有多少根据认为，对共青团的政治性质应当作出限制。

所有这些想法我只是顺便谈谈，为的是强调一下在实行转变中不应当出现的事情。我们最需要改变的是工作方法，以便更适应青年的需要。我们同意，必须在实现我们的原则的基础上去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和策略。我们将在我们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作出这种改变。我们将采取措施，使我们共青团的内部生活、吸收成员的工作方式、宣传鼓动方法、教育和文化工作，以及政治活动适应青年们的需要。我们应当争取广大青年工人群众，吸引他们参加到青年共产国际的队伍中来，为共产国际培养接班人。我们应当在各种体育组织和职工组织开展更强有力的工作，更好地利用辅助性青年组织。我们应当在实际行动中把共青团变为教育青年工人的共产主义学校。

你们不要低估那些能说明青年共产国际发展情况的事实。在青年共产国际活动的第一阶段——1919年至1921年期间——它曾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为共产国际发展成员和实现与社会民主党的决裂。这是青年共产国际当时要完成的任务。1921年，青年共产国际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路线，决定由先锋队变为群众性组织，从“青年党”变为青年组织。这一因素至今仍对共青团的工作性质有着一定的影响。不应忘记，青

年共产国际一旦确定了转变为群众性青年组织的方针，那就是说，它将建立在新的、迄今为止所不熟悉的基础之上。须知，共青团既不能同战前的，也不能同今天的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相比。当青年共产国际决定采取建立共产主义青年群众组织的新方针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里还从未有过这样的组织。这是一个新事物。青年共产国际在集中力量实现这一目标时犯了一些错误，这是很自然的事，这种错误和脱离正确路线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要知道，我们是在无榜样可循的情况下，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逐步建立新型的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错误。从理论上讲，我们已经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我们还要在实践中纠正它。从1921年以来我们一直沿着建立群众组织的道路在前进。我们能达到今天这样的发展水平，是学习了许多东西的。不过，我们现在终于建立起了这种共产主义青年团所应有的正确模型，树立了一种适应我们时代要求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可靠的范例。我们建立了一个群众基础极为广泛的工人青年组织，这个组织的形式适合青年的特点，它概括了青年工人斗争和生活的所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引导工人青年投入阶级搏斗，把政治斗争作为教育群众的基础，而这个组织本身又是青年工人的共产主义学校，是我们党的后备军。共青团是一个适应青年利益的政治、战斗和教育组织。这是共产主义的群众性组织。

依靠共产国际的帮助，我们已经走过了前一段困难的道路，我们深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我们现在也一定能够对我们的工作方法作出必要的改进。我们正处于必须严肃批评自己的工作方法并作出改进（当然是在我们的原则性纲领的基础上）的时刻。我们一定能实现这些改变。

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我们将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之下加紧动员群众。青年共产国际整个前阶段的发展趋向就是建立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希望，共产国际今后也能把青年共产国际当成它的一个最优秀、最勇敢和最忠贞不渝的支部！（热烈鼓掌。）

会议休会。

第四次会议

(1928年7月19日)

主 席：加兰迪

致 贺 词

别尔乌辛同志代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向第六次代表大会祝贺。别尔乌辛同志提到苏联劳动群众一贯关注共产国际的活动，并指出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对于世界革命运动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随后宣读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祝词：

“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致最热烈的敬礼！”

谨代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及其所有分会向在红色莫斯科召开的、旨在使共产国际无数支部作好战斗准备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世界革命的参谋部致以热烈的祝贺。现在又一个使全世界感到不安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这就是殖民地问题。我们毫不怀疑，当我们的同志为了今后能彻底战胜那一伙残暴屠杀工人阶级和绝大部分农民群众的刽子手而被派来此地工作，因此资本家的走狗们将咬牙切齿地对他们恶意诽谤的时候，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必将紧张地注视着云集此地的代表们的工作情况。

我们知道，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正日益成为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相信，作为这支力量的战斗司令部的共产国际，将鼓舞和组织起千百万无产者和农民，建立战斗队，把帝国主义压迫者及其所有支持者统统从地球上消灭掉。”

勒麦列同志宣读德国发来的两份贺电：

1. 我们这一群从德意志共和国服苦役的监狱中释放出来而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厦集会的政治犯们，向世界革命总部致以最热烈的敬礼。弗里茨·艾伯特和兴登堡强加的苦役对我们来说是一所高级革命学校。我们希望，代表大会的工作将导致最快地推翻资本主义各国的资产阶级统治。

松讷贝格、戈尔诺、勃兰登堡
和普列采内的一群政治犯

2. 为欢迎获释政治犯而召开三个群众大会的汉堡数千名革命工人，谨向世界无产阶级的红色总部祝贺。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为了保卫苏联免遭帝国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阴谋破坏，请锻铸出新的武器！我们宣誓将在久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考验的红旗下进行斗争并夺取胜利。

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报告人：斯图契卡）

我的发言很短。委员会的书面报告已经散发，内容非常详尽，因此没有必要再作什么补充。我只作一点小的更正。问题是工作报告中有一处刊误：上面排印的白俄罗斯案件是 29 宗，这当然是荒谬的，实际上白俄罗斯案件只有 2 宗，那个 9 字是指波兰和白

俄罗斯案件加在一起的总数。

现在谈几句关于国际监察委员会的作用和今后的活动。国际监察委员会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选举首次产生的。当时还没有任何人想象得到它将来的意义，因此在叙述它的任务时有些含糊，不够明确。一方面对任务作了限制，同时另一方面又规定得过宽。当时决定，委员会的任务应当是：（1）审查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各部门的行动所提出的申诉；（2）审理个别党员或整个组织因被开除出党而提出的申诉，并且规定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只是建议性的，而决定应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3）检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财政状况和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检查某些党的财政状况。

委员会在头几次会议上便已确信，第2条提出的任务是委员会所力不胜任的，因为要审理关于被开除出党的所有申诉，意味着要研究成千上万份抗议，特别是来自联共（布）党内的抗议。因此委员会自己对本身的职能作了限制，决定只审查具有政治背景的案件，也就是关于某些同志或整个组织由于政治分歧而受到纪律处分的案件。但是在监察委员会以后的活动中还增加了一些由共产国际书记处和执委会转交监察委员会处理的被误为普通纪律处分的案件。在财政检查活动方面，委员会曾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财政状况进行了检查，然而对国际各支部的财政状况则无法进行检查，因为委员会的17名委员，很难凑在一起，几乎从来没有在同一时间留在莫斯科，因而不可能同时出席会议。委员会的决定本应是协商性的，但久而久之逐渐具有了决定性质。诚然，这些决定需要共产国际执委会或书记处的批准，不过这正是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实践中逐步确定下来的那种办法，我觉

得，这种办法将来也仍然应当保持下去。如果国际监察委员会确是需要的话（我觉得，从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在今后也是必需的），那就应当使国际监察委员会具备能够真正积极工作的条件。要规定一种办法，使委员会有一定数量的委员经常留在莫斯科，或至少每隔一段时间到这里来一次。同时必须在章程中更明确地规定国际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范围。为此我们建议，由代表大会任命的章程起草委员会也将讨论关于国际监察委员会章程的问题，我们将把有关的建议提交该委员会。

我们需要审理的大部分案件都是党内出现各种反对派时期的问题。大家知道，在德国出现第一个右翼反对派时期，过多地采取了开除出党的办法。许多工人老党员被开除了，问题是，似乎除了开除以外就没有任何其他措施可以采取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工人并没有与党脱离关系，国际监察委员会认为，必须尽一切力量使这些工人恢复党籍。委员会认为，还可采用其他方法来纠正某些党员的错误。我们严格遵循这条路线，实践证明我们是对的。那些我们退还给德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重新审议的关于被德共开除出党的几个小组的案件，以后得到了顺利的解决。上述小组后来证明，它们都是由忠实可靠的同志组成的。由此可见，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至于第二个反对派，即极左分子，我们同样审理了相当多的与之有关的案件，例如路特-费舍-马斯洛夫案件。从委员会工作角度来看，这些案件中以马斯洛夫一案最耐人寻思。对这些案件的分析证明，国外的青年党员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十分明确的思想，即一个共产党员在法庭上应当怎样表现自己，在其他官方机构面前应当怎样掌握自己的言行。我们必须坚决地、直率地说，马

斯洛夫在他受审期间的行为是错误的，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行为。因此国际监察委员会曾经要求执委会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一个总的建议：制订共产党人在法庭受审时基本上符合联共革命传统的行为准则。经过执委会批准的这项决定对各国共产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委员会今后还会审理类似的案件，但现在毕竟可以认为这个问题多少已经解决了。

国际监察委员会审理过一系列涉及到国外侨民的案件。大家知道，侨居国外好似一种痼疾；一旦侨居国外，党内分歧往往加剧到在实际工作情况下决不会有的程度；并且分歧会带有个人色彩，有时表现为毫无意义的诽谤形式。甚至出现过由此而发展成暗杀事件，芬兰共产党内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大家知道，这个案件当时是以法院审理而告终的。最近以来被提交到国际监察委员会的国外侨民的分歧问题又出现了，但数量不太多，可以称之为旧时的回声。但是也出现过委员会不得不将肆意进行诽谤的同志撤离负责岗位的情况。正如我已指出过的那样，一些最典型的事件已在工作报告中引用；其他详细情况则不宜公布，以免扩散，因此我不准备谈这些情况了。我之所以提到这些细节，只是为了向代表大会证明，国际监察委员会有时必须审理一些需要成立特别委员会来进行讨论的真正重大案件。不过，应当说执委会还保持着一种旧的传统：正如在国际监察委员会建立前经常成立专门委员会一样，现在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机构，但在某些情况下仍然组织专门委员会，而且国际监察委员会的成员不是规定必须参加的人员。我觉得，如果国际监察委员会的继续存在被承认是必要的，并且确保它的所有人员正确审查和迅速处理其职权范围内的案件，那么上述委员会将是多余的。我认为这种委员会不过是

一种正在逐渐消亡的传统。

还应指出，章程中有一条规定：国际监察委员会不审理有关政治分歧的案件。这是正确的，因为在共产国际内不应有重叠现象，只能有一个权力机关，领导政治方面工作的应当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因此我们建议，上述条款今后也保留在国际监察委员会的章程中。

国际监察委员会的另一方面活动是审计工作。共产国际没有设立专门的审计委员会，成立这种与国际监察委员会并行的委员会是没有意义的。依我看，监察委员会应当履行审计委员会的职能。我们解决这项任务的方法是，从我们的成员中选举产生了一个常设的审计委员会，但它没有设立自己的机构。并且我们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甚至没有设担负一定具体工作的秘书。我们请求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帮助，给我们派来了一位党员会计，才使我们摆脱了困境。但是，我认为这种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某些党的财务结算和财政报表应当受到检查，而且确实经过了国际监察委员会的检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现金出纳报表和财政业务，按照章程同样由我们进行了审查。我们认为这方面的活动是正确的，赞同这些活动，当然也提了几点意见，这些意见在某些场合下对工作起了良好的影响。大家知道，秘密的革命政党对财会工作有些马虎。这种状况当然应当改变。秘密革命政党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同样应当毫无误差，甚至应比一般公开政党的财会工作做得更加清楚，更加准确。

我们曾经从总的方面，原则方面对某些党的活动提出了一些意见；我们指出这些党内存在着把所有财政资金拨给中央机关而多少有些忽视党的地方机关的倾向。这特别表现在以下方面：按

照预算委员会的分配，上缴党的中央金库的收入至少有20%应当用于地方需要，审计委员会查明，这一点没有得到贯彻。但是我已经说过，监察委员会去年的审计活动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如果国际监察委员会今后仍然存在，那就应当使它有可能更好地担负这项工作。总的来说，必须使监察委员会在工作上起到比目前更大的作用。

总之，我的建议就是把关于国际监察委员会的权限问题交给章程起草委员会讨论，并向它提出我们的意见。我们总共审理了200多宗案件，但绝大部分案件纯粹是徒有其名。这都是一些因被某个国际支部拒绝介绍他们参加联共（布）的同志提出的申诉，因为大家知道，外国党的成员得不到这种介绍信是不可能转到联共（布）党内的；他们或者不得不按照一般手续参加联共（布），并经过预备期，或者根本入不了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乎一直认为，不应强迫某个国际支部发给介绍信，因为该党中央机关自己知道应该介绍谁。譬如说，如果有谁退出了党，跑到苏联，那么不言而喻，应当考虑到，这个党必然不会把它认为是逃兵的人介绍出去的。联共同样会持有这种观点，它在某些情况下根据总的原则，即必须经过预备期才接受入党，也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的，不过，如果某个支部中央机关采取这种行动是基于政治分歧，同时其行动又是错误的，那么情况又另当别论。我已经说过，如果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不发介绍信，那我们就认为，国际监察委员会有权审理这个案件。我们对章程提出一项修改意见，即国际监察委员会有权自行决定或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建议审查关于评价国际所属支部某些成员的共产党员作用和活动的案件，也就是涉及到某个同志的所谓党员的精神面貌

问题。我们曾受理过这类极其错综复杂的案件。例如出现过党员的职责与纯粹家庭个人问题发生冲突的事例。有些党遇上了五花八门的问题，以致经常要考虑出现这类问题的可能性。不用说，最简单不过的是设立特别机构审理这种问题，而不是由那个在这类情况下应当进行自我谴责的党的中央机关去处理。如果某个支部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既未接见，又未听取某个同志的意见就把他开除出党，那么，我们总是根据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实践，把这类案件转交该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重新审议。

以上就是需要简短说明的关于国际监察委员会的情况。（鼓掌。）

斯图契卡同志报告以后，随即进行了纲领起草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秘书处的选举。

选举纲领起草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大会秘书处

纲领起草委员会

联共（布）——布哈林，斯大林，李可夫，莫洛托夫，曼努伊尔斯基，斯克雷普尼克，奥新斯基；德国共产党——登格尔，施赖特尔；意大利共产党——艾尔科利，塞拉；波兰共产党——布兰特，连斯基；法国共产党——多列士，塞马尔；英国共产党——阿诺特，贝内特；美国共产党——温斯顿，坎农；爱尔兰共产党——卡尼；中国共产党——斯特拉霍夫，李光，张彪^①；青年

^① 斯特拉霍夫是瞿秋白的化名，张彪是张国焘的化名。——译者注

共产国际——许勒，希塔罗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霍拉奇，雷曼；南斯拉夫共产党——利丁；日本共产党——片山潜，加藤；奥地利共产党——科普林尼格；匈牙利共产党——克麦尼；瑞士共产党——克雷布斯；瑞典共产党——弗利格；挪威共产党——格曼森；爱沙尼亚共产党——安韦耳特；保加利亚共产党——科拉罗夫；芬兰共产党——曼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萨明；墨西哥共产党——卡里略；拉脱维亚共产党——斯图契卡；立陶宛共产党——安加雷蒂斯；丹麦共产党——特格森；荷兰共产党——阿·德弗里斯；波斯共产党——苏尔坦-扎德；乌拉圭共产党——塞莱；巴西共产党——拉塞尔达；哥伦比亚共产党——卡德纳斯；厄瓜多尔共产党——帕雷德斯；比利时共产党——克南；加拿大共产党——斯佩克特；罗马尼亚共产党——彼得鲁列斯库；希腊共产党——西弗内奥斯；南非共产党——贝津；土耳其共产党——法赫里；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共产党——海德尔；印度共产党——拉贾。

此外，以个人身分参加的有：库西宁，克拉拉·蔡特金，瓦尔加，安贝尔-德罗同志。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委员：阿诺特，贝内特，贝尔纳，伯恩哈德，塞洛尔，安多尔，劳拉蒂，加兰迪，格热戈斯克夫斯基，格林鲍姆，加肯，琼斯顿，曼纳，明希-彼得松，奥皮茨，奥西波夫，皮亚特尼茨基，勒麦列，塞莱，萨尔蒂斯，什麦拉里，陈昌，陈璜^①，瓦西里也夫和魏因赖

^① 陈昌、陈璜两人均系音译。一译者注

希。秘书——阿布拉莫夫。

秘 书 处

秘书：巴比，安多尔，艾尔科利，戈尔基奇，米科洛斯，罗特施坦，施内勒尔和什麦拉里。

会议休会。

第五次会议

(1928年7月20日)

主席：贝尔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

明岑贝尔格：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坚决要求各国共产党进行群众鼓动，并在辅助组织和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和第八次扩大全会更加强有力地坚持这一点。已经就这一内容听取了专题报告，召开了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详细的提纲和决议。遗憾的是，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没有很好地执行这些指示，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不大。诚然，辅助组织和群众组织中的工作，现在要比1924、1923年和更早时期组织得好多了。但是，如果与这方面本应做到的瓦解敌人工作的要求相比，那我们的成果就太微不足道了。某些国家共产党对待群众鼓动问题过份谨慎小心。有一些党的领导机关不知为什么认为，为进行群众鼓动工作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机会主义和右倾。甚至还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把在群众组织中进行的工作本身也看作是一种半孟什维克倾向，或至少是低级工作。

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目前情况下更是如此。布哈林同志

在报告中指出，鉴于总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过程，必须使我们与社会民主党的右派或“左”派的斗争更加深入和加强。要知道“左”派集团不仅使社会民主党右派容易玩弄其伎俩，不仅掩饰了右派的真实意图，而且在某些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对我们的恶毒攻击甚至超过了右派。我只要提一下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谓的“左”派对待苏联的立场就够了：这个立场大概比整个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还要凶狠。因此我们应当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无情的斗争。然而，尽管如此，或确切地说，正因为我们在进行这场斗争，我们就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非党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工人，即使不是直接吸收他们参加共产党，那也要吸收他们参加在他们与共产党之间起桥梁作用的辅助组织。我们向社会民主党进攻的基本原则是，努力促使社会民主党工人加速退出该党及其领导机关。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越激烈，就越要坚决有力地设法使社会民主党工人背离该党的领导集团和争取工人站到我们方面来。

进行群众鼓动和在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问题，其本身与“机会主义政策”或“右”倾毫无共同之处。我知道有一些党的中央委员会非常积极地在辅助组织和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同时还执行着一条非常明确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我也了解有些集团在提到这项工作时只是一笑了之。在这同时，机会主义分子却胡作非为，其恶劣程度超过近年来所发生的一切类似行为。

群众组织和群众鼓动的任务早就由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后几次扩大全会详细地进行了阐述。因此我认为具体讨论这些问题是多余的，只需提一下最重要的六点。

我们对群众鼓动、对辅助组织和群众组织究竟寄予什么期

望呢？

我们依靠这些组织的帮助要达到的目的是：

1. 我们要使那些袖手旁观、从不参加任何政治生活、还没有投身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对共产党的宣传漠不关心的千百万工人群众激发起对无产阶级经济斗争或文化斗争的兴趣。

2. 我们的辅助组织应当成为我们与那些虽然还没有勇气跨出最后一步并参加共产党，但同情共产主义运动并准备同我们齐步前进的工人之间的桥梁，而不管他们是无党派的，社会民主党的，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政党的（例如德国的中央党）。

3. 我们要在群众组织的帮助下努力扩大共产党的影响范围。

4. 我们要努力把同情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各个阶层吸收到组织中来。

出席过以往几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同志大概会记得关于共产主义宣传小组发展为群众性革命政党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占了中心地位。近年来的经验证明，不管我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作出多大的努力，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成为事实以前，千百万工人仍然会留在各国共产党的组织范围之外。虽然如此，我们仍应加倍努力地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应当找到新的方法并竭尽全力使无产阶级中尽可能大的、起决定作用的一部分从组织上稳定在各国共产党之内。

但是，我们所努力进行的这些工作遇到很多困难，一方面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工人害怕加入组织后承担共产党员义务而顾虑重重，另一方面是由于警察和法西斯分子采取的措施所造成的。在许多国家中，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波兰等等，我们共产党的活动是不合法的。随着战争的临近，警察和法西斯加强

迫害的危险日益增长，这妨碍我们征收党员和从组织上巩固党。

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和组织上加强我们共产党外，还必须把群众团结在庞大群众组织中的原因，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定能吸引这些群众参加夺取政权的最后决斗。群众组织的任务就在于此。

5. 我们应当建立这些组织，使它们对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党的进攻给予反击。

6. 辅助组织和群众组织应当成为给我们党的队伍补充新的成员和经过初步锻炼的积极分子的源泉。

所有上述任务对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着手这项工作时，我们应当很好地了解工作的规模。关于群众组织谈论过多，并且依我看来，有些轻率。老实说，我们至今还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群众组织。

无论是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无论是国际工人救济会（这些虽然都不是共产主义的组织，但都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还是其他这类组织，都不是群众性组织。我们知道有些群众组织已经存在了数十年之久。这就是工会、合作社、政府官员联合会、房客联合会、自由主义者协会，等等。但是，这些组织是敌人掌握的，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敌人控制的。我们所掌握的只是一些我们在战后建立的小组织，即尚未拥有大量群众的组织，这只能算是较大的群众组织的萌芽。

由此可见，我们的策略应当是：夺取仍被社会民主党统治的老的群众组织；扩大和加强我们所建立的和由我们领导的所谓辅助组织，并使它们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组织。

某些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内的集团提出了不仅是政治性的，

而且是组织性的理由来反对这项工作，他们说，我们的人不够，如果我们要建立辅助组织，那党的力量就更弱了。此外，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论调：我们不可能以建立一系列重叠的组织来显示自己的阔绰。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已经指出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建立尽可能多的枢纽，但是这还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在于建立这样的组织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要知道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同样在建立辅助组织。库西宁同志在向最近一次全会所作的关于群众组织的报告中说道，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周围建立一种由辅助组织组成的星系；然而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党建立了两三个以上的这类组织。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却在自已周围建立了大概 50 个辅助组织。我建议不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的同志们熟悉一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报告，那样他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对手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不仅利用工会，而且利用几十个其他组织和联合团体来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毒害工人阶级和诱导他们反对共产主义的。维也纳的鲍威尔集团走得这样远（当然，我们不打算在这方面仿效他），竟然组织了养兔者民主联合会，甚至还组织了室内花卉无产阶级之友联合会。自然，我决不想鼓动我们也成立类似的组织来与之对抗。但是，我们应当建立真正有助于把非党的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吸引到我们这一边来的组织。

另一个例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基尔代表大会上把关于辅助组织的问题作为一项特别议题提了出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比较成功地对我们进行了广泛的进攻；它在竞争中迫使我们不断后退；一周前，它在法兰克福自由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把我们排斥出去；一年前，它夺取了“无线电之友”俱乐部。可见敌人没有打瞌睡，它在自已党的周围建立起数百个据点。

各国共产党的责任和任务不是袖手旁观，而是阻挡住敌人在这一段战线上的进攻，并转入反攻。应当在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逐步排除社会民主党的势力，扩大我们自己的影响。第二，应当建立辅助组织，并把它们变成为群众性组织。第三，必须巧妙地利用有利形势以便超过敌人。

反对进行群众鼓动的人还提出了另一个论点，他们说，发展群众组织会减弱我们党的力量。所有的经验都驳斥了这种说法。在那些共产党的组织比较强的国家，辅助性组织都得到令人满意的发展。自从路特·费舍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垮台以后，取代它而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大力支持了建立辅助组织和群众组织的一切尝试。由于这样做的结果，在最近的德国国会选举中，以及在各次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游行中，共产党才能够利用真正实际的力量，如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和其他组织。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说情况多少有些相似。那些认为不应建立与党并行的辅助组织的党内集团，所持的是落后的宗派主义观点。

第三点理由是强调工作人员不够。实际上我们只要有一些能用来阻碍敌人占有这些组织和保证我们在其中发挥应有影响的工作人员就行了。在辅助组织中进行工作的并非必须是党员，也可以从未加入组织的工人的庞大后备力量中吸收工作人员来担任这项工作。

我们在确定这项工作的策略时，要经常记住，同我们有工作交往的一些联合组织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它们的成员除了共产党员工人外，还有非党工人。

昨天，布哈林在他的报告中对有些党内那种扼杀地方小组和党员主动性的官僚主义的日益泛滥表示愤懑。当然，这是可恶的

和有害的现象。但是，压制群众组织的健康的主动精神也同样是恶劣而有害的。

在支持共产国际的主要组织中有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和刚刚在德国开展了一场非常成功的大赦运动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这场保卫萨柯与樊塞蒂的运动表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是有力量的。国际工人救济会是一个极其庞大的非党组织。在哈勒、德国中部、萨克森举行罢工时，我们看到，在工人与改良主义的工会领袖之间发生分歧时，这样的组织可能要承担多么巨大的任务。

布哈林同志和共产国际机关中的某些同志低估了反帝同盟的活动：不仅布鲁塞尔的示威游行是近年来规模最大、声势最大的反帝示威游行之一，而且反帝同盟在组织方面的首倡精神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布哈林同志对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表现出对尼加拉瓜的斗争给予关注一事表示遗憾。但是，为什么布哈林同志对墨西哥反帝同盟的工作只字不提？该同盟在墨西哥曾经发起了一场规模极大的群众运动。我不得不断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情报部和机关有时讲到身边并没有发生的事，但是没有注意到一些地方已经具体实现了的事。诚然，反帝同盟不是共产主义组织，但是，它是一个联合了工人团体和民族革命团体并值得我们给予支持的广泛性组织。

不久前，自己主动成立的苏联之友协会也具有巨大意义。我记得，1927年11月在这个大厅里曾经召开了苏联之友代表大会。目前，法国的苏联之友协会已拥有2万多会员，英国等国家又成立有这样的组织。这些协会的宗旨是给反战斗争以重大支持。

巨大的任务落在文化教育组织和电影组织的肩上。从现在陈列的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波将金号铁甲舰》这部电影有500万

工人看过。这个数字使我们认识到，电影是多么强大的思想教育手段，但我们尚未充分加以利用。

作为群众组织和辅助组织工作的补充，还必须进行党的书籍、杂志和报纸的传播工作。我认为，定期的机关报和书籍可以特别有助于群众鼓动工作普遍取得成功。

代表大会应当对这些问题给予最大的关注，以便在这方面取得比第五次代表大会更好的结果。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提出了群众鼓动任务，第六次代表大会应当找到解决这项任务的途径。

在战争危险日益临近的时候，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扩大了自己的群众组织。它们为深入到群众中去建立了各种新的渠道。我们必须在这条战线上也能对敌人进行反击。群众组织和这些组织的扩大对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群众鼓动是统一战线策略的实质部分。随着我们从1919年成立的共产主义宣传小组转变为真正的群众性革命政党，我们应当也建立我们的辅助组织，并使它们变成拥有千百万工人和同我们一起为夺取各国政权而斗争的群众性组织。

会议休会。

第六次会议

(1928年7月23日)

主席：卡尔顿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塞马尔（法国）：

法国代表团基本上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报告。但是，代表团发言的目的是进一步明确一些问题，改变某些提法，更清楚地阐明提纲中有关法国帝国主义的那一部分内容。

关于美国，法国代表团希望更加明确地阐述凯洛格方案的意义及其后果。布哈林同志正确地指出，美英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国际矛盾的焦点。依我们看来，必须强调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性的日益增强，因为美国帝国主义正在用和平假面具来掩盖其帝国主义政策的真面目，并为此目的主动提出了“宣布战争为非法”的方案。

确实，提纲草案所指出的完全正确：当美国帝国主义力图以烧杀手段迫使南美从属自己时，当它加强自己的殖民掠夺政策和争夺太平洋霸权时，当它把自己的军备扩张到极限，并且不隐瞒今后仍将继续扩军的意图时，——与此同时，美国帝国主义却又向各帝国主义国家提出凯洛格方案，邀请它们附和它的“和平意愿”。

即使工人阶级有足够的政治觉悟，即使我们共产党有可能揭露凯洛格方案的真正性质，这个方案仍然会在广大群众中散布和平主义幻想。其实，帝国主义分子的本性就是侈谈和平，准备战争。

关于美英关系的紧张程度，可以根据内务大臣希克斯不久前的一次讲话判断出来。作为对凯洛格方案的答复，他声明说：

“在我们与其他国家一起签署条约的数星期以后，我们将告诉美国：根据你们的建议，我们签署条约，但是我们同时很清楚，你们正在扩大自己的舰队。我们有权向美国和全世界声明，事实胜于雄辩。”

同志们，事实的确证明，扩张军备的不仅是美国，而且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每日纪事报》——英国自由党的一家报纸——就这一问题指出，英国用于军备的支出比法国和意大利多一倍，比日本多两倍。

事实说明，所有国家的海军装备程度都超过了自己的战前水平，为裁减军备问题而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一次次遭到了失败，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正在以最疯狂的速度进行武装。但这决不意味着法国帝国主义在这一军备竞赛中没有扮演角色，这一点也应在提纲中着重指出。

因此，我们建议对凯洛格方案进行简短的说明和批判，以此来补充提纲中谈到美国帝国主义而只是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披着和平主义外衣的地方。

但是，我们发言的目的主要是强调法国帝国主义的作用及其经济和军事实力。

当前法国帝国主义采取的是什么政策呢？帝国主义法国作为

殖民大国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就殖民地的面积来说，它占第二位。由于它在印度支那拥有领地，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战略角度来看，它在中国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在巴尔干半岛也是最主要的角色之一，与英国和意大利争夺首位。在地中海，它同样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力图称雄海上，与意大利和英国的利益不断发生冲突。最后，由于它给予苏俄边境国家特别是罗马尼亚的支持，它在帝国主义分子共同的反苏斗争中扮演了头号角色。

目前法国帝国主义的政策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呢？这是一种进行殖民扩张和加强战争机器的政策。

产生这种政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增长和销售受到极大限制这二者之间的不相适应：国内市场容量减少，而国外市场又由于受到外国竞争，一部分已经被关闭起来。法国帝国主义需要更廉价的原料和新的销售市场，由此产生了它的殖民扩张政策。此外，它还必须减少生产成本，由此产生了生产的合理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切后果：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日，实行流水作业，生活费用上涨，强化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等等。我不准备更详细地谈这种情况，法国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对此将作更全面的阐述。

我主要说明法国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所扮演的角色。法国帝国主义为了使自己能够牢固地站稳脚跟，为了使本国财政状况得到持久的稳定，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实行自己的生产合理化政策，它首先必须从自己的殖民地攫取收入；目前它的整个政策都是以加强对殖民领地的剥削为目的。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没收土地，加紧各种矿藏（铁、煤、钾盐等）的开采，利用这些殖民地例如摩洛哥的大瀑布，实现各个地区的电气化，修筑铁路，加强对当地居民的剥削，等等。

这项加强法国殖民实力的政策曾经是法国资本主义报刊讨论的对象。在这个问题上，所有政党——左派、右派和社会民主党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社会民主党对这项帝国主义政策非常卖力。我可以引证某位将军的话，他在“武装力量委员会”的机关报上就法属西非领地的开发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

“可以大胆地说，对我们法属西非这个最佳的‘热带农场’的开发，总有一天将成为保证法国繁荣昌盛的最可靠的因素之一。无需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它就能把我们从耗费百亿元用于进口商品，特别是美国商品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并在已经发了财的当地居民中为我们提供一个非常有钱可赚的市场。”

同志们，这就是所有报刊以及工业界、金融界的共同意见。还可以肯定，对殖民地加强剥削不仅是为了取得新的原料和新的销售市场，它的另一个目的是加强军事组织，用有色人种部队来加强宗主国的军队。法国帝国主义显示出它依靠殖民地军队来保卫殖民地和利用土著部队并唆使他们互相残杀来进行殖民扩张的意图。这种政策的例子在摩洛哥战争中已经有过，在那次战争中，忠顺的里夫人被用来镇压起义的里夫部落。

在法国进行军事改组前展开的讨论中提出了将来用殖民地军队在欧洲人的统率下来独立保卫殖民地的主张。因此建议组建一支庞大的殖民地军队，在发生帝国主义战争时可以把它调到本土作战，而在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国内斗争时又可以同样顺利地用它来镇压工人阶级。帝国主义分子非常清楚，派殖民地军队去镇压罢工工人，要比调遣穿上士兵服装的欧洲工人更加容易。

让我再一次引证在“武装力量委员会”的机关报上发表讲话的那位将军的意见。他说：

“我们一时一刻都不应忘记我们的国防要求。

难道我们不知道，到 1935 年将会出现我们军队人数减少的情况，以及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将必须求助于我们的黑人部队吗？这支黑人部队正在加紧组建，但是它缺少能够保证它有效使用的主要运输工具，我指的是横贯撒哈拉沙漠的铁路。难道我们不知道，即使是为了保卫非洲本身，也必须具有把军队迅速派往战区的能力。”

法国帝国主义研究如何在西非和北非之间建立交通联络的方法已经有若干年了。这不仅是为了建立这两块殖民地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是要用非洲内部的力量来同时保卫西非和北非。横穿撒哈拉沙漠的铁路可以把西非军队调到北非，发生世界大战时，还可以再经过地中海把他们调往法国。由此可见，修筑穿过撒哈拉沙漠的铁路无论从法国帝国主义的经济的发展，还是从军事发展来看，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便是法国人同居住在阿特拉斯南部和塔菲拉勒的部族不断发生战争的原因之一：法国帝国主义竭力要征服这些妨碍它在摩洛哥的经济发展和实现其扩张政策的不听话的部族。它必须这样做才能把北非和西非联结起来，因为横贯撒哈拉沙漠的铁路必须经过塔菲拉勒和阿特拉斯，而这两个地区迄今尚未臣服。

同志们，十分清楚，这种对殖民地人民的严重剥削，引起了不能不使法国帝国主义感到惊恐不安的起义和战争。近年来，我们就发生过同里夫人的战争和同叙利亚的战争。我们那里还爆发过起义，例如印度支那的农民起义。

目前仍在继续进行着所谓平定摩洛哥的战争，也就是镇压不肯臣服的摩洛哥南方部族的战争。正如合理化政策加剧了法国国

内的阶级对抗一样，殖民地如此连绵不断的战争增加了法国帝国主义的困境，助长了反抗法国帝国主义的起义、革命运动和战争。

与此同时，这项殖民政策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法国和意大利为扩大各自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以及为争夺地中海霸权和占有墨索里尼正在觊觎的突尼斯和丹吉尔而进行的斗争。还可以指出法国帝国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在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的斗争，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斗争。德国已失去其殖民地，因此一面拼命进行经济扩张，一面努力谋求国际联盟让它托管殖民地。

但是，这种侵略性和挑衅性日益增强的帝国主义政策要求有强大的军备，确实，近年来我们就是法国帝国主义力量大大增强的见证人。首先是它的军队几乎全部进行了改组，建立了由新兵和预备役军人组成的常备军。同时加强了对青年的军事训练，组建了殖民地军队，在法国东部修筑了要塞，建立起强大的舰队。

不应不提到法国帝国主义最近的一次活动，即在勒阿弗尔的海上示威。所有报刊都认为这次大演习是法国帝国主义炫耀其强大的海军力量。同志们，显而易见，法国帝国主义需要有强大的舰队来保障自己海上交通线的安全，这支舰队对它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它正在积极备战，而这场战争的发生或者是由于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或者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反苏斗争。资本主义报刊对此说了些什么呢？《工业新闻》就勒阿弗尔的海军大演习一事写道：

“3年前，加斯顿·杜美格^①在布列斯特主持了一个同样性质

^① 法国总统（1924—1931年），曾推行军事扩张政策。——译者注

的阅兵仪式。所有专家一致认为，当时他检阅的舰队，兵力有限，其强大之处主要在于具有复兴的意志。3年来走完了一段不短的路程，因为昨天在勒阿弗尔，编队中有80艘舰船，其中半数以上是不久前才补充到舰队中的。”

《工业新闻》认为建立这支海军兵力是正确的，它写道：

“建立海军有其充分的理由，这不仅是为了保持国防安全，而且是由于必须保卫本土与辽阔的殖民地之间日益繁忙的交通线。”

法国帝国主义实行的殖民扩张政策迫使它惊人地扩大军备。

这项政策还导致对殖民地人民，以及对本土上反对这一政策的工人的残酷镇压。

在对内政策方面，这种残酷的镇压表现在向革命组织疯狂地进攻，逮捕革命者。法国帝国主义现在打算宣布我们党是非法的。

同志们，我还想指出社会民主党在这项帝国主义政策中扮演的角色。这项政策对工人阶级来说非常危险，因为它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合作下实施的。社会民主党人协助实行生产合理化，支持军队改组、殖民扩张和国际联盟推行的虚伪的和平政策。社会民主党人保罗·邦古在国际联盟内为加强军队的提案进行辩护，并在日内瓦反对苏联的和平提案。这个人同时扮演两个角色，说是国际联盟中的和平主义者，又是法国众议院内的军国主义者，因为他在众议院一贯支持总参谋部的提案。这对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在法国所扮演的角色来说是非常典型的。

法国社会民主党在殖民领地的开发问题上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和宝贵的援助。社会党对此说了些什么呢？在社会党的提纲中有这样一段话：

“社会党只希望能够对殖民地人民始终不渝地和日益强化地

实施法国的民主原则。”

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要用烧杀手段来实现殖民地化，而在殖民地人民被武力征服之后就将采用这项“民主”政策。

如果说社会党确也主张在殖民地“发展到较高阶段时”实行普选，那么它指的是赋予某些特殊重要人物以选举权，“使他们具有与法国公民代表相等的地位，帮助管理自己的国家”。

社会民主党把殖民地看作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与本国的其他地区毫无区别。社会党对殖民政策的态度表现在它投票赞成关于殖民地的预算拨款，以及在提出摩洛哥和叙利亚的殖民战争问题时给政府投信任票。世界劳联^①主张在殖民地实行生产合理化，按照它自己的说法，主张对“懒惰的”土著居民采取强迫劳动，理由是“工业世界不可能放弃对边远地区的开发”，这里所说的边远地区就是指殖民地。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明白了社会民主党的一贯政策，以及他们不仅为在本土，而且为在殖民地恢复和巩固法国帝国主义的事业所提供的协助。社会民主党人是法国帝国主义在法国国内外的最好的帮凶。保罗·邦古就曾经说过，波兰是文明的保卫者。它想要说的是，得到法国帝国主义支持的波兰应当反对苏联，最忠实地捍卫西方文明。

总之，为了使工人阶级了解真相和为了我们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提纲中加以采用，有必要强调法国帝国主义的作用、它对于保卫和平所造成的危险性和它参加对苏战争准备的事实。

我之所以坚持这一点，是因为工人阶级中有许多人对战争的

^① 即世界劳工联合会。——原编

危险性估计不足。我们党内，在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上，甚至在关于法国帝国主义作用的问题上，都同样存在着分歧。一些人说，帝国主义分子害怕发动战争，因为战争将成为革命的信号。另一些人则断言，帝国主义分子之间的矛盾太大了，以致不可能为了达到宣战目的而组成反苏统一阵线。

因此，我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低估战争的危险性；另一种是认为反苏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之间存在着太大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允许组成对苏作战的统一阵线。

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当矛盾激化，当武装到了极限，当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完成，当社会民主党在没有觉悟的工人群众中到处散布护国主义思想的时候，帝国主义分子是无力遏制战争的。

对苏联的多次攻击、挑衅、内部破坏，对苏联驻国外机构的袭击、所有帝国主义分子实行的经济封锁，——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帝国主义分子策划军事进攻的意向。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国家与苏俄之间的阶级矛盾将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退居次要地位。

由此可见，对苏战争的危险乃是最直接的危险，因此必须在提纲中明确指出法国帝国主义参与此事和它所起的头等重要的作用。

我还要再说几句，以便使你们了解我们在反战斗争中所做的一切。另一位法国代表将详细地谈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提一下这一点，以免有人说我们对此闭口不谈。

第一，我们进行了思想工作，目的是使无产阶级认清帝国主义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并且使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我们的党进行了这项工作，有必要使加入共产国际的所有的党都开

展这一活动。

我们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工作是很积极的，后面我们将更详细地向代表大会介绍我们党在这方面的经验。最近一年来，我们在预备役军人中进行了大量工作。我们在反对殖民战争和反对殖民化方面工作也很努力。

最后，我要特别强调，如果反战斗争不与工业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密切结合，那么我们的反战斗争将是浮而不实的。我们说，反战斗争，这同时也是争取实现最迫切要求的日常斗争。只有在各个工厂组成统一阵线委员会，反战斗争问题才有其坚实的基础，才能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苏联的斗争同反对生产合理化及其后果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些方面，我们党取得了一些成就：我们成功地在各个工厂组成了“苏联之友”委员会。

我的话完了。反战斗争问题和我们面临的其他任务将在对专题提纲的讨论中进一步加以明确。我的发言的目的是，在代表大会上强调法国帝国主义的作用，以便使这一问题提到我们党的首要地位，并吸引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去有效地反对战争，如果法国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敢于向苏联宣战，就吸引他们站到苏联方面来。

德维塞尔（荷兰）：

荷兰代表团总的来说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报告的基本政治路线。我只想对个别问题提一点意见。布哈林同志对总结所述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本身的活动讲的太少了，虽然他也寥寥数语地就这项工作作了一定的自我批评。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指出，在一些重大的国际行动中，执委会要么是完全不作原则性指示，要么是指示的时间过晚。试举一个例子：在英国举行总罢工很久以后

才看清楚，在英国必然会爆发大规模战斗，可是执委会尽管事先早就制订了正确的路线，但是并没有使共产国际对此作好充分的准备。第二个例子是因萨柯与樊塞蒂案件而爆发的运动。在这场虽然是自发的，但持续时间相当长的运动中，我们党始终得不到共产国际应有的指示。当时，我们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例如是否应当提出总罢工的口号，这个问题当然只能由共产国际来解决。我们国际工作的另一个缺点是没有及时通报情况。常常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上，例如同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问题，或越飞的那封著名的信的问题，我们党和我们的报纸整整几周内竟一无所知，还有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的消息是否属实，还是并无此事。完全有必要立即详细地向各党通报这些事实。同样的情况在越飞的信的问题上再度发生。关于此事我们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这封信是否确实写过，它有什么意义，等等。在共产国际开始对反对派作出反应以前很久，反对派的材料就已在许多国家传播开了。绝对有必要使共产国际改进关于重要情况的通报工作，尤其是涉及苏联情况时更应如此。依我看来，这样做会比散发大量资料、工作报告和其他文件更为合适，我们现在收到了这么多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对我们来说并没有现实意义。

布哈林同志谈了某些党和共产国际内官僚主义的症状。我看，他本来尽可以大胆地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厉害一些。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机构需要实行“合理化”。我们直率地说，也许这个机构相当大的部分可以精简，并应与此同时改进工作质量。另一方面，必须从各个支部抽调大批优秀工作者来加强共产国际的政治领导。现在的情况是，某些著名的领袖被工作压得过重，须知道，这最终可能对共产国际造成严重后果。

布哈林同志指出了目前存在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总的说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同样还存在着相反的趋势。在荷兰，譬如说我们常常会碰到来自资产阶级政党的提案：取消诸如电车、煤气工厂之类的国营企业，或把它们卖给私营股份公司，或者成立所谓的合营企业来取代现有的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企业。我们用了全部力量同这种趋势作斗争，我们认为，在提纲中同样提一下我所指出的与国家资本主义相反的趋势是合适的。

说几句关于辅助组织的问题。总的说，我们承认这些组织有很大益处。但是，如果只看到好处，而看不到坏处，那就不对了，特别是在小的支部里。这些辅助组织将会造成这样一种危险，即在不正确的领导下，它们可能成为反对党的工具，这种情况过去已经确实发生过。例如在成立反帝同盟时，各国共产党得到指示要对这个创举保持稍远的距离，这就犯了一个错误。由于这项错误政策的结果，以荷兰来说，“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国际的其他敌人才有可能同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运动取得联系。辅助组织的过于庞杂对于党的工作能力，特别是一些小的支部来说，实在是沉重的负担。不应当允许辅助组织的工作妨碍党在重要问题上显示出自己本来的面貌。我们认为，简化辅助组织系统是有可能的。例如说在小的支部里，如在荷兰，可以同国际工人救济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建立组织联系，但保留这两个组织的行政独立性。

再说几句关于工会政策的问题。在提纲的第 37 条中写道：“把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争取改良主义工会，把被开除出去的工会组织起来，在适当的情况下（在工会运动四分五裂的国家里），帮助已争取过来的‘自己的’地方组织找到出路，并使它

们参加革命的工会联合会。这就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应当明确地说，这种“适当的情况”在荷兰是不存在的。自由工会联合会（改良主义的工会联合会）脱离了红色工会国际，奉行工团主义的一种改良主义工会政策，甚至反对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这决不是说我们在为地方组织从现代的工会运动向自由工会联合会的转变作宣传。在荷兰，无论是在自由工会联合会还是在荷兰工会联合会（革命的工会联合会）内，都必须建立革命的、有组织的少数派运动。在可以自由地进行革命性批评的条件下工会运动实现组织统一的口号，仍然如同过去一样是荷兰最现实的口号。最后，我提一点意见，即共产国际应比以往更多地关注小的支部。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本应在它干预比利时党务以前早就采取行动的。因为很久以前就已经预见到，原领导中的多数必将奉行一条错误的方针，这就是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应当事先采取行动。我们希望代表大会将注意这些意见，以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更加坚强有力地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领导反对世界资产阶级及其最后支柱社会民主党的斗争。

罗吉奇（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关于国际形势和关于我们世界性的党——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和提纲。同志们！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深深感到必须在这个讲台上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采取措施消除了腐蚀我们党的派别斗争特别表示感谢。自从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无原则地进行了一场罪恶的派别斗争。在这之后，共产国际致南共党员的公开信团结了党的所有健康因素。这封公开信成了两个派别领导人的试金石，他们现在应当明确地——而不仅是口头上——或者实行党的政策

和遵守党的纪律，或者奉行派别政策和服从派别纪律，不过那样就已经不能再留在党内了。仅根据各个党支部和党组织对公开信的一次讨论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满意地说，派性只毒害了知识分子的领导集团，但没有毒害到党的无产阶级分子。我们坚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必将彻底清除党内无原则的派性污染，恢复健康后的党将会领导工农群众取得最后胜利。同志们，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健全和巩固由于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危险极其紧迫而尤为必要。一伙帝国主义强盗（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越来越成功地在财政方面，从而也在政治方面，迫使巴尔干各国从属自己，把它们变成自己的附庸国，以便一有机会就唆使它们互相作战或对苏作战。南斯拉夫与法国签订的友好条约、与意大利签订的贝尔格莱德协定和内图诺协定、向英国借的贷款和同英国签订的条约、小协约国屈从于法国帝国主义的意志、在法国和英国军事专家监督下进行的大规模军事和政治、组织准备，——凡此种种都表明战争的危险在日益增长。巴尔干各国政府完全依附于英国和法国，同时还受到美国资本主义的监督，它们不敢与苏联进行政治和经济交往，成为反苏集团中帝国主义大国掌握的驯服工具。在巴尔干半岛，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表现得特别尖锐。巴尔干半岛的紧张局势、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冲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冲突、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冲突，都不是巴尔干本身地方性的，而是具有国际政治性质。巴尔干半岛战争的爆发必将导致世界规模的冲突。同志们，南斯拉夫共产党面临着巨大而困难的任务，以及由于日益复杂和尖锐的国内政治形势而面临战斗。在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塞尔维亚资产阶级依靠自己军队和战胜国盟军的刺刀，已在

战后篡夺了领导权。

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黑山族、马其顿族，以及匈牙利和德意志两个少数民族的劳动群众，都被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掠夺一空，这造成了工农业的严重危机。这个危机由于民族压迫引起的政治危机而更加激化。

南斯拉夫的所谓“民主代议制”王朝的议会，自1921年开除了59名共产党代表以后，成了拥有领导权的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手掌中唯命是从的傀儡。这个资产阶级就在议会的院墙内暗杀了拉迪奇的克罗地亚党的两名代表，以此来酬报该党奴颜婢膝的反对派立场，而且它现在完全公开地通过将军们的法西斯政府采取专政的方针。

甚至在巴尔干各国的这些内政问题上，也可以感觉到有伦敦、巴黎和罗马的帝国主义巨头在插手，在他们的帮助下，巴尔干各国政府不断地建立，又不断地被推翻。帝国主义大国对巴尔干各国国内政治事件的影响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保加利亚的斯坦鲍利斯基政府被暴力推翻，阿尔巴尼亚的范诺利被推翻，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事件，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干涉，以及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签订内图诺协定等问题上。

在南斯拉夫这样的经济、政治形势下，必不可免地发生了革命的民族运动和农民运动。不仅在被压迫的民族中，而且在塞尔维亚本身，各种党派的农民大会都一致要求取消农民的所有债务和积欠的租税，提出了工农联合的口号；因为议会中的暗杀事件而举行的革命示威游行，在萨格勒布变成了两周的街垒战；警察拒绝对示威者进行镇压，——所有上述现象的发生违反了执政党的意愿，甚至也不合于反对党的心意，它证明在南斯拉夫的工农

群众中有着巨大的革命力量。显然，只有按照列宁主义思想进行领导并且有铁的纪律的统一的共产党，才能够实现党和共产国际的政策。

在消除了以往曾经使党无力采取大规模行动和妨碍党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扎根的派别斗争以后，党现在可以领导工农运动，开展斗争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塞尔维亚政府奴颜婢膝地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效劳卖力，反对战争和进行军事、政治上的战争准备，反对进攻苏联，争取实现与苏联进行政治和经济交往，反对法西斯专政，争取直至民族分离的民族自决权，争取实现在巴尔干半岛成立由各个独立的工农共和国组成的联邦。

由于这种紧张的政治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为加强目前在国际战线一个极其重要地段上进行斗争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而发出的公开信，其全部意义就格外清楚了。

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任务有以下一些：在各国共产党中加强国际主义精神，并应当有具体的表现；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在正确采用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组成统一阵线的策略时，克服在秘密政党中特别容易出现的宗派主义思想；从组织上吸收同情的群众参加辅助组织（如苏联之友、反法西斯联盟、反战运动，等等），从组织上扩大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国际工人救济会、青年团体和体育团体，在农民群众中进行工作，目的是争取他们站到无产阶级的阶级阵线这边来，或者至少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工会中进行日常的具体工作。

我们提请共产国际的美国、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支部注意有必要在目前处于天主教民族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下的数百万巴尔干各国移民中进行工作。上述各支部应与这些移民原来所

属国家的支部密切联系，为争取无产阶级移民群众而开展工作。

我们相信帮助我们在南斯拉夫消除了派别斗争的共产国际的丰富经验，确信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样能够依靠波兰党内的无产阶级分子消除该党的派别斗争和消灭各个派别，并帮助波兰共产党保存自己的战斗力。

布哈林同志提纲所揭示的某些支部的政治路线以及工会、青年组织和其他辅助组织的工作中的错误，是根据国际经验分析出来的。这也将帮助南斯拉夫支部克服自己工作的一切弱点，使党成为工人阶级真正的领袖。

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 10 周年的日子已经快到了，即将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将对南共以往 10 年的工作进行总结。

同志们，为了协调巴尔干各国的政治路线、策略路线和工会路线，必须使巴尔干地区书记处和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为巴尔干各支部之间的密切接触和紧密联系提供更多的条件。因为，事实表明，直到今天，巴尔干各支部相互间缺少足够的联系。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为了制订出共同的政治指示和组织指示以及采取联合行动，今后必须使巴尔干各支部的工作协调一致。

福特（美国）：

美国代表团总的来说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阐述的总路线。但是，我想指出报告中以下两点疏忽的地方。第一，报告没有充分阐明殖民地问题，特别是关于正处在英国帝国主义、法国帝国主义和我要强调指出的美国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非洲，以及关于正处在英国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西印度群岛和海地群岛。第二，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没有充分注意美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以及这一斗争是怎样影响到党的工会活动，即组织

未参加工会的工人和开展黑人工作方面。

首先谈第二个问题。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政策的发展达到了很大的程度。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工人阶级正受到巨大的压力。在美国统治下的尼加拉瓜和海地，殖民地人民所受的压迫日益加重。

党内斗争妨碍了我们在组织未参加工会的工人和开展黑人工作方面的工会活动。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在红色工会国际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美国代表团的发言中相当清楚地暴露了出来。我们代表团发言反对了那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策略路线。一般说，与工会工作有经常、直接联系的同志都认为，在我们党内可以感觉到有某种右的倾向。

党内斗争是我们黑人工作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阻碍。从美国共产党发生党内斗争的时候起，黑人工作就落后了。这项工作好像一只皮球，被我们党内各个派别和某些成员踢来踢去。

对某些同志在黑人中进行的工作，散布着许多流言蜚语，提出了各种责难。但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人们明显地低估黑人工作的意义，特别是近年来这种估计不足已接近于对这项工作的直接抵制。

在美国，黑人居民被吸收到工业部门的进程非常迅速，从70年代末起，黑人无产阶级的数量迅速增长，有时每年达30万，目前在美国北部和东部的工业中共有200多万黑人。这些黑人在美国的主要工业部门工作。此外，还有150万黑人在农业部门工作，100多万黑人担任家庭仆役。居住在美国的所有黑人中，66%是在南方各州的农村工业和农场中工作。虽然存在着这样庞大的革命力量，虽然国内有一支庞大的黑人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队伍，但

是在总数 1 200 万的美国黑人中，加入我们党的不超过 50 人。我们没有在黑人中组织任何一个工会，可是，就在不久前，一个社会党人在美国黑人中组织了一个反动的工会。这个工会已经存在两年，而我们党在其中没有丝毫影响，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完全低估黑人工作的重要性而造成的。

但是，比消极对待和低估黑人工作这一现象更为严重的是那种“白人沙文主义”，也就是在美国无产阶级中极为强烈的、或甚至存在于美国共产党员中的那些种族偏见。我们一些积极从事工会运动的黑人同志被赶出工会，而党却不愿花费一点力气去同这种现象作斗争。我们有些黑人同志曾不止一次地向党提出这个问题，但一贯遭到迫害和驱逐。他们甚至被开除出党而跑到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和其他组织中去。

我们党内一位领导美国黑人工作的黑人党员目前正在纽约，但他不是来这里参加代表大会，而是被黑人问题委员会召来的。他没有出席代表大会的原因是他被毫无根据地指责为右倾。这位同志不仅遭到攻击，甚至还要被开除出党。因为他激烈地攻击美国共产党在黑人工作问题上的策略。

在 4 月 1 日匹兹堡召开的最近一次矿工代表会议上，我们从事矿工活动最积极的一位黑人工作人员因违反这次会议管理委员会规定的议程而遭到没完没了的攻击，他的违反议程的行为表现在他向会议提出了黑人工作问题。有些人甚至责骂他是一名间谍，是为美国反动派服务的，这些责难完全是信口雌黄，毫无事实根据。

同志们，除此以外，我们还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白人沙文主义”、各种种族偏见甚至对我们某些党员也是有影响的。我不可

能谈得太详细，但只要提一下在格里和里士满、在圣保罗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在底特律（密执安州）、纽约和密尔窝基（威斯康星州），以及甚至在芝加哥的劳动联合会组织中发生的事情就足够了。在所有上述事件中，我们看到了“白人沙文主义”的明显表现，然而美国共产党却无动于衷，不同这种沙文主义倾向进行任何斗争。

为我们党在黑人工作方面的活动进行辩解、粉饰的任何企图，都是一种近似阳奉阴违的最危险的策略。让我举一个例子。

每当召开重要的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就像我们现在的这次代表大会，或譬如说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时候，美国共产党总要努力加强一下自己在黑人工作方面的活动。例如在4月份（很可能我在这里引证的不是太重要的事实，但这一事实毕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工人日报》登载了1 100行字关于美国黑人工人的材料，这种罕见的壮观使我们感到欢欣。为了评价这一突然的现象，必须回忆前几期的《工人日报》。2月份整整一个月，只登载了100行稍多一点关于黑人的材料；3月份，这个数量增加到300行，最后到4月份，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达到了1 100行难以置信的数字。5月份重新又看到了这类材料缩减的趋势，——共登载了600行。在6月的头10天，不过100行稍多一些。我未能把其他各月的报纸都翻阅一遍，但从上述情况中你们已经可以看到，在加强宣传鼓动期间或者在召开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黑人工作问题在我们党内就讨论得比较热烈，一般说整个这项工作就比较活跃。

你们知道，我们美国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共产党人，都是做广告的宣传能手。4月，我们党中央在纽约出版了一份关于黑

人工作的著名文献。这一步骤同样可以解释为是在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闭幕后紧接着大力进行的活动，也可以是因为当时纽约有一个研究黑人工作问题的黑人事务特别委员会正在开会的缘故。最后，根据这次代表大会期间这里印发的通报来看，我们党现在正极其坚决地同用私刑杀害黑人的恐怖活动进行斗争。同志们，依我看，所有这些都是沽名钓誉的行为。我们党现在大力进行反对美国国内用私刑杀害黑人的运动，这还是第一次。我但愿相信，这意味着我们党的政策出现了新的转折，但是我觉得，这仅仅是又一个自我吹嘘的例子。

掩饰对黑人工作问题的消极态度的这种倾向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企图提出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相应的口号，或者甚至就引用代表大会的决议。让我举两三个例子。在美国，我们有许多同志常常说：

“种族偏见是不可能短期内消除的。在社会主义时期来到以前无法把人们改造过来。让幻想家和信基督教的社会党人去梦想‘改善人类’吧，这不是革命共产党人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到客观事实，承认某些妥协的必要性。共产国际曾多次指出，完全容许对某种偏见（例如，民族偏见、地域偏见，等等）作让步。”

你们还会听到关于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偏见的同样议论。有人对我们说：

“我们应当清除我们政策中和我们党的工作中的种族偏见，因为党内不应有任何内部障碍。但是，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干涉我们党员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兴趣。”

假如我有时间，我还可以再举一些其他例子，来说明美国共

产党内某些同志是怎样企图为我们的缺点辩解的。

我完全理解，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决不能只谈我们感兴趣的事。他只应从总的方面对世界形势进行阐述。但是，鉴于他对捷共和波共的党内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可能对国际形势造成的后果都提出了看法，我想，他也应当谈一下对美国共产党这种状况采取坚决措施的必要性。很可能，布哈林同志关于波共的意见也可以作为对我们的指示。

根据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来看，近年来，共产国际就黑人工作问题给美国共产党寄去了至少 19 份决议和各种文件。但是应当说，这些决议没有一项得到贯彻，而且根本没有提交给党讨论。我们党内一小群黑人同志年复一年地进行斗争，要求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党。现在我们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能，其他同志对美国黑人工作问题的讲法会不一样。居住在这里的美国同志中，有些人是阅读《工人日报》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同志现在已同美国失去了联系。就我所知，至少有一些同志在莫斯科的大学里已经学习了两三年。

我提到的这个问题在国际范围内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想就这一点再谈谈以下情况。

必须考虑到，在非洲——东非、黄金海岸等地还有数百万黑人工人。在西印度群岛和海地已经听到预示着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起义即将来临的隆隆雷声。我觉得，布哈林同志应当强调在这些国家和有黑人工人的一切地方都大力开展这项工作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当我们讨论总的殖民地问题时，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是，我认为，应当使那些与此最密切有关的党，也就是使英共、法共和美共注意有必要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在

上述殖民地内开展黑人工人工作的问题。

最后，我要说的是，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越来越有力地推动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同过去一样，殖民地仍将是最大规模的反帝革命活动的舞台。中国革命摇撼了帝国主义的基础，并作为强大的运动而继续发展。在印度，反对帝国主义的起义已日益酝酿成熟。

下一个澎湃的革命浪潮正在来临，它来自黑人工人和居住有黑人工人的殖民地国家内被压迫的工农群众。我们将看到黑人工人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旗帜下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和支持苏联而斗争。黑人工人将会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在共产国际旗帜的指引下，黑人工人必将投入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斗。

瓦西里也夫：

我想只谈两个问题：各国共产党的组织软弱问题和共青团的工作问题。共产国际的前几次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已经指出，各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组织影响的增长大大落后于组织的巩固。近年来，各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增长与组织工作的发展之间的差距显著增长，而且仍在继续加大。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证明，广大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左倾化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由当前整个客观形势，即现今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的各种条件所造成的。群众的这种左倾化为各国共产党的巩固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形势。然而，在这里陈列的以及随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一起分发给同志们的各国共产党人数增长的数字说明，各国共产党人数的发展实际上与它们在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中政治影响的增长一点也不适应。原因在哪里呢？对这个问题在兄弟党内传播着两个最流行的意见，而依我看来，这两个意见都是完全错误的。第一种意见

是：各国共产党发展的客观困难增大，警察和政府的镇压加强，企业主的恐怖手段增多。这些困难——警察的恐怖手段和企业主的镇压——极大地限制了各国共产党人数发展和全面巩固的物力条件和人力条件。当然，低估企业主和政府对工人阶级加强压力的影响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把共产党的组织软弱只解释为是由于镇压的加强和组织工作困难的增加而造成的，那就是更大的错误了。在德国 1928 年的选举中，大家知道，投票赞成德共候选人名单的无产者有 325 万人，而当时德共党内登记在册的党员共约 15 万人，缴纳党费的平均为 11.2—12 万人。试问在这些投共产党票的 325 万德国无产者中，难道没有几百、几千、几万个无产者现在就已经可以参加德国共产党的队伍了吗？

从去年年底鲁尔区最近几次工业冲突的经验中，我们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事例：克虏伯工厂一个车间的非党工人发起并进行了一次罢工，可是这个车间的共产党支部却对罢工准备情况一无所知，直到宣布罢工以后才参加了罢工活动。

在 1928 年法国大选中，投票赞成共产党候选人名单的选民在 100 万人以上。按照法共中央的材料，约有 30 万无产者积极参加了竞选运动。他们积极地帮助党，法共中央在今年 6 月 2 日公布的正式文件中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法国共产党的人数又有多少呢？按 1928 年 1 月 1 日统计，它共有党员 52 000 多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在大选期间法共没有从这些积极参加竞选运动的 30 万无产者中吸收一些来补充自己的队伍吗？完全没有。不仅它的人数没有增加，而且在一些党的组织中党员数量还有所减少。

有些人还提出了另一种论点，他们说，不应要求党做到超过

它所能做到的事，并且他们还想起了一句成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但是，同志们，不应借口说什么党还年轻，它们的领导干部力量弱，它们还存在过去社会民主党的和无政府主义的传统，等等，等等，以此来解释共产党目前组织状况的基本弱点。不用说，应当注意到除了警察制度的各种条件造成的困难以外，还存在有严重影响着党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之类的传统，不用说，应当注意党的领导人员力量薄弱等等。但是，问题不是这样提法，也不应当这样地提。问题的提法应当是而且必须是这样：为了克服这些客观的和主观的所有困难，也就是克服那些由警察制度和企业主恐怖手段所产生的种种困难，以及由党过去的历史发展所引起的种种困难，党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各兄弟党最近时期的活动时，我们应当肯定，情况通常是：各个党没有为巩固自己的组织去做它们在现有的力量和现有的领导干部的条件下能够做到的任何事情。原因在哪里？同志们，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同共产党内过去的社会民主党做法进行积极的斗争，这种过去的东西在共产党内还很强大，妨碍党向巩固组织和普遍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方向前进。首先是代表大会，随后是各个党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都应当对这个问题给予最大的重视。

只要回忆一下各国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实质、它们组织工作的基础过去和现在是什么，那么在我们面前就会展现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我们党组织软弱的原因。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社会党整个组织工作的基本特点：社会党是在企业之外开展活动的；它的活动主要是组织一个又一个的大规模运动，忙于一次又一次的选举；在

两个大规模运动之间，社会党内没有任何党内生活；社会党的基层组织通常很少积极活动；社会党的主要工作通常是由党的议会代表、报纸和党魁去进行的，等等，——那么难道我们还不能发现，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作的这一本质比较完整地反映在各次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对各个大规模运动所作的评价么。例如，仍以法国共产党来说，从1926年起，法共中央委员会、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每次都重复说，党所进行的运动暴露了基层党组织的软弱、企业中工作的软弱，暴露了运动基本上是由议会党团和中央机关报《人道报》编辑部的力量进行的，等等。正是从这些评价中，我们真正发现了完整反映社会民主党过去的这一切，确实看到了缺乏批评精神和缺乏自身克服这种社会民主党老传统的革命意志。这股直到现在还严重影响我们各支部的过去的传统力量，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各支部进行的工会工作中。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着重指出，在工会运动发生分裂的国家内，我们的革命工会，即在该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工会，经常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采取改良主义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我们只要提醒一下，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法国委员会曾经从法国矿工统一工会主席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在北部，那些由工人选举产生的并在工会与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之间保持直接联系的矿工统一工会代表，通常都是一些饭馆老板。当我们请他给我们解释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才弄清楚，还是从社会党以往时代起就规定了一种办法：把党的专职人员安置在饭馆里当掌柜，为的是用这种方法来保证党有自己的场所。当以后法国北部社会党的这一部分组织改组为共产党的组织时，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消除社会党过去的这种残迹。结果，在法国北部最近几次罢工期间，我们的统一

工会始终在阻碍着罢工运动的发展，而不是去推动它和组织它。

同志们，我想，代表大会应当坚定地 and 硬性地提出一个关于同共产党内这种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作的残迹坚决斗争的方针。各国共产党应当集中全部力量，统一全党意志，以大型企业、重要工业部门的工作为基础改变工作方式，以便加强工厂支部，从而结束我们现在到处可见的状况，其中也包括在德国共产党内出现的情况。我指的是：党所进行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大都没有或很少有工厂支部参加；共产党在大型企业内的力量过于薄弱，特别是在对帝国主义政府进行战争准备有重要意义的企业里和国防工业企业里力量尤其薄弱。发起一场反对进行战争准备的政治大运动，是一件很好的、重要的事情，但是更加重要的，也是各国共产党做得最差的事情，就是在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大企业里，如兵工厂、港口、铁路枢纽等等地方，坚强有力地和顺利地开展组织工作。我再重复一遍，在这方面，所有的党都做得最差。这是我们党整个工作中最大的缺点之一。绝对无须争辩的是，党应当统一全党意志和集中全部力量，以便在这些企业中夺取阵地并在那里建立起坚强的支部，还要在进行党的一切工作时都应考虑到，拟定的措施能使党在大企业、决定性的工业部门和对战备有重要意义的企业内的阵地加强到什么程度，以及在一旦发生重大事件时党在这些企业内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同志们，我还想就共青团的工作再说几句。某些同志发表意见认为，许勒同志的报告与布哈林同志报告的调子完全不一样。他们指出，布哈林同志非常强调揭露各国共产党工作的缺点，以便表明，为了继续前进多么需要有毫不留情的列宁主义的自我批评，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些缺点得到暴露和克服，而在许勒同志的报告

中，特别强调的却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即青年共产国际所取得的成绩，至于报告中关于缺点的第二部分，那就太简略了。

由于我们同青年共产国际的交往很密，就我所知，这并不代表青年共产国际的某条路线。不管怎样，我个人认为，从代表大会的工作效果来看，充分利用青年共产国际本身及其组织部提供的材料来对许勒同志的批评部分作一些补充，那是重要的，也是必需的。

同志们，我想，共产国际中谁也不会贬低青年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所有革命支部之一的意义，特别是在同共产主义阵线某一方面所表现出的各种倾向作斗争时它所起的作用。

但是，我觉得，青年共产国际参加共产国际所开展的共同政治工作时，不是经常考虑其本身组织的内部情况。让我简单扼要地提一下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青年共产国际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再次确认过去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肯定这些决议使青年共产国际有可能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青年组织，肯定青年共产国际已朝这个方向前进了几大步，这反映在其数量和质量的不增长上，而且由于同一时期社会党工人青年组织的衰落，这个进步便更加令人瞩目了。

决议中又写道，青年共产国际在继续目前的发展时，要使这一高涨不是偶然形成，昙花一现，而应保持稳定，要使这一高涨导致青年共产国际成为一个最广泛的工人青年组织，从而把打着社会党旗帜的所有青年组织彻底消灭掉。

决议最终谈到了关于青年共产国际以工厂支部为基础进行改组的问题，决议说，青年共产国际在这方面不仅没有局限于对自己的成员进行思想教育，而且做了远为重要的事情，给在工厂支

部的基础上改组自己所有组织的工作创造了条件，决议指出，青年共产国际是这方面的先驱者，这对各国共产党的帮助很大。

按工作报告中的数字来看，情况又是怎样呢？许勒同志在报告中宣读的数字表明，青年共产国际在除苏联以外的所有国家中，共有 10 万多成员，由此可见，这远不是什么群众性组织。但是，第五次代表大会所说的某些国家共青团持续的稳定的增长，其情况究竟怎样？我以最重要的一些国家的共青团为例来说：德国共青团员，1925 年为 24 000 人，1926 年为 18 000 人，1926 年 11 月为 20 000 人，1927 年为 19 000 人，1927 年底为 20 000 人。没有增长，实际上我们是停滞不前。英国共青团员，1925 年为 560 人，1926 年 1 月为 800 人，1926 年 11 月为 1 752 人，1927 年底为 1 100 人。法国共青团员，1924 年为 7 700 人，1925 年为 9 000 人，1926 年为 9 000 人。捷克斯洛伐克共青团员，1925 年为 8 000 人，1926 年为 13 000 人，1926 年底为 13 000 人，1927 年为 13 000 人。

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中说得那样好听的工厂支部的情况又怎样呢？青年共产国际组织部报道了工厂支部总数变化的数字，下列数字决不能说明工厂支部的发展和巩固：1924 年 603 个，1925 年 1 100 个，1926 年 1 900 个，1927 年 805 个，1927 年底 270 个。到 1927 年底，德国共青团所有工厂支部拥有的团员仅占总数的 6%，在捷克斯洛伐克仅占 12%，在法国仅占 8%—10%。只有在共青团是不合法组织的意大利和波兰两个国家中，工厂支部拥有的团员占总数的 45%—40%。

共青团渗入到大型企业是共青团整个工作的中心问题，这项工作的情况又怎样呢？青年共产国际组织部提供的数字表明，1927

年德国共青团的一个组织吸收了 131 名新团员。在这些新接受的团员中，也就是 1927 年底最近一次赖以增长的人数中，有 84% 是在小企业工作的，只有 16% 在大企业内工作。

最后，关于成员流动性问题。同样是青年共产国际组织部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下列数字：1927 年底，法国为 40%，捷克斯洛伐克为 35%—40%，英国为 20%。

我们有许许多多完全没有建立工厂支部的共青团组织。美国共青团是其中的一个。它至今还没有组织起一个工厂支部。我认为，根据上述数字，考虑到确实有大量青年工人现在不仅参加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而且参加了斗争，在资产阶级的组织中青年工人有数十万之多，考虑到这一切，我们确实应当非常认真地想一下，党用什么方法才能帮助共青团克服现状，使共青团能够真正实现第五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

按照这条路线，所有的党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大量工作，因为必须指出，从党对共青团的帮助来看，各地的情况都很差。例如我们有一个党员人数达 15 万之多的群众性的捷克共产党，但是捷克共青团只有 13 000 人（不完全统计）。我们在捷克的大型企业内建立有工厂党支部，有党员数百人，但却没有共青团的工厂支部，或仅有一些人数少得可怜的组织。

特格森（丹麦）：

丹麦代表团讨论了布哈林同志的报告和提纲，表示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意见。

布哈林同志认为对社会民主党最有代表性的、并决定着我们对社会民主党的立场的那个发展过程，特别明显地表明在丹麦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中。

合理化在我们这里还刚刚开始实行。但是，社会民主党已完全、充分地给予支持，正如在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它始终与资本家步调一致那样。这从以下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1923年以前，丹麦在竞争中从德国马克的低兑换率中取得了某些好处。在德国实行道威斯计划以后，当时1克朗兑换50马克的丹麦克朗开始了整顿。丹麦失去了原来由于克朗对德国马克黄金平价的外汇牌价低而造成的特殊地位。官方统计的包括各行业工人的失业人数提供了一个关于克朗的稳定是怎样影响到生产关系的完整概念。从1922年到1927年期间，失业人数的百分比如下：

	所占百分比
1922年.....	19.7%
1923年.....	12.7%
1924年.....	10.7%
1925年.....	14.8%
1926年.....	20.8%
1927年.....	22.3%

1924年4月，社会民主党人通过大选组成了政府。在竞选运动中他们提出了以下口号：提高对5万克朗以上资本的课税额，剥夺大庄园并把它们改成工人休养所，改善社会保障，裁减军备，等等。社会民主党人承担起使克朗稳定的任务，但是他们同时千方百计地转移工人阶级的注意力，使他们看不到恰恰是工人阶级不得不为支付稳定克朗的费用而付出增加失业人数的代价。随后，社会民主党政府实行新的所得税，也就是征收劳动居民的所得税来抵偿破产了的农业银行的债务。经社会民主党人同意，这些债务

由国家保证支付，到目前为止已经支付了4亿克朗。

大选中作出的那些慷慨的许诺，不仅没有一个得到兑现，甚至没有进行过实现这些诺言的微弱尝试。然而社会民主党部长斯陶宁格却猛烈攻击1925年工会反对企业主斗争时期的工会运动。斯陶宁格制订了强制仲裁暂行法，并经过国王签署以后予以施行。他的意图是利用这项法令把工人赶回到企业中去。

1926年，社会民主党人完成了稳定财政的第一阶段，就不得不让位给大地主政府。这届政府提出的目的是：使社会方面的立法越来越差，降低国家官员工资，在减少工人工资问题上国家支持企业主。

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时期出色地实行了假反对党的政策，为的是阻碍工人对降低工资的凶狠措施进行斗争。

社会民主党人目前正在为再次成为执政党进行准备。很有可能，他们在明年春天便取得成功。1927年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赞同该党领袖们在这以前实施的整个政策，并委托他们重新组织一个以课税和实现合理化为口号的政府。

现在，我们的农业同样遭到了严重的危机。

战争期间，由于向各交战国出口农产品有利可图，土地价格惊人地上涨。田庄经常易主。由于对田庄大量增加投资，当时各家银行把所有田庄的75%纳入自己的经营范围。农民购买田庄时，借的钱是按1克朗为50的兑换率，可是现在他们应当付的利息连同应当归还的欠款，则是按克朗与黄金平价相应的兑换率。

北西里西亚的危机尤其严重。在北西里西亚脱离德国以后，那里所有农民原来欠丹麦财政机关的债款现在必须按双重的兑换率归还。除此以外，在脱离德国后，他们被迫从经营畜牧业转为生

产油料和脂油。由于德国实行 1925 年的关税法，原来向南方出口牲畜已成了完全不可能的事。

在北西里西亚，我们有着真正的革命形势。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府只要有可能，总是企图阻碍农民的革命运动，加剧民族矛盾。

不用说，农业工人的危机也同样严重。尽管他们的工资本来就比较低，可是还经常要一次又一次的减少。组织起来的农业工人只有 10%，而产业工人组织起来的却是百分之百。外地城市的不熟练工人，平均工资为每小时 1.21 克朗，在哥本哈根为 1.39 克朗。农业工人的工资连一半也不到，约为每小时 60 欧尔^①。

说一说工会运动。当社会民主党领袖们逐渐参加到资本主义稳定过程中去的时候，工会内部产生了反对派，最终导致一个拥有 8 万名会员的“工人工会”于 1926 年退出了工会联合会。

这件事的直接原因是社会党人部长们在 1925 年大罢工期间的立场和斯陶宁格关于强制性仲裁的法案。

现在，工会联合会只拥有各行业工人总数的 50%，而其余工人分属 23 个不同的工会。

共产党人反对“工人工会”退出工会联合会，但是社会党人部长们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行事，对这次退出进行了挑拨，因为他们失去了在工会运动中的首要地位。

现在他们开始把这场分裂转移到国际舞台。工会联合会在今年 5 月的代表大会上作出决议，向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建议把不参加联合会的各个工会排除出国际工会组织。一方面，这是力图

^① 丹麦 1 克朗等于 100 欧尔。——译者注

使左派的“工人工会”失去支柱，另一方面，是想使运输工人的罢工成为不可能的事。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人停止了与不参加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挪威工会联合会的合作。

丹麦社会民主党在战前曾以要求全面裁军和对青年学生实行军训而获得了国际荣誉。不用说，这个观点早就被他们抛弃了，现在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一起承担了因欧洲力量重新组合而引起的军队改组的责任。

目前，丹麦军队的改组是在英国监督下进行的。军队的防线面向东方，目的是封闭对苏联的包围圈。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在通往波罗的海的松德海峡进行了疏浚工程，以便英国军舰能够通过它进入波罗的海。

再谈谈我们党内的状况：1927年8月，在同敌视共产国际的右派领导进行党内初步辩论之后，举行了党的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功地消除了党内的各种倾向，实行了新的方针。从那时起，新的领导终于使党巩固起来了，并部分地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化。短期内党员数量增加了一倍，报纸发行量同样增加了一倍。现在我们在工业工人中取得的阵地好得多了，党开始了一场旨在与农业工人和缺少土地的农民更加接近的运动。

西坎杰尔·苏尔（印度）：

我想以印度代表团的名义对布哈林同志的提纲草案表示赞同。同时，我必须声明，按照我们的看法，共产国际在九年中根本没有为建立印度共产党做任何事情。共产国际应当认识到，印度具有组织强大的共产党的巨大可能性，因为印度正在兴起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高潮。

印度目前的状况极其复杂。英国帝国主义在民族资产阶级的

支持下压迫印度工人。同时，它力图摧毁印度工业，破坏某些重要生产部门，以便使英国商品更加容易进口。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分子还关闭了铁路机车修配厂，造成大量劳动者失业。

毫无疑问，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欺压印度资本家，迫使他们为英国在印度的利益服务，但是，无论是英国帝国主义分子，还是本国资本家，都同样对印度工人进行迫害，并尽一切可能挑唆他们采取行动。当工人们不理睬挑拨活动，并且甚至在现行低工资的情况下继续工作时，企业主就宣布同盟歇业。6月第一周举行罢工的有21 000名铁路工人，10 000名冶金工人，8 000名黄麻工业工人（其中600名女工），坎普尔和其他纺织工业区的3 500名纺织女工，此外，还有孟买的15万名纺织工人。在整个这次罢工过程中，英国帝国主义鼓励印度资产阶级对工人不作妥协。在这个事实中反映出帝国主义一个值得注意的矛盾：一方面帝国主义分子排挤民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帮助他们压迫工人。

罢工期间，孟买和利卢阿一些敢于对迫害提出抗议的工人们惨遭枪杀。印度工人同企业主降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日的压迫行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在印度，工作日平均长达10小时，在有些地区企业主强迫工人每天工作11—12小时，而且对此还并不满足。

英国帝国主义除了摧毁已经牢固建立的工业部门外，还实行一项新的政策，它推动印度资本主义走上建立新的生产部门的道路，例如建立航空工业和水利电力设备生产部门。近几年来为减轻困难曾得到各种援助的制铁工业，现在落到了英国帝国主义的直接监督之下，英国帝国主义在未来战争中可以利用它。英国帝国主义在准备未来战争的同时，还在印度农村地区制造相应的社会舆论。我不准备谈英国人的战争准备情况，因为这个问题我

将在讨论战争危险的条款时加以阐述，现在我要说的只是英国帝国主义在全印度进行着有力的宣传和周密的准备。

鉴于印度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战争危险的存在，我想再次强调必须制订一个明确的印度工作纲领。不能只是开会，作决议，然后便回到家里，无所作为地虚度光阴。共产国际应当认识到必须在印度组织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现在印度已有了强大的运动，可以在同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作为革命力量而加以利用。如果当前的运动有一个好的领导，那就更能够推翻在印度的帝国主义了。遗憾的是， $\frac{3}{4}$ 的领导人都是反动的工会工作者，他们是英国政府的代理人。我们的不幸是极端缺乏组织者，没有组织者，我们就不能把群众引导到革命方面来。我们软弱无力是因为我们得不到国际无产阶级的足够支持。因此非常需要代表大会特别重视印度的运动，并帮助我们在那里组织起强大的共产党。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我将更详细地谈这个题目。

勃登曼（瑞士）：

瑞士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布哈林同志的整个提纲草案。但是它建议对涉及实际工作的个别条款作一些补充。我想从小党工作的角度首先就执委会的活动提几点意见，其次，我想谈谈按我们的看法在提纲中应当更好地加以阐述的几项条款。我要强调，我们认为执委会对小党工作的关注非常不够，它把这些不得不在艰巨条件下工作，而且机构比较软弱无力的小党看作是无足轻重的人（*quantite' negligeable*），它很少研究这些小国中党的具体工作问题。

我想举一件事实作为例子：我们党曾经要解决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党本身今后存在的问题。在好几个月中，我们要求执委会就这一问题提出意见。但是执委会并不认为有必要回答我们即

使用电报提出的询问。而且我们了解到，执委会一连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在研究瑞士的某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任何一个工人、任何一个党务工作者、任何一个党委会都决不会感到兴趣的，并且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如果说共产党应当把自己的工作同工人阶级的日常需要联系起来，以便争取无产阶级群众，这样做是对的话，那么，执委会在此地莫斯科把自己的工作同各个党的日常问题联系起来，并试图在这些党的每日工作中帮助它们，支持和指导它们，那就尤为重要了。

依我看，共产国际执委会所属机构向各国党提供材料的情况也同样是很不合理的。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即共产国际执委会庞大的机构只是忙于事务工作，但同执委会政治领导的接触非常差。我们经常收到大量的材料，一部分根本无法读完它；为了掌握这些材料就得专门聘请新的党务工作人员；要么收到材料的时间太晚，已经不可能把它具体化，并研究如何应用到某个运动中去，使它适合自己党的工作条件；有时，材料送到时，运动已经结束了。情报和宣传鼓动机关的工作很差，对它们的活动我们是不满意的。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来强调这个论点，试以反对派的流放问题来说。如果共产国际在西欧的一家有影响的机关报今天在头版用粗字体报道说，关于反对派流放的消息纯属资本主义野鸡记者的捏造，而明天这同一家报纸又在社论中写道，托洛茨基分子对于把他们只流放到西伯利亚应当感到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得到的印象会是什么呢？这样的工作方法破坏工人对我们报纸的信任，从而也破坏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所谓“手榴弹”事件也属于这同一范畴。问题并不是要情报处写一些社论让西欧报刊转载，而是应当将事实通报给各党，那样各党根据事实就多多少少地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分析事态了。

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还谈到官僚主义，他提到，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组成在质量方面不是特别好，因为这次代表大会上来自车床旁的工人太少了。我对这个批评完全同意。但是，如果每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都像这次代表大会一样，工人们得等两三个星期大会才开始，那么将来就根本不存在派来自车床旁的工人参加代表大会的任何可能性了。

我提出这小小几点批评意见，是想着重指出，按照我们的看法，改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工作是绝对必需的。

总之，我们将投票赞成提纲，我们欢迎的首先是提纲对经济形势作了明确的分析。我们在这里已经听到，有些同志认为这个分析不够激进，不够左。我们要反对这种观点，因为首先必须揭露的是现实中存在的东西，从而为我们今后进行工作打下坚固的基础。

我们认为，对涉及党的实际工作的个别条款，应当阐述得更适当一些，更具体一些。这些条款中有一项是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我们应当承认，在统一战线策略方面，迄今为止我们的工作是非常不够的。这项统一战线政策主要不过是发表公开信，或者仅限于议会活动。如果我们对社会民主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就像提纲建议的，以及在英、法等国家中实际上已采取的那样，——那么，我们在巩固统一战线方面本来做得就很不够的工作将会更加软弱无力了。因此，我们在提纲中应当坚决强调，尽管我们对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强硬起来，但必须在我们日常工作的各个方面努力发动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去反对企业主。我们建议对这一条作更加确切的阐述。

我们认为提纲中叙述得不够的第二个问题是工会问题，这个问题无疑是我们整个工作的中心问题。如果在已经过去了4年的今天，重新召开世界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中心问题只是一带而过，那是绝对错误的。在讨论和叙述我们的任务时，我们应当把工会问题提到首要位置。这是必要的，特别是因为恰好最近以来共产党人在工会中取得影响时，改良主义者竭力要把这种影响消除干净，他们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冒工会本身遭到瓦解的危险，只要能赶走共产党人和拔除共产党的支点就行。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存在这种危险，我们应当捍卫工会的团结。但是，我应当着重指出，在领导机构中，也许不是在领导机构本身，但无论如何也是在负责实施执委会决定的附属机构和接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构中，对这个问题存在着非常不明确的观点。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经验：当我们这里发生局部分裂，出现大量会员被开除的情况时，瑞士共产党的观点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执委会的一些附属机构却坚持与我们大不相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似乎必须向改良主义者投降，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加速瑞士工会的分裂，拒绝团结政策。这种混乱状况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为它破坏共产国际的威信。在维护团结时，必须划出一条明确肯定的界线，规定一个极限，在到达极限时，为了保持和取得团结，共产党人可以作出某些让步。我们共产党人在实施我们的策略时，不应做过头，而放弃了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会内部革命工作的这一原则。

工会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我们强烈反对改良主义的运动中，我们的一部分工人阶级表现出反工会的情绪。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危险，即我们的青年同志中许多人不再认真研究工会运动问

题和企业中的工人状况，而仅仅是尽可能强烈地反对改良主义者。我们应当非常有力地强调工会运动在日常斗争中的意义及其在革命决战中的作用。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应作出比迄今为止坚强有力得多的努力，在工会内动员工人去对抗企业主。在当前形势下，企业主任何较强的对抗都会导致同改良主义者斗争的加剧。显然，如果我们在提出明确要求的基础上去动员工人，而改良主义者又对这些要求进行阻挠，那么共产党人的立场就要比我们同改良主义者就一般政治课题、国际课题或甚至理论课题进行辩论时要有利得多了。

我还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共产党人在体育运动中的工作。我们在这里认定，特别是瓦西里也夫肯定地说，西欧的青年运动没有做出重大成绩。但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强大的青年运动，这些青年是在体育组织中联合起来的，并且还没有受到改良主义的污染。我们必须深入到这支有成千上万人的青年无产者队伍中去，用我们的工作去争取他们。

我觉得，提纲谈到了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国际工人救济会和其他辅助组织的作用，但是对那个与工会同样是最大群众组织的体育组织中我们的工作，提纲却根本一字不提，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忽。对合作组织的工作也是如此。经过四年之后我们又来到这里开会，但是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在其中对我们猛烈进攻，并以分裂来威胁我们的合作组织的工作情况，我们也是一句话未说。

最后，我强烈地希望，共产国际的机构能进行改组，使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与各国党的工作协调一致，使与我们实际工作有关的、为所有普通工作人员指明斗争道路的各项任务都能在提

纲中得到更好的和更明确的阐述

科普林尼格（奥地利）：

奥地利代表团认为，必须对布哈林同志报告中关于对维也纳七月起义的评价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问题的部分提出一些补充。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对于正确分析资本主义稳定局面的目前时期来说非常重要，具有国际意义。总的说，我们同意布哈林同志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评述，正如我们同意他对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矛盾日益增长的叙述一样。我们认为，在评价资本主义稳定局面及其矛盾时，必须注意一个事实，即在个别一些国家，稳定的趋势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稳定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也有薄弱的地方。许多资产阶级国家至今未能克服战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在这些国家遇到很大的困难。产生这些困难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总的说来在经济上和组织上落后，由于这些国家中阶级力量对此具有特殊性，此外也由于在战后局势中这些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奥地利也属于这些国家之列。虽然就奥地利来说，我们可以肯定，总的经济状况与战后时期相比有所改善，但我们仍然可以指出，这个国家的稳定局面比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差得多，是不够牢固的。这个弱点和这些困难在政治上的表现首先是，在这些国家中，特别是在奥地利，资产阶级不得不采取法西斯手段来克服自己的困难，并依靠法西斯主义。尽管徒劳无益，资产阶级仍然试图把广大无产阶级阶层置于这些法西斯组织的影响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在像奥地利这样一些国家里，无产阶级比其他国家组织得更好，但企业内的法西斯却能够利用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甚至渗入到大工业区，控制了那里的比较广泛的无产阶级阶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同这个法西斯运动的斗

争和共产党在这个斗争中的主动精神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因。这一点也必须在决议中指出来。

讲几句关于维也纳的七月起义。我们认为，由于稳定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日益加剧，维也纳七月起义具有重大意义。在维也纳七月起义之后，共产国际曾经作过一个决议。决议对维也纳无产阶级这一自发起义的国际意义作了以下的评述：

“维也纳无产阶级自发起义的国际意义在于，它又一次明显地表明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扎实的、不牢固的和暂时的，并且继英国和中国的大规模斗争之后，它再次以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稳定的情况下，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不仅没有停止，相反地更加深入，甚至可以激化到起义。从国际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维也纳起义非常突出的特点是，自1923年以来，它第一次不顾国际资产阶级努力稳定的一切尝试，再一次在中欧举起了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旗帜，并同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执委会主席团1927年9月16日决议）。”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执委会把维也纳起义看作是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称之为资本主义稳定第三时期的进攻信号。鉴于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持完全对立的观点，这就具有更大的意义。社会民主党把七月十五日事件看作是最后一次爆发的革命行动，按照他们的意见，这次爆发的革命行动正在结束战后危机。我们希望布哈林同志在结束语中更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并对七月起义作出更全面的评价。由于在奥地利共产党自己队伍中对7月15日和以后时期的评价还存在分歧，这样做就尤为必要了。除了其观点与社会民主党的评价基本上一致的同志以外，还有另外一些同志，他们有的争辩说，七月十五日事件完全可以看作是起义，有

的人则对7月15日以后总的发展形势持有与党内大多数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意见（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七月起义的决议）相反的观点。这些同志断言，虽说是社会民主党人背叛了，但既然共产党在7月15日以后未能发展壮大，那么这就不仅是由党所犯的和我们已经承认的错误造成的，而且也是客观情况所决定的。他们认为，党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不正确地评价了7月15日以后的事态发展，没有看到，由于7月失败的结果和客观条件的影响，无产阶级不仅没有向左转，相反地开始向右转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维也纳七月起义也是具有国际意义的。按照我们的看法，在7月15日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完全公正地指出奥地利共产党的主要错误之一是，党在起义高涨期间没有提出成立工人苏维埃的口号，没有用这种方法为起义提供一个组织基础。这个问题成为奥地利党内分歧的起点，而反对派所持的观点则是，在当时形势下，如果提出成立工人苏维埃的口号，那将是错误的，因为还缺少与此相应的前提条件。我们认为，代表大会应当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的精神作出决定。由于稳定时期矛盾的不断增长和战争危险的加剧，由于阶级矛盾因生产合理化而日益激烈，完全可以期待爆发新的起义。因此对目前时期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提出成立工人苏维埃的口号的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毫无疑问具有国际意义，否则，难免有重犯原有错误的可能。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评价，我认为，在提纲中应当谈谈关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它是改良主义的一个极其危险的变种。现在，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疑地发生了转折的时候，这就尤其必要了。我们党中央的多数人认为，奥地利七月十五日事件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垮台的开始，它已失去了继续发展的

基础。按照我们的看法，社会民主党在7月15日以后的发展情况已证明这一评价是正确的。诚然，有人提出两个论据来反对这个评价：一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有了发展；二是奥地利共产党在7月15日以后也没有扩大自己对群众的影响。

关于第一个论据，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最近一年的组织发展已经不是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转变为明显的修正主义政党的过程中得到的。这个发展的基础同其他彻头彻尾改良主义政党发展的基础完全一样。至于7月15日以后奥地利共产党不仅没有壮大，甚至还遭到某些损失的这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依我们看，主要是因为奥地利共产党没有同社会民主党完全划清界线，并且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许勒同志在报告中指出了一系列这样的错误。我们完全同意他的意见。由于犯了这些错误，虽然爆发了七月起义，虽然明显地暴露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为，虽然奥地利无产阶级广大阶层无疑地表现出左倾，但是党未能开展相当有力的征收党员的活动并把广大工人群众吸收进来。我们党中央在最近一次全会上，详细地分析了最近一年来总的发展形势，从中得出了应有的结论，明确了党所犯的错误。我们将通过在群众中更加积极地工作来努力改正这些错误。现在，当社会民主党在7月日子里和在以后时期进行背叛的后果已清楚地呈现出来，并为群众所认识的时候，我们认为，在实施正确政策的条件下，我们党可以在同法西斯反动派大力斗争的过程中非常成功地揭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最危险的敌人。我们认为，彻底揭露“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一切所谓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是共产国际各国党的一项重大任务，因此我们提出的问题，不仅对奥地利共产党今后的发展，而

且对其他许多党，都有其意义，因此应当成为代表大会讨论的课题。

墨菲（英国）：

我不打算立即谈到布哈林同志专门评论英国共产党的那一部分。英国共产党将请求在今后的讨论过程中谈这个问题。而现在请允许我对布哈林同志的报告作出总的批评性的评价，并阐述英国代表团提出的意见。

首先，我认为，无论是报告，还是提纲，都片面地强调了一些因素，同时又忽视了国际局势中具有巨大意义和在评价世界资本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发展时应予考虑的一些其他因素。在读到布哈林同志给我们描述世界状况的这一部分时，不能不注意到，对共产国际本身以及所属各党的发展强调得不够。

布哈林同志为了描述从 1917 年开始世界革命以来发生的基本变化而确定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以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而达到了顶峰，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同时指出和强调一下，恰好在同一时期诞生了共产国际和在欧洲无产阶级运动中产生了各国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也很重要吗？

第二个时期，即资本主义形成局部稳定的时期，同样不仅是无产阶级进行防御战和遭到严重失败的时期，而且也是共产国际各国党得到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时期。我认为，在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描述中，必须把这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都指出来，因为这同样的过程，在第三个时期又重现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共产党产生于深刻的革命运动之中，并转变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这是可以用它来与中国无产阶级失败相抗衡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在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也可以看

到这同一个方面的某种发展。这正是实际的有益的成果，忽视这些成果是欠考虑的。这些成果是最宝贵的无产阶级斗争经验，并且能够保证无产阶级在今后的世界大战中不致于孤立无援。正是由于全世界资产阶级认识到这个事实，这才使他们仇恨共产主义运动，决定了他们对运动进行破坏的规模。在对一个历史时期进行总结时忽视了这一点，那就意味着没有注意到列宁学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论断：没有久经斗争锻炼的共产党的领导，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使我不能满意的，还有对第三个时期的叙述，也就是以《世界经济的技术状况和经济状况》为题加以发挥引伸的叙述形式。在这里过于机械地把对第二个时期的描述照搬到第三个时期。我们对资本主义不稳定性的评价，正在从以个别国家内部的不稳定性作为比喻而转为承认外部对抗性的加剧，这种加剧是由于内部不稳定性得到克服的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当然，如果否定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正在进行技术革命，或者否定德国在同一方面创造了奇迹，那将是愚蠢的。

但是，能不能说所有国家都取得了这些成就呢？是不是可以像提纲中那样地进行概括，并且在谈到欧洲资本主义和美洲资本主义时，便说德国在资本主义欧洲起主导作用，而美国在资本主义美洲起主导作用，从而把这个刻板公式当作国际形势的全貌呢？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是说我们认为第二个时期已经完全转入第三个时期就是正确的了。然而，情况绝不会像我们所描绘的那样单一。

例如英国资本主义的状况究竟怎样呢？能不能说，它已经从第二个时期转到了第三个时期？英国的经济生活是不是发生了如

此深刻的变革，以致我们不得不改变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次全会所作出的关于肯定英国帝国主义没落的基本评价？我觉得，英国经济生活最典型的特点是它已经绝对没有力量阻止煤炭、制铁、炼钢、棉纺等重要工业部门的衰败。前不久，就在上一周，英国政府不得不给煤炭出口商提供新的补贴，而棉纺工业已经好几个月存在严重的内部危机。也许，英国实行的合理化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意味着对工资和无产阶级工作日的直接损害，以及在提高劳动强度方面对工人阶级进行的总攻。我坚信，按照美国或德国资本主义的类型实行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可能性是极其有限的。这两个国家无疑在组织基本的生产力方面进行了技术革命。但是，在英国，这样的可能性极其有限，除非是在新的生产部门，而这些部门需要技术革命的程度又最少。关于工业的衰落将使资本家把企业合并起来并进行改组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蓬勃发展的工业比日益衰败的工业更容易进行合并。

乔舒亚·斯坦普先生在今年1月26日的《曼彻斯特前卫商报》上描绘了这种状况。他写道：

“存在着两种合理化——一种是萧条的结果，目的是自卫，另一种是随着工业的高涨而产生的；最近一年来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属于第二种范畴。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舆论比较倾向于支持第一种合理化，然而属于第二种范畴的措施，实际上更容易实现。这是因为，当两个兴旺发达的公司联合起来以便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状况时，未必会发生严重困难，然而，当两个事业不顺利的企业主为保存自己的资本而斗争，尽一切可能去谋求改善，但又不愿考虑现有事实的时候，不言而喻，他们必然会陷入困难得多的境地。”

英国要实行合理化困难是很大的。处于衰败状态的生产部门需要大量资本，以便建立新厂去代替老厂，此外，大地主的利益、老的经营传统和沉重的国债（英国的国债比任何竞争国的国债要多得多），——所有这些都是压得英国工业下坠的沉重砝码和无法摆脱的包袱。而利润率的降低和销售市场的不足，无助于吸收新的资本。必须考虑到阻碍资本流入英国重工业的这个事实。

这促使我对提纲提出另一个意见。我们的看法是，如果提纲能指出全世界工业化的提高，那么总危机的性质，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必要性的增大，就能表现得清楚得多。正是这个事实才是产生销售危机的根本原因。英国鲍而弗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英国贸易衰落原因的工作报告，其中心思想是承认那些在此以前一直购买英国工业品的国家已实行工业化的这一事实。此外，在工作报告中还承认了英国竞争对手生产力的增长。这些就是阻碍英国国民经济普遍实行合理化的因素，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不次于历史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迫使英国更加依赖对殖民地的剥削，并且加深了英国本土经济的寄生性。这种情况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工业不断增长与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冲突。

我对报告中这一节内容的另一点批评意见，就是布哈林同志一点没有谈到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作用。他只不过顺便提了一下，设想听众都已了解因实行道威斯计划而即将出现的危急情况。我很理解，在报告或提纲中不可能把国际状况的所有细节都包括进去，但是不应忘记，未来的一年从实行道威斯计划的角度来看是最危险的一年。明年必须全部付款，虽然提纲中说，主要的竞争对手将是德国和美国，但是我仍然认为，归根到底损失最惨重的定是英国帝国主义。我提醒同志们，英国与担任主角的美

国一起同样在道威斯计划的形成中起了重大作用。从实行这个计划的最初日子起，它就严重影响到英国的采煤工业以及制铁和炼钢工业。正是这个重要的事实决定着英国工业多次进行合理化尝试的性质。这些尝试的结果不是提高了生产力，相反地减少了生产。例如在一郡范围内实行煤炭销售计划和在炼钢工业内限制高炉开工的数量都证明了这一点。这种限制影响到大煤矿公司的采煤。譬如说，原先每周采煤2万吨的煤矿，现在只能采煤9000吨。未必会有谁再反对这样的结论，即这种合理化形式并不是发展生产的形式，相反的，是限制生产力，使生产力适应销售能力的形式。在炼钢工业方面也可以得出类似的意见。在这里，限制高炉开工的数量，是因为英国进口钢制品的数量仍然极大（进口的是半制品），这样一来，对炼钢工业产品的需求就受到了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对英国来说明年将是极其严峻的一年。由于实行道威斯计划的结果，德国的加强竞争将迫使英国或者作出让步（无论如何也要同苏联这个唯一的销售市场达成扩大贸易的协议），或者采取更坚决的步骤去破坏国际关系，加速战争。我觉得，不管道威斯计划是否修改，这都是会发生的，因为德国生产力的发展将使德国能够为争夺市场同英国展开竞争，而且所有取胜的机会都将属于德国。因此我觉得，争夺市场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场斗争中的主要当事人将是德国和英国，尤其是英国，它没有能够采取任何重大的合理化措施，使自己有力量同对手竞争。只有用这一点才能解释鲍尔温^①政府在最近一次预算中

① 英国首相（1923—1924，1924—1929，1935—1937年），保守党领袖。他一贯勾结德、意侵略者，实行反苏、反共政策。——译者注

在课税方面对企业主所作的重大让步，同一情况迫使政府向煤矿业提供补贴。我希望，如果在我的分析中有错误的话，请予纠正，但是我认为，不考虑英国国民经济的现状是错误的。依我看，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决不会具有像提纲中所说的那种单一性，如果运用比较法来更明确地描绘出世界工业化的情景，那么毫不妥协的竞争和冲突将呈现得尤为清楚，这种情况的显而易见，即使在提纲中也是承认了的。

根据对形势的这种分析，我们不能不指出另一个严重的疏忽。人所共知，合理化导致失业。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忘掉当前全世界约有1 000万失业者吗？失业是工业发展和合理化的结果，也是世界经济中的强大因素，这难道不是事实？美国的失业现象是固定不动的，那里有着经常存在的失业大军，这个事实不可避免地将对阶级的相互关系产生影响。因此，改良主义者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轻而易举地在广大失业群众中进行鼓动。我不想对这个问题谈得太长，因为关于失业还有另一位发言者要说，但是我认为，在评论国际局势时决不应忽视这一重要因素。

现在谈谈提纲的政治部分。在这方面我想请同志们注意几点重要的疏忽。首先，我们没有听到关于最近四年来国际联盟活动的任何一点意见。诚然，有一处提到，需要把国联砸得粉碎，但是提纲中仍然一点没有谈到它在近4年的活动，也没有谈到它所起的重要作用。决不能忽视这个强盗窝，在那里策划着并执行着形形色色的阴谋活动。国际联盟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互竞争的中心、欧洲资本主义同美国资本主义斗争的标志和反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当然，我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谈得很细，只要提几点就够了：国际联盟在瓜分委任殖民地方面起了什么作用，它在

对小国的关系上是怎样执行大国意志的，它又是怎样组织国际经济会议，在阶级合作的基础上把周围的改良主义工会和合作社运动发动起来反对革命力量的。我还要提一下所谓的裁军会议和英国打着国际联盟旗号竭力动员一切力量来组织反苏统一战线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忽视国联的作用难道不是错误吗？同样不应忽视资产阶级已经进行了两年的运动和凯洛格最近的建议。所有这一切都是战前 1912 年海牙和平会议的回光返照。当时就有人说，国际仲裁能保证和平，军国主义分子也不惜花费金钱去增强人们对和平主义的幻想。这同样是准备世界大战的总链条上的一环。现在我们又有凯洛格关于宣布战争为非法的建议。对这个建议同样应看作是对战争的准备。

请允许我对报告中叙述阶级力量重新组合的部分提几点意见。我觉得，这部分对工会和合作社的地位阐述得不够详细。

关于后者，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和提纲都完全没有提到国际合作社运动。请从头到尾读一遍提纲，你们不会看到一句关于国际合作社运动的话。然而，现有的合作社社员已不少于 5 000 万人，成立了国际合作社联盟。该联盟在我们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曾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过一次代表大会。在准备孤立苏联和散布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幻想方面，该联盟起的作用不比改良主义工会小。这个联盟与国际联盟经济会议统一行动，共同反对苏联的合作社。与此同时，英国合作社履行着某种帝国主义组织的职能，表现在对帝国的忠诚，帮助帝国茶树种植场发展，派代表去庆祝大英帝国的国庆，并且参加了反共宣传活动。能够忽视这样的运动吗？难道这些事实还不够严重？但是，无论在提纲中，还是在布哈林同志的报告中，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一个字也

没有提到合作社，也没有考虑到共产国际在合作社运动方面的任务。这个疏忽应当纠正，此外还必须讨论党在合作社组织内的工作问题，并作出明确的指示。

至于工会，提纲和报告倒是给予了较多的注意，但是所谈的也只是个别国家的工会情况，而没有就世界范围内的工会工作提出总的国际方针和指示。可是，对工会的攻击已成为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事实难道没有巨大的意义吗？英国的反工会法案并非英国特有的措施，它代表着全世界资产阶级对工会的态度。受到资产阶级打击的是共产党和工会，而不是社会党和第二国际，这个事实有其重大意义。我觉得，从这里可以吸取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也就是说，必须把改良主义工会作为一方，把改良主义政党作为另一方，在二者之间加以区别，因为下列事实同样有着不小的意义：进攻目标是指向工会，哪怕是由改良主义领袖领导的工会，但决不是指向改良主义政党。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同样不应忽视。

其次，资产阶级不得不采取措施反对工会运动的这一事实说明，工会内部正在逐渐实现革命化过程。这个进程会引起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将阻碍工会在准备对苏战争方面以及在全面宣战时再扮演过去的那种角色。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还觉得，在对国际状况作分析时，不谈红色工会国际、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太平洋各国工会的状况，不对这整个国际工会运动及其内部的进程提出一个总的看法，那就是在评价资本主义力量和革命力量，即拥护战争和反对战争的两股力量时忽视了一系列因素。依我看，在提纲定稿时应当予以改正。

我还想说几句关于另一个被疏忽的问题。英国同志们对提纲中完全不提爱尔兰这一点不可能无动于衷。请你们相信，即使共产国际可以忽视爱尔兰，但英国帝国主义是不会忘掉爱尔兰的。爱尔兰在同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曾经起过并且还将起着巨大的作用。不用说，我们可以在总的谈到殖民地国家时也涉及到爱尔兰，但是我认为，爱尔兰的状况需要特别提出来，因为共产国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国家是不够重视的。我们已经好多年致力于建立爱尔兰共产党，但是，看来它尚不存在，当然，尽管很难相信在爱尔兰国内不具备发展共产党的条件。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在专门委员会上得到讨论。该是共产国际和英国共产党对此作出某种最后决定的时候了。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对英国共产党作出明确指示是必要的，这将使英共能够在放手发动那些直接向党靠拢的革命力量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爱尔兰运动不仅存在于爱尔兰，它在英国也有，但是目前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与爱尔兰革命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妨碍着英国共产党继续自己的工作和不断发展英国的革命势力。我们希望结束这种状况，我要强调，专门委员会应当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

爱尔兰革命运动近年来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不断地燃起反英的革命火焰。无需怀疑，爱尔兰民族主义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百年斗争可以非常成功地利用来发展那些正在同英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力量。

我想代表我们代表团再谈谈美国共产党的问题。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已经听到了对波共党内派别活动的严厉批评。我们还了解到美国共产党内也有严重的派别斗争。我本人在美国委员会工作过，那里讨论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注意。我很高兴我参加了委

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已消除了美共党内斗争，因为问题涉及的是政治分歧。

我们代表团希望代表大会能考虑到有必要尽一切力量去防止美共党内发生新的派别磨擦。既然我们消除了美国同志间的政治分歧，所以我们就创造了一个有助于统一的紧密团结的党尔后发展的局面。

最后，我应当非常满意地指出，提纲内列入了专讲共产国际执委会情况的一节和提出了加强共产国际领导的建议。依我看，各国代表团应当对这个问题给予最大的重视。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我有一年半的时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担任英国共产党的代表，根据经验我应当直率地说，我们各国党还远远没有掌握国际主义观点，没有认识到自己有义务把共产国际的中央机构变成真正的领导机关。根据经验我可以说，共产国际机构的成员流动性太大，各国党派去的同志只工作一个短时间就又离开了。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们到这里来，只是为了与同志们谈一下他们党所遇到的困难，随后便匆匆地重新回到自己支部的怀抱中去了。世界革命的真正领导权还没有完全集中在共产国际。不仅如此，我觉得最近几个月来，这方面的情况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坏了。我请求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团讨论这个问题，并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共产国际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国际领导应当大大加强，共产国际要成为国际领导机关，而不仅是那些只关心自己问题，在问题解决后便回到自己国家去的党代表们的集会之所。只要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我们就不可能在把共产国际变成国际共产党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如果各国共产党竭尽全力使共产国际具有真正国际领导机关的性质，那么共产国际必将充满生机，而

我们也将成为我们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中的真正动力。我们应当不仅把共产国际看作是解决我们争端的法庭，而且要把它当作我们争取世界革命的斗争中的领袖和领导人。

麦克唐纳（加拿大）：

加拿大代表团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对国际形势所作的描述。我们很清楚，加拿大共产党面临的问题与我们一些较大的支部的任务相比，其意义要相对地小一些。然而，由于布哈林同志已经谈到的英国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加拿大在世界总的政治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不久的将来它必然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必须指出，在关于加拿大状况的问题上，无论在我们支部，还是在共产国际内，都有很大的摇摆。最初建议我们党采取反对英国资产阶级，甚至反对英国王室的斗争策略。按照这一指示，我们应当通过加拿大资产阶级领导人来进行斗争，因为当时把加拿大的资产阶级看作是或多或少受到压迫的资产阶级。可能在1924年这样做是对的，但是，加拿大资产阶级最近时期的行为迫使我们改变了政治路线。现在应当把加拿大资产阶级列入英国帝国主义的政治同盟者一伙。

在我谈到加拿大必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时候，我指的是以下情况：在上一次大战期间，加拿大提供了一支40多万人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加拿大拥有巨大的金属资源。且不说黄金，它拥有丰富的锡、铜、锌的矿藏，提供的镍占世界总开采量的90%。向这个工业投资的是蒙德控制的英国资本（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听到很多关于蒙德主义的话）。布哈林同志已经指出，加拿大把自己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同美国拴在一起。他又指

出，不仅加拿大，而且还有澳大利亚也同美国帝国主义勾结得越来越紧密，美国帝国主义在加拿大的霸权已经有了保证。然而，在某些方面情况毕竟不是那样简单：尽管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达到了30亿美元，占美国在国外的资本总额的40%，但是，英国资本仍然在加拿大继续起到重要作用。不过重要的不仅是这后一种情况。重要的是，尽管英国帝国主义在加拿大的经济地位比较软弱（无疑这是由于英国帝国主义总的实力软弱的缘故），但是英国帝国主义依靠其到处密布的帝国组织网，仍然起到极其反动的作用。在加拿大存在着诸如“不列颠帝国之女”、“帝国之子”之类的组织（这是一种广泛的学生军训组织），为此常常有一些英国帝国主义的密使打着“帝国代表团”的幌子从英国来到这里。英国帝国主义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甚至渗透到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去，毫无疑问，一旦英国同苏联，或者同美国发生战争，加拿大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将使加拿大发生严重的政府危机。尽管加拿大自由党政府采取了有利于加拿大“独立”的一系列措施，然而加拿大资产阶级被内部矛盾搞得分崩离析，根本不可能找到实现加拿大完全独立的正确路线。在讨论洛桑条约期间，麦肯齐·金声称，加拿大资产阶级应当从三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是完全独立；或者是并入美国；或者是走向民族独立的道路并在帝国内部逐步取得完全的独立。然而，尽管在签署凡尔赛条约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如：要求在道威斯委员会内有加拿大单独的代表席位，独立自主地与各国签订条约和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任命加拿大驻华盛顿公使，不久前决定任命本国的驻日公使和驻法公使，——尽管实行了这些步骤，应当说，加拿大的自由党总理在自己的讲话中总是反复声明对不列颠帝国的忠诚，并且说加拿大将继续实

行他称之为旨在加强不列颠帝国本身的政策。

必须指出，加拿大甚至在太平洋也必定会起到重要作用。加拿大西部港口的航运现在已比东部更加繁忙。任命加拿大驻日公使一事证明，这是比加拿大资产阶级所作的一般姿态更为重大的行动。1926年加拿大对中国和日本的出口超过6 100万美元，比1925年增加了百分之百。

上述种种使加拿大代表团不得不强调指出，尽管爱尔兰、加拿大、南非联邦和澳大利亚的问题当然不如中国、印度、埃及和其他被压迫国家的问题那样意义重大，但是前几个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应当促使共产国际即使不是现在，至少也在殖民地问题委员会里，指出比迄今为止更加明确的路线，以便所谓自治领地的各个国家内的共产党进行工作。

在加拿大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明显地表现出布哈林同志所说的三个时期。布哈林同志指出，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单纯地讨论某一个别国家的危机，而应当与世界资本主义总的形势联系起来看待它。最近几年，加拿大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1921—1924年，加拿大工业的发展还落后于美国工业的发展，但是在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加拿大的资本主义开始繁荣起来。

我的时间太少了，因此不可能引证许多事实和数字，但是我仍应指出其中的一部分。与1919—1924年时期相比，工人就业指数现在是105。加拿大工业部门的工人现在比加拿大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与此同时，加拿大也出现经常的失业现象；在1921年危机期间，加拿大工人总数的25%，即大约有20万人

是失业者。目前，按最低统计数字，也有 10 万人失业。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在听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以后，恰恰是在并非经济危机时期，而相反地是在加拿大资本主义最繁荣的现在，不得不研究失业问题。

加拿大对英国的贸易不断下降。目前，加拿大从英国的输入只占加拿大进口总额的 16.7%，即使把从大英帝国所有地区的输入计算在内，也只能达到 22.3%。加拿大向大英帝国各地区的输出仅占加拿大出口总额的 39.5%——这无疑是相当大的比重，但毕竟是在下降。从美国的输入达到加拿大全部进口的 65%，而向美国的输出达到出口总额的 38.5%。在炼钢和采矿工业（煤和金属的开采），以及纺织和化学工业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在这方面，合理化起了很大作用。最近几年成立了 30 家大型托拉斯。目前在加拿大一共只有 11 家银行。银行联合会近几年来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两家加拿大银行所拥有的资本相当于其余所有银行资本的总和。

加拿大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与 1917 年相比增加了 40%。1917 年的电能每个工人平均可有 5.2 马力，而现在每个工人可有 10 马力。

在结束我关于加拿大经济状况的意见以前，我还想再谈几句布哈林同志已经涉及到的问题，即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和国家是怎样收买社会民主党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对加拿大资本主义来说不是一件新鲜事。从电力工业一开始出现之时起，电能就已经被政府、国家监督下的公共委员会，以及各省市当局所掌握。本国的铁路属加拿大资产阶级所有，资产阶级通过政府的委员会行使自己对铁路的权利。

他们对工会上层进行了收买（我之所以说工会上层，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还未能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加拿大工联代表大会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人数最多的一个组织，拥有在铁路、建筑业等受保护部门内工作的工人 14 万人，加拿大工联代表大会主席是加拿大政府铁路的经理。代表大会的秘书是加拿大政府官方出版社的社长。不仅如此，在最近 10 年中，找不到一位劳工部长在未被任命担任部长职务前不是著名的工会官员。并且由于国家经常干预工业部门的冲突，这个劳工部长职位就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

所有这一切表明，布哈林同志作的分析对加拿大完全确切。加拿大共产党的工作特别艰巨。我们在同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首先提出了加拿大独立的口号。当然，加拿大不能算是殖民地，但是严格说来，也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诚然，加拿大在外交方面越来越多地独立行事。在英埃冲突期间，它要求从条约草案上除去它的签名。在与苏联断绝关系的问题上，加拿大虽然跟着英国帝国主义行事，但是麦肯齐·金却说什么，加拿大政府是由于本身准备承担风险才这样做的，它根本不是在这方面仿效英国，而是从某个时候起自己就已经打算与苏联断交了。尽管这样，由于英属北美领地法的制订，目前加拿大仍然与英国帝国主义有联系。加拿大工人提出的社会要求与这一法令的生效密切相关，因为这个法令明显地、确切地把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之间的行政权和立法权区分开来。

这项关于英属北美领地的法令保证了加拿大参议院的存在。它不是选举产生的机关，而是由经过任命的议员组成的，并且这些至关重要的任命也受到这项法令的保证。

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独立的加拿大”的口号没有实际的内容，因为加拿大资产阶级不是受压迫的资产阶级。我们很乐意承认是这样。但是，与此同时，加拿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和它同帝国主义的合作，以及共产党为争取社会立法，如失业保险法、老年救济金法、最低工资法，等等，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进行的一切斗争，——所有这些都与废除英属北美领地法的问题密切相关。这项法令是维系加拿大与英国帝国主义的纽带。我们不得不与美国帝国主义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工会官僚中的代理人进行斗争。既然这涉及到工会运动，我们就提出了加拿大完全独立的口号。这个步骤无疑地使党处于困难的境地，因为加拿大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都参加了美国劳工联合会。针对我们的党发起了一个强大的运动，直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工会。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联合未参加组织的工人。这样的工人共有 20 万。属于炼钢、采矿、纺织、木器和造纸工业。在汽车工业也有大量非组织工人，不久前我们已着手去联合他们。有时我感到，在对待关于组织非组织工人的可能性的问题上，我们的视野过于狭窄。

我们认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们不会去联合加拿大和美国未参加组织的工人，而这是共产党或工会左派工作人员应当去做的。我们似乎确信，只要我们不着手去做，这些工人将始终处于组织之外，而美国劳工联合会也不会去做把他们组织起来的任何尝试。然而，必须指出，如果说美国劳工联合会并不想把非组织工人吸收到工会中去，因为这些工人是潜在的革命力量，但它仍然会试图把加拿大汽车工业的工人组织起来，并且无疑地也会努力加强对美国汽车工业工人的影响。既然我们承认有必要去组织工人，那就不应自己欺骗自己，期望美国劳工联合会

将在加拿大袖手静坐，一直等到我们认为适宜动手做这项工作的时候。

在我们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不得不一方面同美国帝国主义在工会方面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同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近年来对加拿大的大量宣传进行交锋。

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加拿大的法裔居民，人数超过了 200 万，在上一次大战期间起过重要作用。魁北克省曾经是那些希望逃避应征者的天堂。曾经对加拿大法裔工人进行过兵役登记，但根本拿他们毫无办法，因为他们烧掉了登记处。然而，目前为了使英国帝国主义深入到加拿大青年中去而实行的所谓武备（军训）制度，恰恰是在魁北克——加拿大的法兰西族省份，比加拿大的其他任何省都扎根得更深。安大略省被认为是英国帝国主义的中心和心脏，而且这个省的工人阶级人数比魁北克省多，尽管如此，但是英国帝国主义关注的却是在魁北克加强和扩大武备运动。这样一来，该省在保卫大英帝国方面就表现出比所谓“忠诚的”安大略省具有更大的积极性。

再重复一遍：一旦英国同苏联或者同美国作战，加拿大都将发生严重的政府危机。关于保卫苏联的问题，不久将派出第一个加拿大工人代表团或工会代表团到苏联去。在组织援助饥民期间，有相当大的一笔钱正是在加拿大工人中募集到的，这使我们有理由期望，我们一定能够顺利地开展一场在加拿大和苏联工人之间建立联系的运动。可以通过组织苏联之友协会和派遣工人和工会代表团到苏联去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不仅以此来巩固相互的联系，而且要发动加拿大群众来保卫苏联。

加拿大共产党有很多弱点，对此现在就无需再说了，因为无

论是共产国际，还是加拿大共产党本身，都完全清楚这些弱点。但是，我们期望，我们将来能够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共产国际内部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期望，较小的党的问题将得到比迄今为止更多的关注。不用说，共产国际无论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对自己的支部，都是按照其重要性来区分的。当我们来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就很好地了解这一点。然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正在加剧，特别是在加拿大，这种矛盾尤其尖锐。面对着日益增强的竞争必将导致英美帝国主义之间发生冲突的这种形势，我们应当认识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自治领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比过去更多地注意这些问题，使我们这个不大的支部能够按照列宁主义精神工作，并无愧于共产国际支部的这一称号。

贝津（南非）：

我注意到，在讨论布哈林同志的报告时，每个发言的人都说：“对我们不够重视”。显然，我们不得不代表南非也说这同样的话，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事业是重要的。非洲是一个有 12 000 万人口的大陆。我不可能谈许多关于非洲更多地区的情况，而只是试图说明一下南非被奴役的种族的社会组成。确实，我们应当说，在布哈林同志的讲话以及共产国际的文献中总的来说表现出对这些种族的漠视。理论上我们都懂得殖民地运动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现在我就不说了。至于南非无产阶级的意义，我同意福特同志的意见，即共产国际由于轻视黑人无产阶级的作用而犯了极大的错误。要知道，归根到底殖民地群众的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殖民地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土著居民的斗争目前还不可能导致武装起义。这就是说，他们应当依靠自

己的经济武器——罢工和进行政治斗争，现在很难指望比这做得更多的了。不过正是在经济罢工方面，南非无产阶级大概同印度无产阶级一样，表现出非常大的积极性和毅力。

不用说，非洲和甚至南非的大部分黑人居民不是无产阶级，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居民中农民的人数多于无产阶级。但是不管怎样，在非洲，遭受剥削的居民人数要比可以严格地称之为工人阶级的那一部分多得多。在西非，形式上自由的农民也受到剥削，因为他们从事橡胶收割工作。在南非，我们人数众多的农民为矿场和其他大工业部门以及为农场提供了工人。这样，这些农民部分地从事农业，部分地以当工人来挣钱谋生，因此南非的工人阶级实际上范围很广，斗争时，作为土著居民人数最多的一部分，他们当然地参加了斗争。

既然说帝国主义确实是靠殖民地来养肥自己的，既然说帝国主义力量正是建立在殖民地的基础之上，殖民地是它的主要支柱，为它提供超额利润，并使它能够把在本土已经不可能取得足够利润的资本分布到各殖民地，那么，创造这种利润的工人阶级应当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我们殖民地，同其他殖民地一样，有着规模很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南非采金工业是第一流的资本主义工业，对资本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关于黄金的开采情况，决不能说它是“落后的工业”；相反的，它达到了高度的发展阶段。我们这里同样有制铁和炼钢工业，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大型企业。你们可以看得出，我们国家并不是一个中世纪的、封建的农民国家。因此我们工人阶级的力量具有巨大意义。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工人运动中殖民地的部分看作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它无疑是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非常重要

的武器。除此以外，殖民地工人的劳动在使宗主国形成失业大军方面起到很大作用。造成失业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之一是一系列工业企业由宗主国迁移到殖民地去。毫无疑问，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失业人数增多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样，我们的“不文明的”工人（这是有人对我们这里工人的贬称）在对资本主义的进攻中所起的作用，可能并不小于譬如美国那样的高度文明的工人。

当然，南非民族主义工人中进行的运动还只处于襁褓时期，但这是一个健康茁壮的婴儿，他正在迅速成长，并乐意接受我们的宣传。我们的黑人工人是真正的典型的无产阶级，无愧于工人称号，比任何人也毫不逊色。尽管我们的工人与农民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他们作为被奴役的种族，处境特别艰难，然而我敢说，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不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工人逊色的典型的无产阶级。他们遭到惊人的剥削。在我们非洲，主仆之间，雇主与工人之间、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是这些关系的最典型的例子。约翰内斯堡的第一次黑人罢工是从事最齷齪、最受鄙视的“卡夫尔人”^①劳动的黑人清洁工所举行的罢工。在约翰内斯堡有我们为黑人举办的一所学校，在那里我们用《共产主义宣言》作为教材，工人们——一些从工厂、矿场和作坊来的真正工人就按照这份教材进行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我们学习了《共产主义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表述，我们的学员在认真研究了所学的内容和经过认真讨论之后，总是同意宣言中提出的每一个最细小的问题，认为对这些问题的阐述都是多么地适合于他们自己。他们说：“我们也是这样地成了工人，我们同样地被赶出我们的土地

^① 南非操班图语的居民。——译者注

和被赶到工业劳动市场，我们同样地失去了家庭生活、财富和文明的生存条件，等等”，——同欧洲历史上发生过的完全一样。此外，黑人工人比欧洲工人还有一个优越性，即他们没有受到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思想的污染（除外来的宗教外），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他们的革命化。确实如此，我们在南非成立的一些工联已申请加入红色工会国际。诚然，以往曾经是南非庞大的黑人工会的工商业职员工会投靠了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但是，共产党发现了这个工会由于修正主义的领导已经与我无益，便决定组织新的工联，这些新的组织已在罢工火焰中经过了战斗洗礼，并且正如我所指出的，正在申请加入红色工会国际。

我声明，共产国际对殖民地群众这方面的活动简直太少关注了。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中我读到了一条论点，根据这个论点，现在有两支主要革命力量：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的“群众”。请允许我对这样过于笼统的划分表示抗议。我们国家的工人不仅仅是“群众”，他们同其他国家的优秀无产者一样，也是真正的无产者。纲领草案中规定殖民地只要完成一项任务——举行反帝起义。这一切很好，但是我应当说，在我们南非曾经发生过的唯一的一次民族运动不是黑种工人进行的，而是荷兰民族主义者发起的。荷兰民族主义者得到自己的一份好处后，现在已与英国和好：他们同意了那些许诺他们徒有其名地实行独立的陈词滥调，因此对他们不可能再寄予特别的希望了。当然，如果南非继续开展民族运动，那很好。但是，如果开展工人阶级运动，我们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难道一定要说，所有殖民地不管它们各自的特殊条件，都只能起同样的功用，也就是一定要说明反帝起义是殖民地的唯一任务，这才是正确的吗？那又怎样来看待殖民地的无

产阶级呢，为什么他们的作用要受到这样的限制？无论在纲领草案中，还是在布哈林同志的讲话中，都没有提到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本身，也没有谈到这些殖民地工人的阶级力量。有人认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他们将始终是消极的。

有一次在同一位英共党员同志的谈话中，我曾经发表过现在我在这个讲台上所谈的观点，他回答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呢？请你们回想一下英国工人阶级在对待资本主义、解决组织问题等等方面的多年经验。要知道所有这些你们都没有。”这我完全同意。但是要知道，我们正在遭受资本主义制度下最残酷的剥削，我们充满着战斗精神和斗争决心。那还需要什么呢？我们没有预料到资本主义在我们这里会得到发展；它自己突然出现，它来时“全副武装”，已经处于高度发展阶段。

对欧洲“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群众”所作的这种区别，难道不是我们的“工人贵族”对黑种工人所持态度的准确的再版吗？白种工人的种族“偏见”不在于他一定要杀死黑皮肤的人，而在于他不把后者当作自己的工人同志，而看作是当地“群众”的一员。我们共产党宣布了并且证明了，黑人工人同一切其他工人一样也是无产者。我在这里要向共产国际强调这一点。如果你们把黑人也看作是工人，是无产者，你们就必须完全改变你们对现状的看法。我们应当摆脱这种隐蔽的种族偏见，摆脱“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界线”。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把黑人工人称作粗野的、落后的、无知的、退化的，如果愿意，还可以称作野蛮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确不会读，不会写，但是他们工作，他们创造利润，他们正在组织起来，并将进行斗争。他们占居民的绝大多数，未来是属于他们的。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将成为不仅是殖民

地的，而且是全世界的统治阶级。在我们今后的代表大会上，我们将看到非欧洲国家的代表不是仅占2%或3%不到，而是占80%或90%，也就是达到真正与殖民地整个工人阶级力量相适应的那个数量。

我应当说，在对待殖民地工人群众的问题上，红色工会国际似乎比共产国际更为正确。它能考虑实际情况，号召殖民地工人加入红色工会国际的队伍，即作为工人而参加工会组织。

共产国际好像是一根世界链条，而链条的坚固与否是由它最弱一环的坚固性所决定的。像我们这样一些小党也是链条中的一环。目前对我们的这种态度不会加强，而相反地，将会减少我们的作用。既然我们这些党的力量是软弱的，那就应当加强它们。必须改善联系。当你们了解到，大约六个月前我们是处于五六年没有收到共产国际一封信（除通报外）的状态时，你们也许会感到惊奇。我觉得，应当立即重视此事。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请求把我们看作是工人群众的代表，而不要把我们当作非亲生子，当作某些未定型的“群众”的代表。当我来到这里以后，共产国际有一位积极的工作人员对我说，“我们要对你们进行攻击”。我应当说，这是相当拙劣的接待方法，而被接待的这些代表是由绝大多数成员为黑人工人组成的党所派出的。对这个党的代表们采取这种手段，并且在尚未进行某个问题的讨论之前就向他们宣布，说什么“我们要对你们进行攻击”，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共同讨论怎样相互加强自己的力量。同志们，我应当说，在我们党内，不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是不会这样互相对待的。

我们认为，必须改善共产国际各种不同支部之间的联系。我

想以几次罢工为例来表明，这种联系的不能令人满意已达到了何种程度。大约三四年前，南非举行了一次海员罢工，这次罢工局部地波及到澳大利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到英国，并且我们在这次罢工中起了领导作用。但是实际上，我们不仅同共产国际，甚至同英国共产党都未能建立联系。我们认为，必须改善各党之间的直接联系，这种联系就像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共产国际各支部之间的联系那样，也是必需的。我完全同意墨菲同志所说的，不应把事情看作是似乎各国党来到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目的，只是为了每个党不管其他党怎样都要单独地作一次忏悔。我们到这里来首先是为了在各国党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这就是指我们，指各国共产党，正如墨菲同志正确指出的那样，是我们——共产国际各支部——担负着建立世界革命领导力量的任务。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在完成这项任务方面做得很少，在我们面前有着大展宏图的广阔天地。

除此以外，还需要说的是，必须非常仔细地研究非洲状况。来自整个辽阔的非洲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只有一个南非共产党。在我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曾有埃及的代表，从那时起似乎常有西非代表参加。非洲是一个非常广阔，但还很少被我们研究的地区。南非的状况显然不同于这个大陆其他部分的情况。由于本国的政治气氛，南非是所谓的“白种人的国家”。白人不仅作为殖民主义者、土地所有者或官员可以生活并确实生活在这里，而且作为各个阶级都有其代表的整个民族生活在这里，这个民族在好几百年前就已经定居在那里，他们的祖先是荷兰人和英国人。

其他殖民地同样有其不同的条件，需要更深入地加以研究。例

如，在两种资本主义管理方法之间存在着差异：一种是英国官员的管理方法，这些官员只是在任期内留在殖民地，并且与当地居民毫无共同之点；另一种是法国的管理方法，更确切地说是强迫当地居民同化的方法。在“东部”与“西部”的两种管理方法之间同样存在着差异：一种是剥夺土著居民的土地，另一种是把居民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共产国际应当比现在认真得多地研究所有这些问题。我希望，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将会有各个非洲国家——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代表参加，他们必将比我们更好地阐述非洲全体居民的需要。我们还看到一种惊人的无知现象。例如前几天有人在这里就我们黑人的情况向我问道：“他们是不是荷兰人？”不久前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出现了关于南非的一篇令人目瞪口呆的文章，对这种文章还不如称之为奇谈。它完全是用对这个殖民地状况的假报道编成的。这样的东西将会玷污我们正式的机关报，如果可以这样称呼这家报刊的话。诚然，可能有人回答我们说：“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寄去一些优秀的文章？”问题在于我们从前是寄去过文章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忙，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太少了。要知道，我们的无产阶级，尽管我已经说过它有种种优点，但大部分人是没有文化的。由于这一切应该原谅我们。不过，对这个问题必须加以研究。

但是，在对殖民地群众给予应有的重视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非洲白种工人的成就。他们举行了革命大罢工，我觉得，他们有能力再一次举行这样的罢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能够为削弱英国帝国主义作出很多贡献。

我们南非共产党现在是各国共产党链条中宝贵的一环。如果我们党得到巩固和发展，如果对待我们的态度像我们应该得到的

那样，那么我们可以期望成为这个链条中强有力的一环，并因此能够利用由于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薄弱点而出现的状况。我们将能够在削弱和消灭资本主义的一个环节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完成《共产国际》第一辑的脍炙人口的封面所表示的事业：在这个封面上绘有一条锁链，它绑住了整个地球，但是其中俄国的一环已经被斩断了。

会议休会。

第七次会议

(1928年7月24日)

主 席：伊列克

致贺词。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邓恩（美国）：

我同意布哈林同志提纲的基本路线，并认为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点：

1. 战争的危險性和反战斗争——这是指美英之间和美日之间战争的危險性；指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保卫苏联和中国革命；

2.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激化；

3. 同工会官僚分子和社会民主党积极进行斗争；

4. 集中我们的力量吸收未加入组织的工人参加新的工会，这对美国特别重要；

5. 加强共产党在日常斗争中以及在具有更普遍意义的群众战斗中作为无产阶级领袖的作用；

6. 这个时期的主要危險来自右面，因此必须同右倾趋势和危險进行有力的斗争。

在提纲关于美国的一节中，我建议详细地阐述下列各点：首先是美国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激化和成熟；对群众剥削的日益增长和群众的左倾变化；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不平衡的巨大意义；工人斗争准备的不断加强；有利于壮大党的队伍和提高党领导作用的条件日益增多；中央委员会右倾路线的纠正；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我们党纠正这条路线的必要性；坚决执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美国的决议；这个时期不应大张旗鼓地开展组织工人党的运动和斗争，这种口号只应作为宣传口号使用；重点应当放在黑人工作和同党内外的白人沙文主义倾向的坚决斗争上；必须在最近期间立即建立地下的秘密机构。最后在起草美国工人运动的这一部分时，主要应从工人运动的危机及由此产生我们党的任务的角度来叙述。

目前形势（这里是指美国）的特点是：使美国帝国主义遭到破坏的各种基本因素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美国统治阶级公开地准备以武力把自己称霸世界的计划强加给其他国家；对工业和群众加强军国主义化；把全国划分为若干军区；对美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加剧；世界市场缩小，国内市场容量减少，生产过程加快实现合理化，目的是把改组工业的负担转嫁给群众。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赤裸裸地表现为资本家阶级的执行机关。托拉斯化的结果成立了许多资本主义联合企业，这些公司与国家政权一起，甚至在工资和工作时间等问题的次要冲突中共同对付工人。工会官僚分子和社会党领袖彻底放弃了阶级斗争。所有这些因素现在比过去快得多地导致广大群众对美国民主传统的失望，从“永久繁荣”的幻想中清醒过来，不再被工会运动头目、改良主义分子、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之

流虚假的正直所欺骗。

这些特点预告阶级冲突的加剧和广大群众斗争的发展。我们党应当准备好挑起领导这场战斗的重担。我们应当为此着重指出，美国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加剧再加上世界冲突的发展，将使美国统治阶级难以实现其工业扩张，不能像过去那样轻而易举地对工人群众的思想 and 行动继续实行统治。

美国再也没有空闲的土地，再也不存在劳力的不足（尽管实际上已经暂时停止外来移民），而这两者对加快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来说，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指的那样，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两个因素。当今技术的日臻完善只能使工人对昨天更加丧失信心。规模不断增大的经常失业现象现在还只是开始。美国帝国主义不得不采取特殊措施以便阻止群众战斗的爆发，如果发生，就进行镇压。为此，我想谈一个我认为在讨论时曾经模糊不清的问题。

指出美国没有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这还不是对下述论点的满意回答：即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盼到美国群众左倾势力的增长和普遍性群众战斗的发展。不仅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由于美国的特殊条件，在美国群众性工人政党产生以前就会发生尖锐的革命性大规模战斗。斗争本身会创造出群众性工人政党，而且这些战斗中有许多战斗将在这个党形成之前就爆发。我再重复一遍：只肯定美国不存在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并没有回答关于普遍性群众战斗的前景问题。我们党在执行正确路线和正确工作的情况下一定能够领导面临的战斗。

现在谈几点专门性的意见：

1. 为未加入组织的工人建立新的工会问题。我认为，提纲中这

个问题应当提得明确、清楚，因为在我们党内不仅对这个问题至今存在着很大的混乱，而且有着一种非常明显的趋势：歪曲把未加入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整个计划和整个纲领，把他们放在从属于现有反动工会的地位。在这里，我要指出在我们官方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与登载的佩珀的文章。洛佐夫斯基同志在谈到我们党的工会工作时，把它比喻为“卡德里尔舞”。佩珀在回答他时说，这是“却尔斯登舞”和“扭摆舞”。我不想参与洛佐夫斯基同志和佩珀同志关于他们两人中谁更懂得舞蹈艺术的争论，但是我可以这样说，佩珀同志在舞蹈方面所用的术语，比他在组织未加入组织工人的问题上使用的术语和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具体纲领要正确得多。我希望佩珀同志在进一步研究美国条件的情况下同样能掌握我们在重工业部门工作的正确术语，因为我认为“扭摆舞”和“却尔斯登舞”归根到底应当属于轻工业的比喻。

佩珀同志依靠的是“将有一批批群众加入现有工会”的理论。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这个可能性不下八次之多。我认为，对我们在美国组织未加入组织的工人的纲领来说，这个理论应予否定。它不能成为我们开展这个运动中各项工作的准绳。相反的，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力量集中于在重工业建立新的工会。认为我们运动的基础主要是现有工会的这种看法，完全没有考虑到最近两年来事态的发展和与工会运动中左派取得的经验，依我看这种趋势是右倾。现有工会在成立以后所进行的活动都是旨在反对在重工业部门劳动的大量未经训练的和半熟练的工人。官僚分子拒绝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我们应当把他们组织到新的产业工会去。只有在官僚分子保证不背叛的条件下，我们才能使非组织工人参加老的工会，但是很明显，官僚分子不会作出这种保证。

再谈第二个问题，即在美国黑人中开展工作的问题。正如提纲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我们党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很差，非常之差，犯有许多严重的错误。最近两年半中没有在黑人中进行过任何重大的活动，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对这项工作的意义没有正确的认识。有人说，南方的黑人群众是“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广泛的社会预备力量”，这种说法表明，一些领导同志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暴露出并未真正理解，也未正确评价农业工人和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者的作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也看到了这类不正确观点的例子。在红色工会国际的一份通讯刊物《黑人工人》上登载有《黑人战士》编辑约翰·欧文斯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取自1927年8月号《黑人战士》，这份杂志是美国黑人工人代表大会的正式机关刊物，而这个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影响下的一个组织。这篇文章暴露出最恶劣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它是向黑人小资产阶级，同样也是向白人资产阶级的投降书，表达了怀特曼同志、菲利普斯同志和中央委员会其他拥护者起草的声明中所包含的同一趋势。在这份声明中，他们要求取消反对私刑杀人以及反对对黑人采取不平等待遇的斗争。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确实是向黑人和白人小资产阶级的投降行为，是取消反对种族特权的斗争。这样的趋势必须最坚决地予以制止。

为此我就南非代表的发言讲几句。这是社会民主党式的发言，我认为，代表大会应当注意到“南非是白种人的国家”之类的说法。我认为，代表大会对这位同志只能给予谴责。殖民地人民，特别是千百万黑人工人和农民应当知道，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允许在这个讲台上发表这样的讲话。

现在说几句关于美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问题。英国同志在提

到美国共产党党内斗争时，殷勤地建议采用他们为消灭派别斗争而提出的传统口号。他们的口号是：“让每个人回家去从事自己的工作”。（喊声：“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个口号像一切老生常谈一样，是不错的，但是，在采用它五六年以后，在主要的政治分歧上斗争仍未停止，我们不得不作出结论：必须有某种更好的办法。我们当然欢迎我们英国同志的支持，正如欢迎所有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一样，我们也准备在将来去帮助英国共产党，在他们发生同样的派别分歧时帮助它解决好这些分歧。（笑声。）

最后，我认为我们党的危险来自右倾。许多同志都犯了右的错误，但是共产国际的习惯做法是保护这些错误。自我批评成了开玩笑。我们认为，现在有着强烈的右倾趋势，它表现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右倾政策中。在工人党的问题上，在反帝工作、黑人工作、工会工作等所有的群众工作中，都犯了右的错误。这些右倾趋势是个威胁，特别在战争危险成为世界局势的决定性因素的目前时刻，威胁更大。坚决执行提纲中指出的路线，实现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美国问题决议，特别是关于组织未加入组织的工人的那一部分，进行消除战争危险的顽强斗争，根据共产国际的路线调动党的一切力量参加群众性战斗，——所有这一切在最近时期将保证党得到群众的追随；所有这一切将帮助党出色地领导规模越来越大的战斗。当美国的群众组织起来并开始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时，这些战斗是一定会随之发生的。

奥尔布里希同志代表德国红色前线战士同盟代表团向代表大会致贺词。

当代表团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体与会人员热烈欢呼：“同志们，向你们致敬！红色阵线万岁！”

红色前线战士同盟代表团向欢迎者回报以三声高呼：“红色阵线，红色阵线，红色阵线！”

奥尔布里希：

同志们，德国红色前线战士同盟代表团应北高加索各工会的邀请，将继续自己的旅程到南方去。代表团受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委托向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致以兄弟般的革命敬礼。你们大家都熟悉在同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作斗争中诞生的德国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活动情况。4年来我们动员了大量的工人群众参加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战斗的阵线。现在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消除帝国主义的战争危险而斗争。德国红色前线战士同盟认真地注视着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所有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和策略问题。去年，我们亲自经历了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组织的几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在去年第三次全德集会期间，数十万盟员第一次宣誓“时刻准备保卫苏维埃”。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当前，为消除帝国主义战争危险和反对帝国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要求加强保卫苏维埃的斗争。几个月前，我们得到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革命反战活动的回答。资产阶级的前届政府便已打算取缔红色前线战士同盟。你们根据报纸的报道可以知道，我们举行了多么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动员了多么庞大的群众来对抗这种以取缔进行的威胁，你们同样知道，资产阶级在这以后终于未敢解散红色前线战士同盟。

我们在转达红色阵线向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祝贺的同时，还要指出，消除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斗争应当像过去一样仍然是革命运动所注意的中心问题。我们已经亲眼目睹日本武装干涉中国。而且我们同样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帮助和积极

支持下奉行了一项强硬的帝国主义方针。

社会民主党参加了联合政府。在它的领导下仍然执行着资产阶级集团老的方针。国内的帝国主义阵线一如既往地向着德国共产主义运动进攻。这是一项分裂群众组织，把革命力量从其中排除出去的方针。在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军备不断加强，改良主义分子正在实行一条最恶毒的共和民族主义路线。例如，在今年的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示威游行期间，社会民主党宣布说：当他们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建设德意志共和国和保卫德意志祖国的时候，共产党人却迫使自己的成员向苏俄宣誓效忠，并以未来美好生活的许诺来安慰他们。

社会民主党正在用这些方法驱使工人阶级作好战争准备。这一切更加促使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因而也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为保卫苏联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红色前线战士同盟代表团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任务，现在向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们庄严保证：

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将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继续自己的斗争。我们受20万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和红色青年突击队的委托向你们转告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盟员保卫苏联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活动情况。我们在把这一情况转告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时候，保证不仅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进行反战斗争，而且为了回答帝国主义分子所进行的战争准备，现在正竭尽全力争取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站到革命的反帝阵线一边来。我们保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我们将在所有企业、所有群众组织内日复一日地开展革命活动，我们工作的目的是要在德国和全世界

胜利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我们以协会的革命号召来巩固我们的誓言，这个号召已经成为德国所有革命无产者的战斗号召，它就是“红色阵线！红色阵线！红色阵线！”（热烈鼓掌。）

加香（法国）：

同志们，主席团认为有责任对我们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同志们的祝贺致谢。我们大家非常高兴地听到，德国资产阶级伙同社会民主党企图破坏红色阵线组织的最近一切尝试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前线战士同盟的代表们来到我们这里出席大会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他们建立的红色阵线正在日益巩固。处于红色阵线首要地位的是苏联的红军，跟随红军前进的有我们德国同志的强大组织，以及我们各国共产党的所有战斗组织。

让国际资产阶级不抱任何幻想吧，因为红色阵线不会止步不前，它已经渗入到资产阶级自身的陆军中去，它同时也在向帝国主义的海军内部渗透。

同志们，当帝国主义分子由于进一步扩张的需要而再度发动战争时（这场战争正在临近，战争的阴影已经投射到我们的地平线上），他们很快就会相信，他们的事情不会像1914年那样顺利。红色阵线已经成立，世界各国人民从俄军堑壕中首次听到的握手言欢，对世界无产阶级来说不再是空洞的言词，它已在全世界工人的心灵深处得到了反响。由于普恩卡尔的鲁尔远征，由于对中国的进军，由于摩洛哥的战争，“握手言欢”这个词就具有了生动的现实意义。早在1919年，这个词就曾鼓舞法国派到里海的分舰队的光荣水兵奋起斗争。

同志们，我们在此地集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制订遥远将来的

计划，我们从世界各地来此，是为了解决工人阶级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其中最主要、最紧急的一个问题，就是防止发生我们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同志刚刚所谈到的那种威胁着我们的战争。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应当给无产阶级发出指示作好应付灾难的准备，到那时一切将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到那时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拿出全部力量，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使这次通过的决议在各地都得到彻底的贯彻，并使资产阶级和整个世界帝国主义都感到心惊胆颤。

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现在十分惊慌。资产阶级知道共产国际的力量，它认识到，它不可能摧毁苏联的实力，一旦它侵犯苏联，所有劳动群众（社会民主党工人也不除外，我们将帮助他们摆脱其领袖的不幸控制）都将万众一心地奋起斗争，给资产阶级旧世界以最后的致命一击！

同志们，德国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同志出席我们代表大会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法国人和德国人，过去有个时期曾经是我们两国工人互相拼杀的见证人，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德国同志的号召，我们应当共同宣誓，决不让 1914 年事件重演，我们这一方面可以保证，法国无产阶级同样满怀决心建立红色阵线 and 同全世界工人兄弟般地团结起来。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欢迎德国工人们所要说的话，我相信，当我同我们德国朋友红色前线战士兄弟般握手的时候，我表达了所有与会者的共同感觉和激情。（热烈鼓掌。）

伊万诺夫同志代表军事经济工作者向代表大会致贺词：我们注视着西方资本家的每一步行动，他们正在准备新的毁灭性更大的战争。我们也注视着我们西方和东方兄弟共产党的每一个斗争

步骤，我们为它们的失败而悲痛，也为它们的胜利而高兴。我们完全支持我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和平政策。如果把战争强加给我们，那么我们将在各地采取各种措施向我们英勇的红军提供一切，使红色后方与红色前线构成一个整体。（鼓掌。）与此同时，我们将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把这场资本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

司图亚特（英国）：

为了答谢那些曾经进行和保卫过革命的同志们的祝贺，我们代表大会不仅应对苏联工人和农民在共产党和久经考验的红军领导下取得的巨大胜利，而且应对苏联无产阶级及其光荣的红军在最近 10 年来全力捍卫革命成果，表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谢忱。

我们欢迎德国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和红军代表的声明，并且高兴地、满怀希望地期待在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方面还落后于苏联的各资本主义大国的无产者能以联共（布）为榜样，表现出坚强的勇气和不可动摇的沿着红军道路前进的决心。正是红军把苏联变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堡垒，变成了全世界被奴役的、被剥夺一切权利的和受压迫的各国人民的希望。

伟大的荣誉属于共产国际，因为革命的红军把自己置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我们根据经验知道，这些无畏的战士在共产国际面临的大会战中决不会胆怯和退却，他们一定会在推翻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占据自己应有的阵地。

因此，我代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欢呼：

祝苏联红军朝气蓬勃，日益坚强，不断壮大！（热烈鼓掌。）

勒麦列宣读柏林革命工人的贺电：“柏林 50 万革命工人向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革命敬礼。正如德国共产党是德国

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领导者一样，共产国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

拉贾（印度）：

我代表印度代表团欢迎布哈林同志提出的提纲。虽然我必须承认，这个提纲还存在着错误和缺点，特别是在涉及印度问题的部分。

首先，布哈林同志谈到，英国帝国主义的政策阻碍着印度资本家所实现的印度工业的发展，但他却完全没有指出英国政府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立即开始实施的新的工业化政策。上述说法不完全对，提纲的有关部分应当仔细研究，因为既然采用编年法，那么对工业发展的阻碍是在实行工业化政策以后发生的。

其次，布哈林同志没有提到英国政府新的农业政策，这项政策的任务是实现农业机械化和采用现代耕作法，目的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法，建立富农阶级，以便最终提高农村购买力。

第三，他在提纲中完全没有提到，在印度不同的省内存在有数个工农政党，尽管不能否认，这些政党迄今为止曾是工人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组织者。应当说，由于这个斗争，或者像布哈林同志所说的，由于新的民族革命浪潮的高涨，必须给予某些通过工农政党领导着整个运动的我们的共产党员同志以应有的赞扬。

至于组织印度共产党，我个人是赞成的，并且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叙述的观点。我认为，大多数印度代表同样赞成立即建立一个强大的、有高度纪律性的共产党。在国内存在人数众多的战斗的工人阶级和赤贫的、政治上成熟的农民群众的条件下，那种认为没有历史所赋予的共产党的领导，工人阶级也能够

进行斗争的假设本身就是荒谬的。有人可能反驳我说，工农政党目前正起着共产党的作用。对此我的回答是，眼下这些政党也许确实工作得很好，但是因为这些政党的大门是不加选择地对所有同情改善劳动群众生活条件的人敞开的，所以迟早会出现这些政党被资产阶级及其仆从和小资产阶级等等控制的趋势。

与此同时，我应当说，印度共产党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工农政党作为辅助组织。鉴于中国国民党的背叛，我们不应过份乐观地看待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可能性。当然，我们应当利用和加剧外国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但是我们要记住，印度决不能重演中国的历史悲剧。我越是想到我们中国英勇战士遭受的沉重失败，就越是相信，在印度我们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它的任务是：把工人阶级和农民组织起来，夺取工会，利用辅助力量，组织青年革命运动并领导这个运动，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揭露资产阶级敌视劳动群众利益的一切行动，最后，组织对军队的宣传工作。所有这一切都要实现，以便最终推翻外国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在代表大会讨论共产国际纲领和殖民地问题时，我将更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在结束发言时，我代表印度劳动群众呼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不仅要制订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而且要着手实现它。在印度，我们将给欧洲资本主义的急先锋——英国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把印度从英国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是国际范围的问题，为此我请求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特别是英国共产党，同我们建立更紧密的接触，以便实现我们的共同目的。

科拉罗夫（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代表团总的来说同意布哈林同志就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所写的提纲，并将一致投票赞成。

我们代表团认为对目前时期的总的评述和提纲中根据对世界经济分析所得出的政治性和策略性一般结论是正确的。代表团完全赞同对共产国际某些支部所犯错误的批评和提纲中指出的为纠正这些错误及健全各国共产党而采取的措施。代表团特别欢迎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所采取的相当果断的措施。我们代表团觉得必须更加坚定地贯彻这些措施。代表团坚决主张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如果必要，也可采取政治和组织措施，以便消除波共党内危机。代表团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所说的话：不可能，也不容许在像波兰这样重要的革命战线地段上，让派别斗争造成共产党和整个革命运动分裂的危险。我们代表团还欢迎对罗马尼亚共产党采取的初步措施。今后仍须尽一切力量，使罗马尼亚共产党重新聚集自己涣散的队伍，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

我们代表团认为，布哈林同志想把自己的提纲表述得尽可能短一点的愿望造成了一些遗漏之处，依我们看，最重要的遗漏之一是提纲中没有分析农业关系。在分析世界经济时，农业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似乎被丢在一旁，被遗弃在黑暗的角落里。第39条中谈到必须深入开展和扩大各国共产党在农民中的工作，但是提纲中没有指出，共产党在这项工作中为什么有和有哪些成功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为深入开展和扩大这项工作的有利条件。提纲没有说明各国共产党必须在农民中深入开展工作的理由。

农业问题是各国共产党感到关切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毫无疑问，农业方面也呈现稳定状态。我们看到生产力在增长。但是，如果说这是国际范围的，即世界范围的增长，那么必须明确指出，欧

洲农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欧洲工业的发展。我们在工业、运输业等部门发展中看到的成就，并不是同等程度地再现于农业。因此许多国家正在采取旨在改善农业状况的特殊措施。德国已经把农业保护税率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奥地利已经实行了对某些农产品的保护制度。东南欧的农业目前也在经受极大的危机。在这里，农业的生产费用至今仍高于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水平。这就引起欧洲这个农业地区深刻的农业危机，这个危机对世界市场来说也是有影响的。所有欧洲国家的议事日程上都提出了旨在用建立信贷制度、发展合作社等等办法来帮助农业的一系列措施。

与此同时，农村中正在发生阶级分化以及社会和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世界大战后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反对过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富裕农民，本来已脱离了资产阶级，现在又重新投靠过去。这部分农民与大地主一样也得到资本主义政府的大力支持，并越来越紧密地与政府勾结在一起。结果，我们亲眼目睹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如果说现在美国建立农场主独立政党的运动已经减弱，那么这是由于大资本在农业中影响增强的结果。

在英国，自从自由党通过了劳合-乔治制订的农业纲领草案以后，英国的农场主就重新向资产阶级靠拢。在像奥地利这样的国家，“海姆韦尔”这个中农的军事组织成为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支柱。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由农民资产阶级和中农组成的农民组织，如“皮亚斯特”、农业党等等，都彻底转向资产阶级，和它勾结在一起，实行合作政策。在巴尔干半岛同样发生部分中农离开贫农和无产阶级倒向资产阶级的现象。有许多事实，例如：克罗地亚人的农民首领拉迪奇的叛变；罗马尼亚农民党同特兰西瓦尼亚资产阶级民族党的联合；保加利亚农民右派首领的叛变，他们拒绝

与工人党和无产阶级合作，而主张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实行与它们联盟的政策；资本对墨西哥农民的巨大影响，导致农民参加公开的反革命斗争，——所有上述事实证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富裕农民都出现了向右转的变化。

与此同时，在贫苦农民队伍中可以看到某些相反趋势的加强。大量贫苦农民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资产阶级政府的支持。因此这些群众日益左倾，不断革命化。一系列事实证明，贫苦农民群众日益激进。请看这样一些事实：德国小规模葡萄种植者举行革命发动和法国在预备役军人中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取得成就（须知预备役军人大多出身于农民）；波兰和其他国家农民组织发生分裂，这些组织中的左派脱离这些组织，采取行动同无产阶级合作并拥护工农联盟；保加利亚农民与保加利亚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革命发动；罗马尼亚不久前爆发农民风潮，农民不顾自己资产阶级领袖的背叛，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农民进行斗争，不久前这场斗争采取了街垒战的形式，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实，——所有这一切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贫苦农民的左倾化和革命化。

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指出，已经得到巩固和稳定的资本主义，其今后的发展将在新的条件下进行。布哈林同志列举了一系列新的条件，即苏联的存在、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等等。

但是我觉得，贫苦农民的显著左倾，他们脱离资产阶级和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也是资本主义今后发展所处的新条件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各国共产党应当特别注意农民问题，为什么必须把我们在农民中进行工作的方法加以发展、深入和合理化

的缘故。

由此而产生农民国际的工作问题。我应当完全坦率地说，我们不满意农民国际的工作，因为农民国际是独立的组织，这就是说，我们不满意农民国际内共产党人的工作。问题不在于个人的责任。毫无疑问，共产国际对这种不完全令人满意的工作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但共产党人毕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国际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共产国际的翻版，当然是拙劣的翻版。农民国际应当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它在对待农民群众方面应当研究出自己的独特立场，而不是完全仿效共产党。它应当制订自己的工作方法，它应当练就自己的语言，用这种不同于共产党的语言来同农民群众讲话。在这方面农民国际还没有起到自己应有的作用。它应当转变成我已经说过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的那些贫苦农民专有的群众组织，并在他们当中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这一口号进行鼓动和宣传。农民国际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此，它的特殊任务也在于此，它应当解决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关心农民国际的共产党人应当全力帮助它。现在，当战争问题这样尖锐的时候，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也着重指出的这项任务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不仅苏联国境毗连国家的农民群众，而且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都将在未来战争中提供大部分人力资源。

提纲十分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稳定的过程，没有丝毫模棱两可和犹豫不决之处。布哈林同志在这里直截了当地、非常肯定地、不加任何附带说明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稳定的过程就是按照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而进行着的。

但是，即使说这个过程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也不能说每个国家都存在这个过程，也不能说资本主义稳定的速度各国都一

样。由于受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不尽相同。资本主义的稳定也并非到处一样。由此应当肯定，布哈林同志提纲中作出的政治性和策略性结论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但是在实践中，在每一个国家，根据具体条件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对这些结论作某些修正。我在前面已经强调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巴尔干各国的稳定性是局部性的，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和极大的不牢固性。在巴尔干半岛，资产阶级不能为自己的阶级统治，为自己的政权奠定坚固的经济基础。

由于这一点，他们不得不采取法西斯手段。我不准备谈那些对巴尔干半岛资本主义稳定的缓慢进程和不快速度起影响作用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占有显著地位的，当然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在巴尔干半岛起极大作用国际金融资本。所有巴尔干国家都处于国际资本的最有力的影响之下。它们的发展只能按照国际资本主义认为可以和所容许的程度为限。大家知道，巴尔干国家是沿着把它们变成国际资本的殖民地的道路发展的。

但是，在巴尔干半岛资本主义稳定的不牢固性中也有着它的政治一面，即政治上的不牢固性。所有的巴尔干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国家政治危机。这个危机常常导致突然事件、内战和政变。巴尔干的内战没有结束，远远没有结束。但是，除此以外，那里的资产阶级还连续不断地准备军事政变和国家政变。试以个别国家来说，在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尽管不止一次地采取流血手段，但都未能迫使大部分农民服从自己的政权。他们未能使这些农民脱离无产阶级，摆脱共产党的影响，因此也未能孤立无产阶级和彻底扼杀无产阶级革命。与此相反，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思想在保加利亚的贫苦农民中至今仍然有着极其深刻的反应。

在罗马尼亚，我们看到同样的情况。罗马尼亚的寡头政治用进行土地改革的方法只是暂时地推迟了灾难的发生。但是，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也未能彻底压服农民群众。前一段时期发生的农民风潮就证明了这一点。

贝尔格莱德议会中的几发手枪子弹就绰绰有余地毁灭了年轻的南斯拉夫国家的联合和巩固的全部工作。这个事实证明南斯拉夫经历着深刻的危机。力图在全国建立领导地位的塞尔维亚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农民群众及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冲突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在不断加深。所有事件表明，资产阶级无力解决这个冲突和消除由此产生的经常性危机。南斯拉夫正经历着巴尔干国家中最深刻的国家政治危机，它比所有巴尔干国家都更接近于发生灾难的地步。

但是，要说明巴尔干的状况，这还不够。必须再加上巴尔干国家政治制度的彻底崩溃，它们的代议制的彻底崩溃。除了意大利以外，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统治制度都没有崩溃到像巴尔干国家这样的程度。巴尔干国家政权的崩溃是最彻底的。在巴尔干各国，政权的继承性不再存在，政府的合法性已经消失。各个政党攫取政权的唯一手段就是发动公开的或伪装的国家政变和军事政变。目前，在所有巴尔干国家中新的危机日渐成熟，这些危机必将导致新的政变。无论是在以资产阶级为一方，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为另一方之间的阶级斗争方面，还是在资产阶级本身的内部斗争方面，都面临着重大的事件。

我不想在这里谈战争危险的问题。这个问题留到专门的议事日程上去阐述。但是，我仍然应当指出，巴尔干的战争危险是最紧迫的危险，而且这不仅表现在建立反苏联盟方面。这种反苏联

盟的思想在巴尔干半岛当然也得到反应。英国帝国主义正竭尽全力和使用各种手段力图把巴尔干国家纳入反苏联盟。帝国主义在巴尔干半岛的矛盾和巴尔干各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引起严重的危机，这些危机随时随刻都可能变成战争。目前，战争已迫近巴尔干半岛的许多地区。大家都知道由于马其顿问题和阿尔巴尼亚问题所引起的严重的、尖锐的和资产阶级无法解决的冲突。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任何力量，甚至国际资本的全部力量都不能使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冲突得到和平解决。迟早这场冲突将比料想的时间更早地导致武装冲突。民族革命运动的存在更加使情况复杂化。巴尔干半岛的民族问题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并具有国际的和全欧的意义。

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指出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某些发展和加强。总的来说，这是对的，这符合资本主义的稳定趋势。但这不是绝对的法则。例如巴尔干半岛的社会民主党就没有得到任何加强。相反地，尽管实行了专门镇压共产党的白色恐怖制度，社会民主党仍未能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夺取任何较为重要的阵地。由于最近几年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事件，社会民主党变得虚弱了。但是这里必须指出，在这方面巴尔干半岛不同于意大利：意大利的法西斯不需要社会民主党，并且迫害它，而巴尔干半岛的法西斯却需要社会民主党。假如没有社会民主党，法西斯也会建立它。在不存在社会民主党的地方（例如在希腊），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一切措施去建立哪怕是虚有其表的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巴尔干半岛的社会民主党，确切地、毫无保留地说，它是资本家的工具和工人阶级中的密探。它的专门任务就是分裂工人运动，搞垮和削弱革命运动。

此外，它也直接参加摧毁革命工人组织的活动。它比资产阶级更加关心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统治的未来命运。

不久前，希腊改良主义者曾试图分裂工会运动。前几天，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根据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指令出卖了总罢工，现在正同政府谈判如何帮助政府彻底搞垮希腊的革命运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改良主义领袖起了同样的作用。在保加利亚、当资产阶级血腥地镇压革命的工人运动时，社会民主党人也积极地参加了。

因此，对我们巴尔干的共产党人来说，十分清楚，我们的策略应当是排除以任何形式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的任何合作。我们完全同意，对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应采取任何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队伍中还有某些无产阶级阶层，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对部分无产阶级还保存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才谈得上对工人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即使这样，还必须无情地揭露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领袖的背叛行为。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所有巴尔干国家的共产党都经历过严重的党内危机。保加利亚共产党在沉重的失败以后最迅速地和最彻底地解决了这次危机。目前，保加利亚共产党内完全团结一致，危机彻底消除，党的所有主要问题得到解决，它正齐心协力地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危机持续得太长了。布哈林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必须立即消除这一危机，保加利亚共产党欢迎共产国际执委会已经采取的一切有力措施。保共认为，南共党内有着大量的革命干部，在南斯拉夫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存在着明显的革命思想，因此具备了一切客观条件，可以迅速根除危机，健全党的机

体，使它在巴尔干半岛正酝酿着重大事件之时，在巴尔干半岛正策划着战争之时，能够领导起革命运动。

罗马尼亚的情况还要严重一些。党组织已经涣散，失去领导，并且脱离了群众。革命运动正在撇开共产党。共产国际执委会采取了某些措施以建立坚强有力的中心。我们希望，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不断帮助和经常领导的情况下，罗共能够恢复自己的队伍，重新赢得威信，领导起罗马尼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大规模革命运动。

希腊也曾有过危机。但是可以认为，这次危机已经消除，并且布尔什维克路线和遵循共产国际指示的该党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已经完全取得了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巴尔干国家的共产党内，党所犯的错误大多是右的错误。必须着重指出，尽管这些党是处于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但其中任何党都不能保险不出现左的倾向。不过最大的危险仍然是右倾。因此，所有巴尔干国家的共产党应当明确方向，使用全部力量和一切手段同右的危险作斗争。

在结束发言前，请允许我再说几句。我向你们描绘的情景提供了一个关于巴尔干各国共产党极其复杂的工作条件的清晰概念。这些党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巴尔干半岛的状况非常复杂，混乱不堪，并且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因此，即使是最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也不可能认为自己保险不犯某种错误。问题仅仅是少犯错误和使错误犯得小一些。完全不犯或绝对不犯是不可能的。因此，巴尔干半岛各国共产党有权期待共产国际更多地给予关注，更多地观察它们的活动，及时地就察觉到的倾向作出指示，及时地就它们所面临的危险提出警告。同志们，我认为，如果我请求代表大

会在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中专门列入一条，在这一条中哪怕用简短的几句话来阐明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当前最迫切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以此来表达对巴尔干各国共产党更加亲近和关注的态度，那总不会是布哈林同志提纲中所说的地方主义表现吧。

佩珀（美国）：

在这个讲台上发过言的几位美国同志对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持有某种批评的态度。我要声明，这些同志的讲话只代表他们个人。我被授权以美国代表团的名义声明，美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提纲。同时，这些同志对提纲提出批评，这也是没有什么可以惊奇的：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这是因为他们关于美国帝国主义国际状况的观点从根本上就不同于布哈林同志的分析。

必须指出，就在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散发给各国代表团的同一天，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英美书记处内散发了另一个文件，题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的危险》，署名的是毕特尔曼、福斯特、坎农等同志。这份文件在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国际状况的问题时具有不小的意义，因为其中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分析，根本不同于布哈林同志在他的讲话和提纲中所作的分析。

让我们研究一下，“美国的”文件和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之间主要的差异在哪里？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是怎样评价美国帝国主义目前的国际作用的？提纲中提出的基本论点如下：

1. 美国帝国主义的发展是直线上升的。
2. 世界经济的重心从欧洲移到美国。
3. 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扩张，它的反动性增强，美国帝国主义经济的增长及其实力的强大同有限的殖民地之间的不相适应性日

益增大，它的战争准备“不足”。

4. 美国资本的输出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欧洲资本主义稳定的基础。

5. 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的这一事实本身，促使美国帝国主义的国内矛盾和国外冲突加剧，阶级斗争更加激烈，工人阶级的抵抗加强。

这就是布哈林同志的提纲关于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作用的基本路线。

那么，邓恩同志在这里代表他们发过言的那些美国代表所署名的文件又说了些什么呢？我要强调说，这个文件作出的分析基本上是与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所作的分析背道而驰的。我引用几点作为证明。首先，请注意下面的话：

“对这些矛盾成熟程度的分析表明，美国资本主义正处于达到自身发展的顶峰的前夕。”

文件的作者们肯定地说，美国共产党所作的整个阐述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阐述是以美国帝国主义正在发展这一前提为基础的，相反地没有强调它的潜力正在减弱，他们说：

“这是根据对美国资本主义潜力减弱这个问题的正确分析而得出的”。

同一文件断言，“美国共产党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状况和目前所处的阶段却另有看法”，也就是说：

“主要注意力放在美国资本主义普遍增长和实力加强的趋势上”。

文件说，美国共产党错误地强调美国资本主义增长的趋势。文件把美国共产党的这种判断称之为“危险的修正主义观点”：

“总的来说，这样的阐述将造成对美国资本主义现状的危险的修正主义观点。”

我以上引用的这些话足以证明，在提纲与某些美国同志的“文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谈到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斯大林同志就在几天前在列宁格勒谈到美国帝国主义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星，而英国帝国主义则是一颗正在降落的星，并且阐明美国是资本主义得到巨大发展的国家。无疑，布哈林同志提纲的中心思想之一是：既然谈的是帝国主义国家，所以整个国际状况的核心是关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问题。当前，美国资本主义的世界霸权是一切资本主义国际关系围绕其旋转的枢轴。不看到这一点，就是政治上的盲人。不强调这种状况的重要性，就意味着从根本上与提纲背道而驰。

那些硬说美国帝国主义已经走下坡路的同志们认为，如果我们按照实际情况对事实进行分析，并对现有状况作出现实的评价，如果我们声明，美国资本主义可以继续发展，那就是说，我们是在否认美国帝国主义的国外和国内冲突有加剧的可能性。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正确的恰恰是相反的观点。美国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它的经济实力的空前增长速度才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最主要矛盾的根源。不是美国帝国主义“潜力的减弱”，而是它的世界经济霸权才是它同英国帝国主义冲突的根源。

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它与不列颠殖民帝国、与强大的英国舰队和庞大的法国陆军相比，它没有殖民地，军事力量也较小，两者不成比例，这才是当代帝国主义冲突的实际根源。正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兴起促使它贪得无厌，野心越来越大，要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在世界市场上掠取更大份额的

卤获物。

关于美国帝国主义潜力减弱的论点没有被事实所证实。我们知道，恰好在不久前美国相当大的地区，即所谓“牢固的”南方已开始实现工业化，那么，能说美国资本主义的潜力已消耗殆尽呢？美国现在仍然拥有庞大的后备农业地区，这个地区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在成为高度集中的现代工业的中心之一。农业危机是美国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难题之一。农业危机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不管怎样也不在于农产品的减少。相反地，农业危机的根源在于工业的增长、托拉斯化和技术的迅速发展。美国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难题是煤炭业和纺织业的危机。但是这方面的事实同样证明，产生这些局部性危机的原因正是技术进步，特别是这两个部门的重心转移到拥有充足的更便宜的水力能源和更廉价的劳动力的南方。

美国帝国主义还拥有进一步发展的庞大资源和潜在能力。对事实的分析表明，目前经济萧条的特点表现为以下趋势：

1. 蓬勃发展的不可抑制的托拉斯化过程。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有：铁路公司的联合，大托拉斯的联合和各式各样的企业的合并。目前状况的特点不仅是某些个别公司联合成托拉斯，而且是已经组成的托拉斯又联合成真正的超级托拉斯。仅在《分析家》的一期杂志上(1928年6月29日)就报道了以下的大规模联合：“在南方的西弗吉尼亚州和东弗吉尼亚州，控制有2亿美元资本的煤炭业协会实行了联合”；“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美国铸钢工业最大的两家托拉斯——已着手谈判组织美国钢铁输出公司”；“道奇和克莱斯勒兄弟公司将加入汽车工业史上最大的一家

联合公司”；“正在进行成立超级托拉斯的谈判，据说，这将是美国汽车工业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公司之一……这个联合公司将包括几乎 2 000 个单独的工业贸易组织，它们每年的贸易额超过 30 亿美元，在汽车工业中曾经实行过托拉斯化，而这次新的联合乃是规模最大的托拉斯化的榜样，它将一无例外地控制整个文明世界的贸易活动”；“随着拥有 5 000 万美元资本的‘通用面粉公司’股份公司的成立……这个新的托拉斯成为世界上本行业规模最大的一个组织”；“关于史蒂倍克汽车公司和皮尔斯·阿劳汽车公司实行联合的谈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这家未来的托拉斯将把拥有超过 16 000 万美元资产的企业联合起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塔加尔公司——这是正在进行谈判准备成立的一家托拉斯，它将控制 2 500 万美元的资本，并且将成为由美国生产包装纸和形形色色纸袋的工厂组成的、实行统一监督和统一管理的最大联合公司之一”。

2. 另一个与生产托拉斯化相类似的典型现象是，商品分配的托拉斯化。目前加入商业网的有 3 893 个单位，控制着 30 个不同部门的 101 536 个零售商店。这些组织在 1927 年进行了约 60 亿美元的贸易业务，即占美国整个零售贸易额的 28%。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对这种商品分配的崭新过程作出充分的分析。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这种分配的托拉斯化过程还没有过先例，并且它为美国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的同志对美国资本的不正确观点呢？我觉得，可以用以下几点来说明他们产生错误的原因：

1. 同志们把目前的萧条，即纯粹暂时的现象，当作是美国帝国主义总的衰落。

2. 他们认为,冲突和矛盾的增长只有在**美国帝国主义总的来说走下坡路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而忘记正是**美国帝国主义非常迅速的发展才能说明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矛盾加剧的原因**。他们不理解布哈林同志提纲的基本思想之一,也就是目前状况的基本特点是**帝国主义国内外矛盾的增长**,而这些矛盾是由**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总的增长所引起的**。然而,正是这一点才是目前“第三时期”不同于战后危机时期的当代特点。这一点甚至就欧洲来说也是对的,毫无疑问,对美国就尤其适合了。世界大战没有给美国资本主义造成紊乱。相反地,它极大地刺激了美国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本身并不需要稳定,因为它不像欧洲资本主义那样受到战后危机的损害。

3. 某些美国同志产生错误观点的第三个根源是,他们把**美国帝国主义特有的急剧衰落同目前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看到的那种衰落的因素**,如**资本输出、寄生的剥削分子增多,食利者的阶级形成**,等等混为一谈。这些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美国帝国主义的绝对衰落**,但标志着**美国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增长**。

4. 最后,他们的错误还有另一个根源,那就是他们不正确地理解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一般来说是**资本主义的衰落时期**这句话的意义。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帝国主义时代就排除了资本主义加强的可能性,甚至排除了个别国家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可能性。相反地,列宁写道:“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

种发展……一般地更不平衡了……”^①

我扼要地归纳为：美国帝国主义还可能加强，它还没有达到自己发展的顶峰，它还拥有巨大的潜力。当然，与此同时，应当着重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的加强是有限度的，并且必须分析那些能够促使美国帝国主义衰落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会使美国帝国主义的增长存在着限度呢？我不可能现在作出详细的分析，但不管怎样我尽力列举能够阻碍这一增长的某些因素：

1. 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国际政策中的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又不可避免地必然在国内状况中反映出来。正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加强抵抗。与此同时，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迫使这个国家建立强大的陆海军，从而导致动荡不稳，捐税负担加重，各阶层居民的不满增多和群众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抵抗增强。

2. 工业技术发展本身造成局部危机和工人阶级广大阶层的不满。南方的工业化引起失业，工资降低，新英格兰各州数十万工人的生活条件恶化。采矿工业的危机使广大矿工群众中的骚乱增多。农需工业中技术的发展（1925年拖拉机为20万台，1927年为70万台）使数十万农场主成为“不需要的人”，并且总的说来，给美国农村广大居民阶层造成危机性局势。

3. 美国政府机构的集权和官僚主义化不断加强。美国政府越来越同托拉斯机构相结合。它对美国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干预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每次罢工都具有转化为反政府斗争的趋势。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436页。——译者注

4. 美国资本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欧洲资本主义的衰落不可避免地必然影响到美国帝国主义的命运。

5. 美国不占有英国在几十年内所据有的那种世界垄断地位。它必须同其他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因此可以预见，美国帝国主义在一个长时期内将无力在美国工人阶级各阶层中收买多少人。

6. 最后，限制美国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因素还有：苏联的存在，殖民地革命运动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

这才是对美国帝国主义状况的正确评价。现在主要的趋势是，美国帝国主义拥有政治和经济实力，并且还在发展，但同时我们必须知道，存在着强有力的因素，这些因素目前已在发展，它们将阻碍和限制美国帝国主义的增长。

其次，我想谈谈工人阶级的激进化 and 资产阶级化的问题。

在我已经引证过的某些美国同志的这同一份文件中，同样包含有对美国工人阶级激进化的总的规模和程度的不正确评价。我引用这份文件中的几段：

“可以看到半熟练和不熟练工人（美国无产阶级的基本部分）的不满以及对斗争的积极性和准备程度的普遍增长。”

再引一段话：

“在所有工业部门可以看到工人阶级最受剥削的各阶层广泛的和普遍的激进化过程。”

最后，文件还进一步发挥，并且不加任何说明就判定美国工人阶级正普遍地“激进化”。文件责备美国共产党，似乎美共

“否认美国工人阶级基本部分广泛的和普遍的左倾或激进化

现象的存在”。

我必须说，我们在上述文件中所看到的这些论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美国工人阶级正在表现出一定的激进，这是无产阶级某些阶层的激进，某些部门工人的激进。还可以看到不熟练工人的左倾化，但是不能说，这是普遍的、全国性的左倾，也不能说，这个过程已经包括美国工人阶级的基本部分。我担心，甚至在德国、法国或英国，即在工人阶级激进倾向表现得最明显的那些国家，现在还谈不到，激进或左倾已经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基本部分。要知道工人阶级的“基本部分”，这就是指它的大多数，甚至是指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即使在德国、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激进化过程迅速增大，而且这种现象正成为目前状况特点之一的那些国家内，我们当然也不能说，这个过程已经包括工人阶级的基本部分，即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

有一个明显的矛盾是耐人寻味的。那些现在责备美共中央忽略了美国工人阶级普遍的激进化过程的同志，不过9个月前，仍然在这里，即在莫斯科责备我们党中央，说它不承认美国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强大过程。依我看，美国共产党在9个月前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它指出，在出现美国工人阶级明显的资产阶级化倾向的情况下，同时可以观察到另一种在范围和规模上也许不是那样强大的倾向，这就是工人阶级某些阶层激进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正成为进行共产主义群众工作的坚实基础。我觉得，美国共产党目前所持的立场也是正确的，它指出，工人激进化的范围在增大，工人进行抵抗的趋势在增强，但是，这个激进化的过程还不是普遍的过程，还没有包括工人阶级的基本部分，而且，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到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资产阶级化过程。

正在进行着的过程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可以看到一定程度的激进化，它的范围日益增大；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化过程，换句话说，可以看到工人阶级的分化过程。不懂得这种两面性就无法理解现状。

前些日我曾在红色工会国际说过，欧洲的稳定成为改良主义增强的基础，而稳定过程中的内部矛盾则为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美国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成为美国改良主义进一步增长的基础，同时又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进一步壮大提供了可能。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加强而产生的矛盾，从另一方面为群众激进化的增长和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加强奠定了基础。

我必须强调，这个过程是两方面的，不看见其中的任何一面，就意味着是政治上的盲人。上述美国同志患了某种奇怪的政治色盲症。他们分不清颜色：他们看到的一会儿只是资产阶级化的白色，一会儿又只是激进化的红色。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必须把美国工人阶级的分化过程作为辩证的两面过程来分析。

限于时间，我不能详细地分析美国工人阶级对资本家和国家政权的进攻所进行的抵抗日益增长的情况。我只想指出，在美共中央五月全会所作的政治决议和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中，以及在我们的 1928 年竞选纲领中，都对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作了详尽的全面的分析。

让我来说明一下美国工人阶级激进化所独有的特点。我觉得，我们现在无须重复那些关于美国工人阶级基本部分普遍表现左倾的一般言论，而应当尽力对美国激进化过程的范围、限度、形式和特点进行具体的分析。

目前，激进化范围受到限制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

1. 资本主义政党之间没有重大的政治分歧；
2. 资本主义政党之间现有的分歧比 1924 年以来所有时期都要小得多；
3. 现在不像 1924 年那样存在第三党；
4. 现在既没有全国性的，也根本不存在群众性的、有利于组织工人政党的运动；
5. 美国工人阶级的基本部分现在仍然支持老的资本主义政党，同志们，我不得不谈到这一点，这实在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事，但既然是事实，也就无可奈何了。12 个铁路“联谊会”不久以前还是美国工人阶级独立的（虽然是修正主义的）政治运动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可是仅仅几周前，它们竟然声明拥护候选人胡佛竞选总统。1924 年曾经支持参议员拉福莱特组织第三党运动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今年将支持民主党候选人阿尔·史密斯竞选。
6. 美国的社会党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美国共产党又还不是群众性政党。美国工人阶级尚未能建立起对千百万工人有影响的群众性政党。

上述事实清楚地表明，是什么情况使美国工人阶级的激进化，特别是政治上的激进化受到了限制。但是，仅仅根据已组织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由工人贵族控制的工人运动来判断美国工人的激进化过程，难道是正确的吗？当然是不正确的。正如美共中央五月全会政治决议所肯定的那样，判断目前状况的基本因素是对不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群众的情绪和行为的分析。我们肯定地说，工人阶级最受剥削的阶层正表现出相当明显的激进化过程，这一点已为采矿、纺织和缝纫工人的罢工所证实。

美国的这个过程不同于某些欧洲国家中的激进化而具有某些特点。在德国，激进化过程表现于政治领域，但在工会运动方面是落后的。工人们在政治问题上乐意跟着德国共产党走，同时却不承认德共在罢工斗争中的领导。在美国，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连有左倾思想的工人也仍然不同意承认美共的政治领导，但与此同时却越来越乐意在罢工时服从共产党的领导。福斯特在红色工会国际的讲话中完全正确地指出（他的这次声明截然不同于他的其他声明），美国共产党目前是美国工人每次罢工和每次大规模罢工运动中的动力和主力，并且它已在美国左翼少数派运动中取得了领导权。然而必须指出，在政治问题上同是这些工人却仍然支持社会党或老的资本主义政党。

失业现象目前在美国已是一种十分经常的现象，失业问题已属于美国当前状况的主要问题之一。有些同志责怪布哈林同志，说他对失业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觉得，这种责难是不公道的，因为布哈林同志详细地阐明了目前的失业现象，说它是一种标志着工业预备大军经常不断增长的现象，对于数十万、数百万工人来说是一种经常性的失业。

有一些同志觉得，布哈林同志关于经常性失业和关于美国工人阶级总数绝对的减少的论点不可避免地将导致“机会主义”。我认为，这种责备是毫无意义的，也是毫无根据的。这些同志是这样议论的：如果工人阶级的人数不断减少，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只靠机器而无需工人就可以维持生产过程，换句话说，也就是资产阶级能够用某种“协调的”方法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这样的理解当然是荒谬的。为什么？这是因为，即使资产阶级果真能够把千百万工人群众，即工人阶级的基本部分排挤出生产过

程，我们也仍然不会有一个没有工人、没有阶级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工人由于经常性失业而被排挤出生产过程，这并不意味着协调的发展，而是意味着革命局势的存在。同志们，总不应该忘记，被排挤出生产过程的，甚至不再参加生产的那些工人，仍然是无产者，是要吃东西而且不得不同饥饿的死亡作斗争的人。笼罩着千百万工人的经常性失业不仅不会成为资本主义“协调”发展的基础，而且相反地是促使有这种失业现象存在的所有国家革命局势加剧的最强有力的因素之一。

经常性失业的前景并非资本主义“协调的”发展，而是革命过程的加速。

显然，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无产阶级抵抗的加强不允许资本主义把大部分工人阶级排挤出生产过程。然而，另一方面必须指出，资本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这个过程。在美国存在着禁止外国移民入境法，由于这条法令，在国外出生的工人，每年有数十万人被阻而进不了美国。此外，还可能从美国向其他比较年轻的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移民。但是，企业工人绝对人数减少的趋势有可能再度暂时中止，因为工业预备大军增多的基本原因是新市场的发展跟不上技术发展的高速度，但是也有可能，美国由于实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能够从其他帝国主义那里夺得一系列市场，从而吸收目前成为“过剩的”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参加生产。

否认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这种新现象，意味着不是同布哈林同志，而是同事实进行论战。有关美国的这些事实是清晰的，雄辩有力的。1927年工厂工业的产量比1919年提高了26%。同一时期，在工厂生产部门就业的雇佣工人减少了整整98万。这样，在

产业工人总数比 1919 年减少 11% 的条件下，工业产量在 1927 年提高了 26%。换句话说，每个工人的平均产量增长了 40%。同一趋势不仅表现在工厂中，而且出现于铁路部门：1927 年铁路工人和职员的人数比 1919 年几乎减少了 20 万。在这个时期成为“过剩的”矿工人数几乎达到 25 万。总计，至 1927 年底，在工厂工业、采矿工业和铁路部门工作的工人比 1919 年几乎减少了 150 万。并且工人人数这样的绝对减少是与工业的“繁荣”和产量的迅速增长同时出现的。美国共产党在 1928 年的竞选纲领中对这种现象作了清楚的分析：

“与资本积累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工人人数相对的减少，而在当前甚至是绝对的减少过程”。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像美国这样，呈现出国家机构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的这种明显趋势。布哈林同志在讲话中引用了华尔街机关报的话，这家报纸把胡佛称为“实业家总统”。我们曾痛斥柯立芝总统为“工贼总统”，我们也完全有权称胡佛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总统”。

美国托拉斯和国家机构相结合的过程之所以如此迅速并且几乎已经完成，有其一系列特殊原因。这并非偶然，因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决定了这种联合的过程。国家机构的托拉斯化是以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大、更快的速度进行的。

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中央集权的官僚军国主义国家机构是在金融资本时期以前就发展了的。而在美国，80 年代以前还没有任何中央集权的官僚军国主义国家机构。美国与欧洲国家发展中的这种差异，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并进行了分析，列宁也不止一次地引证了这一点。美国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机构的发展

过程只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才与金融资本和托拉斯的增长并行不悖地开始的。

在美国，国家机构与托拉斯资本迅速地直接结合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从来不像欧洲国家那样存在过封建主义制度。通常在封建主和城市资产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结果是：产生了君主政体控制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国家机关，但是这种阶级斗争从来没有在美国历史上起过任何作用。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决定了欧洲的状况，即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在其发展初期不是由资产阶级本身，而是由官僚阶层掌握的，例如在法国就是这样，或者掌握在普鲁士的容克地主手中，或者像英国那样掌握在拥有土地的贵族手中。为了把历史发展前一时期的残余势力清除出国家机关的关键部门，金融资本和托拉斯的代表不得不在帝国主义时期进行长期的斗争。在美国，金融资本无需同容克地主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政权的贵族执政者进行斗争。美国金融资本可以不经过斗争就比其他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更充分地掌握国家机构。

请让我引证几个数字，这些数字可以表明，美国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机构发展多么晚。1884年美国联邦政府国家职员的整个编制还没有超过13 780人。请不要忘记，这是在一个其本身就几乎是幅员辽阔的大陆的国家里。到1912年，即临近世界大战前，中央国家机构已经增加到278 000人。而现在，即1928年，联邦政府官僚机构人员已达559 138人。国家职员（包括联邦政府的职员和各州、各个地方机关的职员）的总数目前已达300万。这样，从80年代起到最近时期，职员人数从13 000人增加到300万人。显然，任何其他国家不像美国这样，国家机构在与金融资

本结合的同时如此迅速地扩大。看看美国各个主管部门领导人的姓名，会使你感到，你是在读一份托拉斯、银行和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名单。

同志们，最后再谈几句关于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由几位美共领导同志签名正式递交共产国际的文件题目是《关于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那就让我们分析一下美共的右倾危险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是否存在右倾危险呢？是的，存在着这种危险。在一个工人贵族如此强大的帝国主义强国内不可能没有。右倾危险当然是存在的，所以美国共产党代表团对布哈林同志提纲中关于美国的部分提出修正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建议作如下修正：

“必须使美国共产党中央继续并加强同右倾的斗争。”

我认为有责任指出美国共产党同右倾危险作斗争的一个光辉范例。我认为非常引人注目的是，这份专门阐述“美国右倾危险”并责备美共中央执行右翼政策的文件，却只字未提美国共产党过去曾经犯过的一个极大的主要的错误。这份文件竟“忘记了”提示这个非常严重的右倾错误，哦！我觉得，忘记提这件事决非偶然。我指的错误不是在过去发表的某篇文章或偶而讲话中，而是在1924年竞选纲领中所犯的右倾错误。那些现在责难美共已成为右翼政党的同志们自己就是1924年时美共中央的领导人。因此这些同志对1924年竞选纲领中实行的政治路线负有全部责任。这个竞选纲领关于在工业部门立即实行国有化、工人监督和民主的部分是这样写的：

“工人党赞成所有大型工业——铁路、采矿业、大工厂、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实行国有化，主张把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工人组织起来，使他们在实行国有化以后参加对这些部门的管理和领导，以

便由此发展工业民主，直到工业由那些生产国家财富的人实施监督。”

同志们，这段声明是 1924 年美国工人党竞选纲领的一部分。这个纲领是由那些责备中央现有成员实行右翼政策的同志们所提出和传播的。你们可以看到，1924 年的竞选纲领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和还在革命前就对整个工业立即实行国有化。纲领中谈到工人参加管理工业，换句话说就是实行阶级合作。其中又谈到，应当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发展“工业的民主”，纲领抱有幻想，似乎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并取得对国家政权和对工业的监督以前就能得到工业民主。我必须说，同样的错误在两年后，即 1926 年，在党的竞选纲领中又重犯了，尽管形式上不是这样愚蠢。

我们党的这两个竞选纲领都谈到实行国有化和工人监督的政策，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把它评价为走向社会民主党路线的一步。然而这些同志对这种倾向、这样大的错误，甚至没有提到，他们想充当美国共产党列宁主义政策的垄断者，但在草拟和签署这份题为《关于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的文件时，却对上述错误不批判，不指出，不改正。

关于立即实行国有化和工人监督的错误观点出现于 1924 年，也就是在上述同志主持中央的时候。在这以前，美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的路线是正确的。在 1923 年第五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重新修改了的纲领中并不存在这个错误。甚至由我们同志所写的农工联合党的纲领也坚决抛掉了过去工人政党关于国有化的老幻想。还在 1923 年，我在自己的那个关于工人政党的小册子中就十分清楚地谈到这一点：

“它(纲领)抛弃改良主义的逐步国有化的幻想,并公开声明,在工人和农民能够实行国有化和公有制以前,他们首先应当夺取政权和取得对政府权力的监督。”

早在1923年,即在共产国际纠正布兰德勒关于对工业实行工人监督的错误以前,美国共产党就站在这个正确的立场上。

1924年和1926年竞选纲领中的错误在1928年5月的最近一次竞选纲领中得到了纠正。纠正这些重大错误的主动性不是来自签署这份称为《关于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的文件的同志,而是来自被他们斥之为右翼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我必须着重指出,如此出人意外地发现自己“左派”的同志,本身却是在实行工人监督和立即国有化问题中错误政策的首倡者,而且他们对1924年和1926年竞选纲领的正确性一次也没有感到怀疑过,甚至在专门分析美共近年来犯有的一切所谓“右倾错误”的文件中,他们也“忘记”提示一下这个最重要的和最大的右倾错误。

美国共产党不隐瞒自己的错误。中央犯的错误是不是很多?是的,很多。中央有没有缺点?有缺点。中央在策略路线上的错误是不是很多?是的,很多。中央是不是进行自我批评,是不是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我必须最坚决地声明,它是这样做的。只要指出中央五月全会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就足够了。这个决议对我们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评。读一下五月全会的政治决议,你们就会看到,它坦率地承认并纠正了中央所犯的错误的错误。

谁也不会提出异议,正是现在的中央指出了党的前两个纲领中关于立即实现国有化、对工业监督和工业民主问题的极大错误。美国共产党目前的行动纲领则没有这样严重的右倾。

美国共产党，以及我们寄予希望的整个代表大会，都能对指责美共中央是右派或是它奉行右派政策的这种言论给予驳斥。仅仅根据我所说的文件中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绝对错误的分析和评价就提出这样严重的责难，是尤其不对的。

布伦克勒（德国）：

在我们这次世界代表大会议程的第一项中同时列入了青年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这一事实是共产国际活动中一个良好的和具有典型意义的征候。必须争取青年劳动者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定、绝对地提到共产国际的面前，当前全世界资产阶级正把争夺无产阶级和农民青年群众作为它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最重要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对我们这些共产国际的代表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要弄清，青年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农民和无产阶级青年中究竟传播得有多远。为了阐明这一点，再一次引用某些资料将不是多余的。

青年共产国际在人数上是共产国际最强大的支部，它总共有225万人。但是，这样庞大的数量主要是依靠苏联共青团的成员多而造成的。除苏联共青团以外，各国共青团目前共有127 000人。

在已加入共青团的青年工人这个总数中，还应当加上那些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的同情组织和辅助性组织的青年工人以及青年农民。在共青团被取缔时，这些同情组织和辅助性组织却是合法存在的，如：德国的红色青年阵线，法国的反法西斯支队，以及在共青团被取缔的一些国家中的许多合法政治组织，其总数有7万人。

但是，不能不指出青年共产国际的另一方面活动（遗憾的是，

这次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不过它在我们共青团的活动中却占有颇为显著的地位)，这就是目前拥有 4 万成员的儿童团。

这正是青年共产国际及与其紧密联系的同情组织的组织状况。仅仅这些数字便已表明，与我们的共产党相比，共青团的组织成分还远不是令人满意的。诚然，这些数字丝毫不能说明共青团的发展本身情况：是停滞不前，还是向前发展。为此目的我们作了另一个统计，不久前在戈尔基奇同志的小册子中引用了这个统计。它是由执委会根据 10 个最重要的合法活动的共青团的资料制成的（因为只有在合法条件下工作的共青团才能公布成员的人数，就自己的政治和组织发展状况及影响程度提供一个清晰的概念）。

我们研究这 10 个合法的共青团从 1926 年春季以来的增长情况，并把这整个时间分成每 6 个月为一期，就可以看到以下情景：

1926 年春为 5.7 万人，以后各期为 6.1 万和 6.5 万人，目前我们有 6.9 万人。从这些最主要的合法共青团的数字中可以看到，即使没有理由说开始出现明显的停滞状况，那也可以指出青年共产国际成员的数量增长是非常不够的。我再一次强调，这一数量的发展绝对不能令人满意，青年共产国际的总的状况是无法用目前的客观条件来进行辩解的。

青年共产国际的定期刊物和书籍所载的资料同样符合我们青年共产国际上述的组织状况。如果我今天还要提到儿童团问题，那也只是为了促使世界代表大会注意我们儿童团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之不妙。前面我已说过，我们所有儿童团的人数，不包括苏联儿童在内，只有 4 万人。与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儿童组织的庞大数字相比，这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我们儿童组织的增长

情况同样不妙：人数急剧下降。这里不能称为停滞。这里必须清楚地、明确地肯定成员的人数已经倒退，而且这恰恰是发生在像德国、英国、挪威、法国这些最重要的支部里。我们之所以能够把青年共产国际成员的总数保持在原有水平，只是因为最近时期我们在拉丁美洲、中国、蒙古成立了几个新的共青团。我认为，如果我们注意到了组织的人数，又考虑到了我们当前首要的、最危险的敌人即社会民主党，那么，我们把上面提到的事实看作是我们组织和政治方面的消极面，那将不会是错误的。我在上面指出过，青年共产国际一些最重要的组织最近以来在政治活动方面取得了虽然不是足够的，但毕竟是一定的进步。在这些国家中，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团，与我们的情况相反，正经历着组织上和政治上的深刻危机。这里，我可以提出这方面最适当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德国如此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这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工人目前只有4万人。最近几年它的人数大大减少，因为不久前它还有10万多团员。我们在整个社会党青年国际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发展情景。这种状况不仅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而且是我们的青年组织和青年共产国际长期地、始终不渝地和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结果。

在转入研究社会民主党儿童组织的人数时，我们应当预先说明，工人子女的政治作用，不言而喻不像已经参加生产的工人青年的作用那样重要。然而，工农儿童的教育工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依靠儿童组织来进行更新接替对共青团有巨大意义。必须指出，在我们共产党的儿童组织人数日趋减少的地方，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却在最近期间使儿童组织获得几乎创纪录的增长。试以德国为例。当德国社会党青年组织无论怎样努力也摆

脱不了已经持续多年的经常性危机状态时，社会民主党的儿童组织却在最近几年走完了下列的发展道路：两年前在德国还没有任何一个稍许重要的儿童组织，目前儿童组织已拥有 10 万多成员。这里的发展情况与在我们组织中可以看到的情况截然相反，而且我们的情况首先应当归咎于我们共产党和共青团在无产阶级儿童运动方面的方法不当和积极性不高。

若干时间以前，我们在青年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中已经讨论过我们国际青年运动的状况问题。早在本届代表大会以前就对我们的工作方法提出了修改方针的要求。根据布哈林同志的提纲可能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提纲指出必须改变工作方法，只是现在才作为一个问题提到我们面前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青年共产国际早就在研究改变工作方法的问题。还在 1925 年，在我们青年共产国际的各国共青团内最先产生了必须修改工作方法使其更加适应青年工作性质的想法。1926 年 2 月，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首次在这方面制定了明确的路线。我们是怎样在实践中进行这项工作的呢？应当说，——这也是 1928 年春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所确认了的，——个别国家的共青团在实施我们的决议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是一些我们在作出决定时（1926 年）没有预见到的困难。我们不得不肯定地说，几乎只有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采用了这些新的工作方法。我们在德国共青团内运用这些新的工作方法也确实达到了一定的完善程度。仅指出采用这些新的工作方法的必要性是不够的；应当清楚地、明确地说明，这些新的工作方法是什么，应当怎样把它同我们老的传统工作方法联系起来，我们各国共青团面临着怎样的危险。在我们的第一个决议中——这是 1926 年春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

议通过的决议，——谈到了这些新的工作方法对于我们的意义和重要性。新的工作方法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在企业、工会、陆海军、体育组织内采取适合于工农青年思维方式、经验和思想情绪的群众性政治工作的指南。乍一看可能会觉得，——这种看法也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引起严重的后果，——似乎强调这些新的工作方法的必要性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修改对我们生产支部工作和我们工会整个活动的评价。还有可能产生这样的观点和这样的趋势，——实际上这已经发生了，——似乎目前我们认为工会工作或共青团通过我们支部进行的经济斗争不那么重要了。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问题不在于把共青团的整个活动从企业和工会转到其他方面，问题在于使这项工作的进行更适合于工人青年。因此，我们应当讲清楚我们关于这些青年工作新方法的观点。如果我们想使共青团成为群众性组织，我们应当在它们的日常实际工作中创造三个条件。第一，它们应当作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青年的政治领导者；它们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政治生活问题上，特别是使工人青年感兴趣的问题上，放在成立工会、服兵役、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和他们的经济状况等问题上。它们应当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实行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所谓“明确的”路线，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那就是“青年路线”。这样一条清楚明白的路线是共青团群众工作的重要条件。第二，它们应当在工人青年通过生产支部进行的日常斗争中，以及在工会斗争中代表工人青年的经济利益。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变成群众性组织，即具有双重含义的群众性组织：一种含义是每个青年共产主义者在企业中都成为同事们的领导者，另一种含义是吸收青年参加组织和深入到群众中去。第三，同志们，应当使这项工作的形式不同于党的工作方

法。共青团不应当简单地成为党的翻版，它不应当是第二个党，而应是采用符合工人青年思想方式的工作方法的青年组织。

我们不应当因此而忘记另一个情况：如果我们想巩固我们的青年团，我们就必须使共青团具有坚固的基础，这就是强大的无产阶级儿童运动。但是，现在我们儿童团的力量非常薄弱，比共青团还要薄弱，如果情况始终像现在这样，那么儿童团今后也将是共青团的薄弱基础。只要一些党团员否认群众工作必要性的错误观点在儿童团中仍然占统治地位，我们的群众工作就必然面临巨大的、无法克服的困难。

由于上述情况，各国共产党在与共青团的相互关系中面临着几项任务。

首先，重要的是政治领导问题。党应当对我们的工作方法和对共青团的政治领导形式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目前共产国际的一些大党拒绝担负领导工人青年罢工的责任，一些共产党反对把党内辩论移到青年组织中去，如果想使我们的共青团获得正确的领导，那么这种情况就应当彻底根除。对于那些企图把共青团变成无定型的工人青年联盟的做法，同样应当给予有力的回击。

其次，我想再指出一个在党与青年的相互关系上迄今尚未揭示的情况。这就是工作人员从共青团转到党内的问题。请看一下我们各国党由共青团成员进行补充所占比重的统计。这个统计提供的数字是2—5%。我们共青团只有少数团员在团龄期满以后入党。在这方面不仅是共青团员的过错，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应当从党没有充分在共青团内进行挑选，即党组织没有充分挑选人才方面去寻找。上述现象之所以产生，还因为没有正确使用从共青团入党的青年同志。这就是应当引起共产国际更加重视的问

题。

最后，我应当说，如果我们按照共产国际将作出的决议行事，那么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就能完全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使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而共青团的活动在顺利实施这场斗争中必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汉宁顿（英国）：

我代表英国代表团想谈的问题，主要的不是涉及布哈林同志谈过的，而是他忘记谈到的内容。布哈林同志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谈了由于争夺市场而发生的冲突；他指出了殖民地国家是怎样同宗主国开始竞争的；他向我们阐述了，工业由于科学发明的应用和技术的发展而在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他谈到了托拉斯和卡特尔的发展，以及那些推动资本主义走上合理化道路的力量。所有这一切他都阐明了，但有一个问题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与上述问题非常密切有关，并且实际上是由上述问题产生的，这就是失业问题。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强调了在工会、工厂、青年、反帝同盟等等组织内加强党的工作的必要性。但是，他只字未提党员在失业者中进行工作的问题。

刚才发言的佩珀同志对失业问题不屑一顾，好像这个问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甚小。按他的话，一位英国代表说过，似乎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没有注意失业问题。据佩珀同志的意见，我们甚至不可能指望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谈失业问题。尽管失业无疑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尽管在失业中蕴藏着各种各样的革命可能性，但是按佩珀同志的话说，这个问题仍然不是那样重要得足以写在布哈林同志的工作报告中。

我倾向于认为，佩珀同志对这个严重的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否则就不会这样说了。佩珀同志是代表美国共产党代表团发言的，而在这个国家里到处是大量失业，目前共有失业者约 425 万人，因此这就更加令人惊奇了。

请允许我就这个问题谈谈英国代表团的意见。我们认为，不注意这个广阔的工作领域，即在失业者中开展活动，乃是共产国际非常严重的错误。毫无疑问，失业是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之一。在资本主义上升的发展时期，拥有一支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失业大军有时对企业主是有利的，这是一支与在业工人进行竞争的队伍，是一支在工业部门发生冲突时可以利用来打败工人的队伍。然而，目前失业已增长到这样大的规模，以致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失业现在是资本主义最大的经济矛盾之一。它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

布哈林同志强调了在群众中工作的意义。假如我有足够的时间，我可以从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引证许多地方来表明，他在工会工作、企业工作等等方面谈得多么详细。使人觉得，除了工会、工厂、企业等等，就不存在别的什么活动领域了。

现在让我们匆匆地看一下美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状况。还可以提一下殖民地，例如新西兰、加拿大、南非的失业情况。在德国，目前失业大军的人数，按政府资料，已达 118 万人。在英国，据政府统计，失业者共有 119 万人。在意大利，失业人数达 50 万。在美国，我已经说过，失业大军的总数大致为 450 万。我所举的英国数字只包括在职业介绍所登记的失业者；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因未领救济金而未列入这个数目内，因此目前英国失业者的总数更接近于 200 万，而不是接近 125 万。在英国，200 万

的失业者意味着约有 12% 的劳动居民没有工作。在英国的煤炭工业地区，失业人数达到 25 万，必须指出，在像南威尔士这样的地区，没有其他工业能够吸收这么多失业者。因此这里存在着经常的失业大军，如果这些地区不开发新的矿井，或是这些失业者不能迁居到其他地区，那么他们就永远得不到工作。

在这种状况下能不能肯定地说这支庞大队伍对共产国际没有重要意义呢？难道失业只是临时性的现象，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和严重的问题？如果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涉及千百万工人的严重问题，那么共产国际应当考虑它，并制订一条关于失业的明确的政治路线。忽视这个很大的工作领域，就是犯了与忽视工会工作同样重要的错误。

请允许我扼要地谈谈表明党在失业者中工作重要性的几个基本因素。这也许对佩珀同志来说是特别感兴趣的。

首先，失业大军对在同资本主义斗争中进行群众鼓动和发展革命力量具有巨大意义。

其次，我们党领导下的失业者组织是工业冲突时期同企业主斗争的强大武器。

第三，失业与战争准备有密切联系。

第四，失业者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工业合理化的斗争中可以利用的一支力量。

第五，失业是一股力量，在它的帮助下可以摧毁社会民主党的实力。

现在我们稍许详细地谈谈这五个因素。

为什么失业是可以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为什么它属于进行群众鼓动的领域？不言而喻，这是显而易见的，未必再需要

加以解释。人们失去工作，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这一事实本身，便已经把它们变成一群不满现实的人，他们准备进攻，准备听取我们党对他们说的一切，因为党给他们带来了战斗纲领。不言而喻，在失业者通常所处的绝望状况下，只有战斗纲领对于他们才是适合的。让我举几个在英国失业者中进行群众鼓动的例子。我觉得，我们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可以把在英国失业者中进行过的工作引为骄傲。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和在全国失业者委员会（这是一个运动，其中有我们党的最著名的同志在工作）的旗帜下，对失业者的群众鼓动是使英国的所谓“贫民法”起革命作用的手段之一。在1920年以前，官方是不允许运用“贫民法”来帮助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的。在英国所有城市进行的、有成千上万工人参加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迫使政府对“贫民法”作了修改，从而使由所谓地区的“贫民慈善救济机关”发给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救济金的做法得以合法化。我们在群众中进行的大规模鼓动，迫使1924年的工党政府提高了社会保险补助金和改善了获得补助金的一般条件。

我要提一下我们前一个时期活动的情况，即南威尔士矿工向伦敦的进军。当时没有大规模的经济战斗，因为英国职工大会总理事会拒绝进行任何斗争，推行保证工业和平的政策。南威尔士矿工的进军可以说是1927年英国最大的一次群众行动。由于这次进军，可以看到一系列不平常的现象。甚至直到现在，英国的所有资本主义报刊仍然非常关心南威尔士煤炭工业地区的状况。设立了援助穷苦的失业采煤工的基金。成立了研究这些地区状况和寻找改善办法的公共委员会。曾经反对进军和力图搞垮进军的工党任命了几个特别委员会，派去访问南威尔士。在调查后，这些

委员会要对南威尔士的状况提出最为详尽的工作报告。据最新消息，政府同意给英国煤炭的出口以补贴。所有这一切，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是解决不了失业问题的治标办法，但是，这些措施是在 1927 年南威尔士采煤工向伦敦进军的影响下才实行的。

我还可以提出许多其他的大规模宣传鼓动运动，特别是 1922 年的饥饿大进军，在那次进军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加者有 5 000 多人。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失业与战争准备有什么联系呢？首先我要提醒，在像英国这样存在着所谓志愿兵制军队的国家，新兵经常是由失业者，即从处于恶劣的经济状况、过着半饥半饱生活的人们中招募的。

英国在最近两个月内实行了一项新的失业者保险法。请注意一些数字，这些数字可以说明对 18—21 岁，即恰恰是对英国军队所需要的年龄范围内的失业青年减少补助金的情况。对于 20—21 岁的青年人，补助金减少了 4 先令，由原先的 18 先令减少到 14 先令。对 19—20 岁失业者的补助金减少了 6 先令，这样就降到 12 先令。对 18—19 岁的失业者，削减到每周 10 先令，也就是减少了 8 先令。难道这样的缩减与战争准备问题没有联系吗？这项关于失业的新法令是鲍尔温政府根据布莱恩伯格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制订的。工党有 3 名代表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其中有一个英国职工大会总理事会的成员），他们同布莱恩伯格勋爵和其他资本家签署了这份工作报告。不寻常的是，在公布布莱恩伯格工作报告以前，发表了一份关于英国军队的工作报告，这份报告表明，招募到英国军队的新兵数量减少了。在关于英国军队的这份报告中把新兵数量的减少归咎于给失业青年的补助金额太高。我们看到，

紧接着这份报告公布之后，恰恰是兵士补充来源的那一部分工人青年的补助金降低了。补助金的减少是为了用饥饿的威胁来迫使失业者去当兵。同志们，我们应当记住，在有 200 万失业者的情况下，经常存在着一旦宣战他们将被组成志愿军队的危险，特别是如果政府同意为第一批征召的志愿兵提供特殊条件时更是如此，而政府是完全可能这样做的。我们的责任是在失业者中进行教育运动。我们不反对失业者到军队去，如果他们去当兵时是一些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如果他们在适当时刻能够利用自己的技术素养和军事素养去为工人的利益，而不是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话。我们应当使失业者变成同政府斗争的因素。我们应当尽可能做到，使当兵者在未到军队以前已经具有阶级觉悟。这就是说，党应当在失业者中进行工作。

怎样利用失业者作为在工业发生冲突期间同企业主斗争的工具呢？企业主在与那些了解反对资本主义斗争性质的有组织的失业者打交道时，要把这些有组织、有阶级觉悟的失业者作为工贼来使用，那就难多了。最近 8 年来，在所有英国工业冲突中没有发现过出现工贼的情况。1920 年以前和战前，经常有大批失业者准备去抢罢工者或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的工人留下的工作，而最近 8 年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正是由于党在失业者中进行了工作的缘故。

怎样能够在反对合理化的斗争中利用失业者呢？我们知道，合理化意味着失业的增长。我们看看总理事会的代表乔治·希克斯不久前在伦敦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就征集工会会员问题说了些什么。我们的代表在代表会议上彻底批驳了希克斯，因为他坚持同蒙德谈判的政策。我们的同志向希克斯和其他代表显示出我们是

很了解合理化的后果的。乔治·希克斯在回答中承认，合理化意味着对工人的剥削更为加强，它导致工业中劳动的更大分工，导致排斥熟练劳动，它意味着取消工会对劳动的一切保护，而这可能会妨碍生产的增长。他承认，合理化意味着以最低限度数量的生产工人来榨取最大限度的生产力，合理化不可避免地使失业人数增多。不仅是希克斯，就连阿弗里德·蒙德先生本人也是这样说的。不久前蒙德在《曼彻斯特卫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在坚持合理化政策的同时，承认合理化会增加失业现象。

我说过，英国的煤炭工业地区有大量的失业人员。在不久前苏格兰和约克郡的煤炭工业实行合理化以后，仅这两个地区的失业人数在最近4个月内就增加了3万人。这对共产国际来说有没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不是向我们提出了某种问题？这是不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是的，我们获得了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动员失业群众并在他们中间进行鼓动反对合理化造成的结果，因为我们可以向失业者表明，合理化不仅不能使他们回到生产中去，而且相反地，还会把更多的劳动者抛到街头。我们利用群众鼓动可以把失业者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那些想使工业实行合理化的人们。同时，这也会使支持合理化政策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遭到损害。在这方面还可以引述另一个事实。在矿工向伦敦进军期间，英国职工大会总理事会利用工会运动中央机关来破坏这次进军。尽管锡特林指示在矿工从南威尔士向伦敦进军途中的各地区工人组织不要给矿工以任何支持，但我们仍然决定，进军必须举行。我们希望工人们作出响应，当然我们并没有估计错误：在进军者经过的或宿营的每一个城市都举行了群众示威，工人们还为进军伦敦的矿工组织了欢迎会。这一切都是在不顾英国职工大会

总理事会和工党执委会的阻挠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从南威尔士到伦敦的整个途中，我们粉碎了官方机构的对抗行动，从而表明不管总理事会作出什么指示，群众还是愿意联合起来帮助那些抗议南威尔士贫困状况的人们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一次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击，使他们在英国的影响的遭到破坏。

我不能更详细地谈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时间来谈它了。

现在谈另一个问题。目前，英国职工大会总理事会准备公布一个把失业者组织起来置于自己监督之下的计划。实际上这意味着什么呢？正当总理事会与蒙德携手合作共同实施意味着增加失业人数的合理化政策时，总理事会制订出把失业者组织起来的计划，这难道不是令人感到奇怪的巧合吗？我敢肯定，这里决没有任何偶然性。我不可能指出总理事会和蒙德之间有什么书面协定，但我认为，不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就能想象出总理事会与阿弗里德·蒙德所联合的一群企业主之间已就制止失业日益增长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并且总理事会将会组织失业者，使他们保持安定。依我看，这是总理事会的一种伎俩，真实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怎样担负起组织失业者的这项任务呢？共产国际应当委托各个支部按照英国现在组织的形式成立失业者的群众组织。这就是组织失业者参加日常斗争和参加争取补助金和争取支持的斗争。我们党是可以掌握对失业者的领导权的，因为党向他们提出了战斗性的政策，而这是社会民主党人不可能办到的。因此各国共产党可以赢得对失业者斗争的领导权。这场斗争不应是某个党偶尔采取的孤立行动。共产国际应当承认失业问题在全世界的重要意义，并拟定党在失业者中间进行工作的基本方法。

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失业者中间着手开展活动

并取得领导权，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失业者中没有进行任何工作。这方面的情况不像工会运动那样，工会运动的领导权是属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我们正在为从社会民主党人的手中夺取对工会的控制权而斗争，但是社会民主党在失业方面还没有影响，群众是愿意跟共产党走的。如果我们不去领导失业者，社会民主党就会去做，过若干年后共产国际将不得不说：“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开展工作的广阔天地，——我们应当深入到失业者的队伍中去，使他们摆脱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如果我们竟然忽视这个重要的问题，忽视资本主义机体上的这块溃疡，那么我们就不能说，我们真正是群众的领袖。失业者是一群不满现实的人。我们应当认真地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我们应当使他们的不满成为有组织的不满，我们应当掌握对失业者的领导权，引导他们同资本主义斗争，利用他们来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

会议休会。

第八次会议

(1928年7月25日)

主 席：斯特拉霍夫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 (继续)

琼斯 (美国)：

美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我只是想强调一下提纲中的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大国美国的地位日益巩固，美国帝国主义在墨西哥、尼加拉瓜和中美洲其他国家，在海地、圣多明各、维尔京群岛和其他西印度群岛岛屿，在菲律宾和南美各地的侵略性相应增强。最近，橡胶种植业在利比里亚兴起，这也是应当提及的事实，因为将有成千上万来自殖民地的黑人工人在这一工业部门工作，这将为美国向非洲渗透创造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力图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道，以“门户开放”政策为掩护，将中国革命镇压下去。美国在这方面的劲头正越来越大。炮轰南京便是鲜明的例证，这一事件的细节你们大家都会记得。我们应当同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行为进行斗争，加强我们对美国失业工人和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的工作，因为这些人

加入陆海军后便会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还必须努力争取北美黑人工人与来自殖民地的工人——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日本人、墨西哥人、非洲人之间的团结一致，把他们组织起来并吸收他们参加我们的党。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青年组织、学校和社会团体以及这些人常去的俱乐部等等开展好这项工作。这是反对帝国主义进攻的一种颇有成效的方法。

第三个问题是，美国和英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十分尖锐，而且愈演愈烈。

第四个问题是工会工作。应当特别注意对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的组织工作以及对老工会组织的工作。

最后一个问题是黑人的组织问题。布哈林同志极其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提纲中至少两次提到并强调了这个问题。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提高各党党员的理论水平。

由于时间有限，我不打算详谈所有这些问题，只想涉及最后两个问题，那就是未参加组织的黑人工人的组织问题和为此而必须解决的黑人的组织问题。党应当比迄今为止花费更多的精力开展这项工作。工人宣传联盟执委会同样应当有黑人参加。

根据布哈林同志的提纲和他后来在报告中强调指出的问题，我们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所有共产党都应当开展斗争，反对对居住在这些国家中的少数人种和少数民族及与他们有联系的人实行的“白人沙文主义”。

我们的代表大会至少应该有一名南非共产党的黑人代表出席，因为南非党内黑人党员人数超过了白人，而且这个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的支部。

美国共产党内的沙文主义比共产国际任何其他支部都更严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党内的黑人党员少得可怜，而美国的黑人人口达1 200万之多。我可以举出许多事例来说明，由于我们党内存在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立场，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反对种族偏见的种种表现，因此使我们党的工作受到不良影响，使组织黑人的工作受到阻碍。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应有种族偏见的立足之地，不管它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都应当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反对。这里不允许用任何客观条件和社会民主党思想残余之类的语言来进行辩解。布尔什维克应当有能力克服它，谁做不到这一点，谁就不能在共产党中立足。

为了进行辩解，有人搬出了其他许多理由。譬如，有人说，战争时期和战后，由于工业部门大量吸收工人工作，结果，加剧了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在经济上的竞争。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对的，但它不能成为白人工人工会上层诬称黑人是潜在的工贼的根据。可是，这种观点在我们的某些党员头脑中，特别是在工会宣传联盟中，也有所反映。

我们知道黑人在一些场合下被迫扮演这种角色的原因，所以毫无必要在这次会上去谈论它。

由于不懂得对北美人口中最受压迫的黑人劳动群众开展工作可能调动起来的潜在革命力量，所以导致了对这项工作重要性的估计不足。美国帝国主义者大大早于我们理解了这种革命潜力，如果不是受时间限制的话，我可以列举许多例子说明这一点。

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一种不利于党内黑人工人人数增长的不健康气氛，这也可以说是黑人之所以成为不稳定因素以及不少黑人对党存在敌对情绪和离开党的队伍的主要原因。另有一些人说，

不幸的是我们黑人同志加入党以后依然保持着黑人的身分。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现有的环境迫使我们这样做。我们自己思想上也有过分强调主观因素的倾向，这是我们应当纠正的，我们应当表现出更多的主动精神，更多地关心全党的工作。我所提到的党内目前存在的那种气氛必须改变，必须开展斗争，以便消除这种不信任的情绪。

存在这种气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过去没有系统地开展足够有力的斗争以反对沙文主义。只是在最近一段时期，我们才看到开始对种族偏见展开坚决的斗争。但这还不够。例如，底特律党组织采取了迅速而果断的措施，开除了一名党员，处分和撤销了另一些人的工作。但是，还需要再前进一步。根据政治局的记录，中央委员会会有两名成员与此事有牵连。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么，必须采取严厉措施处理这两名中央委员。

不能说党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组织黑人（福特在下面插话：“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也不能说我们在这方面什么都没有干。我们作过某些尝试。如果说由于犯了种种错误，由于缺乏明确的路线，我们未能取得成果，那是另一回事。主要是在最近几年，我们确曾作过努力，提一提其中的某些方面并加以阐述，是完全适当的。例如，召开黑人工人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尝试。这次尝试未获成功，因为代表大会准备不足，领导无方，但它终究是作了某种努力的证明。还曾作过努力，以期吸收更多的黑人参加全党性工作，这项活动还应更广泛地开展起来。

曾试图把黑人组织到各种协会中去，但这些工作同样开展得不够有力。帕塞伊克发生罢工时，也曾在黑人中做过某些工作，在黑人矿工中做过一点工作，但是，还不够有力，所以我们应当

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在最近的选举运动中和最近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250 名代表中有 25 人积极参加了各种委员会的工作。我们的选举纲领对黑人问题阐述了极其明确的意见，但是，我们不仅要把纲领写好，还要在行动中贯彻好，使写在纸上的东西得到实现。

不久前我们还曾试图渗透到南部各州中去。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我们应当尽力做好它。

我们在工作中犯有许多错误，原因是整个党的工作和黑人同志的工作还没有紧密地配合起来。一度曾出现过一种倾向，想把这项工作托付给几位党对他们已不再有影响的同志去做。布哈林同志谈到必须提高各共产党的理论水平，这对我们党也是完全适用的。我们应当自上而下地加强对全体党员的思想教育，促使他们懂得在黑人中开展工作的意义，懂得在一切地区党组织中同黑人相互密切配合的必要性。我们应当有十分明确的纲领和未来工作的明确路线。

同志们，我还就美国共产党内部的状况讲几句，然后就要结束我的发言了。我知道，我们党的领导犯了一些重大的右的错误，但是，因此而断言我们党的领导的整个政策都是右的政策，那是不正确的。其次，因为存在这些错误，就去搞派别斗争，那不是纠正这些错误的正确途径。

至于在黑人中开展工作时所犯的错误，那是整个党犯的 error，而不应当把它作为某一派的错误来议论。在不久前才加入我们党的黑人中间，有不少人在开展批评时有一种过分强调主观的倾向。我已经了解到，产生这一倾向是有客观原因的，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克服它。

我完全同意那位同志的意见，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反对一切企图重新挑起我们党内派别斗争的行为。这位同志说，对黑人的工作问题在我们党内变成了一个足球，被双方踢来踢去。我自己不止一次经历过党内的斗争，所以完全同意他这个比喻。然而我们应当作出一切努力，使这个问题不再成为派别斗争的足球。要想保持事物的现状，最可靠的办法之一就是，让自己受骗并且相信所谓在轻视这项工作方面，党内的某一派比另一派责任更大。而我要说，整个党对这项工作都是忽视的。

如果少数派说他们在对黑人的工作问题上发表了相当有力的言论，那么，这一点应当在会议纪录中反映出来。如果实际情况不是如此，那么，少数派就不能少负责任。

会上有人提到一位应当同我们代表团一起来参加会议的同志。我指的是莫尔同志。他可能有某些反党观点，我并不打算为他的观点进行辩护。我已经说过，有些客观情况往往要对这些观点负责。如果说这位同志果真对反党活动负有责任的话，那么，他的错误应该纠正。我要声明，这位同志应当被派到莫斯科来，因为我认为，他还没有对党失去信心，因为他作为美国黑人工人代表大会的正式领袖还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我认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他可以被党挽救过来，因为他还年轻，还可以改正错误，应该邀请他来出席会议。当这个问题被提交英美书记处讨论时，美国共产党全体领导人都反对这位同志前来莫斯科。这样一来，就十分不明智地在这方面搞起了派别争论，这样做至少是无助于这位同志的。

我们中某些同志特别强调，他们愿意比别人更多地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在莫斯科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这

是回心转意的好事。但是，对我们产生印象的将不是他们在这里承认些什么，而是他们回到美国后实际上做些什么。当我们对黑人的工作在黑人委员会中遭到批评的时候，某些同志企图进行辩解，这同样是不对的。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加强黑人中的组织工作的必要性。我们应当承认，对黑人群众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是可以产生巨大的革命潜力的。他们是我们手中的强大武器，是可以用来对付美国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器。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才有可能动摇美国帝国主义的基础。

格拉哈姆（捷克斯洛伐克）：

我想谈一谈提纲的第二段，这一段阐述国际关系和所谓内政问题，因此，我还将涉及捷克斯洛伐克在帝国主义大国共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

这里的基本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的态度问题。布哈林同志将这个问题摆在首位，这是对的。但是，由于提纲中有关段落结构安排上的失当，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的意义又被缩小了，它被置于与帝国主义大国本身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同等地位。可是，要知道，这两个问题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性质上都是互有区别的。

以帝国主义国家为一方和以苏联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不是别的，而是激化到了极点的阶级矛盾。一边是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另一边是执政的资产阶级。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甚至像英美之间已发展到对抗规模的那种矛盾，就实质而言，乃是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之间的矛盾。就本身的社会意义来说，这些矛盾是不能同阶级矛盾等量齐

观的。总之，从原则上考虑，这两个范畴既不应当并列于同等地位，就其意义来讲，也不应当前后衔接。

然而，不仅从原则上考虑，不能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从策略上，即从宣传上考虑，也十分重要。鉴于一旦爆发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中还存在着强烈的“保卫祖国”的思想倾向，因此，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必须特别明确地强调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战争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阶级区别。否则，我们就会削弱我们为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进攻而开展的宣传效果。布哈林同志在其提纲中阐述策略任务的一节（第6节第30条）里，间接地提到了这一点，但在我现在所说的一段内容中，却完全没有直接提到正在策划中的反苏战争的阶级性质。

我之所以认为，提纲中应有专门的一节来讲这个问题，以便从原则上阐明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矛盾的性质以及这些矛盾发展的具体阶段和形式，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问题涉及的是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所以布哈林同志提纲的基本思想无疑是正确的。重点是谈美国与英国的相互关系。提纲中的一个新的观点是，强调指出了德国在欧洲帝国主义势力的格局发生变动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德国的亲西方方针对这一格局变化所起的影响。总的来说，这个观点也是可以同意的。

然而，我认为有一种看法是错误的，即似乎德国加入反苏联盟，便意味着迄今为止帝国主义在欧洲最主要的矛盾——英法之间的矛盾就此消失，现在好像就剩下了意法之间的矛盾。英法之间争夺欧洲霸主地位的斗争，同它们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一样，仍在继续，而且意大利帝国主义（它当然也追求自己的目的）在其中扮演着英国代理人的角色。诚然，英法之间出现了某种“接

近”，因为两个力量悬殊的对手（如现在的法国，它的阵地正一个个地丧失）之间这样的关系也可以称之为接近。这是在英国占据霸权地位之下发生的“接近”。当法国在小协约国和巴尔干问题上连遭挫折的时候，德国新帝国主义的崛起及其亲“伦敦”色彩重于亲“巴黎”色彩的方针，无疑地对欧洲帝国主义内部力量的变更有着决定的意义。因为德国虽然严重地依赖于美国，却力图推行自己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摆脱美国的影响，所以应当承认，欧洲力量格局现在出现的变化是对英国有利的，但是不应忘记，法国帝国主义今后同样会竭尽全力，希图改变这种关系，使之有利于己。我们指出这一切的目的是想说明，英法矛盾今后仍将是欧洲帝国主义内部最最主要的矛盾。而提纲草案没有指出这一点。

尽管帝国主义力量的格局变化无常，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不难看出，欧洲主要存在着两种趋向：**第一种倾向是主要的、最为重要和稳定的倾向，即组成反苏联盟的倾向；第二种倾向是变化较大的倾向（因为资本主义的欧洲严重依赖于美国），这种倾向激化的趋势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正组成反对美国的联盟。**两种倾向都是英国带头搞起来的，它企图由它充当盟主，组成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联盟，第一反对苏联，第二反对美国。我看提纲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没有指出反苏联盟是以英国为首的，而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种种事件充分证实，共产国际前几次全会即已作出的上述判断是绝对正确的。

希图组成统一的反苏阵线，自然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这是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有时是如此地激烈，以致上升到第一位，使帝国主义国家格局变更中基本的反苏倾向都被冲淡。这种情况特别是在中欧，在意

大利和南斯拉夫大、小协约国和匈牙利之间的政治关系方面，表现尤为明显。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帝国主义大国力图把借助战争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问题推迟到向苏联发动军事进攻之时。它们将在何种程度上获得成功，这是另一回事。但是，这种倾向是存在的，应当估计到这种倾向并在提纲中给予应有的注意。有人说，这样做会把帝国主义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危险置于次要地步，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何况我们对问题的提法有助于提高我们为保卫苏联而开展的宣传工作的说服力并帮助它取得成功。

总之，根据我的看法，提纲中必须更为鲜明地突出以下几个问题：

(1)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矛盾的阶级性质；

(2)英国是反苏阵线的为首者这一事实；

(3)英法矛盾和过去一样，仍然是欧洲帝国主义间的主要矛盾；

(4)帝国主义者主观上企图将其相互间的军事冲突推迟到向苏联发动军事进攻之时。

以上就是我想就提纲所发表的意见。现在谈捷克斯洛伐克所处的国际地位。

捷克斯洛伐克完全受制于帝国主义大国，它的国际地位也是由此决定的。捷克斯洛伐克是英国和法国争夺的对象。最近以来，德国的影响无疑在增长。竞相争夺对捷克斯洛伐克控制权的帝国主义大国企图：首先，扩大自己的剥削范围；第二，在与主要竞争者的斗争中夺取阵地；第三，把捷克斯洛伐克拉入反苏联盟。竞争中的每个国家都各将上述倾向中的某一倾向置于首位。

英国的主要企图是将捷克斯洛伐克拉入反苏联盟；法国则把

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影响看得最重，把它当作与日益严重的来自英国和德国新帝国主义的壓力相抗衡的力量；而对德国来说——至少在目前时期如此——，实行经济扩张是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当然，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试图不顾自己所处的从属状态，在某种范围内实行独立的政策。顺便说一句，小协约国就是这种倾向的一种表现，作为经济上最强的成员国，捷克斯洛伐克力图在其中起领导作用。小协约国是在法国的保护下成立的，它也是法国的政治工具。小协约国的基本任务是保证和平条约的执行，而在这方面法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和小协约国成员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

德国帝国主义的复活和由此而引起的欧洲力量分布的变化必然会动摇小协约国的地位。事实上，我们就是小协约国垮台的见证人。小协约国各个国家在圣哥达冲突问题和意南冲突中的态度就是鲜明的例证。小协约国的垮台，一方面是英国势力增长的直接反映和德国帝国主义日益加强的间接反映，另一方面则是法国帝国主义影响衰落的表现。与此同时，在小协约国解体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我所说的英国同法国某种接近的成分。这在意南冲突中反映最为明显，在发生冲突的过程中法国一直促使南斯拉夫对意大利帝国主义采取忍让态度。这就是在目前英法两国相互关系中也可以看到的接近过程，虽然所占比例还不大。

英国和意大利都从自己的政策利益出发利用和平条约造成的矛盾。为此，它们软硬兼施，诱惑和鞭打并用。一方面百般承诺，另一方面威胁恫吓。它们答应在修改特里阿农条约时给匈牙利以帮助，以此威胁小协约国成员国。但是，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联合

所有这些国家，组成在它们控制之下的反苏联盟。

在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中，这一点反映得最为明显。对遵守和平条约，特别是特里阿农条约的关心，使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无论在军事还是在政治方面都同法国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法捷之间经济联系不多，但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很大，原因就在于此。由于同样的原因，英国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在修改特里阿农条约问题上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罗瑟米尔的鼓动性宣传和意大利示威性地表示支持匈牙利关于修改条约的要求，都可以作为施加这种压力的明显例子。第二个带有军事性质的攻击发生在圣哥达冲突和向匈牙利偷运意大利武器的时候。第三个行动是经济性质的运动。这就是英国降低蔗糖的税收，这对捷克斯洛伐克向英国输出精制糖块造成了严重的障碍。了解制糖工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意义和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出口中所占的极大比重的人，一定会理解英国这一步骤的严重性。除此之外，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的做法，对捷克斯洛伐克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也有不良的影响。英国帝国主义无疑向这里伸出了很长的魔爪。

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对英国日益增强的压力作出了何种反应呢？它的反应是，金钱退却，交出阵地，始终一贯而且颇为卖力地表示愿为英国的基本目标服务，也就是说采取最紧密联系的方式靠拢反苏统一阵线和参加反苏战争的准备。我们有各种性质的有说服力的例子，足以证明这一点。

一类例子属于国际性事例。捷克斯洛伐克至今不承认苏联政府，尽管这样做给它的经济利益带来严重的损害。捷克斯洛伐克正逐步同德国“接近”，而这不仅仅是出于经济需要的压力，而且

是在英国的压力之下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对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挑衅行为不置一词，而且在英国的压力下，正在寻求同匈牙利“妥协”的途径。

第二类例子属于内政方面的事例。在捷克资产阶级同少数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德国资产阶级接近的同时，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在捷克斯洛伐克组成多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府联盟（当然，内政问题在组成这一政府过程中起着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正加紧迫害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企图在一旦发生战争时确保自己的后方稳定。在采取这一步骤时，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甚至并不想掩盖英国在这种向无产阶级，特别是向共产党进攻中所起的重大影响。一遇机会，它就喋喋不休地宣称，国外，也就是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不信任”的主要原因是，捷克斯洛伐克还存在着一个群众性的地下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最近在政治、法律、行政各方面耍弄的手腕，目的都是为了扼杀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

第三类是社会性质的例子。同各地一样，在捷克斯洛伐克，资本家组织同国家机构的结合以及改良主义上层同国家机构和资本家组织的结合正加速进行。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社会民主党完全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的对外政策，而且经常带头诽谤苏联。更有甚者，社会民主党的一位代表在罗瑟米尔发言时，还第一个公开表示捷克斯洛伐克自愿在反苏斗争中为英国效劳，声称捷克斯洛伐克将是比匈牙利更好的对付布尔什维主义，即对付苏联的屏障，说英国利用匈牙利作为自己的工具是不智之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的政策不满只是由于这项政策还不能使德国资产阶级完全满意，因为它“依然带有原来的亲

法色彩”。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向德国和英国方面作了变化，所以也就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方面的充分赞赏了。

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同时在为自己准备法西斯后备力量。虽然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正式的法西斯主义的只是一小撮冒险分子和无赖，但是，法西斯主义得到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支持，即使不是近期，将来也无疑是一种危险。此外，资本家们正加紧在企业中培植法西斯主义，他们在企业中建立黄色“工会”，这些工会都由大资本的党——国家民主党实行直接的政治领导。这个运动自然还不够稳固，但是来自这方面的危险却比来自“官方的法西斯主义”方面的危险严重得多。除此以外，资产阶级还在形形色色的行会和联合会的名义下组织和武装一种法西斯警察。属于这类组织的其他组织有：叫做农民骑兵队的射击协会、传统的民族体育组织“雄鹰”、教权主义体操联合会“鹰”等等。最后，由于法西斯主义和改良主义实质上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所以捷克的社会民主党体操联合会和亲“社会党”的特种兵团战士联合会都属于捷克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这种组织中有数十万而不是数万无产者、半无产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所以，法西斯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值得注意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正在起劲地鼓吹工会国家化，特别是在当前，它正在改良主义上层分子的积极协助下力图使合作社运动与国家机构和资本家机构实行同化。

第四类现象属于军事技术性质。这类现象可以证明捷克斯洛伐克主要为了英国的利益而在准备反对苏联的战争。捷克斯洛伐克建立有不受议会监督的特别军备基金，这项基金不包括在经常的军费预算之内。法律上规定缩短服兵役期限，实际上服役期仍

为18个月。军官和士官队伍在扩大。士兵被剥夺了选举权，并且加强了纪律约束。仿效法国的榜样召开了专门军事会议并且正在郑重其事地考虑按照保罗·邦古的法国模式颁布一项法令。兵工厂的生产搞得火热，规模越来越大。航空工业和化学工业享受国家的津贴，新的化工部门正在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的反革命势力提供武器，并且打算变成为反苏战争服务的巨大军火库。

简单地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已经是反苏联盟中一个积极活跃的因素，在策划的反苏战争中，它将担负重大的任务。捷克斯洛伐克摇摆于法国和英国以至某种程度上和德国之间，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它并没有使上述倾向发生任何变化。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间无疑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危险。决不能低估这一危险。但是，如果承认我们在开头部分阐述的论点，即帝国主义大国有意将它们相互之间军事冲突的爆发推迟到从军事上消灭苏联的时候的论点，是正确的话，那么，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基本矛盾，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间比较次要的冲突就退居第二位了。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表示愿意在反苏活动中为更大的帝国主义强国的利益服务，指望通过这种办法加强自己在同匈牙利这个对手斗争中的地位。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怎样为反对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这种外交方针而斗争的呢？我不打算在狭义上谈捷共同战争危险所作的斗争，我只能概括地讲一讲。总的说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对与捷克斯洛伐克对外政策有关的所有事件、现象和问题都没有作出足够的反应。不错，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确实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观点：确认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日益增长

并把这一影响的增长与捷克斯洛伐克被逐步拉入反苏阵线同等看待。但是，在同这一倾向进行的实际斗争中，我们往往落在形势之后，或是局限于在报刊上进行宣传。例如，对**罗瑟米尔的发言**作出回答的问题，在几个月内一直是斯洛伐克和乌克兰喀尔巴阡山地区目前最紧迫的、也是引起广大群众注目的问题，可是我们却严重耽误了开展运动的时机，即使后来开展了运动，但也未能超出报刊的范围。在**圣哥达**冲突期间，我们没有给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爱国党**的诽谤以应有的回击，而我们在议会中和报刊上开展的运动又未能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输出武器的问题上，我们在发表宣言之前一直持消极的态度，只是在报刊上开展了相当无力的运动。最后，当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紧张忙碌地向广大政治觉悟不高的群众宣传**共产党的存在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对外政策上遭到困难的主要原因**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在群众中给这一运动以应有的回击。然而，十分清楚，如能这样做，那对于争取党的合法存在是会有重大意义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存在这些缺点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无产阶级运动一向存在着地方主义的陋习；其次是因为没有通过对国际问题认真而有计划的分析，充分地开展反对这种陋习的斗争；最后，在日常工作中、发言中和做鼓动工作时还不很善于把这些问题同工人阶级迫切的现实斗争和利益结合起来。

尽管存在这些缺点，但是，仍可肯定，捷共在上述领域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与前几年相比，捷共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能在党内创造一定的前提条件，它在这方面的布尔什维克化进程也必将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黑克尔特（德国）：

鉴于总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决定开展强有力的斗争以反对改良主义。布哈林同志在其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对改良主义的策略上的这一变化，要求我们加紧开展工作。十分明显，改良主义者们也必将采取相应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国际发出的战斗号召。我们看到，在一系列国家中，改良主义对思想激进的工人，特别是在工会组织中的工人的进攻已极度激化。改良主义者对反对派的这次猛烈进攻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的队伍中出现了某种不积极贯彻第九次全会决议，特别是与这些决议精神完全一致的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消极态度。在许多国家中还有一些同志为这种消极态度寻找根据，说什么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危险的，它是路特·费舍时代德国采用过的方法的重演。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说，由于我们采取的策略和所通过的决议，我们自己正在挑动人们开除持反对态度的工会工作者和对反对派采取阿姆斯特丹国际所采取的行动。最后，他们还声称，根本不需要作这些决议。说什么产生这些决议是出于某种急不可待的情绪；改良主义背叛工人阶级已不止一次，因此，使人不可理解的是，现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么有什么必要改变我们的态度呢？与这种情况相反，我们必须指出，最近几个月来，改良主义对工人运动队伍中持反对态度的人的进攻在数量方面也大大加强了。这种对反对派的进攻在所有国家都发生了，而且改良主义采取的手段是十分残酷无情的。改良主义者到处分裂工会，排挤工会组织中持反对态度的优秀领导者。在考察这一事态的过程中，必须说，黑格尔关于数量转化为质量的一句老话是正确的。总之，即使仅从改良主义者发动攻击的数量看，也可看

到，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仅涉及攻击的数量，而且涉及攻击的质量。改良主义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共同语言越多，它参加资产阶级的经济建设活动越卖力，它把资产阶级经济的顺利发展同工人阶级的利益越是混为一谈，那么，它就必然会对工人阶级中的革命部分，对工人阶级中的马克思部分发动更激烈的进攻。这一点在改良主义者的一切行动中都有所暴露，如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他们的民族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弄得他们把资本主义的复苏也当成工人阶级的任务加以宣传。这也是他们对仲裁问题的态度所造成的。他们必须赞成强制性仲裁，因为靠这种办法才能缓和和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矛盾。出于同样的原因，改良主义对合理化也同样采取了欢迎和鼓励的态度，而不去区分是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合理化还是另一种经济制度条件下的合理化。在它看来，重要的是合理化本身，所以任何经济制度下的合理化都是好的。这就是改良主义不能也不愿同合理化造成的后果作斗争的原因所在。不错，它承认合理化造成的事实，它对美国经济创造了所谓奇迹并给工人提供高工资，而其他国家却做不到这一点感到惊奇。改良主义不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工资。所以它要阻拦工人利用形势开展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按照改良主义者的看法，按照他们的理论，这种斗争不会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例如，德国工厂工人联合会（化工部门工人参加这一组织）的改良主义者就是这样解释这一点的，他们说，通过与化工部门领导人的谈判，工资提高了6分尼，而同一地区五金工人通过4周罢工才提高工资5分尼。总之，通过同资本家进行的不打乱经济活动的谈判，比依靠罢工更容易取得某种收获。不言而喻，这种

理论必然使改良主义走向蒙德主义，走向保持工业稳定的思想，走向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新理论和经济民主论。这种理论也把改良主义同民族资本的利益拴在一起，使它丧失一切按国际团结精神行事的能力，相反，它得同希望实现国际团结和开展严肃斗争的工人去斗争。我们在英国煤矿工人罢工期间就看到过这种例子。当时，改良主义者提出的问题不是如何帮助英国的矿工取得同资本家斗争的胜利，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帮助我国的资本家重新夺回他们在战争时期丧失的那部分市场，怎样为由于实现合理化而日益发展的经济获取更多的市场？由此可见，他们捍卫的是民族煤炭工业的利益。在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等国，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总之，到处都有这类现象。发表有利于声援矿工斗争的言论的工人遭到迫害，被开除出工会。

我们看到，改良主义者支持本国统治阶级的战争政策完全是有意意识的，因为战舰、士兵以及潜艇都是为保卫本国市场所必需，都是为了保证或扩大本国工业对世界市场的贪欲。因此，在资本主义遇到危机的国家中，改良主义总是暴露出它极端偏向于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改良主义充斥着保证工业稳定的思想，再往前走一步，就会发展为法西斯主义，就会去维护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就会拥护采取严厉手段对付本国的革命分子。

总之，我们已经看到，改良主义终究还是有变化的，所以我们不能不比迄今为止更为坚决得多地同它斗争。不言而喻，这一斗争将会产生它的后果。

但是，除了这些主观上的原因之外，也有客观上的原因，经济形势的变化也要求我们采取比过去坚决得多和严肃得多的态度去同改良主义斗争，并且更明确地同它划清界线。

相对的稳定未能转化为持久的稳定，所以在分析资本主义大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时，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动摇不定的分子。根据已经查实的事实，美国的失业工人人数已超过400万，世界出现了煤炭危机，美国过剩的矿工人数已达30万，英国过剩的矿工也有此数，德国有5万名矿工被列入裁减之列。在这种情况下之下说资本主义在改造中是不恰当的，这样会把我们引向完全错误的方针。

合理化使资本主义的这种状况更为加剧，而且激化速度很快。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生产能力与市场容量之间的比例失调越来越明显。这种比例失调的情况是如此地严重，以致一些出名的资本家也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一点。大化学企业、萨克森的林纳康采恩的经理、商业顾问齐赫尔在7月20日的《探索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成绩何在？”的文章。他在文中证实说，在所有实行合理化的生产部门，价格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他还提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大权威人士、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曾提出过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源是否在于工资的提高呢？”卡塞尔断言，由于工人享有工资升降的控制权，在实行合理化的部门中便出现了价格上涨的现象。齐赫尔则认为，不能断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工人对工资的控制权。他接着写道：“遗憾的是，日内瓦国际经济会议拒绝研究这种价格上涨现象。”他不同意那种认为工资提高是造成价格上涨的原因的看法，还提出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观点：“在没有可能采取适当方法扩大销售的情况下，合理化只能使产品涨价，而不是降价。”他认为，这应当是所有人都清楚的。

总之，一位担任领导人的资本家说，合理化导致了价格的上

涨，原因不在于工资，而是其他的因素。他在文章结尾发表了一个有趣的见解：

“而有一件事实是奇怪的：引起价格上涨的原因不是由于缺乏原料、粮食或生产资料（因为这些货物的指数是与货币贬值的总水平相一致的），而仅仅是因为那些工业部门极其卖力地推行了合理化。合理化是否正确，完全要看价格是否下降，如果它不能为国民经济减轻这个负担，或者甚至引起价格的上涨（如现在显然存在的那样），那最好放弃它。”

实行合理化的结果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价格，这意味什么呢？要知道这可是套在资本主义头上的绞索，要摆脱它只有两个办法：为重新瓜分市场而发动战争；或是向工人阶级发动新的大规模的进攻。

对此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对这些情况决不能有所忽视。问题在于我们应当根据这一前景来确定自己的政策。最近的将来是否会爆发战争，虽然可能性很大，但我们不敢肯定。但是，资本家向工人阶级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一点已无可怀疑，所有国家都已存在这种现象。保持工业部门的稳定，只是资本家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一种隐蔽的形式。在所有国家中，工人的劳动强度和生产力都提高了，可是，他们的实际工资并未提高。这一事实应当成为我们在工运队伍中开展整个活动的依据。我们应当再次采取进攻政策，因为只有借助于进攻性政策，共产国际才能团结无产阶级去反对资本家和机会主义者，给无产阶级指明新的方针。对此我们应具有充分的信心，否则，我们就不能克服面临的困难。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再次振奋斗争意志的现在，特别需要指出这一点。

因此，有一种理论是应该坚决予以驳斥的，这种理论说什么，改良主义所维护的幻想或改良主义的幻想在工人阶级头脑中已经扎根，似乎我们就应当从这些幻想出发去考虑问题。这种理论会给我们造成极为不利的情况。所以必须同这种论点展开严肃的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如第九次全会提纲指出的那样，同共产国际队伍中的右倾思潮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有人认为，似乎不能选举没有得到改良主义者控制的工会所承认的罢工委员会，似乎没有改良主义领袖参加就不能开始斗争，否则就要失败，似乎执行那样的政策就会把我们引向盲动主义，对于所有这些观点都必须开展有力的斗争。放弃斗争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必将失败无疑。改良主义者不可能也不会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应当领导工人组织的斗争，而且我们没有权利说，只有在胜利有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去领导这场斗争。在斗争的开始阶段谁也不能保证有这种必胜的可能。否则就会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含义就是，工人运动的发展不会由胜利到胜利，直至最后高奏凯歌，我们也要经历一系列的失败。在引导工人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时候，在工人进行防御和无法避免失败的时候，应当使这种失败不至于涣散工人队伍，而要带领他们投入新的更强大的进攻。

这就是我们在罢工战略方面应当学会和必须规定的东西。

我还想就统一运动问题说几句话。看来在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里，超越社会民主党领袖和改良主义组织的领袖而与他们的工人建立统一战线的初步尝试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某些同志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根本应该抛弃统一战线策略。布哈林同志把这种观点称作是错误的观点，我看是有充分根据的。不过，我们应当完全公开和明确地宣布，只有当统一战线策略打破牢固扎根于工

人阶级头脑中的种种幻想时，它才是有意义的。如果像德国出版的《统一》杂志发表的那种说法：“必须相信，您对社会民主党是革命党这一点并未失去信心”，那么，这种说法决不会有利于统一的事业，相反，会模糊工人阶级的意识，给我们队伍中的敌对分子增添力量。这种错误无论如何应该避免。尤其应该避免重犯挪威的同志们和芬兰的同志们所犯的那些错误。这些同志被中央党人说服了，同意不该批准哥本哈根协定和芬兰—挪威—俄国条约，因为他们（仍然是受中央党和特兰梅尔的影响）认为，必须向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袖们提出建议，以便同他们一道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这是当然的）建立广泛而全面的工人联合组织。阿姆斯特丹国际对我们的挪威同志和芬兰同志的回答是，他们根本不考虑改变自己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不考虑改变他们根据 1924 年维也纳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所采取的反对派立场。我们应当通过这些事实学到一些东西，更坚定、更果断地反对改良主义，少把眼睛盯住上层人物，而要在对我们实行工人群众的革命化最需要的地方，即大型企业中争取统一战线的基层群众。我们应当完全公开地宣布，共产党和革命的工会运动还没有在大型企业深深扎根。遗憾的是，我们仍然只是小型企业工人的组织，是夹带着许多工人贵族阶层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组织。如果我们不把党的全部力量用来组织大型企业的工人，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群众基础，当形势发展到必须进行革命战斗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赢得对工会运动的领导权。所以我们恳请大会坚决指出，第九次全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又将这些决议具体化了）应当成为所有共产党的共同财富，各国共产党都必须全力帮助红色工会国际成为能率领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罢工斗争的强大

因素。

萨穆埃利松（瑞典）：

我想就布哈林同志的报告谈几点意见。这些意见与报告提出的政治路线毫不矛盾，相反，是进一步强调布哈林同志的观点。虽然我讲的意见只涉及世界一侧的一个角落，即我们党活动于其中的瑞典。

我们代表团基本上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提纲。诚然，我们代表团对提纲的讨论尚未结束，可能提出的修改建议和其他建议将在以后提交给委员会。

我国的资本主义迄今为止一直是带有地方色彩的资本主义，可是现在它不仅力图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而且企图直接按帝国主义的方向行事。这首先是指火柴托拉斯——克雷格康采恩，这个托拉斯的火柴已经成功地销售到了除苏联之外的世界各个地方。这个托拉斯从不隐瞒它使用的美国式收买手段，它向全世界公开它的做法，向陷于破产境地的国家提供数量不等的贷款，以便保持它在这些国家销售火柴的垄断地位。它买下了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而且出色地变换着付款的条件。例如，几个星期之前，它买下了匈牙利一家火柴工业托拉斯，而给政治上处于领导地位的大地主所有的工厂所付的款大大超过给其他工厂所付的数额。这个原先纯属瑞典的企业，后来吸收了美国资本，接着又吸收了英国资本，现在是到处吸收资本。我国还有一些这种性质的其他企业，尽管表现形式还不像这样突出。所有这些企业都明目张胆地直接采用着帝国主义的行为方式，一心热衷于成为帝国主义大国的据点和参与反对苏联的阴谋活动。例如，瑞典的一家造纸业大托拉斯不久前在哥本哈根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以便共同瓜分

世界报纸市场。一些制造分离器和滚珠轴承的工厂也值得一提。

由此可见，我们也被卷入了（虽然速度比中欧国家慢一些）会导致将来战争的事件，我们那里也不乏自愿为战争准备提供直接服务的势力。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不久前曾就这个问题发表如下见解，他说，瑞典加入国际联盟十分可能使瑞典处于将来不得不参加对苏作战的境地。

同一现象的另一面是，由于存在着垄断企业，对付工人阶级更有了极大的方便。例如，几个月前，我们那里的马达制造公司——斯德哥尔摩“通用汽车公司”所属各大工厂宣布举行罢工，可是工人们失败了，主要原因就是那个企业在欧洲、在丹麦和荷兰等地还有一批工厂，而这些工厂的生产照样进行，毫未停顿。资产阶级报刊便利用工人罢工失败的事例，渲染美国式资本主义方法获得了巨大胜利。

在现在正在进行的瑞典矿工罢工过程中，就有一大批工贼在继续装货。满载矿石的轮船驶往什切青和鹿特丹，由组织好的码头工人在那里卸货，而且谁也不会想到，这是属于抵制装卸的货物。

垄断企业为资本家各个击破工人提供了条件。我觉得，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对这种情况注意得太少了。不错，就这个问题所写的理论材料是有的，瓦尔加和其他同志都曾写过这方面的材料，但是，迄今为止，在这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是十分不够的。

瑞典资本主义的稳定过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合理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顺便说一句，在瑞典—美国联营火柴托拉斯内部情况也是如此，那里的工人们说，新机器是对他们的抢劫，使他们失去了面包。

我国出现的另一重要情况是，整个工业部门不断发生严重冲突、同盟歇业和罢工。现在，矿山机械制造业局部性的总罢工仍在进行。这个工业部门加入工会的工人们同兄弟的俄国工会订有协议，从1月1日起，每周可从俄国工会得到3万克朗支援罢工款。资产阶级对此暴跳如雷，而工人却从中看到，同俄国阶级兄弟的团结正在产生实际的效果。与此相反，阿姆斯特丹分子几乎对运动不提供任何一点援助。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正努力利用俄瑞协定，把它作为走向工会的国际团结的一项最好的措施。

除此之外，两三个月前我们那里的造纸工业部门和一部分锯木厂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共产党人赢得并控制了对这几次大规模冲突的领导权，而且与社会民主党领袖和改良主义领袖们的愿望相反，我们引导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斗争开始阶段，领导权控制在社会民主党人手中，他们先后三次打算同企业主签订失败主义的协定，三次都被共产党人阻止住了。这样，我们第一次从社会民主党人手中夺得了领导权。

再就强制性仲裁问题讲几句。资产阶级不久前实行了一项针对工人和工会运动的强制性法令。我们动员工人同这项反工会法令展开了斗争。斗争中，我们提出了“举行24小时罢工以抗议这项暴力法案”的口号。

社会民主党却坚决反对这一行动，认为那是小题大做。经过我们的宣传，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产生了不满，他们希望斗争，他们要求进行斗争。社会民主党不得不迁就工人们的情绪，宣布实行3小时总罢工以示抗议。这就使我们党处于不错的地位。第一，与社会民主党的愿望相悖，抗议罢工终于举行了；第二，我们实际上成功地引导工人向社会民主党展开了斗争，因为社会民

主党原则上不反对强制性仲裁，甚至还以过去的执政党的身分在这方面表现它的主动精神。我们在有些地区还使罢工超过了工会领袖们规定的3小时期限。参加这次抗议罢工的工人约有30万，这一事实是很值得一书的。但是，我们党并不因此而满足，它正极其坚定地继续开展反对强制性仲裁法令的斗争。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决不承认强制性仲裁！废除强制仲裁法！取消一切协定！”

我们把这一斗争看作是在国际范围内同依靠资产阶级法制瓦解工人阶级队伍的企图作斗争的一环。当前挪威建筑工人的斗争就是以这种态度开展斗争的光辉实践。

我们那里也有蒙德主义这种国际性现象。许多工会领袖都是蒙德先生理论的积极拥护者。瑞典最大的工会办的《五金工人报》公开地介绍瑞典工业的困难处境，还要求工人随时想到企业主的力量和在当前劳动市场出现冲突时不要忘记他们的力量。这是露骨地宣传失败情绪。有时还有这种情况：工会联合会的一些先生们准备同企业主组织的代表一起，共同讨论社会苦难——失业问题。往往某个万贯家财的银行老板、一个贫困不堪的纺织女工或一个瑞典皇子都可能成为提出召开会议讨论各阶级间实行社会和睦问题的倡议人。

布哈林同志在谈到社会民主党的时候说过，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机构和市政机构取得的地盘越来越多了，因此，它直接关心的是如何维护国家和市政机关的利益，也就是说关心着如何直接地采取行动反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的斗争。我们那里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例如，社会民主党的市政官员就网罗过一批工贼，目的是促使他们自己党的同志、参加罢工的工人遭到失败。

伴随着普遍的右倾和社会民主党接近资产阶级的倾向而出现

的是，对无产阶级的一系列叛卖行为：推行实行武装的纲领（连许多保守党人也赞赏这一纲领）；减轻大资本的税收负担；实行新的关税；加紧对苏联的诽谤；掀起反对工会团结的运动，特别是企图阻挠哥本哈根团结会议的工作，想使这项工作彻底失败。

可是，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却力图装出一副样子，似乎它奉行的是反对派的政策并在同右翼阵营作斗争。而实际上它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左翼阵营。目前，社会民主党的打算是在秋季选举后单独组成或与资产阶级联合组成政府。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个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含义和性质，可以预料，一旦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今后必将对工人阶级采取敌视的态度和措施。

再就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所谓反对派讲几句。这个反对派的成分是五花八门的，一部分是根本不属于左派分子的和平主义者，还有某些巧于工计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想通过自己持反对派立场的办法在工人阶级面前为社会民主党涂脂抹粉。最后，还有被我们党开除出去的一批追随霍格伦的分子。同一切的叛徒一样，他们属于彻头彻尾的坏分子。

危险当然在于这批假反对派暂时还能欺骗工人群众，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延缓社会民主党衰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社会民主党巩固自己的阵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产阶级的左派也在出现。但是，他们没有形成为一个稳定的反对派。倒是职工运动中的左派比较稳定。

我们党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斗争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赢得了新的党员。从党发生最后一次分裂以来，我们的党员人数增加了1倍多，从7 000发展到16 000人。与此同时，我们还使党的思想水平有所提高。一个党前进了，可是却引起共产国际组织部

的某种怀疑，甚至向我们提出诸如“这种发展是否健康”这样的问题。这种现象在共产国际中是很少见的。

我们究竟是怎样赢得新的党员的呢？你们可以想象得到，这当然是不无困难和颇为艰巨的。不能说他们早已站到我们门口，只等吸收进来。绝不是这种情况。我们是在斗争中，在同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进行激烈的斗争中争取到这些党员的。我要再次坚决地强烈指出，这是在同社会民主党进行的斗争中赢得的。

我不妨列举我们开展过的几次运动：

反对社会民主党加强海军的政策运动。

反对强制性仲裁的运动。

保护萨柯和樊塞蒂的运动。这也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运动，因为社会民主党不想组织这次运动。

我们的市政选举。

为回击社会民主党的反苏诽谤和第二国际以“反对没有民主的国家的运动”口号为伪装而进行的反苏活动，我们成功地开展了一次活动。与上述口号针锋相对，我们提出了“反对民主的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以第二国际名义发起运动的策烈铁里先生遭到了令人注目的失败。

为争取工会团结而开展的运动。

支援失业工人的运动。

反对工贼的活动。

领导造纸工业部门工人的斗争并使他们赢得了胜利。

领导当前的矿工大罢工，等等，等等。

我们结合上述各次运动和活动，都开展了征集党员的工作。

除此之外，我们每年都要开展几次专门征集党员的运动，这

已成为我们的一个良好的传统，因为通过这种办法我们才在实际上击败了霍格伦。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我们都激烈地抨击了社会民主党人，并与他们的路线针锋相对，向工人们阐明我们自己的路线。我们几乎不让自己有一点喘息的机会，因为运动接连不断，一个接着一个。所有这些运动对活跃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像我们这样的党，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性较差的国度里开展工作，不可能没有缺点和弱点。理论力量不足，学习较差，对农民、妇女运动和合作社的工作开展较差等等都属于这类缺点。但是，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不断取得进展，而且我们希望，这一过程今后也不会中断。

总之，我认为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因为我们的党员一部分来自共青团，一部分是通过多次的运动才争取来的。在艰苦的斗争中发展的同志，本身就是革命者而且又愿意和我们一道进行斗争的同志是不可能成为不可靠分子的。

恰恰相反，如果大会能讨论下面这样的问题，那倒是很恰当的：为什么许多支部在思想方面进步很快？却不见它们在组织发展上有什么成就呢？这是怎么回事？有条件公开活动的党却没有取得进展（虽然资产阶级正是在最近时期采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残酷、更激烈的手段对付我们，而且白色恐怖使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遭受牺牲）。而这些都是发生社会民主党日复一日地背叛社会主义的时候。如果说四年来由于社会民主党搞了一系列如此可耻的反对工人阶级的行为，因而使共产国际没有可能在组织上争取广大群众的话，那么，我觉得提出下面的希望是合适的，即希望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能再次审查一下这样的问题：是否有必

要再次强调一下列宁关于“接近群众”的口号并要求将这一口号付诸实施。

多列士（法国）：

塞马尔同志在其发言中详尽地阐述了当前资本主义阵营矛盾的发展情况。而我受法国代表团的委托，就我们党的策略和党内状况问题发言。

我想讲一讲布哈林同志正确地称之为共产国际及其主要支部策略的“转折点”所包含的内容及我们各党有可能实行这种转折的思想因素和政治因素。

当前的形势是，随着合理化的进展，出现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左倾化，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幻想有所抬头，因此，无产阶级队伍本身发生着某种分化现象。问题就在于，在这种形势之下应当如何提出争取群众的问题。

某些同志有时只愿作泛泛的考虑，认为现在左倾化还只是个别现象。可是，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当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因所谓“合理化”的政策而大受其害的时候，它的另一些阶层却处于较为优越地位。由于受政府的政策及企业主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影响，在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中再次出现了某种幻想，这样一来，我们党和处于共产党影响下的工会组织在执行任务时感到特别艰巨和复杂。不过，总的原则是十分清楚的，首先，我们应当在工人阶级中受剥削最深和能起重大作用的阶层中加强我们的工作。例如，在法国，就要在人数多达 250 万的外国工人中、在非熟练工人中、在青工中、在女工中、在殖民地工人中加强工作。我们必须善于组织实现工人阶级日常要求的斗争，正确表达这些要求，要使某一些口号同工厂和组织中的每一个具体场合相适应，通过这些

口号应能发动所有无产阶级群众，发动整个工人阶级。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在对待社会民主党，包括在统一战线策略问题上采取正确的立场；第二，认真地从事工会工作和组织工作。

在这里有人已经讲到，目前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在平行发展。让我们来看一看，当前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依靠的是哪些人。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依靠的是在合理化的当前阶段处于相对说来比较有利地位的那些无产阶级阶层，是那些熟练工人。他们不仅在合理化的这个最初阶段没有受到过份严重的剥削，而且有时甚至能够增加工资。此外，社会民主党还依靠国家官员和职员，以及还有——这一点十分重要——怀有左倾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的已经向左转的阶层。这种现象在各种国家都可以看到。在社会党最近一次图卢兹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首领布吕姆宣称：

“我们党在农村取得了胜利，但在工业中心城市遭到失败：这种状态可能最终导致我们运动的重心发生转移。”

这无疑包含着不能再把社会民主党看作是几乎完全以无产阶级为依靠对象的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组织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许多同志却仍然这样认为。我们看到社会民主党及其所有分子（普通党员、党的领导干部，以及支持党的选民）的社会成分的质的变化和改变，而这些变化同时既是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原因，又是其政策的结果。我不准备对在这里已经谈论很多的问题多作说明，但是，我想着重强调从中必然要得出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共产党和社会党根本不可能抱有某种共同的目的，所有人都应当看清社会党并不想实现（即使用合法的和平的方式）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社会党同共产党的革命策略混为一谈，因为仅仅

只有共产党一心力求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区分两种各不相干的现象：引导人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政策和避开社会主义而巩固资产阶级地位的“社会党人”的政策。

但是，还在去年 11 月份，在向党员发表了表述我党选举策略和总政策的基本路线的“公开信”之后，就有一些同志写道，我们同社会民主党有共同的目的和任务！

如果正直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以为我们同社会民主党抱有共同的目的，以为我们的分歧只涉及策略问题，以为我们只不过比社会党人更加“坚毅”，以为社会党人最终会走向同一个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目的，就是欺骗这些工人和支持他们的幻想。

同样，也不能相信左的词藻，以为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似乎有一个左翼派别，他们将采用和贯彻一种与一般被认作是右派社会党人的纲领不同的纲领。

当然，在各国社会党内部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因素影响这些党的总的政策。有时来自社会党工人的抵制就是这样的因素，因为社会党人不得不用左的词句来争取这些工人以便实行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因此，右派社会党人也好，左派社会党人也好，他们尽管采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词句，实行的是同一种政策，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我们直到现在仍然坚持认为这样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在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法国代表团的某些同志针对我们提出的必须在共产党和同资产阶级相勾结的整个社会党之间划清界限的论点，提出应当在社会党内部划清界限，说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争取这个党的左翼，以便借以加深左翼与右翼之间的鸿沟。按照这种说法，似乎果真能够把社会民主党分成为右翼和左

翼了。

某些同志断言，我们的路线实质上是否认统一战线策略。同志们，绝非如此。我们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日益尖锐绝不意味着要放弃统一战线策略。这只能意味着，我们应当更加注意下层的统一战线，更加注意工厂中的直接斗争。

法国只在北部地区有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直到最近，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中拥有压倒一切的影响。而且应当说，这种状况对我们那些领导这个地区组织并对我们的选举策略有批评意见的同志们也并非毫无影响。但是即使在那里，而且尽管社会党首领们掀起了一个针对我们的狂热的宣传运动，说什么“你们共产党人的做法对反动派有利”，工人们——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改良主义者——自从这场宣传运动以来已经不止一次地实行统一战线，而这种情况以前一次也不曾有过。

我们同社会党的斗争使我们便于向社会党的工人解释我们的政策，而且这种斗争除此之外丝毫不妨碍例如在阿鲁恩、格维吕、昂赞矿区、马勒山区等地贯彻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

下面谈谈关于必须认真开展工会工作的问题。首先是组织工作。法国的情况是，在1 300—1 400万工人中参加工会的只有100万人。很明显，我们的任务是把我们的工作转向没有组织起来的这1 200—1 300万工人。必须按照产业原则重新组织工会运动，做到把我们的运动自上而下地大大集中起来，但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吸收大量工人参加工会工作、参加讨论工会组织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方法来加强自下而上的民主。必须把工人的日常要求记载下来。最后还必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工会运动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议论得太久了，而且纯粹是从各种组织（改良主义

组织和革命组织) 上层人物之间无休止的谈判和确定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讨论的。必须强调指出，工会运动团结统一问题的重心不在于领袖们举行谈判，而在于我们同改良派工人进行共同的斗争。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因为法国改良主义首领奉行的同国家经济委员会合作、同政府机关合作的政策，使我们能够有力地工人们证明，这些首领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无产阶级的利益。

我还想就统一总工会问题谈几句话。由于我们共产党对这个组织具有影响，因而也要对它的纲领和策略承担责任。必须指出，当前在我们革命工会运动内部，由于企业主和政府的压力以及改良主义幻想再次抬头，正在出现改良主义思潮。我们甚至看到倾向于“自治主义”和“联邦主义”的趋势，以及企图参加资本家和工人平起平坐的各种组织的某种愿望。有人把参加这类组织不是当作革命工会不断提出抗议的形式，而是当作某种合作。所有这些趋向，就其迄今为止的表现形式而言，说明存在一种同共产党的工会路线作斗争的某种暗流。这种对抗行动还没有表现为公开的形式。这些人还没有公开宣布说他们认为共产党在工会方面的某一种行动方式不正确。暂时这种不满情绪表现为党和工会关系中的某种尴尬局面。很明显，工会和党的关系中的这种不正常现象是存在分歧的结果。但是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工会和党的关系的这种表面现象，而在于必须使参加工会的工人和我们自己的工会骨干认识到，应当在工会运动中贯彻革命的路线。

我们同意布哈林同志关于两种极端倾向的评论。联系到工会工作，那就是说：一方面，自然不能纯粹从形式上和机械地领导工会运动，另一方面也不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再度出现并重新

泛滥的无政府改良主义思潮让步。我们反对那种根本不理解工会工作实质，只是机械地和纯粹从形式上领导工会的荒谬理论，但是我们同样反对不久前作为决议案提交政治局的那种“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我们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为了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必须掩饰党的作用。相反，我们以为，这里需要的是紧密的合作，我们的党必须最直接地参加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党应当站在工人阶级一切战斗，甚至最微小的战斗的最前列。这样做绝不会削弱工会的作用，工会的独特任务仍然是十分大量的。

我还想仅用几句话再谈一谈我们的选举策略。我们的选举策略证明，法国共产党决意修改自己的斗争方法。这里涉及的问题更为广泛，不仅仅是我们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这里说的是同所有的议会传统实行全面的无情的决裂，这类议会传统直至最近还一直腐蚀着我们党；这里说的是同“共和制纪律”的旧思想决裂，这种旧思想或多或少公开地把我们党同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联系在一起。在选举中我们党独立对抗所有党派，我们的策略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呢？我看，是达到了。我们不仅达到了预定的目的，而且还使处于共产党影响之下的工人理解了我们策略的实质。我可以举出以下事实来证明：在第一轮选举中共产党获得 107 万张选票；在第二轮选举中，进行选举的选区减少了（从 612 个减少到 439 个），我们还是得到了 82 万张选票，虽然在这些选区内我们第一轮选举时获得 88 万张选票。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大大施加压力和社会民主党不遗余力地开展反对我们的宣传运动，都未能对追随共产党的主要工人群众造成重大影响。我们成功地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发动政治战斗，

而工人们还是跟着我们走的。

无论在整个工人阶级中还是在社会党内部，后果都已经发生。选举后的第二天，社会党队伍中出现异常的慌乱现象。直到最后一分钟，社会党领袖还不相信共产党竟会采用自己的新策略。他们甚至期望一旦我们如此天真地试图采用这种新策略，工人们一定会离开我们。选举后第二天，像隆哥、吉罗姆斯基这样一些人物都不得不公开承认，布尔什维主义果然已经深深渗入无产阶级内部，而且空前第一次造成如此深刻的破坏（“深刻”一词是他们在写文章时经常使用的）。可见，我们选举策略的结果使他们惊慌到何等程度。

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同“左派”政党决裂。请允许我不作任何解释从左派杂志即资产阶级刊物中摘引一段文字。从中大家可以看出，我们是怎样向法国工人提出问题的，以及取得的成功有多么巨大。以下引自 1928 年 5 月 5 日《埃弗尔报》：

“只要承认一点就足够了，那就是共产党人使自己置身于左派政党之外。他们把自己从政治生活和议会生活中一笔勾销了。”

“饶勒斯的朋友们一直说，好的社会党人应当是一个‘完全的’共和派，可是现在仍有这样一批缺少心眼的人，他竟设想共产党人是某种超社会党人。”

“我们现在清楚地知道，在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说以前，尽管存在个别的理论差异，中间的工人只是根据各自‘红色’的深浅程度来判断左派政党之间的差别，那么现在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左派政党或极左派政党了。共产党如今置身于法兰西共和国之外。”

这说明，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共产党已经脱离了“民主和

议会的轨道”。不过是否所有党员都完全一致呢？不！个别的动摇不定现象是难免的。反对决裂的是党的下层。党严厉地谴责了对党的策略有意识或无意识进行消极抵制的人们。经过这一运动，在选举结束的两三周之内，凡是出现对党和共产国际宣布的选举策略消极抵制的地方，都作出决议把罪有应得的人开除出党和采取严厉的惩戒措施。我举一个例子即可说明，法国党对于破坏党纪的现象是善于作出反应的。我们第一次提出要求，并且做到了由选出的代表辞去议会的代表职务。这里说的是关于奥兰同志的事。在安德尔省议会一个选区中，激进派和社会党人投票支持共产党员奥兰，但是在这个省议会的其他选区中共产党员都投票支持社会党人和激进派。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我们党的下层对这种执行我们选举策略的这种消极抵制现象反应十分强烈，以致我们能够要求奥兰同志辞去他的议会代表职务。这件事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说明法国共产党确实决心摆脱旧的议会传统。

我还想提一提我们党的内部形势。如上所述，我们的选举策略显示出，共产党决意纠正自己以前的错误。不过，在我们工作的所有其他领域，党也应当表现出它在按照新的方式行动，已经实现了“转折”。但是，实行这种新政策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在党的队伍中明确地提出问题，必须说服法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和我们党的积极分子，让他们相信这种转变是确实必需的。

我想提出一些看法来论证我们提出的对布哈林同志提纲中涉及法国共产党内部形势部分的修改意见。

我们认为，把反右倾斗争的问题同克服左倾的问题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我们提议加强提纲中涉及反右倾斗争的段落。

在法国共产党内首先应当反对机会主义，因为在我们看来机

会主义是党的最大的危险。我们那里的机会主义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呢？机会主义表现为明显不了解当前的形势，对战争危险性半信半疑，不理解现今在殖民地开展起来的解放运动，对工人阶级左倾化的过程估计不足，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判断错误，以及最后还有存在“民主主义”的幻想。支持机会主义的有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产生和传播的种种幻想——如关于通过政府和资本家的政策以及通过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有可能得到改良和改善的幻想。

在实际上机会主义的倾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 对法国帝国主义的作用估计不足。我们这里存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趋势，但主要是指同邻近大国的帝国主义，如英国帝国主义作斗争（例如涉及对中国的干涉），而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法国帝国主义的利益是同英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完全不同的。（却忘记了印度支那的事！）有人认为，法国帝国主义在赤裸裸地干涉中国的政策方面不会步英国帝国主义的后尘。例如，这种思想在涉及沃伊柯夫事件、涉及召回拉柯夫斯基问题时就有所反映。当时不少同志不相信法国政府会参加帝国主义者反对苏联的统一阵线。

(2) 对政府进行镇压的性质判断不正确。当我们一开始就说新的镇压浪潮说明政府和资本家决意着手实现合理化，改组军事机构，并从根本上准备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时，有些同志对这类镇压行动的真实意义估计不足，认为这些只不过是一种议会手法，而且强调说萨罗无非是想把几个共产党人投入监狱，以便在议会中构成右派占多数的局面。这种想法是从非常狭隘的、受到局限的角度看待镇压行动的问题。“合法主义”、“守法主义”就是从这种

态度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同志便这样心平气和地把自己交给了当局。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强调，因为这种“合法主义的”守法心理还没有得到彻底地清除，例如对地下工作的实质缺乏认识就是一种表现。

(3) 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制造障碍。对这个问题我不准备多说，因为有的同志在这里已经谈论了不少。

(4) 对待选举策略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这种态度往往导致对我们的策略有意识地进行怠工，公开投票支持社会党和资产阶级的代表，甚至进行消极的对抗。

(5) 对无政府改良主义者作出让步，从而在工会方面背离了正确的路线。

(6) 最后，是在组织问题上进行修正，如在组织工厂支部委员会问题上提出“战略撤退”，而理由只不过是这些支部并不能始终提供预期的效果。固然，并没有人公开主张取消工厂支部，但实际上向我们提出的所谓“战略撤退”正是引向这种结果。

所有这些倾向存在已经将近一年了。不少同志在党的领导层内，甚至在党员大会上，明确地为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另外一些同志采取中派的模棱两可的立场，这隐藏着一种极大的危险。他们宣称在原则上同意党根据共产国际路线所作的总的分析和指出的总的前景，但是实际上，在评价日常事件时却同我们有分歧，而更坏的是不执行正确的路线。事实上他们妨碍同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妨碍同右派作斗争，因为他们同意右派的观点。

因此，同志们，我要再一次声明，我们认为法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是同右的危险作斗争。

至于说到左的倾向，那么它们常常是普通工人对领导机关的

机会主义的一种健康的反应。要把这些真正的无产者从某些把他们推上错误道路的糊涂虫和夸夸其谈者的影响下解脱出来，最好的办法毫无疑问在于执行坚定的正确的政策。

在谈到共产党的内部形势时布哈林同志说，这里指的不仅仅是同个人的斗争，而主要的是同各种传统的斗争。我们完全同意这种提法。我们认为，不应当把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当前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归结为同个人的斗争。不过我们觉得在这次十分必要而又有益的辩论中对于我们的积极分子所持的立场闭口不提也是错误的。

我们还想强调指出，法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曾经为“纠正”我们党的“路线”而奋斗，现在坚决准备把全党、全体干部争取到党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面来。不过，纠正党的路线的条件之一是应有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以便确有可能在法国共产党内和共产国际内贯彻这条正确的路线。

西弗内奥斯（希腊）：

希腊代表团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报告提出的总的路线，不过认为必须对以下问题作些补充：（1）农民经济和农民的状况；（2）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和他们的政治阶级趋向；（3）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为争取农民群众而进行的斗争。我们认为这些补充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包括希腊在内的不少国家都是农业国。之所以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是为了使我们在农民中开展工作时有一个牢固的基础。

南斯拉夫党的罗吉奇同志和保加利亚党的科拉罗夫同志已经扼要地介绍了巴尔干半岛的一般情况，请允许我极其简短地叙述一下希腊目前的形势。国内最近的事态，如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城

市小资产阶级及手工业者等的发动遭到血腥镇压等等，证明希腊工农群众正在向左转。尽管资产阶级大力加强恐怖手段，它仍未能取得重大效果，未能摧毁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抵抗。

毫无疑问，希腊工农群众向左转的趋势是战后尖锐经济危机的结果，是希腊资产阶级在国联，也就是在伦敦大金融资本家庇护下实施稳定政策的结果。最近一次解散议会和自由资产阶级领袖、欧洲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and 奴仆威尼翟洛斯的出头露面，说明一次新的政治危机正在国内呈现出来。帝制派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对抗，同英、法、美三国资产阶级内部的对抗密切关联，目前正越来越趋于尖锐化。最近的事态有力地说明，希腊帝制派和自由派的斗争正再一次激化起来。

分析了希腊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必然会认定，国内的稳定局面并不巩固。希腊的稳定局面动摇不定，极不牢固。

在对外政策方面，君主制资产阶级也好，自由资产阶级也好，都是英、法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此外，还应指出，在南斯拉夫和希腊之间在萨洛尼卡也即马其顿问题上存在矛盾。希腊已成为英意联盟的代理人。苏联和希腊的贸易条约被废止，最近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之间正在进行缔约谈判，这一切也都说明战争危险的存在。

现在我谈一谈社会民主党在希腊的作用。说实在的，希腊并不存在社会民主党。试图起社会民主党作用的是以帕潘纳斯塔西乌斯为首的所谓民主联盟。在工会内部存在社会党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存在社会法西斯分子，但是不能认为社会法西斯分子的影响在增长。目前，左翼的影响大约控制了工会运动的 50—60%。近期的罢工运动足可作为工会中左翼的影响的具体检验和

证明。这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尽管社会法西斯分子暗中破坏和政府极力镇压，仍然发动了近4万名工人。

至于说到党内状况，应当说我们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反对派，有中派、取消派和托派，这些都具有明显的反革命新孟什维主义倾向。同志们，可以说党在共产国际路线基础上胜利地同这些反对派派别进行了斗争并消灭了它们。

至于党的组织工作，那么在这方面是有成绩的。这只要把目前党的状况同它以前的状况对比一下就行了。目前党拥有2291名党员，其中工人占59.3%，职员和其他成分占8.7%，农民占31.9%。共有基层支部314个，其中大企业的产业支部占24%，小企业的产业支部占18.5%，街道支部占18.47%，乡村支部占39%。是否可以认为这种情况令人满意了呢？不，因为有大量工厂，特别是希腊工业中心的工厂，连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

党的秘密机关极其薄弱。在战争和阶级斗争尖锐的条件下（而这样的情况眼看就要来临），我们目前这样的秘密机关将无法胜任工作。因此，毫无疑问，必须得出的结论是：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党的秘密机关。

说到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领导问题，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确认，希腊代表团不认为巴尔干书记处对希腊共产党的领导是令人满意和足够努力的。我们要求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和农民国际更加关心希腊共产党。

鉴于巴尔干的形势相当尖锐，希腊代表团认为，代表大会必须成立一个专门的巴尔干委员会，以便研究巴尔干半岛的总的形势，并且概略地确定巴尔干半岛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我们希望代表大会接受我们的提议。接受这个提议是完全必要的。

瓦尔加：

同志们，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在对前一时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出战略上的结论，并且提出今后几年的迫切任务。毫无疑问，在今后几年内战争的危險将占据中心位置，因此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在于防止苏联所面临的危險。布哈林同志在自己的提纲和报告中以很大篇幅谈到这项主要任务。他详尽地描绘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大国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同苏联之间的矛盾。十分自然，按照这种精神拟定的提纲和报告，对于工人阶级队伍中各种演变过程的分析，以及局部地也包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中各种演变过程的分析，就描述得稍嫌简略。我想尽可能来弥补一下这个疏漏。

布哈林同志说道，近几年来像美国这样一些大国的巨大经济进步几乎具有了——用他的话说——技术革命的性质。如果确实如此（实际上也确实如此），那么工人阶级的经济基础和结构必然要发生重大的变动。生产机构和推动它运转的工人是相互不可分离的。如果生产机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必然要发生变化。

如果我们从经济角度来研究技术变动，那么这些变动相当于单位产品中工作时间比重的减少，换句话说，也就是生产率的极大提高。生产率的这种提高确实存在，我还可举出这方面的一些例子。这种提高是两种原因，两种因素的结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技术变化的直接结果。这就是说，在消耗同等人力的情况下，工人开动改进过的、扩充了的设备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使加工的物体发生比以前更有效的改变。劳动强度的增加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工人要消耗比原先更多的体

力。这两种因素通常是同时发生的,但并非必然如此。恰好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样一些例子,那就是在合理化过程中劳动强度极大地增加,但是劳动生产率,或者说工人开动的设备的生产率,仍然原封未动。不过通常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这两种因素是平行发展的,两者加在一起使生产率大大提高。最近四五年内我们都亲眼看到这类现象。

据此,我想谈一谈在我看来是新技术的结果的一些重要的方面。第一是新型失业现象的出现。这种失业现象我本想称之为结构性失业,它与我们一向所知道的工业后备大军在经济上是不同的。其次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出现均匀化的趋向。第三是产业无产阶级出现向工业大国全境分散的趋向。第四是存在一种产生新型特权工人,即新型工人贵族的趋势。

先从失业现象谈起。

战前也存在工业后备大军,但人数相对不多,而且在经济形势好转时会分散消失。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过程。我们长期以来所持的观点是,1921年严重危机后出现的大量失业现象是战争、欧洲贫穷化、新的关税、海外各国工业化趋势等等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倾向于把这种大量失业现象看作为危机的直接结果。但是,同志们,我想最近几年的经验正在迫使我们改变这种判断。让我援引几个粗略的统计数字。战前1907—1913年期间,也即1907—1908年大危机发生影响的时期,德国参加工会的工人中失业工人平均占2—3%。但是最近五年我们在德国看到的数字是:1923年为9.65%,1924年为13.5%,1925年为6.7%,1926年为18%,1927年为8.8%。这就是说,这4年内,即1924—1927年德国国民经济迅速高涨的年份,失业工人平均占12%。而1927年即

德国经济形势最有利的一年中，这个数字几乎是 9%。十分清楚，同志们，把这一切看作为一般性的，由经济形势曲线和工业循环不同阶段所造成的失业现象，是错误的。

我们还看到在英国也存在这种现象。那是失业工人在 1923 年占 2%，而最近 6 年内一直是 10% 或更多。不过下面一种情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美国这样一个资本实力雄厚、一直在向上发展的国家里也出现了大量失业现象，而且失业现象与原先的不同也表现得最为明显。失业现象的这种新特点表现为：美国工业资本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在绝对减少。也就是说，情况并不是马克思认为对资本主义具有典型性的那种情况：可变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比重不断减少，但可变资本的绝对数值不断上升，工人的数目不断上升。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工业中就业的工人人数在绝对下降。

请允许我对这些从美国统计资料中摘出的数字向你们做一些解释。在生产领域中流通并以生产资本形式出现的工业资本，也即工人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那种资本，当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只获得工业资本所实现的部分剩余价值时，这种资本 1919 年在美国剥削 2 500 万工人，1925 年则剥削 2 300 万工人。这就是说，工人人数减少了 200 万，而产业工人从 1 070 万人减少到 970 万人。但是，同志们，1925 年是经济形势极好的一年，尽管工人数量减少，总生产额，即所生产商品的总量，增加到极大的规模。如果我们以农业、采矿、工业（从狭义上讲）和交通运输（铁路）这四种主要工业资本为例，那么我们会发现：以 1919 年工人的数字为 100，1925 年工人人数为 93%，即减少了 7%，而产品总量为 120%，即提高了 20%，劳动生产率为 129%，即提高了整整

30%。其中仅工业一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6年之内就达到40%。

同时，使我十分惊奇的是布哈林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竟同意洪特尔·施泰因在《柏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的观点。这个洪特尔·施泰因绝对不是杰出的德国新闻记者。他使用的是商业部的数字，而这些数字美国和英国的报纸已经使用了不知多少次，而且在共产党的报刊上以及部分地在苏联的报刊上也已经刊载过。老实说，布哈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引用洪特尔·施泰因的材料，那给他的荣誉就太多了。

不过还是让我回来谈我们的主题吧。在劳动生产率极度增长的情况下，工人数量不断减少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技术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超过了市场扩大的可能。原先在战前的情况是：由于技术进步的结果，每天都有工人被抛向街头，但是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销售市场不断在扩大，这些工人，至少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又重新找到工作。这种技术进步的结果首先反映在印度、中国和一切偏僻的地区，那里出现手工业者的失业现象，最后导致几百万人饿死。现在我们则看到，市场的扩大已不足以使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被抛向街头的工人找到一口饭吃。这种新形式的失业现象不仅在美国有，在英国也同样存在。如果我们从英国接受保险的工人数中除去在流通领域中就业的工人以外，那我们就可以看到：1923年初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就业的有837万工人，到1928年初为790万人，也就是说同样减少了50万人。我觉得正好在美国和英国特别明显地反映出产生结构性失业现象的趋势，这并非偶然现象。在我看来，其原因部分地在于美国和英国国内资本主

义销售市场的继续扩大已经十分困难了。

国内市场的扩大是怎样进行的呢？简要地说，那就是农民变成了农场主，也就是说，本来首先为满足自身需要进行生产的农民开始为市场生产，现在成为生产者，他们出售自己的产品，又购回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产品。大家知道，这个过程是分几个阶段逐步完成的：首先从农民经济中分离出纺织工业，然后是农业工具的制造业，然后是建筑业等等。在美国，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农民已经把自己产品的80%以上，几乎90%，都投入市场，而且不言自明，也买回相应数量的资本主义工业产品。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原来一度促进资本主义销售市场扩大的推动力，也即独立的农业生产者从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过渡所产生的推动力在美国已经几乎终止，而在英国依我看已经完全消耗殆尽。自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在世界市场也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完成，这一点根本谈不到。但迄今为止美国工业仍以供应国内市场为主。美国向国外输出的工业产品至今不到6%。因此，如此巨大的飞跃式的技术进步无法找到相应的扩大国内市场的可能性，等等。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结构性失业现象，这种失业现象不是一种景气现象，显然是当前资本主义衰退时期所特有的失业现象。顺便指出，从中可以看出黑克尔特同志把所有各国都存在失业现象作为反对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正在改建的论据是完全不正确的。如果我所讲的不错，那么失业现象就越来越不再成为经济形势的指标。有一种情况完全可能存在，那就是尽管存在极其大量的失业现象而对资本家来说暂时仍然存在极好的经济形势。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近期将日趋激烈。帝国主义大国将尽力扩大自己的国外市场，以补充

与它们的技术进步相比容量过小的国内市场。它们将特别致力于把自己的商品投向国外市场，但是扩大国外销售市场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海外各国也正在实现工业化、高税率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到处都在抵制工业商品输入，禁止进口等，这一切都限制着国外销售市场的扩大。

可以有一定把握地预言，在近期内这一过程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失业现象将成为经常存有的、愈益严重的现象。

为了避免引起争论，我想指出，我的说法和罗莎·卢森堡的观点绝不相同。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认为，如果没有独立的生产者，没有第三者，那么实现剩余价值以及进一步积累就不可能。这种讲法自然是不对的。不过，如果说这种讲法在理论上就经不起任何批评，那么这也不意味着独立生产者即农民、手工业者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过程不会引起资本主义市场容量真正迅速扩大。

卢森堡所一再坚持的没有“第三者”存在就不可能进行积累的理论，同由于农民转变为农场主致使资本主义销售市场急剧扩大的历史事实，是两个不同的事物。这两件事各不相同，不能把它们等量齐观。

那么，同志们，从这个事实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看来，以共产党为其先锋队的庞大工人大军在近期将分为有工作的和失业的两个部分，而后面一部分人的数量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工人中有12%的人完全没有工作，另外有6%、8%、10%或15%的人不能经常有工作，那么这就是说，整个工人阶级中将近1/5的人都受到失业现象之害。这也就是说，每一个工人都经常处于失业的威胁之下！同志们，对于我们的斗争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依我看来，佩珀同志说我们斗争的条件自然得到改善是不正确的。依我看，这里应当划清一定的界限。对于原先意义上的工会斗争来说，对于为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来说，长期存在的大量失业现象无疑是一种障碍，并且大大增加了工会斗争的困难。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一旦革命形势来到，一旦爆发了夺取政权的斗争，这种大量失业现象将成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使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工人们更加坚强，大大增强他们的革命毅力。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近几年来美国尽管存在严重的失业现象，但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还有所提高？固然，提高的范围和程度并不像美国官方资料所显示的那样大。我们在这里看到某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存在大量失业现象；另一方面与之并存的是工资较高，而且部分地还在提高。

不过我想对此可以比较简单地加以解释。那就是：美国工厂的劳动强度增强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只有伙食较好的工人才能真正经受得了难以忍受的速度。如果让伙食极差的工人们进入宛如一架压榨工人体力的庞大机器的美国工厂，那么几天之后他们就要病倒。举一个粗浅的例子。每一个车夫都知道，要是他的马明天要拉重载，那他今天就要好好饲养，不然马就会一步也拉不动。美国工人所处的境况恰恰就是这样。由于劳动强度极大，有的工厂规定工间必须按时休息，有的工厂经常转而采用每周工作五天的制度，因为不这样做，在目前工人体力消耗的速度下，工人无法经受了。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即关于工业大国中工业进一步扩大从而工人向全国各地到处分散的趋势问题。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电气化的影响，向远距离输送高压电力的影响。这样一来，加

工工业就不必集中在煤矿附近。现在我们看到，由于有可能输送高压电力，出现了许多巨大的工业区。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那里的工业已经大规模从东北部向南部迁移。而南部各州15年以前连一家工厂也没有，现在则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新兴工业。在英国我们也看到同样的过程，那里的工业也正在向南方和东南方“搬迁”。我们还亲眼看到新的工业正在意大利北方兴起，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

同志们，我认为这种过程对于我们未来的斗争，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都具有完全特殊的意义。我们的主要骨干产业工人，已经不再是仅仅集中在工业国的某些主要地区，而这些国家的广大地区也不再是纯粹的农业区。1923年，当我们具体设想似乎即将来到的德国革命的进程时，我们曾为会出现一条地理上的界限：农业地区暂时仍将处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而无产阶级专政起先只在大的工业地区取得胜利。目前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工业正在向工业国的全境分散扩张，这样一来工业无产阶级，从而也包括共产党，就能在全国各地获得据点。

第三个新的因素是新技术的出现导致工人阶级均匀化的倾向。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流水线作业法的采用和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要知道，化学工业不是机器性工业，而是仪器性工业。这两者发挥作用的结果，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差别开始消失，多数乃至绝大多数工人都是所谓经过培训的工人。

使用传送带工作把劳动过程分解为一些最简单的操作方法，这种操作方法任何一个工人几天就可以掌握。现在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的化学工业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机械操作和耕作劳动，化学工业不用什么熟练工人。在化学工业部门没有熟练工人，

只有化学家、工程师。例如，在法本化学康采恩的各企业中有20%的人是工程师、化学家和技师，而所有其他人员（除极少数例外）都是工资很低的受过培训的工人。这个事实在战略上十分重要，因为它同失业现象相反，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不是造成差别，而是相互拉平。

第四种因素是产生了工人中的特权阶层，不过不是在熟练劳动的基础上和原先列宁所说的工人贵族的那种基础上产生的。我们看到的是，由于存在失业现象，大企业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工人阶层，他们为了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保障不惜始终充当资本家的奴仆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敌人。我指的是采用传送带工作时能决定工作速度的工长们。他们的工资收入只比其他工人稍多一些，但不会被开除。我指的也包括所谓“技术援助协会”（“Technische Nothilfe”）会员，那些充斥美国工厂的大量密探、工贼、特务，等等。耐人寻味的是，在这里恰好形成了这批工人阶级的腐化分子、工贼，同工会代表及改良主义政党工作人员的某些阶层之间的衔接点。凡是存在革命工会，存在强大共产主义运动的地方，改良主义工会、联合工会以及其他种种工会的代表越来越不必担心失业，因为他们正在由无产阶级的代表变为资本家的代理人。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卖身投靠的特权工人阶层，他们在失业现象严重威胁的条件下能够使自己的地位得到保障。

联系到上述情况，我还想提到失业现象的另一种后果，那就是受到失业现象威胁特别严重并试图同资本家的进攻进行斗争的那些工会人数日益减少。就在这两天我看到英国矿业工会为召开年会而公布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极其值得重视。英国矿业工会1925年拥有95.8万名会员，而1926年为78.5万人，到现在则

为 62.6 万人。这就是说，近两年来，这个工会的会员减少了 1/3 以上。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那么在美国矿工工会中这一过程发生的还要早些。

这样我们就看到，失业现象使资本家有可能做到：或者把工会变成资本主义的附属机构，在意大利、波兰以及部分地也在德国就是这样，或者在斗争中将它们摧毁，使之丧失战斗能力。

我的意见是，最好在提纲中用某种方式提到因实行合理化，因发生技术进步而发生的变化（即使这些变化在目前还并不十分明显）。正如某些同志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提纲中只有一处顺便提到失业现象。我以为在提纲中增加一节关于工人阶级内部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以及特别是关于失业现象的影响和新的特点的说明是适当的。

拉塞尔达（巴西）：

首先我想提一个小意见。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提到，共产主义运动现在才第一次波及拉丁美洲国家。同志们，这不完全正确。并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现在第一次波及拉丁美洲，而是共产国际现在第一次对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表示出兴趣。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甚至在危地马拉，我们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从 1920 年起，也即差不多从共产国际一成立之日起就已存在。但是共产国际直到现在才开始关注拉丁美洲问题。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的关注不要减弱，希望我们这几个暂时还不大的共产党能够成长为真正群众性的共产党。

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正在日益加强。拉丁美洲是实力最雄厚的帝国主义和世界上实力最雄厚的资产阶级的后方。所有同志都强调指出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国之所以能获得这种

霸权，它有赖于拉丁美洲这个宏大的经济基础并非不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帝国主义早已从和平占有政策转向武装干涉政策。

自1900年起，美国对尼加拉瓜、圣多明哥、巴拿马、波多黎各实行武装干涉。这几个国家全都驻有美国军队。

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占有美国国外投资总数的46%。这就十分明显地突出说明了拉丁美洲对于美国的重要性。美国资产阶级在南美的最大竞争对手是英国帝国主义。美国正在逐步战胜英国，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南美洲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从未如此激烈。

在帝国主义疯狂进攻过程中阶级矛盾在不断发展。拉丁美洲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已经开始行动。南美洲正处于土地革命的前夜；随着帝国主义压迫的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也在日益提高。不过美国资产阶级清楚地看到来自革命工人运动方面的危险，因而竭尽全力试图控制拉丁美洲的工会运动。它正通过泛美劳联这样做。这个组织是美国资产阶级用来瓦解拉丁美洲无产阶级的御用机构。泛美劳联的首领是美国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人。在墨西哥油田、秘鲁和智利的矿井、巴西种植园，成千上万的无产者在帝国主义剥削的压迫下做工。把这些群众争取到我们一边来，把他们组织起来并有力地支持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现实斗争，这就是我们在拉丁美洲的居于第一位的任务，主要的任务。一旦爆发反对苏联的战争，我们就要全力以赴阻止向帝国主义军队供应阿根廷的粮食、阿根廷的冻肉，制止为军事工业运送石油和原料。打倒帝国主义！为拉丁美洲摆脱帝国主义剥削而斗争！打倒勾结帝国主义剥削工农群众的本国资产阶级！这就是我们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的口号。

卡里略（墨西哥）：

我们代表团赞同布哈林同志的报告。我想简略地谈一谈对于拉丁美洲国家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些问题。美国目前是帝国主义的中心。美国是世界经济中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因素。美国拥有拉丁美洲国家这样一个强大的后方，大大有利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发展。拉丁美洲蕴藏有美国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原料资源。帝国主义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渗入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美元政策腐蚀并收买着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它们和美国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剥削这些国家的财富和劳动力。美军占领尼加拉瓜开始了美国为建立独霸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统治而发起的公开武装斗争。我想着重强调，一旦发生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反苏战争时这些国家的重要性。这些国家在战争中将成为帝国主义的后备军。我们的任务是使拉丁美洲的工农群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

一旦战争发生，我们的口号应当是：向帝国主义宣战，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豢养的拉丁美洲封建集团和军阀的专政。在我们这些国家里如果不同时进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斗争，就无法开展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而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必不可免地要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我完全同意有些同志的看法，他们指出提纲对于土地问题太不重视。这个问题必须得到更详尽的研究。在我们这些国家里，没有农民群众参加，要进行认真的斗争是不可思议的。千百万贫农和无地农民群众争取土地的斗争，是拉丁美洲革命运动日程上的第一项议题。迄今为止，有一些同志还并不理解，不能把我们这些国家的农民同中欧的农民和巴尔干国家的农民，或者甚至同沙皇时代俄国的农民相提并论。根据前面所说的情况，我想对这些

同志也说几句话。我们的农民生活在极端可怜的条件下，他们的生产工具极端原始，以致于怎样也不能把他们算作有产阶级，算作小资产阶级。这是千百万半无产者群众，我们的任务不能局限于使他们保持中立，我们应当把他们当作直接的同盟军争取过来。在整个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农民群众占居民的绝大多数，因此我们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方针和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对于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革命的经验，保加利亚的经验都是足以令人信服，因而党在这方面宁可做得太多，而不能做得太少。

美国帝国主义的粗暴进攻使我们这些国家的阶级斗争日益激化。墨西哥和中美洲持续不断的革命行动和反革命活动说明，这种分化现象正在日益加剧。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处于土地革命的前夜。巴西的政治骚乱已经持续了许多年，墨西哥革命与反革命相互更迭之快是任何国家也不曾有过的。近几年来，我们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拉丁美洲已经站稳了脚跟。以前我们只是一些宣传小组，现在我们已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而且我们深信明天我们将成为群众性的党。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墨西哥共产党内，大家认为我们党不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政党。现在我们已经纠正了这种错误观点，而且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党是国内唯一的全国范围的有组织的工人政党。

下面就工会问题再谈几句。我们觉得，工会问题上的路线规定得不十分明确。往往红色工会国际推行一条路线，而共产国际又推行另一条路线。我们坚决要求在工会问题上制订一条统一的路线。我们相信，统一战线策略今后仍将是我们的工会工作的基本原则。只要正确运用革命的统一战线策略，同改良主义领袖和工

会官僚的斗争不会削弱，只会加强。只有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会工作，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口号，与改良主义分子的攻击相反，受到参加工会的墨西哥工人的普遍欢迎。

在统一战线策略问题上的任何一点动摇不定，都会给我们的工会工作造成致命的恶果。因此我再重复一遍：在工会问题上必须要有统一的路线，不能有红色工会国际的独特政策，必须要有统一的共产国际的工会策略，所有党员、所有共产国际党团都应当遵照执行。

在拉丁美洲，反帝同盟要担当起特别重大的作用。这个附属组织有可能成为真正广泛的群众组织。同外国资本的霸权地位作斗争，是广大工农群众同主张民族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接近的基础。这种斗争不是宣传鼓动问题，而是直接行动的问题。尼加拉瓜的战斗、墨西哥和中美洲接连不断的国内战争就证明了这一点。布哈林同志已经指出，共产国际对于反帝同盟重视不够。关于反帝同盟的问题必须看成具有国际政治意义的问题。对我们最为不利的首先是美国党对中美洲和南美洲反帝同盟的意义估计不足。美国不存在真正反帝的组织。在美国同志有可能建立这样的组织以前，他们就无法认真地进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强调拉丁美洲无产阶级和美国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墨西哥的改良主义者同美国劳联相互保持联系，这有助于改良主义者麻痹墨西哥工人的注意力和欺骗他们，借口说一旦发生什么事情美国的改良主义工会组织能够阻止美国干涉墨西哥。我们应当以拉丁美洲和北美革命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同墨西哥和美国的改良主义者的联盟相抗衡。这是我们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最后再谈一谈我们这些党内的右的和左的倾向。右的倾向反

映在关于拉丁美洲国家发生革命的可能性问题上。某些同志认为，在美国工人打败自己的资产阶级并推翻美国帝国主义之前，拉丁美洲国家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取得政权。这是典型的改良主义论点，我们应当对这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种右的倾向在于轻视农民问题。墨西哥党已经完全克服了土地问题上的改良主义思潮。但是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党内，许多同志在农民问题上采取完全消极的立场。第三种也即可能是最危险的右的倾向在于：同小资产阶级联合，承认小资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以至在整个革命中的领导权，并且用同民族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词藻，毫无区别的革命词藻掩盖党的真实面貌。这是我们这些党内最危险的倾向，同这种倾向作斗争是我们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此外，还存在极左的倾向，这在工会问题上更为突出。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还不得不同反对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工作的思潮进行斗争。现在，至少在墨西哥党内，我们已经完全克服了这些危险。

布哈林关于必须从思想上做好准备的意见我们完全支持。但是我们应当指出，尽管我们曾经一再提醒，共产国际却至今根本不帮助西班牙语国家的党吸取理论知识。迄今为止，没有出版过一本西班牙语的共产主义书刊。共产国际的主要文件没有用西班牙文发表过，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同志们很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所提高。我们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最近的将来用西班牙文出版主要的材料，并提供给我们这些党。

再谈谈墨西哥的情况。从报纸上你们都已知道，7月1日选出的总统被杀害。这预示着墨西哥在最近期间即将爆发新的国内战争。在同美国帝国主义作斗争方面，墨西哥是美洲大陆上的主要据点。拥有资源丰富的油田和矿场的墨西哥就紧靠美国的大门。只

有在工人、农民夺得政权以后，墨西哥才能获得正常发展的可能。墨西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斗争就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反对世界上最强大的资产阶级、反对苏联的最凶恶的敌人的斗争。正因为如此，这场斗争具有国际意义。我们深信，一旦爆发反苏战争，墨西哥的工人、农民必将同帝国主义斗争，而即将到来的战争必将在拉丁美洲国家引起革命。

同志们，我们将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国际团结和世界革命的旗帜。

共产国际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塞莱（乌拉圭）：

南美洲国家代表团决定就它们认为最重大的问题由三个代表分别陈述自己的观点。

首先我表示完全赞同我们代表团其他成员的提法，即拉丁美洲在世界经济及革命运动中，以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中和在农民问题上，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我必须首先简要地说明拉丁美洲的经济和政治形势。

在拉丁美洲所有国家中，只有智利除外，占统治地位的是农业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工业还处于萌芽阶段。轻工业最为发展。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广大农民阶层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

在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家中（除去小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墨西哥和在最近一次选举后由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的阿根廷共和国），政权都掌握在大农业资本家手中。拉丁美

洲各国政府一般说来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就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巴西政府密切依赖英国帝国主义，其他拉美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屈从于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处于它的直接影响之下。

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政府都是毫不掩饰的大农业资产阶级专政。它们的所作所为违背广大工农群众的意愿，并且野蛮地镇压任何革命运动。高压手段和恐怖统治笼罩着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整个中美洲、古巴岛和安的列斯群岛。哥伦比亚不久前颁布了一项严厉的法令，矛头针对工农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拉丁美洲的这种局势促成了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的革命形势。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国家已经面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墨西哥也充满了革命的气氛，不过那里酝酿的是农民革命。我们不知道这场革命何时爆发，无法指明日期和钟点，但我们确认革命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即将发生。这次革命在开始阶段将同时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在其发展过程中，如果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有能力成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那么就有可能把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变为工农革命。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真正认识到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

现在谈谈工会运动。拉丁美洲的工会运动还较年轻，因而也相当薄弱。不过可以把它看作是“革命”运动。除了墨西哥的各工会团结了墨西哥大部分无产阶级外，参加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工会的工人只占全体工人的很小一部分。不过这些工会对群众的政治影响大大超过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例如，每当工会决定宣布总罢工时都事先广泛开展宣传工作，如果提出的要求是与工人群众密切相关的，那么响应号召和参加运动的就不仅是有组织的工人，而是

全体工人群众，其人数相当于工会基干会员的 5 倍或 10 倍。

原先拉丁美洲的工会运动处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之下，如今这种影响已不再存在。但是，在南美洲我们受到威胁的是来自美国改良主义和欧洲改良主义即泛美劳联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改良主义的危险。

泛美劳联和阿姆斯特丹国际是怎么一回事呢？泛美劳联无非是美国帝国主义在南美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它的任务是把工人运动和进行反帝斗争的工人群众引向与革命相反的方向。它力求腐蚀工会领袖，把工会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以便美国帝国主义能够轻而易举地侵入拉丁美洲。至于阿姆斯特丹国际，那它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它为欧洲帝国主义效劳正如同泛美劳联为美国帝国主义效劳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拉丁美洲泛美劳联的建立的时间上与具有革命倾向的大的工会联合会的成立正好一致。泛美劳联的政策是收买工人运动的领袖，而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得成功。众所周知，墨西哥全国劳动联合会的首领已经接受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影响。

大家知道，波多黎各的工会官僚就在工人联合会章程中提到，必须把波多黎各变成美国的一个省。

一批委内瑞拉工人运动的革命领袖几年前曾去美国。泛美劳联的首领们企图把他们争取到自己方面，使他们在自己国内放弃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很有可能，他们现在回去后将开始进行有利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宣传。

阿姆斯特丹国际从来不曾关心过拉丁美洲的工会运动，现在它突然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不久前，它在日内瓦召开了拉丁美洲

各组织真正的和冒充的代表们的会议，并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代表应尽力在自己国内为改良主义工会运动打下基础。

阿姆斯特丹国际如此登台表演并非偶然。欧洲帝国主义经过战争遭到严重损失。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同美国帝国主义在南美洲进行竞争。不过现在它已经相对地和局部地获得稳定局面并医治了自己的创伤：它已经增加了生产并需要有新的市场。它感到实力已经够大，足以同美国资本主义一决雌雄。这就是阿姆斯特丹国际急于在拉丁美洲为欧洲帝国主义打下基础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红色工会国际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采取有力措施在拉丁美洲组织革命的工会运动。

红色工会国际在拉丁美洲的行动引起了欧洲改良主义即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抵制。毫无疑问，此后泛美劳联对此也必将大力加强争夺拉美无产阶级的活动。

那么我们在拉丁美洲的任务是什么呢？共产国际在美洲大陆这一部分地区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应当同欧洲改良主义和美国的改良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尽一切可能阻止美国和欧洲的改良主义毒素渗入工人运动，因为这种毒素会削弱工人运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力量。

根据红色工会国际在蒙得维的亚的倡议而建立的革命工会拉丁美洲书记处已经开始工作。1929年5月，在蒙得维的亚应当召开主张阶级斗争的拉丁美洲各工会的总的代表大会。

我们认为，有了这个书记处，有了这次代表大会和在大会上将要建立的组织，我们将有可能有力地开展斗争，以捍卫拉丁美洲工人运动的革命的反帝的性质，以及运用工人运动来解放工农群众。

必须提请我们南美洲各个年轻的党重视这项重大的任务，以便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轻视这项工作，并且防止这些国家中的改良主义危险。应当激起所有无产阶级对将于 1929 年召开的拉丁美洲代表大会的热切关注。

必须尽力使这些代表大会取得决定性的成就。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应当全力支持我们，以便我们能够加强拉丁美洲运动的革命性质，并且推进这个运动，使这个运动成为我们各种发动以及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整个斗争的中心。

我们断然宣称，我们同帝国主义的斗争能否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同美国 and 欧洲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能否成功。

再谈几句关于青年的问题。布哈林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批评所有共产党都对青年工人的份量估计不足。这个批评对我们这些拉丁美洲的党也是完全适用的。在我们这些国家中，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或者根本没有，或者力量十分薄弱。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没有认识必须争取青年工人，这是极大的错误。大家知道，青年工人最易于接受我们的宣传鼓动，最有战斗力，而且与传统的偏见格格不入。因此吸收他们参加组织比成年人更加容易。迄今为止，所有党都忽视这个任务。现在应当端正这方面的路线，并且应当更多地注意争取青年工人和在每一个国家建立群众性的共青团组织。

最后，我谈谈群众组织的工作。布哈林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到，必须在同党平行的正在建立的或现有的所有群众组织中积极开展工作。我们认为，我们运动的主要组织是工会和农民联盟。对它们应当予以最大的关注和最大的支持。但是，在拉丁美洲还有三个组织应当起巨大的作用，而且能够变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这

就是反帝同盟、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和红色体育国际。

反帝同盟，正如在我之前发言的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将在拉丁美洲起重大的作用。当前形势极其有利于既争取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又争取和组织反帝的小资产阶级群众。

对于反帝同盟必须认真予以关注，并把它变成一个群众性的组织。

至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那么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镇压和白色恐怖肆虐的条件下，由于它参加了工农运动的日常斗争，拥有很大的威望。它起着巨大的作用，能在每一个国家争取到成千上万名工人。

体育组织在南美也能团结千千万万个工人。在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秘鲁，以及在所有国家中，广大工人群众都爱好体育，资产阶级也利用体育向工人灌输沙文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主要致力于争取青年，也就是我们应当予以极大关注的青年。要同资产阶级的体育组织作斗争，要用具有明显阶级性的工人体育组织与之相抗衡。在乌拉圭和阿根廷，我们只花费了相对不多的时间和精力就通过体育组织团结了二三千人。我们以为所有各国党都可以建立这类组织，并把它们变成群众性的组织。

此外，我们还认为共青团拥有一切必要的前提，足以成功地吸收体育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加入我们的组织。

我的发言就此结束。拉丁美洲代表团清楚地意识到它所面临的任务。它相信，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依靠共产国际的坚强有力的始终一贯的支持，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了无产阶级的事业把工农群众争取过来。

会议体会。

第九次会议

(1928年7月25日)

主 席：福斯特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 (继续)

雷文卡·贝津 (南非)：

首先我认为有必要说明，为什么这次代表大会没有来自南非的黑人代表。这是因为技术性的障碍使这些同志未能来到莫斯科。我们本身也因为未能与这些同志一起离开南非而感到非常遗憾。但是只有取得护照的人才能离开南非，而黑人代表直到最后1分钟也未能取得护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黑人代表未能来到这里，而决不是我们有什么种族偏见。琼斯同志在今天早晨的会议上提到这一点，可他是很清楚这一情况的。

我想谈一点布哈林同志在其报告中未提及的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即克拉拉·蔡特金领导下的妇女部的工作问题。我觉得，这项工作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不清楚，是否我们所有的党都有可能建立专门的机构来开展这项工作。在我们南非是没有这种可能的。我们只有一两个人专职从事党的工作，其余的人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党的工作的。

我同样不能够肯定，建立专门机构进行妇女工作是否会在男工作人员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可以对这一工作不再负责任，如果是这样，我们今后可能取得的成绩将比现在还要小。

代表大会本身就证明了，妇女工作开展得很不够。为什么出席大会的女代表这样少？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妇女部宁愿去建立在党影响下的党外妇女组织而不努力去吸收妇女入党所造成的吗？妇女部采取的工作方式，不仅所有的妇女代表应该加以讨论，而且整个代表大会应该进行讨论。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妇女工作有着极大意义，因为特别是在今天的生活中，妇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名女工，妇女同男人（他们远比妇女为早就成为劳动市场的对象）处于竞争的关系。而作为母亲，妇女担负着管教下一代的责任；即使在苏维埃俄国，儿童在一定年龄之前也主要是处在父母影响之下，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更是如此。然而男人却往往看不起对孩子进行教育的任务，甚至在一些共产党员的家庭里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我们党的一批老党员没有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战士。就以我们的大部分领导同志为例，他们的孩子干什么呢？这些孩子是否成长为共产党员去继承父辈的事业呢？这些孩子通常都不参加革命运动，他们并没有填补父辈离去后的空位。

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不是因为男人通常都不同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讨论政治问题造成的吗？男人们认为，家庭成员还未成熟到能同其讨论政治问题的程度，所以不让子女的母亲了解这些事情。

我们在南非本地居民中也经常看到这种对待家庭成员的态度。尽管他们的妻子也经常工作，有时还背孩子去上班，而且对

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抱着满腔热情的态度，可是，当她们去参加集会时，男人们就感到不高兴。有时候妻子的积极性比她的丈夫还高。但是，男人们认为妻子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是他们化几头牛的代价从其父母处讨来的。一个男人为了攒钱买个妻子（也为了交税，养活自己和供养亲人）被迫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剥削对象，受雇于矿井和工厂。如果他们能多挣得几英磅，他会再买上一两个妻子，虽然应该说这种“奢侈生活”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能过这种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在黑人的心目中妻子就是他的私有财产，就是他的农奴，他可以为了保护她而去斗殴，但从不把妻子看成是与他平等的人。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是要加速消灭这些原始部族的传统，并促使男工和女工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为自身的阶级利益而斗争。

尽管存在着种种困难，但是，只要作为无产者的母亲本身有可能成为有阶级觉悟的人，那么，她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激起子女对现行制度的仇恨。

该是男人不再把妇女看成玩物的时候了；要对妇女进行政治教育，而不要只知对其献殷勤。毫无疑问，一般男人害怕自己的妻子参加政治活动后，便不再关心他舒适的家庭生活了。但是，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懂得，妇女并不是为了使男人快活而存在的，也不是为了没完没了地操劳个人的家庭事务而存在的，妇女应当和男人一样，有她自己更重要的责任。在目前这种自然情况下，妇女被培养成为个人主义者，而妇女也照样地以这种精神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希望她的孩子经过自身的奋斗，能有机会登上社会阶梯的上层，也就是说进入既使她本人，又使她孩子沦为奴隶的压迫阶级行列。

这样一来，希望自己和母亲都能摆脱工人困苦生活条件的孩子，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本阶级的叛徒。

罢工时也同样出现这种情况，由于贫困而造成的愚昧无知，工人的妻子往往成了积极的工贼。她只看到罢工会使她丈夫失去在工作时，每周带回家来的少得可怜的几先令，除此之外，她什么也看不见。因此，她想尽一切办法去阻止丈夫参加罢工或不让他成为工会积极分子，怕丈夫因此而失去工作。这样一来，工人的妻子不是积极地去加强工人运动，而是成了削弱工人运动的真正根源。

我认为，妇女部的活动，应当比迄今为止更多地放在家庭妇女和女工方面，培养她们成为共产党员并引导她们投入党的工作中去。其次，我认为不仅是女共产党员，而且是男共产党员和全党都应该给自己提出这项任务。

克麦尼（匈牙利）：

匈牙利代表团基本上同意所提出的提纲，但认为有必要作几点补充。我想在这里谈一谈我们党特别感兴趣的四个问题。

首先是关于法西斯主义问题和法西斯主义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问题。

提纲正确地强调了现代社会民主党发展的性质，即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上层同各种企业主组织，以及同帝国主义国家逐渐结合。因此必须强化我们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

提纲还正确地划分了法西斯主义的典型模式，给意大利和波兰类型的法西斯主义下了定义，称之为“独特形式的资本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大资本家专制独裁形式”。但是，这是否就包括了所有的法西斯主义形式呢？我们认为不是这样。东南欧和巴尔干国

家政权的法西斯特征多少有些不同于这种典型模式，但仍应看作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类型。也许可以这样说，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那种“不纯正的”法西斯主义形式在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本身正主动地力求扩大其社会基础：它利用流氓无产阶级、失去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团体来扩大传统的国家机构；它使始终存在的失业大军中的一部分人脱离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把他们组织到扮演工贼角色的官办工会中去，在利用各种社会团体扩大国家机构的同时，还试图借助保守的社会政策来腐蚀整个工人运动，而国家则力图在各阶级之间扮演仲裁者的角色。这里是指国家政权的那种独特的拿破仑主义而言，这种拿破仑主义的国家政权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有别于典型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在这里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特别是对工人阶级有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实行的恐怖主义是以甜言蜜语和社会政治方面的小恩小惠为补充的，对国家政权结构的法西斯改造是以形式上保留议会制度来掩盖的。如果可以这样来表达的话，我们在匈牙利看到的这种清清楚楚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干巴巴的法西斯主义”——它一开始就是国家法西斯主义，一开始就是一种官方的法西斯主义。

匈牙利的反革命采用了拿破仑主义的全部手段：对共产党员和左派工人施行暴力，在剥夺工人罢工权利和使工会国家化的同时却又对工人实行保险。这里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积极地鼓励并支持这种拿破仑式的法西斯计划和反革命行动。社会民主党欢迎法西斯的社会政策，支持强制性的国家仲裁，它已经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际上赞成工会的国家化。由此可见，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所作所为，法西斯国家采取公开的恐怖手段来消

灭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组织已成为不必要的事了，因为社会民主党本身正变成匈牙利法西斯主义社会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它自身就在采用独特的形式使工人运动法西斯化（诚然，这种法西斯化不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但终归是一种法西斯化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样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是否还是“自由的”工人政党呢？我们认为，它已经不可能完全符合这个称号。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处于从自由的工人政党向法西斯工人政党转化的过程中。它正摇摆于自由工党和法西斯工党的政策之间。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否仅仅指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而言呢？我想不是。我们认为类似这样的变化可以说或多或少已成为社会民主党法西斯化的共同趋向。因为相对稳定时期国家资本主义趋向的加强，必然产生现代国家政权的拿破仑主义倾向。这种趋向表现于国家政权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方面。这方面我只指出强制性仲裁和美国的工会法两件事。可见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在于它企图采用所谓“和平的”引导方法把工人运动纳入这个帝国主义国家政权的拿破仑主义体系中去，以代替血腥镇压工人阶级的典型法西斯做法。目的和结果依旧不变。看来只是做法和手段变了一点花样。现在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见机行事，摇摆于法西斯政策和同社会民主党结盟的政策之间，现在这种所谓摇摆现象已经渗透到社会民主党内来了。社会民主党本身现在就摇摆于自由工党政策和法西斯工党政策之间。我想，对社会民主党这种发展特点和法西斯主义同社会民主党之间关系所作的分析，应当在提纲中有所反映。这一点对于那些既有社会矛盾，又存在着民族矛盾的国家尤为重要，因为这种民族矛盾使统治民族有可能利用拿

破仑主义去毒害工人，推动他们去反对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统治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变成居统治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用来反对被压迫民族的法西斯工贼组织，这是极其常见的事。只要回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情况就足够了。

匈牙利代表团要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农民问题。

提纲强调必须使农民工作，特别是农业国家的农民工作活跃起来，因此必须使农民国际的工作活跃起来。这是绝对正确的。如果我们既看到罗马尼亚农民在民族农民党在阿尔瓦—尤利组织的游行示威中显示了多么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能注意到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领袖们的变节行为；如果我们能注意到有多少农民群众追随克罗地亚农民党；如果我们能考虑到匈牙利农民是怎样受了反革命的欺骗和农民群众中积聚了多少易燃的物质；如果除了这一切之外我们再能注意到，我们对这些农民运动的影响是多么的微小，那么事情就十分清楚了：我们必须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欧洲农业国家的农民群众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件事：

一是农民中劳动阶层逐渐脱离资产阶级的进程加快。战后，农民曾同资产阶级组成统一的民族阵线，在已实现所谓民族解放的国家里尤为突出。这个时期执政的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能与农民结成统一阵线，靠的是实行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土地改革，当然，与这种脱离资产阶级的倾向相对抗的还有另外阻碍这一进程发展的倾向。对农业采取的所谓辅助性措施，如贷款和海关保护政策等等就属于这种倾向。

以匈牙利为例，相当广泛的农业合作运动是得到国家扶植的。

资产阶级力图尽可能广泛地同农民阶层保持统一阵线。不论出于何种观点，从经济因素出发支撑国内市场在这里同样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主要的趋势仍然是贫苦农民正在逐渐离开资产阶级。

其次，是农民的分化过程日益严重，一面是广大农民群众日益贫困和无产阶级化，另一面是少数上层农民发财致富和日益上升。这个过程发展的结果是劳动农民群众日益左倾，可是共产党至今未能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农民队伍中发生的这些变化作出反应。因此，对农民的领导转到了持反对立场的或受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手中。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情况就是这样。

匈牙利农民脱离反革命以及农民的分化具有其独特的形式：匈牙利的农民党——小农党几乎完全被融合于执政的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产主的党之中。农民党在全国范围内不复存在，只有几个地方的农民党组织还在勉强支撑。

匈牙利的农民组织就这样因上层被收买而垮掉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的反革命一方面几乎完全摧毁了农民自己的政治组织；而另一方面却又力图促使得到政府支持的农民社会团体活跃起来。农村的这种法西斯化是在农村的知识分子、政府当局和富农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这种法西斯化意味着教育农民群众不问政治。当然，农民群众组织性极度降低的原因还在于农民上层已被收买和出现了法西斯化。

从上述这一切情况中首先应得出什么结论呢？

从中应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活跃农民工作的主要任务除了路线、口号和其他等等工作以外，还要能够找到与这种阶级变动、这种分化和农民群众组织性下降等情况相适应的组织形式。

诚然，活跃农民国际的工作十分重要，但是，这种活跃不是

首先去活跃农民国际的机构，而是要使我们在不同的国家里找到相应的具体的农民国际的组织形式。科拉罗夫同志说，农民国际还应当制定出自己本身的、有别于共产党的工作方法。这是正确的。但需补充一句，即为了顺利地开展工作，农民国际应该在不同的国家里找到自己本身的组织形式。

我们应该学习别人的经验，学习波兰党的经验，波兰党通过左翼农民党对农民施加影响。甚至在德国也组织了左翼农民党，我们应该从这一个事实中得出某种结论。而在罗马尼亚强大的农民运动处于如火如荼的时期，我们却未能对其施加任何影响，我们也应当从这一事实中吸取教训。经常有人谈到建立“辅助性组织”。我想，农民需要的恰恰就是这样的辅助性组织。

按照我们的看法，这些农业国家在极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稳定中的薄弱点，所以更有必要从扩大我们对农民的影响的角度出发，重新研究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同意奥地利代表团和科拉罗夫同志关于稳定存在着不平衡性的观点。工人阶级在农民运动的帮助下，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够把这些国家变成对帝国主义平衡的突破口的。

我们想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组织作某种改革的问题。以农民问题为例，我们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具体经验。波兰党、保加利亚党和其他党的经验更多。匈牙利党属于总的德国捷书记处，因为匈牙利与这个国家集团最为接近。但在农民问题上，我们能向德国党学到的东西，譬如说，就要比向波兰党学到的少得多。

再说，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党即使它们在政治上属于不同的国家集团，也应当交流经验。如何开展地下工作，存在着一系列问

题：如工作方法问题，组织形式问题，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互配合的形式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脱离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而作为多少带有共同性的问题，作为秘密工作的国际经验加以研究的。

通过这种有计划的交流地下工作的经验，我们可以为各党开展工作提供极大的方便，减少为取得这些经验而付出的牺牲。我们提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注意，必须找到相应的组织形式，使各党能就专门问题相互交流经验。我指的是，譬如说，就地下工作的方式和方法问题举行有关党的讨论会。如果关于准备开展地下工作的提纲是对处于公开活动的党而言，那么，我们的建议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总的来说，希望能具体地关注一下某些党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在外交政策问题上行动的协调问题。

例如，关于修改特里阿农和约的问题，即匈牙利反革命在什么口号下实行秘密武装和进行战争准备的问题就属于这类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我们党，而且涉及捷克斯洛伐克党、罗马尼亚党和南斯拉夫党，以及意大利党，因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霍尔蒂政权及其战争准备的主要庇护者。难道各国共产党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建立起必要的合作吗？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类似这种协调各党活动的做法之所以更为必要，是因为通过这种办法还可以使地方主义得到克服。而克服地方主义是极端必要的事，对于那些袖手旁观、不注意国际阶级斗争战场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主要地段情况的小党更是如此。

坎农（美国）：

布哈林同志在其提纲草案中强调必须强化我们反对社会民主

党和所有改良主义组织的策略，并号召各国共产党加强反对改良主义趋势的斗争。这个政治方针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正确的，对美国来说同样也是正确的，尽管有人企图把美国说成是例外，从而将其“排除”在这个方针之外。美国也存在着右的危险，而洛夫斯顿—佩珀集团把持的中央委员会中多数派的机会主义政策加剧了这一危险的严重性。

当代美国帝国主义的发展条件为美国工人扩大斗争提供了良好的前景和可能，为我们党在这一斗争中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提供了足够的机会。国际矛盾日益加剧，大批失业现象，工人遭到进攻，推行合理化，工资下降等等，这就是美国当前形势的特点。美国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企业主的进攻和官僚们的背叛，使工人阵线受到严重的削弱和破坏。另一方面，作为对这一事态的反应，我们看到工人的反抗正在日益增强，半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也在准备开展斗争。

半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中的左倾化和激进化过程正不断发展和扩大，当然，这种左倾化和激进化是在美国，而不是欧洲人所理解的那种左倾化和激进化。美国工人经过最近几年的消沉后觉醒起来而向左转了，对于美国工人来说，更强烈地表示不满情绪和开展更深刻、更尖锐的斗争的时期已经到来。我们党中央的多数派没有发觉这种情况，没有得出相应的结论，也没有根据这一时期斗争日益加剧和由此而出现各种可能的特点来确定自己的政治路线。

面对工人日益严重的不满，面对工人日益增强的斗争情绪和日益频繁出现的群众加入战斗的征兆，党中央多数派仍然采取过分谨慎的立场。党中央多数派坚持其对事物的保守观点，奉行保

守的政策，这在党的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所表现，他们犹豫动摇，不断退却。

中央委员会的这种政策，使党在诞生以来几次出现有重大历史机会可以利用的时刻陷于瘫痪状态。我们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这一问题，是想争取使这一路线得到纠正，使党能走上继续领导群众前进的道路。在我们向美国委员会提供的文件中，我们相当详尽地阐述了与当前现状有关的一切问题。我想指出党中央委员会由于缺乏正确分析和没有得出正确结论而造成的某些（局部的和普遍性的）错误。

美国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阶级斗争开始激化，工人群众由消沉阶段转入斗争阶段，这一切在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中引起了某种混乱，造成了某种错误。少数派也犯了某些错误，但是，少数派和多数派在这一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少数派犯的错误是偶然性的错误，它已经承认并且改正了错误，而多数派一直推行错误的路线，而且至今仍坚持这条路线。

请允许我谈一谈中央委员会所犯主要错误中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说明，中央委员会是怎样错误地估计了社会党，并寄希望于社会党内部的某个左翼能帮助我们为建立工人党而斗争。当社会党已经发展到完全蜕化变质的地步并且公开同美国的劳联、警察和政府联合在一起，反对工人群众的时候，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竟然能够对社会党作出了这样的估计，即建议让一部分共产党员加入社会党，从社会党内部实行什么“内部爆炸”。请允许我逐字逐句宣读一下党的书记洛夫斯顿同志在1927年12月14日会议上向政治局提出的这个建议：“责成书记处会同各州详细研究关于少数优秀共产党员加入社会党，以便在社会党内开展工作，实现

我党建立工人党的路线的问题。”

这不是偶然的或孤立的错误。这个错误来源于根本错误的观点。少数派提议否决这条政治路线，但在政治局里却遭到了失败。国际上众所周知的“潘肯路线”就出自这个总方针。在纽约市里有这么一个叫潘肯的法官，他是一个社会党人。他长期担任法官，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派——也就是说，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在最近持续了两年之久的纽约缝纽工人的斗争中，这位潘肯法官充当了警察、美国劳联和老奸巨滑的“社会党”官僚们组成的三位一体匪帮的代理人。潘肯是这群匪帮中的佼佼者，后来，当他被提名为候选人参加竞选时，我们党又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建议投票赞成潘肯先生为候选人，而放弃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与他相对抗。我们曾为反对这个提议而斗争，但是我们的斗争毫无结果。多数派声称，提潘肯为候选人，是“结成统一战线对付反革命”的问题。

这个“统一战线”是由谁组成的呢？社会党的组织和纽约的共产党组织先后表示了对潘肯的信任，同意提名潘肯为候选人。《纽约世界报》和《纽约时报》两家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报刊在选举运动展开时都支持潘肯，而我们党充当了这个“统一战线”的尾巴，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国际面前丢尽了脸。

我们不仅在政治局里反对这种作法，而且还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二月全会，在会上我们对多数派的路线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一切都徒劳无益。如果有充分时间的话，我可以向大家列举他们为了说明潘肯法官代表着反对反动势力的统一战线而向我们奉献的种种奇怪的论据。他们还以德国的总统选举（这次选举中开展

了反对君主主义的斗争)为先例,拿来作为必须投票赞成潘肯的根据,然后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对工人说,要他们必须投票反对潘肯,“工人会不理解”的。

这不是一言了之的偶然性错误,在波士顿发生的比勒克和密尔窝基事件中就曾出过这种事情,当时就有人建议,不要提出我们自己的候选人去与美国社会党维克托·伯杰相对抗。

按照我们党中央多数派的看法,这就是我们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政治路线。现在请允许我宣读1927年10月7日政治局会议记录中洛夫斯顿同志的下述建议,这个建议提出,我们在其他地方的选举中也不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与民主党人对抗。这项建议的内容是:

“在一切可能做到的地方,都应当在不破坏统一战线或不干扰工人阶级其他政党提出的当地候选人的情况下,按工党的名单提出我们自己的候选人。”

这里指的那些“工人阶级其他政党”是什么样的党呢?当然是指社会党。

我们党的多数派不仅在对社会党的评价和对社会党的策略方面推行了一条错误的和顽固的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在工会运动中同样是这种做法。美国劳联日益堕落,变成了高度熟练工人独特的帮会组织。美国劳联的群众性工会已不复存在。这个政策执行已有多数年,劳联的工会领导机构同整个政府机构和资本主义机构日益融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得出什么样的明显结论呢?在美国现有的2 500—3 000万工人中,仅有300万人参加官办的劳工联合会组织。因此,明显的结论是,党的工作方向应该是组织广大不熟练工人参加到新的工会中去。

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一再要求我们党实行这一政治路线。我党少数派也拥护这个要求。但是，我们党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把没有参加组织的群众组织到新的工会中去和吸引他们投入新的战斗方面遇到了巨大的障碍，这个障碍恰恰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优柔寡断、摇摆不定和机会主义的政策。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先说矿工的罢工。一年多以前，当罢工刚刚开始之时，少数派就提出召开全国范围的左翼代表会议，作为从路易斯集团手中夺取领导权的预备性措施。这个任务现在还在执行中。可是，中央委员会以这个建议是“工会运动中的两面性政策”为借口，拒绝了这项建议，这样一来，事情就耽搁了11个月。罢工持续了一年，力量消耗殆尽，直到此时，党才采取组织新工会所必需的这一准备步骤，着手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左翼代表会议。各州都曾出现过许多便于用来组织新工会的机会，可是我们党错过了这些机会。这是不是偶然的呢？不是。这些失败是由于对美国的整个情况和斗争的前途持保守的估计而造成的。

几个月前，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以极其坚决的态度要求我们在建立新的工会方面实行更积极和更坚决的政策。我们的党中央是怎样对待这一决议的呢？它拒绝表示同意这个决议。布哈林同志在其提纲中指出，必须同德国党内那种对抗工会国际决定的右倾趋向作斗争。我们要指出，这个要求应当同样适用于美国，因为在整个共产国际中，没有任何地方像在我们党的领导层中那样顽固地抵制着红色工会国际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还是因为保守，因为过份地谨小慎微，加上被美国资本主义和官办的美国劳联的雄厚力量所慑服，党在这方面也和其他方面

一样，始终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产生所有这一切的原因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因而无力在斗争的高潮时期对党实行领导。

类似上面列举的错误，在党的工作的各方面都有表现。我们在提交给美国委员会的书面文件中详细地介绍了这些错误的情况。

在选举运动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情况：优柔寡断、动摇不定，在社会党提出其候选人名单前，一直拒绝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还在这一年的8月，就有人设想到1928年选举前，便可以把工人党成立起来。似乎这个党一成立便将成为群众的领袖。《工人日报》刊登了许多谈论工人党的文章，把它说成是“带来解放的力量”，是美国劳动群众“唯一的希望”。

在统一战线策略方面，在工会工作和在合作化运动方面，以及在妇女工作中，无论你接触到党的那个工作部门，你都会看到我们刚才列举的事实中所指的那种机会主义政策。

面对这一切事实，党的领导究竟在作些什么呢？他们是否宣布要对右倾危险展开斗争呢？没有那么回事。多数派同志否认美国存在右倾的危险。在今年5月召开的党的全会上，无论是政治决议，还是政治报告，都只字未提同右倾危险作斗争的问题。整个辩论把矛头指向了那些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政治路线的观点出发对党进行批评的同志。

党的多数派与威信扫地的洛尔集团的残余，与党的整个右翼和党的机会主义分子抱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派别，一起来反对中央委员会中为反对机会主义路线而斗争的少数派。多数派的同志们否认右倾危险的存在。他们断言，多年来在缝纫工人中推行机会主义政策右倾错误的人，现在“已经克服了自己的

错误”，实行着正确的路线。可是，就在不久以前，这些得到洛夫斯顿—佩珀集团支持的头头们，还同毛革工会中的所谓“中间派”签订了书面协定，保证“任何党任何集团都不应控制毛革业工会的领导权。在数不胜数的情況下——要举这种例子就太多了——多数派同志们是否认这种右倾危险的存在着的。

多数派用以掩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的办法是歪曲中央委员会少数派的真实立场，从而制造一些足以吓人的东西来反对少数派。在国际上以正确政治路线代表者而闻名的佩珀同志昨天在这个讲台上所作的发言的我可以作为此类斗争的一个例子。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佩珀同志不是什么新闻人物，所以我们不认为他的论据具有多大分量。但是他在这里是以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名义发言的。佩珀同志宣读了我们文件中并不存在的一些话，然后又根据他臆造出来的这些话大发议论，几乎长达一小时之久。他断言，我们在文件里写过，美国帝国主义现在已经处于衰落状态。但是，从我们的文件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根本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佩珀同志就这样把纯属捏造的说法强加在我们头上，同我们辩论了整整 50 分钟。当然可以问一下：难道在共产国际内能允许这样一种斗争方法吗？

在我们美国，客观上是存在着很大的机会的。我们党有种种机会成为工人阶级日益发展的斗争的领导者。这种战斗已经打响，正在不断发展深入，许多大的工业部门即将爆发罢工，这种形势要求我们当机立断，具有明确的、战斗的共产主义路线。可是，这种有可能使党加强其作为群众真正领袖的地位的机会，却被党的领导，被他们的机会主义方针埋葬了，被他们所开展的反对那些竭力端正党的路线的同志的斗争埋葬了。

共产国际应该告诉这些反左勇士们：“调转你们的枪口，去反对右翼吧。共产国际应该纠正我们党的右的错误并为实现正确的政治路线创造必要的条件。

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看不到在这个斗争时期造成党内不和的机会主义，也看不见右的危险，因为他们本身就代表着这种右的危险倾向，我们为实行正确的共产主义路线而斗争，使党能充分利用目前存在而且近期内将继续存在的形势所提供的种种客观机会。

伊列克（捷克斯洛伐克）：

鉴于我们大家都准备在辩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和经济形式作出详细的分析，我现在仅根据我党中央委员会社会经济部的材料谈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经济处于景气状态已一年有余，而且我们有一定的材料为依据，足以说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经济整个说来已超过战前水平，某些工业部门甚至大大地超过了战前水平。捷克斯洛伐克的景气局面与其说是由于国内原因，不如说是由于德国良好形势所促成。根据国家的一部分失业者的统计资料来看，今年的失业人数是捷克斯洛伐克建国以来最少的。1928年头5个月，煤的消费量比1927年同时期增加了15%，而比1926年同一时期增加了21.5%。铁路货运量增长数字也与此类似。1928年头5个月里运货约235万节车皮，而1927年的这几个月里货运量为220.2万节车皮。1928年第一季度营业税的纯收入总数接近5.85亿克朗，而1927年仅4.935亿克朗。这些资料还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情况得到证实。金融市场的紧张情况是迄今为止捷克斯洛伐克前所未有的。金融市场的紧张和利率的提高也影响到交易所，使那里出

现了萎缩的趋势。今年建筑业、铁路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情况非同寻常。对外贸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由于受美国和德国市场行情疲软，以及其余中欧国家当前情况的影响，捷克纺织工业的状况明显恶化，这说明捷克斯洛伐克的景气状态已经达到了顶点。3/4 产品供出口的制糖工业现在已经出现了困难。这个经济部门受到来自美国关税部门的威胁。糖业大老板们利用这种困难局面希望从国库获取补贴，并且力图依靠改良主义者的帮助在最近的运动中降低工人的工资。资本家在景气时期通过对工人的加倍剥削和实行生产合理化所获得的利润，在最近时期已达到了十分庞大的数额。去年的剩余价值为 200%。而工人的境况不仅没有改善，相反，越来越坏。不少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虽有所增加，根据我们的估计，平均增长约 5%，得是，由于物价飞涨和开征农业税，这一点增长数又化为乌有了。资产阶级从各个方面向工人发动进攻。阶级矛盾严重激化，这在政治生活中也表现了出来。在经济领域中我们可以指出最近期间发生的许多次罢工，特别是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建筑业以及玻璃工业的大罢工，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农业工人的罢工，以及在所有工业部门进行的关于工资问题的谈判。这个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是对资本家进攻的回答。群众的思想日益激进，更积极地参加我们党今年组织的“五一”游行；北波希米亚矿工的罢工和其他许多为提高工资而开展的运动取得显著成绩；在市政选举和工厂委员会改选中，投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票数增加，而改良主义政党所得的票数减少，这一切都证明，群众明显地向左转了。

我国的资产阶级同样在谋求一种能提高自己竞争能力的政策，而同时又在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准备。资产阶级加紧对工人阶

级实行高压政策，而对改良主义领袖则采取给予补偿的办法，利用他们去对付群众的左倾化策略。为了这个目的，资产阶级给改良主义领袖们提供待遇优厚的国家职位，把原属大土地所有者的大片土地分配给改良主义的合作社。所有的改良主义者随时都准备同资产阶级妥协，尽管资产阶级并不认为有必要对改良主义者作出重大让步。这在修改社会保险法的谈判中表现得最为清楚。社会民主党人文特尔博士为了便于开展院外“斗争”，甚至以举行街头活动来威胁资产阶级。在维护资产阶级国家的生存和安宁方面，改良主义者甚至比资产阶级本身更卖劲。他们甚至不让共和国受资产阶级政府集团的侵害（见图克事件）。在罗瑟米尔勋爵运动时期，社会民主党人德雷尔博士写道：我们关注的是“保护和捍卫捷克斯洛伐克”，他还竭力向英国证明，处于目前状况中的捷克斯洛伐克是对付苏联的最可靠的支柱。改良主义者对所有的军事法案都投了赞成票，理由是，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是他们的天职，与此同时，他却一直掩盖战争的危险性。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公开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马萨里克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政府采取反对派的立场，是为了等待时机，以便在不改变现有社会关系的情况下，再次进入资产阶级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影响最为明显的事实是，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清楚地告诉人们，由于党内的工人成份处于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小资产阶级已经控制了在这个党内为所欲为。捷克斯洛伐克两个改良主义党都在维护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外交政策。在摩拉维亚——俄斯特拉发地区的工厂委员会中，甚至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与资产阶级结成紧密的联盟，同法西斯

分子联合在一起反对共产党人。他们进行卑鄙无耻的诽谤。他们与政治警察沆瀣一气，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人，充当了奸细和代理人的角色。被我们开除的反对派分子也帮助改良主义者来反对共产党人，其中一人在社会民主党的《人民权利报》上发表了的一篇文章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不可能实现的文章里还得出结论说：“未来只能属于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分子力图使我们同广大工人群众隔绝。最近以来他们照搬在工会运动中的作法开始破坏合作化的统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分子在分裂自由主义者组织和体育团体的运动。在最近开展的保护工资的行动中，改良主义领袖们采取了“更激进的”阶级背叛，公开充当工贼。最近时期，他们采用这种方法使斗争的工人遭到失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工人要改善自己的困难处境，必须坚定不移地斗争，首先要采取坚决行动反对改良主义领袖，揭露他们，防止他们进行进一步的叛卖活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我们党的大部分党员依然存在着传统的思想残余，这就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至今未能十分有力地同改良主义领袖们展开斗争。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去。

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和国际矛盾的加剧，对革命运动及其领袖——共产党的迫害也不断升级。资产阶级采取最能使我们党遭到损害的措施来对付我们党，它禁止和压制我们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想以此来妨碍我们克服党的工作人员的缺点。他们检查我们所有的报刊，以此阻挠我们迅速地向广大工人群众提供正确的信息。他们侵犯我们的议员豁免权，没收他们的演讲稿，不让我们党适当地利用议会的讲坛。资产阶级多次企图借改良主义分子之手从内部瓦解我们的党。当他们采取攻击领导人的做法毫无结

果的时候，资产阶级便采取了恐怖手段。资产阶级先是企图让机会主义分子和取消主义分子渗透到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中来，接着又开始迫害这些组织，指望通过这些办法至少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进程受阻。资产阶级迫害红色工会，镇压无产阶级的体育运动。可是，我们党没有对资产阶级的这些进攻作出足够的反应。党还没有能力很快地对资产阶级的每一措施作出反应。群众有组织地进行反抗的能力还很薄弱。遭到禁止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在多数情况下均未达到目的。我们的党员中还严重地存在着“尊重”资产阶级法律的传统观念，因此还有很多人过份地强调合法地位。我们甚至出现过这样的事情，罢工工人要求共产党议员代他们担任纠察队。尽管一部分党员已经意识到为了争取合法地位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但在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方面，我们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布拉格庆祝国际青年节的活动、纪念十月革命 10 周年的游行活动，以及不顾禁令而于 3 月 29 日在布拉格举行的争取改善社会救济的游行示威均获得成功，这一切表明由于开展了广泛的劳动群众运动，即使在资产阶级与改良主义者串通起来对付政治游行示威的情况下，只要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开展运动，政治性的游行示威仍然可以取得成功。

简单地谈一下我们的红色节问题。这次行动我们没有搞成。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布拉格，这次行动对我们来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通过对红色节的整个准备工作和遭受失败的原因的分析，我们看到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我们是在斯巴达克运动会遭到禁止之后立即宣布举行这一活动的，因此在群众中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红色节是对这个禁令作出的回答，这样一来我们的宣传鼓动纲领的意义就缩小了。中央委员会意识到了这一点，知道自

己犯了错误，自然认为必须立即纠正这一错误。而为此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我们最得力的助手——刊物，只要提到红色节和对斯巴达克运动会的禁令就会被没收。读者在报上看到的只是经检查后留下的天窗。我们收到的来自国外的没有被没收的刊物不但不及时，而且数量也不敷需要。议会的讲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用，来为我们的宣传目的服务。此外，由于我们在议会中的代表有关红色节的发言稿一概遭到没收，所以也很难利用议会的讲坛，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渗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为准备红色节所开展的运动也因此而成了党的积极分子的内部事情，因为我们还可以通过传达指示信的办法及时地向积极分子通报情况。为开展红色节而进行的鼓动工作没有把重心放在企业里，尽管工厂支部在这段时间里表现比较积极，但他们在工厂中的积极性远未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党的党团活动从总体上讲还很薄弱。所以我们还不能激起群众的同情，群众依然处于被动的状态。工厂委员会也没有像我们所需要的那样参与这项工作。另一方面政府却作了极其充分的准备。资产阶级报刊和改良主义政府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这些报刊劝告工人不要去布拉格参加红色节活动，以避免无谓的流血。所有的警察和整个宪兵机构都被动员起来。某些地方的资产阶级还企图动用军队。红色节前几天，布拉格就宣布实行戒严，所有通向城市的道路都被封锁。外省的宪兵还在各车站阻止我们的同志离开当地。宪兵还没收载重汽车，不让这些汽车运送工人前往布拉格。有些地方克服重重困难，派出几辆公共汽车运送参加红色节活动的人去布拉格，也在途中被扣，只得返回原地。红色节前夕就有很多人被捕。7月6日那天，布拉格有上万名宪兵出动。这一天警察除了通常装备的军刀之外，还配备了手

枪和步枪，甚至架起了机枪。尽管政府采取了上述种种预防措施，仍然有好几千工人从共和国遥远的地区来到布拉格，以便和布拉格的几千工人联合行动，为自己争取游行示威的权利。既然在布拉格有好几千工人，为什么没有举行示威游行呢？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面谈到党中央的立场时来讲。至于全共和国范围内红色节的进展情况，我还无法作全面的报告。我只提一下卡尔斯巴德、赖兴贝格、俄斯特拉发和布吕恩等州及斯洛伐克的情况。在上述地区，尽管政府采取了一切措施，示威游行仍然举行了，有些地方的示威游行还具有相当的群众性，连资产阶级报刊也得承认这一点。红色节除了失败的一面外，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首先，最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当时是如此地惊慌，以至不寻常地动用了整个国家机器；其次，我们的党组织和积极分子还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表现积极。这次运动比以往任何一次运动都更加有条不紊。在运动准备期间，党员们懂得，为了争取党的合法地位，必须把合法斗争同地下斗争结合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次行动是我党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地下斗争。再其次，在准备和开展运动的过程中，党的各种缺点也暴露无遗。如果我们现在能明确我们的错误所在并采取措施予以克服，那么，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在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面进一步取得成果的。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低估我们遭受失败的程度。我们不想掩盖我们的错误和失算。我们都赞成对我们党的全部工作和所有决议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并且随时准备得出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关于红色节的经验教训问题，在有我们党最重要的各州州委书记参加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上已经进行了讨论。什捷恩和萨波托斯基同志在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之后

又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开展了广泛而坦率的辩论。通过这些报告和讨论，揭露了我们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中央委员会、各州委员会和所有党组织开展了毫不留情的和全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过了两天会议，我们得出了下面的结论，这个结论的大部分内容获得一致通过。

“举行红色节活动是政治形势的需要。党在这次行动中遭受的失败之所以十分糟糕和严重，原因在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斩钉截铁地强调，必须开展一次规模巨大的、对无产阶级切身利益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行动，可是，在最后时刻，党却没有作出哪怕一点点尝试去真正开展这个红色节。这样的失败不能用任何行动都会发生个别错误和缺点作解释，它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这些原因基于我们党的整个状况，并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和极大的错误。”

失败的原因不应当从党的一般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寻找。总的来说，党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并由此得出了正确的政治结论。党存在着巨大的弱点和不足之处，这是不止一次被指出过的，不言而喻，这些错误和缺点对这次失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仅仅用这些错误和缺点来解释这次失败是不行的。自我批评和正确地判明党内存在的相当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这一点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贯彻，也没有以足够的精力和始终如一的精神去考虑这些问题。

错误也不在于这次行动整个来说是一次新采取的行动。从整个政治局势看，从革命组织面临着可能被剥夺公开开展工作的权利的危险（而这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将受到威胁）来看，组织这次行动是势在必行。如果不是党犯了严重错误的话，这次行

动计划是绝对没有超出党的能力之外的。

导致红色节活动失败的错误和缺点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 这次行动没有或者说没有充分地贯彻统一战线的策略。尽管最初曾在这方面提出过正确的口号，可是党却未能充分地向广大群众讲清红色节活动真正的政治涵义及其对劳动者的意义，没有把非党群众消极的同情变为支持和保证行动胜利的力量。党对形势的困难也估计得很不足。

2. 行动的准备工作的仅仅在党员积极分子中进行，而且连这一点也只是限于党内，目的是组织党员参加行动，而不是动员和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进来。为了吸收一些得不到秘密指示的人来参加活动而准备的关于集合时间和地点的公开通知发布得太晚了。

3. 事先规定行动的日期是在策略上犯了错误。它使我们难于机动行事和选择有利的时机，也使我们难于实行退却和克服群众中存在的错误观点：似乎举行红色节活动仅仅是对斯巴达克运动会遭到禁止而作出的回答。

4. 部分领导同志内心对这次行动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不甚相信，因而出现动摇。党的大部分同志，包括最上层，受资产阶级威胁和恐吓战术的影响太深。

5. 大部分党员积极性不够，特别是布拉格的党员。不积极参加支部会议，支部工作存在着错误，生产支部的工作更是如此。支部在企业中不做任何工作，在工厂委员会开展活动之后，支部在工厂委员会和各种委员会中也不做任何工作，连群众组织中的党团活动也完全没有了。诚然，一小部分党员在不遗余力地工作着，但是，工作的方向不对。通过这次行动的准备，党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党的支部在以往的任何一次行动中都没有像这次

行动那样广泛动员起来，但是，这次动员没有得到良好的利用。举行红色节活动的问题没有在基层组织中进行充分讨论直至作出最后的决定。

6. 游行指挥和联络工作组织不善，在应该行动时不能胜任自己的任务，这在布拉格表现得尤为明显。

7. 过分突出声势的渲染，在报刊上进行了错误的宣传，而没有充分注意讲清红色节的政治意义。没有充分地利用议会讲台进行合法的宣传鼓动，以便在统一战线策略的基础上使广大群众关心这次行动。在新闻检查机关使党的刊物无法进行这项工作的情况下，这种合法宣传尤为必要。

8. 在7月6日当天，奉命前往扭转局势的演说者们没有作出任何挽救局势的努力，他们既没有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也没有提请中央下达新的指示。中央委员会没有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以保障自己命令的执行，也没有灵活地指出其他的解难之法——在全面准备运动的情况下，对可能的退却缺乏足够的保障措施。

失败必然给党和无产阶级带来严重的后果，而资产阶级自然要利用我们的弱点进一步发动进攻。党的威信和它在党外广大群众中以及党员中享有的信任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和很大的破坏。作为党内当前最大危险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一道，竞相利用这次失败以反对列宁主义路线。无产阶级党的自觉性和战斗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失败也促使我们清醒地觉察到党的严重错误和失误，从而为消除这些错误和失误提供了条件。

在这种局面下党必须首先采取以下措施；

党必须由下而上地进行改组并同自己的缺点展开坚决的斗

争，使这些缺点得以克服，使党得以挽回自己在劳动群众和党员中享有的充分信任。失败不应当阻碍党根据现实形势进一步开展自己的战斗行动。党应当回击同时表现出的两种错误的极端情绪，一种极端是对失败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这会使我们难于改正缺点，另一种极端是产生失败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会使人们怀疑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我们为了消除对革命组织的存在形成的威胁而采取战斗行动的必要性。为了弄清所有的错误和缺点，必须进行全面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应当使每个党员都能够作完全公开的和不留情面的批评。为此，应当先在党内进行这种讨论，然后进行公开的讨论，讨论的时间将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应当提倡并真正实行党内自我批评。

在弄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应当重新审查下述各方面问题：

1.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2. 中央委员会对各部门的态度；
3. 对各州的态度，首先是对第一州的态度，以及各州对基层组织的态度；
4. 对各群众组织的态度，共产党党团在其群众组织中的工作性质，以及统一战线问题；
5. 民主集中制问题，也就是说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党员群众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解决党的重大问题。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全会会议上出现了两派意见。其中的一派意见反映在萨波托斯基同志的报告中。根据这种意见，红色节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等等。

1. 口号提得不对；
2. 没有正确地估计形势；

3. 没有运用统一战线策略，而以浪漫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对待这次行动。

第二派意见是州党组织书记斯兰斯基同志阐述的：

1. 除了其他的错误以外，在红色节活动的形式和性质问题上提法有错误；

2. 失败的原因是党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这在以往的行动中已有所暴露，是党的实际政策中的右倾表现；

3. 党的领导对党内主要危险——右的危险开展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软弱无力；

4. 党的领导没有充分积极地去提高党员的布尔什维克水平和吸收他们参加讨论和解决所有的党的问题；

5. 党的领导忽视了自我批评，阻碍自我批评的开展，没有花费应有的精力去克服错误和缺点；

6. 为了同右的危险作坚决的斗争，为了消除党的机构的种种缺点，党的领导必须具有布尔什维克的巨大魄力，必须通过增加布尔什维克成份的办法来改善党的领导。

而现在雷曼同志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会议的讨论中却断言，如果党的路线确实是正确的话，这种失败一般来说是可以避免的。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还想就党内的状况说几句。

在一个很长时间内，党的敌人还将来自右边。我们的党员是名副其实的群众的党，目前有党员 15 万人。从最近一次党的危机，即 1925 年的危险时算起，党员人数几乎增加了 1 倍。从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算起，党员人数几乎增长了 10%。党员现在是由

6个民族的代表组成，1/3以上的党员工作很积极。他们不知疲倦地为人民服务并且影响着那些没有正常开展工作的大多数党员。这些党员合在一起又对上百万的选民产生着思想上的影响，也就是说对全国1/7选民群众产生着影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基础是工厂支部。党的领导以及各州的领导机关，整个说来都在改进自己的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能对政治事件作出正确的反应。但是，在各州和支部里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直到现在我们仍可看到，那里的政治生活不够活跃，工作节奏相当缓慢，因此往往总要过相当一段时间，基层组织才对事件作出反应。我们的主要错误在于，我们在自己的行动中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到生产支部上去。除此以外，我们党还暴露出严重的地方主义倾向，不能对具有国际意义的问题作出充分的反应。它所造成的结果主要表现在动员群众同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党缺乏能够积极开展工作的人员。对党员的教育工作远不能满足希望。最近党已着手对党员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因此，可以期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便能冲破警察的禁令，克服因使用多种语言而造成的困难，较大幅度地解决工作人员不足的问题。在开展党团活动方面我们存在着很大的缺点。迄今为止，我们未能在所有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中建立起党团组织。我们的党团活动尚处于萌芽状态。必须全力加强我们在这方面的的工作。除了红色工会以外，我们这里还有改良主义的工会组织、至今仍然统一的强大的合作化运动、力量雄厚的无产阶级体育团体、群众性的自由主义者组织、战争受害者组织和房客组织，志愿消防组织、特种军团支队等等。我们这里还有庞大的劳动农民组织。我们还可以成立国际工人救济会组织，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组织和对苏友好团体。共产主义青

年团同样也可以成为群众性组织。如果我们共产党能正确地开展工作，我们将赢得很多胜利。我们的党团活动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我们对已建立起来的团体很少进行指导，我们党组织的成员缺乏系统的训练，非党组织往往不受党的控制，也得不到党的教育。我们没有充分发挥那些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的工厂委员会的作用，我们至今没有给工厂委员会以足够的重视。除了大企业之外，我们甚至不去参加工厂委员会的选举准备工作。我们对工厂委员会的选举结果缺乏应有的概念。这可说是一大失误。我们党的工会工作开展得很差。我们不善于正确而充分地利用有利的形势。为克服工会活动中的缺点而开展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无疑应当加快这项工作的步伐。我们的青年直到最近仍然完全忽视工会工作。在农村工作方面，我们也远远地落后了。应当给我们的工作规定出具体的内容。工作应该是多方面的。党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并且千方百计地使生产支部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党应该全力以赴完成这些主要任务。应当不断完善工作方法。只要对党的工作建立起经常的监督，我们就一定能有很大的把握做到，不仅在口头上谈论党内的错误和缺点，而且能有力地纠正这些错误和缺点。如果受过布尔什维克训练的党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那么党开展正确工作就有了保障。

从发生最近一次党的危机之后至今的3年里，我们党大大地前进了，但是，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相比还很不够，我们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受严重的革命考验，因此，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过程有不少困难。最近时期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速度又减慢了。

如果党能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下正确地利用红色节活动的全部经验，那么，布尔什维克化速度将会加快，党必将在战无不

胜的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大步。

沙尔吉（波斯）：

波斯代表团基本上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我个人还同意巴尔干各国代表团的声明并想指出一点，即布哈林同志的提纲，对存在于东方各国的尖锐的农业问题阐述得不够明确，也不够完整。现在，当所有东方国家共产党把土地革命的具体口号列入自己的策略纲领的，毫无疑问，应当更加详细地和明确地谈一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在会上谈到了在巴尔干各国和欧洲国家的农民问题和农民阶级分化问题。我想针对近东国家，主要是就波斯的情况谈一谈这个问题。在波斯这个国家里农民是居民的主要部分，也就是说，是推动波斯革命的最强大的力量。

在这些国家里，特别是在波斯，农民的处境非常困难。现在，波斯农村里的阶级斗争是现实存在的。我们看到农民正在发生分化，几乎每年都可以看到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农民的处境和这一部分居民遭受的剥削所引起的。在英国帝国主义支持下，依靠欺骗和谎言上台的礼萨汗·巴列维反动王朝，代表大地主的利益，使农民本来就十分困难的处境更加恶化。目前在我们波斯，如同在所有的东方国家一样，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无力同外国资本家竞争，闲置的民族资本全都投入了土地。在我们波斯，几乎所有地区的商人和买卖人都在购买土地，而不去开办新的工厂或工业企业。这些与农业相联系的商人当然绝对不会去改变波斯的农业经营方式，相反，他们全盘继承了封建波斯所实行过的种种剥削方法。

惨无人道的剥削制度造成了波斯广泛的农民运动。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里，波斯爆发了

4次大的群众性农民起义和几次小的农民暴动。在这些起义中农民所有队伍都共同高呼“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的口号。农民们纷纷提出自己的阶级口号，殴打和杀死地主，烧毁他们的庄园，等等。

所有这一切表明，我们的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应该更多地注意土地问题并且尽可能地讲清这个使我们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近东问题。我认为布哈林同志在其提纲中同样叙述得不够。近东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英国在近东国家中的阴谋活动已经达到了危险的地步，在出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现实威胁的今天，情况尤其如此。

在世界政治中，近东过去和现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争夺近东地区曾发生过多次流血战争。在世界大战期间，近东起了不小的作用。同志们，现在英国帝国主义在策划新的战争，正在这些国家中为自己建立牢固的基地。英国帝国主义已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印度和其他国家获得巩固的阵地。英国帝国主义已经图谋夺取波斯湾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巴林群岛。英国军用飞机已获得自由飞越波斯南部国界的权利。英国帝国主义正在占领波斯的全部石油产区。它是修建跨越波斯国境铁路的主要倡议者。它正在集中大批力量，为进攻苏联而在印度边境地区实行大规模动员。同志们，一旦爆发战争，不管近东各国是否愿意保持中立，近东将不可避免地再次成为重大战事的舞台。

因此，布哈林同志若能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全部意义，他自然而然就应该在自己的报告和提纲中较为详细地谈一谈这些国家的作用和这些国家共产党应当奉行的政策。英国帝国主义的稳定不仅是依靠殖民地国家，而且还依靠一些落后国家，如土耳其、波

斯、阿富汗和其他近东国家。

遗憾的是，不仅在报告里没有给近东国家以足够的注意，共产国际在其日常工作中也同样很少注意近东国家。

我看应当结束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共产国际应该更多地重视近东国家和近东共产党。

同志们，下面还想讲一讲近东国家共产党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党、民主党和民族党的态度。布哈林同志在其报告中谈到了西方共产党对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问题。当然，我们那里没有社会民主党。但是我们那里有近似这种类型的党，如社会党和民族党等等。我们曾长期同社会党结盟，但最近以来它成了典型的机会主义政党，多次公开地反对共产党，出卖了共产党。

波斯的社会党过去不是，将来任何时候也不会成为群众性的党，不久的将来，必将同这个党内毫无原则的活动家们那种冒险行径决裂。可惜共产国际在这些问题上也没有肯定而明确的路线。例如，1926年共产国际提出过蒙古的经验。也就是在蒙古成立民族革命政党的经验。于是共产国际就说，应当把蒙古的经验运用到我们那里去，也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成立民族党。我们一再说明这种事干不得。结果虽没有取消共产党，但成立了民族革命党。可是，事隔一年，我们又接到新的指示，要我们根据中国的经验取消民族党，加强共产党。这种作法是不正常的！我们年轻的共产党需要明确的路线和确切的指示，以便不犯中国和其他国家犯过的那些错误。除此之外，我认为共产国际在其他方面，如提供情报方面还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些。

在波斯最近的选举中，共产党独立地提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当然，我们犯了某些错误，也存在某些失误。我想对一个年轻

的党来说，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来到这里以后得知，其他东方国家也曾经犯过类似的错误。当然如果共产国际能及时地把这些情况通报我们，我们也许就不会犯这些错误了。但是没有这样作。结果重犯了这些错误。

我还想谈一谈各国共产党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以往的几次代表大会上，对宗主国的共产党同依附于宗主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共产党联合行动的问题谈得很多。在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甚至还专门列出一条谈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仅仅是纸上谈兵。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实际的东西。例如，英国共产党是有很多事可作的，它可以给波斯共产党、给印度共产党以很大的帮助。法国共产党也同样能够为叙利亚和其他国家做很多事情。但是很遗憾，这些党什么也没有做。我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代表大会应当促使有关国家的代表团注意，今后宗主国的共产党应放弃孤立主义的态度，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共产党进行必要的联合。

毕特尔曼（美国）：

我基本上同意布哈林同志提出的提纲，但是我认为提纲的某些部分尚需作进一步的研究，另一些还要提得更清楚一些。布哈林同志在其提纲中正确地指出，战争是威胁工人阶级的最主要的危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问题。我们的代表大会是在动员群众反对战争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也是大会在工人阶级国际斗争中应起的作用。

在未来战争中美国帝国主义将起领导作用。我们知道美国帝国主义这支帝国主义最强大的力量正在扩大军事工业，积极准备战争。因此，美国共产党在即将发生的大规模世界冲突中将发挥

历史性的作用，这样美国共产党就需要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确定自己的立场和奉行的路线。

所谓的“凯洛格和平攻势”影响十分广泛，所以共产国际和我们党应当比现在更加有力地同它进行斗争。凯洛格的“和平攻势”不过是用来掩盖战争准备的一种烟幕。它是一种手腕，目的在于消除苏联争取和平和裁军的斗争，麻痹群众的斗志，向美国工人阶级灌输和平主义的幻觉。因此，揭穿美国帝国主义者和所谓凯洛格和平建议的伪善面目，是我们同战争危险和帝国主义战争作斗争的极其重要的环节。

美国的和平主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美国群众中，和平主义幻想的传播极其广泛，连我们党也不止一次染上了这种毛病。仅举几个例子就足够了：

(1)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美国水兵在尼加拉瓜的被杀或死亡提出了抗议；

(2)中央委员会不久前提出过这样的论调，似乎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行动受大英帝国的领导，美国帝国主义只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工具，接着又出现了另一种论调，说什么美国帝国主义没有奉行独立的侵略路线，只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在最近保卫尼加拉瓜的运动过程中，我们提出了几个完全无法接受的和平主义口号。从上述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同和平主义和和平主义幻想作斗争是多么重要。

现在谈谈世界经济形势问题。提纲完全正确地谈到，由战争和资本主义战后危机所引起的深刻结构变化，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极度激化。但这仅仅是一个总的公式。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代数”分析法，而对于一般性提纲来说，我们需要的是简

单的算术。提纲分析的主要是外部矛盾，主要是国家之间已经成熟的和已经存在于各国之间的冲突。但是，我认为，必须对内部矛盾作更具体的分析，指出这些矛盾是如何发展，如何日益成熟的，更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些矛盾对群众的生活条件产生了何种影响，对工人阶级开展斗争有何意义。提纲对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说得不够充分。

提纲描述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将爆发大规模阶级搏斗的前景。但是，这个分析根据不够，难以使所有共产党人无条件地信服。

现在来谈谈美国。我认为，共产国际在美国问题上应当提出一点新的东西，因为最近几年以来，美国发生了某些意义颇为重大的事情。请允许列举数例，在我看来，这些事例要求我们重新强调美国的作用和对美国提出一点新的东西。

第一，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根本的变化。提纲谈到了结构的变化，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第二，在美国工人阶级的队伍里和阶级关系方面发生了具有变革性的变化，通过对美国的经济分析可以看出，经济领域中发生深刻的质变时机日益成熟。所以，指出美国帝国主义仍处于上升阶段，而且仅仅指出这一点是不够的，当然这本身是正确的。之所以不能这样做，特别是因为在我们美国共产党内多数人相当片面地和错误地理解美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对我们的前景、政策和策略的意义。

美国资本主义在现阶段有哪些特点呢？不妨简要地摘引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少数派致共产国际英美书记处文件中的几段话，看一看少数派是怎样说的：

“美国资本主义现阶段的状况是由下述基本因素决定的：(1)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日益成熟(生产能力提高的速度和产品增长的速度之间比例失调，产品的增长和消费量之间的比例失调，失业，合理化、资本输出和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种种矛盾，等等)，整个经济体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2)这些内部矛盾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不断衰退和苏联社会主义目前发展的条件下，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加速发展和接近于崩溃的条件下成熟起来的。

对这些矛盾成熟程度的分析表明，美国资本主义正处于达到其发展**巅峰**的前夜，进一步的扩张必将促使它采取新的和更加坚决的措施来降低美国群众的生活水准和试图通过武力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划分帝国主义的统治范围；而所有这一切必将使上述种种可能导致美国帝国主义崩溃的矛盾更加激化。”

这几天佩珀徒劳无益地试图证明，这个文件似乎肯定美国帝国主义已经进入衰落时期。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听到了，这个文件是怎么说的，而佩珀又是怎样讲的。不过，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

现在我们先说内部矛盾。请允许我向你们提供几个数字，数字不多，但颇令人生趣。首先是关于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和产品数量的增长速度之间不相适应的问题，我们看到如下的情况：铸钢工业在1923—1928年间生产机构增长了14%，而产品仅增长6%。甚至在产量创纪录的年代里也从未超过生产能力的80%。1928年5月10日《纽约时报》写道：“人均消费量（指钢）未见增长，而消费和生产能力之间的比例却开始出现不良的现象。”另一方面，产品的增长和消费量之间出现了不相适应的现象。从这里我们看到一种颇为重要的趋势，那就是大部分美国居民购买

力在下降，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土地较少的和自己参加劳动的小农场主的购买力在下降。你们可以看到国民收入用于工资部分的比重在不断缩小。1920年雇佣劳动者——不仅是工人，而且还包括职员——所得仅占整个国民收入的59%，而1925年更下降至38%。从事农业的400万工人，1920年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3%，而1924年降为1.3%。从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1925年所得比1923年少约2.7美元，而同一时期的工业产值增加了10亿美元。

再举一些数字。工业部门的雇佣劳动者所得占1914年国民收入总额的41.8%，而1925年为40.1%。

至于农业，1919年农业人口占整个人口的16%，其纯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11.8%。1924年在农业部门领取工资的人占人口总数的14.3%，而他们的收入仅占国民收入的6%。

由于工人和农场主是国内市场的基础，因此不难理解，群众购买力的下降必然要妨碍国内产品的增长，加剧美国资本主义在国外的侵略性。

第三个问题是产量增长速度缓慢。我这里讲的可能对佩珀同志有利，那就是我没有讲美国资本的衰落，而是讲产量增长速度缓慢。关于这方面可以举几个有趣的数字。1919—1923年间，美国采掘业的产量增长36.3%，而1923—1927年间仅增长1.9%。1919—1923年间加工工业产量增长20.2%，而1923—1927年间仅增长5%。1919—1923年间整个工业产量增长21.6%，而在1923—1926年期间仅增长5%。这些数字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增长速度减慢。

如果我们再了解一下那些能说明美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的数

字，我们会看到什么情况呢？我们同样将会看到速度减慢的趋势。面对这种趋势自然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只有从这些趋势出发和面对世界市场竞争愈益激烈的事实，我们才能真正懂得，为什么美国帝国主义者要准备战争，而且不是在宣传上，而是在实际上进行着战争的准备。

我还想谈一谈合理化和大规模生产引起的内部矛盾，以及诸如失业之类的重要事实。瓦尔加同志详细地阐述了这些问题，我只想补充几个数字，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对美国的情况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

1924—1927年期间加工工业增长12.7%，但在加工工业部门就业的工人却减少了3.2%。有关铁路运输的资料也令人颇感兴趣。从1927年7月到1928年1月为止，被解雇的铁路员工达209 055人。目前在铁路上工作的员工比1920年少40万人。一些说明铁路修配厂工人情况的数字更有说服力。1928年在铁路修配厂工作的人数比1927年少41 500人，比1923年少112 126人。5年间铁路修配厂工人人数不断下降，减少了20%，30万矿工无活可做，而且这不是什么偶然现象，也不是由于暂时的萧条引起的短暂现象，而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构成成分上的变化所造成的后果。

资本输出依然保持高速增长。但是，不应忘记它所引起的矛盾。美国把资本输往拉丁美洲和欧洲，在这些国家建立起工业，这些工业同美国工业发生竞争，这就更加缩小了美国扩大本国工业的可能，使经济体系中的腐朽和衰退成分更加增长。

在世界帝国主义处于衰落时期的情况下，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这些矛盾日趋成熟，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战争的危險

性和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性的不断增长。

现在再来谈佩珀昨天提出的批评性意见。他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似乎美国帝国主义已经开始衰落。可是，我们从没有这样想过。我们的观点不管是在文件里，还是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都表述得够清楚的了。我们只是认为，那些渲染美国帝国主义力量强大的人是错误的。为美国帝国主义作宣传，这不是我们的义务，不是共产党人应做的事。我们不需要为美国帝国主义作广告，而应当以共产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美国帝国主义。你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在我们党内的危险性。有时我觉得，这些同志甚至为美国帝国主义感到自豪——为“我们的”美国帝国主义，“我们的”间谍系统，“我们的”舰队，“我们的”水兵等等感到自豪。

我举一个小小的事例，这个事件可以说明佩珀同志对美国情况和国际局势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说：正当美国帝国主义因为不断发展而热衷于战争的时候，你们怎能肯定它不是处于发展的上升阶段呢。假设佩珀同志对我们的观点叙述得不错的话，（实际上他歪曲了我们的观点），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样看待英国的情况？英国的力量处于衰落状态，可是英国仍在进行战争准备，其准备程度不比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差。

7月17日《真理报》发表了佩珀同志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不像美国资产阶级那样具有如此无限的能力去瓦解广大工人阶层。同志们请注意，他说的是“无限的力量”。

由此可见，同志们既然作出这样的分析，你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佩珀同志提出美国劳联，而不是左翼领导的新工会存在着不断发展的前景；你们就会理解他为什么断言，似乎我们既没有右

的危险，也不存在右翼。

同志们，在递交给共产国际英美书记处的文件里，我们指责党中央奉行了右倾路线。这是严重的指责，但我们准备拿出证据来证实这一指责。

近日佩珀同志在会上发言时要人相信，似乎是他第一个发现了美国的机会主义。好吧，就算这样，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既然佩珀同志最终是以右倾错误的角度看待美国的党，那么他又从何发现这些错误呢？原来他是在4年前即1924年在我们党提出的选举纲领中发现的。为什么不去研究最新的即1928年的选举纲领呢？在这个纲领中他将发现这样的政治要求：“美国共产党要求（在1928年）取消国会，取消最高法院，取消总统的否决权。”

1928年美国共产党要求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改革，而佩珀同志却要去搬出1924年的纲领！看来1928年与我们党的工作和政策关系更为密切（在美国代表团的席位上有人喊道：“为什么你们投票赞成呢？”）。我和少数派的其他代表一起向党中央建议撤销这个要求，但是在投票表决时，多数派胜利了。

再举一个事实，就是佩珀同志惯用他那一套混淆是非和在讨论中搅混水的手法，他说9个月前少数派的代表在莫斯科曾说，整个美国工人阶级正在资产阶级化，而现在少数派的代表却说美国工人阶级几乎正在全部转向共产主义。但是，同志们，9个月前我们说过的话，在共产国际的纪录里已记录在案，我们说的是正确的，共产国际也肯定了这一点。无产阶级的上层，即工人贵族已经资产阶级化并且对工人阶级的下层产生着一定影响。我们曾要求开展有力的斗争，反对这种资产阶级化。而现在难道我们说过美国工人现在已跟着共产党走了吗？不，完全没有这回事。坎农

同志指出，在讲到美国出现激进潮流和美国群众发生左倾化现象的时候，我们对这种现象所设想的方式是实际的，是符合美国情况的。我们指的有如下事实：

最近三四年以来，美国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面前不断退却，现在开始表现出战斗激情并准备进行斗争，特别是那些非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和未参加组织的工人。我认为这些群众正在左倾化，所以我们不同意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洛夫斯顿和佩珀同志的观点。按照他们的观点，既然 13 个铁路工会的官僚支持胡佛，所有的铁路员工也就都拥护胡佛。我们不同意洛夫斯顿和佩珀同志的意见，认为劳工联合会支持阿利·史密斯，说明整个工人阶级都拥护他。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不认为美国劳工联合会和铁路工会的官僚们是群众情绪和观点的忠实的唯一的表达者。我们看到资本家在实行合理化，我们看到工资在下降，阶级战斗不断增长和日臻成熟，工作日越来越长。对工人的剥削日益加重，失业现象也日趋严重。我们说这一切是产生左倾化的原因，首先是引起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左倾化的原因。我们党应该利用这个过程来组织群众和引导群众去进行斗争。这就是我们的观点，而且我们坚持这一观点。

我们的态度和党中央不一样。每当你对党中央提出批评时，它就声明：请不要来碰我们，我们是一个年轻的、不大的党。请允许我们提醒你们，到 1927 年 9 月，美国党就 10 岁了，也就是说它已经不像有时想象的那样年轻了。诚然，我们的党不大，但是建立在那种认为美国帝国主义庞大、强壮，而我们党则既小且弱的理论基础上的策略，对于加强美国共产党是绝无好处的。（鼓掌。）

同志们，我的发言就要结束了。我们不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像我们少数派没有犯错误，好像我们完全没有过失。这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也从未这样说过。我们犯过错误：对党中央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我们也是负有部分责任的，不过我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分析并纠正了这些错误，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却毫无这种表示。远不是它的习惯。我们在共产国际大会上阐明我们的观点，说的就是一件事，那就是要端正党的路线。我们肯定地认为，中央委员会、洛夫斯顿和佩珀的政策阻碍着党的发展。他们的右倾政策以及他们同组成我们党内右翼的那些分子的合作，必将造成一种使党不可能发展的局面。我们要纠正这种政策，我们要努力实现一条正确的共产主义路线。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期间，佩珀同志在美国《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想证明，如果共产国际说群众正在向左转，那指的是欧洲，而不是美国。要知道美国是个例外。当第九次全会指出各国共产党内的战斗情绪日益增长时，佩珀却说，这种说法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美国。我们声明，尽管美国不是欧洲，但共产国际的总路线对我们党照样是有效的，我们希望美国共产党能阐明这条路线，理解它并将其付诸实施。

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

布哈林同志在其报告和提纲中没有专门谈到巴尔干形势，也没有指出巴尔干各国共产党的任务。但是，如果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巴尔干在世界政治中和整个世界革命战场上不占多大地位，那就完全错误了。出现这一疏忽的原因只能是，布哈林同志在其总的分析中力图把代表大会的注意力集中到国际政治中最重大的

问题和最关键的因素上。

诚然，巴尔干各国是落后的，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不起什么决定性作用。然而，从未来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正在策划中的专门针对世界上第一个革命工人国家的战争的角度来看，以及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看，世界政治中和整个革命战场上的这个地区却有着巨大的意义，现在和将来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巴尔干是欧、亚两洲的通道。它实际上是连接直布罗陀和苏伊士运河的地中海的腹地，因此控制着世界各地通往印度的道路。由于巴尔干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成了当前正在疯狂策划中的反苏军事进攻的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其次，巴尔干还是工业大国重要的原料产地之一，也是这些国家工业产品的一个销售市场。

所以非常清楚，同志们，帝国主义大国之间为控制巴尔干而展开的斗争现在正处于最紧张的时期。相互角逐的除了大英帝国、法国和意大利之外，正在复活的德国帝国主义如今又回到了巴尔干。势力强大的美国也越来越积极地插手巴尔干各国的关系和巴尔干的政治。帝国主义势力经常进行的干涉及其相互间的角逐（这种角逐当然毫不妨碍它们奉行共同的反对苏联和反对巴尔干革命运动的反革命路线），使巴尔干各国本身之间的新老矛盾和冲突不断加深和激化，随时都有可能导致国际性的军事冲突并造成国际性的后果。由于同样的原因，巴尔干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尖锐的阿尔巴尼亚问题、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关于亚得里亚海的争执、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关于马其顿的争执、南斯拉夫和希腊之间关于萨洛尼卡的争执、希腊和保加利亚之间关于色雷

斯和爱琴海沿岸地区的争执、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关于多布罗加的争执等等，既成了国际性的争执，又成了国际性的问题。

巴尔干国家没有奉行自己独立的民族政策。巴尔干各国本身的资产阶级和王朝在其反对无产阶级、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时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在这些资产阶级和王朝的推动下，巴尔干国家变成了帝国主义大国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大战结束后的时期内，巴尔干国家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经济和政治危机，这种危机因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存在大量的封建残余，以及尚未获得解决的复杂的民族问题（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多布罗加、比萨拉比亚、色雷斯、霍尔瓦提和其他等等）而更为激化。现在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由于帝国主义的倾轧，以及希望保持巴尔干已形成的混乱局面和阻碍其生产力发展的帝国主义大国总的政策的影响，这种危机更加严重，日益扩大和尖锐。

威尼翟洛斯在希腊执政，由此而出现了在军事上发生内讧的征兆；南斯拉夫议会发生凶杀案，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愈演愈烈，塞尔维亚—霍尔瓦提矛盾极度激化；罗马尼亚规模巨大的反对布勒蒂亚努政权的农民运动依然存在，只是暂时的平静；保加利亚民主党的妥协政策垮台，普罗托格罗夫将军被杀，马其顿民族主义组织发生新的流血内讧，保加利亚发生新的军事政变的迹象已经表面化；阿尔巴尼亚正准备宣布艾哈迈德—佐古为国王，它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出现新的紧张；白色恐怖和法西斯对巴尔干的进攻正日益紧张。总之，所有这些最近时期发生的重要事件都是巴尔干深刻危机日渐激化的表现，而资产阶级既无力长期消除，也不能最终解决这个危机。

另一方面，劳动群众惨遭破产，贫穷不堪；工人的劳动遭到

残酷剥削；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对农民的强盗式掠夺、民族压迫、强制推行丧失民族特征的和殖民主义的政策，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巴尔干地区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保加利亚的无产阶级不顾其先锋队多次遭到的大规模屠杀，依然保持着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和积极性；南斯拉夫的工人运动日益活跃，最近在萨格勒布还爆发了街垒战；希腊无产阶级掀起了英勇的罢工斗争，最近发展到街垒战，克里特岛农民举行了武装示威游行；比萨拉比亚爆发了农民起义，罗马尼亚出现了“阿尔巴—尤利”组织，巴尔干各国贫苦农民都出现了左倾化和活跃起来的现象；民族革命运动有所进展，——所有这一切都是最生动的迹象，表明巴尔干地区的群众斗争正在蓬勃发展。

同时，巴尔干地区——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即将爆发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前景日益显露出来。但是，在目前的巴尔干局势和国际局势下，无论是土地革命，还是民族革命只有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通过巴尔干各国无产阶级、贫苦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联盟并在无产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况且巴尔干各国的群众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要摆脱目前这种难以忍受的处境，巴尔干各国人民必须联合起来，组成巴尔干工农共和国联盟，而这种联盟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除了这条出路以外，巴尔干各国便只能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巴尔干各国人民便只能充当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

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是如此的不巩固，在这种不稳定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矛盾是如此的尖锐。巴尔干始终是一个火药库。巴尔干无

疑是世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最易于攻破的环节之一。

现在，当帝国主义正竭尽全力巩固他们的这块阵地，企图把巴尔干变成世界反革命可靠基地，建立起巴尔干国家反苏联盟的时候，我们最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依靠巴尔干各国的革命力量和革命因素并利用现有种种巨大的和各方面的矛盾和冲突来对抗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并在巴尔干地区建立起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牢固阵地。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除了巴尔干各国必须加强群众性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以外，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农民国际也应与共产国际一道）必须特别注意巴尔干的局势和斗争情况，给巴尔干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以最广泛的帮助，使他们能顺利地克服法西斯主义、白色恐怖和帝国主义压力造成的困难，完成自己艰巨而复杂的革命任务。

巴尔干的共产主义运动由于遭受法西斯主义和白色恐怖的打击，由于在领导方面犯了某些重大错误，最近几年连续遭到了一系列的严重失败，发生了多次严重的内部危机。巴尔干各国的共产党是由原来的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它们处于残酷的白色恐怖制度之下，并且是带着沉重的社会民主党遗产和搞合法活动的许多习惯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的。在这些党的队伍中，甚至在它们的领导机关中，有许多社会民主党和半社会民主党的成分。它们同样不具有任何革命经验。保加利亚“6月9日”（1923年）所犯的严重机会主义错误，南斯拉夫共产党1921年在其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时所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的消沉情绪及其在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希腊共产党在1925年前在民族问题上以及工会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罗马尼亚共产党在1925—1926年期间

采取机会主义态度运用工农联盟策略及其在工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动摇态度等等，都是出于这个原因。

不言而喻，主要作为对这些严重机会主义错误的反应而出现的是，巴尔干各国党内几乎都出现了某种极左的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和趋势。

但是，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利用自身所犯的错误和失败的大量教训，正在脱离内部危机时期，纠正自己的政策和策略路线，在经受失败后开始清醒过来，并克服巨大困难，更加勇敢地和有条不紊地沿着实现自身布尔什维克化和把自己转变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无产阶级革命党的道路前进。巴尔干原先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在发展和转变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特别有以下3件事很有意思：

(1)逐步地从共产党内清除了与党格格不入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和半社会民主党分子，如南斯拉夫的日沃特·米洛伊科维奇集团，希腊的科尔达托斯—迪米特拉托斯和马克西莫斯—别里乌洛斯集团；罗马尼亚的克里斯特斯库和其他集团；保加利亚的萨卡罗夫—马诺夫和卢卡诺夫—波波夫集团。无产阶级分子没有跟这些与共产主义运动格格不入的小集团和少数取消主义分子走。他们十分孤立，为革命无产阶级所唾弃；

(2)共产党原先的领导人多半不能胜任在新的条件下领导共产党的任务；必须由新的、出身于无产阶级并具有布尔什维克精神和素质的党的活动家来取代他们。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由于一些原领导人人为地支持和挑起派别斗争，领导班子的更迭遇到很大困难，进展缓慢。但是，由于党内群众的积极干预和共产国际的有力促进，这种派别斗争正在得到消除。为巴尔干各国党培养和教育

一批干练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党的干部问题，现在仍然是巴尔干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3)巴尔干各国共产党要进一步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就必须同右的和投降主义的倾向作坚决的和连续的斗争。这些倾向客观上的依靠力量是无产阶级中那些在白色恐怖条件下享有特权的阶层。这些倾向是当前巴尔干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另一方面，在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中，也必须彻底克服在某些地方还时有表现的极左的和宗派主义的情绪。

巴尔干地区各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的当中享有无可争辩的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远没有在组织上得到巩固。各国党在组织上和数量上都还相当薄弱。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指出的共产党的影响与其组织力量之间不相适应的情况，正是在巴尔干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同一些资本主义大国中的情况有所不同。巴尔干的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群众没有什么影响并且一直处于衰落之中。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巴尔干各国所处的特殊历史、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通常被社会民主党作为依靠力量的无产阶级特权阶层，数量上微不足道而且眼光短浅；另一方面，还是由于上述特殊环境的缘故，巴尔干各国尖锐的阶级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

巴尔干的社会民主党早就充当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代理人。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暴风骤雨般的事件已使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本质在群众面前暴露无遗。无产阶级中的积极分子现在十分仇视社会民主党。

但是，巴尔干社会民主党对群众没有影响这一事实，决不表明它对革命运动已不构成危险。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在国家

职员及小资产阶级中社会法西斯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它所扮演的角色依然会造成巨大的危险，因此必须同社会民主党作毫不懈怠的斗争。

托洛茨基主义在巴尔干共产党内和无产阶级当中没有找到拥护者。托洛茨基在巴尔干的辩护士是社会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最恶毒的叛徒。

按照保加利亚代表团的看法，巴尔干各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如下：

无产阶级要从组织上巩固自己并加强内部的布尔什维克团结；

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成为群众的先锋队和领袖；

培养出足够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联盟，以及无产阶级、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联盟，以便同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作斗争，同极端的白色恐怖制度作斗争，同帝国主义的压力以及帝国主义的战争危险和对苏联发动军事进攻的危险作斗争，并把工农群众的直接利益同这一斗争结合起来，使斗争在“建立工农政权”和“建立巴尔干工农共和国联盟”的口号下进行。

巴尔干共产党的相当一部分任务属于整个巴尔干共同性的任务，因此只有通过巴尔干的所有共产党经常不断的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些任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和保卫苏联的斗争，反对巴尔干的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为建立巴尔干工农共和国联盟的斗争，不仅应当在个别国家中，而且应当在整个巴尔干范围加以组织和领导。

巴尔干各被压迫民族反对民族压迫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

样是巴尔干的共同任务。在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巴尔干联盟，将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这是一切巴尔干共产党的共同事业。只有在巴尔干各国无产阶级和它的工会组织紧密合作和协调行动的情况下，巴尔干地区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最后，在国外组织反对巴尔干白色恐怖和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也是巴尔干各国共产党的共同事业。

巴尔干国家之间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都与其他巴尔干邻国的局势和这些国家革命运动的状况和力量直接有关。

鉴于这一切，以及巴尔干危机的日益尖锐和战争危险的日益逼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巩固和发展早在1910年即已组成的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后称巴尔干社会主义联盟）。

必须加强巴尔干共产党这一联盟的威力，以便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协调各党的努力和行动。在土地和农民问题、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巴尔干的共同问题上实行统一的路线，组织整个巴尔干范围内的运动。

巴尔干共产党联盟并不是介于共产国际和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保持直接联系的巴尔干各个共产党之间的中间组织。它的使命只是帮助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协调地、顺利地地完成各党所担负的巴尔干共同性革命任务。对巴尔干的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这个联盟是最迫切的政治需要，所以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必须作出一切努力巩固和活跃这个联盟，并要求共产国际给予全力协助。在这方面任何动摇不定、任何拖延都是非常有害的。与此同时，必须在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和土耳其、意大利、匈牙利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国

共产党之间，特别是在共同的反帝和反战运动方面建立起最紧密的接触。

小国阿尔巴尼亚是迄今为止唯一尚未建立共产党的巴尔干国家。但是，建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所必需的某些条件也正在准备之中。

近期的任务就是要克服目前的困难，为阿尔巴尼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奠定基础，并让这个新的年轻的支部加入共产国际和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这个新支部虽然很小，但由于阿尔巴尼亚的内部情况和它在巴尔干和整个地中海地区所处的特殊位置，它将起重要的作用。

保加利亚代表团坚信，巴尔干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常帮助下，必将沿着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在巴尔干未来反对帝国主义、保卫苏联，以及争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重大事件和艰苦斗争中完成自己的革命责任。

温斯顿（美国）：

很遗憾，世界代表大会的会议变成了英美书记处的会议，整个会议都在极其详尽地审议美国共产党内部的分歧。在世界代表大会上根本不可能深入地讨论每个问题的细节。让英美书记处去完成这一任务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某些美国同志在大会上提出的指责是如此严重，以致我们虽然肩负着分析美国斗争前景和我们党任务的责任，却不得不对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反对派同志在这里提出的指责作一番分析。

我要说，在会上发言的反对派，在他们指控中央委员会时是矫揉造作和无原则的。以坎农为例，他在反对右倾危险的时候，是如此的能言善辩，而且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如果现在时兴反

“左”的话，他这番娓娓动听的发言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转向反“左”。他在发言时声称，党中央妨碍了党的发展。毕特尔曼同志一再说，党中央妨碍了党的发展。可是，仅仅在几天以前，同毕特尔曼和坎农同志有往来的福斯特同志就曾在红色工会国际说过，共产党领导了美国所有大的罢工斗争并且掌握着美国左翼运动的领导权。请问：该相信什么呢，是相信福斯特同志的说法呢？还是相信坎农同志如此轻松地作出的声明呢？布哈林同志提出的提纲指出，美国共产党以坚定的态度指导着激烈的阶级战斗。我们能否说，如此英勇地领导了15个月之久的矿工罢工斗争和5万缝纫工人18个月的罢工斗争并且正在赢得对纺织工人罢工的领导权的党，患了阻碍党发展的毛病呢？

坎农同志一心希望揭示我们党内的右倾，于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东西统统揉到一块。我们党是否有右的危险呢？是否有右的倾向呢？否定右倾的存在是荒诞的。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反对派的同志们和党中央多数派的同志一样，对这些错误是负有责任的，除此之外，他们还犯过某些受到党中央批驳过的错误。

同志们，不仅如此，党中央在二月全会和五月全会上就揭露了我们党内的右倾错误，列举并批判了这些错误，而没有去查问这些错误是原先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所犯，还是反对派的同志所犯。

坎农同志对所谓潘肯事件讲了许多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纽约州委会所犯的错误，这个委员会中的所有同志一概都负有责任。派同志去参加社会党的事，毕特尔曼和福斯特同志是投票赞成的，而且他们还亲自提出建议要派党员参加社会党，最后通

过决议，从获得情报的目的出发，只派一定数量的同志——经过挑选的一小批同志参加社会党。

然而正是这些同志指责中央对社会党的政策是错误的。党中央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同时也犯了某些错误。那么，这些同志是否就与党所犯的这些错误毫无关系呢？以中央委员会致社会党中央的公开信问题为例。要写这封信的建议是毕特尔曼同志提出来的，而坎农和福斯特以及在这里抱成一团的中央委员会少数派的其他同志都是投票赞成的，当社会党领导变成彻头彻尾的反动派的时候，当需要同社会党的工人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其领导人的时候，我们却向其中央委员会写信，搞上层统一战线，这是错误的。但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同志不仅是提出这项措施的倡导者，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给社会党写这种信的问题。

坎农同志提到了在工人党问题上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关于这一点我下面再谈。但是，高举反对党内右倾危险旗帜的坎农等同志，只字不提毕特尔曼同志的建议，这是怎么回事呢？毕特尔曼曾建议除了工会以外，我们应该把以个人身分去参加的俱乐部作为工人党的基础。要知道，这个政策是被我们开除出党的右翼领袖洛尔提出的。这个遭到政治局坚决驳斥的政策才是有关工人问题上货真价实的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坚持实行这一政策必将导致共产党内的取消主义。

为什么坎农同志对毕特尔曼提出的另一个“小小的”建议也只字不提呢？毕特尔曼不久前曾向党建议主动停止采煤工的罢工，他把这个建议作为向矿工联合会的反动分子路易斯奉献的一份礼物。我们共产党人对停止这次罢工是不负任何责任的。现在报道

说，罢工已经停止，已被路易斯出卖，这就为我们党揭露矿工联合会的反动官僚们提供了条件。而在这里和琼斯顿同志一起装模作样来反对美国共产党内右翼的毕特尔曼同志就曾经建议我们停止罢工，以此来使我们对福斯特同志所说的那种在客观上起着工贼作用的行为负责。

如果我们真想同我们党内的倾向作斗争，如果我们想端正我们的策略路线并改正无论何处所犯的错误，那我们应该不仅提到右的错误，也应该提到我们党内“左”的错误。无论是坎农同志，还是毕特尔曼同志，都没提到毕特尔曼要我们在美国目前的情况下，在日常宣传工作中号召进行政治性抗议罢工的建议。其实，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这个建议当然是不适宜的，如果把把这个建议付诸实施，那只能促使我们党脱离群众。对毕特尔曼同志所犯的另一个极左性质的错误也是讳莫如深，这个错误是他在我们代表团动身前来莫斯科之前一星期的时候犯的。他建议工会宣传联盟、美国黑人工人代表大会和美国农场主宣传联盟（在选举中）一律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候选人，并且采纳共产党的（竞选）纲领，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中央委员会拒绝这项建议，是否就可以指责它右倾呢？坎农和福斯特同志反对毕特尔曼同志的这个极左建议，但在递交给英美秘书处的提纲里却只字未提这项建议和建设的错误之处。

根据邓恩同志关于黑人工作问题的发言，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同志中的某些人在对中央委员会提出指责时是多么地轻率。必须强调指出，我们绝没有完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我们对组织美国黑人工人的问题——这是美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任务——重视不够，为此应当受到严厉的指责。但是，邓恩同志把产生这一

缺点和全党都负有不够重视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身上；他还指责中央委员会犯了它根本没有犯过的错误；例如，他认为中央委员会应对红色工会国际机关报《黑人工人报》上出现的一篇文章负责，说在共产党的报纸上根本不该出现这类小资产阶级的文章，由此可见，他对中央委员会的指责简直是滑稽可笑。因为谁是这个机关刊物的编辑呢？是邓恩和福特，他们转载这篇文章时未加任何按语，未作任何评论。《黑人工人报》编辑们声称：“黑人工人应向共产党芝加哥组织出席代表大会的候选人提出坚决的要求”，是否中央委员会对编辑们提出的这项政策也要负责任呢？工人向百万富翁——共和党的候选人提出要求，这是否是“左”的政策呢？也许邓恩会说，这是一位与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有联系的某某人授意他的，所以他才要中央委员会负责？不管怎样称呼这种做法，把它叫作轻率还是滑稽可笑，或者别的什么，反正这个例子表明，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这次会上表现出来的反对立场不管怎么说都是故意做出来的。

还有一点足以证明，对党中央的所有这些攻击是多么地缺乏原则，那就是在中央五月全会上，这些同志并没有提出任何一条建议指出中央委员会是右的或者执行着右的路线。他们也没有对今年五月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我党政治任务的决议提出任何一项反建议。5月，在投票决定接受共产国际4月13日的来信时，他们也未置一词，根据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证实，琼斯顿和邓恩对信中的每句话都负有责任。信中谈到，“中央委员会的二月会议本身就是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党在政治团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当时这些同志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他们当时不指出党内的右倾危险呢？

在目前我们党还处于年轻阶段而且思想水平较低的时期，右倾和右的错误是它的最大的危险。如果说中央委员会不想进行斗争和主动地去纠正这些错误，或者说在共产国际主动提出纠正这些错误时，中央委员会克服得还不够快，那么指责它犯有“右倾”也许还有某种根据。

但是，中央委员会正在同右倾错误作斗争，而且我们看到反对派中的这些同志本身就同右倾错误有关，这就充分地证明，他们在这里的反对立场在许多方面都是故作姿态和无原则的。

由于组成反对派的同志们在这次会上以讽刺的态度来谈论中央委员会对社会党和工人党的政策，因此有必要把党的真正政策阐述清楚。这项政策是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通过、并经政治局在今年4月批准的，而且在所通过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了：

(1)社会党已彻底地向右转了；(2)它已经放弃了工会工作中的独立自主路线；(3)它成了官僚们手中普通的附属品；(4)它已经同警察沆瀣一气反对工人；(5)它不仅放弃了阶级斗争，甚至放弃了阶级术语；它的最新态度是从它宣布“我们是美国人……”开始的；(6)它不再有党员了，并且改变了自己的组织形式，因此，它现在依靠的不是一个个党员，而是依靠选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宣布必须加紧开展反对社会党的斗争，提出不是同社会党的头头们建立统一战线，而是同社会党的工人建立统一战线，反对社会党的官僚政治和它的领袖。因此，作为一条总的原则，投社会党候选人的票是不允许的。

对工人党的政策；是我们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是我们感到为难，担心把世界代表大会变成英美书记处的会议的话，这个问题本来是应该在这里详细地加以讨论的。不过，在中央委员会

的五月全会上，我们党已经改变了这项政策。我们完全欢迎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建议作出的变动，并且认为，这些变动是和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政策相吻合的。我们认为：

(1)现在工会主要由一些工人贵族分子组成；(2)工会成员已显著减少；(3)目前不存在组织工人党的群众基础；(4)从工会官僚和社会党领袖们所采取的立场来看，工人党只有通过反对工会官僚和反对社会党头头及官僚的斗争才能建立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的政策是明确宣布：(1)当前，组织工人党的口号只是宣传口号；(2)我们只有通过同工会官僚和社会党头头们的斗争才能建立起工人党；(3)建立工人党的全部问题都与我们能否将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问题有关，而且要看我们在建立新的工会方面取得的成绩如何；(4)我们应当在工厂和矿井建立委员会，把这些委员会作为组织工人党的基础之一。

我还要就毕特尔曼同志对经济形式所作的分析讲几句话。我觉得毕特尔曼同志并未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他口头上宣称，总的说来他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提纲，然而，中央委员会少数派提出的提纲唱的却是相反的调子。不过，在没有谈这一点之前，请允许我就毕特尔曼同志指责中央委员会渲染美国帝国主义实力强大一事发表一点意见。在这方面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处境是良好的：布哈林同志在其讲话中说，美国帝国主义在前进，也许某些同志会说这是悲观的估计。斯大林同志在列宁格勒发表讲话时说，美国帝国主义之星正在上升。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在宣扬美国帝国主义的强大还是为了制订摧毁美国帝国主义政权的路线而作出的分析呢？毕特尔曼同志没有读到递交给英美书记处的提纲对经济所作的分析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来源

于对美国帝国主义实力逐渐衰退的正确分析。而布哈林同志关于美国的提纲的中心意思是什么呢？其中心意思在下面的几句话：“必须承认，经济重心转向北美合众国和在此基础上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性的增长，是现代整个资本主义发展中最重要因素。”布哈林同志在其提纲中断言，美国帝国主义富于侵略性，是因为美国成了世界的经济中心，毕特尔曼同志的提纲却说，“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来源于对美国帝国主义后备力量逐渐衰退的正确分析”。

最后谈几句关于把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问题。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正确地指出，必须在这方面开展更有力的工作。这是全党的任务，也是党的工作中的一个缺点。正如中央委员会本身就这一问题所叙述的那样，党没有很快地作到面向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面向没有参加组织的群众。但是，坎农同志说，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红色工会国际的决议，那么，说得客气些，我得声明，坎农同志讲的不是实话。中央委员会说过，我们在如何组织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方面做得很不够。但是，与此同时，必须肯定（不是为在这方面的缺点辩解），在矿工开展斗争的过程中党曾组织过新的工会，在缝纫工人罢工期间党同样组织过新的工会，在纺织工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党也这样作过。对于这些努力有必要作为事实加以指出。

有些同志声称他们是赞成把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他们的全部政策都是立足于没有参加组织的群众，而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是以美国劳工联合会为基础的。但是，他们拿不出任何一份党的文件来证实这种说法。

还想就党内总的情况讲几句。中央委员会在党内政策中所执

行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团结党内积极力量的工作在前进。毕特曼同志和福斯特同志彼此之间在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达到了毕特曼同志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分歧那样的程度。只要看一看我们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就可以确信，党在政治方面的团结正在向前发展，只有在这里提出的种种指责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少数派同志的反对态度才会妨碍这一进程。这些同志本身在2月和5月也承认过，我们在改善党内状况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是排除党内残存的派别思想。

去年有人正确地批评了中央委员会在党内政策方面实行过分狭隘的路线，但是，从那时起中央委员会摒弃了派别路线，在实现党的团结和统一方面迈出了步子，虽然有时还有某些摇摆和不够坚决的地方，中央委员会的任务是继续贯彻这条路线，同所有的和一切想复活党内宗派斗争的人进行斗争，同狭隘的宗派思想作斗争，而不管这种思想来自何处——哪怕是来自中央委员会最亲密的支持者，或者来自过去的反对派和现在的反对派。同去年相比，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当时有人批评中央委员会在党内实行过分狭隘的路线，而现在中央委员会正在为反对这种政策而斗争。它的基本路线已经摆脱了那种不正确的立场。可是反对派的同志——坎农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当时高举为统一而斗争旗帜，现在都完全放弃了这个纲领。现在这些同志坚持不断进行党内派别斗争的立场，奉行始终一贯从事派别活动的路线。他们是不会成功的。这种做法与党的利益背道而驰。为了完成把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任务，为了利用现在的有利条件在美国开展共产党的活动，为了消除我们党在黑人工作方面的缺点，党必须团结一致。中央委员会已经开始着手这一工作，不管反对派

如何进行派别活动，也不管反动派如何进行派性挑拨，中央委员会将在共产国际路线的基础上继续奉行使党摆脱有害的派别思想的路线。

帕迪（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总的来说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但是，觉得还有某些东西应该包括进去。根据布哈林同志的提纲，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运动同时得到发展。意味深长的是，在目前形势下，第二国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在争夺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队伍的影响。在8月即将举行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殖民地的问题将占有显著的地位。

按照我们的看法，我们应当继续批判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的殖民地政策。第二国际将会像它在欧洲所作的那样竭尽全力来混淆被压迫人民的任务和削弱处于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殖民地无产阶级的组织。为了阻挠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运动的发展，第二国际将会给殖民地国家的反动分子以鼓励。不言而喻，社会民主党人绝不会忘记向国际资产阶级指出日益增长的民族革命的危险，以便阻挠我们利用这个运动来促进广大群众的革命化，在了解到中国事变情况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变得比过去更加反动。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了。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必须特别注意，同时我们认为，在提纲中应当强调指出，必须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和加强共产党，并且推动欧洲各国共产党本着国际团结的精神，千方百计地支持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必须促使欧洲各国共产党不断地揭露社会民主党企图在民族主义者队伍中制造混乱的叛变政策。

几个星期前，应邀出席伦敦的工党代表大会的印度工会的改良主义头头们，为了表示对麦克唐纳的帝国主义立场的抗议，拒绝参加这个会议。但是，这还并不意味着他们倾向于同我们合作。因此，我们应当巩固我们在殖民地国家的党，以便对抗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

其次，我们认为，在布哈林同志的提纲里，应专门写进一段关于保护关税政策对加剧帝国主义矛盾的影响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看法，正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竞争日趋尖锐的今天，保护关税政策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第三章《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阶级力量的分布》一章里，我们读到如下的一段话：

“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的政策目前是由两个最主要的任务来决定的：第一，进一步提高‘竞争能力’，也就是进一步推动资本主义的合理化等等。”

我们建议在这段文字中补充下面一句话：“……并且实行和强化保护关税政策。”

其次我们认为，在提纲里应该提到我们的荷兰共产党，提醒荷兰的同志们必须加紧他们的活动，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思想意识方面是明显受荷兰共产党的影响的。

我们希望代表大会能考虑我们的意见。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扼要地向代表大会通报印度尼西亚最近发生的事件并对印度尼西亚的起义作出历史性的总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很年轻，1920年它才成立，而且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得到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任何领导，因此错误是难免的。在这个时期，由于联系困难和缺乏怎样领导群众运动的指示，我们

只能在不指望外援的情况下开展活动。

尽管荷兰当局实行残酷的反动统治和野蛮的白色恐怖，我们党仍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在群众中享有巨大影响。

在1920—1925年的合法存在时期，我们党成功地清除了民族运动队伍中的改良主义领袖并在工会和农民组织中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的影响不仅存在于无产阶级之中，而且还扩及农民、军队和某些知识界人士。

政府预感到这种事态的发展，于是给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设置了一系列严重障碍。数以百计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被捕和流放。政府下令封闭运动的总部并逮捕了中央委员会的成员。1925年党在爪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决定向共产国际通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危急情况。中央委员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详细地介绍了我们党的状况。我们担心的是，同志们没有相信我们，对这些通报的重大意义估计不足，缺乏有关印度尼西亚所处严重情况的全面材料。结果共产国际忽视了我们党，对我们党持一种错误的观点，对我们党的实际力量估计不足。最后，起义是在我们党自作主张的情况下爆发的。党遭到破坏，这一情况犹如严重的包袱压到了我们肩上。

我们认为，在持续两个月的起义过程中，共产国际未作出任何反应，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责备我们的荷兰党，因为同志们为了支持起义作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共产国际当时应该向所有支部，特别是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支部布置任务，要它们支持印度尼西亚的起义，举行保卫印度尼西亚起义的示威游行并在报纸上进行宣传鼓动，等等。这一切都没有做。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希望今后不再重犯类

似的错误。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希望，在目前大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被捕的情况下，欧洲应当提出立即释放被捕者的要求，要求毫不迟疑地释放那些被判处长期监禁的同志们。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宣传能使这些同志们获释。

会议休会。

第十次会议

(1928年7月26日)

主席：加香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维克斯（美国）：

昨天有人在这里说，美国共产党中央表现出一种吹捧美国帝国主义的倾向。我们之所以被人指责，是因为我们赞成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对美国帝国主义所做的正确评价。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心转移到美洲，可是承认这一事实就被解释为吹捧美国帝国主义。这种恶意的责难来自对我党中央持反对立场的同志。为了拟定我们所面临的斗争的方式，必须正确评价美国帝国主义；但是不能，譬如说，像毕特尔曼同志指出某些内部矛盾已经来临时那样来论述这个问题，绝对不能这样发现新大陆。毕特尔曼同志不同意布哈林的提纲，并强调指出，他把美国帝国主义叫做新的内部矛盾。

毕特尔曼同志谈到生产力和产品总额之间的不平衡，难道在这个不平衡中有什么特别的新东西吗？当然没有。既然美国打算向全世界市场供应产品，那么生产能力自然要比实际产品总额大得多。再则，这个不平衡是怎么出现的呢？它里面是否有些新的

东西呢？当然没有。在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生产能力，这种能力战后仍在增长，一直持续到今天。当然，谁也不会去证实，美国由于在大战中处于有利的地位，除了增加生产实力之外还会干些其他什么。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恢复的同时，美国的生产力和实际产量之间出现不平衡也是很自然的。

此外，毕特尔曼同志完全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因素，即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帝国主义老板们有意识地扩大生产能力，并且在组织工业时着眼于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使其转入战争轨道。毕特尔曼同志，您是否记得 1925 年美国举行的那一次会议，即有已故的阿尔伯特·加利、亨利·福特、爱迪生和杜邦参加，由安德鲁·梅隆的侄子、共和党政府实际首脑 B. Л. 梅隆担任主席的那些在美国召开的重要会议中的一次会议。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决定，在组织工业时要考虑到使工业能在两昼夜内转入战时轨道。毕特尔曼同志，您是否想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决定带有特殊的性质，而您在美国经济的内部矛盾方面又发现了与提纲相抵触的新内容。我认为，这种立场是令人可笑的。

现在谈谈发展极限问题。究竟是否有某处提到过美国已达到了发展的极限呢？绝对没有。没有任何地方有这样的提法。相反，提纲中正确地指出，美国还在向上发展。我们讲达到自己发展顶点的国家，指的是这个国家已经十分接近即将开始转向低落的那一个点，因为经济不会是一成不变的。美国不可能达到它将长时间一直在那里静止不动的顶峰。讲发展顶点的同志们自然会认为，明天就要开始转向低落，对此我们不能表示同意。

至于说到毕特尔曼同志为说明其另一个“发现”而发表的关于国民收入和工资之间不平衡的声明和所谓统计资料，那么问题

在哪里呢？毕特尔曼同志把工资总额同整个国民收入相比较，但是他忘记了，即使与生产的增长相比较，工资是相对地下降了，但美国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实际工资，正如瓦尔加同志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仍然是在增加。这才是美国的情况，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毕特尔曼同志，不能把整个工人阶级实际工资下降这一点看作为资本主义的矛盾之一。

其次，为什么毕特尔曼同志如此突出地强调国内局势呢？我们可以说，美国帝国主义将出现或者已经出现了某些将导致灾难的倾向，但是美国国民经济中，美国政治中的这种灾难首先将表现在美国国外，因为美国帝国主义靠牺牲别国，尤其是英国和日本的利益而在全世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不应当忘记对外政策。我们现在也和世界大战期间一样生活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如果反对派的同志们认真地分析一下布哈林同志的提纲，而不是轻率地指出想象出来的缺点，他们就会承认美国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同它的殖民领地的范围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并且会认为，现在美国帝国主义为了清除这种不平衡，正在肆无忌惮地把自己贪婪的魔爪伸向各地，尤其是伸向中美、北美和中国。这个重要事实就能说明美国帝国主义作为导致新的世界大战的最有害因素之一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将在讨论同帝国主义战争作斗争的措施时，即在转入下一项大会议程时再更详细地分析这个问题。

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批评我们在反对干涉尼加拉瓜的运动中存在的缺点。这一批评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把保卫尼加拉瓜的运动变成为我们党的中心运动，而当时是应该这样做的。不过我也想强调一点，那就是我们保卫尼加拉瓜的运动之所以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反帝同盟主席，尽管他并无

多大权威，却得到派性的庇护。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明确予以指出。在党中央力图尽一切可能避免爆发派别斗争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常常可能发生的。我认为即使有人会指责我们出自派性而排挤能力差的同志，中央在那种情况下没有采取断然措施也是一种疏忽大意的表现。

目前，反帝工作比一切都重要。由于墨西哥局势的变化，出现了再次发生武装干涉的危险。美国正在千方百计巩固自己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势力。这已成为美国的对外纲领。它力图在有可能同自己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对手发生战争的地方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样，也不能把美国在拉丁美洲的这一运动同美国政府在国内反对无产阶级，反对工人运动的种种运动分割开来。我们应当认识到美国政府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和它同工人阶级的斗争之间的联系，并且要让工人相信，美国帝国主义对外同殖民地对内同无产阶级作斗争采取的是同一条政治路线。

现在谈谈我们党内的状况。同志们，出现这种局势，无疑是十分可悲的。但是既然它已经存在，我就对此讲几句话。在英美书记处讨论这个问题时，必然会明确地指出这是工人党内的长期的派别斗争。5年来，我们党内某些所谓的领导同志，或大概是一些领导同志，构成了一个因各种政治问题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派别。同志们，你们能说，这个集团在攻击中央的时候是出自某种原则立场吗？我认为，在政局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出现的这种长期的派别活动，说明现在反对中央的派别是违背原则的。

昨天，我们听取了坎农同志的令人惊奇的发言，他竟把我们的一名中央委员看做是世界闻名的正确政治路线的体现者。在坎农同志这次发言之前，我曾和他交谈过。他给我读了一个文件中

的一些话，这些话他后来在这里发言中说了。这个文件很值得注意：它能说明坎农是根据何种材料来源批评“世界闻名的正确政治路线的体现者”的。因此我要说，坎农同志应当对这个材料来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坎农从中获得某种看法的材料来源是长达100页的、批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一份材料，而这份材料出自原先是同志的托洛茨基之手。

同志们，如果你们想了解这一材料来源的全部情况，这是你们的权利。但我想说的是，不要剽窃，而要指明你引用的是什么材料，尤其是当这种材料来源是臭名昭著的材料时。

我还想谈一点，即我们党内的反对派竟罪恶地企图把我们面临的黑人问题当作派性游戏。我再重复一遍，不是当成别的什么，而是当作派性游戏。少数派同志们正在谈什么白人沙文主义。我想提醒他们这样一个事实：在底特律为罢工的矿工举行过一次晚会。而这些同志们的主要支持者、他们最激进的信徒、中央委员会最不共戴天的敌人、现任党的领导集体最顽固的对手，即盖茨同志，却是应对拒绝黑人参加这次晚会负责的人。底特律区委会对盖茨同志采取果断措施，撤销了他的职务，以此纠正了这个组织的路线，并指出，即使花上几百美元，哪怕舞跳不成，会开不成，甚至引起冲突，也要按共产党的原则尽力让黑人参加晚会。

这些同志之所以大提白人对黑人实行沙文主义之类的问题，并不是真心希望加以解决，而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派性目的。我这儿有盖茨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企图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和辩护。这封信是一位自称共产党员的人所写的最为卑鄙的文件之一。

我们应当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彻底排除派性在我们党内再次抬头的危险。我们面临着巨大的任务，而且随着局势的日益尖锐，

我们应当准备好再次转入地下。因此，共产国际应当帮助我们党不把任何派别斗争带进这个时期。

海德尔（巴勒斯坦）：

首先就稳定问题讲几句话。为了判断资本主义的状况，重要的不是机械地总结某一国的或者某一工业部门的贸易和生产平衡情况，而是要弄清这个国家出现稳定现象的前提和基础。

我认为，布哈林同志在谈到资本主义国有化的倾向时不去详细分析国有化的形式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种倾向的意义不在于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而主要在于所谓国家机关同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相互溶合。多少年来人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如此卖力地划分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界限现在正逐渐模糊起来。外交官和交易所经纪人已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个过程的形式，而是它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些后果是：

1.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机构不断发展和扩大。合理化导致工人人数减少。它固然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然而它也无限地扩大了寄生分子的数量，而资本家阶级不得不与之分享自己的剩余价值。国家官吏也不再满足于仅仅获得荣耀和权力，他们要求分得厂主和商人赢利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大的一部分。

2. 每个企业资本家节约开支是以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马克思称之为非生产费用的那部分开支的大幅度增长为代价的。国家预算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和海关等杂项开支不断增大，而这些都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3. 这里最重要的是，资本家阶级失去了它被如此夸耀的创业自由，他们榨取利润的可能性越来越受到限制。原先那种资本家阶级正日渐蜕化，正在下降到充当托拉斯资本大独裁者的普通掌柜

或代理人的地位。资本主义的经济机构滋生出许多国家官吏，而至今一直统治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祸患。

由此可见，稳定首先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法西斯化”。在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已经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民主，试图或者已经把法西斯主义暂时作为摆脱革命的出路。英国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指望蒙德来挽救其命运，即求救于经济上的法西斯主义。经济上的蒙德，就是政治上的墨索里尼。

我还想谈一点，那就是殖民地的作用问题。我认为，不应当像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所做的那样，把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区分为拥有殖民地的国家和没有殖民地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不需要殖民地市场，不需要殖民地的原料。就连表面上并没有殖民地的德国，在殖民地做起生意来，以及在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同它们竞争起来，并不比法国差多少。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许多较大的殖民地的关税决算都说明这一点。但是，在谈论稳定问题时，我认为，我们应当指出欧洲大笔资本竞相投资的进度那种异乎寻常的热情。且以修筑铁路和开辟航空线为例。最近一段时间里，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铁路网增加了两倍或两倍以上，用于建设灌溉渠道、码头等设施的开支也很惊人。正是这一切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稳定。还必须指出，殖民地农业的工业化过程进行得特别顺利，特别迅速。这种稳定的结果将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发生更加深刻的危机。

再就我们的缺点说几句。我们当然欢迎布哈林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提到东方部。埃及正在发生重大事件，埃及议会被解散，议会同盟瓦解了，希望在叙利亚建立君主制度的法国人正在策划阴

谋，策划利用伊朋-沙特的阴谋。扶持伊朋—沙特之子登上王位的做法不仅意味着企图破坏叙利亚的革命运动，而且表明它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一种进攻步骤。正当伊朋—沙特同英国人进行谈判，而且眼看谈判即将以有利于英国人的方式宣告结束之时，法国所有报纸一致提出由伊朋—沙特之子继承叙利亚王位。这一着效果十分惊人。伊朋—沙特中断了谈判。叙利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对英国不甚友好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件事的意义超出了局部地区的范围。我认为，提纲中本应当给埃及和阿拉伯发生的事件留出一定的位置，遗憾的是，布哈林的报告不但一次没有提到埃及，也一次没有提到阿拉伯东方各国，也没有提到法国和意大利的阴谋。我认为，第六次代表大会应当对提纲作出相应的补充。

不过我关心的还不是这一缺陷本身，而是怎么会这样的事：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人竟会在其包罗万象的国际形势评述中忽略了居住着千百万阿拉伯人，而且是欧洲帝国主义种种矛盾交织的地区。在这方面不仅布哈林同志有责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至今对近东也不曾给予足够的注意。

既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中都没有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的位置，那么布哈林的报告中怎么会提到这些国家呢？

所有来自殖民地（印度尼西亚、波斯、南非）的同志都众口一词地说共产国际对殖民地重视不够。布哈林同志谈到我们这些支部对中国事件的态度。同志们，那么请允许我就所有同志，其中自然包括布哈林同志，对那些虽然较小但同样非常重要的国家，如埃及、阿拉伯和阿拉伯东方各国问题的态度讲几句话。埃及近

10年的历史是一部由英国海盗、法国高利贷者，乃至欧洲各种投机商对待千百万菲拉赫居民大肆掠夺和任意施虐的历史。试问，当英国的爵士、将军、总督们在埃及和苏丹摧毁菲拉赫人的村庄，绞死数十名爱国人士，在监狱中折磨革命工人，捣毁工会，取缔政党的时候，我们兄弟的英国共产党又在哪里呢？当法国将军残酷迫害当地居民，血腥镇压叙利亚起义的时候，共产国际又在哪里？我们兄弟的法国党又做了些什么呢？叙利亚革命者同数量庞大的法国军队英勇搏斗了两年，但这期间欧洲的无产阶级又在何处，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主义运动又干了些什么呢？同志们，问题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各个支部和国际执委会本身对待阿拉伯东方的态度，采取何种态度，这不应当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取决于人口和面积，而只应以那个地区出现问题的尖锐程度和迫切程度为依据。

譬如，大家在这里多次谈到南斯拉夫、波兰等国的纠纷，但是却没有人提一句埃及党3年来的艰难处境，以及巴勒斯坦党和这一地区其他小党。共产国际东方部没有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危机。

我再谈一个问题。我指的是反帝同盟的问题。建立反帝同盟的思想本身是极好的，但是这个同盟未及出世就夭折了。欧洲各支部在把同盟变为真正群众性的组织，变为反对殖民压迫的群众运动方面又做了些什么呢？还有，为了同近东真正的广大劳动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同那些追求刺激和捞取外快的个别外交家、冒险家、民族主义分子交往，同盟本身又做了些什么呢？有的同志说，同盟毫无用处。不对，同志们，建立同盟是个好主意，但是同盟的做法很不可取。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应当结束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状态。还应当看到，恰好在最近几年内改良主义分子正在起劲地对整个东方，其中也包括对上述地区施加影响。他们在巴勒斯坦有一个好几千人的严密组织，拥有工会组织和政治团体，这些都是阿姆斯特丹国际和第二国际在埃及和叙利亚等国进一步渗透和发展的基础。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组织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组织的一大批著名首领（肯沃西、布劳恩、王德威尔得等人）正在这些国家游说，竭力想把阿拉伯无产阶级纳入他们的罗网。

我们应当在这些群众中进行坚持不懈的组织工作，以便同第二国际冒险主义分子的宣传相抗衡。然而，我们这些党却完全被置于听天由命、无人过问的境地。我们竭尽全力工作，但是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得不到共产国际、法国和其他国家党的足够支持。再说一遍，无论如何必须根本改变我们共产国际各支部对阿拉伯东方国家的态度。要多关心东方国家，因为那里有千百万革命战士的后备军，因为那里经常出现人民群众不可遏制的骚乱和愤怒的浪潮。

加藤（日本）：

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作斗争、维护中国革命和保卫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当前的三大任务。日本党代表团不仅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观点，而且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所起的极大作用，日本共产党完全意识到自己在执行这些任务方面所承担的特殊责任。

年轻的日本帝国主义从它一开始出现就带有军国主义的性质。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评论日本帝国主义时说，在侵略中国的军事政策中，军事垄断代替了金

融资本的垄断。在日本，国家资本主义体系非常发达，以致国家资本占到 35 亿日元，即相当于私人资本（70 亿日元）的一半。自去年 4 月发生财政危机以来，大私人资本的集中进一步加强，大资本同国家政权的直接结盟日益巩固。这种结盟采取了国家军事资本主义的形式，因而在政治上只能导致战争。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和地主手中的国家政权日益反动，议会也越来越成为欺骗和压迫人民的机关。工人阶级追求的目标是废除帝制，而日本天皇起着充当帝国主义手中武器的新作用。此外，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原清朝皇帝溥仪扶上满洲的王位，以取代已被杀害的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

谈谈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今年 3 月，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袭击日本共产党，把 1 000 名工人农民积极分子投入监狱，向中国派出 55 000 名士兵和 55 艘军舰，把满洲和山东省纳入自己的军事体制，实际上把它们变成了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打算以此扼杀中国革命，从而迈出了挑起世界大战的第一步。从 1928 年春季起，为了摧毁中国革命和进攻苏联，日本帝国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开始相互接近。日美对立加剧。日本撕下了“同苏联友好”的假面具。

日本帝国主义确实是亚洲的反动堡垒。日本共产党的重大的国际主义义务就是争取不在中国留下一兵一卒，打消日本资产阶级干涉苏联的一切企图，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反对日本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目前，工人农民的抗议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自发地展开。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强大的、能够联合广大群众进行斗争的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在它存在的几年里犯过种种错误。尽管党本身处

于不合法地位，但仍然受到种种影响：合法主义用资产阶级法制限制我们的活动，取消主义力主取消党的独立存在并试图使党溶化在左派群众组织之中，而极左的宗派主义又使党与群众隔离并引起党内的派别斗争。所有这些都阻碍着我们党的发展。共产国际在1927年的七月提纲中详细指出了我们党的错误和失算，建议我们坚决遵循列宁主义的路线对党进行改组。自1927年11月起，党在按产业建立支部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组。党开始成为无产阶级的党，吸收工人参加自己的队伍（目前工人已占我党全部党员的80%），并开除了几个无所事事的知识分子。党清除了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合法主义、取消主义、“左”的宗派主义等倾向。不服从党的革命纪律的派别被开除出党，党的统一已经形成。共产党已经在群众面前活动，开始宣传自己的革命政治路线，并在左派群众组织之外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存在。党立即得到了群众的热情支持，成了发动革命群众的动员中心，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因素。我们愿意向大家介绍我们的经验，向你们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提纲是多么正确，尤其是在保持政党的独立性方面，或者说，在克服取消主义方面是多么重要，以及为了消除派别斗争而建设一个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又是多么重要。这都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取得的，但它为我们党的未来打下了基础。

目前，我们大约有500名同志在日本政府的监狱中受折磨，当局打算判处他们长达10年的徒刑。田中将军宣称他打算彻底消灭共产党。不过，同政府的期望相反，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运动，工会联合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都在不断扩大，群众对党也给予越来越大的支持。不错，由于种种迫害，共产党遭到了沉重打击，但是它作为一个非法的政党工作得很出色。它已经不再是宗派主义

团体，而是拥有革命群众的支持。我们党应当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的政党：任何办法也无法阻挡它的成长。

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在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就不能加强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人同资产阶级一起企图侵略中国、发动世界大战和进攻苏联。日本社会民主党存在三个派别。其中一派聚集在铃木、阿部一伙周围，依靠的是右翼工人组织和社会民主党。他们同国际劳工局（阿尔贝·托马）有密切联系。在中国他们同蒋介石行动一致，怀有建立泛亚洲国际的念头。这是一些明显的君主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

另一派是中派群众组织的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领袖，同在共产党人被大批逮捕之后向左转的群众相反，他们迅速转向右倾。

第三派是从共产党中分裂出去的取消主义分子。这里指的是山川、荒烟、坂牛、猪俣等。他们责备共产党在群众中公开活动会使党的行动受群众的压力。这些人自然是靠拢社会民主党的。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不同之点是，日本的社会民主党人更加赤裸裸地充当工贼、战争挑唆者和保皇党人，并且支持对中国的干涉。

鉴于共产党面临的国际主义任务，必须再次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土地革命问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解放运动的主要课题。在日本，农民问题虽说含义有所不同，但同样起着巨大的作用。入侵山东之后，日本资产阶级在农村卖力地开展沙文主义宣传，企图让农民产生一种幻想，似乎侵略中国就可以解决日本的土地问题。通过群众革命运动解决土地问题才是我们的目的。在日本农村应当大力宣传无偿地没收大地产。我们认识到，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工作是共产党人的一项伟大任务，它与农村工作是

有联系的。对于拥有强大资产阶级军队的日本来说更是如此。

再就我们的朝鲜兄弟党讲几句话。朝鲜工农的起义对中国革命和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具有巨大意义，但是朝鲜同志之间长期的派别斗争却阻碍着统一的朝鲜共产党的建立。

因此，我们建议共产国际采取具体措施，帮助朝鲜建立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

哥尔斯基（捷克斯洛伐克）：

我代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发言，我想在讨论中阐述两个问题：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

布哈林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了农民国际以及共产国际某些支部工作中的缺点。他特别强调了共产国际的集体责任。

激励我们加紧工作的不仅仅是我们在农民中影响减弱这一事实（在法国、德国和波兰的选举中均有表现），资本主义国家中格局的变化，以及农业资本同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结成统一联盟以对付劳动群众的现象，也迫使我们加快工作进度。如果说共产国际某些支部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的话，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如布哈林同志已经指出的那样，是由于共产国际未能成为一个善于解决农民问题的组织，而农民问题却是无产阶级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讨论夺取政权问题时忽视同农民建立联盟的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给资产阶级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制定农民（农民不可避免地要经常产生严重的动摇）今后的发展道路，那将会对我们的革命斗争造成致命的影响。

我们不应当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消极被动。他们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竟这样回答问题：农民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敌人，我们对

他们无需关心。正相反，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同渗入共产党队伍中的这类观点作斗争。这种观点是反革命的观点，它使我们丧失了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后备队转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后备队和同盟军的机会。

还必须正确判断农民内部的阶级矛盾，促进农民的分化，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农业资本家提出的“农村是个统一的家庭”的口号。这个口号掩盖农村不同阶级利益的对立，影响中农保持中立，其目的是使贫农群众，甚至农村半无产者疏远我们。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至今没有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应当坦率地说，尽管这项任务十分迫切，可是，我们至今甚至未能同农民中愿意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农业工人接触。

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是这样的：

自 1918 年政变至今，捷克农业党一直在台上执政。同所谓“社会党政府”时期一样，它是真正主宰一切的。这个党在以“保护和捍卫私有制”为纲领的指导原则的所谓“绿色国际”中也颇有影响。除了这个由地主领导、依靠中、小农民甚至农民中的半无产者阶层的庞大的捷克农业党以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农业党。斯洛伐克有一个教权主义政党，这个党不久以前还处于反对党地位，可是现在却进入政府参加了所谓资产阶级联盟。这个政府同所有这类政府一样，采取的方针是欺骗劳动群众并使他们日益贫困。

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迫使相互敌视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成了各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阵线，它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企图建立起社会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反动

统治，即不公开使用暴力的法西斯主义。

不只是无产阶级，无地和缺地的农民群众也充满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1918—1920年间，在无产阶级掀起革命骚动的同时；农民队伍中的不满情绪曾使资产阶级，尤其是大地主的存在受到威胁。土地改革延缓了这一覆灭的来临。

许诺进行土地改革有利于农业党的壮大。这个党当时的口号符合于怀有不满情绪的农民的愿望。

然而，实行农业改革的结果只是使农民感到失望。它不仅未能满足数十万要求土地而一无所获的农民的愿望，还引起虽分到土地但因而成为农业资本和财政资本盘剥对象的农民们的不满。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土地改革，形成了新的土地贵族，即在政府任职的农业党人、人民党人以及社会民主党领袖，他们首先获得了大地产中剩余的所谓割地作为自己的份地。与他们同时得到土地的是“政治上可靠的”分子和士兵，他们则是作为殖民统治者靠牺牲当地居民而获得这些土地的。这主要是在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山乌克兰地区。

此外，还给原先的地主留下了相当于法定标准5倍到10倍的祖传地产，同时给予他们出卖土地的权力，使他们可以按市场投机价格出卖土地。较好的土地收归国家所有，政府把这些土地分给政府的代理人以虚构的农业合作社的名义经营。必须指出，还在土地改革未结束之前就已宣布，相当一部分大地产和主要是全部教会地产不在被没收之列。

如果考虑到农民受到难以承担的高额赋税的重压和重新的立法（林地改革法、狩猎法和土地整理法）加强了资产阶级的经济

地位，再想一想农业党上层分子靠牺牲中、小农民来建立和巩固自己地位的做法，那么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概念：农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益接近极限。

下层农民的不满情绪至今没有得到有组织的表现。大地主在同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过程中被迫放弃了他们曾经用来力求把农民吸引在自己周围的那些口号。广大农民群众开始觉悟，这是非常自然的事。他们在经济上确实主要依赖于不断迅速扩大影响的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则是因为整个国家机器，尤其是在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山鲁斯地区，都掌握在农业党的手中。

农业党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如乳品合作社、信贷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建筑合作社、酿酒合作社等。仅斯洛伐克境内就有这类合作社约1 600个。

我们对这些农业合作社没有影响。格林卡的斯洛伐克教权主义党是执政党，与斯洛伐克的捷克农业党相比它对更多的农民群众具有影响。当然，它在这方面有相当深的经济基础，而且还利用教权主义机构对农民群众施加影响。我们应当同这些政党争夺农民。

由于共产党在农业党、教权主义党、各种企业中，以及在遍布全共和国的经济组织中的党团工作薄弱，尽管农民十分不满，农业党的地位依然很牢固。不过，上面这一切，主要是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的溶合，以及农业党虽已初露端倪但暂时还未显露出来的危机，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提示，促使我们在觉醒的农民中加紧工作。土地改革已近尾声，但是它并没有给土地关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下列统计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

实行土地改革前的农户数：

土地面积	占农户总数
2 公顷以下	7.8%
2—5 公顷	14.3%
5—20 公顷	44.1%
20—100 公顷	17.8%
100 公顷以上	16%

土地改革之后：

土地面积	占农户总数
2 公顷以下	7%
2—5 公顷	16.4%
5—20 公顷	49.7%
20—100 公顷	9.3%
100 公顷以上	7.6%

在 590 万公顷的狩猎地中，土地改革仅仅触及到 7%。顺便指出，土地改革主要是在博格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进行的。在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山鲁斯只实现了计划的一小部分。博格米亚是工业区，只有 29% 的居民从事农业，而喀尔巴阡山鲁斯和斯洛伐克是共和国的农业区，前者从事农业的居民占 69%，后者占 60%，这个百分比比德国和法国大得多，后两国从事农业的居民只有 35—42%。

下面谈谈我们的工作。

提纲强调指出，共产国际对农民问题很少关心。问题不仅仅是关心不够，主要是没有做工作。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对农民问题作过决议，但这些决议只是停留在纸上，事实上直到捷共

第四次代表大会才认真着手解决农民问题。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在同捷克共产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作斗争以后，在我们党的二大之后，我们开始了这项工作。我们准备在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山鲁斯组织农民协会，并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全境组织统一的农会。计划在那些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处于我们领导之下的农民组织和无地农民联盟中进行党团活动。还着手用捷克文、德文、斯洛伐克文出版农民刊物。在州、区委员会中建立起农民工作委员会；在斯洛伐克我们甚至已经组织了“协会”，任命了主席和书记，召开了一系列代表会议，不过我们对领导权问题和工作目的还不够明确。

所谓中立的农民报纸并不中立，而带有共产党报纸的性质。我们的代表会议（尽管有其他政党的党员参加），在农民看来是共产党倡议召开的。在博格米亚和摩拉维亚合法的农民协会中我们依靠的不是组织牢固的党团，而是偶然形成的共产党多数派和同情者。

斯洛伐克农民协会书记（政府连续四次拒不同意给协会办理章程登记手续）收回了我们所有农村支部农民共产党员的党证，而发给他们农民协会的绿色会员证。这在农民共产党员的队伍中造成极大的混乱，并最终导致他们在政治上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在喀尔巴阡山鲁斯，分管农民工作的同志把全境分为三个地区：马扎尔人地区、乌克兰人地区和乌克兰—马扎尔人地区。每个地区的首脑机关是村苏维埃，每个苏维埃有各种委员会（如组织、宣传、市政、工会、报刊等等），数量多到18个。这就是说，建立了一个党中之党。一年之前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纠正了这种不能容许的现象。

有人会指责我是老脑筋，但我举这些例子为的是揭露我们工作中的重大缺点。

不过在我们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已经采取措施改善现状。中央建立了农民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按照一定的计划办事。各个州委会也建立了相应的委员会，颁发了各种指令，向党的工作者下达了指示，而且已经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的计划。但是这项工作至今仍未摆脱无所作为的状态。

1927年进行改组之后，党的农民工作部在两个主要方面开展这项工作：

(1)在党内，扩大和巩固农村支部网，组织各区委会、州委会和农民支部中的农民工作委员会，并积极开展工作；

(2)在党外，在一切能联合农村劳动群众的政党和组织中形成一个左翼和反对派，并予以支持；在以农会章程为基础的农村组织中、在消费合作社和信贷机构中组织党团；支持希望深入到广大劳动农民群众中去的无地农民和缺地农民的反对派组织。

由于在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山鲁斯不可能建立起合法的农民协会，我们只好探索争取农民群众的新的组织形式。

劳动农民统一阵线委员会就是这样的组织形式。分散在各个政党的农民和无党派的农民都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区一级的统一阵线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制定工作计划和今后的行动纲领。把各个区的代表会议联合起来，我们就有可能把这种组织形式推广到所有各州。斯洛伐克的工作经验证明，这种组织形式是正确的，即使是在转变时期，只要能正确地领导争取实现农民迫切要求的斗争，它也是正确的。在农民组织与统一阵线委员会平行存在的地方也同样必须把运用统一阵线委员会的经验用于争取广大农民群

众。我们清楚地懂得，农民问题，即革命的无产阶级同农民联合的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会在这方面负起自己的责任。

下面谈民族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是已经衰亡的奥地利的最坏翻版。在这么一小块土地上居住着 6 个民族。居于统治地位的捷克族同其他民族相比只占少数。因此，斯洛伐克人被说成是捷克族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基础就是这样建立的，在这个国家统治民族只是依靠暴力才得以维持自己的政权。

在被捷克斯洛伐克兼并的那些地区（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山鲁斯），占统治地位的是最残酷的殖民关系。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不久前对个别省进行了行政改革。这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早产儿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警察国家之一。

在捷克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对民族问题的观点同掌权的捷克资产阶级的混乱思想毫无不同之处。捷共当时的领袖似乎比捷克资产阶级更害怕民族问题上的布尔什维主义路线；他们推说，捷克工人和共产党人不理解“包括分离在内的自决权”的口号，说这有可能使他们远离共产主义。甚至在民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由于霍尔蒂在匈牙利的统治，完全的自决权，尤其是对马尔扎人来说，仍然被认为是不可取的。

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在斯洛伐克自治的问题上某些领导同志准备采取最反动的党派的观点；至于喀尔巴阡山鲁斯呢，它们满足于圣惹尔曼和平条约对它规定的资产阶级自治。在捷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执委员迫不得已做出了某些让步，这些让步实质上是对右倾分子的让步。

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推翻了承认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原则，向斯洛伐克和其他少数民族宣布了包括分离在内的自决权。喀尔巴阡山鲁斯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解决的。

1926年7月，捷共在其斯洛伐克地区的代表会议上决定把五大提纲具体化，并在斯洛伐克发出相应的呼吁书。主要口号的阐述没有超越列宁提纲的范围。此外，还提出了把斯洛伐克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和在劳动居民中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对捷克斯洛伐克其他民族的态度口号。1926年11月，喀尔巴阡山鲁斯代表会议，根据五大提纲，决定由俄罗斯路线转而贯彻乌克兰路线。

1927年9月，德意志地区代表会议研究了民族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这些决议实质上同在斯洛伐克通过的决议相似。

关于把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具体化问题，捷克共产党是完全做到了。但是，在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大的缺点，这些缺点是：

- (1) 提纲和具体实现提纲的做法写得不够通俗；
- (2) 它们没有成为党的共同财富，尤其是在捷克人地区，因此
- (3) 提纲的实际贯彻非常不够。

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在其宣传工作和实践中把重心放在列宁提纲的第一部分，即放在实现直到实行分离的自决权上是完全正确的。与此相反，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把重心放在力求各民族自愿地共同生活上来。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并非没有失误。呼吁书写得不错，可是斯洛伐克文的呼吁书只在斯洛伐克族中散发，乌克兰文的呼吁书只

在乌克兰族中散发，德文的呼吁书只在日耳曼族中散发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不错，党的上层人物对这些呼吁书是清楚的，但是捷克的工人群众对这些决议只知道一点皮毛，或者根本不了解。这就使我们全党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工作。

思想准备不足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像罗瑟米尔发动的这类情况之中。捷共对这次发动反应太迟缓，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感觉到了。在国际上，这个时机也没有被各支部适当地加以利用。只有兄弟的匈牙利党以它自己的发动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捷共动作迟缓的借口是，斯洛伐克决议中已经包含了对这个问题的原则立场，但仅仅这些是不够的。

这场运动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正因为如此，大国主义的捷克资产阶级和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后者由于放弃反捷克纲领而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危机）在选举运动期间都得到了加强，并引起了一次带有帝国主义倾向和好战倾向的爱国运动。发动这场运动的结果，资产阶级逃避了它对工人阶级所犯罪行的责任。就连在斯洛伐克已经垮台的社会民主党也振作了一阵子，带头进行沙文主义的和反苏维埃的挑唆活动。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正确的决定还不够，还必须让正确的原则变为统治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的，首先是共产党人群众的共同财富。只有这样，党在这类情况下才能真正成为斗争的领导者，只有这样，民族问题才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总课题的组成部分。

民族问题应当既不脱离阶级斗争也不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它应成为无产阶级专政课题的组成部分。很明显，在党举行的发动中，任何轻视民族问题的表现都会导致有害的后果。在斯洛伐

克许多地方，罗瑟米尔发动在我们党的队伍中造成那么严重的惊慌失措现象，这是不足为怪的。

在喀尔巴阡山鲁斯，对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的贯彻同样不够。一年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得不干预这件事。

我把农民问题同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我想让代表大会重视这个对许多支部都有重大意义的民族问题。在结束讲话时我要说明，我是有意识地谈到我们的缺点的，当然在同样的程度上，或者在更大程度上，我本可以讲一讲我们党在布尔什维克化道路上所取得的成绩。

我认为更应当重视错误，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强大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群众性的党，一个必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党。

彼得鲁列斯库（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代表团完全支持布哈林同志提出的提纲，并认为提纲规定的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今后工作的路线是非常正确的。在这条路线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沿着发展世界革命的道路开展我们的工作。

许多发言人都提到罗马尼亚问题。必须指出，在罗马尼亚这个国家里，资本主义稳定局面的动摇性和腐朽性全都淋漓尽致地得到反映。总的来说应当指出，罗马尼亚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机体，它一直是各帝国主义大国相互争夺的对象。近几年来，罗马尼亚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尽管罗马尼亚的统治者为使国家摆脱困境竭尽全力，但仍然未能奏效。法国不久前之所以向罗马尼亚提供财政援助，只不过是因罗马尼亚同苏联接壤，在策划中的反苏战争中它毫无疑问将被当作世界帝国主义的一个忠实宪兵。

作为罗马尼亚经济基础的农业一直遭到破坏。我手头现有的关于罗马尼亚粮食输出的数字表明，尽管战后许多像比萨拉比亚那样一些产粮省份并入罗马尼亚，但输出额却大大下降。农民日益贫困，处境极端艰难。在俄国革命的压力下，罗马尼亚资产阶级不得不“实行”土地改革，但并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只是对他们进行了一次欺骗。改革只是对某些大面积私有土地进行了再分配，而地主们照旧采用种种纯封建的方法残酷地剥削农民。

在罗马尼亚上述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工人农民群众的革命化过程不断发展。最近，尽管我们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尽管罗马尼亚到处充满了野蛮的、无法想象的白色恐怖，但在罗马尼亚仍然出现了工人运动的高潮。我们看到罢工在扩大，罗马尼亚许多省份失业工人有组织的运动在发展。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罗马尼亚农民运动的壮大。布哈林同志在他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一点。运动壮大的特点是罗马尼亚各省，尤其是比萨拉比亚、多布罗加和其他一些地方，许多自发的运动发展为起义。例如今年在伊尔福县和津卡韦茨村发生的农民起义，那里的农民手拿镰刀草叉奋起反抗宪兵。结果许多人被杀害，成百名的农民被关进监狱。多尔日和普拉霍瓦两个县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发生过这样的起义。最后谈谈在阿尔巴—尤利亚最近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示威游行，参加这一行动的有国家农民党从罗马尼亚各地召集来的15万农民。这次农民发动的特点是，阿尔巴—尤利亚附近的数千名工人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它明显地反映出工人和农民要求结成联盟的愿望。但是由于我们党的组织涣散，这次运动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被国家农民党的首领们出卖了。这些没有平息的农民骚动（在新并入罗马尼亚的一些省份中是以民族革命运动的形式出现的）表明，

罗马尼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稳定局面是很不牢固的。这些农民发动同时告诉我们，共产党在农民工作方面即掌握农民运动方面，正面临着极其重要的任务。

至于说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罗马尼亚力量十分薄弱。但是他们同其他巴尔干国家的改良主义分子一样，又是最坏的一种社会民主党。我们那里的社会民主党人简直是特务机关的走狗，他们出卖工人罢工，出卖工人运动。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工人群众的影响日益减弱。社会民主党只在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布科维纳等地还有一些影响，因为那些地方很久以来就有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罗马尼亚的其他地方，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正在消失。许多罢工的情况表明，工人群众正在离开社会民主党。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布拉伊洛夫的工人罢工。那里的工人都参加改良主义工会。但是当社会民主党出卖了这次罢工以后，所有工人都退出了改良主义工会。另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罗马尼亚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瓦利亚朱利乌所看到的。在那里数万名工人宣布罢工。罢工被出卖了，结果成百名工人被投入监狱。

所有这些都证明，罗马尼亚具备着共产党开展工作的相当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党直到最近还在经受严重的党内危机。党的上层领导集团无论在工会问题上、在选举期间的统一战线问题上，还是在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上，以及在对罗马尼亚具有重要意义的民族问题上，都犯下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由于战争，罗马尼亚变成了一个由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多布罗加、比萨拉比亚等这样一些杂七杂八的省份拼凑而成的“杂烩”国家。在这些省份，大多数居民由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摩尔达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等组成。因此民族问题在罗马尼亚起着

相当大的作用。党还受到合法主义幻想的不良影响，白色恐怖在罗马尼亚尤为猖獗，再加上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所有这一切使党在最近一段时期内组织涣散，丧失了自己的领导中心。结果党内只剩下一些未能形成一个统一整体的零散的地方组织。最大的机会主义分子之一克里斯泰斯库长期以来一直在党的领导层占有一定位置。现在他已作为代表前去参加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这就是这个工人阶级叛徒所走的可耻道路。在党中央和工会的领导机关中还有另外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分子，他就是马里安。党不得不下大气力摆脱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如今他们已经不在党内了。应当说，巴尔干联盟对我们党在发展过程中历经极为艰辛的时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巴尔干联盟不够灵活，不善于同巴尔干各党密切接触，以便纠正这些党的路线，克服这些党从社会民主党那里接受的机会主义传统。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党需要共产国际最直接的关注和支持。

最近，共产国际开始更多地给予这种援助。共产国际就阿尔巴—尤利亚事件致我党的信，以及根据各地方组织的倡议在共产国际的亲自参加和领导下召开的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帮助党摆脱了它所经受的危机。代表大会选举了由健康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新的领导。现在这个领导中心正面临着极其复杂、极其艰巨的任务。我们希望并相信，共产国际会给予新的领导以必要的支持，对于新领导来说这种支持目前尤为需要。

同时我们认为，为了巩固我们党以及其他巴尔干国家的党，必须把各党之间的工作协调和结合起来。因此，我们认为希腊代表提出的关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组织一个委员会专门讨论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工作问题的建议是正确的。我们也完全支持共产国际准

备对南斯拉夫和波兰采取的措施。我们自己对党内存在派别斗争和党内组织涣散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是深有体会的。

我们期望，居于重要岗位的罗马尼亚共产党（这个党开展工作的国家处于苏联和西欧资本主义两者的夹缝之中）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能够完成它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卢（南非）：

我再次呼吁代表大会对非洲问题给予关注。亚洲殖民地革命的蓬勃高涨使共产国际忽视了对非洲殖民地的注意。非洲是个辽阔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内帝国主义的剥削几乎是毫无阻碍地发展着。不过非洲各殖民地人民的愤懑情绪种种迹象已经显露出来。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使这一新的运动加入到世界反帝运动中去。如果共产国际现在采取正确的路线，那它就能把非洲人民的运动联合到世界革命运动中去，并及时防止社会民主党组织在非洲无产阶级队伍中得到发展。

在英国资本家企图实行的合理化过程中，英国非洲殖民领地的极其丰富而且几乎原封不动的资源正起着或者即将起到重要作用。我们是非洲汽车运输和航空运输飞速发展的见证人。而其后果恰恰是加重剥削非洲各族人民，剥夺他们的土地，使之沦为无产者，他们将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备受苦难，给英国资本家创造利润。

在现代非洲，垄断资本的高度发达形式正在同原始共产主义的最初级形式结合在一起。因此，对非洲群众的剥削是极为强烈的。同时，非洲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能够领导革命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然而也不能认为，帝国主义在非洲各地的发展都采取相同的

形式。情况远非如此。帝国主义表现为两种对立的形式，这一事实使局势复杂化了。一种形式是非洲当地的帝国主义，其中心为南非联盟；另一形式是中心在欧洲的外国帝国主义。两者在致力于剥削非洲无产阶级方面是一致的，但在为此而采取的手段方面则各不相同。这两种帝国主义当中又以当地的帝国主义更为残酷，也是非洲工人特别仇视的对象。非洲帝国主义依靠白人地主阶级，并获得了白人工人贵族的支持。对黑人实行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限制是这种帝国主义的典型特点之一。由于这些限制，非洲人民注定只能停留在非熟练工人的水平上。与此相反，英国帝国主义在西部非洲却并不剥夺居民的土地，而是鼓励他们发展农业经营，采取欺骗手段来剥削他们，迫使他们以昂贵的价格购买工业品，而他们对农产品只支付极其低的价钱。

在英属西非，对黑人没有实行任何限制。帝国主义需要有掌握熟练技能的劳动力，譬如需要机车司机、办公室职员、泥瓦匠等，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无法使大量的白人工人贵族移居西非，所以不能对当地人实行限制。帝国主义只得容忍少量掌握熟练技能的黑人工人存在。

但是在南非却居住着大量白人，其中包括白人贫民和不同工种的工人。在那里黑人受到种种限制，没有机会成为掌握熟练技能的工人。非洲的资本主义合理化取消了工业中对黑人的所有这类限制。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并不在白人和黑人中间制造任何差别，它们只对某一些部门的工人的熟练程度感兴趣。然而，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白人工人迫使南非资本家只任用白人担任技术工种。目前的南非政府是地主、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的政府。这个政府的政策，一是反对大工业资本，二是对付当地被压迫的工

人。我们在判断南非的局势时应当注意到这一事实。

同时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帝国主义的对抗在东非以及毗邻的英属殖民地乌干达和肯尼亚也有所反映。乌干达是一个重要的产棉国。乌干达政府千方百计鼓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棉花，并把棉花卖给收购商。英国织布厂厂主希望摆脱自己对美国棉花的依赖，因而也赞同这一政策。

南非的制度在肯尼亚居优势。肯尼亚国内较好的土地均被白人占有，因为白人能够在山区居住。这个殖民地不允许种植棉花，因为肯尼亚的地产主们认为，如果殖民地种植棉花，那么当地居民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棉花，他们就不再去白人农场当雇工。一旦农民有能力缴税，他们就不用再为白人干活了。肯尼亚和乌干达之间的对立就是这样发生的。肯尼亚不仅不准当地居民种植棉花，也不准白人种植棉花，其原因也在于此。

肯尼亚实行的是典型的南非类型的殖民制度，即限制黑人的制度。根据法令，每个当地居民都必须随身携带按有指纹的身分证。当地居民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其地位与奴隶相同。

不过，乌干达居民的处境要好得多。两种不同形式帝国主义的对抗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非洲劳动群众甚至认为英国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态度比当地帝国主义更好一些，因为英国帝国主义允许他们保留土地，而南非帝国主义却要从他们手中夺走土地。

再讲几句关于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在非洲的活动。以前这两个国际对殖民地国家并不关心，可是现在却对它们表现出明显的兴趣。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这只说明他们想要夺取非洲日益壮大的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想把这个运动纳入社会民主党的轨道，不让它发展成为革命运动。共产国

际的责任是粉粹社会民主党人的阴谋，只要共产国际在非洲给予我们必要的支持和关注，以便回击社会民主党的反动企图，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拉柯蒙（法国）：

在各国帝国主义相互竞争的不协调的合奏中，法国帝国主义不断为自己争夺市场铺平道路。它不仅要努力争夺国际市场，还要争夺自己的国内市场。这种需要迫使它在企业中加速实行毫不留情的合理化。

战前法国工业的作用并不怎么太大，然而到了战后，由于占领了洛林的列兹矿区，以及法国的财政状况发生了非常有利的变化，资本主义法国变成一个工业强国。这就是法国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致力于实现合理化的原因。

法国工业合理化的特点是什么呢？法国的企业主们并不需要特别花费脑筋，他们只不过是利用法郎稳定带来的有利条件，利用随后的危机和失业现象，采取有力手段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日而已。这就是说，法国实现合理化的第一步结果就是工资大幅度下降、九小时工作日法一再遭到破坏。随后是实行使工人精疲力竭的劳动方法，使用传送带工作，进行工时测定等，法国企业主的最后一条做法才是稍稍改善一下设备。现在他们在政府的支持下正在实现国家电气化。

由于利用瀑布和修建水坝，法国正在实现工业化和变成真正的工业国，甚至在那些缺少最必需的原料——煤的地区也是如此。

为了帮助国家实行合理化，普恩卡来政府真正实现了货币稳定。这种经过长时间准备的决策为大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相当严重的后果：物价飞涨，而高关税又

加重了物价上涨的程度；税收不可避免地增加；房产主竭尽全力提高房价。这种状况使法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大大恶化，赤贫化的前景威胁着广大工人群众。一句话，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

为了保证自己的目的和计划得以实现，法国企业主对工人采取了两面政策。他们把虚假的让步同强有力的镇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家庭”工资制正在推行，这种做法可以保证受家庭之累的工人获得相当数目的补加工资。建立了医疗储金，体育组织也得到资助，等等。在法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企业主为工人建造公寓，但速度比其他国家快得多。企业主靠这种办法使工人紧紧地依附于企业，同时采用两种手段（通过在工厂的剥削，又通过以房产主身分进行的盘剥）把工人变为真正的奴隶。除了这类由工人自己付出代价的假改革之外，企业家和政府对于真正的工会，对于革命组织，则进行无情的镇压。工厂的工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工会工作人员和工人，即我们的工会会员，不断被解雇。警察的迫害同企业主的镇压结合进行。这里需要提一下法国对外籍工人的残酷镇压。多列士说过，法国有几百万外籍工人。他们同法国工人肩并肩地同企业主进行斗争，但是对他们的镇压特别残酷。塞纳省警察局长爱普先生几周前引以为荣的是，不到两年时间他就从巴黎一个城市遣送走了8 000多名外籍工人。尽管如此，我们革命工会在外籍工人中的影响仍在不断扩大。应该说，这是由于移居法国的党的工作者表现了忘我的献身精神的结果。政府也同样拼命镇压法国人。如果党的工作者遭到打击，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会组织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打击，因为在我们的工会组织中有不少党员。

法国目前的形势大体如此。

那么社会党和法国总工会在这种形势面前采取什么立场呢？

社会党，同所有社会民主党一样，正在为“资本主义合理化”而奋斗。社会党领袖以及许多鲜为人知但已开始崭露头角的活动家正在不遗余力地开展这一宣传运动。斯皮纳斯、蒙塔尼奥恩、杜布列伊尔等公民正在全国巡回演说，鼓吹“美国天堂”，力求证明美国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都非常之高。他们说，在美国，每5个工人就有1座别墅和1辆汽车。

改良主义工会组织（总工会）开展的宣传运动比社会党的做法更加反动。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内部，我们可以看到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同政府组织和资本主义组织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实际的和具体的联系。

实现工业合理化所采用的一切方法，对国家实行政治和经济管理的一切方法，都经过总工会和政府及大工业的代表共同讨论，所有决定也由他们一致商定。工人组织的书记茹奥一直同大钢铁业的代表德一唱一和。只要列举以下事实就足以证明改良主义工会工作者同资本主义机构同流合污到何种程度了：有关法国殖民地合理化问题的报告就是由法国总工会的书记之一米奥恩公民起草的，而这个报告又是如此符合资本家对殖民地的观点，以致于它几乎未作任何修改就被一致通过了。

这样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首先，它导致冶金工业、食品工业、纺织企业和化工企业等部门中受压迫最深的那部分无产阶级肯定无疑地向左转。这种向左转的倾向表现为法国罢工的人数日益增加。仅1928年6月一个月内，法国就发生了102起罢工，其中85起是为了增加工资，7起是反对“合理化”本身，10起是声

援性的。

不过所有这 102 起罢工实际上都是反对“合理化”的，因为反对降低工资或者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和声援性罢工（常因抗议奴隶式工作方法的工友遭到解雇而爆发），以及反对合理化本身的罢工，都是为了反对法国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党盟友和工会中的盟友所企图实现的合理化计划而进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任务又是什么呢？工会工作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认为，前面的一些发言本应当对这个问题更加重视得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列宁曾经说过，革命的工会运动是共产党赖以壮大自己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从最近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对这个问题进行着认真的讨论。这是彻底贯彻我们党的路线的一个基本条件，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我们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报告：在工会方面必须有正确的工作。首先必须同一切改良主义者歪曲是非的行为作斗争，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巩固的党、没有坚强的工作人员和正确的路线，只要我们一使用革命的词句，一提出最紧迫的要求，或着手在工会运动中接触使工人日夜不安的问题，极端狭隘的小圈子利益很快就会主宰一切，就会有出现严重的改良主义倾向的危险。我们应当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因此，必须使在共产党影响下的所有工人在我们的工会组织中始终坚持革命立场，善于把日常的要求同革命运动的最终目的，同反对战争和争取世界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

还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可能较小，但是对工会运动仍然有很大意义。这种倾向就是，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通过工会内部的工作来加强党的领导。法

共全国代表会议表明，按产业划分的支部应当成为促进企业工会组织工作的共产党机关，它应当向工会灌输共产主义精神，在任何时候，任何方面无论如何都不要掩饰共产主义思想。

此外，党的代表会议非常重视贯彻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规定的任务。我们已经开始通过在工会和党内的认真的组织工作，通过扩大共产党党团的活动来实现这些任务。在这次会上很少谈到工会党团和其他辅助组织中的党团问题。在法国中部地区，这些党团是存在的，现在正在对它们进行合理的改组。它们只要着手开展工作，就一定可以使劳动者统一工会联合会以最快的速度实现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规定的组织工作方面的任务。我们同样也要与总工会作斗争，不是同总工会所属工人，而是同它的领袖，同它的总司令部作斗争。我们应当揭穿他们在工人阶级中散布的幻想，揭露他们在群众中进行的蛊惑活动，戳穿他们同资本主义机构实行溶合的事实。我们不能认为他们是误入歧途也许在某个时候能够承认自己错误的人，而应当把他们看作是受命保护资本主义的某一部分，而且是心甘情愿地保护它的人。我们也应当在大的工业地区和大企业中认真开展工作，采取措施建立和保护我们的工会支部。我们应当组织罢工运动，利用我上面提到的目前形势造成的高潮来扩大我们的宣传和工作，使我们组织的罢工运动不再是局部的行动。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帮助这类运动，但是需要努力把它扩大到所有工业部门或者整个企业。必须保证我们对罢工的领导权。

同志们，最后一点是要致力于实现工会的统一。不是为了获得同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对于工人运动来说，他们是永难改悔的）会面而感到满足的那种感情用事的统一，而是建立在保护本

阶级利益和维护最迫切的经济与社会要求的基础上的统一。党员应当在工会中努力工作，以便在参加我们革命工会的工人和因没有克服幻想而仍留在总工会中的工人中建立统一战线。我们还要努力把没有加入组织的工人争取过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能逐步取得无产阶级的阶级统一。我们应当带领无产阶级为争取实现最迫切的要求，反对战争危险、保卫苏联，为实现共产国际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最终目的即世界革命而斗争。

上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和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在工会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希望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能帮助我们加强自己的工作。我们相信，在今后的几个月里，领导革命工会组织的共产党是能够把越来越广泛的工人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的。

片山潜（日本）：

在我之前发言的日本代表已经声明，日本代表团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报告和提纲。我想再谈几点，目的是强调一下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谈到的问题。

首先我谈谈各支部同共产国际之间以及某些支部之间的国际联系；然后谈谈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谈谈宗主国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当承认，所有种种联系形式都是薄弱的，都是完全不够的。这种情况阻碍着共产国际对各支部革命活动的领导。

共产国际在研究原则问题的同时应当在各支部所处的现实革命形势中加强自己的作用。因此，为了不错过采取积极革命行动的机会，共产国际应当迅速而果断地行动。在这里我想说明，为了完成共产国际领导革命行动的首要责任，必须大大加强共产国

际的机构和领导，并且在必要时进行彻底改组，使它更好地发挥作用。为此应当把各个支部的优秀分子都动员起来。

共产国际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尤其是同远东各国的相互关系远不是无可指摘的。其次，语言上的困难也妨碍双方迅速采取行动，而各支部信息不灵和行动上出现的错误阻碍着革命活动的发展，以致造成严重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就有过这种情况。

宗主国的党和殖民地的党之间的关系远不能令人满意。列宁同志曾一再强调，宗主国的党必须千方百计地支援有关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我可以指出去年英国党在对待爱尔兰和印度问题上那种犯罪的漠视态度，以及荷兰和美国党对待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同样性质的疏忽态度。这绝非区区小事，宗主国各党应当改变死气沉沉的状态，消除惰性，想方设法促进上述各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各支部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同样远不能令人满意。几乎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的国际活动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正如布哈林和其他发言人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可能现在去弥补过去由于疏忽而错过的事情，但是所有各支部应当强调各支部相互之间的重要的国际义务。特别要做到的是，所有支部都要重视和全力促进中国革命，以及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革命运动。

对于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的黑人问题应当进行详细的研究，以便制定近期的策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同志和美国代表们曾仔细地研究过黑人问题，并拟定了对待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则。这是因为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黑人问题非常重要。列宁同志把美国黑人视为一个被奴役的民族，把他们同爱

尔兰同等看待。第二次代表大会曾指示美国党，要他们研究先在美国，然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召开黑人代表大会的可能性问题。

正如福特同志指出的，曾经就这一问题通过并发给（请注意，是发给）美国党 19 项决议。但是，正如美国黑人代表在这里指出的那样，这 19 项决议和指示完全被忽视了。正如黑人代表指出的那样，美国党的这一犯罪的漠视态度是美国党内派别纠纷造成的后果。

美国黑人约占美国全部人口的 10%，他们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遭剥削，并且在社会地位上受到白人的敌视。所有这一切对美国的运动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潜在的、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革命因素。不仅如此，黑人在世界大战后已经觉醒，表现出进行斗争的巨大能力。譬如，他们在芝加哥、华盛顿、圣路易和俄克拉何马黑人暴动时就表现出这种能力。

美国党从来没有利用过这种革命因素来推进革命运动。这一点在国会通过反对私刑杀人法案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引导人民同情黑色人种。美国党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加强本国的革命斗争。

至于对黑人施加私刑的问题，最近几十年来，美国全国每年都有 25—30 个黑人被白人私刑杀害。令人高兴的是，美国党开始第一次发动宣传运动反对活活烧死黑人。不顾南部地区的激烈反对，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对黑人施加私刑，但是参议院却把这件提案束之高阁，至今悬而未决。党应当利用这个法案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反对白人压迫和迫害黑人。

我以工人的身分在美国居住了 26 年，并同美国的运动保持联系，因此我有权认为美国党是我自己的党，自然也对它十分关心，

尤其是对它在黑人问题方面的态度。我认为美国党应当为它无休止的派别斗争受到严厉批评。正是由于派别斗争，它忽视了自己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应负的重要责任。现在该是停止派别斗争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进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有效工作。对美国党面临的每一个新问题，有人首先是根据派别的需要进行考虑，因此，对问题的讨论就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几乎任何时候也不会得到满意的解决。美国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到这里，以求解决他们的派别斗争问题，可是回到本国后又陷入新的无休止的派别纠纷。只要美国同志一天不克服派别纠纷，美国党就一天不能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党。你们不能说你们确实为吸收黑人参加党尽了一切力量。当然，你们需要克服社会偏见才能在黑人中开展党的工作，不过，你们的责任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应当永远停止派别斗争，坚韧不拔地着手解决急待你们解决的各种问题（诸如黑人问题等等）。要从黑人中吸收党员，让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解决自己切身的问题。意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共产党应当在自己队伍内部解决这些分歧，分歧解决之后应当贯彻党的决定。唯有如此党才能增加自己的基干党员，扩大自己的影响。

我们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你们也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而斗争。殖民地国家发起的攻击，或者说（在这个具体场合下）中美和南美国家发起的攻击，是对美国帝国主义最好的进攻。你们的首要责任是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同上述国家实行合作。墨西哥党请求你们同它长期合作，即从它通过你们同共产国际发生直接接触时起就进行合作，但是你们过去对此毫不在意。这次代表大会应当调整两个支部之间琐碎的意见分歧，两个支部应

当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事业中相互合作。

最后，我想就反帝同盟说几句话。你们，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代表们，大概知道这个同盟是什么组织，它的使命又是什么。我不准备再详细叙述了。正如布哈林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为了准备好反对战争、保卫苏联的斗争，迫切需要加强这个组织。如果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给予这个组织以应有的关注，那么反帝同盟将获得无限广泛的条件。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党在这方面做了些工作，但是这还不够。应当对反帝阵线的这一个环节予以极大的关注，特别是由于必须对战争的危險有所准备。只依靠我们共产党的力量来做这项工作是不够的，不过经验表明，反帝同盟是有能力发动群众进行反战运动的。

全印大会已正式加入同盟，而且同盟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必须争取吸收太平洋工人代表大会加入同盟的决定。如果这个决定得以实现，那么世界上最大的工会联合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将成为同盟的一个成员。现在已具备了利用同盟进行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的巨大可能性。一旦战争爆发，同盟将在组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战斗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因此我支持布哈林关于更加重视反帝同盟的建议。一位荷兰代表表示反对这个组织，因为同盟荷兰支部的工作进行得不好。但是这种结论是错误的。因为荷兰党没有在同盟的荷兰支部中做工作，而是相信了一个最不可靠的社会民主党人斯米茨。责任不在同盟，而在于荷兰党的疏忽大意。有人说要完全取消同盟。只要这个组织还有一点用处，这种想法就是极端错误的。英国、美国和墨西哥的党已经为同盟做了不少切实的工作。我敢断言，反帝同盟值得人们认真地加以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人民期

望他们的斗争得到反帝同盟的支持。

甘津（挪威）：

在共产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上我们应当做的第一件事理所当然地是指出革命的前景。而这一点恰恰是第三国际同第二国际之间最深刻的原则分歧所在。

挪威代表团认为，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完全正确地指出了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前景，特别是指出了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战争的前景。据此，布哈林同志也完全正确地描绘了由于国内革命战争的结果，资本主义将在全世界覆灭的轮廓。

这绝不是说我们准备复活考茨基的那个人所共知的理论，即他曾经断言的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理论。谁也不想推翻列宁主义提出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新技术、贝尔鸠斯方法、全世界托拉斯化过程，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推翻上述规律。关于三个时期的说法是绝对错误的。这种说法认为，似乎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一阶段欧洲存在过尖锐的革命局势；到第二阶段，尖锐的革命局势出现在殖民地国家，特别是亚洲；可是在所谓的第三时期，无论是欧洲，还是殖民地都不存在革命形势，只有罢工和宣传运动，同时最后一个时期则将以新的世界大战引起全世界规模的突然爆发而告结束。这是极端的简单化。欧洲某些国家出现局部的尖锐危机，以及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某些地区发生革命高潮，这总是可能的；我们应当对这种搏斗做好准备，而没有权力错过这种机会。谁也不敢断言，像英国总罢工和维也纳起义那样的事件在资本主义所谓改造阶段不会重演；谁也不敢断言，大罢工、反对资产阶级司法制度的大规模发动和反法西斯起义等不会发展为决定性的革命，也不会发展为夺取政权的斗争；

相反，大家强调说（布哈林同志的报告也这样说），在目前阶段，罢工运动以及一切所谓的经济搏斗都出现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趋势，都带有同国家政权作斗争、各阶级为争夺政权而斗争的性质。这种前景仍然存在，尽管在规模上和基础上不如欧洲第一次大革命浪潮。但是作为世界革命政党，我们应当始终看到主要的前景，而这个国际革命运动的主要前景在布哈林同志的报告中讲得非常清楚。无论是报告还是政治提纲都强调指出和清楚地阐明了稳定局面的内在矛盾，苏联的壮大和中国革命的巨大意义，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再次激化；并且指出，所有这些因素都孕育着灾难、新的战争和革命。这是世界的革命前景，而不是关于资本主义不可动摇的长期稳定局面的理论。

布哈林同志提出了实现我们运动国际化的问题。经济的发展、世界范围的托拉期化，以及竞争的不断加强，都将促进这一过程。就以英国这样的国家为例吧。难道你们不觉得英国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力量（我指的是无产阶级中有阶级觉悟的那些阶层）同矿工罢工前夕相比大大加强了吗？同样，谁能不看到，同我们国际运动一切弱点相反，像中国革命那样的世界事件不是大大加强了欧洲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精神吗？摩洛哥战争，特别是同苏联作战的危险，不也正是在这方面发生影响吗？就连第二国际这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主要辅助组织也不得不披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主的外衣，口是心非地声称它对“解决使殖民地人民逐步获得解放的问题”特别感兴趣，面对欧洲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国际主义精神它不得不通过了蛊惑性的殖民地问题纲领。在挪威这个地方主义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国家里，特兰梅尔利用民族的局限性，借助于保持民族特色等口号暂时占了我们的上风。但是，现

在国际主义精神正不断加强，我国工业的国际托拉斯化的高速发展恰好加速了这一进程。1927年夏季，在英国政府的指使之下，挪威发生了残酷镇压共产党的事件（借口是共产党在英国军舰上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而几乎整个挪威的无产阶级都起来维护共产党。大多数加入工会组织的工人深切同情我们争取国际工会运动统一和同苏联工会实行合作的路线。即使存在黑克尔特同志在这里提到的阿姆斯特丹分子的行为，即使挪威和芬兰一再拖延批准哥本哈根协定，我们仍然没有理由对哥本哈根代表会议的最后胜利产生怀疑。

不管会遇到什么阴谋破坏，建立于阶级自觉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将取得胜利。尽管中央党分子，耍弄种种手腕，阿姆斯特丹分子竭尽种种威胁之能事，尽管有人企图对我们同俄国工会实行团结行动的自由的权利进行种种限制，斯堪的纳维亚—芬兰—俄罗斯联盟的路线定会取得胜利，蜕化变质的阿姆斯特丹上层集团试图抵抗这一打击将是徒劳无益的。我们的政策是明确的阶级斗争的政策。它符合我们工人阶级反对有组织的企业主资本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的利益。毫无疑问，这个政策同样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符合在斯堪的纳维亚无产阶级中日益增强的、自觉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需要。我们相信，瑞典和丹麦工人不会因为哥本哈根协定而允许别人破坏斯堪的纳维亚各工会之间的关系。

毫无疑问，改良主义分子和中央党分子将借口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执委会否决同红色工会国际共同召开代表会议的主张而采取新的立场。特兰梅尔毫无疑问已向挪威社会党右翼举手投降，他以种种诡辩和欺编手段竭力掩饰自己背叛哥本哈根代表会议的

真相。但是，认为群众也会跟着他走那条路，那是不对的。说共产党不曾努力把群众组织起来施加压力，以争取哥本哈根协定得到批准也是不对的。黑克尔特同志断定我们竟让中央党领袖欺骗了自己，这也是不对的。如果说挪威的中央党分子欺骗过什么人的话，那绝对不是我们党。相反，我们的策略是保持高度警惕，我们曾不遗余力地发动无产阶级同中央党首领斗争，争取协定得到批准。我们是坚持不懈、始终不渝地开展这场运动的。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哥本哈根代表会议的事业在挪威和芬兰遭到失败。这方面的重大成绩是人所共知的，而且前景广阔。在这些前景逐步得到实现的过程中，斯堪的纳维亚党、芬兰党、以及苏联工会和整个红色工会国际将面临着非常重要、但完全可以解决的国际任务。斯堪的纳维亚—芬兰—俄罗斯联盟将成为我们争取统一的斗争中的重要核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产生消极悲观和失败主义情绪。国际工会运动的斯堪的纳维亚—芬兰阵线今后仍将对我们争取统一的斗争，对我们在世界工会运动中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

以 1928 年 2 月执政的挪威“工党政府”为例，我们可以再一次看清，特兰梅尔式的中派主义正像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样，是同联合政策、国内和平、内阁社会主义的方针和睦相处的。区别仅仅在于，中派主义甚至为自己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提出了“革命的”理由。它说，社会民主党人建立政府是对付资产阶级的一种手段，是统一阵线中针对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策略”，目的在于使工人群众的落后阶层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并吸收他们参加“革命”工人党阵线。

挪威特兰梅尔分子实行联合政策和奉行内阁主义的做法，与

其说是按照奥地利人和莱比锡《人民报》的提示，不如说是采用了台尔曼·米勒上层集团的方式。采用这个独特的欺骗手段实行联合政策是十分有害的，它给我们反对“激进”的、乔装打扮的联合政策的斗争带来了很大困难。

经验告诉我们，中派主义是我们工人运动队伍中最危险的敌人，同这个敌人进行较量必须极其周密细致地考虑方法。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更加严格地实行独立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因为一部分直接投向敌人阵营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突然向右转，而且还由于某些国家中央党分子的“左倾”成了设在我们和正在向左转的工人群众之间的重大障碍。挪威资产阶级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他们也就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此，就在本届议会期间，我们完全有可能处于必须作出抉择的境地：是否建立工人党第二届政府。目前挪威的某些社会民主党领袖虽然并不了解蒙德主义，但是他们却已在工人中间进行募捐，以“挽救”“祖国所必需”的大型工业企业，免得它们和同类企业一样落入外国资本手中，受他人控制。在工人政党中已开始鼓吹恢复造船工业，鼓动工会同船主、银行、国家组织合作。尽管进行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宣传，但是在某些资产阶级集团内部，有利于同工会和解，有利于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市民阶层进行和平的议会合作的潮流也在加强。中央党分子掩盖并粉饰这些倾向。鉴于上述这一切，必须从政治上加强我们同中派主义的斗争，在阶级斗争中发扬独立自主的积极性，而且也不能仅限于工会一个方面。同中派主义进行正确的斗争，不为中派的言词所迷惑，保持平衡状态，在同中派主义的斗争中加强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这些就是我们在许多国家所面临的任务，而且在完成这些任务时必须依靠整个国际经验。

现在谈谈我们的策略方针以及同仲裁制度作斗争的问题。我们认为，在同仲裁制度斗争方面，挪威的经验具有相当重要的国际意义。

挪威最近一次“不合法”的罢工具有很大意义，其原因何在呢？

1. 这次罢工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这是一次反对仲裁，违背国家仲裁法庭的裁决而举行的罢工。这次罢工虽然以经济问题为起因，但却完全不可逆转地变成了政治罢工，因为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分子为它设置了政治障碍。罢工发展为以破坏、砸烂和废除仲裁制度及一切国家罢工法案为政治目的的真正的阶级斗争。罢工期间，资产阶级国家机关被广泛发动起来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行政手段、政治措施，并动用警察，力求迫使工人阶级投降。

2. 罢工是由共产党倡议并组织的。我们的党通过由我们倡议而在各地建立的行动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直接掌握着所有罢工中心的领导权。这次罢工的实践证明，我们有能力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罢工委员会，从事工会工作的共产党人是能够赢得必要的信任的。

3. 共产党提出的由群众起来破坏所谓苦役法的口号，也即通过有组织地破坏工会法和刑事法而使非法工会合法化和口号，不顾资产阶级法律而从经济上支持罢工的口号，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响应。成千上万名挪威工人公开地直接破坏资产阶级法令，在明显违反法律的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不顾政府的种种威胁和改良主义分子的一再警告，不顾警方和资产阶级法庭的种种迫害，勇敢地承担起这次革命行动的责任。数百名工人被判巨额罚金，遭

到拘禁,但是法律和资产阶级合法性的限制却受到越来越多的群众日益有力、日益坚决的破坏。资产阶级报刊也公开声称,国家的威信面临严重的威胁,强制仲裁法对现行的国家体制形成直接的危险。

4. 破坏企业主统一阵线的战略顺利实现,挪威建筑业的企业主组织软弱也促成了这一点。相当一部分企业主,尤其是没有参加组织的企业主,自己也常违反仲裁决定。

5. 共产党不仅卓有成效地把加入工会组织的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不仅违背改良主义分子的意志发动并举行了罢工,而且通过群众施加压力的方法,迫使改良主义工会和工会的各级机关给予罢工(尽管是不公开地)以经济支持,社会民主工党的所刊也被迫部分地表示支持罢工,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开展斗争。

6. 罢工取得了经济上,特别是政治上的胜利。工资降低的幅度和其他条件恶化的程度,都比仲裁决定所规定的要轻微一些。由于工人采取的上述行动仲裁决定已遭违反,这种裁决本身也不复存在了。资产阶级不得不公开承认,强制仲裁法遭到破坏,并且声明,继续实行或者恢复这种仲裁已无从谈起。实际上取消仲裁判决等于宣布整个仲裁制度的失败。这是仲裁和整个反工会法的破产。今后再引用法律和规定来保护工贼和由仲裁机构进行反动的调解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资产阶级完全公开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而且还不只是在报刊上承认这一点。国家调解庭不得不提出与仲裁法庭作出裁决的制度相冲突的工资草案,以取代对工会采取的惩罚措施。

7. 反工会法整个说来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国家和法律的威信受到极大的损害,这有力地促进了工人群众从思想上摆脱盲目崇

拜资产阶级法律的观念。惧怕资产阶级司法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权镇压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

8. 这次胜利是革命策略的胜利。改良主义受到削弱，改良主义工会首领置身于运动之外。工人阶级中出现了向左转的趋势。共产党人由于在各级组织中和在斗争的所有各阶段都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因此在工会中的政治威信无疑地得到加强。在斗争快结束时我们党没有固执地坚持从原则上拒绝任何降低工资的做法，而是提出采取同意降低工资的策略，但不是按原先规定的幅度，而且必须在1929年重新调整工资。这一路线得到了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赞同。既不采取尾巴主义的政策，也不进行脱离群众的“革命跳跃”，而是去组织广大工人群众，吸引工会、农业工人、议会党团等一起同国家作斗争，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这次斗争标志着挪威无产阶级的转折点，标志着它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反攻。造纸业工会已要求将工资提高15%。毫无疑问，同一切蒙德分子的愿望相反，冶金工人同样也将很快开展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已开始由防御转为进攻。阶级斗争正在进入更高的阶段。

我要再一次强调，这次斗争是由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的。共产党人组织了这次斗争并为这场斗争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它充实了革命的内容。这场斗争的矛头指向企业主组织、整个资产阶级及其国家，以及改良主义的首领，但是它顺利地结束了，并且取得了胜利。

反对仲裁判决和反对仲裁的罢工的国际意义就在于此。

在当前所谓资本主义改造的时期，这次罢工是欧洲境内第一次反对仲裁制度的卓有成效的斗争。这可能令人感到奇怪，但事实确实如此。在德国，我们还仅处于宣传这种罢工的阶段。这次

罢工表明，同仲裁制度作斗争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哪怕是最有约束力的、最庄严的仲裁决定，通过群众的发动还是可以废除的，这种法制的规定是可以打破的。罢工同时还表明，在这场斗争中，只有采取革命的策略和破坏资产阶级法制，工人才能取得胜利。这次罢工表明，不理睬和违反改良主义工会领袖的意图进行斗争是有可能的，在改良主义工会的范围内可以建立自己的、由接受共产党影响的革命领导人和反对派领导人共同组成一个领导核心的罢工委员会。

当然不应忘记，及时地夺占和巩固工会的阵地具有决定的意义。建筑业中所有罢工中心的某些重要工会阵地事先就已被我们占领。在组织领导核心和有策略地开展罢工时，这一点对于贯彻共产党的实际路线显然有很大作用。

已经到了不应局限于顽强防御，而应当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方面（正如黑克尔特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局部转入进攻的时候了。向仲裁制度发动进攻就应当这样进行，必须力求废除整个反工会法，力求把工会从国家调解的苦役般的法律中解脱出来，使它成为同托拉斯资本及与其相勾结的国家组织和国家政权进行坚定不移的阶级斗争的工具。

想再谈谈党内倾向的根源，以及与之作斗争的方式。产生这些倾向的根源我们是很清楚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客观形势，在于革命速度减慢，资本主义在所有各个领域都有所加强，“左”的中派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党的某些阶层施加压力，还由于存在“议会主义”、市政公用事业的“现实”政策，由于工会、合作社的原因等等；还由于我们缺乏足够的能力更广泛地描绘出革命的政治前景，并给尖锐的日常斗争赋予相应的内容（在日常斗争过程中常

常不得不防备来自背后的攻击), 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 某些干部和党员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不高。另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薄弱。众所周知, 与任何一个其他的党相比, 挪威党 5 年来的历史是更充满着同机会主义、同老的工党留下来的机会主义遗毒进行斗争的历史。如果认为击败了舍夫洛、斯捷斯塔德等人, 我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机会主义的危险, 那将是错误的。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右倾危险以外, 还有因形势变化、社会民主党拥有实力, 以及中央党分子居心险恶的蛊惑宣传而再次泛起的右倾危险。党中央的任务——我认为这涉及的不只是挪威一个党——不是对存在这些倾向大喊大叫, 而是要及时预见正在来临的危险, 正确地判明各种倾向的根源, 开展深入的宣传工作, 对策略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明确地制订党在各种问题上的路线, 及时采取说服教育的措施, 总之, 要尽可能地预防各种倾向和机会主义危险。但这决不意味着, 我们鼓吹在我们党内, 至少在我们的领导层中对机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采取妥协态度。在各种倾向已有明显而具体的表现并对党的路线造成威胁, 给我们的运动带来危险的地方, 我们当然应该坚决彻底、切实有力地同这些倾向作斗争, 并消除这些倾向。明确的政治路线, 统一集中的实际工作, 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加兰迪 (意大利):

在对农村的阶级分化和农村各阶层的态度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 对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工农联盟的工作已达到何种程度作出判断,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不准备详细分析这个问题。科拉罗夫同志在发言中指出了农村中贫农阶层向左转的明显征候。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应

当到反映于农村的稳定过程中去寻找。伴随着工业生产力增长而来的稳定局面改变了城乡的相互关系。农村中的分化不断加快。通过银行向农村渗透的金融资本破坏了以往农业资本同劳动农民的联盟。这个过程把中等农民中发了财的那部分人推入了大资本的怀抱，而把贫苦农民推上了工农联盟的道路。当然，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极其复杂。在不同国家，甚至在一个国家的不同的地区都各有不同的形式。

稳定局面表明，战后时期，恩赐给农民的土地改革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阻碍建立工农联盟的一种手段。资产阶级依靠巧妙的政策收买了农村中的某些阶层，这些阶层出卖了广大小农阶层的利益。我们亲眼目睹千百万小农户沦于破产和农民失去他们在战后赢得的经济地位。通货膨胀给小农的经济地位以猛烈的、在某些地方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工业部门的合理化加剧了失业现象，降低了工人的购买力，缩小了城市市场的容量。另一方面，实行工业合理化的结果往往是实行提高工业产品价格的政策。资本主义竭力通过这项政策弥补其利润的损失。“剪刀”差不断扩大。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劳动农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农业危机已经笼罩着许多国家。

非常清楚，资产阶级正在花费极大精力，以便把广大农民群众控制在自己的影响之下。他们郑重其事地宣布要实行新的土地改革，对某些在群众中具有政治影响的农民倍加鼓励。资产阶级正着手建立农民政党。大家不妨回想一下劳合-乔治在英国提出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工党许多代表所接受的土地改革。在德国同样可以看到建立农民政党的趋势，就连法国资产阶级也开始特别重视以自己的政治影响控制农村的任务了。

现在我想问问大家，共产国际又是怎样完成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五次扩大全会提纲所规定的任务的呢？同志们，我们几乎完全忽视了农民工作。当我听到布哈林同志在他提交代表大会的提纲里只是在匆匆谈到总的群众工作那个简短的一节中才提到共产国际在农民群众中开展工作的任务时，我感到非常吃惊。我非常清楚，布哈林同志并没有贬低在农民群众中开展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我必须指出，布哈林的报告对争取农民的任务阐述得非常不够。

而这正好又发生在几乎所有较大支部和相当多的小支部由于对如此重要的问题重视不够而犯错误的时刻。

我们并没有像共产党人和列宁主义者该做的那样在农村中开展工作。提纲把农民工作同红色体育运动国际、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国际工人救济会的工作相提并论。我认为这不仅不能帮助，甚至会妨碍党充分地认识到争取贫农的意义。不要忘记，贫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

我认为，提纲的第一部分，即在阐述共产国际和我们各党的任务那一部分，应当比较详细地叙述农村分化和向左转的原因和性质。必须专门另列一节指出，我们在农村的工作应当怎样进行，而且应当对共产国际（尤其是在欧洲）在这方面几乎毫无作为的这一事实给予简短的批评。

同志们，我们是否有土地政策呢？我以为是没有的，我们只有土地问题提纲。我们各个支部的政治视野仍然十分狭窄。为了制定我们所有各党的土地政策，必须承认必然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民性”和“民族性”。

我们不能局限于把列宁的提纲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相对比。我们应该有各国的土地纲领。这些纲领应以分析农民经济的

历史发展和农村的社会分化为依据，具体地判断农民目前的状况，农民中出现的趋势和政治集团，在此基础上为农村制订要求。这些要求应当成为整个革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要求，成为具有政权意识的工人阶级的要求。

但是仅仅一个土地纲领是不够的，它不能取代整个土地政策。如何争取农民群众呢？问题就在这里。只有为实现农民的局部要求而斗争并以这些口号把农民团结起来，才能争取到农民群众。如果我们忽视了这项基础工作，如果我们日复一日地仅仅限于重复诸如我们是阶级的党、工农联盟的领导权应当属于这个阶级、我们为给农民分配土地而斗争之类的口号，我们也许会得到几十个农民的同情，但是，整个农民群众将继续留在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怀抱之中，我们将在客观上为反动派和法西斯准备土壤。

应当在政治提纲中强调指出，为了使我们能影响农民，必须为实现小佃农、小农场主、劳动农民的局部要求而斗争。工农联盟还没有实现。我们不能受人迷惑，必须研究土地问题，认真规划农村工作，这是政治性的工作，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要予以关注，而不仅仅是所谓农民问题“专家”们才应感兴趣。这些专家由于缺乏监督和领导，常常陷于官僚主义的陈规陋习之中而不能自拔。

如果在谈论农村工作时只去批评我们各国的党，那未免失之公允，因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心未能倡导这项工作。我们听说，共产国际去年成立了一个土地委员会。共产国际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关心土地政策的同志曾想在我们为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而发表的关于共产国际活动的总结报告中找到土地委员会的专题报告，结果是白费力气。我曾试图同土地委员会建立联系，注意它的工作。可人们告诉我说，它早已不在人世了，它还没有出世就夭折了。应

当说，我们各国党内也有这种变成死胎的部门。

共产国际因没有一项土地政策而造成了不良后果——使农民国际丧失了活动能力，柯拉罗夫同志已经强调指出，农民国际未能变为群众组织。让我再回到那个还没有人作出回答的老问题上去。就实质而言，农民国际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是农民共产主义派别的领导中心或者是群众性农民组织的中心吗？我们历来认为，农民国际应当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并按照这个方向开展工作。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农民国际应当在革命农民中间组织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要实现农民的局部要求和把他们的这些要求同作为工农联盟基础的共同要求结合起来而斗争。

欧洲的农民不了解农民国际。农民国际也没有具体的、明确的工作纲领，因为它从来没有研究过各国出现的具体问题。例如：农民国际研究过租佃关系吗？它是否知道，应当如何领导力求改善租佃条件的佃农？对于这些致力于实现当前迫切要求的小佃农不能只是反复强调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对待他们必须采用别的什么方法，否则这些农业无产者会另寻道路捍卫自身的利益，并继续留在我们敌人的营垒之中。农民不会出于对农民国际的礼貌而靠拢我们。

我只举了一个例子，不过这样的例子很多。对农民国际的整个立场必须重新加以考察。为了使农民国际富有活力，共产国际应当帮助它进行工作。由于缺乏土地政策，各党没有贯彻共产国际有关这个问题的决议，或者对这些决议理解得不正确。

我提醒大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有关土地问题的提纲曾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共产国际对于根据我们倡议而建立农民政党一事的态度。提纲指出，“由共产党人组织独立的农民政

党是不适宜的，因此也不应推广。”但是我们这里仍然有过共产党建立农民政党的事例，而且某些国家还在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我们同意这样的说法，即我们的提纲不是教条主义的指令。提纲可以修改，但是必须在已经积累的经验的基礎上重新加以审议。同志们，我们不同意匈牙利共产党党员克麦尼同志为建立农民党进行辩解而提出的理由。如果农民中的贫农阶层确实出现左倾化过程的话（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那么，作为联合农民的手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是农民党，而只应是能确保无产阶级在其同农民的联盟中起领导作用的某种组织形式。

有人说，是经验告诉我们，要去组织农民党，但是要知道各国共产党通常并没有在农民中开展工作，我们在农村工作方面还没有取得真正的经验。

做好农村工作的前提是什么呢？这就是要加强我们共产党的政治和思想阵地，提高我们开展争取群众工作的能力。而在主张建立农民政党的同志们的立场中和那些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去组织农民，认为共产党的作用只限于以其影响去争取城乡劳动群众的同志们的观点中，都暴露出这些同志们缺乏捍卫群众日常要求的能力。就是赞成根据我们的倡议去建立革命的农民政党的同志们，他们提出的理由从政治上和思想方面来看也是不充分的。这些同志们忘记了，在我们和农民之间是谈不上从政治上划清界限的，更不能说无产阶级先锋队和贫农的目的各不相同。贫农的要求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要求。要把这个原则变成革命的实践，各国共产党就必须在农村中加倍努力地工作，就必须研究农民问题和熟悉土地问题。

如果就此问题展开专题讨论，我们还将要进一步阐明我们的

观点。

我以意大利共产党的名义在大会上提出了几个问题，为的是让共产国际注意到我们在农村工作方面存在的弱点。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必须给农村工作和对这项工作的批评留出更多的位置。

同志们，战争即将来临，面向农村吧。

萨波托斯基（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属于世界大战以后新建立的国家。由于具有较强的工业实力和很高的农业生产水平，捷克斯洛伐克相当快地克服了战争浩劫带来的后果，并通过加快合理化和托拉斯化的途径，加入了局部稳定的国家行列。新的国家政权在其地位尚未巩固之时曾向工人阶级提出种种社会化方案，高唱种种民主调子，但这些方案和民主高调很快被遗忘了，马萨里克的共和国完全暴露了自己真正资本主义的实质。

这一转变自然引起了阶级矛盾的激化，促使阶级战线全面展开。在生产局势高涨的情况下，经济斗争、冲突、罢工却不断加强。在阶级斗争发展的这一时期，可以看到许多现象，证明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是正确的，证明阶级矛盾的激化正迫使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求助于以更加复杂的方式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腐蚀工人阶级的某一部分，瓦解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应当指出，即使在社会民主党没有直接参加政府的时期，这些党的上层分子的利益也是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紧密相连，而不是同工人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些党的党员在疾病保险社、各种社会保险机构、行政管理委员会及各省和全国的种种机构中占据要职。为了保住这些职位，他们要求于社会民主党的不是对阶级斗

争实行领导，而是对现政权的恭顺。所谓“社会主义”政党的机会主义，其部分根源就在于此。他们提出的主要口号是“我们国家”的利益，并以此要求工人阶级的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社会党人所采取的保护国家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对“我们的”工业采取保护态度。因此，改良主义工会组织不仅不抵制资本主义合理化和稳定局面，而且还直接参与合理化和稳定局面的实现。十分清楚，他们是用工业稳定和忠实地同资本家妥协的政策来代替阶级斗争。

战前，只有一小部分工会组织（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声称实行所谓劳资合作政策，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工会都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现在，大部分工会转向另一个营垒，背叛了阶级斗争，公开鼓吹“工业稳定”，倡导通过所谓仲裁手段解决经济冲突，等等。现在在我国坚持阶级斗争的只有红色工会。这些组织拥有的会员只占加入工会组织的无产阶级的12%，而其余的88%都是改良主义工会的会员。改良主义分子同资本家和国家政权一起自觉地反对工会运动中任何主张阶级斗争的倾向。他们不惜采用分裂的策略，不惜从工会组织中开除有阶级觉悟的会员。不管在哪里，只要这些会员的工作威胁他们同资本主义合作，他们就使用开除的手段。为了推行工业稳定政策和阻止罢工斗争的发生，改良主义分子在举行罢工的任何地方都竭力使罢工归于失败，以此向工人证明，采用坚持斗争的策略是不适宜的，甚至是有害的。为了不让工人取得胜利，改良主义分子不仅暗中破坏罢工，甚至还策划工贼活动。最近许多罢工都存在类似现象，例如国际工会联合会领导的赖兴堡建筑工人大罢工就是如此。正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建筑工会（德国和捷克的工会）采取了工贼行为，从而

加强了企业主的抵抗，致使罢工拖延了10个星期之久。

改良主义工会如今起着原先由企业主的走狗——黄色工会和法西斯工会起过的叛徒作用。他们挑起同工会运动中有阶级觉悟的派别的斗争，借以促进黄色工会和法西斯工会的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工会运动中反动势力的加强，黄色工会和法西斯工会的发展，是改良主义分子奉行叛卖政策的直接后果。

改良主义工会推行工业稳定路线，拒绝举行任何战斗发动，企图配合政府和企业主完全孤立红色工会。他们排斥红色工会的代表参加任何涉及工人要求的谈判。唯恐他们坚定的战斗精神妨碍改良主义分子同资本家的友好会谈，唯恐他们把谈判情况告知工人舆论界，发动无产阶级起来斗争。

可以用布拉格建筑工人签订集体合同一事作为例证。去年秋季，大布拉格工人在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下奋起斗争，要求增加工资，签订集体合同。改良主义分子暗中进行破坏。八个星期以后，罢工毫无结果地结束了。但是，建筑工人果断地决定到春天建筑旺季到来时恢复已经中断的罢工。工人们懂得，革命工会的罢工策略是正确的，是改良主义分子以其暗中破坏行为出卖了工人。罢工结束14天以后，有2000名新的成员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建筑业支部，这证实了斗争路线的正确。然而，还在春天建筑旺季到来之前，改良主义的建筑工会就背着工人，不经过国际工会联合会代表同意，擅自同企业主举行谈判，并签订了集体合同。根据这个合同，工人工资增加了13.5%，但条件是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建筑业支部不得参与合同的签订。改良主义工会狡诈地抢先签订集体合同，从而破坏了预定在建筑旺季到来时进行的罢工。由于局势非常有利，这次罢工本来毫无疑问是可以取得更大胜

利的。

冶金企业在进行签订集体合同的谈判时，情况也是如此。当这个支部单独拟定出要求时，改良主义分子拒绝同国际工会联合会冶金业支部共同运动。改良主义分子提出了集体合同的反方案，并要求以不准国际工会联合会参加谈判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不言而喻，企业主欣然同意，便拒绝革命工会参加谈判。当革命工会的代表不顾这一切仍然前去出席谈判时，警察根据改良主义分子的指认将他们赶出了大厅。

要反击改良主义工会领袖这种奸诈的叛卖行为是十分困难的，况且我们党的工会工作也存在很多缺点和薄弱环节。虽然制订的计划相当出色，但是这些缺点和不足之处仍大大增加了采取灵活方式和同工人中的改良主义影响作斗争的困难程度。不仅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而且很大程度上在革命工会中，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也十分不能令人满意。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即使在共产党员占相当大比例的情况下，我们的影响也未能有组织地加以运用。加入改良主义工会的共产党员没有认真注意开展有计划的日常工会工作，而这种工作本来可以帮助他们取得群众的信任，把改良主义分子排挤出领导岗位和牢固地掌握重要的阵地。共产党人没有有计划地开展工会工作，只是时断时续地偶而表现出一点主动精神。在工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其他发动之前，他们都力求建立一个反对改良主义领袖的战线。但是由于没有事先的工会工作来有力地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未能完全取得群众的信任，他们的斗争也没有带来良好的结果。

在革命工会中，所有领导岗位，包括组织部门的职位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但是在革命工会中担任负责工作的大多数共产

党员并不理解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工会工作的实质。大多数工会干部都受过改良主义的旧影响，他们在完成行政管理工作和日常的工会工作时，并没有给工会工作增添多少革命的内容。革命工会的机构仍然默守旧的、已经过时的工作方法和策略，不懂得新的形势和已发生变化的生产条件要求采取新的工作方法和斗争方式。他们看不到工业部门新的改组，也不理解合理化、资本积累和托拉斯化的意义，而认为现在组织罢工和发动时仍然可以照搬过去工会同单个的、没有组织起来的企业主斗争时采用的做法。要让我们的工会工作者弄清楚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转化并理解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同样是很困难的。

他们没有作出努力去利用这场斗争并从中得出必要的革命结论。正因为如此，他们几乎没有利用警察镇压、逮捕甚至枪杀罢工工人的行为来开展斗争和吸引所有工人参加斗争。他们很少做激发国际团结精神的工作。对于诸如英国工人罢工、中国工人运动受迫害等事件都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工会干部开展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宣传工作十分薄弱，也没有强调指出资本主义剥削的新方法和对工人的残暴进攻，对改良主义者批判不力，对改良主义叛卖行为的真正实质也揭露得不彻底。革命工会不善于准确地使用武器去批判改良主义，甚至常常在改良主义的论据面前自感不如。因此，尽管革命工会具有吸引力，尽管它得到工人的信任，它却不能彻底地粉碎改良主义分子的阴谋，完成自己的革命任务。

最近我们党正在坚持不懈地开展有计划的工作，努力按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精神克服缺点和加强革命工会的活动能力。贯彻这些决定是我们革命工会党团工作的基本问题，但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阻力。一方面，工会机关的工作落后，力量单

薄，常常使工会无力贯彻这些决定，更不用说许多工会干部对此缺乏良好的愿望了。另一方面，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是，许多党的工作者不理解这些任务。他们往往只是机械地重复来自上面的指示，而不去开展党团工作和有计划的宣传工作。虽然如此，从红色工会国际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有关改组国际工会联合会的许多决定已经得到贯彻。国际工会联合会的个人领导为集体领导所代替，成立了各种部和委员会。某些产业支部也建立了集体领导机构，或者对建立这种机构进行了部署。同时实行提高这些机关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和发挥它们的主动精神的方针。根据产业原则进行了调整和改组，建立了领导产业工会的机关，并按照“一个企业，一个组织”的口号采取措施筹建工厂组织。此外，已经着手对会员进行有系统的教育，着手组织训练班培训和教育新的工会干部。必须指出，许多工会工作人员曾经担心，我们进行的改组和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党的报刊上开展公开讨论，指出我们革命工会的缺点和错误，会给革命工会带来危害，但事实相反，这次讨论虽然开展的尚不够广泛，改组工作也仅仅开始，却已给革命工会带来了活力，并促使许多共产党员更加重视工会工作。结果，革命工会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近半年来，即自今年1月—6月底，共有31 000名新会员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而且可以期望，作为一个很大缺点的工会会员流动现象将会减少，并将向好的方向转变。

有关罢工战略的问题仍然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为了贯彻正确的战略，革命工会现有的工作是不够的，因为革命工会和改良主义工会在数量上的对比是12：88。必须加强对参加改良主义工会的工人和不过问政治的工人的工作，正确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

在工会中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观点至今远远没有达到要掌握战斗行动领导权这种革命观点的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未能有准备地举行罢工，罢工往往是自发进行的，这样自然就不可能选择最合适的时机，即条件最为有利的时机。零星分散，毫无计划，是我们这里各次罢工的特点。在我们这个资本积聚的时代，这是一个会招致极大危险的缺点，还有一点也颇有代表性，即我们在领导罢工斗争时，通常总把财政问题摆在首位。我们的工会工作人员认为，工会组织只有在具备罢工所必需的财政来源时才能进行斗争。即使在斗争已难以避免的情况下，也必须有最低限度的开支才能进行斗争。很清楚，按照这种观点，宣布和举行罢工的决定不是根据罢工的必要性、条件和目的而作出，不是根据战斗计划是否准备妥当而作出，而仅仅取决于工会组织用于支持罢工的款额有多少。另外，还存在一种错误的危险倾向：某些组织认为，工会组织的革命性应表现为对任何一次罢工都要提供最大限额的资金支持。哪怕是对偶然爆发的和毫无准备的罢工也应如此。最近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就存在重大的错误，重犯这些错误必将造成严重的危险。党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经常不断地强调指出这样一个原理：革命策略首先要求有计划地准备罢工，要求工会组织和罢工工人更多地发挥主动精神，准备作出牺牲，要求整个无产阶级发扬战斗团结精神并提供支持，要求对战斗行动实行有力的、果断的领导。

组织青年工人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会工作是党的另一项重大任务。青年工人独立地举行过一系列罢工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工厂青年工人代表大会的基础上建立青年委员会是吸收青年工人参加工会工作的最好的一种形式。

建立工厂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正如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指出的那样，我们还没有正确地运用这些机构来进行我们的革命发动和达到我们的目的，虽然我们多次努力，试图把工厂委员会和在地区、产业和全国范围内的委员会作为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机关，并把它们变成联合战斗发动的强大堡垒，但至今未获成功。最近一次为争取工人社会保险金不被削减而进行的发动就是其中一例。我们至今没有实现召开工人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口号，而州代表大会又因缺乏充分准备而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说：

在工会运动方面捷共还面临着许多工作。虽然最近以来它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仍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有待克服。党在工会中（无论是改良工会，还是革命工会）的党团工作必须不断加强。不仅工运部的某些工作人员，而且所有党员群众，都必须更加注意工会工作。

党在工会工作和解决其他问题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同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同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倾向作斗争。正如布哈林同志在发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捷共正确革命路线的主要敌人应当从右的方面去寻找。

只有通过有计划的、顽强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工作，而不是依靠空洞无物的革命词藻，才有可能在同这种危险进行斗争方面实行恰当的、有效的领导。

皮奥（法国）：

我要求发言，是希望停止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上对我们党和巴黎地区组织之间的分歧所做的错误解释。

在布哈林同志的报告中，我们党的“左”的错误和倾向是同右的错误和倾向相提并论的。对右倾危险只是从分析选举策略的角度作了阐述，而对“左”的危险则既从统一战线策略角度，又在工会问题上提出了警告。

在我们党就这些问题展开的讨论中，有人曾企图依靠第九次全会的提纲，将巴黎地区的领导机关——“地区委员会”同基层隔离开来，以便端正党的路线。我们的三月代表会议对第九次全会提纲的有关部分提出了必要的修改。

我们指出我们在这一点上的分歧，为的是使本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措词不再给虚假的解释提供口实。

昨天多列士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存在右的危险。我不打算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去。他列举了从右的方面威胁我们党的种种危险。但同时他又提出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中派”。我们认为，这个中派是右派的近亲，多列士谈到的这个中派让我们看到的是右的面孔。就以工会问题为例。在工会问题上我们的分歧在哪里呢？在工会提纲的草案中提出了“中立”的原则，并说什么“党只有在工会运动中才能表现自己”。这两个论点反映了机会主义的，但并不是中派主义的路线。我们巴黎地区表示反对这个提纲草案，并在全国代表会议上对它作了许多修改。

布哈林的提纲草案指责左派“否定统一战线”。我很清楚，共产国际得到的材料往往是单方面的。法国共产党常常利用共产国际信息不灵通这一点。这些不正确的材料就成了布哈林同志这一错误的基础。布哈林同志断定，似乎巴黎地区的左派否定统一战线。他指的仅仅是巴黎地区，因为在外省并未找到左派，那里只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指责左派否定统一战线仅仅是针对巴黎

地区的少数派。请允许我说明真实情况。

我将谈到我们统一战线工作中正反两个方面的问题。缺点超过成绩的情况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存在，在全党的工作中也是如此。应当承认，基层只是在中央发出致总工会中央理事会或者致社会党的“一封公开信”之后才投入运动的。这是统一战线的又一个薄弱方面。

认定巴黎地区否定统一战线是错误的，在布哈林的提纲草案中就存在这个错误。可以举出几个例子：早在社会党于圣诞节召开的代表大会之前，我们就在巴黎地区的一些工厂发动力量，并在使我们向社会党提出的统一战线的建议进一步具体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大家都知道保尔·富尔的答复：在自发地靠拢统一战线的倾向中他看到了共产党的路线。一月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工人代表团的意见，工人代表团在那里充分阐述了关于实现自己的迫切要求的纲领，我们党把这些要求看作是自己的要求，这一做法为我们党加强自下而上实现统一战线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现在谈谈选举。我举几个数字来说明选举的准备工作。在党的选举会议上有没有来自工厂的代表呢？有的。它是否代表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呢？不，它只代表少数。不过这毕竟是沿着共产国际指出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因为共产国际要求企业成为开展选举运动的中心。我们是否百分之百地做到了这一点呢？没有，因为还存在一个主张按照居住地点开展工作的思潮，而且这种思潮在我们党内占据着优势。但是应当指出，也还有一种主张将运动中心转向工厂的思潮。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巴黎地区党组织在选举运动中所做的工作。

第6区：召开了45次会议，其中31次是在企业召开的；

第4区：召开了84次会议，其中27次是在企业召开的；

第8区：每片各召开了15次会议，另有25次是在工厂召开的。

我还可以举出瓦兹省为建立统一战线所做的工作，瓦兹省揭露出了乌里的行为。由于我们为建立统一战线做了工作，乌里只得向工人承认他同激进派的勾结。

为什么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呢？全国代表会议前夕在我们地区进行的党内公开讨论是以提纲为指导的，而全国代表会议上几乎百分之百地修改了提纲。这个提纲除了个别几处正确以外，整个来说是以机会主义为基础的。

在巴黎地区工会提纲为那些阻挠罢工运动的工会分子解除了束缚。他们利用“中立”的口号，什么事也不干，而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变成为企业工会支部的党团组织。巴黎地区运输业职工的运动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由于工会领导的责任，为“工会会员墙”编写的报纸未能散发出去。难道这也可以称做中派路线吗？我们说不能。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政治测绘学的做法，所有实行这一路线的人对我们来说都是右派。他们同我们十分熟悉的其他右派分子是串通一气的。他们的路线不是从中间向左转，而是一贯向右，他们对抗选举策略，实行错误的工会路线，这在中央委员会五月会议上再次反映出来。这次会议认为，似乎我们处于纯粹经济斗争阶段。布哈林同志就此指出，现在任何一次由镇压和合理化引起的经济罢工都具有政治内容和政治意义。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也是产生某些意见分歧的原因。

下面谈一下“阶段”论。这个理论说什么我们的共产主义运动应当根据工会运动所具有的群众性的程度来争取在工会运动中的立足点。我们反对这种理论。我们说，不，我们的党应当始终

是工会运动的领袖，而不是只在这个运动赢得群众的时候才成为领袖。因为，如果运动成了群众性的运动，那么运动中就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改良主义倾向，如果共产党不预先做工作，如果共产主义的思想不深入群众，那它就争取不到群众。

布哈林在提纲中提出了在工会运动领导方面的形式主义问题。这话应当对絮赞·吉罗说，这是他的方法，而不是我们的方法。结果，巴黎地区反对絮赞·吉罗、反对形式上争取工会的人们反被指责为犯有这种倾向。同志们，最好还是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共产国际得到更为准确的材料，以避免在布哈林报告中对我们作出的那种错误的评价。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从形式上争取工会，而是争取已加入工会的群众。对我们来说，争取工会的工人群众比争取工会的一小撮头头更为重要。对我们来说，向工人灌输共产主义思想比任命一个受到工人反对、工会群众不愿意跟着他走的共产党员担任工会书记更为重要。要知道，我们试图实行的正是这一条路线。

同志们，我们认为同右派作斗争具有重要意义。在我们党内右的派别是有的。多列士说要开除那些在地方选举中胡作非为的人。这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在开除他们之前先努力说服他们，向他们说明选举策略的意义那就更好了。

现在谈谈被认定为“中派”的分子。我们认为，他们同右派同样危险。中派抵制“公开信”，推行错误的工会路线，提出“积极的改良主义”的概念，在工会运动中表现出修正主义的倾向。我们认为，他们是与右派一脉相承的。给他们以特殊地位就意味着放开这些分子在党内耍花招的手脚。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同这些被认定为中派的分子（但我们称他们为右派）作斗争；同战争

危险作斗争（而这是我们同社会民主党斗争的核心，是共产国际所有党的最主要的任务）；同我们党内妄图使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靠拢的右派分子作斗争。我们认为，这种倾向不仅对法国共产党，而且对整个共产国际也是同样严重的危险。必须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机械呆板的斗争来反对这一危险，这个斗争应当通过建立多数派来解决，但不是在妥协的基础上，而是在明确的路线、为法共全党和整个共产国际都能理解的明确的纲领的基础上建立多数派。法国共产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就是建立和组织领导这个多数派。

加香（主席）：

主席团现提出参加讨论共产国际章程问题的委员会名单。

这个名单是在各国支部协商之后确定的。建议由下列同志参加：

贝尔纳（法国）、伊列克（捷克斯洛伐克）、利马诺夫斯基（青年共产国际）、洛夫斯顿（美国）、舒尔泽（德国）、陈宽（中国）、维特科夫斯基（波兰）。

书记：海默。

建议被通过。

会议休会。

第十一次会议

(1928年7月26日)

主 席：洛夫斯顿

致 贺 词

奈焦诺夫同志代表卡希拉国家发电站的工人和职员向代表大会致贺词。——我们卡希拉国家发电站的工人正在从事和平建设。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建成了发电站，我们正在为加强国民经济而出力。但是国际资本主义想要破坏这个和平建设。帝国主义者到处都在拨出巨款加强军备，他们在罗马尼亚、波兰炫耀武力，各地都在搞反对我们的战争准备，以便推翻无产阶级国家。

同志们，数以百万计的无产者处在危难之中。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在监狱里受折磨。同志们，万恶的匪徒们正企图把我们投入残酷的战争，用不堪忍受的劳动压迫无产阶级，难道我们还要长久地忍受这种压制吗？该是推翻这一小撮可憎恨的强盗的时候了，该是在全世界的上空升起共产国际的工人旗帜的时候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万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扎罗娃同志代表《农民报》印刷厂工人向大会致贺词。——

印刷厂的工人把向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致贺词看作是自己的职责。工人们希望大会代表回去后以更加充沛的精力继续推进世界十月革命的事业。同志们，请允许我宣读贺词。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农民报》印刷厂的工人和职员谨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致以兄弟般的敬礼，我们深信，苏联工农在联共（布）领导下开创的把工农从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必将进行到底。

我们全体一致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表示：我们将竭尽全力恢复和扩大我国的国民经济，以此向世界帝国主义证明：我们工人正在建设并且一定能够在全世界建成社会主义。

全世界工人、农民和被压迫人民大团结万岁！”（鼓掌。）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狄克逊（美国）：

在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关于战争危险问题理所当然地占有中心地位。我想提请你们注意世界的一个地区，在那里，现在最为突出地表现出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对抗正导致一场战争。我指的是太平洋地区。

太平洋是美、日、英帝国主义三方正在角逐之地。这种争斗不需多久就可能酿成公开的军事行动，从而导致新的世界大战。最近几个月来，太平洋地区的这一战争危险越发加剧了。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关系十分紧张，关于战争问题的讨论已经完全公开化。未必需要详细地谈，不久前，美国陆海军武装力量就在海军“暑

假”期间进行了大演习，美国舰队从自己的马尼拉基地开到了距日本在满洲的租借地仅一日航程的黄海。

比这些战争准备活动更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太平洋各国为预防可能爆发的战争正在采取种种措施以保障本国后方。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形是，反动势力正在加紧活动，在军国主义的整个战线发动进攻，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革命的民族主义正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兴起，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正在向左转。不妨简要地评述一下某些太平洋国家的局势。

在日本，田中将军的半法西斯军国主义政府虽在国会中是少数派，但它依靠恐怖手段（首先是针对共产党人和左派工农，但在不同程度上也扩及到政府的一切政治反对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个政府在日本群众中狂热地煽动好战情绪，灌输所谓爱国精神，使电影银幕充斥所谓“光辉战役”的场面和民族英雄的形象。在新成立的秘密局（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军事工业管理局）的领导下，日本工业正在为准备战争而实行动员。监禁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思想左倾的工人、农民，解散革命组织，遵照天皇御旨，而不是通过国会处死共产党人和其他危险分子，——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发动战争所做的准备。

田中政府声称，在秋天加冕典礼时期，政府将把“有危险思想”的嫌疑分子 12 000 人关入监狱。这次迫害革命者的运动已是日本政府近几年来第五次开展这样的运动了，并且范围一次比一次大。这一事实说明了日本群众日益左倾的程度。城市和农村的阶级斗争正不断激化，日益深入。

在菲律宾，我们同样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在那里，民族资产阶级在“为发展工业而共同努力”的

口号下投降了美国帝国主义。新总督史汀生未经任何斗争，事实上还是在所谓的民族主义者配合下，就一步步地从菲律宾人手中攫取了控制权。但是，群众执意追求独立。他们对美国帝国主义满怀仇恨，思想骚动。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领袖，但是不要多久，他们一定会摧毁菲律宾群岛原先的政治关系，掀起公开的斗争。一度处于沉寂状态的工会运动又趋于活跃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与工人直接有联系的贫农群众组织，力量在增强，工作也日益活跃起来。

在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带头策划向工人阶级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这个政府打算实行一项新的法令，把工会变成国家机构的一个部分，由特别法庭进行监督。继意大利“法西斯同盟”法令之后，这个新法令草案打击了工会方面现有的一切。与此同时，还恢复了原有的“违犯法令法”，根据该法令，许多活跃的工会领袖将被投入监狱，监禁10年。新南威尔士工人委员会的戈登同志便是这个“新”法令的最近的一个牺牲者。澳大利亚的工人战斗精神饱满，在他们的推动之下，改良主义领袖们至少在表面上不得不做出反对“新”法令的姿态。

由此可见，我们在澳大利亚看到的情景同样是反动势力在发动进攻，战争正在准备之中，而工人群众中的革命情绪在日益增长。

在印度，与反动统治的加强和战争准备同时产生的现象是，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日益发展。民族主义情绪似新浪潮席卷全国各地，而且工人阶级开始发挥着领导作用。铸钢工业的工人、纺织工人、铁路工人近几个月所进行的罢工大大提高了印度工人的斗志。

总之，只要略微观察一下这4个重要的太平洋国家，我们随处都会看到，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另一方面是群众中存在着革命的愤懑情绪。

至于风暴的中心——中国，那里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对于国际帝国主义来说，中国依然是随时都可能爆炸的巨大火药库。有人认为，由于中国革命遭到暂时失败，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时期正在来到，这种看法是极大的错误。而这个错误，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共产国际各支部发生意见分歧的所在。

从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不仅是太平洋国家民族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见证人，而且（我认为这也相当重要）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运动和工会运动不断发展的见证人。工会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朝革命的方向迅速发展，并且已在国际工运中起着极为重要的革命作用。这个工会运动是在开展民族革命运动并领导这一运动准备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也就是说，在实现我们在太平洋国家中面临的两项主要任务方面，工会运动已成为我们在东方的共产党开展活动的主要基础和最为重要的推动力。

这个年轻的工人运动已经建立了实行国际团结的中央领导机构，即太平洋工会书记处。这个书记处是1927年5月在汉口召开的会议上成立的。

欧美有些同志一心埋头于本国的日常工作，对东方也存在着颇为重要的工会运动这种思想尚不能接受，往往低估太平洋国家工会运动的作用。这种冷漠和轻视，依我看，是我们世界工运中的严重弱点。应当克服这个弱点。我们的敌人没有犯这样的错误。

下列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受日本政府指使的新闻界正在掀起疯狂的反对太平洋工会书记处的运动，澳大利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三国政府则禁止向各该国寄送太平洋工会书记处的机关刊物《太平洋工人》。从我们开始在澳大利亚发行《太平洋工人》特刊和决定1929年在澳大利亚召开下次代表大会以来，澳大利亚政府便通过它的部长们在议会内和报刊上发动了一场疯狂的反对太平洋书记处的运动，声称，政府将不会允许在澳大利亚举行代表大会。太平洋书记处在各国许多代表被捕，不少人领不到出境护照，等等。这些国家的政府企图通过上述手段阻挠太平洋书记处的工作。

不仅帝国主义分子和殖民主义政府这样的敌人重视我们在太平洋国家的相互接触，而且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和第二国际也没有忽视远东。国民党叛变后，为了同蒋介石组织的法西斯工会及某些军阀建立联系，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采取了种种步骤，这些行动还只是改良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企图在远东站稳脚跟，掌握远东工会运动领导权的新方针的一种迹象。英国职工大会总理事会在印度的活动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在印度尼西亚的活动才是社会民主党在东方采取的新方针的典型。第二国际在这方面采取的最新措施，即邀请国民党和其他殖民主义组织参加他们下个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大会，是全面推行其发展路线、把一切反动势力引向远东的典型事实。

太平洋书记处存在的本身，就促进了这一事态发展，对太平洋各国整个工人运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绝大多数的远东工会加入了太平洋书记处，唯一的、重大的例外是受日本帝国主义影响的右翼工会、改良主义工会和中派工会。印度工会选派了代表，后

因印度政府指使警察进行阻挠，未能参加会议。参加太平洋书记处的有中国、菲律宾、朝鲜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工会，以及苏联革命工会、日本左翼工会，还有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法国、英国）的革命工会和工会少数派，以及澳大利亚工会运动。这是一个关系紧密的联盟，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有组织的工人与远东新生的年轻工会和胜利的苏联工会之间进行联系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在消除民族和种族隔阂，确定处理太平洋重大问题的共同对策，给工会输入新的活力，以及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压迫而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奠定基础方面所做的工作超过了10年抽象的宣传。

这里不是详细讨论太平洋工人运动的工作及其问题的场所。我们日本同志、菲律宾同志和中国同志会介绍它的实际意义、它的作用和存在的缺点。澳大利亚的工会理事会虽然遭到来自政府、工党和右翼首领方面最猛烈的进攻，刚才仍在会上再次肯定了要加入太平洋书记处的态度。这些事实应当足以唤醒我们所有的同志，使他们摆脱对太平洋工人运动所抱的漠不关心和消极态度，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加与太平洋工人运动有关的工作。

我特别赞成布哈林同志提纲中关于帝国主义压迫国家的共产党必须支持殖民地运动，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殖民地运动的那部分内容。大会做出的这一指示，对于激励那些只知醉心于本国日常工作而“不能抽出”干练人员去殖民地工作的同志和共产党来说，是绝对必需的。应当有一批不仅肯“跳进”太平洋，而且能认认真真地在那里游泳一番的同志。这项工作应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同志们的首要任务。

再就提纲中有关我们的中国共产党讲几句。在谈到中国共产

党的那一节里，提纲正确地阐述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不过，我还想建议，要提醒中国共产党防止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的重演。

最后讲几句美国的情况。我同意美共中央少数派毕特尔曼同志的发言。好几个月前，当我离开美国时，我就曾清楚地意识到，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实行的是右的路线。这个机会主义对我们在开展的反帝工作影响极大。去年，我们那里出现过一种论调，说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是，美国与英国帝国主义搞联合行动并且听命于英国帝国主义。今年我们那里又出现了这样的论调：似乎美国在支持日本。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有人向我们建议要提出反对“别国的”帝国主义的口号并且向我们指出，“美国现行的”对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在我离开美国的时候，有些同志正在与某些错误作斗争。但是还不存在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反对派。所以，当我1月份在莫斯科的英美书记处发表反对这个正在发展中的右的路线的意见时，我仅代表我个人，与党内原先所有派别均无关系。但是，现在我在这次大会上，发现存在着一个渴望纠正美国共产党机会主义路线的真正反对派，所以我愉快地表示支持他们的政治立场，乐意与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同志站在一起。

赫尔舍利（青年共产国际）：

我的发言只涉及党与青年团的相互关系，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某些问题。

应当承认，党与共青团的关系至今不够协调。只要比较一下共青团的人数和党组织的人数就足以证实这一点了。在大部分国家中团员和党员人数的比例是1：10。在我们的政治工作和工会

工作中，党提供的帮助也是不够的。我们党的工会机构本应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但是它们对我们的工作却毫无反应。现在，正处于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时期，正是青年在生产部门所占的比重不断增长的时期，我们必须更加重视争取青年工人的工作。党与青年团在本企业中的合作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企业中，虽然党拥有十分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但是这些企业中的青年却依然处于共产党的影响之外。而生产部门的党支部只有在它拥有青年的情况下，它的工作才称得上是出色的。

当然，所有这些因素只是大体上规定了党对青年团所担负的任务。许多文件，如关于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关于战争危险问题的决议，乃至共产国际给各国共产党的专门指示信，都给各支部规定了十分明确的任务。可是，各国共产党几乎没有或者只是极少地执行了这些决定和决议。根本谈不上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给青年以帮助。

我敢肯定，这种对青年工作的全部重要意义缺乏理解的态度，无异于忽视了我们运动的基本要求。

现在谈谈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问题。

在我看来，布哈林同志在其提纲和报告中对捷克党的缺点，对导致最近这次失败的党的策略的批评是太软弱无力了。党在红色节遭到的失败（它自己曾把红色节的成败同自己的威望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要求我们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强整个党的工作，并开展斗争以纠正党在最近时期所犯的政治错误。

党在红色节的失败，是以前各种错误导致的结果。这次失败的过错不在工人阶级，不能责备工人阶级消极被动，失败的过错在党本身。党在红色节的失败是一系列原因造成的政治上的失败。

在这里我仅指出几点。(1) 错误在于党提出了举行红色节的口号，作为对禁止斯巴达克运动会的回答。红色节被看作是取代斯巴达克运动会的活动。不仅广大工人群众，而且党员都是这样理解党提出的这个口号的：党没有去组织声势浩大的抗议以回击对斯巴达克运动会的禁令，而是从一开始就满足于掀起一场运动，通过一系列决议。这是因为党指望通过上级政府机关来撤销这个禁令。尽管后来不断充实口号的具体内容，红色节始终被理解为是取代斯巴达克运动会的活动。无产阶级并没有把红色节看作是捍卫自己重大利益的行动；(2) 硬性规定行动日期也是一个错误。党没有注意到局势的重大变化，未能使自己的策略适应这个变化。在这次行动中党显得应变能力很差；(3) 造成这次失败的其他原因还有，党的基层支部积极性不高，首先是群众性组织（红色体操联合会、工会、合作社、自由主义者同盟等等）中的党团工作极不得力。例如，有些地区的红色体操联合会几乎是与党的指示对着干的；(4) 最后，红色节那天事态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一系列错误。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这次活动的有 4 000—6 000 名来自各地的工人和 2 000—4 000 名布拉格的工人。虽然政府已采取极端措施来维持安定和秩序，但是，为了不辜负群众的信任，党还是应当举行这次发动的。可是，党却表现了犹豫不决的犯罪态度，工人漫无目的地、毫无计划地在街上徘徊。如果党行动起来，那么，即使失败，也是光荣的失败，而不是蒙受耻辱的失败。去年，德国共产党在钢盔行动中也有过类似的情况。那时抗议示威也是被禁止的，但是，通过妥善的群众工作，党成功地动员了工人，顺利地举行了示威游行。

现在我们党进行争论的问题是，党的一般政治路线是否正确。

这里指的是支持税收改革的运动，就维也纳事件采取的行动，为保护萨柯和樊塞蒂采取的行动，经济罢工和争取改善社会保障的斗争（例如，提出召开工人基层委员会的口号和规定举行总罢工的日期），以及党的工会工作开展得不够有力等。在这些方面我们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政治上犯了大错误，党中央的某些同志把一切都说成是组织工作上的错误，应当向他们指出，党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是紧密相连的，还要指出严重的组织错误所产生的政治后果。

党的一般政治方针规定，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要实行反攻并根据这种实行反击的路线开展各种活动，这一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在开展这种活动的实践中，在实际利用工人阶级的情绪的过程中却犯了很多政治错误。这样一来，实际做法与正确的一般政治路线就发生了矛盾。只是把正确的政治路线写在纸上是不够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应当在实际工作和政治活动中得到反映。

应当承认，党的整个工作在体制上是不健全的。党员群众对党的行动袖手旁观，这种情况应当说是不健康的。往往有这种情况：党预定采取某种行动，而党员群众却认为上头的这项命令不一定非执行不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组织的一员，必须参加整个工作和一切行动。因此，我们面临一项巨大的任务——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这对于任何一个人数众多的党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党员群众不能确信党的路线的正确性，难道还有可能把非党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吗？难道还有可能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吗？以红色节前一个星期在布拉格召开的一次大会为例，参加会议的党员只占15%。其余85%的党员对如此盛大规模的政治行动不感兴趣，而党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上曾把这次行动与

党的威望问题联系在一起。

这个问题也值得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讨论一番。为什么党员群众对党内发生的事采取如此漠不关心的态度呢？因为党内生活只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党很少就我们的任务问题组织政治讨论。中央的借口是，党员群众受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教育不够，适应不了布尔什维克式的速度，正如通常所说，“马达的功率小了”。可是中央并没有采取什么办法调整这个速度，所以党员群众不知道真正的速度是什么样的。开展党内民主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一定要使党员群众真正成为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者和体现者。

红色节遭受的重大政治失败使党内的不满情绪迸发出来了。而且我们看到，党员群众已开始明白错误的根源。他们提出要改变党内生活，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例如，上星期召开的布拉格积极分子大会的大多数人都赞成这个意见。他们认为，对党的领导机构做这样的改变，是党实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保证。由此可见，党的基本骨干决不是倾向于机会主义的，不是有些同志所说的那样，机会主义是造成这次失败的原因。相反，捷克斯洛伐克的无产阶级毫无疑问地具有健全的阶级本能。

为了度过已经造成的严重局面，恢复群众对党的信任，党应当怎么办呢？必须展开严肃认真和深刻的讨论，迅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充实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改组党的关键部门，从中央到基层，在全党范围开展党内民主，注意检查已通过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克服对地下工作方法的成见，同时保持公开进行党的活动的机会，认真组织并坚持不懈地开展各群众组织中的党团工作，——上述这些任务及其他种种任务都是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

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紧密相关的。

由于党最近遭受的失败，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右倾危险。必须像同现在正有所抬头的原俄国反对派中的极左追随者作斗争那样同右倾分子展开坚决的斗争。应该强调，主要危险来自右边。红色节暴露出来的倾向和错误也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倾向和错误。

我们在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错误和缺点的时候，无意贬低它在第五次和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所作出的成绩。这些成绩必须无条件地予以肯定。但是，只有在广泛开展自我批评并承认自己实际工作中的一切失误和过错的情况下，党才能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才能消除这些缺点。捷克斯洛伐克共青团也不总是正确地对待党的行动，在实际工作中也犯过错误，但是，它的工作和它的缺点将是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进行专门讨论的对象。

我认为，对这些涉及共产国际一个主要支部的问题加以阐述是很必要的。我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与捷克斯洛伐克共青团的观点一致的。

台尔曼（德国）：

德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向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并得到联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赞同的提纲中规定的基本路线。我们在政治委员会提出的修正案中指出，必须强调对局势总的评价，并专门加进了一条关于社会民主党左翼作用的内容。

这里我要回顾一下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那次大会是在资本主义刚刚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召开的。从那时起4年过去了，这是取得丰富经验的4年、各国党充满激情斗争的4年、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艰苦和困难战斗的4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各次扩大全会根据这4年的变化情况给某些支部作了决定和指示，在策略问题

上给它们以很大的支持，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决定对英国和法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就大有帮助。

在这些年内，资本主义的稳定究竟带有什么性质呢？请看最近这4年发生的重大事件：英国总罢工和持续整整数月的矿工罢工、印度尼西亚的暴动、中国大革命事件、中欧罢工浪潮、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反对罢工法的罢工、全世界保卫萨柯与樊塞蒂的大规模运动、维也纳起义、巴尔干国家的农民起义和希腊的最近事件，——所有这一切表明资本主义在相对稳定时期矛盾的增长。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作的评价是正确的。稳定只是暂时的、局部的、相对的。

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应当依据最近几年的丰富经验，作出实际的结论。在布哈林同志的报告中和在辩论中充分阐述的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矛盾，无论是内部矛盾，还是外部矛盾，都在不断加剧；而且两者密切相连，互为作用。内部矛盾，由于帝国主义矛盾而给资产阶级造成的困难，将导致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彼此间的战争，或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战争，这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无产阶级革命。

不可能事先预言，哪条道路会更快地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决战。我们的任务是竭尽所能在帝国主义分子点燃战火之前动员群众，并在具备相应的主客观条件的前提下发动革命。

在提高我们本身的积极性的同时，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的矛盾来加强政治斗争；这样我们同样能够推迟战争。假如没有共产国际，没有各国共产党进行坚决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备活动，假如没有苏联用和平政策束缚住战争贩子的手脚，帝国主义分子

大概早就互相厮打起来了。但是，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战争危险性正在世界各地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增大的这一事实。我只举4个明显的例子：

(1) 美国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严重冲突；(2) 中国最近的事件和日本的武装干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干的勾当不是在准备战争，而是已经进行战争；(3) 第三件严重的事是立陶宛和波兰的冲突最近加剧。谈判突然破裂，关系急剧紧张，士官开始动员，等等，最近几天在维尔诺地区和西白俄罗斯还举行了军事演习，——凡此种种都增大了战争的危险性。最后，(4) 从白卫军的恐怖活动直到准备经济封锁，连续不断地对苏联进行攻击。

在第八次全会上，我们曾经谈了世界上战争危险性日益增长的问题。在专门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并一致通过军事提纲的日子里，英国中断了同苏联的经济谈判，数日后苏联驻华沙的全权代表沃伊科夫被暗杀。从那时起我们可以列举许多新的事实：在中国，苏联的一些代表被无耻地杀害；法国外交政策进行着反苏的离间活动；由于苏联存于美国的黄金问题，双方发生冲突和今年春天在华沙对苏联代表暗杀未遂；最后还有德国的斯特莱斯曼政府借口一些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德国工程师被逮捕而采取了中断俄德经济谈判的粗暴挑衅行为。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我不准备在这里谈的一系列事件中的数例。除此以外，我们决不应当忘记在外交家办公室的阴暗角落里不断进行的战争准备活动。

国际社会民主党在这些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中起着巨大作用。每个人都应当清楚，假如社会民主党不支持帝国主义的所有战争准备活动，帝国主义分子就决不可能发动战争。1914年，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和战争面前投降了，背叛了国际的一切决定。

现在，它又在极其卖力地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其战争措施而创造条件。在这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起着特殊的作用。新帝国主义得以发展的国内因素是：有高超的、发展速度空前的技术，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正在加强，生产规模日益扩大，急切希望更积极地参加世界市场竞争。德国资产阶级力图为自己夺取更好的阵地，在对外政策方面表现得越来越反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组成极其清楚地证实，托拉斯资本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存在有协议。在这个政府中，社会民主党是对苏联进行战争准备的推动因素。

目前的财政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就在不久前国会讨论停止俄德谈判的问题时，曾要求断然拒绝给苏联贷款；他要求不仅停止谈判，而且实行加剧紧张关系的对苏政策，以致连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代表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领袖都感到惊奇而采取了另一种基调。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在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和本质中得到了反映。在一些不同的国家里可以观察到改良主义正在朝社会法西斯方向发展；可以就此举许多例子。例如以德国来说，在这里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支柱，在最近年代里，只要共产主义运动得不到更大的加强，改良主义将始终扮演这种角色。所谓的“帝国旗帜”突击队在竞选斗争中对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和共产党人采取暴力行动。在波兰，我们可以指出同样事例：5月1日，当华沙的无产阶级英勇地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时，法西斯警察得到了波兰社会党队伍的支持，在这场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被打死、打伤的游行示威工人达数百人之多；根据《国外通讯》上的一篇文章报道，波兰社会党的队伍甚至袭击了工厂里的工人阶级革命骨干，并在那

里殴打共产党人。改良主义向社会法西斯的这种转变是同资产阶级战争准备的加强和战争危险性的增大密切有关的。社会民主党不仅是一个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组织；今天它还在建立军事组织，以便在这种思想基础和军事基础上更紧密地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开始在“帝国旗帜”——社会民主党为“保卫”共和国而建立的这个组织中灌输民族主义社会思想；并且竭力用此类精神来教育自己所有的追随者。社会民主党人帕格尔斯在一次柏林的“帝国旗帜”大会上作关于《帝国旗帜与射击运动》的演讲时说到：“我劝同志们不要成为过于执著的和平主义者。青年同志的使命是在可能发生叛乱时帮助警察。因此对于青年同志来说，重要的恰恰是取得用小口径步枪进行射击的技能。”

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这些组织不仅应当在发生革命暴动时反对工人阶级，也就是说，要采取措施在“帝国旗帜”组织内进行系统的军事教育。

“帝国旗帜”中央委员会在1928年6月给各州委员会的秘密指示中写道：

“所有同志都应当成为体育协会的成员，以便通过体育本身进行锻炼和军事操练。”

我还注意到，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内由于战争危险性的增长，一些受社会民主党影响的群众组织也发生类似的变化。再举一例：《前进》周刊针对《消息报》提出的就停止俄德经济谈判一事发表看法的建议时写道：

“我们不可能为了颇为可取的对苏友谊而去牺牲欧洲所绝对

必需的德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

这是赤裸裸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语言，十分清楚地道出他们将在反苏斗争中支持联合起来的西欧资产阶级。

还有一个事实：德国的改良主义者正在分裂工人体育运动，企图使这项运动也浸透帝国主义思想。几周前在莱比锡召开的体育协会代表大会毫无理由地开除了一部分最优秀的革命斗士。在柏林和哈勒也完全公开地采取了分裂方针。

最后还有一个足以表明社会民主党领袖已经与法西斯同流合污到何种程度的最新事例：这就是托马在去年意大利法西斯工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大家知道，托马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民主党人，而是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以这种身分担任了国际劳工局的主席。请听托马是这样说的：法西斯意大利是“为公正对待所有工人而斗争的先进战士”。他接着又说：“法西斯政府保证为所有工人进行有益的和公正的改革”，“意大利的法西斯经验可能对其他国家也是非常有用的”。按照托马的话来说，墨索里尼“只有一个唯一的强烈愿望：保证工人们工作，提高他们的福利以及他们的道德和精神状态”。最后，托马还肯定地认为，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之间只有方法上的不同，但是两者都捍卫工人的利益。这些不多的事实比一切都更好地说明，这些领袖们已经堕落得有多深了。

资产阶级用来镇压工人阶级的方法有二：改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增长和改良主义影响的减少，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手段来驯服工人阶级已不够了。于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采取更强有力的法西斯方法。

社会民主党最反动的趋势集中地表现在它的联合政策上。当

社会民主党政府坚决执行资产阶级政策的时候，工人们就会从社会民主党周围跑开；继续奉行这种政策将使社会民主党受到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彻底决裂的威胁，这些劳动群众将离开它去投向共产主义。如果它执行帝国主义政策不够坚决，摇摆不定，那么金融资本将会让它彻底完蛋。在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中，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联合政策的斗争。各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整个对内政策都是旨在镇压工人阶级。它们在对外政策方面则是在伪善和平主义幌子下支持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

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背叛活动，加上共产党和革命运动的工作和发动，使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开始动摇并倒向共产主义这边。在这种形势下“左派”社会民主党粉墨登场，目的是阻止社会民主党工人大批转入共产党。

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策只有依靠各个国家“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才有可能实行。大家知道，在社会民主党于基尔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当希法亭就联合政策问题提出“向国家接近”的概论时，左派领袖没有对他采取任何对抗行动。在维也纳起义以后，鲍威尔一伙与伦纳等右派共同决定提出在奥地利也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的问题。德国代表团建议给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作一些修正，目的就是为今天指出“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危险性，因为由于战争威胁的日益增大，“左派”社会民主党将起着比现在看来更大的作用。战争越近，“左派”社会民主党就越危险。第八次全会通过的关于战争的提纲已经指出，在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最危险的敌人是“左派”社会民主党领袖，在矛盾日益加剧和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加强的时刻，他们用革命的词藻和虚伪

的左的鼓动方法，帮助了右派的联合政策和军事政策；并且他们的整个政策都是旨在支持反苏和反共斗争以及镇压工人阶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待“左派”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在目前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原因所在。在揭露“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方面的任何犹豫、任何迟延，都将受到我们队伍中最坚决有力的反击。（有人喊道：对！）

在我们德国共产党内，由于右翼集团在对待“左派”社会民主党方面采取模棱两可的策略，我们之间存在分歧。在埃森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把“左派”社会民主党看作是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希望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决定，因为对于许多支部来说，这个问题具有极为巨大的意义。只要指出英国、奥地利、波兰以及德国就够了。

我们看到，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十分庞大而又复杂的战斗机构采用了一切斗争方法：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政权、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政党，最后还有它的最重要的武器，即社会民主党，包括其“左派”领袖。我们能用什么来对抗这个敌对力量体系呢？这就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阵线：苏联、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殖民地解放战争。

我认为，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确认苏联在目前的“改造”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不可能充分估计苏联社会主义大工业产量每年增长15%这一事实的意义。苏联新建立起许多工业部门：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大工业中工人的数量在最近3年增长了33%。如果注意到这些成就几乎是在没有引进外资，而是在社会主义积

累的基础上取得的，那么我们应当说，苏联创造了世界纪录。世界无产阶级都极其关心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苏联经济战线上每一项新的重大成就都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又一次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这个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最终将由我们与资产阶级、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斗争来解决。不言而喻，在无产阶级专政总的发展中存在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并非标志着停滞，而是意味着前进。国际社会民主党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问题时一贯说假话，不老实，它到处大喊大叫，为的是更牢固地把工人群众拴在资本主义制度上，使他们弄不清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真相。它这样做，是因为它知道，无产阶级群众对苏联的同情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无产阶级专政在其存在 11 年以来的总的发展表明，布尔什维克党依靠自己的力量、首倡精神，依靠自己对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影响，不断克服每一个新的困难，一次又一次获得新的胜利。凡是见到过千百万群众兴奋欲狂地热烈欢呼“克拉辛”号破冰船上红水兵建立功勋的人，都感到了这一反响的政治意义。并非仅仅因为这是救生行为，而是由于这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国家——苏联所完成的真正的英雄业绩，正是这一事实才引起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热烈的赞扬。问题不在于 6 名法西斯冒险家的被救；千百万人的这一反应证明了劳动人民对世界上唯一工人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持。

现在谈几点关于左倾化的动向。除战争危险性日益增长外，这是目前时期最重要的迹象之一。各国选举就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波兰和法国的选举显示出左的情绪在增长，而最近时期的经济斗争和罢工浪潮更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现象。在德国出现了新高涨的趋势。

我们党在选举中获得了 55 万多张新选票，其中 80% 是在 13 个最重要的工业州取得的。党有了新的拥护者：在德累斯顿 41 000 张，在哈勒有 38 000 张，在莱比锡有 3 万张，在汉堡 26 000 张，在开姆尼茨有 16 000 张，特别是在红色柏林及其郊区还有 23 万多张选票。我们在 40 个大工业城市一共获得 21 万张新选票。尤其在工人阶级有悠久传统的那些城市，如柏林、汉堡、莱比锡、德累斯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城市的选票数量都增加了。这些事实表明，德国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骨干真正拥护我们党，拥护共产国际。

当然，不能否定社会民主党获得了 900 万张选票的这一事实；但是，它是在借助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进行选举和在采取社会民主党参加大联合的方针的情况下取得这些选票的。而我们则是在竞选斗争中高举无产阶级专政旗帜而赢得我们选民的。

我再举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我们应当把它与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策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

可以认为，社会民主党获得的 900 万张选票中约 300 万张是小资产阶级投的；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而投我们票的几乎全是无产阶级。在我们失去选民的那些州里，社会民主党从我们这里夺去了一部分工人选票，但大部分选票获自小资产阶级选民。

不言而喻，在德国出现的左倾化进程不具有一面倒的性质。这种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党所面临的策略问题，不管我们明天、后天、不久的将来处于任何局势下，都需要尽量地使其具体化。

德国代表团完全同意提纲中所指出的，一方面是各国共产党的影响有了巨大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党的政治影响与其组织力量

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共产党员的人数对党在工人阶级中已经拥有的强大影响来说，也是很不相称的。这种畸形现象，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原因来加以解释。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同志工作过重，劳累不堪，每天都必须进行大量革命工作。许多同情我们的非党人士被这种沉重的工作吓住了，另一些人在转到我们党内来以后，重又离党而去。因此形成大量的流动。在那些需要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和利用每一个有利局势从非党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工人中争取新的拥护者的地方，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表现得不够灵活，缺乏耐心。全党应当共同努力克服这个缺点，必须实行新的改进了的工作制度。

选举结果，成立了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现在已经可以说这个政府的活动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许愿阶段，那时社会民主党还可能使工人阶级产生某些幻想，还可以把群众保持在自己党内和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在新国会工作时间不长的日子里，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活动已经向我们表明，它在竞选运动中许下的愿并没有兑现。甚至连共产党人曾经给予支持过的某些社会民主党提案，政府也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和支持下拒绝了。在这个发展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利用社会民主党人来实现一些连资产阶级也不想使自己声誉遭到败坏的行动。正如1919年社会民主党政府签署凡尔赛和约一样，现在它又将奉行与法国接近的政策，而这项政策是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右翼政党不甚乐意实行的。可社会民主党政府将按照资产阶级的指示去完成这项任务。

不言而喻，以后斯特莱斯曼和米勒政府将肆无忌惮地加强一切反苏措施。

发展的第二阶段将非常短暂，它必然导致社会民主党联合政

策的破产。

正因为群众的压力不断增强，如果社会民主党不愿失去群众的话，它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如果它不执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对内对外政策，那么，资产阶级就会把它从联合阵营中赶出去。

由于无产阶级群众的压力，由于我们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长期工作，由于争取释放政治犯和要求大赦的运动的开展，社会民主党政府不得不从监狱和城堡中放出了无产阶级俘虏，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受到群众的压力，以及希望以此造成劳动人民的某些幻想。

我们的同志、革命者马克斯·格尔策（热烈鼓掌。）和所有其他无产阶级囚徒回到党的工作中来受到我们全体最热烈的欢迎。德国共产党保证尽一切力量使马尔吉斯等等这些还在监狱中受折磨的革命者都能够在最近的将来由于无产阶级在德共领导下施加压力的结果而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回到自己的阶级弟兄的身旁。（热烈鼓掌。）

简短地谈几点关于经济斗争的情况。席卷德国的经济斗争浪潮，无论是客观形势，无论是资产阶级政策，无论是社会民主党在政府中的活动，都不能使其平息，相反地，在最近几个月中它将更加汹涌澎湃。由于实行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方法而加剧了物价上涨、工资下降，以及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今冬失业人数必将增多，——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在最近几个月内德国可望出现大规模的经济斗争。

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把日常的要求同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斗争、同建立工农政府的口号联系起来。我们现在为破坏仲裁

制度而进行的经济斗争，由于部分工会机关和工会官僚同国家机关勾结在一起，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政治性质。随着资本主义倾向的增长，一切经济斗争的政治性质将比最近几年更为强烈。所以必须使党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斗争和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同时，在所有日常问题和日常任务上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作为一支真正能捍卫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唯一力量更有力地、更积极地行动起来。

同社会民主党联合政策作斗争的问题是包括许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策略问题是最最复杂的。这一斗争的重点是：第一，当前将为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而进行经济斗争；第二，为反对政府的税收政策而进行坚决有力的斗争；第三，为反对社会政策的日益恶化和为德国所有劳动者争取改善这一政策而斗争。我们应当把所有这些问题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危险性的斗争联系起来。

在党内讨论这些策略问题时，出现了策略上的某些差异和分歧。在这方面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企业 and 工会内为争取实现日常要求而组织斗争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党对群众的领导是不力的。我们的提案中应当包括对群众、对企业和工会工作的指示内容。

工会官僚们对我们以企业为出发点提出的要求将不得不采取一定的立场。工会官僚们会用仲裁手段试图扼杀一切斗争；我们能用以唤起工人阶级斗争愿望的方法，不是提出“迫使工会官僚进行斗争”的口号，而是提出我们自己的要求，并把这些要求提交企业，从而迫使工会官僚必须对这些要求表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表现出，唯有我们是真正捍卫无产阶级利益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径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除了这些策略上的困难以外，还要加上国内政治上的困难和党内困难：在改良主义面前实行总退

却，机会主义的危险逐渐增多，甚至出现某种背叛情况，在另一些情况下则表现为赞同改良主义的工会政策。在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我们的同志就曾经赞同社会民主党关于谴责共产党刊物对社会民主党所持态度的决议。这是我能举出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在工厂工人工会联合会大会主席团的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

“总的说来，同各级工会组织和共产党人的磨擦极其令人可喜地减少了。不过，这不是共产党领导具有善良愿望的结果。共产党领导一如既往地对我们的工会同志和对地方工会组织及整个工会的策略竭力扩大他们的影响。他们没有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工会机制健康的征状。”

“我们认为值得赞扬我们的共产党同事，凡是在他们和我们一起在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加工资的斗争中担任负责工作时，一般说，他们的行动是支持我们的。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例外反而证实是合乎常规的。”

诚然，这些话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是它证明，在这个工会工作的同志们表现得不够积极，不够坚决。谈几点关于德国五金工人工会最近一次选举结果的情况。这次选举结果比1928年5月德国国会选举的结果差得多。这次结果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和工会内改良主义的活跃，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在当时情况下没有充分有力地支持经济斗争。（有人喊道：对！）无需怀疑，凡是反对派工作真正得力的地方，凡是更坚强捍卫我们的革命路线的地方，我们取得的成就都比在德国其他地区取得的要大得多。我们不应忘记，我们必须努力提高党支部工作的政治水平；在进行和准备罢工时，我们应当更清楚地显示出工会反对派工作中的革命路线；我们应当作为工人阶级有魄力的领导人更

坚决地行动起来，遗憾的是，在这以前行动是不坚决的。

某些德国同志把五金工人选举结果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归咎于没有提出过渡性口号。诚然，这些同志没有像右派集团那样提出监督生产的口号，但是他们想寻求其他的过渡性口号，而大家知道，这种口号在当时形势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对我们来说，过渡性口号只有在出现尖锐革命形势的时候才有可能作为行动口号而存在。如监督生产、建立苏维埃、武装无产阶级等等，都是我们用以区别于我们在那个时期所要提出的最终要求的过渡性口号。但是在目前形势下，要求把过渡性口号作为行动口号提出，那就是一种机会主义倾向。根据具体形势，党应当提出局部要求和采取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的策略。

我们还不得不指出在总的政策中的一些缺点和失误。例如，我们没有及时地觉察到在基尔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出现的改良主义方法上的最新转变，也没有与此相适应地改变我们自己的具体策略。除此以外（关于这一点在讨论党内状况时我还将谈到），必须在党内进行更有力的监督，努力使党在这方面的工作得到加强。尽管存在着这些缺点，但是德国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仍在不断增长。改良主义者的策略和他们在工会和一切群众组织中推行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分裂政策，就是我们取得成就的最好证明。

矛头指向共产党人的分裂政策还从来没有像最近几个月以来推行得这样猛烈：在共产党人影响下的各地工会小组大多被解散了。在莱比锡召开的工人体育协会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决定在体育运动组织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分裂活动，因为他们害怕，明年我们会在这个协会内取得多数。一些优秀的共产党人因此而被开除，数日后，柏林和哈勒的体育组织内也发生了分裂。

几周前，在法兰克福的全国自由主义者代表会议上同样采取了这样凶狠的策略。我不准备继续举例来说明了，当时一些优秀的共产党领导工作人员往往由于一篇文章，由于任何一个表面上的错误，由于在议会内的任何一次讲话，就被随随便便地赶出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鉴于竭力制造分裂的改良主义分子的这次进攻，我们应当动员无产阶级群众为争取在共产党领导下统一工人运动而行动起来，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工会组织的分裂。

不言而喻，随着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矛盾的增长，随着帝国主义力量的加强，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其反对革命运动的斗争中也将越来越肆无忌惮。德国就是这一政策的典型例子。

德国也在进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所主张的最大限度地加紧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政治局势的这种变化在党内产生一定的后果。现在我就这一问题谈谈党内冲突和对党内状况的分析。

在这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可以肯定下述情况，即德国共产党在最近3年来第一次能够高兴地宣布，极左的托洛茨基叛徒们已经彻底地、完全地失败了。（热烈鼓掌。）他们一部分变成了小资产阶级市民，一部分则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没有必要为他们多费口舌了。

德国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的压力、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策、企业主的进攻、企业内反对派工人和革命工人的被解雇、改良主义分子为分裂工会而发动的进攻，——所有这一切明白无误地证明，我们共产党的部分工作人员在向社会民主党交出阵地；部分原因是党内的教育不够，监督不力，缺乏坚定不移的精神。如果

这种倾向开始有理论为依据，去迎合改良主义，那么，这些现象对党来说是危险的。在布兰德勒同志的行动纲领中提出的监督生产的口号，其实质就在于此。遗憾的是，这个口号不仅是我们党内右派分子的理论；它还经常贯彻于我们日常政策的实践之中。

在我们的具体政策中还暴露出强烈的机会主义趋势和倾向。最近以来，这些现象表现在：对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左派”社会民主党抱有调和主义的情绪；向反动的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投降；迎合资本主义的仲裁；在一些市政机关内犯有极其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作为例证，我只要从为党的积极分子出版的机关刊物中引用两段话就够了。在莱比锡州工作人员的机关刊物《党的工作》上对台尔曼同志的文章进行了一次论战；有位作者写道：

“党应当向工人阶级声明，它准备支持社会民主党政府。党应当明确、具体地说，它要对政府提出哪些要求。”

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理论，它使我们想起党的领导在1923年来采用的理论。

在图林根的工作人员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关于左派社会民主党是这样写的：

“在东图林根，‘左派德国社会党’的论点要比‘抽象的共产主义观点’更得到这些地区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支持。不言而喻，我们应当将共产主义观点献给工人，但是‘左派’的论点则是唤起社会民主党工人和使他们投入到反对联合政策捍卫者这个运动中去的更好的出发点。”

总之，我们从这里首先看到的是要利用社会民主党内的分歧；凡是有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地方，我们就应当用“左派”的论点

去反对右派，而且我们不应当在我们的日常斗争中把“抽象的共产主义观点”提到首位。简直是乱七八糟！社会民主党越向右倾，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就越严重。

现在，危险是不是来自极左或“左”的方面呢？绝对不是！目前，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我们一向把极左分子看作是一种偏离共产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我们始终把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右的思想来斗争。我们曾经预言，他们将会转向社会民主党。不过，既然现在党内存在“左”的趋势和情绪，那么，只要统一战线策略运用得不够具体，极左思潮就可能表现出来。

但是，这已经不是1924年以来曾经存在过的那种重要的危险来源了。

在我们德国有一个老的社会民主党，有许多老的工作者，另一方面有一个只是在革命烈火中诞生的年轻的共产党。这个党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它经历了1923年的十月危机（这场危机没有特别费劲地就被消除了）和路特·费舍主持中央工作的时期；党成长了，并且更加成熟了。然而，尽管它成长了，目前在德国，产生上述危险的根源甚至比德共领导同志自己所预料的还要强大。因此，领导应当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创造条件，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渗入到我们党的队伍中来。党应当加强反右倾斗争。当然，我们党内的右派还只是一小撮，他们对党的群众没有真正的影响。但是，最近以来这群右派为反对党的政策而采取的行动已经带有宗派的性质。因此，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也有必要提醒一下关于铁的纪律、党章和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并得到一致通过的21项条件。在其中的第12条写道：

“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

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①

这一条在目前形势下具有现实意义，并且不仅对德国共产党，而且对共产国际其他支部来说都是如此。波兰共产党的状况在某些方面也是一个例子。值此战争危险性日益增长之际，波兰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波兰作为侵犯苏联的基地和出发点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派别倾向和派别集团表现得非常严重的波兰共产党内，必须使用一切手段努力恢复团结。在这里，即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当尽力量找到实现党的团结的方法。目前，只有资产阶级及同它在一起的社会民主党才会从波共的党内状况中得到好处。（鼓掌。）

在21项条件中写着，少数要无条件服从多数，议会党团、工会党团和报刊要服从中央委员会。在我们遇到很大困难和准备迎接重大事件的今天，21项条件中提出的要求尤为必要。不言而喻，有了21项条件，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当不再努力运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思想宣传手段去说服那些有偏离倾向的同志，使他们放弃错误的观点。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首要任务。但是，如果没有更多的保证来实现党的正确政策，那么，仅使用思想手段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广泛的党内民主。我们应当从上到下和自下而上地加强全党的集体工作。但是，纪律不应因此而放松，纪律应

^① 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24页。

当更要加强。

在第九次全会上，俄国和德国两个代表团就对待右倾危险分子的忍耐问题作出了共同的决定。存在着一种倾向——政治上与右倾划清界线，但同时以德共党内右的危险都估计不足。首先，这些同志低估了那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右倾思想体系的人的思想影响。他们没有看到，在目前条件下，改良主义正在加紧对我们党施加影响，右的思想不仅影响到工会、议会、群众组织中的部分工作人员，甚至影响到党的委员会。由于这种错误的政治评价，许多同志有时还反对采取必不可少的措施。州的某些领导同志往往冲淡和粉饰右倾集团的理论倾向和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错误的意义，尽管这些错误有时接近于对德国共产党和工人革命运动的背叛。我们代表团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对这一问题同样存在某些分歧。诚然，绝大多数同志表示反对对右倾危险分子持忍耐态度。俄国代表团还单独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补充提案，经征得俄国代表团的同意，我把这项补充提案宣读如下：

“德国共产党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大军中最优秀的队伍之一，与此同时它的对手则是在国内扎根很深、组织得极其出色的社会民主党，这就为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内部的右倾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因此，始终不渝地同右倾现象（如目前提出的生产监督的口号，对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的反对立场，对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妥协态度，等等）作斗争，坚决消除对这种倾向的调和主义思潮，同时吸收那些拥护红色工会国际和德共埃森代表大会决定的党的所有优秀分子参加党的负责工作，坚决奉行全党统一的方针，团结现有领导层的一切力量和加强集体领导，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就是当务之急”，等等。

德国代表团的多数人同意这项提案。根据这条路线，德共领导将继续奉行和深入实行埃森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统一全党的方针。同时，党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努力吸收新的无产阶级分子参加党的工作。不言而喻，我们不会对党的组织工作中和党实现其政治路线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缺点和疏忽视而不见。我们存在的问题主要还不是直接犯错误，而是疏忽。领导人和全党的自我批评，不论在上层，还是在基层，都没有充分开展。但是，我们不会让党内右派集团利用党的工作的任何弱点来达到他们的派性目的，即达到他们攻击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领导的目的。

我们把俄国代表团的提纲看作是我们在德国面临的任务的新的基础。我希望，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能支持我们的观点，从而帮助我们在德国共产党的发展中进一步取得胜利。

最后，我提请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和所有党务工作者特别认真地注意。在战争危险性日益增长的目前形势下，必须使所有国际支部，包括德国支部在内，充分有力地利用无产阶级青年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反军国主义传统去同帝国主义战争作斗争。（鼓掌。）青年们由于有毅力、有热情、有自我牺牲精神、有主动性，因此是最重要的革命因素之一，共产党应当依靠他们进行革命工作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生产过程中的社会重新组合越来越吸引妇女参加日常的政治工作。在同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进行的斗争中，我们同样应当吸收妇女参加，并把她们组织起来。共产党应当特别注意这方面工作，应当在妇女中加强革命工作和加强宣传鼓动。

还有一句话要敬告所有国际支部，其中也包括德国共产党。这次代表大会上谁都不会怀疑，我们正在迎接重大事件。谁也不知

道，帝国主义是不是会留给我们足够的时间，使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能够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召开。资本主义的稳定正遭到破坏。新的革命高涨时期日见成熟。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国际主义、全世界劳动者的革命团结、与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联盟。（鼓掌。）几年来，我们不得不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斗争。在这场严肃的斗争中，列宁主义在共产国际所有支部内始终是无可争议的胜利者。（鼓掌。）在这场严峻的斗争中，国际主义精神、对共产国际的绝对忠诚和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党——联共（布）党的坚定信念得到了巩固。（热烈鼓掌。）这种革命精神应当一如既往地支配我们，指导我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在共产国际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国际的领导下，革命毅力和对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者革命力量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必将保证我们获得胜利。（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斯佩克特（加拿大）：

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是对社会民主党人最清楚不过的回答。那些社会民主党人硬说什么，在我们和他们对资本主义稳定的理解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差别，整个实质仅在于我们不如他们真诚。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提纲草案中阐述的我们的观点不同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正如街垒的一方与另一方互相对立一样。在提纲草案中，我们指的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矛盾急剧激化时期的稳定，这些矛盾乃是资本主义为了达到稳定而采取的措施本身造成的结果。正是在稳定中包含着新的世界大战的前景，即在苏维埃祖国和资本主义敌对的包围之间为争夺统治权而斗争的前景。

群众左倾化向深入发展和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不断增长的前

景是与资本主义在所谓“新的工业或技术”革命、世界托拉斯化等等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有机发展的观念完全对立的。其实，这种观点就是希法亭、鲍威尔、麦克唐纳和他们在各个国家内的拥护者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反映出他们自身的愿望。由于采用这种理论，他们就不得不竭尽全力去证实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因而采取阶级合作政策，积极支持巩固资本主义和捍卫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一切趋势。于是他们支持生产合理化、蒙德主义、“工业稳定”；于是他们支持一切束缚工会运动手脚的措施；于是他们敌视苏联，同情国际联盟。

在向代表大会提交的纲领草案中写道，帝国主义正大大加剧世界经济生产力的增长与民族国家边界之间的矛盾。我们在布哈林同志提纲草案中所看到的这种对稳定的观点，是为整个共产国际，而不是为某一个国际支部所作的分析。这个分析也不是为世界的某半球而作的。

当然，美洲在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中现在起着与欧洲不同的作用。但是，美洲和欧洲——这是反映现代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同一幅世界全景的两个部分。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毫无疑问存在着某些趋势，我知道，在我们加拿大有些同志就暴露出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认为对稳定的这个分析总的来说不适用于北美洲的条件，尤其不适用于加拿大的情况。我们同志中有人也持有这种观点，但是把这种观点在群众中进行传播的，当然是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应当同这种观点进行坚决斗争。

例如，有人指出最近几年加拿大的生产力增长了。不错，我们发展了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仅最近一年中，资本集中的情况比许多年的总和还要多。加拿大工人的劳动强度不断增大。1927年最后

几个月工人就业的指数比 1921—1924 年时期勉强增长了 10%，而工业产量则增加了 50%。在产量大增长的同时，企业倒闭者增多，经常性失业人数增加。

加拿大的资产阶级依赖于农业和国际市场。欧洲是它的主要市场之一，因此，尽管不能说加拿大现在正经历着危机或者甚至出现停滞，或者出现某种萧条（这是使用美国同志谈到邻国状况时所用的术语），但加拿大的昌盛毕竟是很不稳定的。它的昌盛完全依赖于国际状况，这一点是实实在在可以感觉到的。加拿大的工业化更加重了这一情况，因为我国的资产阶级已开始作为竞争者出现在世界市场上。

加拿大生产机构的开工率还从来没有超过 75%。因此，即使在加拿大目前的昌盛时期，企业主也千方百计地反对工人提高工资的任何微小尝试，他们不是以直接反扑作为回答，就是把工人的要求转交调解庭处理。在目前时期，加拿大工人本来似乎能够轻而易举地争取到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而实际上在这方面与 1921—1924 年经济萧条时期相比，没有任何重大改善。我想不起最近期间有哪一次罢工是以工资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而结束的。相反地，我却想起诸如在温哥华、新斯科舍等地举行的一系列罢工，这是木材工人、矿工、建筑工人举行的罢工，其结果，有些是工人所得甚微，工资毫无增加，有些是工人的要求被企业主和工会官僚的共同压制所破坏。因此我认为，加拿大同志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他们应当依据布哈林同志的提纲，强调加拿大目前的繁荣完全是相对而言的，并且应当使工人们作好今后战斗的准备。

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未加入组织的工人发生骚动，另一方面是工人运动中的右翼力量正在加强，在这种情况

下,我觉得上述方针就尤为必要。加拿大工人党正处于一个发展的新阶段,确切点说,正处于衰退阶段。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像辛普森这样一些领袖都同意与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但是,目前情况表明,辛普森完全背叛了自己对统一战线的立场,并接受了英国工党典型的观点。他声明,现在与共产党人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却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们接近了。结果,辛普森在安大略省使工党造成分裂,现在他同独立工党一起在全国各地活动来组织全国性的社会民主党(他们把该党称为社会民主党还是独立工党,这并不重要)。在阿尔伯达省,他们正在制造分裂;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分裂已经发生;在魁北克省,一些共产党人被开除出党。共产党人在加拿大全国面临的问题是,对工人党应采取何种策略。辛普森制造的分裂无疑将会加强加拿大工会官僚对共产党人的诽谤中伤。

应当指出,独立工党目前在众议院有4名议员,在马尼托巴省立法机关和温尼伯市委员会也有代表。独立工党一贯反对建立加拿大工人党,并由于我们参加了该党而对该党不断进行破坏。加拿大独立工党的纲领对工人阶级是巨大的危险。这完全是社会民主党精心策划的实行叛卖的明确纲领。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为之辩护并在群众中广为传播的思想。乃是工人帝国主义的思想。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出席帝国工人代表会议的,有职工大会主席汤姆·莫尔、著名的工会官僚塔龙和独立工党的两名成员(两人都是加拿大议员),而且他们都同英国工党的帝国主义分子携手合作,当印度代表举行示威并离开会议厅时,加拿大的代表们却支持伦斯贝里和英国工党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对殖民地的立场。

加拿大独立工党的纲领是一个支持国际联盟和支持以所谓

“合作政府”这种隐蔽形式出现的联合政府，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独立工党领袖伍德斯沃特经常发表千篇一律的讲话，主张在加拿大现有条件下实行银行国有化），甚至不再像过去那样侈谈工人监督而直接支持国有化的纲领。所有这些就是加拿大独立工党的思想，总而言之，它鼓吹的是工业民主和“惠特利委员会”^①制度。

在工会工作中，我们党面临着存在两个工会中心的问题。一个中心是职工大会，这是从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组织；另一个中心是新成立的独立职工大会的中央机关。既然这次代表大会是在自我批评的精神下召开的，那么应当说，我们党未能完成支持这个新的工会中心的任务，总的说来，采取了一条在工会问题上不正确的路线，党落后于事态的发展。我们只是在不久前才开始确定以下述新任务为方向：不仅同意建立这个新中心的原则，不仅批评新中心的领袖们没有这样去做，而且认为我们自己有义务走到前面，着手解决把未加入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问题。

目前，在加拿大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组织未加入组织的工人的问题。加拿大工人的基本部分还没有组织起来，这部分未加入组织的工人对两个中心开展活动来说都是一支巨大的物质力量。只要问题涉及到北美洲，加拿大本国的美国劳联职工大会就与美国劳联的官僚们携手合作，而在涉及到大英帝国的问题上，职工大会则支持亲英国政府的“日内瓦”方针；在这两方面，职工大会都是反对左翼少数派和共产党人的。结果，共产党试图组织左翼的做法导致一些著名的工作人员被实际上开除出工会。美国劳工联合会在加拿大完全无力完成组织未加入组织的

^① 英国在战时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原编者注

工人的任务。而且,由于一系列新工业部门的发展,这些部门的工人又都是没有组织起来的,因此在加拿大,这个问题便更加尖锐了。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竭尽全力去巩固新的工会中心,以此来实现统一的口号。我们对加拿大工会统一的口号的理解迄今为止一直是非常抽象的。把整个问题归结为只是两个职工大会即加拿大工会运动两个中心合并这样一个含义狭窄的口号。我们过分相信通过某个职工大会会议作出正式决议的办法就能把工人联合起来。

现在根本谈不上加拿大职工大会将同意讨论关于与新的工会中心实行统一的决议的问题,因为新的工会中心所持的立场是保持加拿大工会运动的独立性。当然,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应当脱离旧的工会和脱离美国劳联的职工大会,不要认为,我们应当试图使任何一群希望参加新工会中心的极少数工人从他们本来的、还未准备参加新工会中心的组织中分裂出来。

然而,只有在我们能够改变这两个职工大会现有的力量对比,以及着手进行并真正把未加入组织的工人组织到新的职工大会的时候,工会的统一才会在加拿大彻底实现。统一战线运动应当从下面搞起,应当组织联合的统一委员会;应当确定统一的行动纲领,必须有联合理事会,——关于这些问题在美国劳联木工统一联谊会 and 独立木工联合会发生争斗期间,我们已经取得了少量经验。

由于我们面临着国际规模的战争危险,加拿大的右翼力量正日益增强,加拿大职工大会内部的反共运动不断加剧,承认这一事实是极其重要的。加拿大目前处在英美之间的位置上,而且这两个国家都在为争取把加拿大作为一旦发生战争时的战略基地而斗争着。加拿大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动员工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

苏联，既反对美帝国主义，也反对英帝国主义。独立工党正在加紧散布和平主义幻想，似乎工人们通过政府官方机关、委员会，采取支持国际联盟，实行强制性仲裁等等手段，就可以同战争危险性作斗争。加拿大共产党应当用“保卫苏联”和“国内战争”的革命口号来动员工人。我们应当利用加拿大的地理位置，促使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美国和参加这一运动的其他国家一起加入太平洋书记处。

还谈几句关于我们党内的情况。这个问题与我刚刚说的有密切的联系。很遗憾，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党总是跟不上加拿大各种事态的发展；我们被资本主义的稳定和昌盛弄得目眩神迷，以致我们低估了工人的战斗力，而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它压制工人运动的能力。

让我举几个例子。就拿保卫萨柯与樊塞蒂的运动来说吧。我知道，在共产国际最近一次全体会议上，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有机会对法国共产党进行了批评，因为法共低估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激情而在举行反对美国驻巴黎特种部队的示威游行问题上退却了。我认为，我们存在着低估工人士气和他们的斗争准备程度的危险性，因为我们过分陷入了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刻板观念，忘却了群众斗争。在加拿大，共产党无疑地低估了这场运动在工人群众中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党中央因为没有得到来自中心的指示，未敢组织总罢工或宣布24小时罢工，以致有一天早晨突然读到有5000名采煤工人在新斯科舍省为保卫萨柯与樊塞蒂而举行罢工的消息时便大吃一惊。罢工是由几个有战斗精神的工人临时发动的，我们党与此毫不相干。

毫无疑问，我们低估了这些工人要求斗争的意愿。再举另一个例子，就以霍林格公司的矿井发生的惨祸来说。许多年来，安大略

省北部的矿工很难组织起来。我们根本无法获得工人的响应和向他们阐述组织起来的意义。但是，突然矿井发生了爆炸，于是全体工人都行动起来，反对霍林格公司所属企业的制度。我们碰上了一个开展组织工作的绝好机会。但是，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因为党没有迅速地对此事作出反应。我们太迟钝了，因为我们低估了工人要求斗争的潜在决心。可是，当党对情况迅速而灵活地作出反应并立即着手把未加入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时候，例如在新斯科舍省，在温哥华岛，或者如着手组织阿尔伯达省的采煤工人工会、组织木材工人工会，总之，不管在加拿大什么地方着手组织未加入组织的工人的时候，在那些地方都是由于加拿大共产党开展活动而取得的成果。

共产国际应当给我们以比迄今为止更多的帮助，这将在加拿大目前情况下共产国际所提供的最好服务。像我们这样的小党往往处于孤儿般的状态。我们同共产国际有联系，但是我觉得，完全有必要请共产国际在比迄今为止更大的程度上直接干预加拿大共产党的工作。我们面临着我们时代最大的任务——战争危险问题等等。可是，我们党甚至还没有作好在一旦发生战争危机时设立秘密机构的准备。

同志们，最后我想指出，我向你们描绘了加拿大形势的这样一幅情景，并不是因为我对形势悲观，而是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次代表大会是在自我批评的精神下召开的。所有来到这里并参加讨论的同志都应当谈谈各自党的弱点和缺点。布哈林同志在他的提纲中未能给加拿大留一个位置，因为加拿大所处的形势就其重要性来说，是不可能同诸如德国、法国、美国之类的国家所处的形势相提并论的。

希塔罗夫(青年共产国际)：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托我声明，我们完全支持共产国际以往的路线和布哈林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提纲。你们知道，青年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一贯是共产国际最可靠的支柱之一。我们希望，将来仍然能光荣地起到我们的作用。常常有人责备我们，——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听到了这种责备，——说我们青年共产国际、青年团“过多地从事政治”。我们认为，从以下两个原因来说，这种责备是毫无根据的和绝对错误的：第一，同志们，要知道在评价青年运动的作用和任务方面，我们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人之处恰恰在于我们除了用政治和通过政治来教育青年进行阶级斗争以外，不可能考虑使用其他方法。我们坚决反对使青年脱离政治。我们根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队伍中存在这种思想。第二个原因是，任何人都应当清楚，青年共产国际由于这些年进行的革命工作，在各自国家内已经成长为党的一个巨大的政治因素。无论是整个青年共产国际，还是它的个别支部，都在共产国际和自己党的工作中起着杰出的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应当容许限制我们的政治活动。诚然，有时我们共青团往往过多地从事党的政治，而且是从狭义的理解，也就是说从不正确的理解角度去从事党的政治。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就以波兰和美国来说。你们都熟悉波兰事件。你们知道，在那里共青团也被卷进了激烈的党内派别斗争，而且党中央在这场派别斗争中已经发展到解散了共青团中央的程度。我们认为，在那里党内斗争过分强烈地渗入到共青团内。我们曾多次警告我们波兰共青团的同志，说他们在那里站到某派的一边去了。不过应当说，共青团被卷入党内派别斗争所带来的危害并没有妨碍我们波兰共青团进行广泛的革命群众工作。美国的情况则略有不同。我

们的美国同志也许会不满意,但是我应当坦率地说,我们认为,我们的美国共青团过多地注意党的问题。党员在共青团内的百分比很大,这种情况已经不够健康了。一半以上的共青团员是党员。党内的整个派别斗争转到了共青团内,这对我们的青年运动是非常有害的。这使共青团没有充分的可能去完成纯属共青团的任务。但是,我们决不是说,它根本没有这样去做。近几年,它越来越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基本任务,即完成在青年无产者中的工作。不过,以上我指出的两个例子都是用以说明我们共青团从狭义理解因而也是从有害的理解角度从事党的政治的事例。但是,也还有其他例子。我只想提一下中国和法国。众所周知,我们共青团在这两个国家中起着多么大的作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决不会有谁去争论,对我们这两个共青团来说,当时坚决地和直接地干预党的工作和党的政治是必要的,也是适当的。同志们,对我们来说,这些问题已提到首位,我说的是关于党和革命的兴旺、灾难、生命和未来。既然党的盛衰和存亡在这两个国家已处于决定关头,既然革命的命运特别是在中国已处于关键时刻,那么我们完全持这样的观点,即共青团应当首先地和主要地解决这些问题——直接从事党的工作。

我们有时还会遭到责难,说我们要教训党,说我们要改正党的错误和扮演导师的角色。同志们,这是不确实的。我们不想去教导党,而且我们根本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要知道,我们有时也跟着党重犯党的错误。这种情况在一系列国家都曾发生过,我们同党一起犯了许多错误。但是,绝对无可争辩的是,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能更快地避免犯这些错误。当它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它们通常都能更快地、更坚决地予以克服,并避免再犯错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共青团的成员没有受到社会民主党旧传统的影响,而

这种旧传统对我们某些党的影响却仍然很大。如果我们列举共产国际中各个党或者部分党偏离正确路线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党内发生这种情况要比团内为多。这是一个可以用统计方法确定的事实,也是我们不应忽略的事实。我们在这里肯定这个事实的目的,不是为了自我吹嘘,而只是为了再一次指出,我们认为我们共青团从事重大的政治问题仍然是必要的。

在共产国际中存在着一些不妨一看的偏僻角落,而共产国际本身往往没有机会及时地看一下所有这些角落。于是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青年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率先做了这项工作,只是在那以后,共产国际才着手研究青年共产国际提出的问题,并继续加以发展。我举一个例子,即希腊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共产国际正在非常详细地、认真地研究希腊问题。今后我们仍将这样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也绝不会忘记说,还有些问题我们想要提出,我们想请代表大会给予重视。

例如奥地利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不想谈这个问题的实质,但是我想表明我们的看法。我们确信,如果共产国际不注意奥地利兄弟党内发生的事情,如果它不帮助该党弄清党内的是非,那么奥地利将面临危险,它在与庞大有力的社会民主党的对抗中将会日益削弱以致被彻底消灭。

另一个问题涉及到捷克斯洛伐克。当然,捷克斯洛伐克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捷克问题也并非小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报告人在发言中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求共产国际更加认真地讨论它呢?我们认为,红色节事件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党的工作中的一次重大失败,出现了困难的局势,按照我们的看法,共产国际对这种局势作出的反应不够强烈,不够

认真。一个大党的重大行动遭到如此惨败，无疑地值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给予更大的重视。我只能完全同意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共青团代表赫尔舍利同志所说的。我们只想提一个问题：如果情况发展为真正重大的事件，如果我们真正被卷入我们正在面临的战争之中，那么这样的党在那个时候能够作出什么反应呢？它又怎样能完成共产国际的指示，响应国际无产阶级发出的号召呢？如果在那边发笑的同志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么我感到非常遗憾，对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可好笑的。我们指出一个非常重大的危险性，即在一旦发生战争时，该党就可能会屈服。

我们青年共产国际首先肩负着在资产阶级军队中进行艰苦工作的重担，必须开展反军国主义的工作，因此我们说，我们有权要求各个党具有战斗力和活动能力，要求它们能回击反动派的打击，要求它们在重大情况下不会像捷克斯洛伐克在红色节事件中那样处于不利的局势。

同志们，因此我们不能允许剥夺我们谈论党的某些问题、发表我们的意见和以这种精神教育我们共青团的权利。因为这是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运动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

青年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得非常详尽。这是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如此认真、如此详细研究青年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我们高兴地确认这个事实，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是什么原因使共产国际及其各党对青年问题提高了兴趣呢？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各党逐渐地学会了正确评价共青团的作用、意义及其工作。现在我们能够说，青年共产国际已经可以说是为自己牢固地获得了共产国际经常给予关注的地位，并且在这个位置上并非无所作为。这一点是每个人都承认的。

以上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战争危险日益增长，企业实行生产合理化引起生产部门和工人阶级内部青年的比重增大，由于资产阶级为了在意识形态上争夺青年而频频发动进攻，因此青年工作问题便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只要指出法西斯意大利和其他法西斯国家就够清楚的了。只要看看法西斯为了使青年接受其影响作出了多大的努力也就够清楚的了。法西斯分子很懂得，未来的斗争将由这些青年来解决，对法西斯分子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共产国际应当日益重视研究青年问题，要比过去更加有力得多地支持共青团。

这次代表大会应当给即将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提出一条指导性路线，它应当向我们作重要指示，我们将根据这些指示来召开我们的代表大会。

现在，如果主席允许，我再谈几句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状况。我们是不是满意青年共产国际的状况呢？不，不满意。在这里我们应当明确地、坦率地这样说。如果某些同志不仅在想，而且说我们似乎不太重视自我批评，似乎自我批评在青年共产国际中未占有应有的位置。这是不对的。我们批评我们的缺点，其严厉程度不比党内批评差，也许还更严厉些。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过失，在许勒同志的讲话中非常清楚地说明我们运动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在哪里。这些错误和缺点不在于我们似乎“过多地从事政治”，而在于我们还没有学会使政治为青年所理解，使政治适合于青年，并根据青年的特点和以更容易为青年所理解的形式去进行政治工作。我们还不会根据政治形势发展和党的策略引导广大青年群众投入日常的斗争。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削弱我们的政治意识和我们的政治工作，而是相反地，在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共青团的行动中去加强和扩

大它。我们应当通过这种途径来努力改善我们的方法，为此我们想召开我们的代表大会。我们将按照这种精神讨论关于工作方法、工作错误和疏忽的问题。我们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保证，我们将以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精神召开我们的代表大会，我们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将严厉地、明确地指出我们工作中的弱点，我们将竭尽全力在今后克服这些弱点，我们将在那些老的方法不能完全奏效和我们也许采取了错误途径的地方，努力寻找新的途径和新的更好的工作方法。

我们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保证做到这一点并请求它给我们作出关于我们如何召开代表大会的重要指示。我们深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我们必能比过去更好地解决我们今后的任务，我们必能成为全世界工农青年的真正群众性组织。我们要对共产国际说，如果它率领自己的队伍投入决战，那么它将看到青年共产国际冲在最前面。

曼纳(芬兰)：

我想根据我们芬兰的经验谈 3 个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是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和某些同志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已经提到过的。

第一个问题是，在建立了白色政权，更确切地说是在建立了法西斯政权的我们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是怎样变成这个政权的组成部分和得力部分的，这个白色的社会民主党又是怎样玩弄左的词藻，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法西斯本质的。

10 年前工人革命失败以后，在 3 万名被打死的工人尸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在的芬兰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骨干，从恐怖政权刚一成立之日起，就已经成为这个政权理所当然公认的和经常使用的武器。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工业无产阶级、农村的

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居民聚集在自己周围，并教育他们效忠和服从白色政权。

社会民主党着手实现这项任务，为此而使用了两种方法：

1. 它宣布，它要为遭受反革命迫害的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在刚革命以后不久的时期，有时可能会觉得情况真是这样。诚然，它也宣布过，它同样要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其方法似乎是仅限于使用思想武器。有时候，它甚至建议政府在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不要采取暴力措施。

2. 但是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又在自己的刊物上向政治警察告发革命阵营中自己的对手。

社会民主党用这种两面派策略力图把群众吸引到自己这边，并以此恐吓他们，迫使他们紧跟社会民主党走。但是这种策略未能特别奏效。工业无产阶级群众越来越离开了社会民主党。在农民劳动群众中同样出现了可以证明社会民主党对他们的影响日益削弱的趋势。社会民主党人的主子——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便越来越多地用责备和嘲笑的方法去唆使他们为自己卖力。

于是社会民主党的行动开始具有新的性质。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成为无用的武器而被抛弃了。社会民主党哪怕只是为了做做样子而采取行动来保卫被迫害革命者的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少了。社会民主党承认对“犯罪的”共产党人的迫害是合法的和可以允许的。社会民主党刊物及其政治代表人物越来越经常地为政治警察效劳，向他们告发革命者的活动。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从未采取任何步骤去同政府措施以及同解散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和两个革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行动作斗争。

这样一来，芬兰社会民主党就彻底地从白色政权的隐蔽的拥

护者演变成为这个政权完全公开的捍卫者了。

这个时期的芬兰社会民主党干了以下的一系列卑鄙勾当。

在资产阶级司法部门的帮助下，它强占了人民的工人之家；它用强制手段夺取了工人体育协会的领导权，干脆把根据章程完全合法选举出来的 50 名左翼代表的当选证书宣布作废。由于工会联合会不管社会民主党玩弄什么策略仍然能保持统一，而且其中多数持有阶级斗争观点，芬兰社会民主党便不断要求政治警察注意工会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它还利用刊物帮助资产阶级搜罗工贼，有时则提供这种败类；总之，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成了政治警察的喉舌。

1927 年，社会民主党组成了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人政府，这是它作为一个替白色政权效劳的政党积极活动最为得势的一年。政府的产生，其部分原因是资产阶级本身阵营内发生分歧，另一部分原因是工人运动在当时正经历高潮阶段。但是最有可能的是，英国帝国主义劝告把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因为这个党是英国反苏政策的最可靠的支柱。

从便于研究社会民主党演变的角度来说，这个时期是最典型的。1926 年社会民主党还曾经宣称，它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并且拒绝投票赞成从国家预算中给警察拨款。1927 年，社会民主党政府却提出国家概算草案，其中规定给政治警察拨款 300 万马克。有个时期，社会民主党曾经宣布同扩大军备作斗争，但是一成为执政党后，它就决定建造第一批 3 艘潜艇。1926 年，它还声明，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应当继续有效，而 1927 年它却允许部分地废除这项法令，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自己就是提出这项措施的发起人。以往它表示要同法西斯的警卫队作斗争，而 1927 年它却从国

库中给这些队伍发放了津贴。从前它赞成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但在执政期间，它拒绝就互不侵犯条约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以前它有时还建议资产阶级不要对共产党人采取暴力措施，可是成为执政党之后，它就下令逮捕了 100 多名革命无产者，并把其中大部分人投入监狱服苦役。在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一职的社会民主党主席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社会民主党政府为围剿共产党人和革命无产者不断准备条件，结果，已有 47 名革命者被送交司法部门受审。社会民主党为了证明自己对芬兰大资本和英国帝国主义的忠诚，按照英国金融资本的要求，使大规模掠夺芬兰东部数百农民的土地和森林的行为成为合法化了。

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是白色政权和英国帝国主义的公开的帮凶和极其得力的助手，它竭力为它们巩固阵地。芬兰的一位“自由主义者”教授、前总理文诺拉在一次记者采访时承认，社会民主党在执政期间加强了白色芬兰在国际经济界和帝国主义列强中的政治地位和经济信用。芬兰一家主要的资产阶级经济机关刊物《市场》杂志在去年的 12 月一期上写道：

“当芬兰在这些日子里庆祝国家独立 10 周年的时候，总结一下过去的 10 年，就可以看到，总的说来，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结果都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人们通常把我国整整 1 年来由社会民主党政府执政这一事实作为社会和政治迅速巩固的证明。它作为一个少数派政府，只能具有以它那种学究思想的精神来施加影响的有限能力。虽然这个政府由于当时存在的议会条件，主要是因为国会否决了它的关于降低粮食税的提案而垮台了，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不承认在该党执政期间这个政府所表现出的那种温和精神，那种善于考虑到现有政治矛盾的才能。不言而喻，我们的

社会民主党是基于自己的专门利益，按照一定的社会主义原则而行动的，但是它做这件事时采取了忠诚的、议会的方式。然而，与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敌人时的 1918 年相比，该有多么大的差别啊！”

法西斯分子的领袖顿纳公开承认，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重大的、可喜的变化”，他表示希望法西斯组织今后会得到社会民主党的直接支持。

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任务，一方面是限制工人革命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阻止广大群众的左倾化。社会民主党在完成这项任务方面未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很快它就不得不实行自己政府的政策而彻底暴露了自己。社会民主党政府商业部长古普利承认，社会民主党在执政的这段时期授人以柄，使共产党人掌握了可用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极其有力的武器。确实如此，我们手中掌握着这种武器。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芬兰群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认清了社会民主党的本来面目。现在，工人群众将不难想象，这个社会民主党必将伙同装备有各种杀人技术兵器的法西斯将军们一起反对工人阶级，因此无产阶级不会感到措手不及。在执政时期结束时，社会民主党政府前部长唐纳在他的讲话中说：

“过去有人认为，开明的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这也许是对的，如果确实是由一个开明的和有远见的人来执掌政权的话。”

这听起来几乎像是某个未来的墨索里尼在讲话。

部分群众，特别是工业无产阶级中的部分群众纷纷离开社会民主党，这是不难理解的。在执政期间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在数以百计的工人大会上，对政府进行了批评。这在社会民主党阵营内引起了巨大的不安。该党明智的先生们觉察到，

他们已经过分地暴露了自己。必须运用新的方法来挽救局势。人人都清楚，群众的批评和他们对社会民主党政府策略作出的反应造成了政府的垮台。于是前任部长先生们互相指责对方使社会民主党暴露了真实面目。左的词藻立即重新出笼。从去年底起，也就是从社会民主党垮台之日起，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就试图使我们相信，这些法西斯代理人，即我们称之为后备法西斯分子的这些人，不仅要“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而且甚至还在谈论夺取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批评”目前的资产阶级农民政府实行迫害共产党人的政策，他们写道，内阁社会主义“对于较长时间来说已表明是不适合的”。

他们仿效英国，展开了争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是不是可以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不言而喻，凡此种种纯属欺骗。所有这些讲话的目的依然是为了隐瞒社会民主党及其反动头目的白卫分子和法西斯分子性质，从而防止尚留在他们阵营内的群众继续离去。

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左的词藻和欺骗手法是目前芬兰社会民主党的特点之一。我们认为，揭露社会民主党这种玩弄词藻的行径，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我们还要补充说，如果在其他国家也有这种现象，那么共产国际在确定各党的任务时应当考虑到这种情况。

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所以在革命队伍中产生了某些糊涂思想和动摇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以下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有些同志认为，既然说社会民主党政府具有资产阶级性质，那么就没有必要采取任何特殊措施去揭露它，因为对每个人来说，即使不这样做也很清楚，资产阶级政府是资产阶级

性质的。这种观点产生了消极态度。另一些同志认为，社会民主党政府毕竟比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府要好些，因此不应批评它，使它难以工作。第一种观点形成了极左倾向，第二种观点发展成右倾，这两种倾向的结果都是以某种形式支持社会民主党政府。除此以外，还存在着第三种倾向，这种倾向的代表者指出了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有发生法西斯叛乱的可能性。这些同志想集中一切力量同预计的法西斯叛乱作斗争，而不是同社会民主党政府斗争。这些同志没有考虑到，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法西斯的预备队，这支预备队现在已经被调到前沿阵地。这些错误的倾向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头几周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在合法的革命运动内尤为明显。至于我们党，它从一开始便对这种危险性提出了警告，并对社会民主党政府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党自己的工作使这些倾向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影响到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斗争。

我在这里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工会团结代表会议。黑克尔特同志在这里曾经说道：

“特别要避免发生我们的挪威同志和芬兰同志所犯的错误，这些同志竟然接受了中央党人关于不应批准哥本哈根协议，即芬兰、挪威、俄国三国条约的劝告，因为他们在中央党和特兰梅尔的影响下仍然认为有必要向阿姆斯特丹工会领袖们建议，同他们一起建立广泛的工人大联合，当然，那是要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

关于这个问题必须说几句。芬兰代表团认为，黑克尔特同志在某些方面搞错了。不言而喻，改良主义分子曾竭尽一切力量要使哥本哈根决定成为一纸空文。不言而喻，中央党人表现出动摇。但这是它本身的事情。事实终归是事实，芬兰工会联合会还没有批准哥本哈根条约。但是，如果说似乎芬兰同志是由于黑克尔特同志所说

的那些动机而拒绝批准的,那就不对了。当然,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挪威共产党人。说芬兰共产党人和革命党人对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存在着那种像黑克尔特同志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想法,那就不对了。至于芬兰工会联合会未批准哥本哈根协议的问题,在分析事实时必须考虑下列情况。

那次代表会议的准备和进行是非常仓促的,以致工会有组织的群众未能及时动员起来,也未能充分掌握情况。社会民主党则在召开代表会议之前就开始广泛活动,以分裂进行威胁,这种活动到代表会议结束后仍在继续进行。1926年在芬兰还有可能主要依靠广泛的群众运动击退这种分裂工会运动的威胁。这一次我们不能不承认,确实被迫作了某些让步。但是,不论共产国际,还是红色工会国际,在这个问题上都未对芬兰共产党人作任何指责。参加芬兰工会运动和一贯遵循阶级观点的同志们,不打算给社会民主党提供方便的借口,使它得以利用法西斯民警和保安队来袭击工会运动;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我们党所赞同的。要知道必须考虑到,假如荷兰的工会运动发生分裂,那么工会运动革命分子进行工作的机会就要大大缩小,而社会民主党则将在工会运动中取得垄断地位。目前,社会民主党就没有取得这种局面,因为大多数工会会员都在向左转。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明显的是,有阶级觉悟的进步分子,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在大力工作,为实现哥本哈根决议中规定的目标而斗争。像改良主义分子和中央党人自己不得不承认的那样,由于 $\frac{2}{3}$ 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都拥护哥本哈根决议,上述目标就更可以实现了。现在必须动员工会群众,并把社会民主党工人也争取到支持哥本哈根决议的这一边来,使法西斯社会民主党领袖无法或者难以搞分裂活动。这项动员工作正在进行,这些问

题已交群众讨论，正在作出捍卫哥本哈根代表会议的决定。

至于挪威和芬兰的工会联合会关于呼吁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联合召开代表会议的建议，这是符合哥本哈根代表会议的决定。苏联工会的中央组织也同意采取这一步骤，不过认为必须发表自己的声明。芬兰人认为，哥本哈根决议在芬兰至少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即揭露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是工会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实现国际统一的敌人。如果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作出否定的回答，那就可以帮助社会民主党人懂得，在这个问题上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政策同工人阶级的利益存在着多么深刻的分歧。假如所有的党当时在国际范围内集中自己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揭露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那么，也许获得的成果会更大。无需怀疑，芬兰同志对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过去并未抱有任何幻想，现在也不存在这种幻想。对挪威同志来说，大概也是如此。

现在谈最后一个问题，即关于前景问题。芬兰代表团肯定地说，芬兰工人阶级左倾化的过程正在顺利地向前发展。顺便说一下，1927年的选举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工会会员的人数在近两年里增长了50%。在这个期间，罢工浪潮连绵不断。各次罢工均以工人获得全胜或局部胜利而告终。工人的积极性无论在抗议逮捕的运动中，还是在示威性的罢工中都表现了出来。在农村，工人和贫苦农民越来越聚集在革命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周围。我们党的影响增大了。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约有50名同志面对资产阶级司法机关的审讯，其中一些优秀分子英勇地捍卫共产主义事业，在被带出法庭时每次都高呼：“共产国际、芬兰共产党和世界革命万岁！”资产阶级报刊不得不为共产主义作宣传，因为这些报刊不能避而不谈我们同志在法庭上的英勇行为（顺便提一下，这是为了保卫瑞

典少数民族)。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白色政权的进攻越来越凶狠了。社会民主党是白色集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再考虑到,资本主义稳定的过程越来越显示出接近结束的征兆,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新的矛盾,那么就很清楚,在芬兰我们也正面临着大规模的日益激烈的群众性战斗和以革命方式来解决这些矛盾的前景。

会议休会。

第十二次会议

(1928年7月27日)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莱姆利(英国):

受英国党的委托,我想向大会谈谈英国党的某些经验。我们认为,其他国家的兄弟党可以从我们的经验中吸取宝贵的教训。

综观最近两三年内,特别是总罢工以来英国的事态,我们可以说,当前在那里发生的那场伟大斗争,乃是以共产党为一方向以工党和工联主义运动的改良主义领袖为另一方,为争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在总罢工前,工党和职工大会领袖的主要论据是,英国工人对于立宪制,即“议会制”似乎笃信不移。然而总罢工的经验却证明,英国工人阶级同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样富有战斗力,一样坚决果断,一样愿意投身于斗争。它还证明,改良主义领袖们甚至在拥有一支像英国工人这样的工人战斗大军的情况下也不愿进行斗争。

这个时期是英国工人运动的转折点。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我们看到改良主义领袖们在利用一切机会阻止英国工人阶级参加斗争,而不是去帮助它进行斗争。他们帮助、配合和千方百计地促使英国资本家阶级实行反对工会的法案。这一法案表明,资本家们已

经懂得了总罢工的全部意义，并决心不让它再次发生。工党领袖们在总罢工期间举手投降，并且说，“再也不干了”。他们还叫嚷说，罢工是违背宪法的，社会应当保护自己，如此等等。正是这些头头们后来看到，在议会讨论工会法案时，他们自己提出的论据被人用来反对他们自己。资本家和鲍尔温政府利用这些论据来证明：对于社会来说，重要的是要使工会永远失去团结英国工人群众为反对资本而斗争的可能。

1927年9月召开的工联代表大会采取了进一步束缚英国工人手部的步骤。在会上，所谓左翼分子之一的希克斯作为大会主席在致词时邀请英国的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和工业家参加联席会议。蒙德^①以及其他一些企业家对这一邀请作出了响应。结果，便召开了有名的“蒙德”会议，目的是讨论保持英国工业稳定的问题。

在会上，所有改良主义领袖再一次倒向资本家阶级一边。他们公开抛出诸如工人和企业主利益一致，不存在阶级斗争这种东西等观点，并采取种种措施把工会变成资产阶级国家的附属物用以反对工人阶级。然而，正当这些论调甚嚣尘上之时，资本家却采用了最残酷的阶级斗争手段来攻击工人。我可以从亲身经历中举出一些具体例子。例如，在德尔赫姆煤矿区，资本家把工人赶出企业门外，逼迫工人同意进一步削减工资，许多矿工村还发生了工人被赶离住宅的事。而改良主义头头们还在继续散布保持工业稳定的说教。所有这些措施是相互关联的，是为了制服工人所必需的，它们为资本家改造英国工业和实行合理化创造了必需的条件。

① 阿弗里德·蒙德是化学工业托拉斯的首领，提倡工业合理化和保持工业稳定的重要人物。根据工联代表大会所提的建议，召开了蒙德领导下的一批有势力资本家和总理事会代表之间的会议，目的是制定工业稳定的基本原则。

与此同时，我们也是英国工人阶级逐渐觉醒的见证人。矿工们准备现在就抵制对矿工接连受挫负有责任的立宪民主派领袖的政治路线和建议在德尔赫姆区，改良主义头头们利用工会运动建立工贼组织，用以对付那些反对根据普伦德决议^①大幅度降低工资的矿工。由于这个原因，爆发了一系列非正式罢工。矿工们信赖地让共产党领导这些罢工。

表明形势变化程度的另一个例子是，从1926年开始，自爆发总罢工时候起，职工大会和工党的领袖们同资本家建立了统一阵线，他们加紧勾结掀起诽谤共产党的运动。我们还看到，在不久前召开的矿工代表会议上没有讨论关于如何帮助矿工收回过去所作的某些让步和如何帮助他们准备对矿主进行有组织的反击的问题。可是，改良主义头头们却决心不惜一切力量，采取除名和剥夺工会权利等手段向共产党人和左翼运动的拥护者进行明目张胆的攻击。但这一点恰好可以证明，英国共产党尽管人数不多，但因在工会内进行了顽强的工作，仍然享有很高的威望。正是依靠这一点才使工人们在斗争尖锐的时刻，违拗反动的改良主义头头而拥护我们的口号并信任我们的领导。在这种条件下，改良主义分子的反抗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为此而利用一切工具，并采取一切欺骗手段，希图击败共产党，使它威信扫地。但是我们一方拥有这样一种优势，即工人的革命性日益增强。他们开始理解到“工业稳定”和阶级合作政策的实质。世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迫使英国资本家不间断地向英国工人阶级发动进攻。工人不能不作出不懈的抵抗以回击这些进攻。而改良主义头头们不想带领工人群众投入

^① 以普伦德为主席的仲裁法庭所作的关于德尔赫姆矿工工资的决议。

战斗，这就促使工人日益靠拢共产党和追随它在工会内的领导。英国共产党将率领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党员应该了解在英国工人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实质。英国工人一向受的教育是使自己的行动服从于宪法。我们在英国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地利用改良主义运动。我们利用这一运动，只能是为了使群众和我们在一起，为了和群众建立联系。最后，我们的任务还在于赢得对群众的领导权。工会运动内部也好，工党内部也好，哪里有群众，哪里就应该有我们。我们的使命是引导群众，使之直接面对反对群众的机构。

群众根据亲身经历必将懂得，他们应该撇开这个蛊惑人心的改良主义机构去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斗争。那时，他们将认识到，我们现在指出必须采取特殊方法，进行非正式罢工，例如德尔赫姆矿工反对普伦德决议的罢工等等的做法是正确的。通过这种途径，共产党就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在英国工人群众中赢得比以往更高的威信。

英国共产党通过这种途径，执行新的政治路线，就定能使自己发展成人数众多的政党。

我们看到，英国工人继续向左靠拢，而他们的改良主义头头们却越来越右倾。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一国范围之内，而且出现在国际上。改良主义领袖们准备为英国帝国主义助一臂之力的地点不仅有中国，而且有英国帝国本身所属各部分。英国工党就曾从自己的党团中派出两名成员到下议院，以便参加西门委员会^①的合作。其中一名就是矿工区选进议会的代表，而且矿工选民们对他投了

^① 为了调查 1919 年实行各项“改革”的成效而派往印度的一个委员会。

不信任票。

手中掌握有机构的英国改良主义分子准备采取一切手腕，甘冒任何风险，为的只是不让普通工人群众的真正情绪暴露出来。

我们在英国所面临的困难是十分巨大的。我们不得不同最老的而且最有经验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英国资本家极其狡诈多谋。他们支持工会领袖和工党领袖同共产党进行斗争。而且，一旦工人阶级认识到议会制对自己毫无用处，他们随时就会把议会制这套把戏全部抛进垃圾箱。其实，英国资本家准备现在就改行法西斯制度，在这方面他们得到了改良主义分子的支持。就以诺丁汉郡的“斯宾塞主义”^①为例来说吧，这是地道的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戴上了一副特殊面具罢了。

我们还看到，在南威尔士，工会的改良主义头头们现在正利用矿工的不满情绪来建立同南威尔士矿主的统一阵线，以达到使铁路员工工作条件恶化的目的。

虽然这些例子只具有地方意义，但也不应忽视。鉴于上述种种现象和这种特殊的形势，英国共产党拥护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制定的新的政治路线。我们人数虽不多，但我们愿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顽强地同改良主义领导层作斗争。我们准备公开地同他们进行斗争，同时我们认为，统一战线的口号应当作为共产党的武器之一保留下来。我们懂得，工人领袖脱离了工人群众就什么也不是了。我们知道群众在哪里。群众在工人运动内部，在职工大会运动内部。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打破改良主义分子对共产党人采取除名的手段和剥夺其工会权利的企图，

^① 斯宾塞是诺丁汉郡矿工工会的叛徒，现在是矿工区法西斯联盟的组织人。

坚持留在这些组织的内部，并与这些组织的无产阶级分子保持统一战线，同时带领群众反对这些官僚及其官僚机构。

现在，必须让英国工人群众接受有必要成立工厂委员会的思想。成立工厂委员会的目的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动员本生产部门的群众；通过这种途径我们可以揭露改良主义领导层的叛卖行为；当群众性的斗争在英国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这种局面），共产党可以率领群众反对工人运动内部的而且事实上正在支持资本家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改良主义分子，同时也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机构。

我们认为，我们的经验对于兄弟共产党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共产国际如能运用我们的经验，特别是工会工作经验，就将变得更为强大。我们认为，英国共产党的前途是十分美好的。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英国共产党将能显示党员人数的巨大增长，并且表明它已走上向人数众多的共产党发展的道路。

尼施维茨（德国）：

有一个问题，尽管它与大会提出的各项问题有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但在报告中却没有涉及到，在提纲中也只是一带而过。我指的是对无产阶级妇女进行工作的问题。德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对提纲作出相应的补充。我将谈谈资本主义国家中女工的作用，以及争取她们参加阶级斗争和实现共产党思想的最有效方法。

请允许我简略地谈谈德国女工的现状。由于德国在加紧进行工业的合理化，还由于技术和劳动分工的发展，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量正在下降，并有可能以非熟练劳动力和较廉价的妇女劳动力替代熟练劳动力；男工和女工的工资差达到了50%，甚至超过此数。结果是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加紧使用女工的不

仅仅是那些专用女工的工业部门、纺织业、服装业等等部门，就连最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也因进行合理化改革而有条件使用女工了。其中最重要的部门有电机工业、无线电工业、人造丝制造业和化学工业。女工在纺织工业中所占比重只增长了31%，而在化学工业中则增长了79%，在电机工业中竟增长了49.5%。这些数字可以证明，资本主义吸收妇女参加生产过程已达到了何种程度，资本主义依靠无限制的剥削女工增加自己利润已达到了何种程度。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在使用女工的同时也创造了相应的社会条件。在德国的企业里，没有妇女劳动保护，劳动时间不加以规定，也没有妇婴保护措施。资本主义国家不但不发展社会救济事业，相反地，却越来越厉害地压缩社会救济的规模。德国有一个工作时间法，似乎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但这项法律伸缩性太大，实际上没有任何单位遵守八小时工作制。加班加点在德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德国也有一个妇婴保护法，但实际情况却是另一回事。法律赋予女工在产前和产后各享受6周休假的权利，但是也缺乏实现这一权利的社会前提。女工在休假期间得不到工资，而疾病保险社只付给少得可怜的补助金——只占本已很低的工资的2/3。由于这个缘故，女工被迫在机床旁坚持工作直到临产。这就为女工的健康、无产阶级的健康以至整个人民的健康带来了危险。这种残酷的剥削激起了无产阶级妇女的反抗。女工们相当广泛地参加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是不无原因的。然而，她们还不仅限于参加共同的罢工，在纺织工业内，女工们往往一连几个星期、几个月地独立进行斗争。根据纺织工人工会的统计，参加罢工的女工人数达50%，有时甚至达到70%。总之，近几年来，妇女们已不只是消极地参加斗争，而是积极地行动起来，而且在一定条

件下甚至还领导斗争。改良主义的工会领袖在对待女工运动方面扮演了资本主义帮凶的可耻角色。他们不支持女工们最起码的要求，总是千方百计地压制女工们的自发运动。改良主义的工会在工资问题上低头屈服，签订了极其不利的长期工资合同。它们在劳动时间的问题上也低头屈服，竟擅自容许仲裁机构规定工作时间。

因而，我们在女工问题上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就在于加强对工会的工作，组织一支积极的团结一致的反对力量。尽管改良主义的工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人有种种叛卖行为，但改良主义分子在女工中仍具有重大影响。他们借助于激昂慷慨的言词，和平主义的和脱离政治的纯文化性的夸夸其谈，得以巩固自己在女工中的影响，并诱使她们追随自己。最近的议会选举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社会民主党的900万张选票中，无产阶级妇女的选票占有相当大比重。然而，笼络女工的不仅是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也在起劲地拉拢女工。他们采用一切方法力求使女工脱离工人阶级，脱离阶级斗争，通过全国性的和基督教的联合会对她们进行反无产阶级的教育，不间断地为将来的斗争进行准备。共产党应当开展一次集中吸收女工参加组织的活动，以对付敌人方面的加紧拉拢。有哪些方法能帮助我们顺利地接触企业中和家庭内的女工呢？在工业地区，我们的首要任务在于争取企业的女工。在这里，妇女代表会议制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俄国的妇女同志们依靠召开妇女代表会议的方法取得了出色的成就。至于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则这项工作在许多地区还只处于开始阶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其一，实行妇女代表会议制的方法不当；其二，我们在生产部门基层支部的同志工作方法不正确。在这项工

作中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代表会议没有明确的非党性质，同志们不善于为代表会议谋得工厂和工会的支持，而过分地把共产党提到了首要地位。另一个缺点是，代表会议之间的休会期太长，这就妨碍了对妇女代表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并导致某些代表退出会议。至于代表会议人员组成符合要求的程度如何，我将举柏林的一次代表会议作为例子予以说明。

参加该代表会议的 258 名妇女可分类如下：工厂妇女 125 名，工人 7 名，失业工人 25 名，家庭主妇 100 名。^①

这次代表会议的人员政治情况如下：非党人士 175 名，共产党员 80 名，德国社会党人员 3 人，德国国社党人员 1 人。^②

可见，参加代表会议的主要是非党妇女。不过，我们还没能把企业中的社会民主党女工都争取过来，使她们脱离社会民主党。上述例子表明，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

在妇女代表会议休会期间，代表们执行我们给予的任务：散发书刊读物，收集宣传材料，结合共产党的政治口号研究关于征集工作（征收工会会员）的专门资料。这项预备性工作收到了效果，它对妇女代表在共产党开展的各种运动中积极地进行合作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红色妇女和女青年联盟也担负了重大任务。尽管这一运动还很年轻，但它已成功地争取到非党妇女和女青年，把她们吸收到组织里来，并在她们中间进行教育工作。

总之，我们在妇女运动中的基本任务是：加强企业和工会内的工作，加强工厂支部的活动，推广妇女代表会议制度。这些任

^{①②} 数字计算不准确，原文如此。——译者注

务的完成将有助于我们争取企业女工和家庭主妇，并吸收她们参加共产党进行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应当永远地懂得，没有一支无产阶级妇女大军，世界革命就不会胜利。

库斯特齐瓦（波兰）：

波兰代表团基本上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报告提纲，同时建议补充某些内容，这就是：

(1) 关于把战后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的问题，我们认为，使第三时期区别于第二时期的主要界限并不是那种巨大的技术进步，因为它已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全面恢复阶段的前提。主要技术改造在第二时期就已获得巨大进展。新的第三时期的特点则首先是以下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技术和生产力大大发展，在稳定进程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现在都暴露出来，并震撼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这些矛盾分布在三个方面。在经济方面，这就是竞争着的资本主义大国加紧争夺市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投资领域。在国际政治方面，这就是重大的世界性矛盾压倒了相对而言属于地方性的矛盾，而世界性矛盾占上风，一向是危机时期的征候。我指的是英美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世界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最后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苏联之间的占主要地位而且无所不包的对抗。在社会关系方面，这就是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工人阶级的左倾化，对工人阶级采取的恐怖手段日益加剧，以及工人阶级中出现的新的分化。

这就是第三时期所出现的并构成该时期特征的三类主要矛盾。这个第三时期把我们带进了经常发生极大规模的冲突、帝国主义战争和极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代。

(2) 下一个补充内容涉及到如何评价美国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在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均势遭到破坏的问题上，起首要作用的应该是英美之间最严重的对抗，而不是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对抗。此外，对英美之间对抗的特点应当比较充分地予以说明。美国的迅速扩张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利益与英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发生冲突。英国帝国主义虽然正在腐朽，但仍很强大，它日益严重地面临着退居半从属性的世界二流国家的地位的威胁。除了争夺销售市场和对主要工业原料的控制以外，发生冲突的主要因素是争夺海洋统治权，即战争时期对贸易的控制权，这一斗争已经导致裁减海上军备的会议以失败而告终。

(3) 我们希望补充的第三项内容是，必须对工会与国家机构相结合的过程作出较具体的说明。这里有必要指出结合的一切类型，指出各种对等组成的或混合组成的仲裁机关、自治机关和司法机关，下自“工会法庭”保险机关等等起，上至最高经济委员会止。还必须指出工人官僚化的某些形式，如担任议会代表、进入自治机关等形式。国家机构和工会上层人士就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所有重大问题经常举行会议，也是工会与国家机构互相接近和结合的一种形式。

(4) 第四项补充内容涉及到对社会民主党的评价。我们认为，把社会民主党内部现已出现理论上的蜕化变质这一事实纳入提纲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至今，我们在宣传中对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的蜕化和基本纲领的改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我们的宣传中没有充分利用这一点。但我们认为，在提纲中不仅要指出社会民主党向工党的自由主义方面的转变，而且同时要注意到它向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演变。现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正在发展法

西斯主义的理论（如宣称议会民主制是不充分的，必须以工会代表予以充实等等）。

下面，关于社会民主党还有一个意见。我们感到，把战后第一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和平主义当作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来描述，是不完全正确的。乌托邦的软弱无力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和平主义，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同一个东西。社会民主党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在利用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罢了。战后时期，社会民主党一贯反映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向。社会民主党的和平主义极其充分地反映了英美资本的愿望，而英美资本力求使西欧的各种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处于某种“和平状态”。这种和平主义在德国为履行凡尔赛和约条款的政策铺平了道路，德国资产阶级的所有领导阶层都逐步走上了这一道路。

最后，提纲内应该补充一段关于联共和苏联的内容，其中最好谈谈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并由最近一次全会通过的政策。

我们应该着重指出这一政策的重要性，因为它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以更快速度进行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

我们应该拥护坚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贯彻实施，这一路线指出，在加强同中农的联盟时，要不断地同富农作斗争，要以贫农为主要依靠力量。我们应该指出通过发展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个体农户的合作化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

以上就是我们想在布哈林同志报告提纲中增添的主要内容。

现在我谈谈波兰问题。

波兰共产党的特殊作用在哪里呢？

首先，同志们，我想提请大会全体同志注意波兰的共产主义

运动对于整个世界革命的特殊作用。而且这是有许许多多原因的。第一，因为波兰共产党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进行斗争的，这个国家是世界帝国主义的桥头堡，在这里，国际资产阶级正集中全力准备反对苏联的战争。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在波兰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比其他国家更为紧张，而且我们斗争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共产党所用。同志们！我们的这些经验，例如结合进行地下工作，成立政治性的农民激进党派；又如我们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干得最为成功的在农村建立广泛的共产主义组织网的做法，以及我们为反对军国主义而进行的工作，这些都是财富，是波兰共产党对我们的国际宝库作出的贡献。

使波兰共产党的分量得以提高的第三个因素就是波兰无产阶级具有丰富的多年的革命传统。我们的革命干部的特点是经受过特殊的革命锻炼。几十年来，我党队伍中经常有半数人被关在监牢里。我党的骨干不仅拥有在工人运动中多年进行革命工作的经验，而且其中大多数人还具有多年坐牢的经历，具有在警察局、监狱和街道遭受折磨和毒打的经历。

但是，最重要的，应能引起整个共产国际对波兰支部重视的乃是第四个因素，即波兰目前的局势。这就是毕苏斯基分子即将发动新的政治进攻（而这种进攻乃是变本加厉地对工人阶级实行恐怖政策的预兆）；这就是存在着加紧推行军事独裁的倾向；这就是出现了战争危险加剧的信号，这场战争正通过外交关系、实行军国主义化和技术等各个方面积极进行准备。我特意要指出下列事实：集中管理和扩充民间军训组织，并使之与军队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加紧进行扩充这种组织的宣传，特别是对农民进行宣传；

发展各种军事技术装备；使军队干部年轻化；采用一切伪装手段扩充现有兵员等等。与立陶宛最近发生的冲突悬而未决，以及企图占领立陶宛。这就是波兰的整个内外形势，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它更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最严重的震动、最重大的事件的发生地，这些事件将最终动摇资本主义的稳定局面，并使全世界动荡不安。

在这种条件下，波兰的斗争进程意义十分重要，共产党能否善于领导这场斗争，对于整个共产国际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们党在最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恐怖下进行斗争，为了沿着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足迹前进，我党作出了一切努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的。它在千百万群众的战场上进行斗争，组织和领导了整个罢工运动和一切大规模的政治发动。所有这些活动完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我们党是各被奴役民族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领导者。

我们党深入农村，尤其是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那里，党实实在在地领导着大量的农民。

为了正确地领导无产阶级运动，为了有效地保证无产阶级在农民运动和民族运动中的领导权，党必须有一条正确的路线。

我们党在五月政变时刻犯了重大的机会主义错误之后，端正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并且正像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成员承认的那样，已经以坚定的步伐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是，这一成果我们党是得之不易的，因而我想请大会注意，曾经使我们党的政策得到锤炼的那场严重的内部斗争。我想提请大会注意的是，在波兰共产党进行斗争所处的那种条件下，党内少数派所犯下的、与极左错误交织在一起的右倾错误，是孕育着极其严重的直接危险的。

在这种条件下，党的领导为巩固、发展和运用正确政治路线而进行的斗争应当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坚决支持。

构成无产阶级政党正确政治路线的基本因素是什么呢？这就是正确的形势判断，正确的策略结论和指导。

我们把五月政变判定为法西斯政变。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产生的政体，是这种危机迫使资产阶级采取极端手段以挽救自己的生存而产生的政体，我们并没有随便地把它同作为整个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特征的一般性政治反动混为一谈。而法西斯政体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最为严重的危机因素的征兆。我们曾经指出过，已实现法西斯政变的国家内的斗争条件与我们只看到某些法西斯发展征兆的国家内的斗争条件，是有差别的。

波兰的法西斯政权标志着整个资产阶级在大资产阶级和金融资本的领导下结合了起来。大资产阶级和金融资本力求消除某些工业部门之间的矛盾、工农业之间的矛盾、波兰某些工业地区之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大资产阶级和金融资本（法西斯政权体现了它们的利益）的领导下正在推行把工农业资产阶级所有阶层都联合起来的经济纲领。这个纲领的内容是：借外债，提高粮食价格，发放工农业贷款，鼓励各种卡特尔和辛迪加，加紧剥削群众，取消土地改革。至于毕苏斯基的对外政策，这就是在服从于英国的帝国主义反革命计划的条件下进行扩张，这就是像对待内外敌人一样实行同革命作斗争的政策。民族政策是法西斯谋求稳定和实行备战政策的重要环节。为了进行战争，争取同情并把资产阶级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上层分子拉拢到自己一边来，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法西斯政府采取了不同于以往历届政府的做法，让少数民族的资产

阶级也分享它所获得的资本主义稳定带来的好处。法西斯政府正在排除过去使波兰资产阶级和少数民族的资产阶级互相分离的深刻对抗。

在社会方面，法西斯政府实行的是一种居心十分恶毒，但却是灵活巧妙的政策。这个政策一方面以恐怖手段对待工人阶级，同时利用激进的言词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并在政府机关中起用冒牌的民主激进党或自由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用以欺骗工人和劳动群众。

法西斯政府设置了一系列新的机关，用以束缚工人阶级的手脚，使其无法举行大规模的发动。属于这类机关的有仲裁委员会、工业法庭，还制订了奴役性的集体合同法和雇佣合同法。总之，这是一整套法西斯法令，它利用所有这些敌视工人阶级的机构网把工人阶级束缚起来，而工人阶级要想冲破这个网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党驳斥了少数派同志在涉及法西斯政变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错误的机会主义论点。党认为，费德勒尔、伦格等同志的论点是不正确的，在他们看来，似乎法西斯政变是小资产阶级的胜利，似乎小资产阶级在毕苏斯基的率领下将要发动反对大资本的进攻。这个错误是五月错误的继续，也是由于过高估计小资产阶级的作用而产生的。后来，在政变问题上再次产生这种想法，其原因是过高地估计了小资产阶级的独立作用。我党还摒弃了少数派提出的另一个也很错误的论点，这个论点认为只有垮了台的国家民主党才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直到今日波兰社会党人还提出这种论点，它造成的结果是，把毕苏斯基看成是为害不大的人。党驳斥了所有这些论点。党还认为，那种把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仅归之于单纯经济基础的法西斯主义定义是不正确的。党驳斥了把法

西斯主义当作卡特尔的一般上层建筑和当作垄断资本主义的正常职能的说法，而少数派竟把垄断资本主义当作中世纪行会式的卡特尔。这种从纯经济角度对法西斯主义所下的定义使法西斯主义脱离了整个社会基础，脱离了社会革命时期，也脱离了恰恰推动着资产阶级走上建立新社会制度道路的危机时期。这个论点也为我党所批驳。它也反映了波兰社会党人把“五月后的政府”当作“通常的资本主义政府”的看法之一。

根据对波兰政治形势的分析，认清社会民主党在法西斯制度下的作用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波兰的形势不同于意大利。在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从最初时刻起就成了法西斯主义加紧迫害的对象。而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则是法西斯主义的走卒，它支持和保护法西斯政权，并在工人群众面前掩盖法西斯主义获胜的事实。社会民主党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持法西斯政权，这正是波兰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特征。但是，这并不妨碍出现以下情况：法西斯主义必然倾向于使自己党占据完全的统治地位，因而越来越渴求使妥协派政党，特别是波兰社会党，服从法西斯政府的直接指挥，把这些政党所剩无几的组织上的独立性剥夺殆尽，同时把它们党员群众吞并过来。法西斯主义越来越强烈地力求根据赤裸裸的法西斯纲领和“超阶级”国家、阶层组织思想、社会团结、非党派原则等等法西斯口号来组织群众。情况发展的双重性在于，法西斯主义一方面利用妥协分子，同时又力求破坏他们的影响和建立纯粹的法西斯组织。为了揭露妥协分子的真正作用，必须看清这一套复杂的手法。这些妥协分子日益成为法西斯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并处于向公开的法西斯组织过渡的阶段。

至于说到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领袖，那么他们在波兰比在

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充分地在工人群众面前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并且威信扫地。他们已经有一段参加我们运动的长长的经历。他们的经历是：每当妥协分子的叛卖行为在劳动群众中引起强烈不满时，每当他们的党遭受到大量工人退党的威胁时，总有“左翼”反对派出来活动。它的目的是挽留住那些已脱离妥协分子的群众，向他们灌输妥协派政党可以改善的期望，把他们引往另外一个方向。而一旦不满情绪的浪潮平息下去，这些“左翼”小丑们又变成官方妥协派教会的温顺儿女。这就是他们的经历，这种伎俩在我们这里已重演几次，它充分暴露了社会民主党这些假装的“左翼”领袖。

这种经历提供了一个样板，共产国际所属各党可以据此进行研究，“左翼”改良主义的真正作用究竟是什么。

对稳定过程进行细致的研究，既研究它的成就，也研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矛盾，这是正确评定波兰形势的十分重要的部分。不能不承认，波兰的局部稳定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在提高产量和平衡预算方面，在减少失业工人方面，在振兴农业方面，等等。下面我只提出某些数字，它们能向我们表明国内市场和国内消费获得一定发展的情况。生铁消费量增长了95%，钢消费量增长了50%，煤消费量增长25%。波兰所有主要工业部门（钢、生铁、煤、纺织品）的总产值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在农村边远地区，法西斯政府对农民上层分子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实行了收买政策，因而也取得了某些成就。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法西斯成功地分裂了民族运动。甚至使中农阶层也追随他们，更不必说富农了。法西斯政府在波兰农村也建立了基地，并使全部富农分子和相当大一部分中农分子投靠到政府一边。这些就是波兰的法西斯政权所

获得的成就。

但是，在稳定过程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极其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破坏着整个这种制度，而且它们在波兰表现得比任何地方都更深刻，更尖锐。

最大的矛盾，这就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波兰，由于战争后果造成的工业崩溃，由于技术落后和一系列经济上的困难，还由于很大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备战，用于支持法西斯政权本身（警察、监狱等等）和用于支付借债的利息。而这些借款大部分又用于非生产性开支，在波兰就是由于上述种种条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国际联盟也承认，波兰的工资低于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似乎只有葡萄牙是唯一的例外。波兰机关的统计资料指出，自1925年起工资就没有增加过。而1925年是危机最严重、失业人数最多的一年，就在大量工人失业的基础上，企业家们把工资降到了最低限度。

所以，在近两年的形势较好的整个时期内，工人的工资并没有得到增加。政府依靠各种法西斯欺骗手法和对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贿赂，依靠仲裁系统和各种法西斯立法手段，才得以暂时制止大规模罢工运动的发生，并使工人阶级忍受这种极低的工资水平。

罢工运动在一定时期内的削弱，首先是对工人阶级施加恐怖手段的压力的结果，而不是像我们的少数派认为的那样是工人阶级境况有了改善的结果。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压迫，这就是最明显的矛盾，因为它激起工人阶级强烈的不满情绪和骚动，促使其革命情绪增强。农村的形势也是如此。同志们，波兰农村是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贫穷的农村。在保留大地主土地占

有制的情况下，多数农民，甚至绝大多数农民都是半无产者，他们被迫离家外出挣钱，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现在是挣不到钱的。在波兰，向国外移民在战前曾起到过安全阀的作用，而且移民的规模也很大。现在，这条路也几乎堵死了。波兰农村的失业者年年增加，得不到工钱的赤贫者的数量不断增大。波兰农村人口的年增长额达到 35 万人。农村的人口过剩达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这支逐年增大的失业大军乃是农村常年动乱不安和怨声载道的因素。农村的失业大军同时也使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受到压力。城市的失业大军极其庞大。同志们曾指出，在其他欧洲国家，失业人数为工人阶级的 10—12%。而在波兰，失业人数竟在 18—25—30% 之间上下浮动。失业者只能得到微乎其微、少得不能再少的补贴。生活极其贫困的失业大军所造成的这种压力，是阻碍罢工运动发展的原因之一。

除上述矛盾之外，还有一系列纯经济性质的矛盾和困难。波兰是一个农业耕作十分落后，致使收成波动极大的国家。前后两次收成的差额可以高达 40%。这是使整个经济生活的平衡受到威胁的因素。国家处于严重歉收的威胁之下，这当然会给政府带来极大的困难。由于平衡贸易的条件恶劣，由于经济的景气有赖于进一步的投资，波兰的经济生活陷入了高度依赖外债的境地。但是，波兰引进的外国资本犹如涓涓细流，而且条件苛刻，利率极高。利息的问题同时也成了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加重赋税压力、使其境况急剧地和不断地恶化的问题。

在这种条件下，法西斯政权在农村和工人阶级的某些特权阶层中建立的基础是不可能扩大的。不过，即使法西斯主义得以深入到工人的个别阶层，使他们直接依附于法西斯政权，即使这样，

也改变不了革命浪潮正不可避免地不断增强和日益高涨的普遍事实。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法西斯政权来说是一种推动力，促使它在军事冒险中去寻求摆脱这种处境的出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当然需要使整个经济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当然需要一定的城乡支持力量。但是，在这方面，法西斯政府是不可能指望有重大成效的。

少数派的同志们不去考虑虚假的法西斯“稳定”过程的全部辩证关系，却把工业崩溃说成是产生革命发展形势的唯一原因。这些同志认为，只有工业的彻底崩溃才能为革命发展和革命倾向的增强创造先决条件。这些同志不懂得，战后的稳定过程和在该过程中使生产力得以发展的条件，为极其严重的新矛盾的迅速发展造成了更广泛的基础。他们把一切都归之于设想中的彻底的工业崩溃，而对于确实存在着的矛盾却视而不见，所以他们或者是预言彻底的经济破产，或是无力抵制法西斯主义散布的稳定的幻想，总是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华沙委员会的代表们断言，法西斯的稳定改善了无产阶级众多阶层的境况，八小时工作制没有被废除等等。他们的这种意见不可能不影响到少数派的整个策略，而在对待罢工斗争以及采取夸夸其谈，但实际上完全消极被动的策略这一问题上影响特别明显。

党的策略 在波兰的现实条件下，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是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发挥最大限度的积极性是党在这项工作中的基本原则。虽然近一年来由于法西斯的打击、仲裁的条件和妥协分子的一再背叛，致使罢工运动的规模有所缩小，但仍必须指出，在波兰本境所发生的所有罢工都是根据我们党的倡议组织和进行的，而且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由我们党领导的。就是政府

和妥协分子借以压抑群众积极性的那些仲裁协议，在许多场合下也是在罢工的威胁下产生的，而且它们的结果还受到下列事实的影响，即群众已经愿意参加罢工，并根据我党的倡议进行罢工的准备。我们对问题的提法是，组织、准备和领导罢工，而不像我们的少数派所做的那样，只是预告、约定和宣布罢工，但对罢工的准备却漠不关心。

在我们阐述的上述条件下，我党的中心任务是为反对策划中的对苏进攻而斗争，保卫苏联，宣传它的一切成就，向群众讲明策划中的战争的全部意义。这一反战活动是我们党全部活动的真正核心。我们不折不扣地把这种活动同波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所有大规模发动结合起来。为了进行这种反战活动，党的领导认为必须做到的并首先努力去做的，是把整个反战运动同无产阶级迫切的日常需求结合起来，尽可能让群众具体地了解战争准备的全部情况。我们过去和现在一贯认为，不应该只向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灌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类抽象的词句，而应该尽可能全面地向他们展示把我们推向战争的全部现实情况。我们认为，在我们的宣传中必须突出地予以揭示的正是行将发生的战争的阶级性质，这场战争不是通常的帝国主义的冲突，而是一个阶级反对一个阶级的战争，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战争。我们曾经解释过把波兰推向战争的所有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指出过的有：经济因素，这就是工业力求向外扩张；外交政策因素和波兰作为英国手中的工具所起的作用；整个法西斯政权的冒险主义倾向。但首先并且每次都指出的则是对苏维埃国家不共戴天的仇恨的社会阶级根源。这种仇恨在波兰尤其强烈，因为波兰资产阶级比任何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更强烈地感受到社会革

命的危险，而这种革命的范例就出现在与波兰直接毗邻的国家内。但是，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同新的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这样一场巨大冲突，少数派的同志们却令人费解地固执己见，硬把它归结为纯经济性的局部冲突，并认为这个冲突是由于西里西亚的采矿工业需要扩大市场所致。

选举运动是我党最近时期所进行的最大运动之一。这个选举运动就好像是一面哈哈镜，反映出了波兰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说它是哈哈镜，是因为它是在法西斯加强恐怖的打击下进行的。选举运动时期不仅不是自由更多一些、公开活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的时期，相反地，却是恐怖手段加强的时期。选举运动是在法西斯使用最无耻的压迫手段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竟无耻到把政府集团候选人名单偷偷塞进选票箱的地步。然而，尽管处在这种空前的恐怖状态之下，尽管政府要尽了种种手段，我党在议会选举期间，仍作为巨大的、最实在的政治因素出现在全国和欧洲的面前。共产党的和靠拢共产党的候选人得到了约 85 万张赞成我党所领导的反法西斯联盟的选票。在这场运动中，我们的组织表现出了广泛采取灵活行动的巨大能力。我们的党把选举活动发展成为真正群众性的运动。党不仅收集到选票，还征集到了 6 万个表示赞成共产党候选人名单和反法西斯联盟候选人名单的公开签名。这就是说有 6 万名波兰工人和革命农民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公开地向整个法西斯政权宣布，“我们是波兰共产主义的拥护者”。虽然在选举运动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候选人的名单大多数都作废了，但党还是成功地动员了数万名工人和农民投票选举未暴露身分的候选人，尽管劳动群众只是在最后时刻才得知他们是共产党方面的人，仍然遵照党的指示投了他们的票。凡是候选人名单作废的地

方，群众便把数以万计的选票投给被取消的候选人，他们以此证明，我党所进行的选举运动已摆脱了一切对议会抱幻想的成分。群众在投票选举时，并不指望法西斯议会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改善，并不指望进入议会的代表能在法西斯议会内争取到他们生活的改善。群众投票无疑地是赞成共产党的纲领，赞成作为自己日常斗争中的领袖和领导者的共产党，赞成改善生活和摧毁法西斯政权，赞成工农政府。

但是，同志们，在这个选举运动期间，我们党内也出现过重大的分歧，主要是在如何对待妥协派政党方面的分歧。我党的少数派建议我们党同妥协派政党、社会法西斯党和波兰社会党上层搞统一战线。我们党的领导认为这个建议是最不能容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否定了这个建议。少数派同志的这个严重的右倾错误还与特殊的、看来是极左的错误纠缠在一起，因为他们不理解我们党对激进农民的党派和其他某些组织的政党所采取的机动灵活策略，我们同这些组织建立政治联盟的基础是拥护下列口号：保卫苏联，成立工农政府，土地归农民所有，实行自决直到分离独立。少数派完全是机械地，从该联盟合法化的角度来理解党的领导权。他们认为，如果组成反法西斯阵营的各个党不建立这种合法的共同的委员会，那就等于放弃我党的领导权。这种论调天真幼稚，勿需置评，在法西斯居于合法地位的条件下更是如此。

由于我的发言时间快要用完，我只好把我的发言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省略不讲了，这就是有关民族政策和农村政策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党的路线也是经过重重困难的磨炼而形成的。我们犯过某些错误，第四次代表大会对此提出过批评。但是，尽管四大指出了这些错误，在四大后，中央委员会仍不得不同少数派进

行斗争，因为他们在民族问题上，在对待富农和清除瓦西里基夫分子问题上又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右倾错误。

最后，我还得把自我批评的问题略去不讲，也不去指出四大后我党及其领导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如何解决党的危机？ 怎样消除党内危机呢？这个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目前正出现某些极其重大的事件：战争危险增长，备战活动变本加厉，军事独裁日益加剧，以及工人阶级先锋队面临遭受屠杀的威胁。现在，最重大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参加政治发动和政治性罢工。总罢工的口号应在我们的政治活动中占据中心位置。党应该调动自己全部力量去实现这一口号。我提请大会全体同志注意，波兰的事态具有特殊的极其重大的意义，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成为重大事件的见证人，这些事件是我们的大多数支部所预料不到的，并可能使我们手足失措。

在这种条件下，同志们，正确的政策和对我党正确的领导就成了最重要的问题。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但我还得就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如何消除我们正在进行的党内斗争讲几句话。这场党内斗争是执行正确政策道路上的绊脚石，它阻碍了我党的发展。同志们，如何消除这场斗争呢？我认为，俄国代表团对德国党提出的那些问题和建议对波兰党来说也是正确的。的确，同志们，我们也需要提高警惕，需要同右的倾向作斗争。必须把党团结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之上，必须在党内建立铁的布尔什维克纪律。这就是我们党所需要的消除这一斗争的方法，因为近来我们党的纪律由于派别斗争而松弛下来。这里有必要把共青团也提一下。共青团和我党肩并肩地英勇斗争在自己的岗位上，但与此同时，少数派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变成了他们与中央和中央正确路线进行

派别斗争的工具，变成了用以同选举策略，同议会党团及其揭露社会主义叛徒的策略进行斗争的工具，而少数派对于这些策略不仅一贯反对，而且简直达到了肆意中伤的地步。

我们党内的这种状况必须予以消除。不应该存在下面这种状况，即正确路线和错误主张在党内并存，在政治上平等对待，使派别集团在组织上得到巩固，而中央委员会却受到内部结构的束缚，这种结构维护派系存在，使党分裂成各派系独霸山头的现象得到保护。同志们，这种状况必须消除。但我们从这个讲台上听到的关于撤换领袖的建议并不是摆脱党所遭受的危机的出路。布哈林同志试图从我党骨干分子中区分出能进行斗争的来自生产岗位的工人，用以同领导人、领袖相抗衡。这种建议，我再重复一遍，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我们党内存在的正是这样的条件，即全体骨干分子，所有领导人和领袖都像战场上普通士兵那样进行战斗。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干部不仅有蹲监牢的经历，还有遭受毒打和屠杀的经历。把他们区分成能英勇斗争的基层人员和似乎不能进行斗争的领导干部，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实际，不符合我党的全部历史，因此，它将无济于事，在我们党内没有人会相信这种做法。试图找到某些完全未受派系斗争影响、没有卷入政治斗争、对斗争袖手旁观的干净人，也是办不到的。必须寻求摆脱我党困难处境的出路，但上面这种建议完全是不现实的，因而不可能达到目的。

消除我党危机的问题，首先就是在正确政治路线基础上的坚强领导的问题。这就是说要保证坚强的领导，保证那种在同各种偏差和错误的斗争中能贯彻执行正确政治路线的领导；这就是说要保证领导有可能进一步贯彻执行正确政治路线，但要使磨擦和

干扰少一些，要遵守铁的布尔什维克纪律，要少数服从多数。（**噓，笑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才能共同对少数派进行富有成果的工作。这是可以导致消除危机的唯一道路。我党应该在四大以后的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条路线在发生各种党内冲突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曾试图建立另一条路线，例如在选举问题上的路线，但遭到了反对。党的领导现在执行的正确路线曾经取得胜利，但那是在不断地同少数派，更多地是同少数派右的倾向和错误进行斗争过程中取得胜利的。必须记住这一点，必须支持领导在极其重要的岗位上进行这场困难的斗争。我希望，共产国际将帮助我们找到摆脱危机的正确出路。我希望，我们能团结全党，达到布尔什维克的统一，把波兰的革命引向胜利。**埃韦特（德国）：**

共产国际在前几次代表大会上曾不止一次研究过德国党的问题。1921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要纠正三月起义的错误，谴责右倾取消主义分子并把他们清除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同德国共产党一起详细讨论过关于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当时，大会既要克服“左”倾分子的反对，又要同右倾分子的观点进行斗争。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批评了当时党的领导所犯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因为他们对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未能利用有利的形势负有很大的责任。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说明的问题，然而已出现的分歧绝不应导致党的危机。这些分歧来源于德国共产党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所面临的某些困难。这里指的是，在党内要建立和巩固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便能共同行动，共同解决问题，以便能更好地运用自己以往的经验，使经验的运用适应于

现实的具体形势并取得最大成效。在我们德国有着欧洲最先进的、组织程度最高的资本主义，因而产生了许多新的现象和矛盾，我党应该在保持团结一致的情况下予以解决。但是，在这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危险。在党内，由于受到党的发展的老作风的影响，某些不良倾向未能得到克服。每逢出现意见分歧或试图讨论实际问题之时，总会出现这种倾向，即事先不作任何解释就给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扣上一顶帽子，而不去用辩论的方法解决问题。

下面就布哈林同志的报告和提纲中作出的分析讲几句话。这里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分析的问题上是否存在严重的分歧？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尽管相当多的德国同志无疑地赞成这样一种意见，即提纲中提出的前景过于悲观。某些同志指出，这是一种停滞的前景。（台尔曼插话：“这指的是谁？”）我提请您回忆代表团会议上的争论情况。（台尔曼插话：“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在当前稳定时期是否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基础的改造、恢复和扩展阶段的阶段呢？如果客观地分析事实，那么否定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不仅在技术和组织方面，而且在一系列其他方面都显示出存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有人企图利用五花八门的合作方法，更深地把工人组织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并用同样的方法把工人阶级的许多阶层拉过去。我提请注意美国、英国、德国和其他高度发达的国家内出现的种种这类企图。这类发展合作体系的企图不论在哪里都同立法措施相互配合，而那些方法措施的矛头又都是指向工人组织，例如英国的反对工会的法令，其他各个国家的仲裁制度等等。当然，可以把整个任务说得轻松些，办法就是，我们只描绘出最近似的、尽可能“乐观的”前景，而对于目前存在的现象则用印象主义的手法予以解释。我们中间有不

少同志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知道，列宁曾不止一次地告诫革命者不要陷入这种错误。我们还知道，共产党正确策略的首要条件，就是对前景作出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估计。不言而喻，这种估计才能最严厉地驳斥孟什维克的任何企图或断言革命已经完结的取消主义分子所发出的社会民主党人式的一切胡言乱语。

在这方面，共产党人只有一种观点。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更高形式的过渡才使矛盾激化。现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同时造成了内外政策一切领域内的矛盾的尖锐化。在对外政策领域，这表现在关于战争的问题上；在对内政策领域，这表现在导致革命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且这个过程并不是仅仅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就可以说明的简单过程。工业中垄断的集中和垄断程度的提高，就某种意义而言阻碍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给这一斗争带来了困难。原因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中缺乏阶级觉悟的阶层现在所承受的资本的残酷压迫，比战前更要严重得多，尤其是，资本家们甚至力图把工人阶级本身的某一部分拉入资本主义体系。

但与此同时，这个强大的已十分集中的资本所具有的侵略性又促使形势日益紧张，而这点是必须着重指出的。虽然现在，特别是受工会组织执行叛卖政策的影响，号召工人阶级参加重大斗争比较困难；虽然发动类似斗争对我们来说比较困难，但是这些斗争的规模更为巨大了，性质更为激烈了，其结果也更具有革命意义了。即使在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有时能组成庞大的国际卡特尔，那么这一事实也只能加剧争夺市场的斗争，只能加强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以及对苏联的侵略性。虽然总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但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仍然互不相同。只要把美英两国比较一下，

就足以看出这个过程和这个过程的发展速度是极其多种多样的。

下面我将对某些认为提纲内没有充分强调英国的衰落和大英帝国的崩溃的同志提出批评。我认为，英国衰落的事实已无可争辩，在共产国际内部已得到公认，没有必要千百次地反复强调它。更重要的是必须使工人阶级注意到大英帝国所包藏的对革命的种种危险。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会对大英帝国和英国宗主国没落的事实提出异议。

某些同志指责提纲，说它预料，只有在发生新的战争，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或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的战争之后，才有可能产生新的革命浪潮。我认为，对这种指责应该予以驳斥。没有任何共产党人会认为，只有爆发战争，才可能爆发革命。在共产国际内部，没有任何人会维护这种观点。战争和革命是紧密相关的。战争和革命是为了解决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矛盾而采用的两种办法，是当今时代为争夺政权而进行斗争的两个阶级所采取的两种尝试。资本家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工人阶级用革命来解决问题。内外政治矛盾的尖锐化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工人阶级内部革命浪潮的不断增长，同时也使帝国主义者更强烈地企图通过战争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对战争和革命这一问题的回答还取决于我们对战争危险逼近程度的认识如何。合理化、托拉斯化和当前稳定阶段的整个发展过程推动着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地向外扩张。而与此同时，这种扩张正日益加剧、而且必然会把矛头指向苏联，为的是把被革命分离出来的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再次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的是消除危及资本主义的这个巨大危险。

所有同志都说，战争危险已经迫近。但就在对提纲的抨击中

也包含着某种危险。（有人喊道：“对谁危险？”）对攻击提纲的那些人，因为在这些攻击中表现出对战争危险估计不足。根据发展的可能进程来看，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在许多国家中进行的战斗将是这样一种性质的战斗，即其中只有一部分战斗推动我们直接投入夺取政权的斗争。我想以此说明的是，在目前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不可能一举获得胜利。这种理解也许过分简单了。最需要注意的是以下情况：在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广泛的群众运动由较低阶段向较高的决定性阶段过渡是要经过一系列革命性的和半革命性的战斗的，而这些战斗不一定立即就以夺得政权而告终。诚然，维也纳无产阶级的起义和英国矿工的伟大斗争似乎与这种说法相矛盾。但我认为，把奥地利这个只由一个城市组成的国家发生的具有突然性因素的例子，搬到工业大国去是不正确的。英国的总罢工和矿工的罢工恰恰既表明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英勇精神，同时又表明了目前仍存在的资产阶级稳定状况相当牢固可靠。（有人喊道：“牢固可靠吗？”）是的，牢固可靠，因为资产阶级在进行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时并未表现出过分焦躁的征候。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准备进入一个偃旗息鼓的时期呢？不，绝对不是。但是我特别地强调过这些因素，因为对于共产党来说现在开始了一个决定性的时期，在整个这个时期中，我们应该扩大自己的基地，以便在即使是突然的革命危机到来之时，我们也能够率领广大群众进行胜利的革命。

某些同志要求在提纲内更明确地指出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我认为，没有任何人会反对这一建议，我只想对它略作补充。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产业工人，我们在指出成就，指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应该比以往所做那样更多地指出随着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内的这一建设而产生的特殊困难。因为正是这些产业工人常常习惯于按照自己国家的经济情况来看待苏俄发生的事件，而且他们的眼睛因受改良主义毒素和资产阶级诽谤的毒害往往迷糊不清。在苏维埃共和国处境最困难的时刻，列宁曾指出过，必须把所有这些困难情况完完全全地告诉外国工人。（有人喊道：“难道没有这样做吗？”）是的，当然是这样做了，只是我认为，应该比过去做得更好。恰恰是这样介绍情况，才使工人阶级有可能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问题。而工人阶级在理解这些问题的同时，就增强了自己的抵抗力，能更好地抵制改良主义的备战活动和改良主义目前在工人阶级中散布的战争思想。

我认为，提纲的总路线和提出的前景是正确的。它告诉人们，在当前的稳定阶段，时代同样具有革命的性质。提纲既揭示了革命的前景，同时也没有忽视困难和所有共产党都必须清楚地看到的那种复杂的形势。

再就工人运动的形势谈几点意见。假如整个形势不是如此复杂的话，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解释左倾化过程的矛盾性质呢？这种矛盾性是一个普遍现象。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都出现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右倾化的过程，而群众则日益左倾。群众左倾化过程既对共产党有利，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社会民主党有利。这里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这不仅涉及到不同国家内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发展程度上的不同，而且，正如德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的选举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发展也是极其不平衡的。以德国的选举为例，它表明了什么呢？它表明，在所有最重要的工业地区，共产党都有迅速的发展，而在某些地方更取得了突出的进展。这种发展，与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相比，有的地方大些，有

的地方小些，在速度和规模方面也是不平衡的。但是总的说来，在最重要的工业地区，我们已经着手从思想上把工业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我们一方来。在多种经济并存的地区和农业地区，我们还看到了另一种过程：共产党员人数的增长较少，有时甚至停滞不前和数量下降；可是，社会民主党在这些地区总的说来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个情况表明，目前在德国，整个工业无产阶级的左倾化正以某种形式在进行着；同时这个左倾化或者正在达到完全的革命自觉的程度，或者向左转的工人群众在退出资产阶级政党的时候，暂时还没有越出改良主义的范畴。然而，这种阶级分划过程的性质还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的确，除了处在个别特殊紧张的革命形势之外，无产阶级的阶级成熟性很少能达到像现在这样高的程度，这是事实。但这一事实是否就排除了形势的复杂性呢？还不能够说，投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群众，而靠向德国共产党的主要是工人。靠向我们一边的几乎全是工人，而且大多是产业工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在德国享有选举权的工业无产者，连同他们的妻子计算在内，至少有1 600万人。此外，还要加上几百万农业工人，几百万小官员和工商部门的职员。这些实质上属于无产阶级的阶层大多数已经退出明显的资产阶级政党，但还有几百万人追随这些政党，他们还没有受到左倾化总过程的触动。在充分指出我们在选举上所取得的重大胜利的同时，我们不能认为，我们获得的选票，其分量重如金石，而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则轻如草芥。（有人喊道：“我们得到的选票比社会民主党的更有价值。金石对草芥这比喻是正确的。”）台尔曼同志认为，金石与草芥之比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的是：在革命形势下，共产党获得的选票将像金石一样掷地有声，

即使处在目前的形势，它也是颇有分量的。但是，有许多选票是工人阶级的众多阶层投给社会民主党的，我认为，这些选票现在也是重如金石，它们对另一个阶级有利，即对资产阶级有利。

我想谈谈社会民主党占据优势地位的基础是什么，它获得的900万张选票意味着什么呢？这个胜利是一时情绪的反映呢？还是基于自己组织（这些组织的传统和职能在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中仍有深厚的根基）的活动而取得的呢？后者是对的。社会民主党取得这一胜利依靠的是拥有80万党员的党组织，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市政当局、各种社团等等有联系的党的机构。仅仅这一事实就可表明它具有比我党更高的组织程度。但社会民主党的力量还不仅在于此。除此之外，社会民主党还控制着强大的工会机构，操纵着消费合作社系统、保险机关和文化团体，它通过这些文化团体，对工人群众施加的思想影响远远超出自己组织的范围之外，它还依靠这些团体从组织上拉拢工人群众。

改良主义分子在上述组织颇有影响，这一事实本身就潜藏着危险性，这一事实造成了形势的严重性，正因为如此，必须加强反对改良主义，反对共产党内右倾倾向的斗争。

主要工业国家的共产党为能胜任自己面临的历史任务，必须充分理解这一课题的全部意义。

下面还谈一个问题。社会民主党取得胜利靠的是什么？也许是由于它在选举运动期间隐瞒了自己的企图？根本不是。社会民主党曾公开而明确地表示赞成联盟政策，但在革命的工人运动兴起的年代，该党反对工人阶级和摧残革命工人的行动却又不止一次地破坏了这一政策。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还是获得了900万张选票。

德国资产阶级明确地、不加掩饰地承认这一事实。它不否认在选举中的失败，不过它有个自我安慰的想法，即社会民主党现在在政府内部也承担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某些职能。《科隆报》在与重工业部门的某些机关报进行论战时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想法。例如，该报写道：“喋喋不休地一味谈论工人阶级向马克思主义方向的发展，是没有用的、多余的和有害的。当然，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共产党得票的增加说明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更多部分的资产阶级化。”

我并不是说这些事实对我们有决定性意义。但在我们某些党的分析中，过分小看了这些事实，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全部重要意义。这必然会导致低估任务的重要性和困难，导致削弱我们理应完成的工作。我们不是已看到，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已成功地拉拢了几百万工人，当然不是全部 900 万人，那种说法是不对的。但是，这几百万人确切无疑地已被社会民主党拉拢过去保卫资本主义共和国，维护这个国家的继续生存。社会民主党还成功地鼓动和唆使这几百万人去反对共产党人，教育他们把共产党人当作这个国家、这个资本主义共和国的敌人去加以痛恨。

而且，社会民主党的上述活动，恰恰是在工人阶级这样一部分人中颇为奏效，这部分人在工人运动和企业内的组织作用特别重大。黑克尔特同志曾说过，在我们党和其他许多党内有相当多的工人贵族分子，其中一部分，据他说，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有些革命党，如革命前夕的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组织等等，其骨干主要是由熟练的五金工人组成。它们的经验表明，熟练工人能更好地接受我们的影响。现在，技术在不断发展，工业的合理化正威胁着他们的境况，使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特殊地位逐步丧失，在

这样的条件下，熟练工人越来越容易接受革命思想。而大量未受训练的工人（“当前”状况的特点就在于此）则与此相反，在许多工业国家内，动员这种工人自己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是很困难的，况且现在的斗争与直接的革命形势下的斗争，性质完全不同。在革命高潮时期，工人阶级的这些阶层多数是最易冲动的分子。但在目前的形势下，动员他们独立举行大规模罢工，总的说来要比动员熟练工人（就与企业主的关系而言，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居于较有利的地位）反而困难些。必须认清这个事实，因为它说明了目前我们在许多国家的工会策略中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种种困难之由来。

为什么我如此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为了转入我们当前工作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现在，我们面前没有直接的革命斗争，因此，党和工人阶级首先应该摧毁本组织内改良主义反抗势力的壁垒，这是发动独立的斗争的需要。克服组织内部改良主义领导的反抗，打破束缚工人手脚的改良主义的羁绊，这一切是向企业主发动全面进攻的第一步。这里隐藏着右倾错误最主要根源之一，隐藏着右倾错误的客观原因。要知我们看到什么吗？我们党的工作中最严重的摇摆，恰恰发生在我们对群众组织的工作上。在这些组织中，共产党人的行动往往显得不明确，不坚定，而且由于自己思想上的软弱无力，因而缺乏动员工人群众参加战斗，并使他们摆脱改良主义羁绊的能力。在当前情况下，我们的同志，一方面拥有部分愿意斗争的工人，另一方面又有一部分觉悟不高、比较落后的工人。此外，他们还要同自觉的社会民主党骨干分子打交道，这些人起劲地反对共产党的政策，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共产党。在加强我党对工人阶级影响这项工作中，我们的党员同

志常常遭受挫折，其原因或是由于胆小怕事，或是由于投降情绪，或是由于能力不强；指导不够以及我们党组织的工作缺乏计划性也是原因之一。

当我们这个伟大的总的运动正一步一步地、迂回曲折地向革命接近之时，阻碍这个运动向左发展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在许多国家中，资本主义的联合及其相对的稳定已达到的程度，使改良主义分子获得了玩弄权术的一定自由。在德国，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这种玩弄权术的本领。改良主义分子一方面提出了将重工业收归国有的口号，另一方面，又阻止重工业部门的工人争取提高工资和减少劳动时间的罢工运动。一方面，为举行不会伤害整个制度的中等规模罢工开放绿灯，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又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联合政府，并为扼杀罢工开动仲裁机器。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会工作有哪些不到之处？它有哪些典型的特征？在许多场合下，我们工会工作的缺点是始终跳不出社会民主党的老框框，工作方法、影响群众的方法和组织罢工的方法，都是社会民主党得力的基层工会干部在一定形势下采用过的那一套。我们还没有完全抛弃掉这些过时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应该花气力的地方，而且在推广良好的工作方法、把主动权转交给群众的同时，还应该把实行这些方法同公开揭露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结合起来，这就是说要坚持不懈地要求他们执行由工会内有组织的工人作出的并经工会组织通过的决议所提出的任务。这还意味着在方法上要求得到统一：把工作重心转向独立地发动群众投入战斗，同时要提出要求，责成各地的改良主义领导人执行工人的决议。这样，我们就能使这些头头威信扫地，使社会民主党工人离开他们。在其他某些策略问题上也应该这样办。

总之，可以说存在着危险，这就是由于解决我们日常的策略问题而往往会把德国革命的普遍性问题置于次要地位。党本身也负有部分责任，由于日常任务繁重，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未来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考虑不周，讨论不深。

在这种客观基础上，产生了第三个右倾危险，这表现在右翼集团的某些倾向上。该集团提出了监督生产的错误口号，从而给党内某些人士带来了思想混乱。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究竟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我认为，这种问题不仅德国支部有，而且欧洲其他支部也有。或许只有那些条件完全不同的国家（如意大利和波兰等等）的党属于例外。

对于我们特别重要的首先是：从原则上彻底弄清所有问题，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从详细分析总形势逐步转向更确切、更清楚地为每个具体场合规定专门的任务和口号。

其次，我们亟需使党具备灵活运用策略的高超本领，要能对改良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每一个步骤作出更迅速、更有把握、更积极的反应。在我们的许多党及其领导机关内，常常发生不是他们领导工作，而是工作牵着他们走的现象。他们往往预见不到事件的发生，而是跟在事件后面跑，然后对自己的错误批评一番了事。我认为，捷克同志针对自己党提出的指责表明，正是这方面的重大弱点必须克服。克服这个重大弱点，主要是领导的任务，只有同党员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支持他们的主动精神，这个任务才有可能解决。

第三，必须认真地准备战斗，领导战斗，而这种领导应能丰富群众的经验，促进其组织性的加强，并能巩固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

为能圆满地完成这些任务，当然需要一定的党内环境。布哈林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就曾说过，在不同的党内，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倾向，没有充分的政治理由就拉帮结派，大搞派系斗争，从而妨碍了党的发展、党的生活及其他等等。我想扼要地谈谈这个问题。我认为，为能从原则上彻底弄清问题，为能获得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准备和进行战斗的本领，为能增强革命决心和组织性，必须创造某些先决条件。第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党的正确政策。大体上说，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我已说过，它应该更快地、更有根据地、并以更具体的形式产生出自己的政治路线。（台尔曼插话：“政策是大体上正确吗？”）是的，大体上是正确的。（台尔曼插话：“塔尔海默也是这么说的！”）我认为，每个党在执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时当然都会犯错误。因此，说党的路线只是大体上正确，这并不是离开了党的路线，正如同把草案只作为基础并不是脱离了草案一样。这就为进一步完善草案留下了余地。而需要我们加以改善的东西则是很多很多的。

第二个先决条件是正确的党内方针。我们是否存在偏离这个方针的倾向呢？同志们，在我们代表团的会议上，曾发生过关于右倾分子问题的争论。这种争论我们以前就有过。争论中，在采取一定的组织措施是否恰当，例如恢复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的党籍是否恰当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我们就这个问题发表的观点，在第九次全会后的联共（布）和德共代表团会议上遭到了拒绝。此后，在我们的分歧中，这个问题没有起过任何作用。全会以后，对于某些地区和工会内必须作一定的组织变动的问题，也没有不同意见。但是，与这一事实相反，竟发生了反对党内部分工作人员的倾向，而这些工作人员执行了埃森党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积

极地捍卫和贯彻了这一路线，并履行了自己在这方面应尽的职责。事情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第九次全会后通过的、不允许对右倾代表人物采取容忍态度的决议，竟被解释成对遵循党的路线的工作人员也要采取组织措施。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团会议上，更进一步宣布，构成主要危险的不是右倾集团，而是对右倾集团抱容忍态度的同志。许多坚持党的立场的同志，竟毫无根据地被扣上帽子，被说成是这个右倾集团的分子，而且还宣称，要对他们作出组织结论。我认为，这种路线正危及党内方针，它将导致新的派系斗争在缺乏充分的、有根据的政治基础的情况下重新抬头。这种做法必将给党的团结带来困难。在没有严重政治分歧情况下搞派系斗争，必将导致迷失方向，使错误观点和思想得到发展，使很有作为的党的工作人员感到害怕。必须在这种危险刚一露头时就发出警告，因为它已经有所表现，它还使德国共产党面临严重倒退的危险。这种路线将使党无法胜任面临的伟大任务，必将造成在党内生活中热衷于纯组织问题的局面。这种路线还会造成在领导问题上的派系掌权，使派系思想占统治地位。十分清楚，这种状况同对政治问题应取公正态度是不相容的。它造成的结果是，人人都把别人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在这种状况下，往往发生争执，而这些意见在正常条件下本可以通过协商顺利解决；每个党和每个党的领导层内不可避免的分歧，被广泛地用来为夺取优势地位和党内权力而争斗。这种状况使党的生活僵化，给党选拔新干部的工作带来困难，而布哈林同志所说的群众需要与党的干部水平不高之间不相适应的现象，也将因此而更为加剧。

显然，就连居于领导地位的多数派也可能蜕化为派别集团。这已见之于不同国家的党内。这种派系思想也可能产生于多数派，而

且我已经说过，在德国党内，在一定程度上就存在着这种危险。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别是俄国代表团的修正案，能不能阻止这种现象呢？我想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只有在所有各方真正决心贯彻通过的决议和改变现状的条件下，这才有可能办到。目前，改良主义在德国颇为得势，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需要反对右倾偏向及其代表人物，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在发言中也明确地强调过这一点。这个斗争容不得任何程度的忍让。但是，对右倾偏向不抱容忍态度，并不意味着只应采取组织措施来进行斗争。每个负有重大责任的党的领导层应该明白，组织措施乃是对付那些企图把错误观点带进党内的同志的最后手段。采取组织措施，是为了缩小错误观点的影响，是为了有效地同错误理论进行斗争。但是，与此同时，还要进行教育群众的工作，要采用说服的手段。改善党的状况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从党内的气氛中消除掉近来在党内产生的有害东西。为此，必须驳斥那种把一大批捍卫党的路线的同志看成是党的最主要危险的观点。在德国代表团会议上表达出来的政治观点，必将导致斗争的尖锐化。为什么我们反对德国代表团多数派就容忍态度问题提出的那种说法呢？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与它同时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我刚刚提到过的对执行党的路线的同志也要采取组织措施的方针。

我们对俄国代表团提出的建议表示赞成……（登格尔插话：“这是合乎情理的。”）……同时我们要说，如果多数派同志今后还坚持他们在代表团会议上维护的、在我看来是不容许的观点，那么，现状将得不到任何改善，相反，将恶化下去。必须特别指出，领导层和全党都应参加反对右倾偏向和观点的斗争，但其目的应

该是求得党的团结，团结所有领导力量，加强集体领导，巩固民主集中制。这自然就意味着党内少数派执行多数派的决议，不过，多数派同时也承担使用党内民主方法的义务，因为党内民主能使我们选拔出优秀的党的工作人员和干部。我相信，不论在德国，还是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都是十分良好的。工人群众为进行极其伟大的革命斗争而团结一致的过程，虽然缓慢些，但却在进行中。现在，资产阶级具有更大的侵略性，它正在准备对苏进攻。历史赋予每个共产党人重大责任——为革命竭尽所能和减轻党所面临的困难。不可能预言，对于某些党来说，决定性考验的时刻何时到来。我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必须指出两个前提，它们对于在未来的战斗中团结群众、赢得战斗胜利、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成就是极其重要的。第一个前提，这就是联共党在其一贯执行的工人、贫农与中农群众结成联盟的政策基础上团结一致，这项政策也是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团结一致的最重要保证之一。第二个前提，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德国，执行这样一种政策，它应能保证各国共产党冲破阻力，接近工人阶级的新阶层，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应能促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向更高形式发展。

我想本着这个精神结束我的发言。我相信，我们的大会也会本着同样精神为德国共产党提出行动的指导路线。这将不是一条悲观主义的路线，而是对我们面临的危险所作的正确判断。同时还应通过最认真的工作为迎接革命进行准备。必须把可能导致德国共产党已经摒弃的旧的派系斗争再次出现的种种观点，从党内排除出去。

斯特拉霍夫（中国）：

同志们，因为纲领和殖民地问题还要专门讨论，我今天只对总提纲简要地提点意见。先谈国际性问题，再谈中国问题，因为正是在这个领域内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策略问题。

同志们知道，中国人一般都有点“民族局限性”的缺点，虽然中国共产党内有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的知识仍十分贫乏，尤其是在国际问题上。因此，我只是提出一些国际问题。我对许多国际问题不甚了然，但是仍想谈谈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总的形势。现在总的形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稳定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日益增长。我们面临着战争危机、反苏战争的危机以及干涉中国革命的危机。

共产国际的总任务就是防止战争，保卫苏联和保卫中国革命。可能这三项任务就是所谓第三时期的特点。但是，我认为，这里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在经济分析方面，在谈到工业生产力的增长、技术的改善等等情况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了一下新经济形势对农业、对亿万农民境况的影响。这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够清楚的。

农民的作用，不论在东方国家和殖民地国家，还是在欧洲国家，对将来的战争都是举足轻重的，无论如何，不会亚于农民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1914—1918年）曾起过的作用。这个问题同共产国际的整个策略问题，同无产阶级对待农民的策略问题有关。许多同志，特别是罗马尼亚、波斯、保加利亚等代表团的代表们已经提及这一点。我同意这些同志的意见，而且建议在提纲中更确切、更清楚地阐述这个问题。

至于殖民地问题，这个问题是相当清楚的。现在，殖民地农民普遍赤贫化，许多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欧洲各国国家资本主义方兴未艾，这种组织程度更高的资本必将变本加厉地剥削本国的农民，特别是殖民地的农民。如果战争就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市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那么，殖民地和许多东方国家，即所谓农业国，恰恰就是这种原料产地。由于殖民地国家中的土地逐步兼并到地主和高利贷者手中，因而农民的土地逐渐丧失，东方各国的土地问题就变得日益尖锐了。我们亲眼看到，不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土地问题成了中心课题，是目前时期革命的主要内容。如果发生战争，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发生战争，那么，中国和印度的农民就一定会说出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谈谈提纲的第三点。这里对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作了精辟的分析。我认为，似乎应该更详细地分析所谓的太平洋问题。现在大家都认为，或者说，至少是倾向于这种看法：一旦发生战争，远东将会起到第一次大战期间（1914—1918年）巴尔干各国所起到的同样作用。太平洋问题涉及到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和印度。这里是世界矛盾的总汇。由于日本武力干涉济南，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虽然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战争尚未发生，但是，实际上由日本、英国，现在又有美国（美国支持蒋介石）所操纵的中国军阀之间的战争已在一处或多处进行着。我认为，这就是应该更详细剖析的太平洋矛盾的问题和课题，因为中国和日本的党还很年轻，缺乏国际经验，还不能独自剖析这些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具有世界意义，它不仅对殖民地，而且对欧洲和美国都是至关重要的。须知美国是当今世界霸主，它将在太平洋战争中起主要作用。

自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在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次全会期间，中国党未曾收到过有关国际问题的任何决议。我们只收到

最近一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而那也是会后两个月才收到的。我们代表团在讨论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时，对于其中提到法国党内对第九次全会关于法国问题的决议持有某些反对意见这一点，我们不了解内情。在这里，我们才发现了一些过去从未能找到的资料。在直接涉及中国的远东问题或太平洋问题上，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在大会上提出来，还应通过书籍或小册子广为传播。如果不能在大会上提出，那么，执委会今后应当向所有与太平洋问题和印度问题有关的国家发出相应的指示。

由于我们在提纲中得不到足够明确的答案，由于事情涉及到农业问题、殖民地问题和太平洋问题，所以，在我们看来，所谓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区别甚微。（有人喊道：“对！”）不错，提纲中提到了战争，提到了保卫中国革命，并且还有一个特殊问题——保卫苏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因为当时还处在一系列帝国主义国家承认苏联的时期。只是在中国革命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地步，并开始威胁英国之后，英国才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而这是不久前，就是去年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提纲中还是应该提出第三时期，但是，要更详尽、更准确地提出，为什么所有列强在现在开始认真准备反苏战争，而不是在我们召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等等。需要更明确地提出来的就是这些问题。这对于那些缺乏国际知识和国际经验的各党尤为必要。

现在我再谈中国问题。中国革命遭到了严重失败。姑且不谈我们领导上的机会主义错误，我只是要说，这次失败的客观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的强大。事实上，帝国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是我

国国内反革命力量的组织者。1927年初的中国革命战争高潮没有得到西方，如德、英等国无产阶级的强大革命运动的配合。印尼和印度也未发生殖民地起义。即使当时发生这些情况，其规模也不够大，不足以造成对我们的声援，就更不必说当时我们的革命是处于上升的形势，而英国的总罢工已是失败的局面了。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向我们每个兄弟党提出这样一项任务，即做好准备，以便在可能发生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第三时期，西方和东方能在全世界协调一致地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其次，必须指出，由于阶级力量经历了重大改组，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现在更加增强了。我们现在多次谈到的广州起义，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是它彻底打消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即苏维埃革命的新时代。广州起义以后，中国革命抛弃了任何右的和左的国民党的旗帜，正在并将永远在苏维埃旗帜下前进。

我们知道，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城市的工人运动呈现出消沉情绪，当然，目前它已不像城市工人运动横遭镇压的恐怖时期那样突出地令人感觉出来。但是农民自1927年秋开始直到现在从没有停止过地方性的起义。他们建立了许多乡、村苏维埃，数量达131个。其中许多遭到反动派的破坏，但是也有许多保存了下来，或又重新建立起来。保存下来的苏维埃驱逐了本地的地主豪绅之流。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的城市起义（如广州起义）不能取胜，如果胜利了又得不到巩固，那么中国革命能否（哪怕是在几个省内）胜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此就要求我们加强工会的群众工作，以使工人运动恢复元气，以使中国工人阶级能够真正领导农民。至于我们的错误，这

里我想谈几点看法。弄清别人对我们的错误应承担几分责任，对我们来说是并不重要的，别人为我们少说几分错误也无关紧要。对于我们至关重要，应该弄清楚我们的错误究竟在哪里。问题就在于，在武汉时期，我们对待农民的策略，以及我们对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态度，完全是非布尔什维克的。这就是我们的主要错误。（有人喊道：“对！”）如果过去我们说过，甚至同民族资产阶级结盟也是必要的，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要变成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期，为了联合小资产阶级，我们自己在政治上却变成了小资产阶级。再者，也不能说，既然我们应当和全体农民结成联盟，或更准确地说，和农民的大多数，即贫农和中农结成联盟，那么我们就应该变成农民。而我们曾经有过，也许直到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既然农民群众要求平分土地，那么我们的党，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应当同意这种纲领。他们真以为，这种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在于，要以过去的错误为戒，端正我们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要贯彻这条路线，我们就得有独立的阶级立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领导中国农民。谁都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已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阶级，完全投向了反革命阵营，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依然是革命的动力。革命斗争的矛头不仅是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且要指向中国资产阶级，因为不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作斗争，不推翻国民党反革命政权，不打倒一切军阀，不实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力争在城市中建立立足点，争取群众，为新的高潮做好准备，因为除了革命以外，其他任何途径都不可能解决土地问题。现在我不能详谈这个问题，我只是要说，目前中

国反动政权保持“稳定”是可能的，其他一切情况也都是可能的，但是，要想使中国资产阶级（即使有美国资本的帮助）完成中国的土地改革，这是办不到的，这是不可能的。目前中国的形势是，赤贫化发展迅速；地方性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在南方，有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农会；在北方，运动具有原始的、半宗教的农民战争形式（北方的农民发动，大多数被富农，甚至小地主操纵，他们暂时也反对军阀）。关于农民问题就谈这些。这里还有个重要的士兵问题。士兵也就是破产农民，他们既不能到工厂做工，又找不到别的工作。须知这些农民和士兵——汪洋大海般的群众，现在每天都在威胁着土豪劣绅，使他们深感恐惧。除非彻底消灭农民和士兵，否则谈不上消灭革命。但是，一当他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动起义的时候，谁也抵挡不住如此广大的群众。显然，由于中国的这种形势，军阀混乱必将继续下去，必将成为形形色色帝国主义国家政策的传播工具。但是，即使有国际背景的军阀混战继续打下去，即使中国资产阶级和军阀联合行动，甚至借助各种改良方法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那也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现已胜利在望。不，我们的敌人十分强大，他们虽然相互厮打，但同时又组成统一阵线镇压我们，他们用白色恐怖，用你们西方同志闻所未闻的白色恐怖来扼杀我们的运动。我们中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里竟煞有介事地谈论法西斯主义是什么东西，工会官僚和国家官僚相结合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所有这一切我们是太熟悉了。中国之所谓“工会”，本来就是遵奉国民党政府、南京政府、北京政府之类的旨意建立的。它们干的是白色恐怖勾当，而我们所听到的在意大利发生的那些“小事”，它们是决不干的。它们在杀人，它们在杀工人，在广州3天之内就杀了5700名

工人。他们不是一般地杀人，而是在杀人时还施展亚细亚式的残暴手段。我无法用俄语来表达这种惨状，因为对应的汉语词句是难以翻译的。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的。我们必须工作，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准备新的高潮，因为高潮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经出现了某些征兆。因此，我认为，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对于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评价，是正确的。我知道，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这个任务也就是为今后必将出现的新高潮，为举行武装起义做好准备。在新高潮必将到来的情况下，我党和中国无产阶级的迫切任务就是使党在必要时刻做好起义准备，因为只有采取武装斗争手段才能打倒整个国民党败类。用其他方法来完成和解决中国革命任务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提纲中应当明确规定出我们的这个任务，因为如果笼统地谈对工农的群众工作问题，那么这个任务对一切时代，对所有党都是适用的。现在必须像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会所做那样，明确规定我党的总路线是为争取群众而斗争。必须强调指出：现在，在两个革命浪潮之间的时期内，党的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党的责无旁贷的、刻不容缓的总任务，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或至少在较大范围内，为胜利的、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做好准备。

因此，在工人、农民和工会中间做群众工作，巩固党等等，乃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只有到那时我们的形势才会明朗起来。

最后，我谈谈倾向问题。有人说，如果说西方国家存在着右倾危险，那么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则是“左”倾盲动主义的危险。是的，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盲动主义危险。大家看到，在那里，倍受压迫和贫困破产的广大群众，往往走投无路，铤而

走险。我们党应当坚持布尔什维克路线，领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不是跟在他们后面跑。但是，在济南事件以后，当城市反帝运动开始有些活跃，小资产阶级群众趋向“左”倾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发生新的右倾——机会主义重新抬头。阐述这个问题的文件，是我们在听过布哈林同志报告之后收到的。我们的文件指出，近来，在6月底，有些同志认为，现在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应该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口号，应该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更有甚者，居然还通过党组织作出了这样的决议。何谓恢复民众运动？大家昨天可能看到了《真理报》的报道，目前，上海的银行家和资本家要求“重建”或“恢复”（两词汉语含义相同）民众运动。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当国民党还革命的时候，它设有工人部、农民部和妇女部、民众运动委员会、示威游行筹备委员会等形形色色的组织。现在，这些东西早已无影无踪了。广州起义以后，各种力量两极分化，国民党明令禁止“民众运动”，撤销了上述各部，而现在资本家、银行家和“第三党”却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担心，正在兴起的工农革命将要推翻他们，需要下点功夫美化和粉饰国民党政权，为其恐怖政策开脱罪责。“虽然我们搞反共的恐怖活动，但是你们不是看到我们开始组织工会了吗？”就应当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恢复民众运动。可是，我们的同志却要提出这种给工农队伍带来幻想和混乱的口号。我们应当号召群众起来争取自由，而不是“号召”国民党恢复它的“民众运动”。至于国民大会，这个问题大家是很清楚的。即使我们依旧不提苏维埃口号，难道能够不提武装起义问题，不提坚决战胜国民党和军阀问题，反而提出召开国民大会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口号吗？不管召开什么名目的会议，现在一概不能提这个问题。召

开这个会议的将是军阀，而参加这个会议的必然是一切残渣败类、我们所说的各式各样的“军阀走狗”和一切军阀代表人物，尽管他们完全可能同时是某某“工会”的代表，但是，他们一定是李济深、蒋介石或别的什么人委派的。现在我们绝不能提出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或国民大会的口号。否则，就可能意味着完全否定或取消苏维埃的口号。看来，我们也应该指出这些右的倾向。（有人喊道：“对！”）

最后，我要说，我们指出新高潮的一些征兆，指出它的必然到来，决不是聊以自慰，而是因为我们面临一场极其严重的斗争，我们的敌人是包括最强大的美国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反革命力量。这可不是玩笑！必须指出，我们应该锤炼我们的党，应该动员群众，应该动员整个共产国际，以准备迎接远东的革命高潮。

因此，我向大会呼吁，号召一切外国同志关注远东问题，并尽可能改进我们之间——中国党和其他党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世界性的远东问题的重心所在。今天我们在报上看到，英、美两国都在向满洲渗透。我们知道，日、美、英之间的矛盾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美国金融资本很可能企图借助于日本染指满洲、蒙古和华北。美日之间也可能爆发武装冲突。总而言之，我们共产国际各党对此应有充分准备。

赖斯特（英国）：

关于青年共产国际已完成的工作和当前任务的问题在大会的工作中占有显著地位。这自然是由于最近一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青年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中起了重要作用，而青年共产国际未来发展的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巨大意义。

布哈林同志极其详尽而确切地介绍了青年共产国际的现状，

并指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广泛推行新的工作方法，同时还要保持青年工作的战斗性政治特点。大家还认识到，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应成为推广新工作方法的重要阶段。同时，我以为我们应当承认，在群众组织中采用新工作方法和加强我们的积极性方面，已经迈开了步子。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青年共产国际想掩饰采取果断措施以推行新工作方法的极端必要性，而只是为了明确这样一个事实，即采用新工作方法和扩展群众工作的基础已经奠定，现在需要的是青年共产国际的所有成员加紧工作，以使这些新工作方法将来成为青年共产国际活动的鲜明的固有特点。

许勒同志在报告中已经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在工会工作方面的实际经验，使我们青年不得不承认，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关于青年组织在工会内部不必采用特殊工作形式的决议是错误的。实际经验表明，必须发展诸如少年支部、青年委员会和青年代表制等特殊的工作形式。承认这个事实，就是向推广新方法迈出的一大步，至于说认识到在工会中必须采用新的工作形式是来之于实际经验，这种说法当然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把目前青年共产国际在工会工作中的地位同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前的状况相比较，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时只是讨论过这个问题，只是在我们的报刊上谈到过这一问题，而现在共青团则日益广泛地（当然还不够）投身到青年工人的日常战斗中去。

下面我谈谈青年的经济斗争和罢工。许勒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谈它只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工会工作。

以德国为例，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前，我们在工会内只拥有200个职位；而现在，德国共青团成员所占有的工会职位达700

个，此外，还有共青团领导的 120 个青年支部。

英国的经验还证明，共产主义青年有能力在改良主义工会内开展工作，同时还发展了特殊的少年组织。在五金工人工会和矿工工会内，我们做成了两件事：一是在共产主义青年提出的要为共青团的最低纲领而奋斗的口号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专门的青年委员会；二是通过选举向各种工会机关输送了一批青年代表人物。此外，我们还在工会内部召开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青年代表会议。这种会议既为英国共青团，也为整个青年共产国际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因为这涉及到工会内部的工作方法问题。

在红色工会内开展工作较为容易，因为我们在那里工作的青年同志，可以得到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的支持（尽管不都是十分有力的支持）。例如在法国，参加法国总工会的工人达 50 万人，我们在 9 个大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内都拥有青年代表：在总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内我们有 2 名代表；在五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有 5 名；纺织工人工会中 3 名；木器工人工会中 2 名；公务员工会中 2 名；矿工工会中 5 名；食品工人工会中 3 名；建筑工人工会中 3 名；化学工人工会中 2 名；制革工人工会中 2 名。这就是说，总共有 27 名青年代表参加领导机关。

此外，在各种工会的省一级所有委员会中都有青年代表。他们组织青年代表会议，领导工会中的青年工作。不难令人相信，由于在工会中广泛运用上述各种组织青年的形式，由于修改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扩大工会中的群众工作就有了可能，这反过来又为共青团扩大自己的影响提供了条件。然而，必须指出，在红色工会内，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是由领导机关指派青年代表来开展此项工作，而不是建立在

青年自身积极性的基础之上。这种现象在捷克斯洛伐克尤为严重，青年共产国际在这个国家的工会工作中所作成绩极微，青年只在一个纺织工人工会中有组织地开展了工作。

在谈到红色工会内的工作时，我还可以说，我们同红色工会国际的相互关系不仅大有改善，而且可以认为是十分令人满意的。最近召开的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曾就青年问题通过了青年委员会制定的决议。此外，选自青年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而且还有青年代表被选入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趁此机会，我要着重指出，各国共产党应当重视工会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不要使它成为一纸空文，工会内的党组织应大力贯彻这一决议。这一点十分重要，尤其是因为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近几个月来特别重视青年工作。当然，它这样做是因为想同工会内共产主义青年日益增长的积极性作斗争。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并建立了一个与青年社会主义国际保持极其密切联系的委员会。由此可见，得到党的积极支持，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在工会内开展工作是多么的重要。而且，这种积极支持不仅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体所需要的，在吸收未加入组织的青年参加工会方面也需要这种积极支持。现在的问题是，广大青年工人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因而我们面临着一项重要任务——把这部分青年吸收到工会运动中来。

现在，改良主义头头们（特别是在英国）正蓄意破坏我们在组织青年工人参加工会方面的努力，因为他们知道，青年是潜在的革命力量，此外，青年工人一旦加入工会，就会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将加强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反对改良主义官僚的力量。

鉴于我们负有组织青年工人、组织未参加组织的青年工人的

任务，我们应当再次强调广泛采用新的工作方法并要求各共产党在这方面给予协助。以英国为例，纺织工业地区的织补工（纺织工中的一个专业）正在开展一项运动。织补工们组织了称之为“织补工改革运动”^①的委员会，动员青年工人为争取加入职工大会（这个反动工会一直拒绝吸收青年工人入会）的权利而斗争，或者虽然被接受入会但在权利上受到限制时则为争取享有充分的权利而斗争。青年工人用组织非正式委员会的形式为争取加入工会的权利而发动的这个改革运动，是一种值得我们各党注意的重要工作方法。

鉴于我们负有把未参加组织的青年工人组织起来的任务，我认为必须着重指出在东方组织青工和童工的重要性。青年共产国际已经注意到这项任务，向红色工会国际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已采取措施把在东方国家工厂中劳动的青工和童工组织起来。

下面我要谈的是群众组织中的另一项工作，也是青年共产国际活动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这就是体育组织中的工作。首先必须坦率地说，我们的青年团并不懂得体育组织对于青年共产国际的全部重大意义。对体育组织的工作极不重视。

青年共产国际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突出地强调在体育组织内部有计划、有组织、周密地开展工作的必要性。即使在那些已成立了红色体育运动国际支部的国家里，我们的青年团以及共产党也没有在红色体育运动国际支部内进行有组织的党团工作，其结果是，共产党在这些支部内的领导不够有力。因此，必须要求各国共产党认清体育组织对于青年共产国际的全部意义，

^① 英文名称为“Piecers Reform Movement”。

并协助它开展这一工作。体育组织对于我们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扩大共青团影响的手段和发展新团员的场所，而且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领导下，它能够参加反对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斗争。社会民主党对体育组织是十分重视的。同志们知道，现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正在开展把革命分子和红色体育运动国际的拥护者从改良主义的体育组织中清除出去的运动。他们这样做自然是为了尽可能地使共产党人更加孤立于工人群众组织之外。卢塞恩体育运动国际是一个影响颇大的、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因而就更需要我们对发展红色体育运动国际的工作予以关注并付出精力。必须指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红色体育运动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遗弃的”境地。在我们这里，红色体育运动仿佛成了“灰姑娘”。我们的共青团和共产党应该既从发展共青团的角度，也从发展共产党的角度考虑问题，充分认清和理解红色体育运动国际和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红色体育组织的重大意义。

8月份将在苏联举行的斯巴达克运动会，应该成为开展旨在扩大红色体育运动国际的大规模运动的开端。今后，在那些至今都不曾有过工人体育运动的国内，共产党应协同共青团采取措施发展此项运动。以英国为例，虽然它号称体育的发祥地，但这里却不曾有过工人体育运动。那里只有一个名存实亡的称为“英国工人体育联盟”的运动。这个联盟根本不进行，或极少进行工作。改良主义分子虽也承认这个联盟，但却不给予任何帮助。共青团已开始在这个组织内进行工作。由于开展了积极的活动，还由于依靠了原有的联系和同俄国体育运动的交往，我们得以大大发展这个组织。现在，它已拥有5 000名左右成员，而且看来它

还能为进一步发展做很多事情。共产党人在这个组织内部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尽管卢塞恩体育运动国际阻止该联盟参加斯巴达克运动会，并为此作出决议，但是共产党人争取该联盟参加运动会的活动获得了成功。职工大会根据其压制任何真正积极性的政策，撤销了它对联盟的承认，现正采取措施建立与资产阶级体育运动合作的内奸组织，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地把该联盟的领导权掌握到自己手中，并使该组织得到发展。

最后，既然我们谈到了体育运动，我们就应看到，资产阶级，特别是为配合工业合理化的实行，正集中力量为建立工厂的和公司的体育俱乐部而加紧活动，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指出体育工作的重要性。资产阶级这样做是为了扼杀青年工人日益提高的阶级觉悟，诱使他们脱离无产阶级组织，也是为了利用这些体育机构来增强青年的体质和消除由于生产过程合理化从而使劳动强度提高而造成的过度疲劳。争夺青年的斗争，特别是在体育领域内的斗争，同在工会内部一样日益加剧，甚至比在工会内部还要剧烈。因此，共青团加强自己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我谈的只是上述两类群众工作，但它们都是极其重要的工作。我认为，青年共产国际在这方面已经采取的措施，将能保证我们坚定而果断地贯彻执行大会提纲中提出的关于开展我们的工作的一切指示。

会议休会。

第十三次会议

(1928年7月27日)

主 席：塞莱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麦利哈尔（捷克斯洛伐克）：

布哈林同志提纲中关于共产国际捷克斯洛伐克支部的主要缺点和错误的阐述是完全正确的。党十分消极被动；它不大能够迅速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性的反击，它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过高地估计了合法性的作用，对农民重视不够，而且克服工会工作中的缺点也极其缓慢。

然而，党在最近期间的行动却暴露出更多的严重失误，对此我们必须完全直言不讳地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加以叙述。

为了客观地评价这些缺点，必须了解党的整个发展情况和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

与大多数共产党不同，捷共是从几个社会民主党脱胎而成的，捷共的主要干部就由这些党的党员组成。几个独立的共产党民族支部联合在一起，构成了统一的有各种民族成分的捷克斯洛伐克

共产党。

这个党在最初发展阶段只不过在名义上称作共产党。它的整个思想和实践，由于大多数党员保留着根深蒂固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仍然具有社会民主党的性质。直到不久之前，即 1924—1925 年期间，党的整个思想和实践同党所面临的革命任务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从而出现了深刻的危机，正是在克服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党才成长为真正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由一度得到相当多党员群众支持的取消派和明显的机会主义者所组成的强有力的小集团被粉碎了；一个核心小组建立了起来，其目的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以及同党的队伍中的机会主义作斗争。这个核心小组的使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引导全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核心小组胜利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这一点毫无争议。党的团结统一得以保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也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效。

胜利进行的多次发动，大大加强和扩大了党对城乡无产阶级各阶层的影响，从而使党在 1925 年 1 月的选举中赢得了将近 100 万张选票。去年市政局的选举和不久前的工厂委员会的选举运动都证明，近年来上述影响又有所增长。党的影响的增长也反映在组织方面。今年党员人数将近 15 万人，而去年，在党内发生危机之后，为 72 000 人，1926 年为 92 000 人。崭新的党的机关建立了起来，进行了分工，所有党的活动分子都掌握了新的工作方法，并学习过如何运用这些方法。党按照在生产单位建立基层组织的原则进行了组织调整，大部分企业的基层组织都积极开展工作了。与此同时，按列宁主义的要求对党员群众和工作人员进行了训练，并且吸收了有理论基础和经过实践锻炼的新生力量参加党的工作。

但是，尽管取得了上述种种成绩，党内仍然存在许多缺点。这一点在组织最后陷于失败的“红色节”的行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这些缺点中最严重的一个缺点，仍然是大多数党员群众表现了一种极端有害的消极被动状态，这个缺点不但感染了全党，而且妨害了党的活动分子的工作。党员群众思想水平低和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依然强大，对党来说也是一个重大障碍。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争取社会保险运动的第一阶段，即实际实现自下而上建立统一战线之际，并且几乎使整个运动转向机会主义方向。

另一个缺点是，按列宁主义的要求进行教育不够，特别是对青年教育不够，既缺乏经常性，也未能普及到广大群众，而且没有同党的实际活动联系起来，致使我们在这方面的一切努力至今收效甚微。同样，通过吸收党员群众参加研究和决定所有党务问题而对他们进行实际教育方面的工作也极其薄弱。

党在工会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中的党团工作也出现了严重错误。被撤离党务工作的所有机会主义分子都涌向这些组织，而由于他们具有实际工作经验就被委以重要工作。他们进入了各种组织的共产党党团的领导层，然而他们不是帮助党在这些组织中扩大和运用党的影响，而是在那里同党进行斗争，阻挠这些组织实现党的任务。

最近以来还发生了另一个过失，那就是大大延缓了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除了上述种种情况外，其原因还在于生产单位的基层组织在加强活动时遇到严重的障碍。这些障碍一方面是客观条件造成的（残酷的迫害、企业中特务活动加强、合理化迅速实现并带来种种后果），另一方面也有主观的原因。建立生产单位

的基层组织本身和党员转入这些基层组织的进程相当顺利。但是，生产单位基层组织加强活动所遇到的困难却导致一些后退的现象。部分党员不愿意积极参加生产单位基层组织的工作；由于一开始就出现种种困难，使他们对于工作是否适宜产生怀疑，于是他们又回到街道基层组织。出版工厂小报也发生同样的情况，报纸的数量去年有所减少。生产单位基层组织的领导机构同工厂委员会党团及其领导机构的联系未能完全实现。所有这一切延缓了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而党的领导机关也未能及时通过对各个组织执行任务的情况作出更详尽的指导和细致的监督，来克服这种危险的现象。

除了上述各种普遍性的严重错误外，还存在以下缺点：

企业中党的工作薄弱，对党在工厂委员会中的阵地未能很好地加以利用。这一失误在争取召开工厂委员会各省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运动中显露了出来，以致这一运动虽然对无产阶级群众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但对党来说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把工会工作当作某一个特殊部门的工作来进行，而不是看作为全党的工作。

党的机关仍然没有充分开展对无产阶级妇女的工作，没有把这项工作同妇女的日常要求结合起来，而是过于抽象地看待这一工作。对实行妇女代表制度的工作组织不力就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党的青年工作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与广大青年工人群众相隔绝，在工会中几乎毫无影响。而在这方面也是党的过错所致。它对青年重视不够，结果自受其害，因为青年人入党的很少。

我们公开承认，应对这些缺点负责的首先是党的领导机关。它们未能及时注意激发党员群众必不可少的主动精神，对他们执行所承担任务的情况进行监督，并不断给以指导。关于党在组织“红色节”中遭到失败的原因，曾在各组织中进行过讨论。共产国际六大结束以后，我们将公开进行这一讨论。通过这样的讨论，不仅能够揭露出党的工作的所有缺点，而且还能找到克服这些缺点的途径，进而使捷共的布尔什维克化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使捷共真正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

洛佐夫斯基（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党党团）：

我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主要想就工会问题向大家作一些说明。你们知道，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国际在各次代表大会和执委会全体会议上都曾通过相当明确切实的决议。在涉及各个国家的决议中，国际执委会也大力强调必须开展工会工作，组织工会，等等。但是，如果你们想完全客观地总结最近4年来各国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工作，你们就会不得不承认，事情的进展极其缓慢，而在许多共产党人看来工会工作问题、在群众日常需要的基础上组织群众的问题，仍然还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不是经常性的实际问题。

当然，如果说根本没有任何成绩，那也是错误的。成绩是有的，但是各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增长同它们在工会中的影响相比，同它们的影响在组织上的巩固相比，则是完全不相称的。

这种不相称的状况已经成了所有各国共产党的传统，而这很不好。许多同志虽然确认这一事实却又心安理得，忙于从事日常的迫切工作。然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的剪刀差继续加大，势必也将阻碍各国共产党对群众的政治影响的增长。

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把有关工会的策略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并再三讨论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组织工作的方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 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今年2月底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非常仔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全会为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共产党人规定了方针，这个方针体现在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和各项决议中。

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是世界工会运动中的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这不仅因为有代表参加的国家数量众多，而且还在于这次大会的性质突出，工作规模很大，通过了众多的决议。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严格的自我批评的旗帜下举行的。尽管我们遭到阶级敌人的无情攻击，我们在会上仍然坚决揭露自己的所有缺点。资产阶级的报纸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抓住一大堆我们的批评意见、我们的批评性发言和决议加以利用，试图证明自我批评恰是虚弱和衰败的象征。对于这类攻击我们可以不加理会。我们不羡慕改良主义的“诸事顺遂”，也不准备加以仿效。代表大会不是国际间的聚餐会，可以让工会官僚们在空闲时间如同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那样大搞个人之间的相互攻讦。召开革命工人的代表大会是为了进行总结和确定今后开展斗争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做的。

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特点在于，除了涉及所有国家的一般性决议之外，还就某些重要的国家和重要的问题通过了

一系列实际的决议,也就是说,我们代表大会的大部分决定都具有纯粹实际的性质,也可以说具有指导的性质。我想在座的代表都已了解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人员组成、工作性质和各项决议,因此对这一切不准备详细叙述。

还想再说明一下的只有以下两点:1. 在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极其彻底地揭露了我们的一切缺点和错误,因此现在谈论红色工会国际及其所属各个组织的弱点和错误是没有意义的;2.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提出的总方针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也不可能不如此,须知参加工会活动的共产党人无论现在、过去和将来都始终贯彻执行自己国际的路线。

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反对派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虽然有各国党和非党的代表参加,所有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既然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他们所代表的组织如此一致,看来似乎他们都将坚定不移地贯彻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但是,第四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就已发现,有人并不喜欢大会的决议。在德国和美国,已出现有组织的反对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反对派。德国共产党内的右派分子妄图诋毁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正确性,而且他们在各地区都提出了明显地或隐蔽地反对代表大会决定的各种决议案。

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中有哪些内容引起右派分子的不快呢?他们所不喜欢的恰恰是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不同于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处,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正是这样

来表述他们对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攻击的：“其决定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相矛盾。”似乎国际的任务就在于在每一次代表大会上都重弹同一个调子！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有哪些独到之处呢？这次大会对于我们的策略提出了什么新的内容呢？这些新的内容可以表述为以下几点：

1. 强化反对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及其世界中心——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斗争。

2. 实行以自下而上为主的统一战线策略。

3. 领导经济斗争，如果改良主义的工会机关涣散群众的斗争意志，也要反对改良主义的工会机关。

4. 在工会运动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中要加强革命的工会联合组织，不仅要吸收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而且要吸收已被争取到我们一边的改良主义组织参加。

5. 在重要工业部门的工人还完全没有联合起来的地方（如美国）把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组织成新的工会。

6. 强化反对开除工人的斗争，谴责投降主义和不惜代价寻求统一的策略。

就是这几点引起了德国共产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攻击。从各种会议的记录可以看出，反对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人竟提出这样一类论据来反对所通过的决议，使人有时不禁想到这些论据是出自共产党人之口还是来自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我列举几项并非在社会民主党的会议上而是在共产党的会议上十分流行的这种“思想”的杰出范例。

头脑混乱的德国右派分子的思想

斯莫尔卡同志在图林根州委员会扩大全会上抱怨说：“诸如‘阿姆斯特丹分子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一类提法，在我们所处的局势下是极其危险的。”波勒则认为，“如果有人以为必须采用阿姆斯特丹分子是资本的盟友和工贼的提法，那我们就无法继续前进”。

南德一家工人报纸的编辑哈默尔同志怀疑，“难道能说阿姆斯特丹国际是资本家的工具？”按照他的看法，“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给我们在工会中的工作造成困难”。

德国共产党图林根委员会政治书记蒂特尔同志认为，说阿姆斯特丹分子是资本主义的工具的提法是不正确的。

不过，还是克劳斯同志在斯图加特市委扩大全会上对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最为明朗。照他说来，加强同改良主义者的斗争就是为分裂制造前提。进行维护罢工委员会和争取建立罢工委员会的斗争是错误的。提出“反对改良主义者”的口号是错误的。把反对仲裁制的斗争放到首位是错误的。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关于必须在吉尔什敦克尔派工会和基督教工会等工会组织开展党团的工作的决定是错误的。

例如，斯图加特的克恩同志之所以反对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因为：第一，通过了关于建立罢工委员会的决定；其次，通过了关于必须在基督教工会和吉尔什敦克尔派工会中建立反对派小组的决议；以及最后，对阿姆斯特丹国际作为同帝国主义者勾结的组织进行了批判。此外，克恩同志还反对我们对仲裁制采取否定的态度。

我可以从恩德莱、豪森、瓦尔歇、梅尔歇尔、施特雷贝尔、施图克、弗伦策尔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文章和演说中摘引几十段话来说明，他们不是为贯彻执行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定而积极工作，而是表现出严重的具有腐蚀作用的悲观情绪，并在事实上拒绝在德国贯彻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些同志被改良主义的强大所慑服，他们习惯于老的一套，他们对于充当毫不负责的反对派角色已经十分习惯，以致于只要稍一试图把他们从发表反对派言论的地位推向群众工作舞台，迫使他们在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时采用新的方法，以及运用在群众中已经赢得的影响发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统一战线，他们就会拼命抵抗。这是一批被改良主义吓破了胆的变态的共产党人。

那么这类反对意见究竟散发着什么气味呢？我们看到，德国共产党的这些党员染上了（但愿说得缓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的毒素。既然这些党员是从这样的角度对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表示异议的，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他们原先究竟是在哪些方面赞同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我不想对这些思想混乱的人逐一进行批驳，也不想劝服他们。我只准备指出一点，莫纳特在自己的机关报《无产阶级革命》上就是逐字逐句这样写的。但是要知道他置身于共产国际之外，而上述那些同志却身在共产主义运动之中。有一点十分清楚：谁在共产国际内部就这类问题进行争论，谁同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就是非常微弱的。我们关心的是另一点：对待问题的这种不正确的而且是明显反共产主义的态度根源何在？毫无疑问，根源在于对于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左”派社会民主党的评价不正确，对工会组织抱有偶像崇拜的态度，以及采取不惜代价寻求统一的错误策略。克尔同志说过一句绝妙的名

言：“工会的任务是对剥削加以调整。”这句话足可以作为例子说明，我们面对的是地地道道的社会民主党倾向，因为没有一个人阿姆斯特丹分子会比这一句话说得更加精采。现在谈谈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政党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值得借鉴，因为虽然相当多的工人阶层都跟着这个党走，但社会民主党是否是工人政党的问题仍然存在。德国共产党的右派分子认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政党“之一”。从“左”派社会民主党口中也同样可以听到这样的论断，他们一直在讲存在两个工人政党。但是这样讲是否正确呢？难道一个党的政治面貌是由它的社会成分决定的吗？迄今为止，我们都不是这样看待此类问题的。当然，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好，法国社会党也好，英国工党也好，它们都拥有相当多的工人阶层，但是难道德国的中派没有工人吗？而且难道不是有更多的工人阶层跟着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走吗？难道不是还有成百万的工人投票支持英国的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吗？而且难道不是还有成千万的工人跟着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走吗？这是否能说明，这些党都是工人政党呢？显然不是这样。左派分子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即各国社会民主党在保留了大部分原有社会成分的情况下变为资产阶级政党。我们所处的战后时期¹⁹的历史特点也正在于此。最近若干年来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社会民主党及工会的改良主义上层分子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密合作意味着什么呢？那种强制性的仲裁制以及工业稳定等等又是什么呢？这些无非是社会民主党及工会的改良主义上层分子同资产阶级国家及企业主组织相互融合而已。不过这一切也证明，上

述政党已不再是工人政党，而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特殊变种。它们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保留了一部分工人成分，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词句，保持着同很多工人阶层的联系，因为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干部大部分都是出身于工人。谁要是认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政党，谁要是认为阿姆斯特丹分子是犯错误的兄弟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敌人，谁要是认为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领导机关的存在对工人阶级仍然有好处，那么谁就理所当然地要反对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不过我希望我们在这里把一切都谈彻底。我很不喜欢德国那些同志所玩弄的毫无必要的外交手段。这种毫无必要的外交手段在于，他们反对红色工会国际，而借此又掩盖自己反对共产国际策略的立场，但问题的实质恰恰又在于此。他们在反对红色工会国际的旗帜下奉行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看来心中以为谁也识不破这种并不高明的政客手腕。可是事实上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红色工会国际的反对派，而且是共产国际的反对派。说出这一点来是需要勇气的，而德国共产党内的右派分子恰恰没有这种勇气。他们不着边际地兜着圈子，在攻击红色工会国际的决议时采用种种狡诈的对比手法，力图证明：我个人的发言同红色工会国际的决定是不一致的，但红色工会国际的决定同共产国际的决议不一致，等等。所有这一切编造得极其牵强而拙劣，正如俄国谚语所说：无理寸步难行。

美国式的思想混乱

在德国，反对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意见

来自个别分子。其中一些同志公开表示反对，另一些同志隐蔽地进行反对；一些同志说他们不同意，另一些同志表示有所怀疑。他们一起消极抵制贯彻执行通过的决议。不过，中央委员会是支持代表大会决议的，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和他们的机会主义言论、悲观情绪和消极态度。美国的情况就不同了。那里反对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先锋是中央委员会。还在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就有人因为我曾激烈批评该党领导机关对待工会宣传联盟的错误态度、在组织未参加工会工人问题上的消极情绪、对待黑人工人的错误态度和对反动的美国劳联的盲目崇拜而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这种不满表现为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抗议红色工会国际给工会宣传联盟代表会议（1927年12月）的号召书，理由是这份号召书中指出必须把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组织到工会中去。这种不满后来还表现为几篇文章，就思想混乱程度而言，佩珀同志的几篇文章占有特殊的位置。佩珀同志在《共产党人》上发表文章，试图证明美国资本主义极为强大，美国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极差，党极度虚弱，总之在美国整个说来存在很大困难。关于这一点他在代表大会上也说了。佩珀同志一面发现着再次发现的美洲^①，一面避而不谈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前夕我在几篇自我批评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些重大问题。为了使问题更加混乱，佩珀同志提出了美国劳联有可能扩大的理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为了把党的注意力从今天的组织未参加工会工人的当前迫切问题引开，引向一旦美国劳联重新扩大将会发生的未来问题。所有这类用咖啡渣占卦的做

① 意为重弹老调。——译者注

法^①只有一种政治目的，那就是分散党的注意力，不使其集中于解决最迫切的任务。我不打算现在剖析佩珀的“理论”，不过只想说明，原先佩珀同志常常在欧洲的事情上表现出思想混乱，如今我们从他在这里的发言则可以断定，他对美国的事情也产生了混乱思想，因此他不折不扣地可以被称作为搞不清两个半球事务的糊涂人。

不过还是放下佩珀同志来谈谈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吧。美共中央反对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美国问题的决议。至于中央委员会为什么要反对，它却隐瞒不说。但是，当中央委员们来到莫斯科后发现反对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并不特别合适，于是他们在这里，在莫斯科，说是他们早就赞成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我们参加的几次红色工会国际的会议上都出现了滑稽的场面；大部分中央委员确认中央赞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而也是中央委员的福斯特、毕特尔曼、坎农、琼斯顿等同志却说并没有作出过这样的决定。事实上中央委员会的记录中确实连这类决议的影子也没有。试问，这像什么话？当然，每一个党的中央委员会都有权反对红色工会国际通过的决定，但应当有勇气说明这一点，而不要装聋作哑，不要把问题搞乱，把事情说得一切都很好。总不能在从纽约到莫斯科的路上把对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的否定态度变成肯定的态度。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即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右派分子与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之间就这个问题形成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统一战线。我们的美国同志难道不认为这一类统一战线无助于提高美国

① 指毫无根据的猜测。——译者注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威信吗？

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

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

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在贯彻执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方面所做的工作最多，但就在这两个国家进展也十分缓慢。我不详细说明代表大会就我们在这两个国家的策略所作出的决议，只提一下核心的问题是吸收广大工人群众参加革命工会。必须指出，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方面事情很不顺利，某种转折尚未到来。此外，未参加工会的工人在法国还占 90% 以上。有一些同志倾向于把这种现象的原因解释为法国工人的天性，这是不值一提的。要知道参加各类互助储金会的就有 300 多万法国人。问题不在于法国工人的天性，而在于我们法国的工会工作存在一些缺点，而且也并非天生的缺点。正是在法国，宣传鼓动工作取代了组织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共产党的巴黎地区表现得最为杰出。皮奥同志在这里指责法共中央犯了机会主义。这种指责只有一点根据，那就是皮奥同志的强烈的气质。当然，错误是存在的，中央委员会也不指望毫无过失。大家知道，只有上帝才毫无过错，而这也只是因为上帝并不存在。皮奥同志按说应该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他认为并没有机会主义气味的巴黎地区组织五金工人工会的事如此不顺利。为什么拥有好几百名五金工人共产党员的巴黎党组织竟找不到一批工作人员来从事巴黎地区几十万五金工人的组织工作。在对待工会问题上具有指挥官气质的皮奥同志忘记了下面几点：（1）对工会是不能指挥的；（2）对工会进行领导，指的是吸引群众参加工会并教育他们；（3）党应当善于发动

新的工人阶层，吸收新的分子参加领导机构，唤起群众的主动精神，而不是事事包办代替；（4）最后，共产党员必须在无产阶级的一切战斗中站在前列，并善于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在实现这些条件时，仅仅在巴黎一个地区还可以吸收几十万工人参加。皮奥同志，请你不妨试一试按这种方式行动。我向你保证，这样做没有丝毫机会主义倾向。工会决议中的错误是在中央的帮助之下，而不是由于反对中央才得到改正的。遗憾的是，我们的实际工作还存在缺点。法国共产党和统一工会联合会在吸引千百万工人参加统一工会方面拥有广阔的活动余地。要极其坚毅果敢地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组织地巩固我们在法国的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

至于捷克斯洛伐克，那里最重要的迫切问题也是再吸引几万、几十万工人参加多民族的工会联合会。谁不继续前进，谁原地踏步，谁就将被抛到后面，——斗争的逻辑就是如此。

罢工战略的问题

下面我想谈谈罢工斗争问题，即我们的罢工战略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注意的中心，因为近一年来的经济罢工的浪潮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罢工策略问题上，德国共产党的右派分子也反对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过，他们为什么又不反对第九次全会关于罢工问题的专门决议呢？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在于，群众对于资本的进攻，对于狂热的合理化等等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被改良主义者纳入了与工人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强制仲裁和同企业主组织妥协的轨道。工会机关，至少其主要

领导部门，恰是企业主组织在工人阶级中的继续，正因为如此，一旦在群众中掀起运动，改良主义者就明目张胆地或隐蔽地进行消极抵制。

我们的某些德国同志提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口号呢？现在的口号是：“强迫工会官僚领导罢工（Zwingt die Bonzen）。”这就是说，可以通过压力把社会民主党人变成真正的战士。“Zwingt die Bonzen”的口号在群众中散布幻想。这种口号的出发点是：社会民主党是工人政党，工会领导人虽然不好，但毕竟是工人阶级利益的捍卫者，只要对他们施加压力，他们就会成为工人人们的优秀捍卫者。这种观点不是共产党的观点，对我们的党是有害的，因此这类“策略”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遭到了严厉的反击。工会机关如今成了压迫群众的工具，压制群众积极性的工具。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把改良主义的领导赶下台来，让真正的革命无产者取代他们，站到自发罢工的前列，领导罢工反对资产阶级，也反对改良主义的工会机关（如果它暗中破坏劳动群众基本利益的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是这样说的，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也正是这样说的。

请问，在当前情况下这样提出问题难道不对吗？英国总罢工和矿工罢工的经验、最近鲁尔冲突的经验，以及德国中部五金工人罢工和法国及其他国家一系列罢工的经验都必须记取。难道所有这些实践都徒劳无益吗？难道各国共产党竟不能从这些事件中，从这些严重的阶级搏斗中为自己吸取教训吗？看出“Zwingt die Bonzen”的口号是消极等待的口号，而不是积极动员群众的口号，看出寄希望于工会的改良主义上层分子就等于放弃共产党人组织和动员群众反对改良主义上层分子，反对资产阶级这一

起码的义务？

德国共产党的右派分子不喜欢我们的罢工战略。但是他们的建议和提出的口号又是什么呢？他们提议用什么样的行动路线来代替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规定的行动路线呢？他们的策略十分简单：丝毫也不要反对改良主义工会上层分子的意志，而是等待有朝一日我们掌握住工会机关。不仅如此，这些同志所理解的掌握工会并不是用革命的机关取代改良主义的机关，而是对改良主义工会官僚进行重新教育，把糟糕的改良主义者转变成为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优秀战士。

我想，这样的消极策略对于共产国际及其所有支部都是万分危险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会全体会议才通过了关于经济斗争和共产党员的任务的专门决议。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才极其重视罢工战略问题。

在这方面，从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会全体会议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应当始终和群众在一起，应当认真地倾听群众日益强烈的不满情绪，应当组织群众并和工会机关一起领导群众前进，如果需要，那就摆脱工会机关或与工会机关针锋相对地领导群众前进，不要过分崇拜工会，不要把改良主义组织变成偶像，而要牢记，改良主义组织是资产阶级国家和企业主组织手中镇压革命工人运动和奴役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工具。

争取统一，但并不是不惜任何代价 ●

为反对开除共产党人而斗争

多年来，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都坚定地为了争取各国和国际的工会运动的统一而斗争，但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红色工会国际都不把这种统一看作为崇拜的偶像。统一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不能根据统一的状况来决定反对派存在和形成的问题，决定我们共产党在工会中的策略问题。事实上，例如在德国，就有这样的共产党人，在他们看来统一高于一切。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些同社会民主党人一起签署决议谴责德国共产党的策略的共产党人？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些为了取得统一而甘愿放弃自己路线的共产党人？

我不想摘引大量的言论，不过只从德国那些主张不惜任何代价寻求统一的人们最近的活动中援引两个例子。在1928年6月德国皮革工会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员采取的立场是：“在‘纯粹工会’问题上不赞同共产党的观点，仍然可以是一个好党员”。在1927年7月德国制鞋工会代表大会上，来自克莱沃的共产党员席夫勒宣称，他“不同意共产党人的某些诬蔑性文章”。共产党员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宣告：“工会支持合理化的做法是正确的”。为什么共产党员们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上（我不再列举其他事例）这样说呢？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工会的统一看得高于一切。德国同志们可以在这里举出几十个例子，不过我想以上所述已经足够了。我肯定地说，这不是共产党人的行为，这种方针同共产国际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毫无疑问，那些为保持统一而不惜任何代价的同志们，那些认为工会的团结高于一切的同志们，

当共产党员被开除时一定仍然抱消极观望的态度。在这些分子中特别流行的一句话是：不要受人挑拨。这句话在原则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右派分子却把这个正确的说法用来专门掩饰自己的消极态度。众所周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对待资产阶级国家和霍亨措勒恩的德国的策略上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不要受人挑拨”这个口号。当然，只有地道的白痴才会让自己受人挑拨，但是请回忆一下，德国社会民主党运用这个口号做了些什么呢？这个公式不仅被利用来掩盖消极态度，而且被利用来掩盖放弃斗争的行为，此外它还用于掩盖同霍亨措勒恩分子，以及后来同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妥协。

正因为如此，当右派分子不去反对开除共产党人而开始高谈阔论起“不要受人挑拨”时，人们不禁想起，随着“不要受人挑拨”口号的提出德国发生了什么事。为反对开除共产党人而斗争，这对于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可是右派分子不是去加强反对分裂的斗争，不是去动员群众反对工会官僚的罪行，而是开始为消极态度和投降主义思想凭空臆想种种理论。他们不愿意为反对开除共产党人而斗争，于是就着手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寻找制造分裂的罪魁祸首。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断言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采取了分裂的路线，用这类谰言来为开除共产党人的改良主义政策辩解。人们指责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奉行分裂路线，这才真正是地地道道的神经病大发作。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只字未曾提到必须分裂的话，而是说必须为反对分裂而斗争。我们知道英国就有过这样的事实，苏格兰通过全民选举被选上的革命工人无法着手工作，因为工会官僚们依靠资产阶级国家赶走多数派的代表。瑞士工会联合会开除巴塞尔联盟，就是因

为巴塞尔联盟反对法西斯，支持中国革命，而且从根本上主张阶级斗争。因此在主张不惜代价寻求统一的人们看来，我们的英国同志就应当低头顺从工会官僚的意志，否则就会造成分裂。我们的瑞士同志就要顺从本国工会官僚的意志。而我们的美国同志就要顺从华尔街代理人的意志，只要能保持住统一就行！不是努力去把组织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强自己的影响，增加、提高、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在反对分裂分子的斗争中恢复统一，而是举手投降，——这就是不惜代价寻求统一的结果。共产国际任何时候都不能同意这类投降主义思想。如果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竟赞同这样的观点，那么就应当解散所有的党，解散这两个国际。要同分裂分子作斗争，但更需要同投降派作斗争，因为这些投降派把统一看作为目的，认为为了达到统一应当放弃我们把群众争取到阶级斗争一边来的神圣权利。

当前的任务是把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

由于上述原因，组织未参加工会工人的问题就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对于美国，以及对于日本、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就更加尖锐。

在工会运动发生分裂的国家，有关未参加工会工人的问题是十分清楚的（如日本、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等国），也就是说，需要吸引群众参加革命工会。而在美国，由于没有平行的工会联合组织，对这个问题要另作研究。美国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工会。在未参加工会的工人中有成百万的钢铁工人、纺织工人、橡胶工人、水运工人等等。要

使我们的美国同志根本摒弃关于统一的虚幻观念，需要若干年的时间。在未参加工会的工人中建立新的工会，也需要若干年的时间。美国应当建立新的工会。那里有 2400—2500 万未参加工会的工人、职员、国家官员，有几百万黑人（他们是一支潜在的强大革命力量）。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在美国还未能做到在那些白人不吸收黑人参加工会的工业部门着手组织黑人工会。不言而喻，在新建立的工会中工人不分种族和民族都一律平等。

如果说美国的问题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那么其他一些国家的问题还并不完全清楚。就举波兰为例吧。栋布罗瓦矿区几年前曾有过几万名有组织的工人，可是近三四年这个矿区只剩下了仅仅拥有几百名会员的残缺不全的波兰社会党工会。试问，为什么在这个地区拥有巨大影响的我们的同志们不试一试把 95% 的未参加波兰社会党工会的矿工联合起来？难道我们应当在栋布罗瓦地区围着波兰社会党工会的残骸跳舞吗？该是对这一切认真思考的时候了，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迁就刻板公式而不去组织群众，我们就会迁就不惜代价的统一而不去把成千成万的无产者团结在阶级斗争的战斗旗帜之下。确实应当对这个问题十分认真地加以思考。毫无疑问，“不惜代价争取统一”策略的支持者们会围绕这一点大吵大闹。他们会说，这样做就是分裂，让几万名矿工不参加工会比把他们组织到新的工会中去更好。不过，我们并不主张不惜代价的统一，所以这类大吵大闹吓不倒我们。我们主张统一，但并不是不惜任何代价。我们的所有决议、所有发言都证明我们是主张统一的，我们同意芬兰和挪威工会提出的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阿姆斯特丹国际则表示拒绝，而原因在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导人认为，他们迄今为止仍然是大地的中心。让他们用

这种幻想去自我安慰吧，而我们要继续为建立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统一的包罗一切的国际而斗争。

关于统一派小组

据此，我想简略地说一说统一派小组问题和统一运动问题。大家知道，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主张统一。大家也知道，不久以前相当大数量的左派改良主义分子集合在统一的口号之下，而且这个运动最为兴盛之时正是英俄委员会存在时期。英俄委员会被摧垮之后，这些小组发生了分化。在英俄委员会纲领的基础上形成的小组有的宣告瓦解（如荷兰），有的发生分化（如比利时），有的气息奄奄（如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而有的小组（如德国）即使有一些活动，也只是在出版物方面。不过，另一方面，挪威、芬兰的工会加入了统一运动，前不久召开的苏联、芬兰、挪威三国工会代表会议是为争取统一而斗争的一个阶段。

我想把挪威、芬兰、苏联三国工会代表会议的问题放在一旁，只谈谈统一派小组。我们不必隐瞒，这些小组现在十分软弱无力，而且就连其中最强大的小组，例如德国的统一派小组，也是很软弱的。我愿意在这里极其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这些小组为什么软弱无力。

以德国为例。这个统一派小组的软弱当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其软弱之处在于，这个小组是一个纯粹的写作出版小组，它没有实际的行动纲领，它的全部工作只不过建立在关于统一的谈论上。但是，如果只就统一发表文章，即使把文章写得十分冠冕堂皇，也仍然是不够的。应当讲清楚，为什么要实现统一，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是否应当对德国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回答，而在这方面并

非什么都十分顺利。

首先，这个小组在反对开除共产党员的问题上的做法就不妥当。按说这个小组本应极其坚决地反对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工会。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不知为什么这个问题并未能使《统一》杂志编辑部感到激动不安，这个问题在这份机关刊物上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反映。然而，如果一个统一派小组既没有对各种问题的明确纲领，甚至又不进行反对开除共产党员的斗争，那么请问：这个小组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样的小组能指望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吗？很值得怀疑。只有通过日常斗争才能不断扩大影响。如果小组在主要的现实问题上能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它的影响就会增长。如果小组能对开除共产党员的任何行动和分裂行为进行坚定的斗争，它就能扩大影响。不然它的影响将不断下降。统一派小组的力量之所以不断削弱，而在不少国家里甚至陷于瓦解，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具体的行动纲领，而一旦需要为统一而斗争，为反对分裂而斗争时，它们最多只不过是提出某些抗议而已。德国的统一派小组也面临着这样的危险。

下面我想指出《统一》杂志的一些怪现象。《统一》杂志是由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共同出版的。我们当然不能要求《统一》杂志内的社会民主党人陈述我们的斗争观点。但是我们有权要求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人捍卫党的观点，捍卫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对于我们的社会民主党对手所反对的问题的观点。我们有权要求我们党的党员在统一派小组中一面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一起进行斗争，一面并不卷起自己的旗帜，不放弃对在我们的共同机关刊物上撰稿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错误、含糊其词和模棱两可提出批评。在我看来，在《统一》杂志编辑部工作的同志们在这

方面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积极性和坚韧性。

我本可以从《统一》杂志中摘引出大量言论，但由于时间不够，我不准备这样做了。我只想提醒大家，在《统一》杂志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文章，其中说到某些共产党领袖表现出一种滑稽可笑的自吹自擂，认为自己天生是而且有能力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在那份杂志上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说法，如共产党人“像孩子般地逞强好胜”，“共产党人沾染了贪图党派小利的利己主义”，“他们除了对左翼领袖和社会民主党不遗余力地恶意诽谤之外，根本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东西”，等等（见1927年7月9日《统一》杂志第14期）我们当然不能要求社会民主党人讲共产党的好话，可是我们可以要求在机关刊物《统一》中工作的共产党人对于在统一战线旗帜下无理攻击共产党的做法给予应有的回答。

我们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在统一派小组中一起工作目的何在呢？目的在于，同社会民主党的优秀工人一起为反对阶级合作，反对改良主义领袖的工贼行径而斗争，把工会变成为民主组织而斗争，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试问：为什么《统一》杂志不提出关于同德国的工会反对派组成统一战线的问题，而写道，“我们不赞同反对派对手的所有行动”，（见1928年3月3日《统一》杂志）但又不明确指出不赞同什么？为什么《统一》杂志不报道（即使发发消息也好）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及其决议？为什么？这样的既想置身斗争之外又想超脱一切的杂志是什么机关刊物？在我看来，这种脱离生活的状况正是德国统一派小组力量微弱的基本原因。

总的说来，在这方面我准备只作下面这样一个结论。为使统

一派小组能够生存、发展并源源不断地吸收新的工人阶层，仅仅夜以继日地重复庄严的“统一”二字而在发生开除共产党员的事件时却不能很好地维护这个团结，那是不够的。必须拥有实际的行动纲领，组织群众反对改良主义首领的分裂政策，倾听工人的日常需要，而当共产党人领导群众反对改良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时，则应当同共产党人一起并肩战斗。如果不这样做，那么“统一”派小组将仍然是小小的写作出版组，而不能成为在阶级斗争基础上联合工人阶级的有力因素。

秘密工会运动问题

当前，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面临着一系列极端复杂的建立秘密工会的问题，因为阶级工会运动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被迫转入地下。看一看中国、意大利、智利、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以及现在的日本和许多工会运动不能合法存在的国家的情况，大家就可以理解，这种新的情况给我们提出了多少新的问题。一向公认的看法是工会不可能处于秘密状态，但是生活批驳了这种公认的看法。对于秘密工会来说，联系群众的问题比任何其他场合都更为尖锐。人人都懂得，秘密工会运动不可能有组织地吸收成百万的工人。秘密工会不可能定期收到会费，定期散发会员读物，等等。因为，例如在中国，读秘密工会的会员读物就会危及生命安全。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掌握特殊的联系群众的方式，不言而喻，群众组织将具有某种特点。在秘密工会运动方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富有战斗精神的优秀分子团结在工会的周围，并且同所有大小工厂建立联系。一个组织的规模可以不大，但它的影响却可能扩及成百、成千、成百万

人，一切取决于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正因为如此，红色工会国际才花费了很大精力研究中国工会运动的行动纲领。正因为如此，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作人员才为最近一次中国工会代表大会拟订了详细的决议案。在保存秘密工会的同时，还必须寻找各种公开和半公开的立足点，以便脱离地下状态转入公开活动。需要什么样的立足点呢？这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而有所不同，取决于政治形势，这种问题的解决要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对于这一类国家，红色工会国际一向下达的指示是：不懈地巩固和扩大秘密工会。哪里有工人，就要在哪里开展工作。如果工人被迫参加了法西斯的政府官方工会，那么，就必须进入这些工会，瓦解这些法西斯工会，从内部分化它们，把仍然留在这些工会里的落后工人争取到阶级斗争方面来。对于工会运动处于秘密状态的国家，这一指示今后仍然适用的。在这些国家中，领导经济斗争的问题特别重要。这个问题对于共产党和秘密工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凡工会运动处于秘密状态的国家共产党必须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些国家特别需要注意。这是通向群众的捷径。

各国共产党是否应当贯彻执行红色工会 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对这个问题只能给予肯定的回答。为什么呢？因为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总结了世界整个革命工会运动的工作。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活生生的实际。没有一个工会运动策略方面的问题不曾在会上进行了严肃而全面的讨论。红色工会国际对所有产生的问题作出的回答根据何在呢？根据在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红

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之所以必须贯彻执行，不是为了抬举红色工会国际，而是因为红色工会国际所积累的经验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在工会中开展工作的经验。不能说共产党的报刊对红色工会国际的决议进行了系统的宣传运动。许多同志认为，只要他们刊登一两篇文章，三四则消息，并且陈述某一项决议的内容，那就算进行了宣传运动。我必须指出，这不是宣传运动，而是敷衍塞责的官样文章。应该记住，对于宣传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抱消极态度只有对右倾取消主义倾向有利，而这种倾向尽管不多，但在我们队伍中还是存在的。整个说来，还不是所有各国的共产党都已学会组织真正的宣传运动，特别是世界性的宣传运动。提纲指出某些党全世界观念不足和存在一定的地方主义，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在中国事件期间，这个缺点表现得格外明显。例如，不妨回忆一下红色工会国际组织的国际援助中国工人运动双周活动的情况。第四次代表大会号召所有共产党全力支持这次双周活动，但是据判断，这次国际双周活动的气氛和规模同刚毅英勇的中国无产阶级的行动相比，是不相称的。如果再考虑到既不善于组织长时期的宣传运动，又对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总结的经验的积极意义认识不足，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国家的共产党还没有认真宣传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种消极态度将首先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危害。

结 论

争取群众这个课题给共产国际及其所属支部提出了大量问题，我在自己的发言中只涉及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问题。工会工作问题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日常的实际问题。我们现在

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已经能够说出什么方法好和什么方法不好。我们拥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开展群众工作，能够进入有工人群众的任何地方，以及能够领导日常斗争。并不是在所有国家我们都有足够的力量，也不是在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可能违背改良主义领袖的意志而领导罢工和战斗。但是，只有通过为争取对群众的领导而进行的斗争，共产党才能发展壮大，只有通过顽强的日常琐碎工作，只有对群众的情绪极其关切，我们才能使我们所有的党变成群众性的组织。我们面对的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企业主和国际改良主义的统一战线。国际改良主义指责我们制造分裂，但是你们要知道这种指责花费了多大的代价。我只援引两件事实。当工会太平洋地区书记处成立之时，阿姆斯特丹分子不是支持太平洋沿岸地区工人的这个联合组织，不是支持这个组织反对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新战争的斗争，而是反对这项创举，指责工会太平洋地区代表会议是莫斯科的产儿。再有，当工会拉丁美洲书记处根据我们的倡议而奠定了基础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国际不是号召拉丁美洲的所有工人组织加入这个组织，而是力图建立自己在拉丁美洲的组织。为此，他们在日内瓦召集了几个来自拉丁美洲的人开会，并在阿根廷人的庇护下组成一个阿根廷工会联合会联络局。这是一个只把阿根廷改良主义者同委内瑞拉、乌拉圭和古巴的一些骗子手联结在一起的联络局。这就是阿姆斯特丹分子对国际工会运动统一的理解。

不过无法期望他们能够做出什么别的事情。阿姆斯特丹分子按自己的主张行事，我们也应当按自己的观点行事。资产阶级国家、企业主和改良主义分子的统一战线还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工人运动的革命一翼在许多战斗中遭到失败，不过我们正在从失败中

学习,各国的党在成长,工会运动的革命一翼正在形成。正因为如此第一项议程的提纲和讨论都充满了对我们必然胜利的巨大信心。

这种胜利信心的基础是对国际资本主义的状况和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及对工人阶级本身内部的力量对比作出了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国际改良主义的力量仍然强大,因为资本主义仍然强大。不过,请比较一下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和现在我们的力量。请比较一下4年前即1924年的和1928年的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1924年,中国无产阶级尚未登上历史舞台。1924年,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动摇英国、日本和美国的强大帝国主义的基础。1924年,在印度的工业中心城市还没有出现现在这样数十万工人的罢工。那时,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大部分还处于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支配之下,而如今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工人都正在向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靠拢。我们的力量正在壮大,正因为如此,我们坚信必定能战胜资本主义及其改良主义奴仆。(鼓掌。)

李光(中国):

资产阶级背叛中国革命并不是偶然的。早在一年以前,即1926年3月,蒋介石就试图叛变。我们党曾经警告过,说反革命行动正在日益临近,但只限于在口头上议论。党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预防措施,因此1927年4月12日上海的大屠杀使我们党措手不及。4月15日在广州和7月15日在武汉,我们党也陷入张皇失措的境地。从实质上说,党当时还支持了国民党的领袖。党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和少先队组织,而且压制了土地革命和长沙的工农起义。党的政治局表现出迟疑不决和左右摇摆。这是机会主义

的错误。我们知道国际代表有过错，但我们也知道中国共产党同样有过错。我们党当时的首领陈独秀尚未公开承认这个严重的错误，因此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党开展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决议，还通过了关于土地革命、关于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和关于组织“工农”政府的各项决议。这条武装起义的路线当然是正确的。

武汉市^①的同志们还在1927年8月30日就准备举行起义。中共中央建议他们对起义做好更加细致的准备，但是直到9月10日任何准备工作也未进行。浏阳和平阳^②的几十万农民举行了起义。党的湖南省委不但不帮助起义者，反而破坏了起义，因为领导铁路工人工作的工运部反对在铁路举行罢工，致使军阀们有可能立即调遣军队镇压农民起义。但是到了12月10日，省委未作任何准备却突然号召举行暴动。湖北省东部的负责同志也未发动农民举行起义，理由是今年庄稼很好。不过到12月份，共产党员试图发动起义，并在1928年1月又举行了一次。应当指出，中央委员会却纠正了这类“盲动主义”的错误。

南昌起义陷于失败，原因在于同志们没有土地纲领，没有吸收农民参加起义。

广东省倒是动员了农民军举行起义，但也没有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党在汕头遭到失败以后，群众在海丰、陆丰、海南岛和广东其他各地举行了起义。

后来，国民党加强了迫害行动，开始封闭工会，废除工人同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显系平江之误。——译者注

企业主签订的协议。逮捕和枪杀日益频繁。汪精卫摧毁了同帝国主义斗争了一年零四个月的香港工人。

广州工人清楚地看出，国民党左派也同样无非是军阀手中的工具。在1927年4月至12月期间，广州举行了大量群众性的政治示威游行。广州工人的革命情绪达到了最高点。正当此时，爆发了张发奎（人们认为他属于国民党左派）和李济深之间的军阀战争。工人们意识到必须摆脱自己的反动首领。于是，广州工人于去年12月11日举行起义，夺取了政权。起义恰似一声巨雷轰鸣，对整个东方和全世界无产阶级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工人认识到，工人、农民和士兵夺取的政权才是摆脱当前处境的唯一出路。

广州起义后，中国许多其他地方的农民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土地革命进一步深入。广州起义期间是有过种种错误，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把它称作为盲动。

下面我谈一谈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指出，中国革命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千百万群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武装起义的口号将一直是宣传口号。我们的任务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 加强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把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织起来。
2. 普遍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军队，准备在一省或数省夺取政权。
3. 加强城市中的工会运动。
4. 同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作斗争。

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的工作不够有力，对帝国主义的状况了解不够。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共产国际给予更多的指示。土地革命正在深入，正在动摇反动统治的根基，缩小帝国主义剥削的范围。在土地革命过程中要避免抢劫、烧杀等错误做法。

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组织工会运动。迄今为止，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不够主动，而且犯有许多严重错误。在土地革命期间必须加强城市的工人组织。要避免这样一类错误做法，例如不预先让群众做好准备而由参加工会的工人下达宣布罢工或不宣布罢工的指示，也要避免另一种失误，例如同那些群众不愿跟它们走的反动法西斯工会联合等。必须彻底搞清工厂委员会的问题。还必须同因简单化地解释统一战线口号而产生的错误现象作斗争。

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千百万群众，把他们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并且深入到群众之中。我们还应当寻求组织工人和培养积极的工会工作者的新方法。同时还要明确划分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界限。

新的革命浪潮正在不可逆转地来临，这个浪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认真做好准备的任务。我们必须同盲动主义作斗争，而且我们应当知道，盲动主义的危险还没有消失。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不久前中国曾决定提出召开国民会议、恢复群众性的国民党、争取言论自由等口号。

这显然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像反对盲动主义一样坚决地反对机会主义。

再谈谈国民党和“第三”党。前者也好，后者也好，都是屠

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我们应当清楚地知道，孙中山的所谓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主张。所谓“民族”是要巩固加强一个居民阶级并由它主宰所有其他阶级，所谓“民权”是要否定阶级斗争并建立最反动的专制制度，而所谓“民生”，其实质就是要把工人引入歧途的改良主义。这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现在，据我们所知，国民党加入了第二国际，从而使自己的反动性质最终固定了下来。

至于第三党，它归根到底同国民党并无不同，在这方面不应抱任何幻想。

还要谈一谈白色恐怖。白色恐怖使中国损失了 31 万工人、农民和 2 万名共产党员。至今中国的白色恐怖仍然十分猖獗，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白色恐怖。白色恐怖是以最野蛮、最残忍的方式进行刑讯和杀人：上电刑、砍头、分尸等等。我们不在西方的工人报刊上公布这些材料就是犯下严重的错误，就会让帝国主义者有可能任意造谣。

还要谈一谈中国党同其他国家兄弟党的相互关系。兄弟党应当更加关心中国革命。同时，还应当更加坚定地大力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向中国派遣陆海军、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白色恐怖的运动。应当制订出这方面的具体措施，并建立各国党之间更加密切的接触。我已经说过，我们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了解极少，因此我们希望兄弟党更加详尽地为我们提供情况。

连斯基（波兰）：

整个说来，我赞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提纲。由于时间不够，我主要谈一谈波兰共产党的党内状况。我认为，我

们党内的问题极其尖锐，而布哈林同志也极其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必须特别予以重视。我们向专题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内容可归纳为，第一，突出强调法西斯倾向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垄断性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基本要素已在提交大会的提纲中作了说明。需要用一個总的表述对这些要素加以概括归纳。这个问题是在我们党内延续了半年之久的一场争论的根本问题之一。拉品斯基和塔尔海默两位同志仍在继续推行的库斯特齐瓦同志小组的错误，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不理解法西斯倾向同资本主义的垄断性之间的联系。关于这些错误我们将在政治委员会或纲领委员会中加以说明。其次，需要突出强调说明，用法西斯方式镇压工人阶级的做法正在走向国际化。1927年的一次国际执委全会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在所有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我们都看到用法西斯方式镇压工人阶级的各种做法。台尔曼同志说社会民主党是实现用法西斯方式镇压工人阶级的做法国际化的工具，这是完全正确的。台尔曼同志也完全正确地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正在从社会改良主义政党变成社会法西斯政党。这一点在我们波兰特别明显，那里社会党同法西斯的国家机关正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最后，还必须对法西斯主义方法作出确切的表述。法西斯主义方法不仅仅在于实行一系列恐怖手段，而且还有一整套从思想上毒害群众的办法。在这方面我们党有丰富的经验，我们想介绍给共产国际。

现在我接下去谈谈波兰的事情。人们在这里已经多次强调说，波兰共产党在我们的时代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处于责任最重大的岗位之一。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一向给予波兰党以极大的关注。它曾

帮助波兰党克服一些重大的错误，如 1923 年的托洛茨基主义、1926 年 5 月的错误，并帮助波兰党在巨大困难面前沿着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前进。

我们党从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得到一系列指示和教导，据以确定了自己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例如最近一次议会选举中的策略。

在共产国际领导下，我们党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认真地批评了过去的重大错误，为近期内党的活动制订了明确的政治路线。

但是，我们党所面临的任务，以及我们党内的状况，都要求共产国际给予更大的关注。在资本主义稳定中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的过程中（对这一过程布哈林同志曾作了描述），一些可能对国际革命运动和苏联今后建设的整个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正在波兰酝酿成熟。我们眼见，而且多次强调指出，战争的趋势在波兰大大加强，波兰的全部生活都处于从军事上和从思想上准备反苏战争的标志之下。这就是毕苏斯基的对内对外政策蓄意追求的目标。

我们党去年召开的代表大会强调指出，“法西斯政府在同英国紧密勾结下奉行的对外政策，其目的就在于把波兰纳入全欧稳定和准备反苏战争的轨道”。波兰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全过程正在不断证实这一判断的正确。

毕苏斯基政府正在加速把波兰置于外国资本的奴役之下。它利用向美国借债来维持波兰货币的稳定性，为此它不仅像在波兰的美国银行代表杜威所说的那样“用波兰的荣誉和声望作担保”，而且还以从关税到国有企业的“各种收入作抵押”。波兰的关税是正式抵押给杜威的，因此他就控制了波兰的国家银行和整个经济生活。波兰所有最大的银行都是经过乔装打扮的外国银行的分支

机构。

在国际市场上，波兰越来越成为外国工业产品的消费国和原料及半成品的供应国。这只要指出以下数字就足以说明了：1923年工业品的输出额占输入额的 $\frac{5}{6}$ ，而如今仅为 $\frac{1}{5}$ 。不仅如此，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化的影响下，半成品的输出量也在明显下降。

结果，今年上半年的外贸逆差达到近6600万美元。这对波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随着面临的农业歉收和外国棉花的输入，这种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从国内日用消费品市场情况来看，某些工业部门的萧条现象将越来越触目惊心。杜威正在大力促其实现的同德国的通商条约也必将对波兰工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波兰的杜威化恰恰是对德国道威斯化的某种补充。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强了波兰帝国主义的扩张意向，而其矛头是指向苏联的。资本主义稳定内部矛盾的增长正在加速波兰卷入战争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波兰和立陶宛的关系日益尖锐化，波兰法西斯主义在国际联盟的支持下，在社会党叛徒的极力协助下，利用种种借口力图吞噬立陶宛。最近波兰同意大利的接近，同罗马尼亚恢复军事条约，以及波兰在波罗的海沿岸耍弄的种种伎俩，等等，这些都是投向苏联的同一根链条的一个个环节。

战争准备的进展十分迅速。其主要表现有：军队本身的预算增加了38%，大批组织正在实现军事化，狂热地训练青年骨干，发展军事工业，扩大战略性铁路网等。

法西斯政府的对内政策服从于备战的任务。除了采用疯狂的恐怖手段对付革命运动，以及利用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战斗队打击革命运动的先锋队共产党以外，正如布哈林同志所说，法西斯分子还力图大量渗入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队伍中去。不仅如布哈

林同志所说在华沙是如此，而且在波兰全国都是如此。他们还企图瓦解农民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不坚定分子。他们制订了一整套法西斯劳动立法，妄图藉以束缚工人阶级的手脚，迫使其服从于法西斯权贵而放弃阶级斗争。正在大力推行的工会法西斯化是对工人运动的极大威胁。

一些妥协主义政党（如波兰社会党、“解脱”派）的领袖们，虽然采用的是其他手段，也同样在这个方面努力活动。这些领袖们除了毫无顾忌地唆使人们反对苏联外，还玩弄激进民主主义的言词与反对派的言论，试图以此阻止群众参加反对法西斯政权的革命斗争。

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而且常常自发地爆发出来。政治压迫不断强化，经济剥削日益加重，赋税猛增，物价暴涨，所有这一切都推动劳动群众走上斗争的道路。最近以来，波兰一些最大的工业部门罢工浪潮迭起。失业者和在业工人的群众性示威游行时有发生。此外，由于法西斯分子划分土地，进行土地整理，横征暴敛和警察任意肆虐，农民开展大规模发动的时期也已开始。随着斗争的开展，我们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迅速增长。最近一次议会选举说明，我们党在栋布罗瓦、华沙和罗兹等大的工业中心城市已经争取到了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同时不仅在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而且在波兰本土大大扩大和巩固了自己在被剥削劳动农民中的基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对于波兰共产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对于它克服布尔什维主义口号与实际活动的不一致，起了重大的作用。自此以后，波兰共产党大大成长了，已不愧为工人、农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在克服右倾和极“左”倾向的过程中，党在思想上大大地巩固了。由于第四次党代

表大会作出了正确的指示，波兰党富有成效地（虽然并非没有错误）开展了一系列宣传运动，尽管力量并不强大，却发动了广大群众。

不过，同志们，同党所面临的任务相比，这些成绩是远远不够的。

党的主要缺点是，党的影响范围之大与其组织上的不够巩固，组织上控制局面的能力之薄弱对比极不相称。此外还有：在农民工作中重视一般的宣传而不注意具体地关心广大农民群众的日常困难，没有把这类要求同我们的反战宣传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及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缺点。

影响党的发展速度和活动的最为严重的障碍之一，是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前后党所经历的领导机构的危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波兰问题又一次显得十分突出，成为共产国际最为尖锐的问题之一。这次危机的根源，同志们，首先就在于机会主义的错误和背离了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路线，这使我们党的团结产生了困难，使党内斗争激化起来。国际代表大会主席团重新建立的华沙委员会常委会和共青团中央被解散，是我党领导机构执行反对团结政策的悲惨结局。

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完全正确地指出，我们党内进行的尖锐派别斗争“并不是由于任何一种较重大的分歧所引起的”。同志们，我们认为，党内存在的分歧可能也应当通过非派别斗争的方法加以消除，但是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关于分歧的讨论被生硬地制止，甚至在我们党的理论刊物上也不再进行。

这些分歧涉及波兰法西斯主义的基本趋向和党的策略任务。

限于时间，我只谈一谈争论的主要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因布兰特同志一本论述五月政变的经济因素和现今政府的政策的小册子而引起的。我们党用这本小册子教育干部已经半年了，至今库斯特齐瓦同志的小集团还在维护这本书。实际上，这本小册子只不过是把贝尔维德宫御用经济学家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改写一遍罢了。布兰特同志对于波兰法西斯集团的纲领作了如下表述：“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并加速向外输出，在工业战线上对欧洲采取守势，在国内市场实现集中并**聚集力量准备将来向东方扩张。**”

这就是说，资本只在国内市场实现集中，现在并不推行向东方扩张的政策，这种扩张只是很远的将来的事。

在论述发展前景的一节中，布兰特在指出波兰工业有摧毁东方壁垒的意向时直截了当地说，“这只是历史的趋势，虽然这还不是今天的现实”。照布兰特的意见，波兰的工业界目前并不希望同苏联作战。既然布兰特否认波兰帝国主义存在现实的经济上的刺激因素，那么他客观上就站到了掩护毕苏斯基侵略苏联阴谋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立场上了。而且布兰特完全颠倒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散布“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战线上采取的是守势，“它们是利用实力最雄厚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保持经济独立等等论调。

布兰特的小册子是同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背道而驰的。四大强调指出，“国内市场的自我发展根本不可能成为波兰资本主义获得真正发展的基础”，而客观条件“正在推动并将越来越有力地推动波兰资产阶级加速向东方扩张”，同时这也是波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依附于外国资本这种现象的发展趋向。代表大会明

确地向党指出，战争危险的加剧和日益临近，是由资本主义稳定中矛盾的增长(其中包括争夺新的销售市场的必要性日益迫切)所决定的，而就后面一点而言波兰并不是例外。

第二类争论的问题是由于西乌克兰共产党因其原领导机构奉行民族机会主义政策而经历的危机所引起的。尽管四大强调指出，必须同原华西里基夫领导集团的民族机会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并通过了决议，但我党政治局的多数派仍然继续支持近来已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最凶恶工具的这个集团。

他们很久以来就否认华西里基夫集团执行民族主义路线，不敢对它开展有力的批评。由于对如此明显的右倾危险采取了上述态度，致使西乌克兰共产党内的危机不断激化和加深，导致发生了布哈林同志提到的分裂。

争论的第三类问题涉及对妥协主义政党所起作用的评价。这类问题可归结为：不了解社会妥协主义者采取的反对派手法的实质，对他们阵营内部的摩擦估计过高，认为所谓“左”派的发动几乎都具有革命意义，对于妥协主义政党提出的捍卫议会民主的口号揭露不够。

例如，库斯特齐瓦同志的小团体就阐述过这样一种观点，即波兰社会党目前正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即处于波兰共产党和波兰法西斯的夹击之中。这个小集团一再肯定并在中央委员会的号召书中宣称，达申斯基——著名的社会党叛徒之一，毕苏斯基法西斯政府最热心的同伙之一，已通过为议长，这是因为妥协主义政党代表为我们的议会党团人员遭到法西斯警察毒打表示了义愤。我们发现，这类错误不仅在号召书中存在，而且也出现在瓦尔斯基同志的议会发言中。他也着重强调妥协主义者的愤懑情绪，

并且谆谆告诫社会妥协主义的领袖应怎样为争取议会民主而斗争。同德国共产党的右派集团一样，在我们这里也存在一种对妥协主义政党“左”派领袖的错误态度。例如，不久以前，瓦尔斯基同志在党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断言，在这些“左”派分子的影响下波兰社会党已不再殴打华沙工人。同志们，在这里有人提到是我们在挑唆议会党团。这完全不是事实。我们不拒绝对我党个别代表所犯错误进行批评。我们不仅批评瓦尔斯基同志 1927 年以前的发言，而且也要批评他 1927 年以后的发言，只要发现其中有错误。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的批评的正确性基本上已经得到承认。我向大家举出一件事实，它足以作为对类似蛊惑宣传的最好的政治答复。当法西斯分子袭击我们的议会党团时，华沙组织接连几个小时动员工人抗议殴打我们的议会代表。

此外，库斯特齐瓦集团还歪曲中央少数派同志的错误。对这些错误我们已及时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四大以后的主要错误在于，少数派中的某些同志认为：为了揭露妥协主义领袖和所谓社会主义联盟，不应排除在选举运动中采用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可能性。首先由于我和原先少数派中其他同志的原因，他们不久放弃了这项提议。在共产国际的专题委员会里，我当即发言反对这种错误。但是，在这里，在这个讲台上，库斯特齐瓦同志提出了完全虚构的材料，说原先的少数派建议同波兰社会党缔结选举联盟，等等。与此同时，多数派集团力图利用形式上的威望来阻挠对自己错误的批评，而这些错误的结果是使党的实际工作遭到机会主义的歪曲。在对妥协主义政党采取错误态度的影响下，近来在罗兹和华沙出现了违背华沙组织代表们意愿的采用自上而下统一战线策略的最恶劣的事例。随即在罢工策略方面也发生了一

系列错误。同志们，在我之后一位来自国内的代表将要发言，他将向大家通报这些错误。不仅仅由于派别斗争的影响，而且也由于这些错误的影响，在波兰罢工浪潮高涨之际我们未能起到应该起的作用。在我们党内存在过一种观念，以为只有在党拥有工人阶级的决定性多数的地方它才能够在罢工期间独自行动，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机会主义观点。

当然，任何一个集团也不能担保自己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在我们给全党的加强团结号召书草案中我们也完全开诚布公地谈到了这一点。但是，同志们，最难保险不犯这类错误的则是那些丝毫不愿意对自己错误进行自我批评的人。库斯特齐瓦同志就对自己和自己集团的错误一字不提。她所谈的只是中央原少数派的并不存在，或虽然存在但却被她加以夸大的错误。在这方面，库斯特齐瓦同志的集团是同党的干部背道而驰的，而党的干部经过代表大会前的讨论在政治上成长了。这个集团在这方面也同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背道而驰。四大强调指出，“右倾危机和极‘左’危机的经验教训应当印入每一个党员的心灵深处。”同时代表大会还指出，“在同极左倾向作斗争时，党应当特别注意右的错误，把它看作为当前最危险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新的错误是旧错误的继续。所有新的错误都证明，库斯特齐瓦同志的集团并没有彻底克服他们的遭到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批评的观点。应当着重说明，这个集团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没有承认共产国际对他们错误的批评是正确的。

例如，在乌克兰问题上这个集团在宣言中就不同意说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实际上用“按农民委员会规定的价格把土地

分给农民”这种残缺不全的口号取代了“土地不要赎金”的布尔什维主义口号。共产国际对这种富农倾向的批评并未被库斯特齐瓦同志的右倾集团所接受。对于其他错误也是一样。正因为如此，在代表大会以后党内才出现了实际上否认波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野心具有现实性的观念，以及使党猝不及防地面临西乌克兰共产党发生分裂的局面。由于存在资本主义稳定局面和法西斯主义政策（这种法西斯主义政策，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是一整套愚弄群众的措施）的客观条件，右倾危险就更增长了。在这种时候，对于机会主义错误不进行开诚布公和切实有力的批评是特别危险的。在这种时候，即使整个中央委员会，整个党的领导机构的路线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若继续坚持这些错误，就可能发展到右倾的程度。党的正确路线是由于我们参加了领导机构并在中央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的批评才得以形成的。党以我们的提纲为依据，一直工作到现在。不能像库斯特齐瓦同志那样把这一条路线归功于右倾集团。只有通过切实的全面的自我批评，党才能使自己免于机会主义的错误。

右派集团企图通过硬性施加压力来改变党内的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自己。这个集团现在同党内的多数派，同华沙、上西里西亚、西部白俄罗斯等大的党组织，都存在分歧，至于同共青团更是如此。它差不多同中央委员会的所有部门在作战，把本派别的专权放在党的集体领导之上。

库斯特齐瓦同志在这里提到在党内必须要有铁的纪律。这话不错。特别在目前，铁的纪律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库斯特齐瓦同志的小集团在对待共产国际方面并不遵守这种纪律，因为不通过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即行解散华沙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就

是最明显地破坏了纪律。

由多数派单方面对华沙组织进行的分裂主义试验，表明了一种威胁着全党的危险。华沙组织是我们党内人数最多、积极性和战斗性最强的组织。在地方选举时这个组织征集到 75 000 张选票支持后来被废除的候选人名单。沃伊柯夫同志被杀害后，这个组织发动了数万工人表示抗议。尽管力量集中的首都法西斯机构运用种种恐怖手段施加压力，这个组织在议会选举期间仍然巩固了自己在工人中的影响。

它在法西斯专政的首都组织了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五一节示威游行，并在武装的社会法西斯分子的袭击面前捍卫了自己的旗帜。

我们今天从报纸上得知，昨天举行了示威游行。这最有力地证明，华沙组织至今仍然坚持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试图在这个组织中制造分裂和摧毁它的领导机构，就是对整个波兰的革命运动进行打击。

我们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共产国际解决，不把冲突带到各个基层，带到各个党组织。这个建议被在当地的中央多数派单方面所否决。同志们，我们现在得知，我们党内的分裂仍在继续，关于解散华沙委员会的问题已提交华沙组织进行一种独特的全民表决。这种全民表决正在华沙组织的所有基层支部进行。关于全民表决的结果，将由从波兰来的那位同志向大家介绍。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不能等到大会结束。必须提前召集共产国际六大的波兰委员会。必须由波兰委员会采取一系列果断步骤制止我们党的队伍中这种恶劣的做法。

同志们，我们深信，国际六大将为我们党的真正团结创造条

件。共产国际在制止我们党内的派别斗争的同时一定能保证我们党运用自我批评这种用以克服任何背离列宁主义路线行为的唯一武器，这种最好的教育全党的布尔什维主义方法。我们决心尽一切可能协助共产国际完成这项任务，结束削弱党的派别斗争。

同志们，我的发言即将结束。我们希望我们党能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有威信的领导机构，一个无论在党的一般政策方面，还是在组织政策方面都能坚决执行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路线，克服错误，把党的干部团结在自己周围的领导机构，一个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同右倾危险作斗争的领导机构。台尔曼同志曾经正确地指出，必须做到少数服从多数。但是不能用这一点掩盖一些头脑错乱的人的行动，他们分裂党，用自己单方面的意见制造多数。我认为，保留这样的多数并不是摆脱目前局面的布尔什维主义办法。

只有在布尔什维主义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党，以及能正确理解自己对全党和共产国际所负责任的党的领导机构，才能够成功地击退法西斯主义的疯狂攻击，阻挠其实现罪恶的侵略阴谋，才能够真正起到作为群众为建立工农政府、为建立苏维埃的波兰、为实现被奴役民族的自决权而斗争的领袖的作用。

福斯特（美国）：

我同意布哈林同志提纲的基本路线，不过我想就专门涉及美国形势的几点内容谈一点意见。

首先，我想指出，提纲乃至整个共产国际应当更多地关心在提纲中称之为腐蚀工人阶级的美国方法的这种东西。我想特别提请大会注意在美国广泛流行的一种阶级合作的思潮，这种思潮是伴随着美国帝国主义的合理化纲领和战争纲领而来的。这种思潮

是构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总的新体系在理论、组织和实际工作方面各种学说和手段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没有更好的名称，在我们美国党内把这种思潮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率的社会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当然是带括号的。这正是所谓劳动美国化的最高表现。

这种运动的目的是首先在于把工人卷入美国资本家正在各工业部门推行的加快工作速度的体系中去，从根本上消除工人阶级对企业主加强剥削的反抗。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个运动的任务还在于取消无产阶级的所有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灌输阶级合作的幻想，以及诋毁任何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此外，其目的还在于消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扼杀一切发展革命前景可能性。

这种大力推行提倡阶级合作的运动，是在一大批为提高资本主义生产率而奋斗的工程师^①和经济学家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个运动引起了大量出版物问世。整个资本主义报刊，无论是一般性报刊还是专门的经济报刊，都充斥着关于这个运动的一般思想的报导。这一次倡导阶级合作的激烈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满足产业工人日常需要的理论和设施。他们甚至向工人推荐摆脱资本主义剥削的手段。正是由于此种运动具有这样一个特点，我们才把它称之为假社会主义的变种。

下面我简要地谈一谈这个运动提出的最迫切的几个“口号”。

第一，必须指出支持御用工会的运动。这是在工业中制造假民主气氛的一套办法。御用工会是为了取代职工大会而提出来的。

^① 即“Efficiency engineers”（“效率工程师”，指研究工业组织和劳动生产力等问题的专家。——原编者注

御用工会运动的着眼点在于取消职工大会或使职工大会蜕化为御用工会。

与这种支持御用工会的总的运动相联系的，是一种主张职工大会与御用工会合并的口号，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这样一种组织严密的运动。目前，这种合并已在美国工人运动的各个部分开始实行。

此外，我们还看到这种倡导阶级合作运动的另一个侧面，即所谓“福利运动”。这种运动的目的在于给工人制造一种幻想，似乎资本家正在努力改善工业无产阶级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一个名叫威廉斯的研究提高生产率的工程师正在从理论上对这个运动进行论证。他的观点是，工人并没有任何根本的革命要求，他们的要求只涉及一些次要的缺点，而资本家能够通过一整套改善工人福利的工作克服这些缺点，因为这样做既直接于资本家有利，并可借此取消革命运动。

除了以上种种趋向以外，还有一种颇有声势的运动，其主旨是建立企业主与工会在生产中的合作。这一口号的提出是为了取代在工业中为提高工资和改善一般劳动条件而开展的阶级斗争。在美国，这个运动表现为一系列各色各样的纲领，作为这些纲领核心的基本蓝图在美国主要是所谓的“B. O. 计划”^①或 union management corporation (工会董事会协会)^②。这个计划，同上述阶级合作运动的所有其他种种形式一样，也是由研究生产率提高问题的

① “B. O.”代表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御用工会计划最早就是在这条铁路线上提出来的。——原编者注

② 这是工会和企业董事会订立的协议的一种形式。这种协议规定工会应协助企业主提高劳动生产率等，而企业主则以微小的让步作为代价。——原编者注

工程师们拟制的。

这种假“社会主义”在“教育”方面，即在各种工业部门开展资本主义宣传、建立互助团体、利润分享协会、信用券制度等方面，有一整套实际做法。不过，我愿意提请代表大会特别注意目前在美国兴起的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体系的一些最新表现，那就是这批资本的奴仆所提出的一些假革命的方案。他们硬说这样的方案能够使工人群众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例如，著名的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卡维尔就提出一种理论，断言工人通过获得资本主义公司的股票就能够成为某一个工业部门的所有者，并从而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再如，一个名叫吉利特的百万富翁资本家兼生产效率专家提出的理论是，不仅仅工人，全体人民都可能通过获得股票而一个一个地买下所有工业部门，然后在集团原则的基础上对它们加以改组，把各个工业部门统统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全民公司。他坚持说，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废除资本主义。此外，美国研究大批量生产的专家之一杰格韦尔教授也提倡一种理论。他断言资本主义可以并且正在克服自己的矛盾。他建议设置资本主义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由它来有步骤地克服这些矛盾。他扬言，通过大批量生产、提高工资和降低成本，工人的处境可以逐步得到改善，最后他们在财政方面的实力可能变得十分雄厚，以致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会自行消失并为某种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还有一种维布伦的理论，它宣扬另一种思想，即通过工程师们的活动，资本主义将自行消失，社会将按非资本主义原则得到改组。他完全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

所有这些资本主义乌托邦贯穿着一个共同的思想：要让工人

们相信，他们应当放弃斗争，他们不需要建立任何无产阶级组织，无论是政治组织还是经济组织，他们应当放弃一切革命理想，同资本家进行合作，以便藉此获得自身的解放。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理论家极端敌视无产阶级组织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现在美国的所有工业工程师们都充斥着我所简略地加以描绘的这类思想。产生这种运动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企业主想要镇压美国的职工大会或者迫使它们实际上蜕化为御用工会。

在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力图把工人纳入合理化计划和战争计划中去，在这方面他们主要想依靠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和工会领袖中收罗到的仆从。

在美国，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趋向。美国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竭力利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和工会领袖，但与此同时又把使工人卷入合理化计划这件事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交由自己的工程师们来直接实现这项任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美国改良主义的领袖和组织对于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十分微弱。美国不存在群众性的改良主义政党——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工党，改良主义工会只能影响极少数工人。因此十分自然，这些组织的领袖对于工人阶级不可能起到资本家所期望的那样巨大的影响。因此，资本家就力图利用自己更为亲近的仆从——工业工程师——来取代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会领袖和政治领袖。

此外，还存在另一种明显的趋势，那就是要使改良主义的领袖和工会更直接地从属于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组织并溶化在其中，以及对它们进行更加直接的控制。因此，工程师在运动中就起着重大的作用。美国劳联的领袖们已经完全处于企业主的这个提高资本主义生产率纲领的影响之下。工程师们已经把对保守的

美国工人运动的思想上的领导权，在不少场合也包括组织上的领导权掌握到自己手中。许多工会吸收从事提高生产效率的工程师参加自己的机构。工会报刊充斥着这些工程师按上述精神写成的文章。

这个运动的总的趋势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力图把工人贵族纳入资本主义组织，布哈林同志的提纲已提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从精神上瓦解广大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群众的纲领，必须同这个纲领作斗争。美国的这一次旨在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效率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一系列国际性的后果。它破坏了国际社会民主党发展的总路线。蒙德主义就是这个总趋向的表现之一。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接受了企业主的合理化纲领，也就是同时接受了这个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率“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将越来越背离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和纲领，越来越吸收美国资本家的工程师仆从所提出的思想和纲领。我们的纲领本应该更加明确地指出这个总的形势。

我想谈的下一个问题，是在提纲中必须对美国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规模和后果作出更为详尽的分析。在这些矛盾中，应当指出生产能力与生产实际增长的不相称、生产的增长与消费的不相称、存在失业现象等等。毕特尔曼同志在发言中详细地剖析了这些矛盾，瓦尔加同志也有部分涉及。由于时间不够，我不准备对这些矛盾作详细说明。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之所以必须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是由于以下一些原因：第一，因为这些矛盾是促成未来世界大战的根本因素。这些矛盾越发展，美国帝国主义就越需要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战争的危險就会越来越严重。美国是为首的帝国主义大国，它的内在动力、内部矛盾正在推动

它奉行一种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政策，从而使全世界被卷入战争的危險日益加剧。对于整个共产国际说来，对此进行详尽的剖析是十分重要的。第二，布哈林同志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分析之所以还要进一步具体化，其原因还特别在于要为美国党的政策奠定牢固的基础。

我在发言中主要将涉及第二个原因。我之所以建议详细地进行分析，特别是因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劳斯顿—佩珀多数派在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上执行了不正确的路线，犯了右倾。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根本错误在于：一贯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估计不足，而对它的潜在力量估计过高。这就决定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在其整个党的政策中造成右倾错误。

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在分析美国帝国主义时只是强调其强大的实力，而忽视了破坏这个实力的各种因素。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说明美国帝国主义向上发展的征兆，而对于其内部矛盾则只是例行公事似地、笼统抽象地说一说。在我们的多数派看来，这些内部矛盾不是发展变化的因素，不是现今正积极发挥作用的因素。毕特曼同志说得十分精彩，这些人的立场差不多可以归结为赞美颂扬美国帝国主义的强盛和发展。

他们的发言人中没有一个人涉及美国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这就十分典型地说明了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只要能够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正在向前发展，他们就极其满意了。他们竟天真可笑地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党的巨大危險不在于我们可能忽视美国帝国主义的实力，因为关于这一点各方面都在向我们喋喋不休地唠叨不停，这种危險恰恰在于，我们可能像中央委员会多数派那样在这种实力面前解除了思想武装，从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的同

资本家作斗争的可能性。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与多数派不同，他们不满足于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关于美国帝国主义仍在不断向上发展的含混不清，观点模糊的声明。他们坚持主张详细研究美国帝国主义更加具体的发展前景。对于整个共产国际来说，对于我们党也是一样，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描绘出这个前景是极其重要的。

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完全同意美国帝国主义仍在向上发展的看法（佩珀同志指责说，似乎我们认为美国帝国主义目前正处于衰退时期。这纯属捏造），但与此同时也强调另一个事实，即由于日益增长的内部矛盾，以及由于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不断壮大的苏联和殖民地各国人民蓬勃发展的解放运动的日益增强的抵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前进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我们的观点是：面对日益增长的本国和世界范围的冲突和矛盾，美国帝国主义并不可能像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所预言的那样期望获得持续不断的，无止境的发展。为了继续向前发展，美国帝国主义不仅不得不向美国工人现有的生活水平发起进攻从而引起罢工和冲突，而且还不得不采取更加气势汹汹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而这样做又会使世界大战的威胁日益临近。美国帝国主义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与几年以前欧洲因经历世界大战而受到极大削弱的情况完全不同。

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关于美国帝国主义无止境前进的理论包含着对战争危险估计不足。由于看不到打击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及美国帝国主义日益激化的内部矛盾，他们也不能认识这种发展前景推动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发生冲突的一切后果。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与众不同的侵略作用认识不足。去年他们提出一种理论，似乎美国并没有自己野

心勃勃的政策，美国只不过是英国在中国的工具。现在他们又把美国说成是日本在中国的伙计和工具。从所有这类错误论调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他们对战争危险估计不足。

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夸大美国帝国主义的强盛和繁荣，以及对其日益增加的困难认识不足，还造成另一个后果，那就是他们对群众向左转的趋势估计不足，而且始终不善于根据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判断一般发展的前景和确定党的方针。

这种右倾错误具体表现为：

1. 对当前工业不景气现象的规模、深度、实质和后果估计不足。这表现为他们在提纲和文章中引用关于工业“退潮”属于“偶然”现象的资产阶级理论。

2. 对于工资降低的幅度和对工人的总的压力估计不足，看不出计件工资降低的情况将广泛扩大。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忽视整个主要工业部门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大规模转向革命的趋势，只承认在所谓“患病的”工业部门——采矿工业、纺织工业和缝纫工业存在这种趋势，而且按照他们的观点，这些工业部门现在也只是由于推行合理化才经受着危机。

3. 对企业主为摧毁工会而发动攻击的力量估计不足，因而对于工会的危机不够重视，并企图依靠这些旧的工会，而不是去大力建立新的工会，以便把未参加工会的群众组织起来。

结果，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由于不能正确判断群众日益高涨的战斗精神，也就无法对群众的斗争进行果断的领导。在工会工作中这一点可以看得特别明显。中央委员会策略的特点是根本不相信群众的战斗精神。这是中央委员会对于把未参加工会的群众组织到新的工会中去这项伟大任务采取敷衍塞责态度的主要原因之

一。中央委员会对于在这里发生的冲突极不关心。因此，我们的工会工作因为一些完全不应发生的失误而停顿不前。例如，我们在汽车、制鞋、五金等等工业部门开展的组织运动就彻底失败了。

另一方面，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既清楚地看到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也同样清楚地看到它的矛盾，不是简单地把当前的工业危机看成是普通的战前那种周期性危机，而是把这种危机看成是美国帝国主义日益增长的困难的反映和更加深刻的危机的预兆。我们看到，不仅在“患病的”工业部门，而且在整个工业中，工资大幅度下降，“提高工作速度”的运动正在开展。我们看到，不仅在采矿工业、纺织工业和缝纫工业（这些所谓美国工业的“薄弱点”）中，而且在汽车工业、肉类包装工业、制鞋工业及许多其他工业部门中，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群众的抵抗精神正在不断高涨。这种论断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佩珀指责说，似乎去年我们就曾认定所有工人都资产阶级化了，而今年又断言他们又全都革命化了。对此我不准备再作答复。毕特尔曼同志对这一指责的反击完全正确。少数派一年以前在莫斯科曾说过，熟练工人的上层是美国无产阶级内部资产阶级化了的分子，而广大非熟练工人群众没有发生这种资产阶级化。而现在我们说，在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中，也即去年我们明确地断定为美国无产阶级中没有资产阶级化的阶层中，出现新的抵抗精神和向左转的倾向。目前，他们正处在资本家的强大攻击之下，这种攻击表现为降低工资、加快工作速度、失业现象增长等等。可见，我们的立场并没有任何矛盾。

正是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分析和判断了美国当前的形势，这种形势在很多方面都是全新的。正是

少数派成了组织未参加工会的群众这个运动中的推动力。我们党在莫斯科可以指出的一个实际成绩是：在开展上述运动期间，采矿工人兴起了规模宏大的斗争。但是，运动期间的政策实际上百分之百都是少数派的同志们制订的。在战斗第一线进行领导和实际贯彻执行这个政策的也是少数派。在很多场合下，采矿工业部门制订富有成效的策略的工作常常遭到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反对，在各次发动期间也往往遇到同样的反对。

我想谈谈提纲中肯定共产国际的主要危险来自右的方面的有关内容。这一点就美国党来说特别正确，因此提纲对这一点应特别予以强调。从我上面谈到的关于对美国帝国主义内部矛盾认识不足和由于这种错误判断而产生的错误政策中可以看到，洛夫斯顿多数派在制订和实现党的当前任务方面顽固地采取了右的方针。对整个党的工作做一番总的回顾就可以看到，我们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右的倾向。

在工人党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一贯犯有右倾。这表现在他们培植和容忍这样一种理论，似乎工人党像多数右派分子所断言的那样，将为无产阶级事业而斗争，甚至为之大开绿灯。这也表现在他们把建立工人政党运动的重心从工业无产阶级转向农场工人，表现在他们违背共产国际与此相反的决议而把农场工人和工人联合在一个政党中，表现在他们企图在组织工人政党时依靠工会官僚机构。

在反帝和反战运动中，正如毕特尔曼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犯了重大的右倾错误。在工会工作方面他们反对提出建立新工会的口号，并且宣称少数派的所有这类意图是想建立双重工会。在这方面行动迟缓，全党都是负有责任的，但是劳

斯顿多数派对此要特别承担责任。在黑人工作方面，多数派的毛病是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极差。当然，对此仍然是全党都应受到严正的指责。共产国际和农民国际的可贵功绩之一，就是它们终于迫使美国党认识了在黑人群众中开展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在妇女工作方面，多数派着眼于家庭主妇而不是工业中的女工。在合作事业方面，他们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使我们在纽约的全部合作事业计划目前面临彻底失败的危险，这可能引起公开的闹剧，并对全党产生致命的影响。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多数派暴露出一种更多着眼于自由党人和进步党人而不是着眼于工人和左派的严重倾向。

此外，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在对待社会党问题上也采取了错误的立场。这特别表现在支持潘肯在纽约的候选人资格方面。对此坎农同志等人已经作了说明。

由于对美国帝国主义作了总的错误分析而在党的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所有这些倾向，构成了我们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一定程度的右倾错误。

佩珀同志在他的讲话中宣称中央的多数派为反对右翼进行了斗争。他举出 4 年前提出的选举纲领作证，不过佩珀同志忘记说明这个纲领是鲁登贝尔格同志拟定并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而且这个纲领是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既然佩珀同志愿意退回到 4 年前去寻找右的错误，那么我想不如提请他注意当时所犯的更加严重的右的错误，那就是第三次美国革命理论。（鼓掌。）这种理论认为，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势力在拉福莱特的领导下能够战胜大资产阶级。

佩珀同志在讲话中用了 50 分钟时间说明同左派的斗争，用了

2分钟时间讲同右派的斗争。这一点正是中央委员会整个路线的典型表现。他们并没有同右派作任何斗争，因为他们确信危险来自左方。当我们坚持必须建立新的工会时，他们斥责我们是左派分子和双重工会的支持者。当我们同潘肯进行斗争并反对一切同社会党勾结的错误做法时，他们也宣称这是“左”倾。当我在中央委员会宣称共产国际致法国党和英国党关于加强同工党及左派联盟斗争的信对于美国的局势也适用时，他们嘲笑这种说法，认为这是把仅仅适用于欧洲的政策机械地搬到美国来。

他们是怎样同右翼作斗争的呢？这一点在我们党中央最近一次全体会议上暴露得十分清楚。当我们试图极其和缓地谴责缝纫工业中洛夫斯顿一类机会主义首领时，我们当即被打得头破血流，攻击的全部力量都指向我们。他们一贯歪曲我们的立场。例如，佩珀就曾断言，我曾把毕特尔曼关于宣告煤矿工人罢工失败的建议称作为工贼政策。实际上我说的是，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可能使我们被指责为工贼。劳斯顿集团没有同右翼进行过任何斗争。它本身就是右翼。

温斯顿同志指责我们说，我们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做法是无原则行为，中央委员会的所有错误我们都有份。事实并非如此。确实，少数派犯有和参与了某些右的错误，正如犯有和参与了某些“左”的错误一样，如给社会党的公开信、对黑人工作重视不够，等等。但是，他们的总的政治路线要比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路线正确得多。

我们反对洛夫斯顿关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国际作用的错误观念。我们坚决反对对当前的工业危机和无产阶级战斗精神不断高涨估计不足。我们反对同潘肯勾勾搭搭。在我们政治局中，我们

——毕特尔曼同志、坎农和我——一再发言和投票反对同潘肯勾搭，这种勾搭表现为支持那个也得到共和党和纽约大资产阶级报纸支持的社会党候选人。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反对多数派，而且也反对维护上述勾搭行径的共产国际代表。

我们坚持不懈地反对合作社中、缝纫工业中、妇女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而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一直遇到来自洛夫斯顿集团的顽强抵抗。劳斯顿集团的策略比我们的策略要右得多。我们的策略尽管偶而出现错误，但基本上是共产国际的策略。这正不断得到事实的证明。

洛夫斯顿同志会向大家说，还在不久以前——在我们的二月全会上，我们过分缩小了我们党内的政治分歧，因此我们现在不应该对中央委员会提出指责，说成是机会主义。

毫无疑问，在二月全会上我们犯了错误，没有十分尖锐地把不断增长的政治分歧暴露出来。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分歧还没有成熟到能令人清楚地认识它们的程度，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结束旷日持久的派别斗争。我们本来是应该以个别提纲的形式对劳斯顿的提纲提出修改，以改变整个路线的。其次，我们当时是应当展开反对洛夫斯顿集团的斗争的，因为他们的策略不正确，而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

最近几年来，我们一直处于目前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反对派地位，反对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主要在于极端不重视工会工作和在工人党问题上采用错误的政策。但是，只是在最近几个月里，随着领导权转入洛夫斯顿同志手中和美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个集团的右倾性质才彻底暴露出来。

斯大林同志 1926 年 1 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发表讲话时曾

谈到右的和极“左”的危险。他说：当客观局势使革命发展的速度由较慢转入较快时，威胁特别大的是右的危险。美国的局势正是如此。目前，我们正从相对平静的时期转向斗争更加激烈的时期，而洛夫斯顿集团无法理解这一点因而也不能采取加强进攻的办法来迎接这个时期。

正是在当前这个转折时期，洛夫斯顿集团最明显地暴露出他们的右倾性质。洛夫斯顿集团不能理解新形势的意义，因此无法加强向资本主义的进攻。他们对工业萧条现象的规模和后果估计不足；他们无法理解群众日益增长的抵抗精神。他们不能根据这种前景给党提出更加积极地进行斗争的新方针。这些都证明了他们严重的右倾性质。

5月16日，共产国际曾经给美国党发出一封信。这封信纠正了中央委员会整整半打严重错误。所有这些错误都是右倾性质的错误。这封信清楚地证明，洛夫斯顿多数派顽固地采取了背离共产国际路线而向右转的方针。现在，共产国际应当不局限于只提出这封信中的那些批评意见。它应当十分明确地承认洛夫斯顿集团肯定实行了右的方针，并采取果断措施纠正它的路线。

尽管现在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执行了右倾的政策，我们党在对群众发挥领导作用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如果有正确的政策，党就能取得更加大得多的成绩。客观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了。群众在客观条件的强大压力下开始觉醒。但是，只有取消目前的右倾方针，我们才能充分运用现有的条件。

为了实现我们面临的巨大任务，党的统一是绝对必须的。但是，有一些同志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只要在党内的政治分歧之间搭上一座桥，就能人为地达成统一。我们党的统一取决于

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政策正确与否，取决于能否对党的领导机关进行相应的改组。那时党就有充分的准备，能够向前迈进，并顺利实现它作为美国无产阶级先锋队所面临的伟大任务。

东巴尔（农民国际共产党党团）：

我只想谈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作。应当承认，布哈林同志在其报告中提出的批评以及某些代表的发言都提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也指出了农民国际必须加强自己的工作。对于我们农民国际共产党团的工作人员来说，看到人们明了农民工作应当受到极度注意，心中是非常高兴的。但是，在提纲中只谈到要加强农民国际的工作，而对农民运动面临的任務却只字未提。

我想简要地描述一下农村的局势。资本主义的稳定在农业领域也表现了出来。这种局面一方面造成了现有制度的暂时稳固性，一方面也使阶级矛盾激化，为农民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创造了前提。

资本主义稳定年代的特点是，金融资本大大发展并日益控制农业。银行资本、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越来越控制着农业领域的销售和供给。农业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农业实行工业化主义的方针日益加强，销售领域卡特尔化的趋势，如 Reichsgetreidehandels-gesellschaft（国家粮食贸易公司）、加拿大小麦联营公司等，以及生产领域的托拉斯化的趋势，正在不断增长。此外，以粮食垄断等形式出现的国家进行干预的倾向也在加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和大农业越来越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融合在一起，而小农和部分中等农民的处境则日益恶化，它们越来越难以同生产效能更高的大农业相竞争。

贫农和中农负担着赋税中极不相称的很大一部分，而它们从信贷和合作事业等等方面所得却微不足道。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

而来的是农民的分化不断加剧，其结果是农业无产阶级和向他们靠拢的贫农逐渐联合，中农越来越不稳定。在存在封建农奴关系残余的国家中，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由于金融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加强以及资本主义的普遍发展，现在的农村生活结构迅速崩溃。各地的土地租售价格普遍上升，租赁条件日益恶劣。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殖民地国家，土地占有者开始大量地驱赶佃户离开土地（如印度就是如此）。在不少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现有土地关系的破坏，特别是引起了村社土地所有制的破坏（如北非、印度尼西亚等）。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激化了农村的阶级斗争。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越发展，农民就越趋向于革命。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法也要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帝国主义大战后在不少国家开始进行的土地改革，不但未能解决农村中的基本矛盾，未能从议事日程上把农民革命的任务取消，反而破坏了现有的土地关系。这种改革大都有利于富农经济的发展。

归根到底，这类改革使小农的处境恶化，造成越来越多的农民对现状不满。

最近以来，在印度尼西亚、印度（通过皇家委员会的工作）这样一些国家，以及一定程度在日本（实行租佃法）和北非等地，土地改革正在准备之中或者已在进行。这类改革的方针大体上与1905年革命后沙皇政府实行的所谓斯托雷平改革的方针相同。着重发展富裕农民、巩固对土地的私有制而使贫农走向赤贫化和无产阶级化，这些做法必然加速新的革命爆发。

农村上层分子同金融资本及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融合，必然同时造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保留有封建关系残余的农业国的农

村政治反动势力的加强。这一过程表现为富农组织向右转的趋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波兰、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国家）。在农业向上发展的基础上，法西斯主义往往能够带动中等农民跟着它走，同时摧毁和用法西斯手段镇压左翼农民运动（波兰）。

资本主义的稳定也反映在美国农民的向右转方面，反映在法国和德国的左派组织在最近的选举中失去了农民的选票，等等。

这一切给左翼运动的发展造成客观的困难，但是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稳定基础上矛盾的普遍增长，特别是农业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以及小农和部分中农处境的恶化（其背景是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发展），也为农村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中国的农民革命运动和原先一样具有巨大的意义。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任务并没有解决。各地的农民运动虽然屡遭挫折，但仍在前进，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类国家的农民斗争正不断激化。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农民参加斗争的人数越来越多。除了早已在进行革命斗争的墨西哥农民以外，玻利维亚和中美洲、南美洲其他国家的农民也正在投入斗争。由于那里的农民革命运动是同美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因而具有特别重大的国际意义。

同志们，关于农民国际及其工作的问题，是与整个农民和农民运动问题直接相关的。农民国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世界农民运动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对农民国际采取取消主义态度，就是对革命的农民运动采取取消主义态度。

托洛茨基反对派正是由于不理解农民在不同国家革命发展不同阶段的作用，所以对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能力估计不足，对农

民国际的活动采取了取消主义态度。这绝不是偶然的。农民国际的基础是革命的农民运动。否认农民国际的作用，看不到它的工作的基础，必不可免地要否认农民革命运动的作用和意义。

农民国际应当成为党外的群众性农民政治组织，其任务是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的基础上组织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柯拉罗夫同志在其发言中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毫无疑问，他的主张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在这方面也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把农民国际变成为群众性的农民组织。参加农民国际的各个农民组织，在革命前是团结和组织农民群众的机关，在革命到来之时则应转变为农民协会或成为它们的组织核心。根据各国的不同条件，农民协会应当同工会一起或者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或者和现在苏联的村苏维埃一样，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这就是我们农民国际发展的前景。

这就是说，参加农民国际的农民组织应当和职工大会、青年组织等一样成为共产党的纽带，共产党通过它们来实现对群众的领导。不妨提醒一句，列宁就十分重视农民组织。例如 1905 年革命期间，列宁就曾认为当时处在自由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的农民协会具有巨大的意义。1917 年时，列宁对于掌握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手中的农民苏维埃的活动也极为重视。列宁把农民组织看作为团结农民群众的机关，看作为自下而上地没有衙门作风地组织农民的手段。他号召全党以最大的决心在农民组织中开展工作，这是正确无误的。我们党果然从富农政党的领导下把农民组织争取了过来，并通过它们带领农民跟随自己前进。不妨回忆一下，1917 年农民苏维埃转到革命方面来的情况。

只有不理解农民组织（甚至包括处于资产阶级和富农领导下

的农民组织)的重大作用,才会因为农民国际在南斯拉夫斯特凡·拉迪奇的党内和在处于异己势力领导下的其他农民组织内开展工作而批评农民国际。

主要的任务是发展农民国际及其所属组织,使其成为真正的党外群众性的农民组织,成为共产党和广大农民群众之间的纽带。

这就是说,共产党党团在农民国际和农民组织中的工作应当成为各国共产党开展农民工作的一种特殊形式,应当有别于党组织自身的工作,特别是乡村基层支部的工作。

当然,共产党党团在农民国际及其所属各组织中的工作应当同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工作协调一致,但是主要的是,共产党党团不应当取代整个农民国际和农民组织。

国际执委会的土地委员会(其基本核心应由农民国际共产党党团工作人员组成)应当关注共产国际各支部执行土地政策的情况。

农民国际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吸收真正非党农民活动家和农民积极分子参加农民国际的工作,从仅仅执行宣传鼓动任务转向建立和加强同当地农民组织的直接组织联系并扩大这种联系。

在当前情况下,我应当说:必须规定农民国际要有重要国家非党农民的代表,而各重要的国家中要有农民国际的代表。应当建立起若干组织方面的据点。鉴于存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这样做就更加必要了。现在就必须在各个国家召开一系列农民代表会议,并筹备农民国际代表大会。农民国际已经5年没有召开代表大会了。此外,还应当举行一些主要共产党农村工作领导人的会议。与此同时,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农民国际的非党性质,不

过也要同时加强农民国际的共产党党团。还必须给国际农业研究所增加学术力量。同时也必须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全会关于在群众性农民组织开展工作促使其参加农民国际和关于建立新的农民组织的指示。尽管困难重重，力量不足，而且开始时缺乏现成的基干工作人员，农民国际的共产党党团还是完成了相当大量的工作，不断为把农民国际转变为群众性的农民组织创造条件，目前农民国际正在实现这种向群众性农民组织的转变。

这些就是建立和发展农民国际的党外组织的前提条件。不妨回忆一下，在建立农民国际时，除了联共（布）党以外，在其他党内既没有农业委员会也没有农村工作部，只有波兰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各有一个还是同工会工作部联合在一起的农村工作部。如今，差不多所有各国的党都在我们的协助之下建起了农业委员会或农村工作部。现在我们正在帮助许多党纠正自己的错误，并在农民群众中开展实际工作。

至于在农民中开展群众工作方面，我们在下列国家已经建立了支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瑞典、挪威、美国、捷克斯洛伐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此外，我们还在不少国家形成了左派。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一些支部被法西斯恐怖手段所摧毁。总的说来，各支部的力量都很薄弱。它们人数不多，但是正在成为沿群众组织方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至于非党农民积极分子骨干，那么在不少国家已经形成。

应当承认，组织工作十分薄弱，必须加强。

至于宣传鼓动工作，除了共产党的农民报纸外，办起非党农民报纸的已有以下国家：德国、法国、波兰、希腊、保加利亚、瑞典、挪威、美国等等。固然，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并不大，但在有

几个国家达到了 16 000 分。作为农民报纸，这样的发行量已经相当可观了。此外，我们在最近期间还出版了若干有关选举运动的小册子，若干有关苏联问题的小册子，出版了一本《苏联农村》图片集。这本图片集已售出 80%。谈到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成绩，还可以提到我们已在这段时间内建成了自己的学术基地——国际农业研究所。这个所的工作日益开展，值得所有各国共产党予以关注。

下面谈谈我们工作中的弱点。我们的主要弱点是群众工作做得很不够，在这方面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农民青年工作至今还是空白，在这方面也必须坚决改变现状。

共产国际的个别工作人员以及在各国共产党内，对于农民国际的地位和它在不同国家（如：（1）没有共产党的国家；（2）共产党力量薄弱的国家；（3）共产党力量强大的国家）应完成的任务，没有明确的认识，态度不正常。这种状况必须克服。

再谈谈农民国际的工作方法。农民国际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以具体情况，而首先必须以不同国家乃至不同地区的局部要求为出发点。它的工作应当根据各国乃至各个地区的不同条件而有所变化。例如，在南斯拉夫就不能规定一般性的工作计划，因为不同地区应有各自不同的计划。认为在发生农民革命的国家以及一切已爆发农民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国家（如中国等）农民国际不应开展工作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弄清直接的党的工作和与之平行的非党群众工作的问题。应当坚决地着手把农民国际改变为非党的群众性组织。我在这里表示欢迎柯拉罗夫同志的建议，不过不能同意他的一个提法，即农民国际应当用一种非共产党的办法对待群众，应当采用自己的非共产党的语言，等等。农民国际

开展的活动实质上当然应该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活动，不过要使这种活动适应农民工作的特殊条件。

至于各个国家的工作状况，我只谈谈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并举出若干事例来说明农民工作薄弱到何种程度。先说波兰，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都被认为是开展农村工作的典范。这个国家存在的缺点说明，那里并非一切都很顺利。我必须指出，波兰工作的弱点是由于工作主要在宣传鼓动方面，而不是在直接行动方面，而且还出现了一种从实用主义出发阉割革命口号的倾向，如试图取消“土地不付赎金”的口号而代之以“以低廉价格获取土地”的口号，以及要求公正地整理土地，等等。

在独立农民党和村社大会党被摧毁之后，我们没有采用新的群众工作方式，而是在原地踏步不前，抱着旧的工作方式不放，没有认真地考虑到法西斯在农村的工作方法（夺占合作组织，在各县设置军事督导员以组织法西斯团体“射手团”等）。

存在着一种不善于区分合法的农民工作与地下的共产党的工作的现象。而这又导致另一种倾向，即把农民组织看作为共产党的“代理机构”，某些同志甚至试图在农村工作中用农民党来代替共产党。

在地方自治工作中对于合作经济组织也重视不够。注意力几乎只集中于对农民进行政治动员，而且始终未曾努力建立一个在农民经济组织中开展工作的主要基地。因此，在激进的农民组织被摧毁后，我们几乎就悬挂在半空中了。在选举期间，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缺乏联系。共产党在农业工人中几乎毫无影响，而农业工人却是在农村开展工作的基础。人们感觉到对工作缺乏经常性的指导。波兰社会党的影响大大加强，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

农村工作十分薄弱。法西斯在农村的势力也在不断巩固。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认真关注波兰共产党的农村工作。为了描述近期以来这项工作的状况，我要引用一封信，把其中一段读一下，因为这封信说明工作近来的确没有进展。这是农村工作部一个成员写来的。他写道：“每一个县都有一名中士和两名下士长期留驻。工作很不顺利。但是愿意参加“射手团”组织的人日益增多，因为游逛嬉戏能吸引每一个人。我们对此能抗衡的程度甚至不及5%。独立农民党（处于地下）活动期间的农村工作同现在相比真是黄金时代。农村存在激进的情绪，而且有所加强，不过这不是我们工作的结果。这纯粹是过去工作的结果，是选举产生的结果，也是农村悲惨的经济状况造成的。

“我们只是在形式上存在，有的无非是谁也不需要的统计资料。我在这里也好，我不在这里也好，反正都毫无进展。也感觉不到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原因很清楚：因为存在党内斗争。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今天谁也无权借口农村工作困难而回避工作。今天门是打开着的。”

同志们，这一呼声告诉我们，必须认真关注波兰共产党的农村工作。

至于德国，应当说领导机构对于农民问题关心很少。在选举期间也出现过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我想，当时有人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以及对这个口号的理解都不过是把它当作一种皆大欢喜的口号，而当必须将这个口号具体贯彻的时候就把它忘记了。选举之后，在一部分农民中，甚至在农民共产党员中，出现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因为选举时农民候选人被放在最后并且均未当选而感到屈辱。

我想，我们不应当向农民许诺我们无法做到的事。共产国际应当注意到这一点。不应使工农联盟问题受到威胁，不应增加农民群众的不满情绪。

谈到法国的的工作，可以说经过4年之后到今天我们才得以说服法国同志把农民协会建成群众性组织。我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做好，也希望法国共产党能够支持我们。

至于捷克斯洛伐克，我应当说，在这个农业资产阶级当政的国家共产党迄今还没有在农村大力开展工作。应当说，那里的领导机构对这项工作的看法是完全不正常的。在一次会议期间，一名工作人员说，他不能在农村工作，因为他怕被指控为反对派。也有像另一个同志那样地“解释”说，党未进行农村工作，是因为“忙于实现布尔什维克化”。

至于民族地区的工作，我们的缺点就更多了，特别是在乌克兰的喀尔巴阡山一带，那里迄今为止还没有把工作整顿好。不过既然指出了错误，那么也应该谈谈工作中的长处。我们在兹沃伦区建立了一个团结委员会，除了共产党人外，参加的有农民党党员、改良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领导权则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不过应当指出，在党这样做以前，农民坚持提出这种要求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迄今为止，这项工作在其他区还没有开展。因此，除温文尔雅的恭维话之外，应当向共产党指出，它必须开展自己的工作。

在奥地利，值得注意的是：在1927年内，当人们纷纷讨论土地税和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的时候，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尽管对什么事情都发表看法，但对土地问题几乎一字不提。这家报纸不停地转载各种各样的苏联诗歌、民谣等等，却不给严肃

重要的农民工作让出一席之地。同样，当现在围绕农业工人保险问题展开斗争的时候，我们看到《红旗》采取的也是这种态度。这时，《红旗》又一次保持沉默。应当指出，总的来说，不仅仅只是奥地利一国的共产党报刊很少阐述农村工作。

至于罗马尼亚，在这里应当指出，那里农民的革命化转变正在不断加强，农民运动正在呈现明显的巨大高潮。这次高潮不是一下子就来到的，它是从群众集会开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今年3月，在有15万多农民参加的在阿尔巴—尤利亚召开的代表大会之前，在布加勒斯特举行过一次有6万农民聚集的农民大会。但是，共产党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于是农民的运动也就不理会共产党。不仅如此，当前，当民族主义的农民党对议会进行抵制并试图召开自己的议会时，还在说这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两个派别在斗争，这样就要在罗马尼亚重复1923年保加利亚的错误。因此，对罗马尼亚共产党必须认真加以注意。共产国际必须对罗马尼亚共产党施加影响，使其改进农民工作。

现在再谈谈南斯拉夫的形势。那里农民运动正在掀起一个大高潮。高潮正在原先的塞尔维亚兴起。那里的运动第一次具有了群众性，并且指向执政的资产阶级。普列昌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克罗地亚、伏伊伏丁那和原先奥匈的其他区正在兴起具有民族色彩的运动。拉迪奇和法西斯资产阶级，以及普里比切维奇等等，都在利用这个运动，而共产党虽有许多同志在搞农民运动，却只开展了一些很微弱的、不经常的工作。那里也做过一些努力，试图通过农民国际中的共产党党团来加强这项工作。应当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机构，组织起相应的农业委员会，使我们不致于落在塞尔维亚“土地派”和普列昌地区拉迪奇的屁股后面。

希腊的运动刚刚在开始。同志们只是最近在农民国际的协助下才开始着手工作。已经取得一些成绩。只要工作做得正确，就有可能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不过迄今为止，马其顿逃亡农民的工作还未做好，去年和今年的逃亡农民代表大会几乎都没有我们参与。

至于保加利亚，应当说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农民中开展了广泛的活动。不过那里也有一些不足，如这个国家的党在对待非党农民工作干部的态度上就出现过发号施令的做法。

至于殖民地国家和东方，就东方而言，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同那些参加民族运动，团结较多农民群众，还处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强烈影响下的那些农民组织建立联系。

这一点涉及多数东方国家。在朝鲜、印度、菲律宾，以及部分地也包括印度尼西亚，许多农民群众还站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旗帜之下。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我们已经同当地的农民组织建立了联系，获得了它们的一定支持，并拟定了它们的工作计划。这些组织力量很弱，对农民斗争的目的认识得也不明确。那里我们遇到的困难很大。其原因首先在于共产党力量薄弱或没有共产党存在（如菲律宾），而共产党本应成为农民国际在活动中的支柱。不管怎样，农民国际在这些国家中已经打下了工作的基础。

在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如埃及、波斯、土耳其，情况要差一些。那些国家还没有农民组织，人数不多的共产党刚刚着手开展农民工作。关于农民国际在这些国家的工作问题现在才提出来。在某些国家，如埃及，不得不确立利用民族运动左翼派

别的方针。而在土耳其和波斯则相反，只有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之下，组织农民的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农民国际在中国的工作是一个特殊问题。这个国家的强大的农民运动完全是在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在对待东方工作问题上，存在着某些影响农民国际工作的倾向。这一点必须指出，并应坚决克服。我不准备详细介绍这方面的全部情况，不过这确实是我们同开展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国家联系很差的原因之一。应当指出，在完成这一任务时，农民国际共产党党团得不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足够关注。目前，由于国民党政权获得暂时稳定的前景并未排除，建立中国农民斗争合法形式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在新的革命高潮来到之前，中国的农民运动由于没有与游击战争汇合在一起而被迫转入地下。这就大大地妨碍了动员农民群众，妨碍了农民工作。在我们看来，建立合法的农民组织，即使以农民的局部要求为基础，也能够帮助我们保存干部，以及重新整顿被驱散的农民协会和使它们作好参加未来战斗的准备。

我的发言即将结束。我必须说明，整个说来我同意科拉罗夫同志的发言，只不过正如我已经指出那样，不应该采用这样的提法，即农民国际应该按自己特有的方法工作，不用共产党的方法。我也不同意他的这样的一种错误观点，似乎巴尔干国家的中农全部都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不过总的说来，柯拉罗夫同志正确地指出了农民国际不应当成为共产国际的质量低劣的翻版。农民国际应当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它应当形成自己特有的工作方法。科拉罗夫同志的这个建议应予接受并使之实现。

至于克麦尼同志提出的应该把农民党看作是进行农民工作的

唯一的和最重要的工作形式，以及应该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全会决议加以修订的建议，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他十分狭隘地看待这个问题，并且认为农民国际指出在农民运动中有更好的工作方式是犯了错误。组织这样的党，并且主动承担这件事，并不是我们的任务。我想，波兰的例子说明，那不是开展农民工作的最好方式。我们应当采用各种形式，例如建立团结委员会等，但不需要对第五次执委会扩大会议的决议作任何修改，需要的是贯彻执行这些决议，而现在并没有这样做。

我同意哥尔斯基或许稍有夸大的说法：我们的每一次代表大会都就农民问题作出决议，但可惜的是这些决议一直是纸上谈兵。一般说来，在所有的代表大会上，也许今天是例外，但通常并不例外，讨论农民问题总是在人们已经拿了皮箱准备启程的时候，总是在人们都很疲劳，都像现在这样打瞌睡的时候。（笑声。）我想，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哥尔斯基同志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方面应有改进。

至于对提纲的更加详尽的建议，农民国际共产党党团将以书面形式提出。必须说明，农民国际共产党党团自然需要全面的支持，我们感谢科拉罗夫同志，因为他击中了我们的工作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党外群众工作这个弱点。正是在这方面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

最后，我必须说明，目前富农的活动确实正在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正在增长，他们在农村加紧活动，法西斯主义也在不少国家的农村取得了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暂时的客观条件所致，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会在农村开展实际工作，我们的领导机构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资产阶级和地

主正在大力开展争取农民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必须认真讨论我们的农民工作的状况。我们的决议确实不错，但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却很差。必须加强工作，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正面临战争的危险，而这恰是决定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因素。在未来的战争中农民将起重大作用。因此，在小结我们的工作时，除了指出赤色农民国际及其各支部今后的工作方向及如何改组为群众性组织以外，我们还要使同志们认识到必须加强在农民中、在农业工人中，特别是青年农民中的工作。我们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必将推动这方面的工作。我以为有必要再一次指出，必须召集参加代表大会的个别重要的党的领导人就此举行专门的会议，因为情况紧急，迫使我们要敲一敲警钟。我认为我们不会张皇失措，不会走上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取消主义道路，但是我们必须讨论如何清除我们工作中的障碍，讨论如何改进赤色农民国际今后的工作，因为面对战争危险，赤色农民国际将要起重大的作用。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实际措施加强赤色农民国际的工作，据此必须加强各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实际工作，因为各国共产党是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它们必定会在最近期间在农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鼓掌。）

会议休会。

第十四次会议

(1928年7月28日)

主 席：萨波托斯基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张彪（中国）：

由于不懂外语，我们参加讨论布哈林同志的报告和提纲感到困难。

我完全赞同布哈林同志在他的提纲中所提出的基本路线。我的发言主要谈中国问题，把中国当前的局势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从山东省的事态谈起。日本军队占领山东和满洲，其士兵在济南一带对居民进行血腥镇压，这些事件说明什么呢？这些事件说明，世界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反对中国革命。帝国主义的这一行动达到了采用猖狂进行公开武装干涉的方式，直接瓜分中国领土的程度。

日本在武装干涉问题上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是因为存在以下一些情况：

第一，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革命遭到暂时失败，遂使帝国主义有可能大胆地、毫无阻碍地占

领山东及满洲。

第二，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必须指出，这种关系从英美结盟变成了英美之间的冲突。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与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相比受到了某些削弱。另一方面，英国和日本之间在中国问题上出现行动一致的趋势。这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径自瓜分了中国领土：华南归英国，华北归日本。这是日本之所以如此明目张胆地动用武力占领山东和满洲的第二个原因。

最后，第三，华北的工农运动和反帝运动没有获得巨大的发展，无法阻止日本实现其对华北的掠夺政策。与此同时，英国在华南虽然还没有实行公开占领，却几乎已占据了垄断地位。英国把李济深将军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从而加强了自己在中国南方的地位。不言自明，美国感到受了凌辱，不甘心于这种状态。

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冲突正在扩大和激化。英国和日本采用公开瓜分中国的政策，而美国则推行“门户开放”政策。

美国这项政策的内在含义是什么呢？其含义就在于，美国企图通过统一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和英国一起把中国领土分成相等的几部分。但是，英国在南方和日本在北方具有实现自己剥削计划的强固基础。在这方面美国相对说来是软弱的。英国，特别是日本，向美国作出某些让步，使其有可能加强它在中国的基础的可能性十分有限。

日本也好，英国也好，都不愿意让中国成立统一的民族政府。这两个帝国主义大国都致力于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各自有一个分别为其充当工具政府。而美国的愿望则是有一个所谓统一

的政府，以便它能够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实现自己的剥削计划。

美国能不能不实行上述政策而利用日本的企业把自己的资本输入中国呢？无论怎样说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并不愿意成为美国手中的工具，而自己只做一个名义上的剥削者。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如果是这样，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试问，从国内形势的观点来看，中国是否可能成立这样一个能长期存在下去的统一的民族政府呢？固然，占据北京和天津以后国民党的力量有所加强。但是，随着力量的加强，国民党内部各种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也扩大和激化了。原先，国民党各军阀派系有张作霖这个共同的敌人，在张作霖被打败以后共同敌人的威胁大大减弱了。

在国民党各派将领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主要的问题之一是裁军。最近，蒋介石的参谋长就裁军问题向南京政府报告说，中国除满洲外现在有正规军 220 万人。按照他的报告，每年军费开支为 7.2 亿银元，而中国全国的收入只有 4 亿元。就算这 4 亿元全部用于抵偿军费开支，还差 3.2 亿元。不仅如此，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军费开支超过 7.2 亿元，而全国收入的总数要低于 4 亿元。

国民党各派军阀代表着相互斗争的各种社会阶层的利益，他们裁减军队的可能性不大。事实恰恰相反，这些军阀正在争相把俘获的张作霖军队并入自己的名下。因此，这些军阀的军队不是在缩减，而是在扩充。

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国民党军阀之间必将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增加财政收入来源而进行斗争。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从政治斗争的形式转为公开的军事斗争。由于国民党军阀将需要大量资财维持军队，他们必然要加强对广大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

的剥削。此外，他们今后仍然无法向士兵支付薪饷，而他们不给士兵发饷已经五六个月了。这种情况必将使工农兵群众和大部分城市贫民阶层更加革命化，他们必将给予国民党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几点结论。首先，建立统一的民族政府和形成便于实现由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帝国主义大规模投资计划的所谓和平秩序是不大可能的。不过美国也决不愿放弃中国及其4亿居民，因为这4亿居民是进行大量剥削的对象，而中国又是富饶的原料产地。因此，美国不可能同日本以及英国发生激烈的冲突。这是孕育未来战争的重大问题之一。此外，这也是太平洋地区帝国主义大国各种矛盾的核心问题。

其次，由于国民党的处境不可能就此稳定下来，因此还存在另一种前景，那就是发生军阀混战和劳动群众的赋税负担大大加重的前景。

我们再来看一看，所谓“第三党”能不能成为足以解放和统一中国的强大政党呢？对此我们坚定地回答说：不能。

谭平山、邓寅达、陈公博等人领导的这些小集团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具有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性质。我们必须同他们进行斗争，以免落后的阶层受到他们的影响。

这个“第三党”目前还只不过是进行宣传活动和军事密谋的零星小集团，在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

只有通过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够使中国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获得解放和解决土地问题。因此，“第三党”各集团在群众中制造幻想的客观可能性是极为有限的，这类幻想就是在落后阶层中也不可能维持较长时间。因此，“第三党”的客观前

景也是极其有限的，在判断中国革命前途时对这个“党”可以不予考虑。

只有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才是广大工农群众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斗争就能够胜利地把工农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革命仍在继续。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曾说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口气。西方的社会民主党断言中国革命已不存在。这种幸灾乐祸的情绪不会持久。新的革命高潮必不可免。在这场近期即将来临的高潮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必将更加广阔，更加激烈。

农民群众是革命运动的主力之一。土地革命仍然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我们应当扩大农民运动。但是，中国革命并不因此而成为纯粹的农民革命。这种纯粹的农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太平军起义和义和团起义就是这种农民革命的表现。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城市在革命运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现阶段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是这样一种工农革命，其目的在于进行坚决的土地改革、消灭封建残余、驱逐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统一中国、推翻现行的国民党政权、实现苏维埃形式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

当前的斗争不仅仅是同国民党即地主、豪绅及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是同世界帝国主义的直接斗争。这场斗争同前一时期相比不可避免地要更加激烈。它不仅将依靠中国内部革命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而且还将依靠兄弟的各国共产党的支持，特别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干涉阴谋方面更是如此。

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谈到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所有各点我都同

意。不过我觉得应当指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来临。还应当指出，在这场新的革命高潮中，阶级斗争将更加广泛和更加激烈。之所以必须指出这种趋向，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更明确更坚定地理解近期的任务，使兄弟的各国共产党现在就开始采取实际措施积极支持中国革命。

我还想强调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以前的各次决议也好，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也好，都谈到必须争取广大群众，以便在中国组织和实施武装起义。问题现在只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把千百万群众争取到革命方面来。有必要提醒大家，中国共产党还年轻。它在自己领导机构的成员方面、在政策方面和在日常工作方面都存在不少缺点。党曾经犯过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后来又发生了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战斗力的党。这个党经历了一个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搏斗的时期。一度有 300 万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和 1 000 万有组织的农民曾处于它的领导之下。这个党目前也还面对着严重的白色恐怖，在白色恐怖的迫害下它损失了 26 000 多人，有 6 000 多人被关在监狱中。尽管如此，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战斗的群众性政党。

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党，应当让它有一个能保证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动员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的领导机构。我们党不久前犯了所谓“左”的错误。但是这类错误刚刚得到纠正，立即又发生了右的错误。这种右的错误表现为提出要求国民党政府恢复群众运动等口号。斯特拉霍夫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指出了这一点。从我们方面提出恢复群众运动的口号是

错误的。斯特拉霍夫同志在发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内容谈得不够清楚。如果这个口号是国民党人提出的，那么这个口号的意义在于国民党人想在国民党的机构中恢复工农部门。但是，当群众提出这个口号时，它就具有了别的意义。大家知道，群众性的工会和农会是被国民党查封的，原先争得的条件是被国民党废止的。因此，群众提出恢复群众运动的要求就是要求恢复原先的自由和原来夺得的阵地。以前，党对群众工作重视不够，因此同志们曾经提议参加这场争取恢复自由的群众斗争，以便引导群众同国民党作斗争，以便充实这一场斗争的内容，使之具有反对国民党的形式。但是，现在既然是我们自己将提出这个口号，那我们就应当提出“群众自身为自由而斗争”的口号。

让我们举个例子。铁路是属于国家的，但是铁路工人已经五六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试问，我们是否应当走在群众前面，为争取国民党机关补发欠薪而斗争？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不过这个斗争应当具有群众性、革命性，而不应当像所谓第三党所想的那样属于和平的性质。这就是说，在争取群众的斗争中，我们应当坚定而勇敢地走在群众运动的前面来组织和扩大群众运动，把局部的发动变成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发动。这样，群众就不会对国民党抱任何幻想，而客观上这就是对国民党的沉重打击，因为即使工农群众微小的局部要求国民党也无法予以满足。

正如布哈林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理论水平太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战斗的党。只要它在共产国际指出的争取广大群众的正确策略路线的基础上在工业企业中奠定基础，只要它进一步提高自己党员群众的理论水平，它就一定能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共产国际的任务，中国革命的任务。

乌布利希（德国）：

近几年来，工人阶级的战斗使德国共产党的经验大大丰富起来。与此同时，在这些搏斗中，党的力量和战斗能力在工人阶级面前鲜明地显示了出来。

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体会议和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分析了德国最重要的几次阶级战斗，据此指出：在许多重要的战斗中，一部分党组织对于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意志估计不足。例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出，在五金工人发动斗争期间，党组织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按企业开展斗争，也没有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意愿针锋相对地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这场斗争。对于动员广大群众和在企业中组织斗争的任务，从而包括对于为在广阔战线开展斗争创造前提条件的任务，党组织的认识是不够的。不仅在五金工人的运动中，而且在其他大规模的运动中，部分党组织存在尾巴主义的思想，这就妨碍了它们充分地履行工人阶级积极的先锋队的革命责任。

如何使党具备充分的能力在当前的经济斗争中履行革命责任，在企业中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使他们违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意愿去开展大规模的斗争？这就是主要引起分歧的一些问题。关于这种分歧我们在这里，在全体会议上，已经听到。这种分歧也是德国党内争论的主题。重要的是，共产党不应局限于一般性的鼓动，而要把群众动员起来，以便组织革命斗争。

埃韦特同志说共产党内存在着企图恢复已被克服的旧的派别观点的趋向，这是不正确的。他的说法逐字逐句引用过来是这样的：“应该把那些可能引起已被共产党抛弃的旧的派别斗争再次重

复出现的观点从党内排除出去。”这种态度只会妨碍搞清争论的问题。

目前，革命发展的曲线正在开始上升。这时制订的战略和策略，应能帮助党最大限度地发扬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战斗精神。可是结果发现，一批支持右翼派别的同志始终试图妨碍党去完成这些任务，而调和主义派别又对结束右翼派别的这种行径加以阻挠。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德国共产党内围绕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决议展开的争论说明，右翼集团的支持者对德国资本主义的稳定估计过高，而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和无产阶级积极性的增长认识不足。无怪乎在谈及这些问题时一名右派的支持者在布雷斯劳宣称：

“目前，不可能在巨大的工业部门违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意志而举行罢工。”

在自己的发言中，埃韦特同志也特别强调稳定的各种因素。他宣称，资本主义在英国“结实而稳固”。我们并不倾向于低估英国帝国主义在工会机构帮助下为实现合理化所作的努力。我们对英国工人在最近一次大规模斗争中遭受的失败给予应有的评价。但是与此同时，英国存在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失业现象，英国出口工业的危机仍在继续发展而并未缓和，煤炭工业的危机也无结束之趋势。报纸最近的消息证明，政府又开始对煤炭工业进行资助。

在评价社会民主党时，埃韦特同志也夸大了社会民主党的力量而没有充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目前工会机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机构及国家机构采取联合政策和日益溶合，无产阶级（其中包括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同社会民主党上层干部之间的矛盾正在不可逆转地深化，而壮大和组织工人反

对派的客观条件，以及使大部分无产阶级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客观条件，正在形成之中。

除此之外，埃韦特同志还突出地说到苏联的特殊困难。我们在德国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谈得很充分。联共（布）党和苏联政府，特别鉴于沙赫亭审讯事件，公开强调这些困难，以便动员苏联的整个工人阶级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不过，我们以为，在欧洲应当比以前更加强调宣传进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方面，特别是当最近几周以来改良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不停地进行挑唆时，更应当反其道而行之。

对资本主义稳定局面估计过高而对资本主义的矛盾估计不足的情况，在埃韦特同志的发言中还表现为，他认为维也纳“发动”只具有地方意义。我们的意见是，维也纳“发动”（这是埃韦特同志的叫法）并不是一次发动，而是维也纳无产阶级的起义，而且在当前局势下应当提出成立工人代表政治苏维埃的口号。我们完全拥护执委会就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各项决议。

对当前形势的不同评价也表现为对德国选举结果的争论。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仍然是这些同志在评价德国选举时夸大社会民主党票数的增加，而对于共产党的质的成就则估计不足。毫无疑问，德国共产党首先在工业区获得了选票。这说明它对于起重大作用的无产阶级阶层的影响大大地加强了。埃韦特同志的朋友们在政治局发言说，选举结果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胜利。（有人喊道：“你们听听，你们听听！”）后来这个观点有所改变，但对于这些同志的根本见解来说这个观点还是有代表性的。

埃韦特同志试图掩盖自己（与我们不同的）对当前局势的判断，他说有相当多的同志在提纲中看到了“萧条的前景”。我们在

这里并没有听到类似的意见。在德国代表团中也没有一个同志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但是，从埃韦特同志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某些同志力图把提纲阐述的形势说成是走向萧条前景的形势。埃韦特同志的这种做法不仅同提纲的内容相矛盾，而且同布哈林同志的报告相矛盾。

由于分配给我的时间很短，我不能详细说明德国工会运动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极其重要，因为我们党组织的策略方针在工会工作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台尔曼同志已经提到，在德国工会官僚机构中存在一种要把自由工会变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建设机关，变成为新的德国帝国主义的附属机关的趋势。为此目的，工会官僚机构力图在反对派中不断制造分裂，并且力求把他们从工会中排挤出去，或者至少撤销他们的职务。

我们看到，工会官僚机构解散了肯尼斯堡的铁路工会地方组织，因为它认定这个组织对于帝国主义侵犯苏联计划的准备工作是一种障碍。由于肯尼斯堡这个铁路枢纽站对于德国资产阶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肯尼斯堡的铁路工人小组遭到镇压，被迫解散。

党在矿业工会着手按企业自下而上地动员工人参加争取每班工作七小时的斗争，于是工会官僚机构违背自己的意愿决定停止继续履行关于加班费的协议。工会官僚机构为了破坏反对派的积极活动和阻止其影响的增长，把 65 名工人开除出矿业工会。如今工会代表大会决定在工会章程中增加 1 条（第 47 条），规定中央理事会有权解散一批批地方小组。

柏林纺织工会的地方理事会也被解散。有人建议我们的同志

发表一项声明，表示他们为共产党报刊撰写的文章将事先交由区理事会审查；如果共产党报刊出现对改良主义者的攻击，同志们有义务对共产党报刊的这种做法表示抗议。换句话说，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机构企图决定共产党报刊的内容。

柏林木器工会地方理事会遭到一次清洗。13名共产党人被开除，原因竟是因为在罢工期间他们坚定地维护木器工人的利益。

那么右翼派别的代表在反对开除问题上说了些什么呢？其中一人宣称，由于我们没有力量阻止开除共产党人，我们不应当公开表示反对，不该公开在罢工期间维护我们的革命路线！（有人喊道：“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是地地道道的向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机构投降的政策。

为了回击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机构的上述政策，我们应当制订出所有工会组织中的革命工会反对派的纲领。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我们才能够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形成工人反对派。《统一》杂志中某些可爱的朋友们认为，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利用左派社会民主党领袖。其实不然，恰恰相反，只能通过从德国社会党手中争取工人的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同德国社会党作斗争，从社会民主党手中把工人争夺过来，并把他们引向共产党方面。

除了在对待工会官僚机构开除共产党人问题上存在策略分歧以外，我们之间在罢工战略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我在这里举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在目前形势下，工会官僚机构甚至竭力阻挠放弃恢复工资率协定的做法，因为每一次较大的经济冲突都要对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策有所损害。正因为如此，在爆发经济罢工的任何地方，工会官僚机构都自愿地去履行国家

机关的职能，竭力镇压运动。

柏林的建筑工人不顾工会官僚机构的反对，为实行工资率协议的新条款而宣布罢工。我们的同志们提出的口号是：工人们，以企业为单位公开表示自己对问题的态度，要求工会官僚机构在工厂的大会上表明它对工人要求的态度。这个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是革命的策略。

但是，在大规模的罢工中也常常遇到另一种做法。在萨克森五金工人开展斗争期间，部分党员不是把工作重心放在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上，而是放在求助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会领袖上。个别同志，以及在报刊上，这类观点的表述是：“第一要务是必须发动工会各级机构，因为只有先对它们施加压力才能持久地进行斗争。”此外还有这样的说法：“要强迫德国五金工会理事会放弃它的失败主义战略。”大家可以看出，部分同志实行了一种错误政策，他们把工人的注意力集中到工会官僚机构身上，而不是坚持发动广大工人群众的方针。

这种现象在柏林金属工业中也同样存在。当柏林五金工人开展运动时，工会官僚机构按照社会民主党的指使，竭尽全力镇压罢工运动。这时，我们的同志却在工会活动分子大会上提出了这样一个决议案：

“德国五金工会代表会议否决目前提出的解决冲突的办法，认为这种办法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在实际运用时它归根到底就等于降低工资和计件报酬。代表会议责成五金工会理事会采取一切措施立即实行罢工。”

在当时情况下，当工会官僚机构已经明目张胆地力图扼杀运动之时，在决议案中本应坚决明确地谴责工会官僚机构的政策，

毫无必要委托五金工会理事会，即 22 名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员来筹备罢工。我们的任务应当是明确地指出在企业中工人们应该怎样行动，以便迫使工会官僚机构表明自己对于那些正当要求的态度。如果在当前具体情况下开展斗争确实不可能，那就应当极其明确地指出不可能开展斗争的原因，以便工人们在未来的发动中运用这个经验于斗争的准备过程，并采取同工会官僚机构的政策针锋相对的行动。

鉴于上述情况，注意到埃韦特同志特别强调工人贵族的作用，是很必要的。他对黑克尔特同志发言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他说，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不能独自进行斗争。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和他不同，我们指出，收入高的工人在斗争中常以小团体观点指导其行动，对于把熟练工人的斗争同收入低的工人或非熟练工人的斗争结合起来缺乏应有的认识。他们不想把本工业部门的所有工人都吸引到斗争中去。柏林五金工人的运动也有过这种错误。在全体会议上不应像埃韦特同志那样掩饰这些弱点。

现在谈一谈德国共产党的党内方针问题。埃韦特同志声称，存在一种“在多数派队伍中产生派别思想的危险”。自知有罪的埃韦特同志忙不迭地喊叫道：“捉贼！”让我引证一些事实来答复埃韦特同志。

埃韦特同志不肯费神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论点，但是他的发言却使我们不得不声明，很大一批同志在埃森代表大会以后试图悄悄地修改党的路线。党的埃森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委员会全力以赴团结全党的力量，并且差不多让原先参加右翼集团的所有同志都担任负责职务。但是，这些同志却始终力图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他们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共产党。他们说：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在

党的实际工作过程中向党员宣传我们的观点。但是，要知道这就是派别活动。右派集团的派别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被用来巩固以格哈德同志为核心的小集团的阵地。现举以下事实为证：

1. 党的六月中央全会被利用来修改埃森全党大会关于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决议。

2. 在围绕布兰德勒行动纲领而展开的争论中，同志们反对在决议中列入这样一句话：“对于把行动纲领变成为某个集团的纲领的同志们，应当坚决地进行斗争。”对于这种危险应当发出信号。埃韦特同志的朋友们起先是反对就这种危险发出信号的。

3. 因为柏林党组织代表会议的召开，他们曾试图把某些同志排挤出柏林委员会常委会，并在常委会中加强调和主义思潮的影响。

4. 他们企图通过扩大政治书记处形成由参加格哈德—埃韦特集团的同志们组成的多数派。

5. 提出这样一项要求，参加工会部领导的不只是瓦尔歇一个人，而且这一派别的其他同志也担任党内的领导职务。

6. 在最近一次中央全会召开前夕，同志们宣称：主要的危险是左倾。而这恰恰发生在右派在工会部占了多数，千方百计拒不执行共产党的决议，而且公开反对这些决议的时候。

总之，当主要危险来自右派的时候，这些同志却认为主要危险不在右派而在左派，并且提议不对瓦尔歇派进行斗争而是对开姆尼茨的同志们进行斗争。

7. 当提出议会候选人问题时，同志们一再坚持不仅提出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而且还提出一批其他同志，以便改变干部机构成员的力量对比。

8. 以格哈德集团为核心的同志们力图首先利用柏林工会机关以调和主义思潮的精神影响柏林的党员群众。直到现在为止，最大的柏林工会党团仍然由反对红色工会国际决议的人在领导。在其他党团的常务局中，这些同志也有很多代表。很少有新干部被吸收参加工作。

9. 在围绕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争论中，同志们试图多少掩饰一下多数派和右翼集团之间的分歧。

事实便是如此。我希望埃韦特同志在提出自己的论点时也引证事实。他不可能这样做。我以上所举的事实证明，埃韦特同志硬说政治局千方百计要给某些同志乱扣帽子是不真实的。右派也好，调和主义分子也好，都是以自己的行动给自己选定了帽子。只有当他们用事实证明他们决心同政治局中的多数派肩并肩地贯彻执行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时，他们才能够甩掉这些帽子。

同志们，我再就埃韦特同志关于俄国代表团的提法所作的最后一次发言讲几句话。俄国代表团强调指出，主要的危险是右倾，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坚决反对调和主义思潮。在提出的补充意见中说道，必须吸收党的优秀分子参加党的工作，以及采取团结全党的坚定方针。台尔曼同志清楚而明确地宣称：我们同意主要的危险是右倾，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同调和主义派作斗争。他们和右派相互利用。调和派阻挠党同右派作相应的斗争。因此，在同调和派作斗争时，既要从思想上着手，也要采取组织措施。台尔曼同志明确指出，如果跟着埃韦特走的同志们转向上述立场，那么就有可能消除党内的分歧。埃韦特同志是怎样回答的呢？他回答说：党的领导机关的多数派也可能堕落成为一个小组。（台尔曼喊道：“托洛茨基也是这样说的。”）台尔曼同志讲的完全正确，托洛

茨基也是这样说的。这有点像托洛茨基分子的组织观点。

但是，同志们，不仅仅只是埃韦特同志在中央全会上这样说。在德国代表团的会议上一名右派观点的女信徒也宣称：任何人都可以被称为右派，只要他坚持的观点与官方的不同，而不管这些观点正确与否。换句话说，这些同志们承认党的决议只承认同他们自己的观点相符合的那一部分。

固然，埃韦特同志随后又把所讲的话的语气稍加缓和，声明说：消除分歧是可能的，但是为此必须所有各方面都怀有真正的意愿。台尔曼同志清楚明确地宣称，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团中，这种意愿是存在的。但是，埃韦特同志回答说：好，但是存在多数派堕落的危险。而这个多数派指的正是愿意消除分歧的多数派。这对党内的多数派是从未有过的侮辱。埃韦特同志表现了对于消除分歧的极为独特的意愿。他表示同意，但却保留某些附带条件。

总之，一旦埃韦特同志认为有必要维护另一种政策，他就会借口多数派正在堕落而自命有权破坏纪律。托洛茨基对于联共（布）党的庞大的多数派也是这样说的。埃韦特同志应当明白这样一点：或者他沿着德国代表团和德国政治局表示完全拥护的俄国政治局提出的道路前进，或者，如果他不走这条路，如果他不愿意同中央并肩携手严守纪律地贯彻执行已经通过的决议，他就可能成为所有背离党的总路线的人的代表。^①对于这种后果埃韦特同志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在德国代表团的会议上人们对埃韦特同志已经提出告诫，其要旨也就在于此。

① 参见乌布利希同志在第十五次会议结束时就此问题所发表的声明。——原编者注

我就要讲完了。一开始我就提出党的主要课题是什么。党的主要课题就在于尽最大的可能发挥党的活动能力去克服在最近几次罢工中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立场。必须在全党范围，包括在各个基层党组织，开展自我批评。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在正确运用党的经验的同时，不仅仅要紧接着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针，而且各基层组织必须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组成能保证全党有纪律地、完全一致地贯彻执行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的领导机关，获得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组织保证。我们希望，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巩固党的统一，使党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罗明纳兹（苏联）：

在这个讲台上发言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联共代表团向第六次世界大会提出的提纲。不过我觉得，并非所有在这里发言的同志都能同样正确地理解，或者说得更准确些，都能同样正确地解释这个提纲。从革命前景的角度来看世界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提纲对此作出了清楚明确的回答：资本主义稳定中矛盾的激化和发展，其中包括世界性的矛盾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的激化和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稳定局面的动摇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剧烈激化，并且最后导致当前的稳定时期进入大灾难时期，也即革命浪潮新高涨时期。提纲所指出的革命前景是与世界性矛盾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增长相联系的。当前，核心的问题是战争危险正在临近，而且不止是临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战争已经爆发。业已开始的瓜分中国的行动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同志们，正是由于战争危险十分临近并且正在成为今天的现实威胁，不应当对于因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

盾增长而不断扩大的革命可能性估计不足。这将会是一个大错误，而照我看来提纲根本没有给这种看法提供任何口实。根据对当今时期的上述分析，提纲为共产国际提出了近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由下列任务所决定的：同日益临近的战争危险作斗争，保卫苏联，保卫中国革命和殖民地运动，以及最后一项（但就其重要性而言并非最后一项），鉴于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增长，必须使无产阶级准备好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直接斗争。这就是向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方针和路线。如果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某些同志的发言，我觉得毫无疑问发表同意提纲的声明并不就等于真正同意这个提纲。首先我谈谈埃韦特同志的发言，不过我不准备详细说它，因为刚才发言的乌布利希同志已经对埃韦特同志作了极其详尽的回答。我觉得埃韦特同志虽然企图维护我们代表团向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实际上却回避了提纲中规定的路线和方针。埃韦特同志在这里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各国共产党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可能一次成功。这是一个无须作任何证明的真理，没有人准备就这一点同埃韦特同志争论。但是，埃韦特同志援引这个毫无争论的真理是为了证明维也纳起义是一般规则的一个例外，在奥地利以外的其他国家这种起义是不可能的。埃韦特同志强调说，奥地利是个只有维也纳一个大城市的国家，这种起义在其他国家再次出现是不可能的。埃韦特同志几次脱口说出这样的话：在当今时期，革命斗争不可能存在。这一段我作了笔记，如果需要，可以附在记录稿后面。我认为，把维也纳起义看作为在其他国家不可能再发生的一种例外现象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与提纲的方针完全背道而驰的。维也纳起义是一种革命爆发，如果有一个联系群众的

强大的共产党，这次起义本可以成为奥地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这种革命爆发在其他国家是否有可能发生呢？无疑是有可能的。按照提纲规定的方针来看，维也纳起义是一次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是由于资本主义矛盾激化而必然要发生的。在评价英国的大罢工时，埃韦特同志犯了更大的错误。他干脆宣称，如果说英国的罢工（起先是总罢工，而后是矿工的罢工）显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那么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了英国资产阶级稳定局面的强大和巩固。这个结论不仅同提纲的内容直接相矛盾，而且同共产国际原先对英国总罢工的种种评价相矛盾。共产国际一贯十分强调 1926 年英国罢工斗争的巨大革命意义，一再指出 1926 年事件是英国资本主义稳定局面极不巩固和动摇的反映。我认为没有必要花时间对埃韦特同志的论调进行批驳。其次，我觉得埃韦特同志对于欧洲工人向左转过程的规模和性质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埃韦特同志在这里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不能把德国选举中支持共产党的选票看得重如金石，而把支持社会民主党的选票看得轻如草芥。当然不能这样比较，因为两者的比重相差太大。但是我认为，埃韦特同志把支持共产党的选票和支持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完全等量齐观是极大的错误。埃韦特同志宣称，如果支持我们党的每一张选票都是加到我们党秤盘上的金石，那么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每一张选票也都是加到资产阶级秤盘上的金石。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也明显地表明埃韦特同志对欧洲特别是对德国工人阶级向左转过程的性质理解得多么不正确。德国共产党在选举中提出了革命的口号。它提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工农政权的口号，而工农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共产党并没有对工人提出任何因为自己参加议会工作就会给工人带来任何改善

的许诺。共产党向工人提出的许诺只是强化斗争，扩大斗争。在选举期间共产党号召德国无产阶级进一步鼓足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社会民主党则提出了积极的改良主义纲领。社会民主党极其有效地利用了在很大程度上还影响着德国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幻想。在当前情况下，把支持号召工人进行不倦斗争，进行革命改革的战斗的革命政党的选票同支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和平的有机建设纲领的妥协主义政党的选票等量齐观是完全不正确的。因此，如果说支持共产党的每张选票都重如金石，那么，不管怎么说，支持社会民主党的选票的份量就轻得多了。

我还想就埃韦特同志发言中的另外两点谈一谈。乌布利希同志已经详细地谈到了，但我认为不妨再提一次。

埃韦特同志赞同许多代表团关于把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性质作为专门的一节列入提纲的建议，但是他却提出要对这项建议加以扩展，以便更好地向共产国际通报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会场上有人当即问他：关于这些困难不是已向欧洲工人阶级进行了充分的通报吗？但是埃韦特同志却认为关于这些困难向西欧无产阶级通报得仍然不够。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乌布利希同志说过，欧洲工人阶级绝不会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轻而易举的，我看这番话是完全正确的。

从我们党和共产国际方面来说，它们正在尽一切可能，有时甚至过分地向全世界显示在我们建设道路上发生的困难。埃韦特同志建议的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我还不完全清楚。埃韦特同志最好能更清楚地解释一下他的意思。我们从来不缩小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从这方面对共产国际和联共进行指责是没有任何根

据的。

最后，说一说埃韦特同志涉及的党内问题。埃韦特同志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一点，即在对党内右翼集团、右倾派别采取组织措施方面，他同德国共产党中央的多数派存在分歧。我必须说，如果真要谈德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缺点，那么它的缺点并不在于对右派同志，对于公开背离共产国际列宁主义路线的人，对于公开破坏党的纪律的人，过多地采取了组织措施和党内处分措施，而是它采取这种组织措施太少了。（鼓掌。）

我认为，只要听了昨天洛佐夫斯基同志的发言，没有一个大会议代表对此会产生怀疑。洛佐夫斯基同志的发言举出了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和重要的党的工作人员公开出面为阿姆斯特丹国际辩护的一系列事实。德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当允许担任党组织领导工作的同志为阿姆斯特丹国际辩护，从而腐化党的组织。

我以为，把政治路线同组织措施完全分开是不正确的。应当清醒地面对真理。如果党实行某一种政治路线，而在党内却正在形成旨在迫使党离开这条政治路线的集团或派别，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始终仅仅局限于采用一般性的说服手段。在某种场合下，对于右翼集团，对于右翼派别，以及对于右翼反对派采用的组织措施，必须由党的领导机构采取党内处分这种组织措施予以对付。

至于谈到埃韦特同志一再断言德国共产党的多数派正在蜕化为一个特殊的小集团，那么埃韦特同志在进行这种指责时本应当提出一些多少有点分量的证据。摆不出一件事实就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对一个大党的领导机构提出这样的指责，这是不应该的。这样做是不行的。乌布利希同志已经提到，我们党内反对中央多

数派的反对派分子原先就曾提出过这类指责。他们在每一次会上都宣称：派别集团是中央的多数派，而我们可不是派别集团。这一次埃韦特同志对德国党的中央提出这类指责，莫非是为了掩盖另一个事实，即那些因党内生活的各种问题而联合在埃韦特同志周围的同志们的活动才带有真正的小集团性质？我以为，情况正是这样。

另外，关于埃韦特同志，我想说的最后一点就是：既然埃韦特同志接受联共党代表团关于如何评价德共党内关系的建议，那就应当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地接受这项建议。埃韦特同志在这里提出的附加条件有可能成为进一步产生分歧，进一步反对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基础，因此，代表大会应当使我党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德国党内状况的建议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被接受。

下面我接着谈谈另一个也接触到不少政治问题的发言人，佩珀同志。

照我看来，在抹煞欧洲工人阶级向左转过程的意义方面，佩珀同志较之埃韦特同志有过之而无不及。提纲是怎样说的呢？提纲说：“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向左转的总过程在继续发展。”这里讲的是“总过程”，而佩珀同志在发言中是怎样说的呢？他宣称，我们不能说连德国、法国、英国这样的国家都出现了工人阶级总的说来向左转的现象。这句话是从他的发言的速记记录稿中摘引下来的。佩珀同志当时就提出了大大小小一系列附加条件。在提出附加条件方面佩珀同志是一个能手。你找不到他的哪一个论点，哪一个明确的思想，不随着带有成十个附加条件，而这些附加条件使你无法弄清楚佩珀同志究竟想要干什么。不过这一次他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相当清楚，尽管他的附加条件还是不少。对于上面援引

的那句话，佩珀同志随即补充说，基本部分，即欧洲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还没有显示左的倾向。第一，工人阶级的基本部分并非始终就是工人阶级算术上的多数；第二，从来也没有人说过，欧洲无产阶级基本部分向左转的过程已经结束。提纲以及整个说来共产国际的所有发言，都是说欧洲正在发生总的说来向左转的过程。最后，同情苏联的情绪的增长，维也纳起义，因萨柯和樊塞蒂而引起的示威游行浪潮，所有这一切都最为明显地表明，欧洲无产阶级基本部分向左转的总的过程已经开始，并正在继续。

佩珀同志在这里所维护的关于美国工人阶级向左转和激进化的前景问题的观点，在我看来就更加错误了。有人在这里已经指出，不久前佩珀同志在《真理报》上提出了一个令人十分可笑的论断，说美国资产阶级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足以收买美国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这当然是极大的夸张。不过佩珀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说，随着美国世界霸权的扩大，改良主义和美国劳联的基础不可避免地要增强，社会稳定也必将得到巩固。社会稳定能否巩固，这个前景还有待于证实。至于美国世界霸权的扩大是否必然要引起社会稳定的巩固，这更是大有争议的问题。我以为佩珀同志这样描绘美国阶级矛盾发展的前景是不正确的。当然，拥有世界霸权可以使美国资产阶级更便于收买很大一批无产阶级阶层，但是如果说随着美国霸权的扩大社会稳定就会同时得到巩固，那就很值得怀疑了。在我看来，这样说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恰恰是相反的观点。佩珀同志在发言中指出，美国工人阶级向左转的过程受到以下各种界限的限制。为了保持他这一部分发言的“原貌”，我想全部援引佩珀同志的论据。他说，美国无产阶级进一步向左转受到的限制有：第一，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不存在政治分歧；第二，

今天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政治分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第三，不存在几年以前那种支持第三党的政治运动；第四，不存在全国范围的支持工人政党的运动。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工人阶级向左转所遇到的障碍。把所有这一套看作是障碍，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成立的，更不必说这4条中一再重复的只不过是说美国资产阶级队伍中不存在严重的分歧。佩珀同志在这4条论据中所说的全部内容，无非是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即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正在以最集中、最露骨的形式同美国无产阶级相抗衡，也就是说，美国的阶级对抗表现得最为明显。而这种情况恰恰应当成为美国工人阶级队伍向左转过程的保证和促进因素，而不是像佩珀同志所想的那样会引起这个过程的减弱。佩珀同志把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前景看颠倒了。我没有时间详细谈论佩珀同志在判断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时所做的所谓经济分析。我只说明以下一点：如果把佩珀同志吹嘘美国帝国主义实力的那一部分发言刊登在美国报刊上，人们一定会把它当作为民主党或共和党（这无关紧要）某一名候选人在竞选大会上的演说。（鼓掌。）我用一点时间向大家披露佩珀同志在美国《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在这篇文章中，佩珀同志对美国工人运动发展所描绘的暗淡前景表述得更加清楚。为了同洛佐夫斯基同志辩论，佩珀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宣称，在美国要完成把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和建立新工会的任务，受到以下情况的阻碍（不妨听一下）：

“1. 妨碍我们的情况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仍然十分强大，并且在继续向上发展。

2. 妨碍我们的情况是，美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处于优惠地位。

3. 妨碍我们的事实是,美国存在一个人数最多、力量最强大的工人贵族阶层。

4. 妨碍我们的事实是,基本工业部门和大型企业的无产阶级由出生在国外、讲不同语言的工人组成。

5. 妨碍我们的事实是,我们这里建立了一个力量最为强大的金融资本的政府,这个政府运用军队、警察、法院压迫工人阶级并竭力摧毁一切工人组织。

6. 妨碍我们的事实是,有组织的企业主正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个成立开放性作坊和御用工会的运动。

7. 妨碍我们的事实是,钢铁、煤炭、纺织等工业部门的很大一部分工人不得不生活在企业主经营的城镇里。那里的一切,无论是土地、房屋、道路,还是学校、商店都全部为企业主所有,那里的国家政权直接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他们建立起自己的一整套私人警察和工厂特务系统。

8. 妨碍我们的还有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情况,即美国的工业已经从上到下实现了托拉斯化。我们不应忘记,欧洲非熟练工人的工会是在实现托拉斯化之前组织起来的,那时把这类工人组织起来要容易一些。今天的美国正处于托拉斯大发展时期,资本家及其政府的反抗和压力比在此以前的别的国家表现得更为剧烈,更为有效。

9. 妨碍我们的情况是,美国共产党的力量仍然很微弱,数量也不多,因此我们不得不运用极为有限、极为软弱的力量去执行伟大的历史任务,而这项任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又是我们所不能避免的。”

总而言之,什么都是障碍,障碍就是资本家在剥削工人,障碍

就是资本主义存在本身,任何前途也没有。(鼓掌。)

可是事实上,佩珀同志列举的大量情况恰恰是在最大范围内,最有力地组织最广大的美国无产阶级群众的有利因素。佩珀同志连资本家反对工人等一类事实都看成是共产党在未参加工会的工人中进行工作的障碍。根据这样的“前景”,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能发展成强有力的运动。

我认为,美国具备一切条件,足以使我们共产党(毋庸讳言,它现在还只是一个小派系)在目前美国表现得特别尖锐的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尽管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仍在上升,尽管美国资产阶级有可能收买无产阶级上层的很大一批人,但对于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来说,美国现在的条件要比许多别的国家更为有利。美国要发展壮大革命的共产党仍然具有极为丰富的源泉。这就是巨大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日益广泛的基础上不断重新出现,而佩珀同志却忘掉了这些社会矛盾。据此,我想再指出一个情况,那就是在我看来,在美国应当采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向英国和法国提出的策略。

佩珀同志不久前就这个问题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不准备摘引这篇文章。佩珀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在美国妨碍实行这项左的政策五个原因,同时又指出了有利于实现这项政策的五个原因。(笑声。)不过总的结论仍然是:不能在美国实行国际执委会向法国和英国提出的策略。

迫使共产国际要求英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把方针向左转移的基本情况是什么呢?这种基本的情况在美国也存在,而且十分明显。这个基本情况就在于:改良主义竭力向右转,社会民主党正在

同国家机关溶为一体；这个基本情况就在于改良主义正在疯狂地反对共产主义运动。所有这一切在美国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而且非常明显。因此，坎农同志所谈的关于纽约共产党员投票选举得到共和党和美国劳联支持的社会党候选人的事实，从美国的条件来看，同从法国的角度看一样，也是不可容忍的。这类事情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应当再发生。佩珀同志企图以美国情况特殊为借口，而为这类事实辩解是毫无道理的，这种做法极其恶劣。在美国要实现乃至尽快实现共产国际在英国和法国所实行的转变，条件是完全具备的。对于佩珀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必须予以驳斥。而且我还认为，虽然我对美国党内的派别斗争并不特别熟悉，如果美共中央的多数派完全赞同佩珀同志的观点，那么美国党中央的反对派一定在很多方面是正确的。（鼓掌。）

（沃罗夫斯基在座位上喊道：不能这样批评佩珀同志，他是美国共产党的英雄好汉。）

我想就中国问题谈几点意见。关于广州起义在提纲中写道：“代表大会认为试图把广州起义看作为一次盲动行为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曾经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前一时期英勇的后卫战斗的广州起义，尽管领导机构犯有严重错误，仍然是新的革命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的旗帜。”

提纲的这一段文字，由于它将成为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具有极其重大的原则意义。它不仅给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诽谤以应有的回答（他们和社会民主党配合默契，宣称广州起义是共产国际组织的一次盲动行为，一次冒险行动），而且也结束了我们队伍中，即共产国际队伍中在评价广州起义问题上的左右摇摆。这种左右摇摆达到何种程度，从有一位雷贝尔格同志在《共产国际》杂志最近

某一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的恢恢宏论就在于一个含义深刻的结论：结果顺利的起义就是好的起义，结果不利的起义就是不好的起义。例如，就广州起义雷贝尔格同志写道：

“广州起义遭到了失败，而且也不可能不遭到失败，这是因为起义的社会基础不够广泛，广州和广东省胜利举行起义的条件不够成熟，革命和反革命双方实际军事力量的对比对起义不够有利，起义的时机（12月11日）选择不当。”

同志们，向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关于广州起义是怎么说的呢？提纲说，党的领导机构在起义准备和实施过程中都犯有重大错误，但是广州起义本身是完全符合规律的，是必需的和正确的。否则它就会是一场盲动。可是雷贝尔格同志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广州共产党人最大的错误就是组织起义本身。雷贝尔格宣称：

“起义领导人在军事上和组织技术上的错误（对计划考虑不周、不占领兵工厂和军火库、不善于构筑街垒、对于解除了武装的步兵团和炮兵团的士兵未加利用）毫无疑问对广州斗争的结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它们在上述客观原因中只起附带的作用，而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这就是说，主要的错误在于根本不应该组织起义。这个观点同我在这里从递交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援引的内容毫无共同之处。

雷贝尔格同志在这里什么都谈到了，就差没有讲“盲动”两个字。如果组织起义时确实没有足够广泛的社会基础，起义的条件不成熟，实际的力量对比又不利于起义，如果组织起义为时过早，那这种起义就是盲动。我要声明，从这种观点即雷贝尔格的观点出

发,任何一次不成功的起义,都可以毫无困难地说成是盲动,例如,1905年的十二月起义、1923年的汉堡起义、1924年的爱沙尼亚起义与广州起义相比更应当称作是盲动。

当我阅读雷贝尔格同志的文章时,我曾断定雷贝尔格是佩珀同志的笔名。(笑声。)雷贝尔格同志的所有论据同佩珀同志当时反对广州起义时提出的理由竟相似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我在这里又一次提到佩珀呢?因为不久以前佩珀同志竟然鼓起勇气(让我们说得缓和一些)在美国《共产党人》杂志上宣称,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从头到尾全部接受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

同志们,其实大家都知道,佩珀同志对广州起义问题的意见是:在广州起义开始前他是反对的,在起义开始后他是反对的,在起义结束后他还是反对的。(鼓掌。)他反对起义所持的所有论据,无论就其实质或就其形式而言,如今又在雷贝尔格同志的文章中全部重新出现。不过后来还是发现,雷贝尔格并不是佩珀,而是另一个同志。但是这并不能使事情有所变化。佩珀同志认为,他的功绩就在于他还在广州工人发动起义以前就向中共领导人提出过警告,指出广州起义必然要遭到失败。同志们,我并不想把佩珀同志和孟什维克完全等同起来,并把他说成是孟什维克,不过我必须提醒一句,在1905—1906年期间孟什维克反对十二月起义的根据也是认为起义当时过早,并且认为反对为时过早的起义是他们的功劳。

就这个问题让我借用一小段引文。

列宁写道:

“普列汉诺夫说了一个笑话,把自己比作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以

惩其过早进行战斗的罗马统帅。笑话是俏皮的。可是，假如我是‘儿子’，那么在‘革命力量已经超过政府力量’的决战关头，我会毫不犹豫地一枪打死（或者像罗马人那样一剑刺死）提出同反动派勾结的口号的‘爸爸’并且心安理得地让后世的蒙森们来评断我的行为是杀死叛徒、处决叛徒呢，还是大逆不道。”^①

雷贝尔格同志和佩珀同志对于广州起义的评价与提纲所作的评价毫无共同之处。

为了避免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想掩盖自己本身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因而专事攻击别人的错误，我应该直截了当地声明，在第九次全体会议之前我也犯过一个严重错误，在这里我要提出来。我的错误在于，我曾认为广州起义并不是一次后卫战斗，并不是对整个一段革命时期进行总结的最后一次斗争行动，而是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开始。事态的发展驳斥了这一种观点，事态的发展表明：广州起义是一系列革命搏斗的整个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些革命搏斗在1927年年中开展得特别广泛，然后逐渐低落，而以最后的有力一击——广州起义而告结束。

紧接着广州起义之后就开始了衰退局面。我的错误就在于，我对广州起义后的局势作了不正确的判断，并由此出发继续认为今后仍应当采取广州起义前的那一种举行直接武装起义的方针。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在广州起义以后，这样的路线是没有根据的。第九次全会以及随后向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都完全正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武装斗争的口号现在只能是宣传口号，只有在出现自发农民运动的地区共产党人才应当领导农民起义的行动，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5卷第47页。

在农民起义中使自己得到巩固和加强。但总的说来，农民起义的口号现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只能是宣传口号。但是，如果有谁说，由于早在1927年底广州起义之前衰退时期即已开始，所以广州起义本不该举行，那么这就是对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的不可容忍的歪曲。我想引用一小段列宁恰恰是谈到这类问题的话。列宁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个预见到革命时代的到来，开始唤起人民，并且在庸夫俗子还作为忠诚顺民陷媚驯顺地酣睡时就已敲起警钟。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个走上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走向面对面的搏斗，同时揭露各种社会和政治庸人的调和主义幻想。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最后一个放弃直接革命斗争道路，而且是直到一切可能都已不再存在时，直到毫无希望找到更加近便的途径时，直到号召准备群众性的罢工、号召准备起义等已明显失去了根据时才放弃。所以，马克思主义者用鄙视回答那些数量众多的革命叛徒。这些叛徒对他高喊：我们比你们‘更加进步’，我们比你们更早放弃革命。我们更早地‘服从’宪法。”（鼓掌。）

我以为中国同志完全有权用列宁的这一段话回答所有指责他们不慎重地和过早地举行广州起义的人。只要还存在革命高潮将继续发展的一点点希望，就应当像中国同志去年12月份所做的那样行动。现在，情况已经更加清楚，完全可以认定中国不可能沿笔直的革命道路发展，而是曲折前进的（列宁在提到历史转变时常喜欢采用这样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主席摇铃。）

同志们，我还有关于瓦尔加同志的很大一段话要说。这纯粹是理论问题，不过我的时间已经过了。如果大家不给我延长时间，那

我就到此结束。(鼓掌。喊声：欢迎，欢迎。)

我认为有必要非常简要地(虽然这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题目)谈一谈瓦尔加同志在这里所讲的内容。瓦尔加同志在这个讲台上宣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了极其巨大的结构变化,这表现为失业现象的性质完全变了。瓦尔加同志认为,现在的失业现象与前一时期相对扩大的工业预备大军不同,是一种“结构性”失业现象。瓦尔加同志在代表大会前出版的一本书中(这本书大部分与会代表想必都已看过),对这个思想作了更详尽的发挥。在书中瓦尔加同志宣布:“以前,工人阶级作为整体(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即可变资本,在工业大国中只是相对下降。而最近发展的结果,如今已出现绝对减少。”(《衰退时期的经济》,第53页)这就是说,按照瓦尔加同志的意见,在所有工业大国中开始生效的是这样一种发展规律,即可变资本,从而也包括工人阶级的数量,在固定资本增长的同时,绝对地下降了。

布哈林同志在其报告中已部分地涉及这个题目,佩珀同志也谈到一点,但发挥得最为详尽的是瓦尔加同志。我不准备和布哈林同志辩论。布哈林同志认定的只是一个事实,即目前我们在美国看到,在C(固定资本)增长时可变资本正在绝对地下降,而原先当固定资本增长时V(可变资本)只是相对地下降。布哈林同志并没有从这个事实得出任何总的结论。我不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有一点,那就是在世界历史上这种现象根本不是第一次出现。我可以在这里摘引一些马克思的专门的段落来证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举出大量事实说明,当固定资本增长时,在一段时间内个别工业部门会出现可变资本绝对下降的现象,就业工人数目绝对下降的现象。因此,布哈林同志谈到的那种现象绝不是这类现象中唯一

的现象。

佩珀同志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在理论方面佩珀同志的分量是可以不予考虑的,所以我就直接谈谈瓦尔加同志的论据。(笑声。)

瓦尔加同志并不限于确认个别事实。他从个别事实得出了总的结论。这个总的结论是与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完全背道而驰的。

瓦尔加同志本人也并不隐瞒,他的论点同马克思发现的法则相比是一种新的东西。我读一段《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说法与瓦尔加同志的提法相反的地方:“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样,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在这一段话结尾处马克思说:“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①

而瓦尔加的论断则相反,认为现在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阶级不是扩大而是绝对地减少。

我必须指出,这种理论不是特别新的理论。这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一度曾经提出过的理论。布哈林同志在自己那本批驳罗莎·卢森堡的书中给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一个极好的回答。

不过,同志们,早在马克思那时就已存在过这种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嘲笑过某一个加尼耳,这个人提出的就是瓦尔加同志在这里维护的思想。马克思说,加尼耳“的观点的愚昧,只有用他自己的话才能表达出来”,接着他引用了加尼耳的话:“注定要从事生产和消费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减少,而管理劳动,安抚、宽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4页。——译者注

和开导全体居民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增加……他们占有因劳动费用减少、商品丰富和消费品价格低廉而产生的全部利益。人类沿着这个方向正在升入天才创造的至高领域，进入宗教的最深奥的境界，”等等。^①再往下就都是神秘主义的胡说了，不过我们感兴趣的是，加尼耳断定从事生产的各阶级人数在减少，而管理劳动的阶级人数在增加。我敢说，如果现在提出一种总的理论，认为在大量积累的条件下，在固定资本增长的条件下，可变资本(V)绝对地减少，那么这就一定意味着加尼耳的观点在复活。这恰恰和马克思所说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全部内容完全南辕北辙。

瓦尔加的总的结论的根据何在呢？瓦尔加同志得出自己结论的根据无非是两张表。我为此曾详细地对这两张表进行了批判。现在我只能顺便说一说主要方面。其中一张表是从一份美国杂志《商业年鉴》中抄来的。这份杂志说，1919—1925年期间工人的数目减少了7%，而工业、农业和铁路运输总产量增加了20%。

同志们，首先，这张表中没有经过准确核实的数字。其次，表中只列入农业、采矿业、钢铁工业和铁路运输的数据。公路运输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采用铁路运输的数据是为了研究与C相比V减少的情况，那么应当把公路运输也计算在内，而在公路运输部门中工人的数目有很大的增加。就业工人数目增加极多的建筑业又到哪里去了呢？不应当根据一张令人可疑的表格得出结论来修改马克思的整个学说。顺便我还要说明一点，那就是瓦尔加同志在分析这张表中的数据时把资本的技术构成和资本的价值构成两者混淆了。而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瓦尔加引用的关于英国的数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0页。——译者注

说明,自 1923 年至 1928 年期间工人的数目在绝对地减少。但是,有人驳斥这些数据,如斯佩克塔特同志就在这样做。

此外,在英国出现了生产资料生产的停滞,而不是固定资本的增长,在那里失业现象因经济萧条而不断增加。瓦尔加同志的数据涉及的是 1925 年,那时美国的失业现象比现在要少得多。就是现在也不是因为技术变革引起了失业现象的增长,而是经济萧条引起的;不是 C 的巨大增长,而是美国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引起的。当然,在代表大会上很难就理论问题进行争论,这里的讲台不是干这种事的适宜场合。不过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强调说明,要推翻马克思的旧法则并提出新法则,至少也要认真研究一些有份量的材料。马克思为了证明很简单的法则常常援引大量的具体材料,而瓦尔加同志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却满足于两张令人可疑的表格。事实上失业现象的状况是怎样的呢?事实上,无论过去和现在,技术变革一向只能引起个别企业、个别工业部门工人数目的缩减,但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如此。工业不停地吸收和排斥工人将导致预备大军迅速增长,但是整个积累过程将伴随着工人阶级的绝对增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劳动预备大军的加速增长,但这并不能废除关于资本主义在自己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不断地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工人这一规律。现在围绕失业现象发生的一切情况一点也没有超出马克思提出的发展法则的范围。资本主义正按照马克思发现的法则发展和死亡,因此没有必要臆造出新的法则。由于时间不够,这一部分发言我只能草草结束。

最后我认为还有必要谈一个问题。我认为,共产国际现在采取的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不言而喻绝不意味着要削弱我们对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不可调和的态度。不过,现

在同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尖锐阶段正在成为过去,而右倾危险则正在各个共产党的许多方面显露出来。我们在美国党内、德国党内、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党内、在法国党内等等,都看到这种情况。代表大会及时注意到这种危险并给予应有的回击,这正是共产国际队伍中稳妥地同时克服这种倾向的保证。

洛夫斯顿(美国):

我以为美国党应当就我们代表团某些同志不可容忍的发言向代表大会做出解释。我愿向你们保证,我不准备像他们那样在这里仔细地分析我们内部的问题。在当前没有必要分清每一个人对所犯的错误应负有何种责任。我只想对美国当前的经济局势作一些分析,而在分析时不仅仅以美国为出发点,而且主要考虑到美国的经济局势对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的现状发生了何种影响。然后,研究几个涉及美国共产党人的作用和任务的问题。

库西宁同志曾经批评过我们的一些同志,说他们以“暂时的和表面的现象”作为自己制定政策的基础。我认为,从这个判断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这正是我们党的某些同志在政策上犯错误的根源。工人党(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同志们现在把当前的经济形势同美国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混为一谈。我们否认一切刻板划一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是从根本上反列宁主义的。

美国党的反对派宣称他们原则上接受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但他们又提出了7项附带条件:第一,他们希望对若干章节再进行研究修改;第二,他们要求对其他一些章节更加突出地予以强调;第三,他们断言生产增长速度减慢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还断言输出也存在这种现象;第四,我们的反对派要求“再次突出”美国;第五,按照我们的反对派的意见,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没有明确

地说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同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相互依赖关系；第六，像福斯特同志在这里说的那样，“必须由代表大会为美国描绘出更加具体的前景”；第七，我们的反对派一面接受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一面又想听到关于美国的“新的言论”。在其他方面，我们党的这个自封的左翼，即因右的错误多次遭到共产国际谴责的“左翼”，接受了布哈林同志的提纲。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评价美国帝国主义呢？布哈林同志说，美国帝国主义正在向上发展，正是这种发展引起并推动欧洲合理化进程向前发展。中央委员会也确认美国帝国主义处于上升时期。我们的反对派的同志们用蛊惑宣传代替马克思主义分析，指责我们为美国帝国主义吹嘘，因为我们承认美国帝国主义目前强大这样一个客观的、虽然对我们来说并不愉快的事实。莫非是，举例说，在7月4日我们举行游行示威期间（当时我们的同志因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而遭逮捕），我们在为华尔街吹嘘？同志们，如果从这种观点看问题，那么斯大林同志就应该被谴责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歌颂者，因为就在不久之前他说到美国帝国主义是一颗上升的明星。用我们的反对派的话来说，那么这里还有一段吹捧美国帝国主义的话，这段话在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

“这一事实的总的社会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危机发展缓慢，因为其某些组成部分在发展，另一些组成部分比较缓慢地衰退。属于这一类的有以下事实：美国作为世界剥削者、债权人和高利贷者的地位日益巩固（美国的繁荣‘Prosperity’）……”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在评价美国帝国主义时从来不曾提出过像布哈林同志代表俄国代表团提出的提纲里所作的那样尖锐正确的表述。

让我们看一看反对派又是怎样说的。我从他们的文件中摘引
以下几段：

“对这些矛盾的成熟程度进行的分析表明，美国资本主义正面临达到自己发展的顶点。”

这一段引自毕特曼——福斯特的提纲。其次：

“目前的经济萧条必不可免地要成为深刻危机的预兆。”

再次，邓恩同志在共产国际主席团宣称：

“还有，——在这方面我们都有过错，不过中央的多数派自然要负主要责任，我们党一方面对于美国阶级斗争发展之快估计不足，对于美国国民经济衰退的速度估计不足，另一方面又对群众斗争意志的加强估计不足。”

对于“国民经济”这个术语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你们自会有正确的认识。不过结论十分清楚：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这种“分析”的人没有写过一篇有关的文章，没有在我们的报刊上，也根本没有以任何形式在全党面前发表过一行对于美国经济局势的分析，而且自我们党存在以来都没有过，这是极其值得庆幸的事！列宁主义者不能成为幻想（即使是自己的幻想）的牺牲品。不过，首先还是应当成为一个列宁主义者。

现在谈一谈美国当前的经济局势。那里存在萧条现象。的确，目前美国出现了严重的萧条现象。其主要征候是：大规模失业现象，这首先是此种萧条现象本身造成的后果，此外也是疯狂的合理化过程所引起的，这种合理化过程实际上不断制造不从事生产的工人大军。其次，原先曾是美国帝国主义骄傲的巨额产品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第三，在信贷领域（不应忽视美国是主要的世界债权人）由于资本的骇人过剩而发生了危机。在各种

工业部门也同样存在危机。但是，这类危机并不是衰退的现象：它们是这些工业部门中合理化发展的征兆。可以举出煤炭工业、石油工业、纺织工业为例。

美国帝国主义内部是否存在矛盾呢？提交给我们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对派也表示接受的提纲极其明确地指出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一系列矛盾。请允许我宣读下面一段引文：

“为了正确认识美国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可能的前景，我们还应当考虑到美国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威胁其生存的根本矛盾。简略列举如下：(1)存在过度的，剩余的生产能力，表现为某些工业部门的‘过度发展’；(2)农业状况从根本上恶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出现危急局面；(3)信贷出现剩余；(4)大力进行分期贸易，其规模极为巨大。美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种分期贸易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提前消耗工农未来的购买力的做法可能暂时推迟经济萧条现象，但一旦经济危机来到必将成为加强危机的因素。(5)某些主要工业部门出现解体现象。原因之一是当前合理化没有充分推广和这些工业部门处于从属于位，例如煤炭工业就从属于钢铁工业和铁轨轧制业，另一原因是像煤炭工业和石油工业这类工业部门与其他工业部门相比更依赖于世界市场的分配条件。(6)欧洲大型卡特尔的迅速发展证明，其他帝国主义强国的能力在不断增长，不仅能同美国帝国主义相竞争，而且足以打破其独霸的局面。(7)美国资本主义在主要原料如橡胶、氮肥、石油、锡、镍等方面都依赖其他帝国主义强国。(8)资本输出的日益增长使美国帝国主义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的外国债务人完全用商品来抵偿。而这反过来又导致美国的税率降低，因为这是保证债务人有可能偿清借款的必要条件。而这样做又意味着债务人同债权人即美国资

本主义的竞争日益加强,不仅包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而且包括它本身迄今为止几乎是毫无限制的广大国内市场上的竞争。”

同志们,让有的人去说我们只突出强调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吧。我们明确认定,强调说明,并且完全清楚地指出了美国帝国主义内部发展着的矛盾,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我们党开展工作的日益增长的可能性。能否认为现在已经存在明显的衰退因素呢?能。我们已经强调指出,并且是十分明确地强调指出过美国帝国主义的这些衰退因素,如食利者阶级的发展,以及迄今为止一直是美国繁荣现象基础的国内市场的缩小。

然而,我们也不应当对于美国资本主义还存在相当力量和拥有潜力估计不足。我只列举其中若干主要的潜力:

1. 对美国的后方(拉丁美洲及太平洋岛屿)加强剥削和资本输出。不应忽视,美国帝国主义目前正试图在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岛屿建立自己垄断性剥削的经济“后方”。当然,这样做可能引起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的冲突。此外,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动还将激起殖民地和半殖民群众的反抗。

2. 继续实行生产特别是分配过程的合理化,对分配进行改组的倾向就是这方面的表现。

3. 发展电气化和使用电能。当前电能在美国工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1870—1880年期间铁路所起的作用。

4. 开发美国的鲁尔区——实现南部的工业化。

不过我们看到这些潜力时不应陷于消极悲观。我们重复一遍我们在二月全会上所讲过的话,即我们认为正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性才是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化的根源,这也使我们更加相信美国必会卷入即将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在分析美国帝国主

义所起的作用时，我们不应当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实力估计过高。尽管美国资本主义外表繁荣，却存在着从根本上破坏其生命力的势力。主要的是我们不应忘记，国际资本主义目前正处于自己最后一个阶段——帝国主义走向衰亡的阶段。

我们的反对派或者只看到美国资本主义的矛盾，或者只看到它的强大。他们无法看到，正是美国帝国主义强大本身产生种种矛盾，从而也为我们党开展活动提供了日益增长的可能性。

现在，我想分析一下我们的反对派对布哈林同志提纲所提出的某些批评意见。首先谈谈所谓生产率增长速度减缓的问题。同志们，谁不知道，随着基础的扩大增长速度要逐渐减弱。

其次，反对派领袖毕特尔曼同志在进行判断时只是随意选了一个时期，而且是一个为时较短的时期，这就预先使他的结论失去了价值。

第三，我们想提醒他一句，事态的发展并不始终是按直线方式进行的。

第四，他选来作为比较基础的时期是一个所谓非正常的战争时期。

最后，美国帝国主义的生命力如何，是不能仅仅用某几年内产品产值的数字来衡量的。需要对合理化的整个体系，特别是对生产单位的生产率水平即每个人时的生产率作出判断。

在这方面，毕特尔曼同志的结论离真理太远。可以确认的恰恰是一种相反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又恰恰证实布哈林同志提纲的正确和毕特尔曼同志结论的不正确。工业中 1914 年需要 100 名工人的劳动来生产的产品，在其他各年需要的工人数相当于：

年 份	工人数
1919	102.2
1921	99.6
1923	80.5
1925	71.0
1927	64.0 (近似数)

这表明 1914 年时需要 100 名工人完成的劳动,后来所需要的工人数逐年下降。直到 1919 年以前,工业中就业的工人数量和劳动生产率同时上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生产率不断增长的趋向,但与此同时,特别是最近 3 年以来,工业中就业工人的数量明显下降。大工业中每一个工人的平均生产率,1927 年与 1914 年相比提高了 45%。

第二点,毕特尔曼同志确认出口额增长速度减慢。像毕特曼同志那样把这几年同战争年代相比较是可笑的。首先,战争年代和战后最初几年是一个非正常时期。其次,我们应当按战前的美元来计算产品产值,而不能按票面价格计算。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就不能同 1919—1921 年时期相比较,因为这个时期不能用作正确的标准。而主要的是,我们不应从统计数字上机械地评判事实,而应当运用辩证的方法。美国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我们应当把美国放在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相互关系之中来对它进行考察。问题是:美国是否继续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挫败其他帝国主义大国?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才是美国帝国主义现有的实力和生命力的标志。在这个基础上,美国的输出,与毕特尔曼的数字相反,仍在继续增长。

但是,毕特尔曼同志为什么对于当前形势最典型的特征报以缄默呢?为什么他对于恰恰是理解当前国际形势关键因素(在布哈林的提纲中就是这样正确指出的)的资本输出方向的趋向报以缄

默呢？这种值得令人注意的缄默原因何在呢？而这方面的事实却证明，美国帝国主义仍然在不断向上发展。原因恰恰即在于此。请允许我就此引用下面的表格：

美国的资本输出

年 份	数 额(万美元)
1923	4 400
1924	87 800
1925	103 100
1926	113 500
1927	137 700

这些数字不包括长期债务在内，而是上述年份增加输出的新的资本的净数。

1928 年头 6 个月，美国输出资本达 105 316.4 万美元，而 1927 年上半年则仅为 79 427.7 万美元。这就是说，美国资本主义在每一秒钟营业时间内投资于国外和本国证券的钱，包括对外输出和用于国内金融市场，为 1 000 美元。

让我们看一看，毕特曼同志的主要论据是什么？他用以证明他关于美国帝国主义正在衰退的错误理论的主要论据是，工人的平均国民收入降低了。毕特曼同志引用这一事实来证明美国无产阶级的贫困不断加深。这是荒谬的。他忘记了一点，即虽然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遭受剥削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但这一事实本身却根本不能就说明工人的生活状况恶化。较高国民收入中较小的比重大于较低国民收入中较大的比重。为了证实我们的论断，我们在这里举出一些材料，它们能说明美国的国民收入在不断增长：

年 份	国民收入 (万美元)
1921	6 273 600

1922	6 556 700
1923	7 676 900
1924	7 936 500
1925	8 646 100
1926	8 968 200

这就是说，7年内增长了280亿美元。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下降？这是毕特曼同志下降的顶点。

瓦尔加同志断言美国的生活水平没有下降是正确的。实际收入确实每年增长7%。问题在于反对派把实际工资和剥削的程度混为一谈了。

从自己这种对于收入的错误分析出发，毕特曼同志就得出了一个反对布哈林同志提纲的最为“气势汹汹”的结论。毕特曼同志指责提纲没有充分阐明帝国主义外部冲突和国内冲突之间的依赖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原来毕特曼同志想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在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冲突被描绘成是没有阶级基础的，是和每个个别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没有任何联系的。这种指责显然是十分可笑的。如果这种指责确有根据，那么布哈林同志代表俄国代表团提出的提纲就根本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了。

毕特曼同志只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提纲的基本路线”，那就是他在发言时提出的：“共产国际应当就美国发表一点新的言论”，应当对美国重新加以强调。换句话说，布哈林提纲的“旧的言论”是不够的和不正确的。这使我想起一首古老的美国歌曲：“你想什么就讲什么，你讲什么就想什么。”毕特曼同志说，我们党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但是听了他的发言，我开始相信，尽管党已

经成年，而我们的某些理论家却仍然还很年轻。

下面谈一谈美国帝国主义的作用。中央委员会认为，美国帝国主义日益增长的侵略性在当代是以其日益加强的实力为基础的。这正是当前世界形势独有的特点。我们的反对派断言，这种日益增长的侵略性的基础在于……——我还是逐字引证吧：在于“美国帝国主义日益减弱的潜力”。这是对提纲的根本错误的“补充”。但愿我们党和共产国际摆脱这类关于美国的“新言论”！这种“新的强调”是根本错误的。反对派的错误根源何在呢？他们无法理解，美国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它的侵略性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按照他们的看法，侵略性只能是衰退的结果。因此，反对派宣布一种臭名昭著的理论，说中央委员会如果不同时承认美国帝国主义处于衰退阶段，就不能说美国帝国主义富于侵略性。请看他们用来批评党的材料是些什么。他们如此坚信自己的幻想和自己关于美国帝国主义衰退的错误结论，以致于指责中央委员会说，中央对于英美冲突和日美冲突的政策是立足于这样一种观念，似乎美国在中国是尾随在英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行动的。

还是让我们看一些事实吧。我援引我们的反对派中一位“理论家”对英美关系的评价。在考察英美关系时，邓恩同志宣称：

“如果美国帝国主义确实希望使自己和帝国主义世界（我们在本文中只考察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冲突，而不涉及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共同斗争）获得和平，那么它的行动方式看来就会十分简单。为了达到这两个直接目的，只要两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即美国 and 英国，签署一项反对战争的条约并商定共同反对任何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或任何一个破坏和平的国家，那就完全足够了。这样一种联合力量已经相当强大，任何帝国主义大国集团也不敢对

它挑战。”

中央委员会驳斥对于英美冲突的这种机会主义的、非列宁主义的评价。中央委员会确认（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也是如此），当前的英美冲突相当于战前英德冲突所占的地位。

现在谈谈日本问题。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确认，日美之间的帝国主义冲突正在发展，而且必不可免地要越来越尖锐。目前，美国帝国主义大力进行反日宣传，华尔街也力图使人们相信美国是中国的朋友。这两种手法的目的都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中制造反日情绪，以便为太平洋地区的帝国主义战争作好准备，并形成一种可笑的观念，似乎美国真是中国的朋友。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急需揭露美国的帝国主义宣传，说明美国帝国主义的具体侵略作用。美国帝国主义目前暂时给日本某些行动自由，这是因为总的说来中国革命孕育着更加严重的危险。我们是否否认日本帝国主义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存在发生冲突的根源？我们是否否认太平洋上存在斗争？真是胡说。我们对这两者都不想否认。我们否认的只是一点，即似乎我们的任务在于掩饰美国帝国主义作为日本消灭中国积极伙伴的作用。党的策略的基本路线不应当立足于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分歧，而应当建立在所谓本国政府，即压迫美国无产阶级的美国政府的具体作用上。

再谈几句关于向左转的问题。美国是否存在革命化的进程？中央委员会的回答是肯定的。当前革命化的规模是否很大呢？我们的回答也是肯定的，而且我们说，革命化的进程现在比拉福莱特运动高潮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激进化的进程正在不断加强，不过还没有达到美国全国的规模，从另一方面说，深度也还不够。如果这个进程能发展为美国全国性的进

程，并具有相当的深度，那它就会获得某种群众性的政治表现。我们也就亲眼看到无产阶级大量的经济搏斗。我们也就目睹一场罢工战争。但是，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仍然追随着格林、沃尔和反动的工会骗子手和资产阶级政客的政策。

反对派在向左转问题上的错误在于，他们断言，似乎美国的革命化过程已经具有普遍性，已经席卷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我们的反对派分子之所以发生这一错误，是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化只有在资本主义衰退时期才有可能出现，而美国帝国主义在他们看来正好处于这一时期。他们无法看到美国帝国主义日益增长的实力本身就在不断产生种种矛盾，而这些矛盾就是促使群众向左转的根源。

简单谈谈失业现象。在美国由于存在大规模失业现象和骚动不断增长，我们党开展活动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党对此作出了正确的反应。

反对派在这里多次讲到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美国党多年以来一贯不断反对右倾危险。另一方面，我想提请同志们回忆一下列宁同志的一句忠告：“重要的不是言语，而是行动。谁相信言语，谁就是傻瓜。”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在我们的反对派那里简直变成了一种讽刺。例如，反对派的一位同志曾向我们代表团提过一个关于更改我们党的名称的建议。他声称：把党称作为“共产党”证明你们左倾；如果你们坚持认为根据合法性的客观动机要保持党的名称为“工人党（共产主义）”，那就表明你们右倾。同志们，这是些什么手法呢？何必穿戴上极“左”的服装。用不着采用“左”的装饰。何必采取这类无原则的手法呢？为什么你们要隐瞒自己队伍中的分歧呢？为什么你们要夸大和强调同我们的分歧呢？

你们想干什么？是想机械地把欧洲的条件移植到美国的土壤上来吗？请告诉我们，你们用什么来进行投机呢？是利用想象中的别的党内的摩擦吗？

同志们，我不想多谈细节，不过还是需要向你们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党的发展，在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活动的这个党的发展。这对于理解我们内部当前的形势是完全必要的。在我们成立的最初时期，我们是极“左”派。我们的所有错误大都属于极“左”的性质。我们党同极“左”派进行了多次战斗。例如，以“左”派之一的身份在此大为炫耀的坎农同志就曾经提出过一个肃清极“左”倾向的极为简单的办法，他建议从我们党开除5 000名工人。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否决了这种做法。

我们党的生活后来一个时期又主要是存在右的指导思想。这是在1924—1925年期间，当时主持党的领导机构的是洛尔、福斯特、毕特尔曼。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现在的反对派在党内占多数时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

(1)当时由福斯特出版并作为工会教育联盟正式机关刊物的《劳工先驱报》公开宣传如今已为大家所否定的工人银行。

(2)洛尔(因犯机会主义错误已被驱逐出党)在他所出版的《人民报》上把福斯特—毕特尔曼—洛尔—坎农集团占据多数的党代表大会当作托洛茨基多数派的胜利加以祝贺。而我们试图加以否定，却毫无结果。

(3)这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提出请求，希望国际执委会关于在工厂基层支部的基础上对党进行改组的决议不要运用于美国。

(4)我们曾试图在托洛茨基主义刚一露头时便加以抑制，但未能成功。直到我们从参加莫斯科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那里得到

指示之后，托洛茨基主义才第一次被以福斯特和洛尔为首的当时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所否决。

(5)整个工会工作的安排都寄希望于熟练工人，寄希望于工人贵族。而对于把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作却丝毫不予重视。当时只把已有的工会的联合看作为唯一的任务。我们为把组织未参加工会工人的工作推进进一步的种种打算(如1923年的党代表大会)均遭到否决。

(6)当时实际上是福斯特多数派思想领袖的洛尔后来被开除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向我们党发出专门的指示，要求福斯特多数派与洛尔的追随者(现在已在党外)决裂而同鲁登贝尔格的支持者实行联合。这是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对美国问题的政策。

(7)接着共产国际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宣布：

“聚集在坎农同志周围的同志们发表了一系列声明，这些声明证明，他们试图对小资产阶级施加影响时没有站稳共产主义的立场。”

(8)现在自封为“左派”的人当时对于黑人工作问题上的政策是怎样的呢？我援引反对派分子之一邓恩同志在红色工会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劳驾洛佐夫斯基同志费神听一听，并回忆一下我下面讲的内容。在听取关于黑人问题的辩论时，反对派对于这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所采取的无原则态度使我大为吃惊。请允许我引用邓恩同志对1924年福斯特—洛尔中央委员会关于黑人问题政策的叙述：

“下面谈谈黑人问题。我应当说，在听取关于黑人问题的辩论时，我为某些同志对待这个复杂而危险的问题的轻率态度而感到吃惊。请允许我首先提出，美国黑人是美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工

』人阶级中已经组织起来的那一部分，集中在美国劳联的各个工会中。有组织的黑人工人的数量相对说来不少于，很可能还多于有组织的白人工人。黑肤色工人没有组织起来的原因，并不在于种族对立，而在于整个说来美国无产阶级都没有组织起来。在有黑人工作的工业部门中，他们按同其他人平等的原则参加工会。矿业工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建筑业的情况也是如此。有的工会只吸收高度熟练的工人，这类工会不吸收黑人。不过，一旦黑人在这些工业部门数量增加并开始同参加工会的工人竞争时，他们也将会以同别人平等的原则被吸收参加这些工会。从根本上说我们反对工会二元论，所以我们也不能赞同平行的黑人工会。种族偏见是存在的，这不假。但是，同种族偏见作斗争的最好方法是把白人工人和黑肤色工人联合在统一的组织中，而不是把黑人引向街垒的一边，把白人引到街垒的另一边。

我们看到吸收黑人参加白人工会的工作已在进行。如果洛佐夫斯基同志不顾这一切而坚持在美国组织独立的黑人工会，那么我们就要请他到美国来至少用一年时间亲自接触这个问题。我坚信，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就会同敢于提议用这种办法解决黑人问题的同志拼命。”

总之，这位同志，不是别人而正是邓恩同志，他在正式代表美国党就黑人问题发言时曾邀请洛佐夫斯基同志去美国贯彻执行自己的政策。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采用了另一种策略，而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求助于洛佐夫斯基同志。

(9)让我们看看，库西宁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全会上是怎样表述当时的福斯特—洛尔多数派，即现在的反对派(在工党问题上)的立场的：“按照委员会的意见，多数派对于偶然的

和表面的政治现象抱有过多的希望。”

现在谈谈我们党生活中的当前时期，即自 1925 年末以来的时期。

我们看到，从那时起我们党在现在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已开始向建立布尔什维主义党的方向演变：

(1)我们在产业基层支部的基础上改组了党。

(2)我们提高了党的思想水平。

(3)我们把党引上了开展群众工作的道路。现在我们党的党员有 47%参加了工会，而在我们接管党的领导机构之初，参加工会的党员只占 32%。

(4)我们开展了把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的运动。而在我们结合帕塞伊克爆发的著名罢工试图具体开展这一运动，把未参加组织的纺织工人组织起来的时候，反对派曾出面反对这类步骤，指责我们提倡工会二元论(1925 年的中央十二月全会)。

(5)我们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全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6)我们为在黑人中开展群众工作打下了基础。

(7)我们进行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继续开展反对洛尔的斗争，并反对了美国帝国主义对工人阶级乃至对我们党的某些成员(即现在的反对派)的思想影响。

反对派首领之一茨沃贝克同志宣称，由于俄国革命不再是鼓舞美国工人的源泉，消极悲观的情绪正在我们党内发展。请允许我摘引 1926 年 8 月当时担任我们党第二个大区芝加哥区组织员的茨沃贝克同志写给中央的信：

“消极悲观情绪控制了党员……总的说来，其结果是使普通党员和党的领袖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信心……”

目前我们党再不能依靠俄国革命的光荣过日子了，我们就应当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承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同工人阶级建立联系，并在实际上成为工人阶级日常生活和斗争的一个因素。”

在这位同志看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同党积极参加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是矛盾的。我们当即毫不留情地驳斥了这种理论，指出这是机会主义最恶劣的表现。

当福斯特同志发挥这样一种理论，似乎工会官僚机构是不可战胜的，似乎美国工人的储蓄孕藏着不断扩大的可能时，我们批驳了这种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是又一个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实力的强大对于我们党的思想产生着致命的影响。请允许我摘引福斯特同志在1926年7月号《工人月刊》上发表题为《工会资本主义》的文章。让我们看一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最纯粹的左派面目出现的福斯特同志当时是怎么讲的：

“现在，工会官僚所拥有的恬不知耻地全部用于压制工会内部民主的财力已经十分有限。即使如此，要撤销工会官僚的职务仍是极其困难的。一旦获得大批资本主义机构的资源，他们又将变得真正不可战胜。

……(工人)的储蓄是存在的，储蓄总额极大，这类储蓄孕藏着无限的迅速增长的可能性。”

我们不准备把这种提法说成是为美国帝国主义大肆吹嘘的典型。

我们党首先忙于组织未参加工会工人的工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工会教育联盟采用给未参加工会的工人保留地位的组织原则，这还是第一次。在矿业、纺织、缝纫、制鞋、橡胶等工业部门，我们已着手组织新的工会。在纺织、矿业、缝纫等部门我们已经部

分地建立了新的工会。我国发生的每一次罢工，我们党都处于中心地位。在帕塞伊克罢工和其他一系列罢工中，在围绕萨柯和樊塞蒂事件开展的运动中，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者、在尼加拉瓜发动战争的斗争中，在反对压迫殖民地群众的斗争中，我们每次都站在斗争的前列。现在对左翼的领导权已完全掌握在我们党手中。

坎农同志在这里批评了我们的选举运动。我只需援引他来莫斯科之前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就行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可是对我们的选举运动大加赞扬的。这就是说，在莫斯科讲的是一套，而在纽约讲的又是另一套。请允许我摘引坎农同志6月5日在《工人日报》上就我们的选举运动所发表的一番话：

“无论是谁，只要参加了代表会议或者注意了会议三天来的工作，他就会毫不怀疑地认为，党终于给自己的选举活动打下了实际基础。

这是第一次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实际显示我们党的目的、性质和组织。代表会议组织得十分完善，准备工作是高水平的。它的特点是情绪确实不断高涨。代表会议各方面准备工作的顺利安排是1928年运动的好兆头。

参加刚刚结束的代表大会的有来自3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296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与会的还有各兄弟组织的150名代表。革命工人运动的优秀活动家阿尼塔·威特纳和卢斯·帕森斯等参加会议，使会议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黑人代表团，这就巩固了各个种族在他们共同斗争中的兄弟般团结的纽带。举行罢工的矿工、纺织工人和缝纫工人也派出代表参加了会议；南方和遥远的西部也派来了代表。代表大会的人员组成值得专门大书一笔，它显示出一个真正全

美组织的图景。

各个代表团的性质，以及在报告和讨论中涉及的阶级斗争的迫切问题，都令人信服地证明，共产党对待选举运动的态度远远不同于资本主义政党和改良主义政党的态度。代表大会取得的完全无可辩驳的成就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断言，我们正在接近实现一个最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巩固我们作为全美国范围政党的地位。

近几年来，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工人群众局部斗争的基础上实现的。目前，我们党正集中自己的力量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进行共同的斗争。这里就包含着以我们的全美选举运动开始为标志的转折的巨大意义……党已经赢得了为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而奋斗的战士的荣誉。剥削者及其‘工人’走狗之所以对我们表示憎恨和恐惧，就是因为我们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许多工人对我们的工会工作反映良好，他们以为我们的全部活动也就局限于这一项工作。我们在帕塞伊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反对企业主、警察、美国劳联中的叛徒和社会党，直到停止缝纫工业的生产。当前，我们党是煤矿工人英勇斗争的灵魂。”

在黑人工作方面我们犯有许多错误，不过我们终于为这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组织方面我们完成了我们党的机关的统一集中。我们在采矿业的宣传运动期间吸收了 1 000 多名新党员。目前我们党拥有 15 000 多名党员，而今年即 1928 年每月增加党员 600 人。我们现在拥有各个企业基层支部发行的报纸 28 种，总发行量达 6 万份。

我们是否在进行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谁也不能指责中央委员会在对党的工作实行领导方面过于谨慎和因循守旧。中央委员

会规定任何党员对破坏司法禁令（“Injunction”）毫无作为就要被立即开除出党。在反对上述禁令的斗争中，特别是在煤矿工人罢工期间，我党有数以十计的党员被投入监狱。在组织纠察队和上街游行示威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党都积极参加，有时还进行领导。

就在最近几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还不得不否决了美国反对派首领之一茨沃贝克同志关于放弃在纺织工业中建立新工会的意见，根据是反动的纺织工人联合会——我们美国最为反动的一种工会——已宣称要着手把未参加工会的群众组织起来。我们毫不留情地反对了这种左右摇摆和因循守旧的情绪。我们也反对了明尼苏达出现的右倾危险。反对派的支持者断言，那里的工人党的纪律性同共产党的纪律性一样严格，而且这些反对派同志们在那里坚持支持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希普斯特德作为候选人参加美国参议员竞选。

在反帝工作方面我们反对了反对派代表之一戈麦斯的和平主义错误。

在采矿工业宣传运动期间，我们反对了反对派分子佩肯在无烟煤地区所犯的右倾错误。

在进步党人问题上，正是中央委员会注视着在同他们达成协议时不使领导权转到他们手中。请允许我援引一些提案：

“政治局，1927年11月16日。福斯特的提案：

‘只有进步党人和右翼的联合力量才能提出必要的行动纲领和实现对矿业工会的领导。’

政治局，1928年2月22日。邓恩的提案：

‘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同进步党人和正直的反对派分子建立

联盟，因为在当前必须对机枪、骗子手和政府作斗争时，没有这样的联盟就无法取得和实际贯彻对矿业工会的有力监督。’

洛夫斯顿的提案：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斗争的领导权交给进步党人或正直的反对派分子。’”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对社会党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在这里围绕着所谓对待社会党的机会主义态度掀起了一场风波。我要说，毕特elman和福斯特也曾主张派出可靠的和值得信赖的人员到社会党去进行专门的工作。请允许我援引我们政治局1927年12月14日会议的记录：

洛夫斯顿的提案：

“就社会党四月代表会议问题决议：由书记处会同各州委会讨论向社会党派出少数优秀同志，以便按照我们关于建立工人党的政策的精神开展工作的提议。指派担任此项工作的同志应经书记处批准。”

毕特elman的修改意见：

“这项关于向社会党派出可靠同志的建议应当只涉及拥有大量工人的那些组织。这一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从内部破坏社会党现在领导机构的威信，并为阐明必须建立工人党而进行宣传鼓动。”

福斯特的修改意见：

“奉派前往拥有某些无产阶级成分的社会党支部工作的同志的任务应当是，宣传我们的纲领，以求造成这些组织瘫痪，并把上述无产阶级成分吸收到我们党里来。”

洛夫斯顿用以取代前一提案的提案：

“工人党在其目前对待社会党方面的基本任务在于：使所有追随社会党的工人离开社会党。这样做的基础首先是那些足以揭露社会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已经破产的具体的、直接的问题，例如：关于工人党的问题、对待工会官僚机构的态度、对待政府特别是对待帝国主义和对待苏联问题上的态度。这一场宣传运动应当通过提倡统一战线的方法来加以实现，这种方法可与激烈攻击目前的社会党及其现今的领导机构同时进行。”

洛夫斯顿的提案：

“本次会议通过的策略应当成为对政治局指定的小组（对待社会党策略问题专门小组）的总的指示。”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件人们指责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所犯的骇人听闻的机会主义罪恶中（如果一般说来可以把这称为罪恶的话），我们反对派的首领们毫无疑问是参加了的。而且从提案来看他们比多数派走得更远。

我们的反对派在这里还就潘肯事件大肆喧嚷，似乎这个事件足以证明中央委员会的另一个机会主义罪恶。可是，反对派在纽约州委会中的支持者不仅一致投票赞成我们关于选举潘肯的策略，而且在1927年10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福斯特同志还提出了一项堪称为我们党有史以来在对待社会党方面所犯最恶劣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典型范例的提案。福斯特的这个遭到否决的提案声称：

“纽约州委会关于对潘肯（社会党的法官候选人）表示某种支持的策略是不正确的。党本应当向社会党提出一顶总的提议，即在纽约的选举中投票支持以最低纲领为基础的统一工人阵线的共同名单。”

关于自己的这一项提案，福斯特同志在这里闭口不谈。

反对派指责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犯有机机会主义，因为采取了向社会党发出公开信的错误做法。请允许我回顾一下这封公开信的始末，以便揭露反对派在这里对中央委员会的攻击是极其无原则的。

“政治局。1927年11月7日。毕特尔曼的提案：

‘政治局的小组应当草拟一封给维克多·伯杰和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批评社会党的战略，并提议明确地主张于1928年确定真正的工人党的共同名单或者确定统一的工人名单。’

政治局。1927年11月25日。毕特尔曼的提案：

‘我们重申政治局上一次关于向社会党发出公开信的决议，并建议书记处采取措施贯彻这一决定。’

政治局。1927年12月7日。

‘毕特尔曼提出给社会党公开信草稿交小组最后审定。’”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这个错误的责任整个说来应由中央委员会来负，但反对派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党不止一次强调指出社会党策略具有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性质。4月9日，在收到共产国际主席团最近一封信之前，政治局记录了洛夫斯顿的下述提案：

“党发出的不是给社会党的声明，而是就社会党代表会议给工人人们的正式文告。”

我们党在五月全会的决议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反对社会党的策略。毕特尔曼同志在这里宣称，他和整个反对派承认并且正在改正自己的错误。其实他应当说，反对派仍然一次又一次重复自

己的错误。

下面谈一谈当前的分歧。一直到五月全会之前，党内的分歧并没有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原先存在的分歧并不是沿着旧的线索发展的：这些分歧主要涉及工会问题，是在毕特尔曼和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也包括福斯特在内）之间展开的。在毕特尔曼同志关于我们日常宣传鼓动中的政治罢工问题的提议方面，情况也是如此。

直到最近一次全会开幕之前，所有同志一致认为没有必要在会上通过某种政治决议。坎农同志和毕特尔曼同志甚至还提出了这方面的相应提案。这两个提案被一致通过。4月20日，毕特尔曼同志建议政治局确认，“自3月6日以来，全党表现了执行中央全会拟定的路线的更大决心”。看来，直到最近我们现在的反对派并没有发现任何右倾危险，也没有感觉到来自这方面的威胁。

关于洛佐夫斯基同志，我想谈几句洛佐夫斯基同志，我说你滥用了自己作为红色工会国际领导人的地位。我们欢迎批评，特别是欢迎来自洛佐夫斯基这样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但是我们劝告洛佐夫斯基同志不要再把自己和红色工会国际等同起来。

我们深深感觉到，在涉及美国党的问题上，于其说洛佐夫斯基同志像一个教师，不如说他更像一个检察官。他指控的是什么呢？他武断地说，我们否决了红色工会国际的决议。他武断地说，我们同德国党的右翼建立了统一战线来反对红色工会国际。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想象力太没有边际了。

人所共知的所谓不接受红色工会国际决议这件事的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呢？（1）福斯特同志向中央五月全会提出了关于工会工

作的议案，我们投票赞同。(2)琼斯顿同志提出了一个极端派性的文件作为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团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个文件被我们否定了，甚至连洛佐夫斯基本人也未必会坚持要我们接受这个文件。(3)我们通过了一项赞同红色工会国际决议的决议。(4)洛佐夫斯基同志昨天指责说，发给工会教育联盟代表大会、左翼代表大会的电报在中央委员会内引起了不满。这是毫无根据的。福斯特同志曾反对这封电报的内容。我不能准确地把他的话重复一遍，怕速记员会提出抗议。他讲了这封电报对代表会议造成的印象。

不过我们公布了这封电报，并且在收到关于组织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的忠告很早以前我们通过了下述决议：

“政治局。1927年11月2日。

‘为了同未组织起来的工人建立积极的联系，工会教育联盟应当同工人俱乐部、工厂委员会和其他按工厂或地区成立的组织保持密切的接触。工会教育联盟的所有小组和所有领导机关都应有相应工业部门和地区内其工人未加入工会的各企业的代表。’”

至于谈到洛佐夫斯基关于我们同德国党的右翼建立统一战线的令人发笑的指责，那么，洛佐夫斯基同志，请你记住：“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不应当乱扔石头。”在你之前很久我们就反对过布兰德勒，并且同德国代表一起在第七次全会上进行斗争，纠正了你们的路线。你们对于德国右派分子的批评正确吗？我们百分之百地接受了这个批评。

但是，为什么你们在指责我们的时候不援引任何一段文字根据呢？而你们在批评德国人时不是援引了吗？为什么你们对我们

不这样做？你们为什么不引用我们的文章和文件？

我们没有批评过红色工会国际的决议吗？当然，批评过！是谁批评的呢？特别是福斯特同志，而对此，你们——在五月全会关于工会的决议中——却保持缄默。福斯特还在一封篇幅很长的——达 18 页——给洛佐夫斯基同志的信中批评了红色工会国际的决议。在党内任何地方，只要有可能，福斯特同志就对之进行批评。5 月份福斯特同志写了一篇文章答复洛佐夫斯基同志对我们的批评，我准备向你们引证的也就是这一篇文章。我所援引的是福斯特同志的话，洛佐夫斯基同志维护了他，却又把他忘却了，而我维护了他，但记住了他在这次批评中的情况。在这里福斯特同志是完全正确的。我按照 1928 年 7 月号我们的《共产党人》月刊的文字引用这一段话。这篇题为《老工会和新工会》的文章针对坎农同志的批评维护中央委员会在工会问题上的立场。福斯特同志在文章中写道：

“洛佐夫斯基同志对我们工会策略的尖锐批评使中央全会的讨论显得十分激烈。这个批评大部分是明显没有根据的。例如指责说，似乎我们“围绕美国劳联问题纠缠不休”，似乎我们“一再请求改良主义工会的首领组织未参加工会的工人，挽救工会，领导罢工，等等”，似乎我们存在“关于统一战线的形而上学的观念”，等等。洛佐夫斯基同志也未能对美国的形势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提出我们在老的工会中确切的工作路线，以及说明这项工作对于建立新的工会的关系。对于所有这些论断在关于工会的决议中都作了详细的说明，我们在这里不必再予重复。在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批评中，真正宝贵之处，是有力地把党的注意力转向建立新的工会这一迫切问题。”

洛佐夫斯基同志没有任何根据就毫无顾忌地攻击我们党在组织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群众方面完全无所事事，与洛佐夫斯基同志的全部诽谤活动恰恰相反，我们党在这条战线进行了大量工作。

请允许我继续引用福斯特同志文章中的话，而洛佐夫斯基同志自然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它的话的。福斯特同志写道：

“尽管最近两三年以来我们党越来越坚定地坚持建立新的工会，并且在各个工业部门直接着手组织未参加工会的工人（我们在汽车、冶金、煤炭、制鞋、纺织、肉类包装等工业部门以及在海运部门中的活动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进行所有这些工作并没有足够明确的目标，没有足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究竟向何处去。”

这才是切切实实的批评，但是这样的批评从来不合洛佐夫斯基同志的胃口。

我个人不同意红色工会国际决议的某些方面。在这项决议中红色工会国际为我们党制定了工会工作的路线，竟然一句话也不分析工人运动的形势。在这方面我也想声明我同佩珀同志之间存在重大的分歧，他宣称他 99%地同意红色工会国际的这项决议。我仍然保留原来的批评意见。红色工会国际决议中对工人运动的状况丝毫不作分析并非偶然。还有待于洛佐夫斯基同志去发现美洲大陆。

看来洛佐夫斯基同志有一种习惯，那就是在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把涉及他本人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在这种场合，他把自己完全排除在视界之外。

洛佐夫斯基同志不负责任地指责美国党并不是第一次。在第七次全会上洛佐夫斯基同志指责我们党对于工会教育联盟的工作

和帕塞伊克罢工工人的利益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但事实证明这类指责毕竟毫无根据，后来洛佐夫斯基同志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

同志们可能会问，究竟为什么洛佐夫斯基同志对我们党如此冷酷无情，如此抱有成见？回答是这样的：几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反对他，目的是要迫使他修改工会教育联盟（属美国的左翼派别）的纲领。这个纲领很久以来一直包括有这样一项条款，即任何工人只要在很早以前曾经不承认过无产阶级专政，他就要被开除出联盟。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在建立和发展左翼（洛佐夫斯基是努力加以维护的）方面的这种错误观念的斗争。许多年来，工会教育联盟纲领一直保持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款。

回想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为战胜洛佐夫斯基而经历的种种事件，我们不禁产生一种想法，即洛佐夫斯基同志并没有任何权利指责别人“混淆了整整两个大陆”。红色工会国际的悲剧就在于它是由洛佐夫斯基同志领导的，而这个人几乎一接触任何一件事情，就要把这件事搞得一塌糊涂。

在第九次全会上我们党又使洛佐夫斯基同志的策略遭到一次严重的失败。洛佐夫斯基同志在那里提出了一项关于美国工会的决议，其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共产党人必须在美国劳联现有的工会中进行工作。美国代表团在第九次全会上提出了一项反决议，其中特别强调必须组织处于工会组织之外的工人，同时宣称必须继续和加强共产党人在美国劳联内部的工作。洛佐夫斯基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修改意见，不过遭到了迎头痛击，——甚至连福斯特同志也拒绝支持洛佐夫斯基同志对于我们党在矿工宣传运动中的政策问题的立场。

洛佐夫斯基同志看来对于自己对美国工会政策问题的理解具有特殊的兴趣。在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最近的某一次例会上，洛佐夫斯基同志谈到美国问题时发表了一个荒诞的声明，似乎美国劳联得到发展的唯一条件是共产党人不去组织未参加工会的工人；如果共产党按这个方向工作，它就不会有发展了。

很明显，洛佐夫斯基同志反对我们中央委员会是出于派别的动机。我们警告洛佐夫斯基同志：或者他自己不再插手美国的派别行动，或者我们将强迫他这样做。我认为，洛佐夫斯基同志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所起的作用是，他成了鼓励我们党内派性的主要力量之一。

最近几个月，党在组织未参加工会的工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党的几千名党员被开除出工会。我们党在领导罢工方面开展了有力的活动。我们需要忠告和批评，但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攻讦我们并不需要。

同志们，我想说明，尽管我们的反对派进行了尖锐的没有根据的批评，我可以向代表大会保证，美国党不会再走上派别斗争的道路。代表大会不应该在了解事物的真实情况方面犯下错误。尽管我们的反对派在毒气烟幕弹的掩护下拼命地试图把我们党推上自相残杀的派别斗争的道路，我们不会再卷入派别斗争了。我们党反对过右倾危险。我们在这里对布哈林同志代表俄国代表团建议的提纲专门提出修改意见，建议指示美国党中央继续和深入开展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令人吃惊的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派第一次批评现今的领导机构及其支持者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原先他们总是批评我们犯了“左”倾错误。

党需要和平。我们处于重大宣传运动的时期：煤炭工业的宣

传运动、选举运动和在一系列工业部门组织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的运动。和平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虽然我们的反对派犯有种种错误，经历过种种曲折，发生过种种动摇，但他们越来越接近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越来越接近中央委员会实行的政策。中央希望党内和平。因此，我们坚持要反对派解散自己的联盟（福斯特—坎农联盟）。我们要求共产国际否决毫无根据地强加给中央委员会的关于右倾的指责。我们要求共产国际从此永远制止搞宗派主义的反对派反对中央委员会的行动。美国党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我们决心竭尽所能维护我们党的团结统一，完成我们在开展黑人工作方面、在反对对尼加拉瓜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方面，以及在组织未参加工会的工人方面所面临的任務。在共产国际的协助和领导下，我们将沿着建立统一的、群众性的美国共产党的道路向前迈进。

布兰特（波兰）：

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应当把消除波兰共产党内的现状和巩固党的布尔什维主义领导看作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在这方面居于首位的是两个问题：（1）党内的思想分歧是否很大，这些分歧是否大到了足以形成派别斗争，或者现有的矛盾是否有可能和解？（2）波兰共产党中央执行的是正确路线还是错误路线？对这两个问题必须作出绝对明确的答复。在布哈林同志和联共党提出的提纲中对这两个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思想分歧不是很大。波兰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和波兰代表团中的多数也持同样的看法。代表团确认，在反对孟什维克的各种攻击和反对右倾错误的斗争中党保证这条正确路线取得了胜利。我们并不把孟什维克的立场看成是一种完备的原则路线。我们指出一系列错误，而且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这些错误是能

够并且应当加以克服的。因此，多数人总是主张真正的合作，并且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采纳了实行合作的观点。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投票支持孟什维克的候选人参加中央委员会。

他们是因为我们投了票才当选的。

大家昨天在这里听到了连斯基同志发表的一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声明，他说他也不认为分歧很大，并且认定党的路线“整个说来是正确的”路线。但是，不仅过去的全部实际行动，而且连斯基同志发言的内容，都是和这项声明相矛盾的。连斯基同志说，路线整个说来是正确的。但是还没有换一口气他又补充说：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集团是右派集团。右派集团怎么能够执行正确的路线？他说整个说来路线是正确的。但是一分钟以后他又断言，这条路线是犯一连串右倾错误的路线，正在发展成为右的倾向。他说分歧不大，但是布兰特的小册子却证明存在重大分歧。连斯基断言，这本小册子是“把法西斯主义作者的思想转换成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是维护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同志们，连斯基同志是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崇高讲坛上讲这番话的。他发言时按稿子照本宣科，因此不可能有任何口误。如果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出版并维护一本阐述法西斯主义观点的小册子，那么这里指的就是共产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的分歧——这样的分歧就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如果连斯基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分歧绝对不小，而且是原则性的分歧。那就应当把多数派开除出共产国际。但是，如果这个论断不正确（事实当然是这样），那么，通过这个很能说明连斯基同志发言基调的实例大家可以看到孟什维克进行派别斗争的方法。这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方法。这种派别斗争的方法毒化着全党的空气。

我们有权指出，连斯基同志关于分歧不大、关于愿意实行合作、关于自我批评等等方面的声明都是一些空话，都是为了适应代表大会的气氛而不得不讲的空话。孟什维克的全部实际行动与这些空话并不相符，但却和他发言的其余内容相符合。不过我没有时间来叙述这些实际行动，我们将在委员会中说明这些事实。我只想强调一点。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少数派不投多数派同志的票，而我们投了少数派同志们的票。少数派预先就拒绝合作，他们进入中央委员会只是为了对多数派进行攻击。他们以后的全部活动也都带有这种性质。少数派一贯对中央进行派性攻击。他们奉行的是分裂政策。

我敢断言，少数派提出来反对中央的所有提案，以及他们每次向党员群众散布的所有提案，都是右倾的。就拿统一战线问题来说吧。在选举运动期间，少数派的同志们建议实行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连斯基同志曾想否认这一点。我给他读一段少数派向政治局提出的提纲。提纲中说到：“党原则上不排除对所谓‘反对派的’机会主义政党实行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运用。”

而这涉及波兰社会党这样一个同法西斯主义的联系比任何其他社会党更为密切，比德国和法国社会民主党走得更远的社会民主党！连斯基同志硬说这只是某些同志的做法。我敢断言，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所有少数派的同志们都投票支持这个提纲。下面再以战争问题为例。连斯基同志指责我们粉饰战争危险。我要指出，少数派的同志们在不久前召开的白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拟定的提纲就说道，反对苏联的战争危险正在日益减少。而在讲这番话时，波兰正在大力进行战争准备，我们正处于重大事件的

前夕。

再举农民和农业工人问题为例。恰好目前波兰农民正在发生剧烈分化。毕苏斯基凭借自己的经济政策不仅把波兰本土境内的，而且把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上层农民都争取到自己一边。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更加尖锐了。在这种时刻，西白俄罗斯的少数派同志捍卫的口号是，我们应当率领包括富农在内的整个农村前进。我们对此进行了斗争，我们否决了这些错误的提案，我们反对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反对粉饰战争危险，反对率领“整个农村”前进的口号。

还可以举出关于稳定局面中的矛盾的问题作为例子。华沙委员会的同志们断言，毕苏斯基在华沙选举中的成功是由于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有了改善。这恰恰是毕苏斯基和社会民主党人讲的话。他们硬说，稳定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有好处的，稳定局面的产生并不损害工人，它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

还有最后一个例子。连斯基同志宣称他和台尔曼同志意见一致。但是，少数派同志在1928年5月华沙五金工人罢工期间提出了对生产进行监督的口号。这是台尔曼同志的观点吗？恐怕未必。少数派在给华沙青年委员会的号召书中要求对生产进行监督。我就谈到这里。我要肯定地说，这一切都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并不是无法改正的机会主义错误。我们没有说少数派同志正在为系统的、深思熟虑的机会主义路线辩护而且从本质上说没有能力改正错误。如果他们想要反对正确路线，他们今后还会出现种种偏向。谁要反对正确路线，谁就非犯错误不可。他们能够改正错误，但只能通过真正实行合作的办法。我们要求，也可以要求少数派同多数派实行合作，维护党内布尔什维主义的纪律，少

数服从多数。

还要就我那本被连斯基同志说成维护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小册子讲一句话。顺便说起，他硬说我否认波兰的工业家们希望战争。波兰的工业家是波兰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支柱。如果他们不希望战争，还有谁希望战争呢？总不会是工人或农民吧？中央委员会一方面把反对战争、保卫苏联当作自己活动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又出版一本小册子否认波兰资产阶级希望战争，这怎么可能？连斯基想证明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什么也未能证明。

他想把这种荒唐话说成是我讲的。但这种荒唐话后面却隐藏着真正的分歧。是什么原因推动波兰资产阶级发动反对苏联的战争呢？少数派倾向于把这些原因归结为纯粹的经济动机，主要是上西里西亚工业需要销售煤和生铁的问题。这就是说，他们把反苏战争问题同总的国际形势和社会革命时代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他们把这个问题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斗争的一部分变成为上西里西亚工业产品的销售问题。我们说，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工业家）希望战争，但是并不仅仅由于考虑到销售的需要，而是波兰局势中所有的政治矛盾、经济矛盾，特别是社会矛盾推动他们发动战争的。正如推动英国进行反苏战争的不仅仅是因为需要向苏联销售工业产品，而是由于所有的种种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重大社会矛盾。具有决定意义的并不是上西里西亚的销售问题。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1920年毕苏斯基要向基辅进攻，而当时上西里西亚还不属于波兰，波兰的工业也还十分可怜。无法解决的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斗争的激化，所有这一切使波兰资产阶级感到与苏联为邻包藏着巨大的危险，如果同它相邻的苏联将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它就无法长久地在波兰保持阶级统治。关于战争起因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学院式研究的问题。它决定着未来战争的性质问题。这将是普通的帝国主义战争，还是不寻常的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战争？这首先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战争。这才是我们应当告诉波兰工人的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不当像连斯基同志所要求的那样，仅仅把销售的利益放到首要地位，因为我们这样做就会抹煞战争的性质。关于我的小册子，我应谈的就是这些。

同志们，我们赞成自我批评。我们批评过我们的错误，例如，我们批评过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之前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但是，连斯基同志以自我批评为名提出来的东西，却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自我批评的嘲弄，却是败坏党，是同党作斗争。我们希望代表大会帮助我们结束这场党内斗争，并且是从政治上，而不是从形式上结束这场斗争。这就意味着要在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上把党团结起来，维护这条正确路线，反对一切右的和极“左”的倾向，反对一切派别攻击，维护布尔什维主义的铁的纪律。这样波兰共产党就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就会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可战胜的堡垒，领导波兰无产阶级战胜法西斯主义。

艾尔科利(意大利)：

我们一致认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面临两项基本任务。

其一是搞清自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较长的4年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了些什么。必须在此基础上对成功、失败、成绩、缺点、错误和我们尚须纠正的失误进行总结。

另一项基本任务是，在对每一个国家的国际国内形势的主客

观各方面进行深刻分析之后，制订今后总的工作路线，确定为了达到预定目的我们应沿着什么方向前进。

同志们，我以为就第二项任务而言，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布哈林同志的报告和提交国际执委会的提纲提出了总的路线，对这个报告和提纲所进行的讨论，据我看来，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这条基本路线。尽管参加讨论的大多数人把全部注意力仅仅集中于详细探讨本国和本党的状况，甚至仅仅集中于分析本国党内派别斗争的细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整个路线的考察，忽视了对一系列个别事件和一系列问题分析所得结论的正确性的考察，忽视了对我们据以安排自己全部工作的预想前景的正确性的考察，尽管如此，这次讨论仍使我们得益匪浅。

请允许我代表意大利代表团宣布，我们同意提纲所提出并在布哈林同志的报告中得到进一步阐述的总的路线。不过，在强调说明我们同意这条路线的同时，我们要特别提到和着重指出涉及共同性问题乃至形势个别细节的某些情况。

首先谈一谈我们对客观形势所作判断的意义，或者更准确点说，对于导致我们作出这个判断的那种方法提出一些看法。

我们十分满意于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无论在提纲和布哈林同志的报告中，还是在大多数的发言中，同志们都力求摒弃那种描述客观形势的完全没有内容的固定格式(*méthode purement verbale*)。这种固定格式就在于先认定存在稳定，然后又给“稳定”这个术语加上一大批修饰语，并把这些修饰语根据不同的程度和分量加以排列，就以为解决了全部问题。我们必须坚决弃绝这种纯粹咬文嚼字的方法。我们的方法应当是仔细而深刻地分析所有的

因素，而不管它们在我们看来是否有利。

在构成形势的种种因素中，有一些因素是对我们不利的。我们坚持认为，对这些因素必须认真切实地加以研究和分析。问题绝不在于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在这里听到有的同志说，我们应当依据乐观或悲观程度的大小，也即依据对于不利于我们的客观要素重视的程度，来判断和划分我们中间的派别，这使我们感到有些意外。同志们，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标准来判定我们中间的派别。例如，当我们研究美国帝国主义这类现象时，我们的任务在于极其详尽地对这一现象进行判断。如果我们看出美国存在危机的征候，那我们就应当清醒地查明这些征候的性质、深度，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尚拥有的潜在力量的规模。对危机估计过高和对这些潜在力量判断不正确的倾向，无论如何不应称之为“乐观主义”的倾向。承认必须对当前形势的所有因素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这在我们这里不应当成为引起各种派别之间分歧的原因。问题不在于乐观或是悲观，而在于正确地运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列宁最后一次在这个讲台上对我们提出的告诫：“……我们……不但要向俄国同志说，而且也要向外国同志说：目前这个时期，最最重要的是学习。”^①

这就是列宁给共产国际留下的最后遗言，我们应当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完全彻底地按列宁的遗训办事。

但是，同志们，仅仅国际领导机构运用这种对客观形势进行区别对待的分析方法是不够的，仅仅主要由我们在这里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各种要素进行认真的深刻分析是不够的。必须使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88页。——译者注

共产国际的每一个支部在这条道路上都能取得和领导中心一样的成就。我敢断言，只有不多的几个党已经有效地和认真地解决了这个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必须解决的重要任务：学会全面透彻地认清客观形势及其各个组成要素；学会看出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的实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变化，并从而判定其前景，这种前景应使我们有可能（即使是概略地）预见今后的发展以及特别是可能发生的突然变化。

我敢肯定，整个共产国际和各个党之所以犯错误，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对客观形势的这种分析。这类事例在任何一个党的生活中都存在。所有这类事例使我们深信，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通常遵循的只是一般性的公式和原理。这些公式和原理对于判断总的形势来说是正确的，但也仅仅适用于认识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总的特征。一旦我们转而有区别地分析形势时，我们就力不胜任了。因此，我们研究的结论总是“Post factum”（在事实发生之后）才问世。这些结论几乎总是确认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不是预见这些事实。事态的发展始终使我们有些措手不及，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始终有点赶不上形势，原因也在于此。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对于确定列宁主义策略的实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大家想必还记得我们在前几次代表大会上和国际执委会的全体会议上同极“左”派的争论。极“左”派指责列宁主义的策略是“无原则的实用主义”。这个指责是由博尔迪加抛出来的。我们驳斥了这种评价，击败了这种思潮。我们尽自己的一切可能肃清了我们队伍中的这种思潮。不过不应忽视，缺乏对形势的详细分析确实会使我们走上某种“无原则的实用主义”的道路。那么，如何称呼仅仅依靠形式上的、空洞的、表象上的认识，而确定我们的策略的

倾向(多少有些“右倾”或“左倾”)呢?“左”和“右”这两个术语对于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用来表示工人运动脱离引向革命目标的道路两种主要倾向。但是与此同时,“左”和“右”这两个术语只有在以下场合才具有充分的意义,那就是当我们把它们同一定的形势,同我们面临的任务以及从这种形势引出的方针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我已经指出,缺乏分析可能造成对当前形势反应迟缓,而迟缓的反应无疑从来不会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反应永远会有某些错误,即使沿正确道路前进时也是如此,因为由于迟误,结果不是超越现实就是跟不上现实。但是不能排除,它也会把我们引上不正确的道路。

自从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在分析客观国际形势方面所做的全部工作的主要成果,在我看来,就在于我们确定无疑地、清楚地掌握了这样一个真理,即资本主义的衰退绝不是不间断地直线下降。相反,资本主义的衰退过程受到不断激化的内部矛盾的深化和发展的制约,因此它的总的曲线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只有牢牢地掌握这个真理,我们才有可能按照其实际意义判断这个事实: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有所上升,而这种上升绝不改变我们所处时期的总的性质——即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衰退和死亡的时期。

在分析矛盾(资本主义危机就是这些矛盾的发展所决定的)的基本原因时,我们应当承认,这些原因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同时在于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提纲对这一点完全正确地特别加以强调,并且给予正确的评价。我们在第七次扩大全会上予以十分重视的市场问题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只

有把市场问题同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以及同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事实联系在一起，市场问题的重要意义才能显现出来。

现在举意大利为例来说明。最近两年（现在仍然如此），意大利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的基本原因在于，在某一时刻意大利生产力的发展超出了界限，冲破了意大利国民经济的传统框框。当然，其断裂线的走向是由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内部结构决定的。意大利资本主义内在的软弱性，自始至终靠剥削群众的方法加以克服的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以及其他国家市场行情的变化对意大利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危机的深化，使危机的表现大大激化和加深。

但是，在分析最近时期的形势时必须承认，经济危机的发展似乎稍有停顿。危机的最强烈的表现缓和了下来。意大利资产阶级是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而做到这一点的。其中最主要的是：（1）外国资本的帮助；（2）对劳动群众施加异常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3）法西斯主义帮助资产阶级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利益。这样一来，政府才得以干预经济生活，并采取种种措施推迟危机的到来，而不去采用极端的办法解决问题和克服危机。资产阶级的总利益恰恰就在于延缓问题的解决，从而获得集聚力量的机会，以便阻挠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意大利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深化的这一不可避免的结果。

总而言之，意大利资本主义目前采取的是守势。但是，实际上这种守势只不过是掩盖正在准备一场激烈斗争的事实。这场斗争现在已经展开，其目的是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夺取新的阵地。

对于意大利的上述看法，只要加上一些限制条件同样适用于

许多其他国家。当前，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表面看来采取守势，但实际上却以此来掩盖其进攻行动。生产力发展形成的压力正在越来越快地使任何民族资本主义转入积极的进攻。

这种转变采取何种形式呢？首先，每个国家的内部平衡遭到破坏。这特别表现为广大工人群众受到更加强大的压力，农业危机不断激化和城乡阶级分化加快。这一切都是普遍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我们代表团坚持要求认真讨论农业问题，而且是从全局上来讨论，不是仅仅从加强我们机关中的某一个相应部门出发，详尽地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后果和形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无产阶级和我们各国党的任务。我必须说明，我个人对昨天东巴尔同志就这个问题的讲话是不满意的。他重复了一大堆我们已经听过不止一次的一般原理，却没有向我们阐述农业问题的现实表现，也没有指出当前我们应如何在农民中进行工作。这样的讲话，这种大量堆砌一般性词句的做法，是无助于解决问题的。东巴尔同志在发言中完全忘记了法国这样一个农民的作用仍然十分巨大，而我们的农民政策问题异常尖锐的国家。从东巴尔同志的这一表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另一方面，生产力增长所造成的压力正在把各帝国主义之间的和平斗争方法变为远非和平的方法。这是当前形势的另一个主要侧面。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的那本书中早就强调说明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和平斗争方法和非和平斗争方法。他把建立关税壁垒列为和平斗争方法之一。在当代我们看到，另一种看起来似乎是和平的斗争方法正在被广泛运用，我指的是成立大型的国际卡特尔。不过主要的是，我们生活在由和平方法向非和平方法过渡的时期。这种过渡局部说来已经完成。殖民地战争和扼杀中国革命

的战争就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我们常常感觉到其中孕育着种种意外事件。正因为如此，我们意识到面临着十分重大的任务。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把战争的前景看作为基本的发展前景。

这种战争的前景——作为主要的发展前景，应在代表大会上大力加以强调。这是因为，在我们某些党内，对于这个可能前景的全部意义还没有真正认识。人们虽然在谈论战争，宣传反对战争，但给人的印象却是，与其说真正认识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不如说是对已通过的提纲表示应付的态度。对于我们正在接近战争这一事实的认识，在我们各个党内并没有深深扎根，也没有成为决定我们在这方面工作的因素。

但是，从实质上说战争前景在今天的确切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在谈论把世界分裂开来的种种矛盾，其中一方面指的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指的是帝国主义强国同苏联，也即资本主义世界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我们也一直认为（或者说这一直是我们潜在的出发点），第一类矛盾（即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即使不阻碍，至少也要迟滞帝国主义国家同苏联的矛盾的发展。同志们，我以为现在应该放弃这种观念了。这种观念已经与现实情况不符。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要提到库斯特齐瓦同志的发言。她在这里说，提纲过分强调德国在欧洲以及在全世界的作用，其实应当给予英国以更多的关注。当然，从目前形成的欧洲局势来看，应当承认英国拥有政治霸权这一突出的事实。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一旦欧洲资本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发生冲突，英国必然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的首领。然而在研究问题时只考虑到局势的当前“政

治”方面则是错误的。应当从发展中考察这种种现象。英国的政治霸权已不再同经济霸权联系在一起，而德国的政治地位则同它的经济发展和作用不相称。必须注意到，当前欧洲和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德、英两国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影响之下。但是，这场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将在何处得到解决呢？这场斗争只能在反对苏联的斗争中得到解决。研究一下英国和德国的立场和方针，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要解决夺取欧洲霸权的问题只有走上同苏联作战这条道路。

正因为如此，才可以断言，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已不再是能够迟滞第二类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世界同苏联之间矛盾的因素。相反这第一类矛盾只会促使第二类矛盾的增长和加深，并将加速第二类矛盾爆发和反苏战争的发生。

难道我们提出存在战争前景的目的和意向是为了把西欧资本主义大国开展阶级斗争的前景推到次要地位？把这两个前景相互分开是不可能的事。这两个前景是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首先就因为生产力的增长本身客观上在不断地增加战争的危險，生产力的增长是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而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要素正是对工人阶级大力加强政治和经济压迫。其次，从主观方面看，对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压迫正是战争准备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把同战争危險作斗争的必要性同在西欧国家开展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分割开来。无论对于资产阶级还是对于我们，这两者都是相互联系的。

事实上，反苏战争的最初接触战已在全世界发生。各方面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激烈状态，就是这类初步接触战的表现。在白

色恐怖猖獗的国家内受到迫害、被投入监狱和遭到肉体消灭的我们的同志们便是反苏战争中的第一批战士和牺牲者。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调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反苏斗争与各个国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之间这种极其紧密的联系。

我们觉得，在提交给我们的提纲草案中，对于涉及阶级力量增长和经济形势的客观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的部分未作足够充分的阐述，而这种阐述是必不可少的。之所以必须对这一部分作更多的研究，在我们看来，是因为必须重新明确地提出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毫无疑问，共产国际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1921年、1922年和1923年期间，人们谈到法西斯主义时，是把它看作为某一时期内而且是在一定条件下资本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一种特定的形式。现在考察这个问题，必须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客观矛盾的加深而出现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构趋向反动方向的改组联系起来。对问题必须从这样的角度来考察，才能清楚地看到法西斯主义的真实性质和作用。

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对于到处都在发生的，而且成为当前历史时期基本特点之一的所有资产阶级政治机构趋向反动方向的变革这个总的问题加以研究。不过在试图总结意大利在法西斯方面的经验时，则不应操之过急和走得过远。这里必须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进行分析。

法西斯主义是反动势力最彻底、最完备的形式。但是，反动势力并不仅仅只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反动势力还具有其他的形式，这些形式不同于法西斯主义，但也具有与法西斯主义同样的巨大作用。例如，当1924年清楚地看到法国统治阶级面临对国家的所有政治机构实行反动的改革时，我们法国党的某些同志提出了“法西

斯来到”（“Le fascisme est là”）的口号。现在已经完全清楚，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反动势力果然来临，但它所采取的形式与法西斯主义完全不同。我们当时在法国看到的不是法西斯运动，而是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左翼政治集团的变动，以及它们被反动联盟所吞没。反动势力不是戴着法西斯的面具行动，而是以左翼议会团体的形式出现。

照我们看来，法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所犯的一部分错误，其根源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共产党未能准确地认识到法国政治趋向反动所采取的形式。用最概括的方式来表示，可以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反动势力的这样一种形式，它只是在特殊条件下，主要是在大工业资产阶级力量薄弱而为了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对群众采取完全特殊的暴力形式和政治压迫形式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此外，反动势力采取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只有在这样一种场合，即由于城乡中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发生变化而有可能使反动运动成为“群众性”运动的时候。

自然，把法西斯主义看作为某些国家在完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典型形式，就会导致一些极其重要的政治结论和战略结论。对于我们来说，基本的一条结论是，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及由此而引起的对资产阶级制度彻底的反动改革不可能开辟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景，而只能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已完全成熟，证明我们所处时期的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

时间不允许我更展开地发挥这个论据，不过我想就某些同志对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作的对比讲几句话。我们认为，指出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存在明显的思想联系是完全正

确的。此外还应指出,在不少场合下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在某些场合和在某种条件下社会民主主义还采用明显的法西斯主义方法。但是,与此同时,在这方面必须注意防止过分的概括,因为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采用法西斯主义方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法西斯主义整个说来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领导的中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它在工人阶级的传统组织中并没有扎下根。而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则是以工人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为依靠对象的运动,它主要是从被广大工人群众看作为本阶级传统组织的组织中汲取力量的。

在转而分析主观因素时,我们首先应当看到革命形势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常常是不相适应的。

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仍然是当前形势最典型的特点之一,而正是这种不相适应的事实决定着我们的任务。当然,目前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已在日益缩小。所有资本主义大国的工人群众正在向左转。否认这一过程是完全错误的。这一过程的征候显而易见,闭眼不看是不行的。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向左转的过程是自动发生的,而且它也自动地把群众引向共产主义的革命立场,那则是极大的错误。这种对事态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眼前的这种群众左倾化的问题究竟是怎样的呢?罗明纳兹同志断定群众左倾化的过程并没有结束而是仍在继续,我仍不明白他在讲这番话时究竟想说明什么。十分明显,这一过程不能认为已经结束。如果这个过程“结束”了,那将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历史过程停顿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任务在于准确地判明群众左倾向过程的特点,弄清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群众的动向。群众向左转的出发点是什么?它可能把群众引向何方?这个问题应当这样地

提出并加以讨论。

我们在这里首先应当提出，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不断向左转，正在离开资产阶级政党和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另一些阶层则正在离开社会民主党，脱离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工人群众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却又接受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这是一种分化的过程，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研究。最后还有，工人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并站到阶级斗争的立场上以后又会走上什么道路呢？他们是否会像在1919—1920年那样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不，我们并不能这样断言。群众主要是走上了发挥更大的积极性，更加有力地反抗资产阶级的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的道路。这意味着：第一，同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进行局部的斗争；其次，群众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在增长；第三，对苏联的好感在加强。不过我断言，无论在哪一方面，没有我们各个党对群众施加有力的、不间断的影响，没有我们各个党发挥政治积极性和开展斗争，群众不可能牢固地占领任何阵地。只有通过共产党开展的斗争，工人群众才能够巩固地占领并扼守他们现在已经想夺占的那些阵地。

于是这里就发生一个“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问题。我坚决否认对工人群众左倾化的性质和形式以及对这种左倾化给我们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就是悲观主义的表现。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提防把悲观主义色彩同真实情况的反映混为一谈。总得承认，我们还要克服许多障碍。而群众自身也要克服种种障碍，然后才能完全彻底地转到我们一边来，走上彻底进行革命阶级斗争的道路。

存在哪些困难呢？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进攻，这种进攻把

群众同我们隔开，起着瓦解群众，分散群众力量的作用。某些国家已出现这种情况。

其次，工人阶级自身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这一点起着重大的作用。这种变化由于工人贵族的社会地位下降和中间阶层的工人群众加速分化而使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同我们更加接近。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也不应闭眼不看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这种结构性变化，工人阶级队伍中正在形成新的工人贵族，形成这样一些无产阶级阶层，即仍便于社会民主党在其中扎根，并为社会民主党对整个工人阶级扩大影响提供合适土壤的无产阶级阶层。

第三，必须承认，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仍有相当的组织基础，这种组织基础在奥地利或比利时范围最广，力量最强，在意大利这类国家中则力量最小。不过，这种组织基础到处都存在，甚至在那些反动势力的进攻已把工人运动几十年来建立的所有阶级组织全部摧毁的国家内也是如此。

我们向各国共产党提出把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最猛烈的斗争作为基本任务。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看到在工人阶级中存在有利于社会民主党扩大影响的客观条件，正是在工人群众彻底向左转和迅速地从现今的立场转向彻底进行革命阶级斗争的立场的道路上还存在障碍。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才提出，更猛烈地同我们队伍中的右倾危险作斗争，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可以说，有利于社会民主党对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保持影响的那些条件和客观事实，实质上也能为我们自己队伍中右的错误和倾向制造适宜的土壤。最近两三年来，可以说在共产国际范围内没有一个党不曾发生过右的错误。不过，尽管这些错误的形式各有不同，还是可以把它们归纳为几个基本类型。

一方面，这些错误在我们的某些党内和个别同志身上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面对在我们眼前形成的联合力量有某种恐惧情绪。这个联合力量包括反动的国家机构、作为这种国家机构支柱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之溶为一体的改良主义工会，以及工人阶级内部改良主义工会的反共政策，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给我们各个党造成十分不利的局势，这种情况给我们的队伍带来混乱，并给某些人造成幻想，似乎只要对我们最大的敌人——社会民主党——作出让步，就能使力量对比变得对我们有利。照我看来，这就是我们一些秘密活动的党，如巴尔干各国党，产生右倾的根源。

右的错误的另一个根源，是认为社会民主党还起着革命作用。这种观点就是法国共产党犯右的错误的根源。

最后，最危险的倾向表现于准备向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政策作出让步，要我们各个党接受近似社会民主党路线的政治路线。德国共产党内右的危险就具有这种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德国共产党必须同这种危险作最坚决的斗争。

不过，既然我们都承认必须同社会民主党作更有力的斗争，那么试问该以什么方法，用什么形式进行这一斗争呢？这是我们应当加以研究、考察和分析的一个新的领域。为了战胜社会民主党，我们应当怎样开展工作呢？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摸索到，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我们还没有学会，运用正确的方法。且举思想斗争领域为例。我们在这一领域中的工作失误完全是显而易见的。社会民主党还掌握着几十万工人的思想。我们必须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进行斗争，而且不仅仅是用提纲和决议作斗争，而是要当着广大群众的面进行这一斗争。这一点我们做的是否够了呢？照我看来，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承认，即使在一般理论问题方面，我

们现在还停留在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在战争时期和战后最初几年所采取的立场上。我们在这个方面前进得很少，并不足以针对社会民主党的新的思想立场顺利地同它进行斗争。

我们同社会民主党的论战是显然不够的。甚至我们在群众面前进行论战时使用的语言也是枯燥无味、平淡无奇和官气十足的。我们的文风使人觉得我们所写的决议是为了调和两种相互敌对的思潮，缺乏足以吸引群众的那种深刻的说服力和革命激情。

下面谈一谈在争取实现局部要求方面的斗争问题。由于群众的左倾化如我所述在这方面反映得特别明显，因此十分清楚，我们应当主要在这方面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正在成为真正争取群众的斗争。然而在这方面我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决议规定，在无产阶级争取实现局部要求反对合理化后果的斗争中，掌握领导权是我们各个党的基本任务。但这项决议没有得到全面彻底的贯彻。许多本来可以从社会民主党手中夺取过来的阵地，现在仍然被它控制着，其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各个党在争取实现局部要求的斗争中所做的工作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完毕。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应当让工人们看到，我们善于也愿意在这方面开展斗争。我们自己坚信也要让别人相信，我们是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但是，如果我们的日常活动在与工人最有密切关系的方面不能体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去为使工人群众摆脱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而进行斗争，如果我们不去设法使他们相信只有我们能够满足他们在同资本主义压迫作斗争中的要求和愿望，那么，仅仅认识到我们是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又有什么用

呢？

现在我想简单地总结一下我们在第五次和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之间的活动。这期间我们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的影响扩大了，我们各个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得到某些加强，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对此必须加以说明。

其中包括我们在中国的局部失败、几乎存在于所有各个党内的严重的右倾错误、对英国矿工的罢工声援不够，以及在组织方面和思想方面的一系列弱点。

在布哈林同志的报告中，——可能在共产国际的生活中这还是第一次，——对所有这些缺点都进行了切实和全面的分析，而且清楚地提出了共产国际在克服这些缺点方面的任务。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应当说，共产国际的中央领导机关还是第一次提出自我批评的口号，因此未免处于不很愉快的境地。这种处境可与一位伦理学教授的处境相媲美，这位教授在结束关于良好品行的讲课时不得不声明说：“请遵守这些规范，但不要学我本人的样子。”这句话换一个说法就是：“按照我所说的做，但不要按照我所做的样子做。”共产国际领导中心活动中的缺点在工作的各个方面——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都反映了出来。现在举个例子：如今所有人都同意必须坚决反对右倾和右的错误，可是为了纠正法国共产党的路线，即一条可以说完全是由右倾和右的错误组成的路线，我们克服了多少抵制啊！塞纳区参议院选举事件的发生以及不时出现的“混合的”妥协理论还嫌不够。必须再出一次照资产阶级法律办事的丑闻，才能使共产国际懂得，必须坚决提出纠正法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问题。不过，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预过迟且未能使所有党员和工人阶级充分了解这种干预，因此后来

改变党的路线所收到的效果大受影响。在选举运动中，法国共产党未能完全取得可能获得的成功，因为它的选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即兴”安排的性质，它为时过迟，而且并不是以若干年来在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彻底贯彻政治路线为出发点的。

今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应当更加直率地和更加坚定地发扬这种批评精神，布哈林同志的报告就是这种批评精神的范例。

至于谈到我们党，那么意大利代表团坚定不移地坚持认为，在提纲涉及我们的成绩和失误的那一部分要增加更多的批评，要直接指明所犯的 error 和这些错误的不良后果。我们所以坚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把对于我们所有各个党都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即合法性问题彻底地提出来。战争即将来临，因此，秘密活动也势在难免。但是，地下活动的准备工作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是否就是建立一个从事地下活动的新的机构？不，这恰恰是最次要的一部分任务。主要的任务在于，从政治上提出地下活动问题，以及在广义上提出组织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的各个党要能够适应各种条件，及时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局势（而不是当局势已经成为历史再去考虑），并能使工作方法适应于新的形势。从实质上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一种任务，那就是：善于在形势需要时后退几步，以便今后有可能更大规模地开展革命工作。

会上还提到一系列其他缺点：官僚主义、不善于吸收新党员、缺乏革命的战斗力的等等。关于所有这一切都提到过，但是我不曾发现有人作了什么努力来克服这些缺点。不仅如此，会上也不曾指出，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应沿什么方面开展工作。我们应当弄清，所有这些错误是否产生于某一个共同的根源。而且只有找

到这个根源，我们才有可能判明应怎样进行工作来克服这些缺点。

我们认为，为了在出现缺点的一切工作方面都获得积极成果，必须在以下 3 个基本方面开展工作：

(1) 务必加强我们各个党的党内政治生活。

(2) 必须扩大我们各个党和整个共产国际的党内民主。

(3) 应当明确地提出建立各个党的领导中心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问题。

这 3 个问题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统一的问题，那就是在真正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组织的问题。

我们不时谈论我们的运动思想水平不高。但是，同志们，难道不采取广泛讨论各国共产党都关心的所有问题的方针，不采取结合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讨论这些问题的方针，就能够提高思想水平吗？怎样反对“官僚化”，怎样吸收新党员，怎样使我们的基层支部活跃起来？若干年以来组织部一直在探讨的就是这些问题。组织部取得了某些经验，也拟定了若干一般性的规定，但是必须承认，这个部的成绩不大。缺点仍然存在，而且在某些场合，尽管我们的组织部做了工作，这些缺点甚至愈益严重。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转向另一个立足点，才能取得成绩。

我肯定地说，吸收新党员的任务、进一步活跃我们的基层支部的政治生活的任务、清除“官僚化”的任务，所有这一切都是同一个问题，即我们各个党的内部生活问题的不同侧面，只有在扩大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才能解决这些任务。

当一个工人离开车床来到我们基层支部工作的时候，这个基层支部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把共产党组织日常工作中的具体事务托

付给他。应当使这个工人感觉到，从今以后他就是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有关工人阶级的所有问题在这里都能获得解决。他应当积极参加制订政治路线的工作，即整个工人阶级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斗争的路线。总之，提高我们各个党的革命力量和战斗精神的问题是同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谈一谈有关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予以更大的关注。把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我们各个党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同它们现在的组成相比较，我们就会确信，从那时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保存了下来。只有少数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保持不动，其中包括意大利党的中央委员会，它的组成到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仍然和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一样。这个中央委员会在这段时期内既反对了右的倾向，也反对了极“左”的倾向。它清除了这两种倾向，同时又保持自己完整无损，把党开展斗争所需要的所有力量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最近两年以来我们有时也不得不采取组织措施，在采取组织措施时我们并未犹豫不决。不过，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基层，这类组织措施和整个党内斗争都是遵循一定的政治路线公开进行的。如果说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党内生活的经验中有什么可以成为共同财富的东西，那么就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是在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公开的政治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至于说到我们在建立我们各个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方面的活动，那么，作为口号我们可以借用哥德临死前最后说的话：“多一点光明吧！”无论如何要避免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所以我们才认为，在党内各种思潮进行政治斗争中转而采取组织措施时，必须

持特别谨慎的态度。表现为某种组织措施的一些斗争形式，如果使用得不够审慎，就会具有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性，就会不听从我们的意志而发挥作用。这类斗争方法可能形成自己的内部逻辑，并且也同样不顾及我们的意志而常常导致我们各个党的领导力量瓦解，甚至使其变为一盘散沙。不能闭眼不看这样一个事实，即类似现象在我们的某些支部目前是存在的。对这一点必须予以重视，现在防止酿成过于严重的后果还为时不晚，应立即着手反对这种危险。

具体地说，我们代表团可以谈谈我们对于法国党和德国党中央领导机构问题的意见。关于法国党，我们认为，已经应当公开提出和解决在一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和单一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即建立能够坚定领导全党实现这条路线的中央委员会的问题。至于德国，我们表示同意这样一种主张，即德国共产党的最大危险来自右方，德国党的中央应当集中自己的力量同右的倾向和党内残存的社会民主党思想进行斗争。但是，对于德国党的政治局内部存在的不同思潮问题，我们认为，对各种问题的不同意见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可以正常存在，而且绝不是必不可免地要导致派别斗争。如果德国党在这些分歧意见的基础上发生了派别斗争，或者政治局的多数派对少数人采用组织措施，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意味着党的领导机构的基础受到削弱，并使党的政治生活和党内民主受到限制。德国同志们面临的任务在于，在统一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为使全党彻底理解这条政治路线而斗争，以及在这条政治路线的基础上实现党所需要的所有领导力量的团结统一。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应当在什么样的标志下进行工作

呢？我一面注视着讨论的进行，一面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我必须指出，尽管各国同志们的发言反映出我们内在软弱的迹象，但这次讨论仍然证明，我们的工作、组织活动和斗争都取得了国际性的经验。这个经验是我们取得的，是工人阶级中优秀分子的经验。我们一致同意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应当在同战争危险作斗争、同社会民主党和欧洲的右倾危险作坚决斗争的标志下进行工作。但是，为了扩大和发展已经取得的经验，为了把这些经验变成为我们充满统一和彻底性的整个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基础，我们的代表大会也应当在进一步开展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进行工作。要多研究！要学会更好地、更全面地掌握事态，要更好地认识和纠正自己本身的错误。这些品质在目前远不是次要的东西。获得这些品质就是共产国际、它的中央领导机构和所有支部面临的任务。我们如果想要把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推向前进，把革命推向前进，我们必须顺利地解决这项任务。

贝内特（英国）：

我想谁也不会在这里指责美国同志们，说他们在本次代表大会期间一言不发。我想美国同志们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即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正是共产国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个人认为，只有一个情况能说明这一前提，那就是我们都相信：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是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相互关系中最重要因素。但是，正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因素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我以为本次代表大会必须对英美这两个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加以分析。希望美国同志允许我从英国谈起。

英国代表团对于布哈林同志提纲的总的意见已由墨菲同志作了表述。尽管谁也不会否认存在“第三时期”，即提纲中谈到的技

术急剧发展和资本主义加速改组的时期，但我们仍有责任强调指出当前时期的所有矛盾，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帝国主义世界和殖民地世界之间的矛盾，也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而且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日益激化并从而为各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任务。因此，我们才坚持认为，在提纲中必须提到英国帝国主义的衰退。

我们要十分明确地指出，不仅在场的英国代表，而且还有英国党的所有领导工作人员，都不同意瓦尔加同志对英国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成就和前景所作的评价。我们认为，事实，无法否认的事实，批驳了关于英国开创了新时代、关于出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切理论。不过还是有一个部门，一个颇为重要的部门，在实现美国化方面取得了某些成就。我指的并不是所谓工业的“新部门”。我们始终认为，“新”工业部门的相对繁荣并不能补偿基本工业部门的衰退。

实现美国化有相对进展的部门是工人运动本身。很值得注意的是，正当蒙德无法在资本家中给自己的英国工业合理化计划找到追随者的时候，他在英国工党和英国工会首领中找到了英国工人运动美国化的支持者。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国际关系这个领域。谁都知道，所谓帝国工人联合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工人联合会政策的反映。固然，前者具有更大的美化作用、粉饰作用，但终究是工党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反映。但是英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并不局限于为英国帝国作些简单的表演。可以举工党的帝国主义分子在印度的活动为例。这些活动值得我们极其认真地加以注意。例如，在不久前萨克拉特

瓦拉同约希的争论中曾经有人宣称：

“英国某些熟悉工人运动的人提出了一项十分明确的报告，认为：如果工党右翼和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官员能把印度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到自己手里，他们就一定能制止颇有威胁的印度革命活动，为英国帝国主义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

柏塞尔和戈尔斯沃兹在印度的活动证实，这项报告确实有过。英国职工大会的首领同印度工会代表会首领达成的协议具有真正重大的意义。我只从今年2月26日签订的这项秘密协议中向大家举出两条。其一是：

“决定今后英国工联代表大会总理事会将作为全印度工会代表大会在英国的直接代表。该总理事会决定对印度提高工人福利联盟给予全印度工会代表大会的支持表示自己的谢意。”

这项决议案的意义何在呢？十分简单。工联代表大会总理事会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印度提高工人福利联盟是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组织。这是第一项决议。

第二项决议宣布，英国总理事会应派出自己的组织者前去协助印度工会的“贫困的”工作人员。在柏塞尔和戈尔斯沃兹向总理事会所作的总结报告的第43页上，我们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的意见是，我们必须在加强英国工会运动与印度工会运动的联合方面迈出果敢的步代，以便进行持久而有系统的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独立工党（这个党的主席马克思通先生曾和其他中派主义组织一起签署过促进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宣言，并同库克一起反对过蒙德主义）向“贫困的”非工会工作人员派出自己的顾问，以便帮助他们在以卡达利为首的工会中开展工作，而这

个卡达利在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支持下正在公开反对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

在这里我想就南非讲几句话。我认为邓恩同志把南非党代表贝津同志的发言称之为社会民主党式的发言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还应当作一点补充。贝津同志宣称，在最近六年内他们除通告以外，没有从共产国际得到任何东西。这不是事实。去年就向他们发去一个很好的决议，是在来自南非的一位同志的帮助下拟定的，提出了在对当地人进行工作问题上的新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贝津同志反对这项决议倒是事实。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和他相一致也是事实。不过这并不说明决议不好。尽管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反对这项新决议，以及因而这项决议只得到部分贯彻，即使如此，这项决议仍然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

现在，同志们，请允许我谈一谈英国本身的情况，或者说谈一谈工党和工联代表大会首领们的“美国式”的国内政策。只有孩子才会相信，所谓蒙德代表会议建立的机构会是自愿的仲裁委员会。这个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定的真实意义在于，对于旨在反对某些罢工形式——政治罢工、声援性罢工——的工会法提出补充，其目的是取消作为工人阶级斗争武器的罢工。蒙德所耍的花招意义即在于此。蒙德代表会议所达成的所有协议意义即在于此。

当然，有人会说：英国工党首领在印度的活动和蒙德代表会议的活动证明，这些首领们的“美国化”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要解释蒙德主义在英国取得胜利的原因并不困难。那些曾经策划破坏总罢工和造成煤矿工人失败的首领们自然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以便对在他们促成的罢工失败之后随之而来的消沉情绪

加以利用。这里我还要谈谈我们自己的事情，即共产党本身的问题。应当承认，共产党并未做好实现必要的转变的充分准备，没有准备好适应新的形势，并在煤矿工人失败后的一段时期巧妙地进行反对改良主义者的斗争。正因为如此，同志们，我们才把新的策略，即第九次全会通过的策略，看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看作为反对改良主义者的必要的武器。不过，坦白地说，我们应当说明，现在要谈论采用这个新策略的效果还为时过早。我们还没有条件在实践中运用这个策略，而要这样做也并不容易。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列举以下几个论据：

1. 要实际运用这个新的策略，我们整个党的指导方针必须有一个转变。而这种转变不是在一小时或一天内能够实现的。

2. 决议本身在比较次要的问题上，如在是否应拒绝参加工党的口号问题上，在是否应当实行扣款捐献于政治目的问题上，造成了某些不明确之处。

3. 在决议中丝毫没有谈到随着大选临近必将日益增多的大量补选活动；因为英国形成了一种传统，就是在临近大选的最后几个月内，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总是加紧授予数量众多的种种荣誉称号和提升官职，以便充实该党的金库，供即将来临的选举之用和在官员中加强自己的地位。由于所有这种种花招^①，就出现了大量的补选活动。在决议中丝毫也没有谈到有关补选的策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能在30—40次补选中经受检验的策略，那么，我们在大选运动中就未必会形成这样的策略。

① 例如指定众议院议员为参议院议员。——原编者注

尽管存在上面列举的各种事实，我还是要声明：英国的消沉时期即将结束，而且我们能够预见到工人即将觉醒，那时我们的地位将得到加强，我们一定能够正确地和顺利地贯彻执行我们新的策略路线。试以库克和马克思通的事件，或者以总理事会内部在蒙德主义问题上的分裂为例。所有这一切都是新的转变的明确无疑的征候，都证明萧条时期即将结束。

可惜的是我必须在此宣布，在开始阶段我们对待库克—马克思通事件的政策并不很成功。我还要说，我们在宣传运动期间也犯了某些错误。本来应当通过批评马克思通、希克斯等人来推动运动，而我们却认为应当通过对库克和马克思通进行领导来推动运动。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仍然不应怀疑，就我们党本身来说，它自上到下都接受了新的策略路线，并且力图加以贯彻。

同志们，现在谈谈印度。首先我要强调说明，尽管柏塞尔和戈尔斯沃兹签署了上述秘密协议，但我们亲眼看到，在这之后印度随即出现了强大的运动，这一场运动不仅反对英国帝国主义，不仅反对印度资产阶级，而且也反对改良主义者。我听说，我们的印度代表团正在就此准备相应的建议。不过我想指出，虽然改良主义者在实现英国工人运动“美国化”方面看来取得了某些效果，但是如果对这种成就估计过高则是极大的错误。与此同时，对于我们在英国内部和殖民地所拥有的巨大可能性估计不足也是错误的。蒙德主义加深了群众同官僚机构之间的鸿沟，而工党的帝国主义花招则使英国共产党人同印度无产阶级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现在谈谈美国。那里形势怎样呢？当福斯特同志和其他人说到迫切需要强化我们对右倾现象的斗争，迫切需要在我们的策略上实行彻底的转变时，我们都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当福斯

特同志在这里确认群众中出现某些革命化现象并说这对我们把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时，我们还是说：完全同意。但是，当福斯特同志宣称美国经济处于危机状态时，我们则要说福斯特同志不完全正确，因为当前的萧条现象无论如何也不是美国经济衰退的前兆。不过，即使在福斯特同志的这个断言中也还是存在一点真理，那就是目前阶段孕育着开展真正的阶级斗争的巨大可能性。只有孩子才无法理解这一点。

只要研究一下美国的全貌，大家就会看到那里具备共产党开展各方面工作的肥沃土壤。但是，虽然我们同意福斯特同志在这里发表的许多思想，不过当他把自己的论点变成为自己本派别的纲领时，我们要声明：在这里我们是有分歧的。共产国际曾经通过一项决议（我认为，必要时应当再次重复并强调这项决议，指出在美国党内继续进行派别斗争就意味着使党内斗争蜕化为宗派斗争。有的同志提出某些建议（这些建议我们可能全部接受，也可能部分接受），这是一回事。一旦这些建议具有了派别纲领的性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高喊危险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不再相信这些建议是真心实意提出来的，是实事求是的。任何斗争，只要带有派别斗争的性质，它就不再是反对右倾现象的斗争，而变成为反对党和党的成就的斗争了。（鼓掌。）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

另一方面，我必须极其明确地表示，当多数派的同志们就群众的革命化，就美国的经济形势提出这么多附加条件，当他们把情况描绘成会使工人产生必须同现有条件妥协甚至无法期望美国会出现强大的工人运动的思想时，他们正好给运动帮了倒忙。美国的局势正处于剧烈变动的过程之中。已经发生的变化极其重要，

十分深刻，不能不对这些变化作出判断，并从中得出必要的政治结论和策略结论。不过这些政治结论和策略结论应能使全党团结在这样一种纲领的基础上，即不仅要最坚决地反对右倾，而且也要反对挑动派别情绪的任何企图。当前条件下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党，团结党。在这里提到的许多错误并不仅仅是某一个集团的错误，而是全党的错误。请允许我举出其中的一些例子。就说潘肯事件吧。福斯特想躲到共产国际代表身后藏起来，但国际代表不可能知道雅科布·潘肯是何许人。如果他知道支持潘肯就相当于在英国支持托马斯，在德国支持谢德曼，在法国支持保罗·邦古，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赞同这种“狡黠”的手法。第二点涉及那封著名的给社会党的公开信。我希望在这一点上丝毫不要推给共产国际代表。这是两个集团的共同错误。

最后一点，最大最重要的问题是黑人工作问题。就算某几个黑人同志在批评美国党时用语过于激烈，但基本上他们是正确的。无论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都完全忽视了这一部分工作。黑人工作未能很好开展，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必须在黑人工作中实现彻底的转变。不久前就这个问题草拟过一个新的决议，但在这项决议中也把主要的东西忽略了。美国党如果不首先清除自己党内的白人沙文主义，它就不可能在黑人中开展任何工作。（鼓掌。）否认或隐瞒这个事实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多次指出，只要英国同志在殖民地工作，特别是印度的工作方面不作出重大改变，他们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的。更为正确的是，只要美国党不坚决改变自己在黑人工作方面的策略，它就不可能有所发展。

美国党内的两个集团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呢？我以为是存在的。其中许多分歧具有深刻的根源，但其性质并不足以证明必然要出

现派别。我坚信美国党应当改变自己的策略。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只要党还没有牢固地领会到必须清除这两个派别并像一个团结一致的党组织那样共同工作，党就不可能前进。

米科洛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提交代表大会的关于共产国际状况和任务的提纲的基本特点是包罗一切。这个提纲包括了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不仅对经济形势和国际关系进行了统一的分析，而且分析了各个党的状况，同时还广泛地涉及各个大陆的所有重要国家。提纲的意义十分重大，不是仅仅偏重于欧洲，不是仅仅偏重于美国，也不是仅仅偏重于“白人”。就这一点而言，提纲进一步摆脱了还是从第二国际沿袭下来的旧的欧洲主义的传统。既然在提纲中为埃及、小亚细亚及印度尼西亚各国规定了特殊的任务，也许继续这样做下去是有益的。不过这个问题不是原则问题。

我们各国党正在同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决裂，而且这个过程还在不断深化。在这方面，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意义。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各个党内社会民主党的传统还很严重。提纲在第 42 段中提到我们各个党工作的重大缺点时指出，其中之一是农民工作和被压迫少数民族工作不够，这是正确的。提纲也同时专门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党在这方面对民族问题重视不够，而整个说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因“红色节”活动失败而经历的危机要求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的许许多多方面大力加以注意和重新进行审查，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的工作。鉴于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提出的备忘录，共产国际已经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的工作进行研究，并指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我还认为，美国黑人同志们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证明，美国共产党对黑人问题重视不够。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甚至连对于黑人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问题，即黑人运动的“种族”性质问题，美国共产党竟没有一个代表在这里谈到，这个问题应当在做殖民地问题报告时列入议程专门进行讨论。但是，现在进行一般性讨论时就应当提出，这种“种族”观点是根本不正确的，这种观点会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对于黑人问题的观点，从研究社会特征转向研究人类学的特征。这样做应当遇到美国共产党的强烈抵制和批评。

可惜由于时间不够我不能谈这个问题。现在我只谈一个问题，即乌克兰问题，如果来得及也谈谈波兰问题。（喊声：“请谈谈，请谈谈。”）看来，共产国际从已经公布的文件中知道了西乌克兰共产党内发生的事件。这个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起先支持苏维埃乌克兰共产党里的民族主义倾向，然后即转而执行明显的民族主义路线，最后竟自己置身于共产国际之外，成了实际上支持毕苏斯基政权的叛徒。

其他党的同志们可能要问，共产国际为什么要把注意力用于中欧一小块土地上的一个不大的共产党的一小批首领身上。同志们，应当承认，对于在那里发生的事件的意义不应以面积大小及该组织成员多少来衡量，而应根据这个组织和这些事件对整个共产国际和整个国际运动的客观意义来加以衡量。

应当承认，在毕苏斯基法西斯统治下，波兰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它是世界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打击的直接工具。波兰境内存在着一些英、法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为了从那里打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予以十分关注的基本力量。而西乌克兰的领土则

是帝国主义今后进攻苏联的主要地区，是必经之门户，苏维埃乌克兰的领土更是首当其冲。苏维埃乌克兰已经多次被世界帝国主义当作向红色共和国心脏莫斯科发起进攻的跳板。1918年德国帝国主义的进攻、1919年俄国邓尼金反革命势力的进攻、1920年毕苏斯基向基辅的进攻，这一切都说明在最近的将来帝国主义将沿着哪一条路线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对于毕苏斯基法西斯政府说来，特别重要的是要保证自己后方的安全。目前波兰军队中有数量众多的西乌克兰人。要率领他们向苏维埃乌克兰进攻以反对苏联，除非波兰法西斯政府能够设法欺骗和毒害西乌克兰的劳动群众。现在，西乌克兰的民主主义政党，首先是乌克兰民族民主联盟，正在从事这桩诽谤、污蔑苏维埃乌克兰（首先针对我们在乌克兰实行的民族政策路线问题）的肮脏卑鄙的活动，推行这种肮脏卑鄙的背叛政策。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阶层已和法西斯政府勾结在一起策划进攻苏维埃乌克兰。但是，只有以前曾在共产党旗帜下进行过工作的叛变分子和叛徒集团把欺骗群众和使他们疏远苏维埃乌克兰的叛卖任务承担起来，广大劳动群众、工人阶级、贫农和中农才有可能受蒙骗。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原先担任领导的多数派客观上恰好起着这样的作用。这不是个别集团的简单的叛变而已。我们面临的这种现象可能对于世界帝国主义通过波兰和通过西乌克兰来进攻苏联，进攻苏维埃乌克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得不予以特别的关注，并提请大家，亲爱的同志们，认真注视这个在西乌克兰境内发生的看来似乎并不大的事件。我们看到，健康的共产主义运动、西乌克兰的工人阶级，已经克服了这次背叛的后果。恐怕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即眼看有人将发动进攻，在西乌克兰

这样的地方，却发生了共产党领导机关多数人叛变的事。西乌克兰工人阶级的健康力量迅速肃清了这次叛变造成的致命后果。我可以告诉大家，不久前召开的西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确认，拥护共产国际的组织已经完全恢复，并查明只有人数不多的两三个集团仍然留在已同法西斯勾结的瓦西里基夫集团的叛徒旗帜之下。

我们面临的问题，西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和波兰共产党面临的问题，也即我们曾经向共产国际提出的问题，是这次叛变的原因、根源问题。我们应当说明，在我们解释清楚这次叛变的原因和根源之前，我们不可能清除党的领导机构这次叛变所造成的全部后果。这个问题是长期辩论、长期讨论的焦点。这个问题我们曾向共产国际提出，共产国际也多次讨论过。我不能不十分惋惜地表示，波兰共产党中央少数派的代表连斯基同志在这里发言时把这些问题上原来的分歧一次又一次地搬了出来。连斯基同志宣称，他谴责波兰党多数派在西乌克兰问题上的错误立场。

不过，波兰党少数派的同志们，请允许我说一句，你们对于西乌克兰问题的立场不正是共产国际讨论的中心吗？去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开会期间，关于西乌克兰共产党原领导人叛变的原因和根源问题有两种认识、两种解释。其中一种是波兰党少数派提出的，另一种是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代表团和波兰党中央多数派提出的。（主席摇铃。喊声：“讲下去。”），我早就要求发言，但在限定时间以后才让我发言。（鼓掌。喊声：“讲下去！”）由于我既要代表苏维埃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发言，又要代表西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团发言，因此我请求延长我的发言时间。（鼓掌。）我们说过，叛变的原因在于1926年毕苏斯基五月政变以后波兰的阶

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即波兰的整个资产阶级（包括各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波兰的、乌克兰的、犹太的）团结了起来，从而引起了西乌克兰阶级关系的变动。这对于共产党内的个别不坚定分子产生了影响。叛变的原因在于波兰阶级关系的变化，而这就导致了西乌克兰共产党内部某些分子在当前的新条件下分离了出去。这个解释业经共产国际于 1926 年 8 月通过，并于 1927 年 12 月重申，而 1928 年 1 月，即已在瓦西里基夫和他的小集团叛变以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一次重新确认这个观点。

波兰党少数派的代表又是怎样解释的呢？他们说，瓦西里基夫集团的叛变并不是客观社会政治条件变化的结果，而是由于新的条件才使得西乌克兰党中央原领导机构一直存在着的民族主义叛变本质得以暴露出来。波兰党少数派的同志们，你们的建议，你们的解释，并没有被共产国际接受。那么，你们现在为什么要来到代表大会的这个讲台上说话，为了共产国际通过的解释而谴责波兰党中央的多数派呢？而这样做，你们事实上是在抨击共产国际接连确认了三次的决定。波兰党的少数派不是以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去进行客观的解释，而是在寻找一种主观的解释，怀疑并诬陷西乌克兰共产党过去的活动是民族主义。

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多年来，在波兰党中央（并有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中央的参与）领导下，在共产国际领导下，执行了正确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路线。而且，虽然瓦西里基夫和另一些人是 1919—1920 年期间从民族主义的乌克兰资产阶级阵营转到我们方面来的，虽然他们毫无疑问犯过个别的，有时甚至重大的错误，但是整个说来，在毕苏斯基 1926 年政变以前，这个集团在共产国际领导下所走的方向是对的，做了很好的工作。把所有

这些工作说成是始终只不过用共产主义词句作掩护的民族主义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样做就意味着打击整个西乌克兰共产党，而这个党曾极其迅速地克服了自己原领导集团叛变所造成的后果，表明它本质上是健康的。但是，当阶级力量发生变化时，瓦西里基夫和其他一些人以前的民族主义思想就反映了出来，那时，他们在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便开始转向民族主义倾向的立场，一直坚持这种倾向并对抗共产国际，直到滑入叛变的深渊。

情况就是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先后三次接受了这种解释。而波兰党中央的少数派却提出另一种解释，他们说，西乌克兰共产党原先的领导集团总的说来从本质上就没有能力在民族问题上执行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总的说来“从本质上没有能力的理论”对波兰党中央的少数派起着重大的作用。确实如此，试以波兰内部的关系为例。现在的斗争应作何解释呢？是因为多数派以前的错误，以前的右倾吗？这是有过的。但是，难道少数派没有犯过“左”倾，甚至极“左”的倾向吗？连斯基同志提到了瓦尔斯基同志 1923 年所犯的托派性质的错误，他当时是不同意的。你们为什么如此片面？你们为什么不提及当时你们原先的同伙多姆斯基的错误？当 1920 年苏军打退毕苏斯基对基辅的进攻并为解放波兰而进军华沙城下时，多姆斯基发表抗议，声称这是来自莫斯科的“赤色帝国主义”。连斯基同志当时并未和多姆斯基划清界限啊。你们究竟为什么要提起过去的过失呢？人们是逐步掌握列宁主义观点的，也是通过错误锻炼领导机构的。瓦尔斯基原先的错误和连斯基原先的错误都不值得再提，它们已经相互抵销了。而在毕苏斯基五月政变期间也不只是某一方犯有错误。1926 年 5 月毕苏斯基发动政变时，波兰党中央的多数派和少数派都同样犯有

错误。当去年共产国际根据这些分歧对错误进行分析时，共产国际最后要求波兰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这样就消除了波兰党中央内部的政治分歧。连斯基当时宣布自己同意共产国际和联共提出的决议案，而这项决议就曾指出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不存在原则性的政治分歧。但是他当即又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原则性分歧意见——关于从本质上说没有能力的理论。连斯基同志已不是第一年提出这个理论，他以这种理论为基础形成自己的派别，并据此认为瓦尔斯基、库斯特齐瓦等所谓多数派的代表，照他看来，从本质上说就没有能力采取列宁主义的立场。证据是不需要的，连斯基也不提出证据。这就是他的出发点。但是请问：连斯基同志的这个观点在波兰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是否列入了讨论的日程呢？列入了。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是否讨论了呢？讨论了。是的，这个观点在会上进行了讨论，并为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所否决。大会在原则路线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既然没有原则分歧，那么就可以（这样做也是正确的）推选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根据力量对比大体上各占一半。不过，虽然所有的分歧都已消除，仍然还剩下一个分歧，那就是连斯基同志关于瓦尔斯基和库斯特齐瓦集团从本质上说没有能力采取列宁主义立场的理论。于是，连斯基同志就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在这个唯一的原则分歧的基础上组成了自己的派别，并进行了一年的斗争。

为什么要死抱住已被否定的分歧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斗争呢？

要知道除了这一点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其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其余一切都是次要问题。但是，既然连斯基同志想要在这种所谓西乌克兰共产党从本质上说没有能力采取列宁主义路线，瓦尔斯基从本质上说没有能力采取列宁主义路线，等等的理

论的基础上组成一个派别和党，那么我就产生一个问题：连斯基同志从本质上说有没有能力到某一个时间放弃自己的本质无能理论呢？

当然，在波兰党内存在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解散华沙委员会和共青团常务局等。但是，当看着波兰党少数派首领在讲台上发言并且宣称不容许破坏中央委员会的党纪时，我曾极其认真地倾听，竟发现连斯基有一项绝大的发明，他竟把列宁主义的整个组织学说完全首尾倒置。他发明并且认为，如果中央委员会不服从自己的各个部门，那这就是不可容忍的破坏党纪！你瞧！他在说不能容忍破坏纪律，说中央正在反对各个部。可是，如果少数派的代表置身于中央委员会的各个部而又不服从中央委员会，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对这些部稍稍动用一下纪律这个武器。连斯基同志在这里发言批评主席团关于华沙委员会的决议，并且想利用这一点来反对多数派，使自己从中得到好处。不过他忘记了一点，那就是必须承认，共产国际现在看到，在目前条件下根本谈不到继续采用对等原则。（鼓掌。）这是在共产国际必须提出来的主要之点，在代表大会结束之前，必须对此作出果敢的决策。虽然从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以来不存在原则分歧，但连斯基的本质无能理论仍然在起作用，必须加以清除。我坚信，共产国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波兰问题进行研究以后，能够最后解决这件事，彻底废弃这种不可容忍的方法，平息这场纷争，帮助波兰党真正团结起来，建立起坚强的、团结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应能在当前同帝国主义搏斗的重要时刻完成自己的任务，领导波兰无产阶级为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为建立苏维埃政权，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

雷曼（捷克斯洛伐克）：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问题，许多发言者在这里都已谈到。我也是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谈。首先我想分析一下存在于两部分同志之间的分歧。一方面，许多反对派的同志不完全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党迄今为止所执行的路线；另一方面，一些同志就是在“红色节”活动失败以后仍然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红色节”失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队伍中引起了争论。这一场争论的实质何在呢？问题的实质在于，一个遭受了如此重大损失而又不能在决定性的时刻迎击反动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否拥有一条完全正确的路线？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必须清楚明确地声明：捷克斯洛伐克党在“红色节”期间的失败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党的路线并不是明确的布尔什维主义路线。关于“红色节”的争论，首先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中央委员会就此通过了一项决议，主要说明“红色节”的失败同党的总的错误和缺点有关，但是指出这些缺点还不能正确解释失败的原因。伊列克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列举了与“红色节”有关的所有个别错误。但是，照我看来，问题的提法不应当这样，而应当是：发动“红色节”活动期间所发生的全部个别错误是否就足以解释党遭受如此重大损失的原因呢。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会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即“红色节”遭到失败的真正原因要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整个路线中去探寻。我手头掌握有若干证据，足以说明现在，在“红色节”以后，党内是怎样解释这些问题的。党的某些机关现在把事情说成似乎“红色节”根本就不是什么失败。《斯洛伐克》杂志写道，这一天走上布拉格街头的有10万工人。这10万工人究竟在哪里呢？至少在布拉格街头

并不曾有过这么多人。这种说法反映了一种企图抹煞党的失误，不愿意从事物的实际情况出发得出相应结论的倾向。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另一个根源就在于有人企图抹煞失败这个事实本身。也存在另外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我想从《红色权利报》所阐述的新理论中摘引几句。这家报纸写道：“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内，决定并举行任何发动都是有广泛基础的。这就是说一切都是广泛的集体性决定，是广泛的集体行动。因此，如果党犯了某些错误的话，那责任一向在于整个无产阶级集体。”

同志们，这是一种什么倾向呢？这种倾向是企图把党的领导机构失败的后果推到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身上，推到所有党员群众身上，他们当然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应当绝对肯定地说，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结局如此悲惨，整个责任应由党的领导机构来负，而不应由党员群众来负。

为了说明有些人把党的路线作了多么“精辟”的论证，只要扼要举出伊列克同志在发言中关于经济的分析就够了。他是怎样谈论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形势的呢？捷克斯洛伐克目前正处于有利的形势，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但是，要分析经济发展趋势，简单地认定捷克斯洛伐克形势有利是完全不够的。至于几周之前召开的党代表会议所作的分析也仅仅限于确认这一事实，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更是站不住脚的。

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发展的趋势究竟怎样呢？是和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完全一样的。我们看到的是垄断化、托拉斯化、合理化。所有这些现象在较小的国家里也同样存在。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迅速发展给这个国家提出的市场问题比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要尖锐得多。例如，英国已规定对从捷克斯洛伐克输入

的食糖征收关税。这样一来，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面临着销售市场大大缩小的前景，结果自然造成一片慌乱。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所引起的所有矛盾，将来在捷克斯洛伐克要比其他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尖锐。这种情况一方面自然会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增加对帝国主义大国的依赖，另一方面将使战争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更加紧迫。

同志们，对所有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十分清楚的认识，必须仔细地分析这个国家经济的主要事实，而不能仅仅局限于空谈大好形势。

请允许我现在谈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系列实际政策。如果我们判定战争危险对党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那么党就应当把准备迎接未来的重大事变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正确指出，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合法主义的倾向还很严重，它一方面不善于为秘密活动准备土壤，另一方面它也不善于以必需的毅力捍卫自己的合法地位，为扩大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虽然党在这方面不时采取某种措施，但是仍然不能认为合法性问题曾经成为某一次群众发动的基础，或者曾同其他的局部性发动结合在一起过。没有根据说党正在使工人阶级注意这个问题，没有根据说党正在创造条件使工人阶级认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而这个问题又是同党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以及同反对战争威胁的需要联系在一起。

合法主义是党继续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之一。我敢断言，党对这一危险的认识不够清楚。

还存在着一系列别的机会主义倾向，由于时间不够，我不可能详细阐述。在这里我只提出党对工会问题态度这一点。

众所周知，捷克斯洛伐克开展红色工会运动的工作条件是很不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红色工会运动是以一种联合工会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这样的联合工会完全剥夺了群众发挥自己主动性的可能。同志们，这种情况影响了红色工会迄今为止进行的整个实际斗争。在大多数场合，开展斗争时统一战线是从上层，即在红色工会领袖和改良主义工会领袖之间建立起来的，而群众本身实际上没有被动员起来，没有参加到斗争中去，因为红色工会运动的组织原则迄今为止一直是发动群众和深入群众的障碍。

除此之外，红色工会还采取了一种完全错误的机会主义方针，这些工会的思想方针不以开展上述群众工作为宗旨。

同志们，到什么时候党才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危险并向群众发出警告的呢？是在我们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重要搏斗，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处于最紧张炽烈的时候，是在一系列战斗因工会上层领导机构的上述机会主义政策而遭受失败的时候。只是在一系列群众运动失败或未能充分广泛开展以后，党内才提出红色工会的问题。而现在，在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已经对红色工会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并且阐明在捷克斯洛伐克必须采取建立企业工会的方针以后，我们看到，正如昨天洛佐夫斯基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改造工会的过程发展依然过于缓慢。

我不可能在这里谈到许多其他问题。在结束发言时我要说一句，如果把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所有这些错误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党内存在严重的右的危险，党所采取的方针包含着一系列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正因为如此，代表大会必须在这方面提出明确的指示。

在捷克斯洛伐克必须把斗争的重点放在反对右的机会主义倾

向方面。主要应当打击机会主义现象，因为这种现象现在甚至在党的领导机构本身也已暴露出来。

同志们，我声明：俄国代表团就捷克斯洛伐克党领导机构本身存在某种机会主义消极情绪而对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提纲所作的补充以及他们指出这个事实的做法，都是完全正确的。

我还可以指出一种情况，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党员群众完全清楚当前的形势，参加共产党的工人群众要求急速改变党的现行方针。几天以前，布拉格干部中的骨干分子要求坚决改变党的方针。就此我还可以补充一点，赖兴贝格州召开的一系列干部代表会议也同样通过决议，要求彻底改变党的方针，主张更新党的领导机构。这些事实说明，如今的党员群众比4年前我们党内进行讨论时已经更加成熟了。

正因为党员群众在思想上更加成熟，我坚信党一定能够更好地接受这一次新的争论，这一场新的讨论，党在自己成员的无产阶级部分的帮助下一定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蒂特尔（德国）：

我打算谈谈德国党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国会选举的结果毫无疑问是共产主义的巨大胜利。这次国会选举表明，在当前局部稳定的形势下德国无产阶级表现了向左转的总趋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闭目不看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工人阶级普遍左倾化，改良主义仍有增长，两者之间的这种矛盾正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和发言中也都指出了这一点。这就是关于改良主义的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改良主义政党，而且也是在改良主义方面最为彻底的、在同资产阶级合作方面比所有其

他党走得更远的政党。它是第二国际的重要支柱。而这个党到目前为止仍然还受到德国工人阶级多数的拥护。这种状况有利于托拉斯资本的加强和保证它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民主在德国成了托拉斯用来直接控制国家的工具。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德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仍然还对这种民主十分向往。资本的集中、企业主联盟势力的不断扩大，都使纯粹工会斗争的范围日益缩小。差不多每一次较大的工会冲突在目前形势下都具有政治意义，并向工人阶级提出了参加实际斗争以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任务。另一方面，托拉斯化使企业主有可能通过提高价格在短时间内把工资的任何提高都完全抵销。在这方面工会官僚也已登台表演，他们的影响着起着保护资本主义免受进一步震撼的作用。工会官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它不致触动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他们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调节器。

共产党应当把改良主义对群众的影响消除干净。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削弱社会民主党，那么一旦出现严重的尖锐革命形势我们也一定能够摧毁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还在以自己的政策在德国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中散布一种幻想，似乎有可能给德意志资本主义共和国注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个党还能用社会民主党官员有可能充实国家机关这种前景来诱惑群众，并让他们相信这就是改革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萌芽。这个党还能利用工会官僚机构和各级国家仲裁机构的活动来散布经济民主主义的幻想。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领袖同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官方政策的拥护者是没有丝毫区别的。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的政策，旨在用激进的词句麻痹不满的群众，把他们引入改良主义影响的轨道。

在对待“左”派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上，我原先犯过错误。这些错误是在如何利用群众利益与左派领袖虚伪激进政策之间的矛盾问题上，以及如何利用改良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问题上。

同志们，这种群众与领袖之间的矛盾却是党顺利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基础。事实是：工人对“左”派领袖的压力愈大，这类“左”派领袖的言词就愈是激进；不过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我们的策略路线也就变得愈加复杂困难。

群众在目前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

台尔曼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说，支持社会民主党的 900 万选票中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的票。（台尔曼在座位上说：“这不对，我没有这样说过。”）黑克尔特同志说过，工会是把在小企业中就业的工人和工人贵族分子联合在一起的组织。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党三星期以前在国会选举后发表的号召书，我们就会看到其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投票支持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这 1 200 万人斗争的统一性。”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对选举存在一种完全矛盾的评价。不过，如果我们想赢得现在还跟着改良主义者走的群众，那么首要的前提是要清楚地、正确无误地分析改良主义拥护者的社会成分和政治成分。

社会民主党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党呢？

它是工人的政党吗？不错，社会民主党就社会成分而言确是把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联合和组织到一起的政党。但是，就其政治性质和政治内容而言，社会民主党是小资产阶级的乃至帝国主义的政党。在对待社会民主党和首先在对待“左派”领袖的政策方面，我们的任务在于用共产主义的观点对之进行批判，从而推动群众前进一步。首先必须通过具体的和日常的斗争向社会民主

党的工人和追随者揭露领导机构的政策同群众当前利益之间的尖锐矛盾，并推动这些群众去实现我们日常的目的和最终的目标。中派主义，“左派”社会民主党，是横在群众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最大障碍。

我们对待中派主义的策略和原则问题早已解决，已有过明确表述，并且制订了实际办法。（有人喊道：“不过你并没有看到！”）我们在斯巴达克同盟时期的政策、我们在哈勒对待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我们在战争期间对待考茨基和哈泽的拥护者的态度，以及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对待托洛茨基主义的原则政策，都说明了这一点。（有人喊道：“回想一下莱比锡代表大会吧。”）中派主义领袖以其激进言词妨碍着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群众明确地辨别方向。他们在改良主义的范围和界限之内推行一种所谓的反对派政策。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正确的日常政策加速拥护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左倾化过程，使工人转向共产主义方面。

因此，我们不应当在思想上站到中派主义的立场上去，而应当自始至终从我们共产主义的原则观点出发，对其进行无情的批判。因为只有击败中派分子，战胜中派主义，我们才能把群众争取到我们方面来。

争取群众的问题是每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关注的中心。统一战线政策是争取群众的手段和革命方法。我们应当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取得对群众的领导权。我们应当表明，我们是在所有一切方面，无论是在工资方面、社会政治问题方面，还是公用事业、文化问题方面，我们都是群众直接的日常要求的最有能力的捍卫者。只有在工会中、在合作社中，以及在所有的群众组织中正确开展工作，这种统一战线政策才能得到运用和贯彻。在这类组织中，我

们的同志应当表明，他们善于根据当前斗争的具体情况为群众争取尽可能有利的实际结果，从而同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进行革命斗争。我们应当针对两派改良主义者在工人阶级内部散布的幻想，阐明我们关于必须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农政府而斗争的观点。我们应当向劳动群众表明，作为工人阶级真正民主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才能够实现。这种原则宣传不应脱离现实政策，而必须以当前形势的具体条件为出发点。

同志们，在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之后，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完全松垮了下来。党的领导机构出现信心不足和动摇的现象。由埃森党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所拟定的党的政治路线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党的领导机构却未能自始至终根据具体的现实情况正确地贯彻这条路线。这个事实最明显地表现为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在选举结束三周之内竟一直保持沉默，直到三周之后才向全党和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提出斗争纲领和可行的当前要求，但是却未能把它们同有效的革命宣传结合起来。遗憾的是，未能利用这个号召来发动广泛的宣传运动以争取群众。选举结束后党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状态。而这恰恰又是在社会民主党采取一系列狡黠手段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任何政治领导，党完全处于束手无策的地步。这种束手无策的状态和缺乏具体指示的情况也反映在党的中央机关报《红旗》上以及无一例外地反映在所有地方出版物上。（有人喊道：“闻所未闻！”）但是，缺乏党的领导（有人喊道：“闻所未闻！”）是机会主义危险的重要源泉之一。（笑声。有人喊道：“你现在讲的是谁编造的？简直闻所未闻！”）

无论我们研究什么问题，我们都能看到党的动摇和软弱无能。

(有人喊道：“是谁参加了图林根五金工人的选举?”) 在苏尔五金工人罢工期间我们曾取得很大的胜利。我们不得不在三条战线作斗争：反对企业主的战线、反对改良主义者的战线和反对托洛茨基拥护者的战线。

鲁尔的矿工曾进行过大规模的经济斗争，但在那里党也同样无所建树。党不去真正组织群众，不去真正地开展革命宣传（这样做可以为这一冲突的政治激化创造前提），而是一再重复同一个刻板的公式：结合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求得运动的扩大和联合。

这里有一些数字。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1926 年和 1928 年选举萨克森（德累斯顿、莱比锡、开姆尼茨、德贝尔恩、弗赖贝格、迈森、普劳恩、茨维考、包岑、克里米乔）五金工人联合代表大会代表时的选票数字。

1926 年	8 645 (反对派)	13 303 (改良主义者)
--------	-------------	----------------

1928 年	11 807 (反对派)	26 092 (改良主义者)
--------	--------------	----------------

莱茵地区—威斯特伐利亚（杜塞尔多夫、埃森、波鸿、赫尔姆、盖尔森基兴、巴门、奥普拉登）的情况是：

1926 年	3 902 (反对派)	3 941 (改良主义者)
--------	-------------	---------------

1928 年	4 417 (反对派) (11%)	5 367 (改良主义者) (14%)
--------	-------------------	---------------------

(有人喊道：“那么图林根的情况如何呢?”) 由于给我发言的时间很短，我不可能详细谈到全部选举结果。如果给我延长时间，我可以谈一谈图林根和其他州的情况。可惜毫无疑问，这些选举结果并不是个别州内的个别现象，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不过这两个例子是很典型的，因为这两个州都举行了五金工人的罢工。这就是说，这两个州里党的积极性最强。我们在苏尔的行动很顺利，打破了改良主义分子和所谓“列宁崩得派”的影响。

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不仅由于缺乏中央的必要政治指示和强制规定，还因为在当前党的工会政策指导下真正的统一战线一开始就必然四分五裂。党员群众的主动精神被官僚机构和党的工作的机械作风以及压制基层一切首创精神的作法破坏殆尽。同志们害怕在超出纯粹地方范围的问题上表现任何主动性，害怕表示自己的思想，害怕这样做他们会受到来自党的官僚机构的迫害。（有人喊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早就不是书记了！”）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常常害怕会被指责为“左”倾或右倾。

这样一来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情况下什么事也不干，党员同志失去党的领导而不得不无所事事。此外，党的活动能力削弱（最近以来）的原因还应该从中央委员会根据德国党和俄国代表团在第九次全会以后的协议的基础上通过的新的党内方针中去探求。九次全会以后党所执行的方针，就执行以来现有的经验看，必将导致党走向孤立的地步。这个方针意味着在统一战线策略方面，在争取工会和在此基础上加强党内集中方面实际上背离“公开信”所提出的并经埃森党代表大会所批准的路线。

我不想详细叙述这类事实。我只不过强调说明我的观点。不过，同志们，我必须表示反对洛佐夫斯基同志发言中的某些内容。洛佐夫斯基援引了图林根州委会的记录。我们讨论过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关于“阿姆斯特丹分子是资本主义的工具，是工贼组织”的提法，特别是“工贼组织”一词，在这里起着重大作用。在这里我并不像洛佐夫斯基同志想要人们相信的那样反对这种评价，相反，我是强调了这种评价。

我可援引州委会一次会议记录中的一段话来作证。我当时在会上说：

在关于我们的国际任务的提纲中，阿姆斯特丹分子被称作为“资本主义的工具”。从客观上说，这是正确的。在英国矿工罢工期间，德国工会领袖不是站在斗争的英国工人一边，而是站在国际矿业资本和帝国主义者一边。工会领袖奉行联合政策，因此，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工具。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重要的不只是说出真理，而最主要的是怎样说出真理。”

可见我说过这是“正确的”。我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洛佐夫斯基同志要说相反的话。在我们的工作中重要的是，在每一个个别场合我们将怎样向工人们解释，阿姆斯特丹分子的组织是工贼组织。

只有采用正确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我们才能够争取到广大群众。我们应当避免我们同企业中广大工人群众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相反，我们的任务在于推动以我们和广大工人群众为一方和以改良主义领袖为另一方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以便一旦工会领袖进行分裂时（而事情正在向这方面发展）广大群众会转到我们这一边来。

我很想从德国工会的实际活动中举几个实例来证实我的话。可惜给我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本来想再谈一谈在讨论中出现的若干重要问题，并且提一下行动纲领和监督生产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和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提出来的。如果它现在被宣布为机会主义的口号，那我服从这项决定。

我只想再说一说党内方针。台尔曼同志说，“德国的右派集团是一种接近于叛党的危险。”洛佐夫斯基同志说，右派同志们同党的联系十分薄弱。（台尔曼从座位上说：“我不是这样说的，我反

对这种说法。”) 如果在这里有人讲了类似的话, 那么在德国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提醒大家注意, 这种评价目前可能给党造成严重的困难。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事情已经到了何种地步。当我所在的那个区选举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时, 一名中央委员发言说: “摆在面前的问题是: 拥护共产国际还是反对共产国际。” (乌布利希从座位上说: “这样说完全正确。”) 这就是说: “谁赞成蒂特尔同志, 谁就是反对共产国际!” 乌布利希同志现在还强调这一点。那样的话, 我要求作出相应的结论!

我不想隐瞒, 在某些问题上——在几十年中做了有效的革命工作的同时——我也犯过错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 也有“左”的错误。我未能自觉改正这些错误, 是党通过说服教育加以改正的。但是, 现在人们反对我是因为在某些策略问题上我持有不同的意见。不过我始终执行埃森党代表大会的路线, 而且今后也将严格服从党的决定。但是最主要的是, 对于我们党内的任何一项切合实际的提议, 特别是当这一类提议出自所谓“右派”之口时, 不要在还没有进行真正认真的讨论之前就给它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 将其否定。采用这种做法就会使党的思想政治生活陷于瘫痪, 而这一点正是党发展党员时吸引力不够和成员流动性大的又一原因。

我绝不是要求对背离党的现行决定的现象采取容忍态度。不过现在的领导机构不容许同志们在探求复杂形势下如何采用更好方法时表示丝毫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危险所在。机会主义的危险是主要的危险, 对这一评价绝不应有任何改变。同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妥协, 对待改良主义采取容忍态度, 这些都是不能容许的。这意味着与党分离。在这方面不允许有丝毫调和折衷。

我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我许多年来 (我强调一句, 几十年

来)一直在无产阶级队伍中进行斗争,也一直坚持这种观点。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我们都在斯巴达克同盟中为反对改良主义而斗争。谁现在断言我们想把改良主义引入共产党,他讲的就不是事实,他就侮辱了同志,因为这些同志的过去证明情况恰恰相反。

我们的领导机构的张皇失措,破坏了党的活动能力,应当通过发扬主动精神,通过自下而上地激励党员群众来加以克服。只有这样,领导机构才会有能力尽快地对新发生的种种问题作出反应。为此,必须根据联共(布)党中央的号召书和斯大林同志的演讲和文章开展必要的自我批评和发扬党内民主。

党内所有健康力量的聚集,党内新老干部的联合和团结,应当通过共同探讨和明确德国工人运动的所有问题来实现。

必须进行一个时期的解释工作。这样做的结果将是:过去所有党员的经验将得到运用,党将在思想上恢复完全的一致,所有派别都将被清除,各种力量将真正聚集起来(这种力量的聚集不是生硬地做到,而是从政治上达到这一点)。与此同时,这种解释工作将会为同真正的机会主义错误作真正的必要的斗争创造条件。德国的战争政策可能造成十分严重的局势。资产阶级将会利用改良主义和采取恐怖手段来对付我们。这对我们说来是一次检验,我们已是第二次经受检验。苏联面临着战争的危险,这种危险日益严重。苏联在世界上唯一的支柱就是各国共产党。巩固各国共产党,促进各党领导机构的团结,在党内创造必要的条件使各国党在决定性的形势下不致一筹莫展,——这就是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任务。为此,就必须像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演说和文章中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开展自我批评。因此,党在思想上必须团结统一,必须拥有坚强的领导机构,必须无情地开展自上而下的

和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吸收所有同志，所有新老干部参加党的工作，在埃森党代表大会路线的基础上不断地聚集力量！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基础上真正把力量聚集起来！（发言一再为高呼声所打断。）

会议休会。

第十五次会议

(1928年7月28日)

主 席：勒麦列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 (继续)

皮佑 (法国)：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应当制订青年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至于实施既定决议的方法，应由青年共产国际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因此，必须让共产国际和所有的共产党都能了解和认真地分析青年共产国际活动的优缺点，以便吸取相应的教训，得出相应的结论。

这里没有人会怀疑，青年共产国际及其所属支部必须极其认真地研究现时的局势并且直接地探索新的工作方法，以便将它的影响扩展到广大青年工人阶层中去。

青年共产国际的一项重大任务是，结束存在于青年共产国际的政治影响与其所属多数支部组织力量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这个问题不是什么新问题。前几年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也曾引起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和青年共产国际历次全会的注意。应当说，迄今为止，收效甚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大

会上，健康的自我批评将有助于克服缺点，促进我们组织的顺利发展。

我们应当分析青年共产国际的有益经验。我想提请各共产党注意青年共产国际最近一年来一般活动中两件极其重要的事。

我指的第一件事是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党和共青团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讲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问题。我不打算详谈这个问题，因为在辩论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方法时还将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闭口不谈青年共产国际的活动也是不可能的。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会之间的时期，各国党为弄清反对军国主义斗争的问题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在许多党内开展了反对那种低估军队中工作的思潮以及某些和平主义思潮的斗争。在美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国的党内，都进行过这种斗争。

青年共产国际曾在各地帮助人们理解反对军国主义斗争的意义，有时还领导了这一斗争。

在谈到反对军国主义斗争的成绩时，不能忘记英国共青团在英国大罢工期间和武装入侵中国期间的经验，不能忘记英国共青团在摩洛哥和叙利亚战争期间的经验及我们的美国同志的经验。

必须提到的是，一些共产党常常不能充分地考虑到，对于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必须从政治上加以领导，而不是单纯地帮助共青团去开展这一斗争。

资产阶级军事机构的改组，要求我们认真地分析社会民主党青年所起的作用，这些青年实质上一直是按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方针确定其立场的。但是，在工人青年队伍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反军国主义精神，迫使各社会民主党不得不谨慎行事。我们应当

时时保持警惕，毫不留情地揭露社会主义青年领袖们的蛊惑性言论。

必须分析青年工人队伍中刚刚露头的和平主义思潮。资产阶级力图依靠其组织把这种思潮纳入一定的轨道。

在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进行不间断的无情的斗争的同时，我们决不能忘记，只有通过工厂、军营、舰船、军训营地和一切有工人青年的地方开展宣传和有力的群众工作，才能消除青年工人中的“和平主义”幻想，把他们引上布尔什维克的反军国主义斗争的道路。

现在讲一讲青年共产国际和党的相互关系。我将以青年共产国际与法国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例，具体地谈一谈这个问题。最近一个时期，青年共产国际开展了坚毅的斗争，反对机会主义的、右倾的思潮。青年共产国际及其所属所有支部在这方面态度明朗，战斗坚决。我们开展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对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残余的斗争手段之一。

1927年，共青团是最早对我们党内的倾向和错误作出反应的一批组织之一。去年11月的“公开信”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共青团的倡议写成的。在整个端正党的路线时期（这种端正路线的工作现在仍在继续，远远没有结束），共青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不准备多谈你们十分熟悉的关于产生种种倾向和错误的来龙去脉。从对这些倾向和错误的分析的结果来看，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是：

1. 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理解不够；
2. 对中央委员会全会决议或全国代表会议规定的任务不甚理解；

3. 对有“合法主义”思想的分子做出了过多的让步。

共青团对端正党的路线所提供的帮助，不仅仅是参加辩论，而且还开展了许多实际工作；参加这种实际工作的不是个别同志，而是整个共青团组织。

参加贯彻旨在端正党的路线的政策，首先是开展解释工作，这对整个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活动，因为不仅在基层，而且在党的骨干中，对党的新策略和新的政治路线都存在着模糊认识。

许勒同志在其报告中谈到我们的共青团在法国举行的选举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新的经验。应当指出，不能仅仅从推举一两个候选人的角度来看待共青团参加选举的问题。这一点并不是根本的。重要的是，整个共青团第一次动员起来在全国宣传共青团的口号，我们利用我们在选举期间获得的一切机会让青年工人看到，共青团是什么样的组织，它的活动具有什么意义。依靠我们掌握的资料和我们向党提供的大批鼓动员，我们在选举期间，在所有的竞选集会上，我们都成功地提出了使青年工人感兴趣的口号，特别是我们的反军国主义的口号。

我们积极地参加了选举和其他形式的活动。我们不是局限于进行批评，而是积极地参加党的工作，注意不让错误和背离党的路线的倾向发展。特别是在基层干部和区的积极分子感到有困难的选区。当选举运动出现错误和混乱时，我们的共青团员同志总是首先作出强烈的反应，以自己的行动表明，青年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作用。

我们在工会运动中的工作也是帮助共产党了解其在工会运动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十分显然，不仅在竞选策略方面，而且在党的一切活动领域，特别是工会运动方面，都存在着端正党的路线

的问题。

还可以讲几句话来说明，法国共青团不是局限于进行批评，而是全面地参加了端正党的路线的活动。在历次中央全会会议上和最近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共青团的代表团就曾对党拟定的决议草案提出过一系列重要的修正意见。我说过，在法国，端正党的路线的工作尚未结束。最近，在这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法国党就将从政治上加强自己的领导，以便在各方面继续贯彻业已开始的端正党的路线的政策。我们也要配合党的实际工作，在各大区所有基层组织开展思想工作。

共青团是党的未来接班人，因此，不能用脱离实际的态度对待共青团干部的形成。必须懂得，只有让共青团员经常参加党的一般工作和活动，我们才能培养出党的新干部。

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共青团内组织了党的核心，现在我们应当扩大这个核心。我们对“党的核心”是怎样理解的呢？我们是不是指在共青团内共事的党员呢？不，我们不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们指的是那些没有退出共青团而又在党的核心机关工作的共青团员，他们正利用共青团的全部经验教训为党工作。我们的大多数支部都要走这条路，我们竭诚希望我们的党员能在这方面帮助共青团。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还有几句话要说一下。我们同意，共青团应当发展和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共青团应当找到适当的方法，使自己首先成为有各种辅助组织为后盾的青年组织。我们认为，共青团应当保持为共产主义青年的组织，继续保持为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我们坚决反对任何解散或取消现在这样的共青团组织，因为它在最近一个时期获得的经验证明了

共青团的重要作用。所有的党都应该帮助我们的组织发展成长。

马哈茂德（印度）：

同志们！印度的青年运动现在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斯是从印度建立“印度青年联合会”和其他类似的组织开始的。直到1925年为止，印度的青年运动始终局限于主要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具有唯心主义思想的学生。这些年轻的唯心主义者迷恋于民族主义的高谈阔论，实际上很少考虑经济纲领，更谈不上与印度的劳动大众结合。对于他们来说，群众只是普通的炮灰，他们想按照民族主义利益来领导这些群众。当然，总有个别的知识分子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来，但是，他们的活动往往只是扔几枚炸弹或者采取某些政治剥夺行为。这就是他们解放印度的全部纲领，他们从未考虑过其他的使祖国获得解放的办法。

由于受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不同英国政府合作）的影响，1920—1922年期间，这些人靠向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和平主义立场，但是，在确信这一运动的错误主张之后，一些激进分子又回到了恐怖主义立场。其中一部分人可能现在仍然附和甘地的哲学，但是，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不断加强，他们正日益脱离甘地的和平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它将印度青年的注意力引向了群众。新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正在青年中间扎根。青年们开始意识到，如同恐怖主义一样，不合作运动的纲领也是无法实现的，他们渐渐地聚集到那些在共产党影响下开展活动的或直接由共产党员组织的革命团体和革命政党的周围。

印度的青年运动始于1905年，当时，学生作为一个统一的团体，为抗议瓜分孟加拉的行为而奋起斗争，主张抵制英国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组织，但所有这些组织不是恐怖主义性质的组织，

就是改良主义的组织。直到所谓布尔什维克阴谋案和关于少数同志活动的案件经过各种各样的审理之后，印度才开始出现真正的共产主义宣传。这种共产主义号召在印度青年中所引起的热烈响应，预示着革命事业的光辉前景。

这个新的青年运动无疑将在保证无产阶级对印度革命的领导权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运动正在缓慢地，然而却是坚定地向前发展着。每天都有新的进展。共产主义一度曾引起人们的怀疑。如今，形势不仅发生了变化，而且不少地方把共产主义当作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而予以欢迎。连那些同共产党观点不一致的人，如左翼自治运动的青年支部，也公开承认，只有通过民族主义者同工人运动的联盟，才能获得独立。印度北方（旁遮普）的共产主义运动通过争取被卷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宗教纠纷的学生的办法，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印度政府十分警觉，当即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来对待这个青年运动，特别是一小批共产党人。他们搜查了共产党人的住房，没收了他们的书刊并逮捕了他们的领导成员。然而，这种镇压不仅没有摧毁青年运动，反而给它输入了新的战斗坚毅精神。

拉合尔的“印度青年联合会”组织是1926年在共产主义小组影响下，由印度北部激进的学生和城市青年建立起来的。这个组织主要是在农村青年和工业部门的青年中开展工作。它正日益巩固并成为集中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正在逐渐向农村和工业企业扩展开去。在不久前席卷印度的罢工浪潮中，这个组织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此外，它还有计划地开展了一项运动，以争取参加工会的青年和那些仍受民族主义者或改良主义者控制的农民组织。

印度无产阶级因为有了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和共产主义小组为主要依靠，于是开始庆祝五一节以表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这在1923年以前的印度是从未有过的事。根据“印度青年联合会”的倡议，5月1日在拉合尔召开了隆重的群众大会，数千名工人参加了这次集会。这次群众大会由共产党员主持，大会通过的决议谴责了印度警察开枪射击罢工者的行为，痛斥了英国在筹划反苏战争中所持的帝国主义立场，表示了对英国工人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声援。

孟买也组织了这种五一节庆祝大会，参加的工人达1万，而且一致通过了决议，其中写道：

“大会向全世界工人致以敬礼并伸出友谊之手。大会认为，只有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一致，无产阶级才能砸烂资本主义锁链，赢得确保其自由生活的条件。大会要求立即批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华盛顿协定，实行最低工资额规定，向失业工人提供国家救济，实行养老金和工伤补助，享受普遍选举权和义务教育，废除童工制度。”

在这次群众大会上，关于俄国革命历史的报告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印度青年运动虽尚未达到欧洲国家那种发展水平，但在促使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的革命化方面确已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要说印度青年运动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缺少一个全印度统一的青年政党，这个青年政党应与青年国际紧密联系，又同英国青年运动保持同样的接触，以便更好地协调行动，共同进行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

格尔维克（波兰）：

说实在的话，我本应当在今天的发言中向大会报告我们在波兰工作的情况。但是，听了波兰同志布兰特以及米科洛斯同志今天在大会所作的两个发言之后，我不得不涉及他们提到的另一些问题，况且这是一些目前对我们党来说很有意义的问题。首先，我要讲一讲与布哈林同志的报告和他提出的提纲有关的，以及与罗明纳兹和洛佐夫斯基两同志的发言有关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看到的那种工人群众左倾化的现象，在我们波兰也有。这种左倾化过程的发展是在工人阶级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的同时出现的。最近两个月来，波兰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白俄罗斯西部爆发了大规模的纺织工人大罢工，许多小型企业发生了罢工事件，不少重要的工业部门爆发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罢工。

在这种情况下，党在工人阶级经济斗争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怎样开展工作和制订怎样的策略路线，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独立性，党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遗憾的是我们犯了德国党犯过的同样错误，犯了曾遭受工会国际严厉批判过的那些错误。

在比亚威斯托克爆发纺织工人大罢工时，罗兹的纺织工业部门也出现了直接罢工的形势。当时，改良主义者企图阻止斗争的爆发，工人们则多次召开大会和群众集会，表示斗争的决心，并借此迫使改良主义者通过决议，承认罢工的必要性，可是，依然未能宣布实行罢工，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罗兹组织的领导人坚持了错误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临时中央内部以及中央工会工作部和罗兹党组织领导人之间，是存在着严重分歧的。工会工作部建议，不要受改良主义者的摆布，要独立地举行罢工。工会工

作部指出，继续推迟罢工将给工会的官僚们以机会，从一开始就把罢工镇压下去。但是，中央委员会中那位属于右倾思潮人物的同志坚持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在罗兹省不掌握领导权，不经过工会领袖们的批准，我们不能举行罢工。甚至在改良主义者虽未确定罢工开始日期，但“原则上”已宣布实行罢工的时候，我们的那位同志及罗兹党组织的领导人仍然坚持上述观点。中央委员会工会工作部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的建议均被斥之为“极左的”和“盲动主义的”东西而拒之于门外。结果，我们白白错过了举行直接罢工的机会。

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工会工作部观点的正确性。直到改良主义者实行叛卖活动之后，在他们签署了工资合同之后，罗兹的一家大工厂——波兹南斯基工厂才爆发了罢工。

这次罢工以同盟歇业，大批解雇工人而告终。为了避免将来重犯类似的错误，波兰委员会（我向它提供了一切必需的材料）应当对罗兹发生的事作出明确的评价。

随着波兰工人阶级积极性的日益提高，党也应该明确地而不是模棱两可地制订自己在经济斗争方面的独立的策略路线。

不言而喻，党的领导层中存在的严重分歧也渗透到了党员群众之中。

同志们！由于时间有限，我应当讲一讲党内的状况了。我们党领导层中的右派集团并没有把党的大多数争取到自己一边去，所以他们就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为了筹划分裂行动，右派分子确实毒化了党内的空气。

我手头有这些同志向波兰共青团发出的一份号召书。这份号

召书是我见到过的最最缺乏理智的一份号召书。它通篇充满诽谤之词，实属闻所未闻。这篇号召书指责波兰共青团领导“采用对付共产主义运动的那种警察手段来反对右派”。号召书就是这样写着的。你们可以想象得出来，这里造了多少谣言。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着共青团的领导来的。而共青团的领导在最近几年来已经使自己的组织成为青年共产国际的优秀支部之一，并且英勇地进行了反对法西斯独裁的斗争。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库斯特齐瓦同志的集团一再企图分裂共青团，却提不出共青团的一个政治错误。来自右派的分裂活动以及在华沙的组织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我们曾竭尽全力，使事态不致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我们提出过一个又一个妥协性建议。但是，一切建议均遭拒绝。对于右派同志们来说，归根结蒂为的是让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面对既成的事实，似乎波兰党内原来的少数派已经彻底消除了。

在原多数派集团搞了上述分裂活动之后，华沙党组织、共青团、东布罗瓦党的相当一部分人，以及许多原先持多数派观点的同志都对这种反党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华沙党组织的700多位党员和全体共青团员通过许多决议；表明了这种态度。在华沙，只有30—40位同志附和库斯特齐瓦同志的分裂主义观点。

我们党内出现了一种严重的局面。对左翼的无情斗争削弱了党的力量，有可能使无产阶级失去对波兰共产党的信任。

库斯特齐瓦和布兰特同志今天在这里找不出一一点理由来为这种在波兰危难之时削弱党的荒诞政策辩护。所以我认为，代表大会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以最坚决的方式谴责这种已成为国际问题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政策，并且立即着手整顿波兰党内的状况。

同志们！共产国际把实行团结的政策的责任交给了中央委员会，可是大多数中央委员没有执行这个政策。这就表明，在我们处于危难的时期，是不能把领导党的责任托付给他们的。

布兰特同志在发言中问，既然右派的路线是错误的，那又怎么能认为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呢？这是不矛盾的。要知道，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我们在合作中发挥出同等作用的结果。例如，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通过的提纲就是少数派提出的，这些提纲至今仍是党的工作的基础。但是，后来党在西乌克兰问题上接受了右派的决议案，于是犯了错误，共产国际不得不出来加以纠正。这一错误造成的后果是，曾经反对过共产国际决议、反对过联共（布）和波兰四大的瓦西里基夫同志，在一段时期内仍然担任乌克兰党的领袖。

布兰特同志今天指责我们犯了一系列机会主义的错误。我看到过《国外通讯》经布兰特同志同意后发出的一份电报的电文，这份电文说，波兰党内的左翼集团不承认对苏联战争威胁的迫近性。此外，布兰特同志还指责我们似乎在目前仍认为党的任务是夺取“整个农村”。这些指责显然是无中生有。而讲这些话的人正是那位在自己的小册子中（这本小册子已被连斯基同志批得体无完肤，而且我们还将在委员会内对其展开详细的批判）就毕苏斯基农民政策问题写过下列内容的同志：

“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对消除存在于生活富足的农户与难保温饱生活的农户之间的界限产生着作用。这样一来，这种上层农民的总数扩大了，而他们对土地革命是不感兴趣的。”

而对于毕苏斯基的政策所造成的战争危险问题，这位同志写道，这种危险乃是一种“历史趋势，尽管它还没有成为当前

的现实。”

可见，布兰特同志没有对毕苏斯基推行的稳定政策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他不理解农民群众的赤贫化过程，对战争危险的估计也是完全错误的。

现在谈一谈米科洛斯同志，他提到了少数派在瓦西里基夫事件上的态度问题。米科洛斯问我们：你们根据什么断言，瓦西里基夫同志犯了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错误，说他在以前也不可能坚持正确的共产主义策略？米科洛斯同志当然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米科洛斯同志的观点，在我看来，是对西乌克兰党遭受的分裂危机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我认为，米科洛斯同志过去就是把瓦西里基夫集团看成我们党内唯一的列宁主义集团而闭口不谈该集团错误的人之一，这些人在党的领导对西乌克兰党的态度问题上犯严重错误的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瓦西里基夫已经投入反革命阵营，如果米科洛斯同志仍然否认瓦西里基夫只是暂时委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中，那么，我要宣布，这显然是与共产国际的二月决议相违背的。二月决议有这样一段话：

“瓦西里基夫集团的领导人是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民主派阵营里暂时转过来的，在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的当前时期，这个集团的危害性尤为严重。”等等。

可见，瓦西里基夫来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阵营，是暂时靠向共产主义运动的。如果米科洛斯现在仍然赞扬瓦西里基夫过去的活动并以瓦西里基夫（他曾毫无根据地把西乌克兰党的历史同他自己的集团等同起来）的论据来反对波兰党内的少数派，如果米科洛斯同志因此而继续坚持我们在中央委员会中反对党内右派的批判过的那种观点的话，同志们，那就很清楚了：米科洛斯

同志坚决与共产国际在西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道扬镳了。

还有一个问题：米科洛斯同志对连斯基同志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诽谤性指责。他今天声称，连斯基同志似乎支持过多姆斯基对党的立场，说连斯基同志似乎没有同多姆斯基划清界限。而这里所讲的连斯基，正是与红军一起向华沙进军的连斯基，而多姆斯基是反对红军这次进攻的人。

我们对这种利用代表大会的讲台诬蔑波兰共产党的一位领袖的行为表示抗议。

代表大会应当结束我们党内这种严重的局面。代表大会应当对这种状况加以整顿；应当理解，我们党的领导层中的右翼是无能力实现我们党的团结的。因此，代表大会应当作出相应的结论并采取实际措施，以便整顿波兰党内的状况，建立一个比较坚强的领导机构，建立一个有能力赢得共产主义胜利的、强大而统一的党。

致 贺 词

国际主义工厂工人代表克鲁格利亚舍夫同志向大会致贺词：

在我们开展斗争的年代，我们历尽艰险。在我们夺得政权的时候，工业破败不堪。工人们要在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工业战线上拼杀。尽管困难重重，工人们迅速地行动起来，拿起武器，打击敌人，振兴工业，为的是把革命进行到底。我受国际主义工厂1 800名工人的委托，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致贺词。工人们希望享有光荣的英雄们——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向你们赠送一帧布哈林同志的肖像匣，这是我们国际主义工厂一位工人绘制的。请接受这份礼物。（鼓掌。）

马斯洛夫同志代表“红旗”工厂 12 000 名纺织工人向大会致贺词：

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工人，特别是我们“红旗工厂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曾经经历了艰苦而伟大的发展阶段：我们和沙皇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17年2月推翻沙皇制度，1917年10月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又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同饥饿和破坏进行了斗争，我们都胜利了。

恢复时期结束后，我们转入了改造时期，我们实行了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工业化。我们“红旗”工厂已经实行七小时工作日（鼓掌），我们增加了 3 500 名工人，开展了合理化运动，提高了生产率。我们向联共（布）提供了我们一切最优秀的和最能表示工人觉悟的东西。（鼓掌。）在紧张地从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危险。我们在警惕地捍卫我们成果的同时，随时准备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鼓掌），同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我们牢记伊里奇关于国际工人团结一致的遗训，并号召世界无产阶级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为将来的斗争和胜利而战斗！（鼓掌。）

赫里普诺夫同志代表捷多夫斯克织布厂工人致贺词：

他说，祖传于工艺厂的纺织工人向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致敬，并热切希望国际无产阶级能在全世界实现俄国工人阶级已在苏维埃俄国实现了的事业。

科先科娃同志代表克拉拉·蔡特金工厂的女工们向代表大会致贺词，她说：

女工们密切注视着代表大会的活动，因为她们懂得，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捍卫者，它要使全世界的妇女获得解放。代表大会的决议将会指明正确的道路，如何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科先科娃同志在结束发言时说：“我们女工将同整个工人阶级一起贯彻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我们向大会敬献一份礼物——我们为我们捍卫十月革命成果的红军而缝制的军服样品。”科先科娃同志向主席团赠送礼品——一套红军制服。（鼓掌。）

梅尔策同志代表莫斯科共青团组织积极分子向大会致贺词：

请允许我代表红旗共青团，代表莫斯科团组织积极分子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致敬。我们的共青团组织和同我们在一起的全体青年怀着高度的警惕性注意着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注视着群众革命化的进程。我们对恐怖主义，对反动派的回答是，以十倍的坚毅精神参加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参加对生产实行社会主义合理化的活动。下述事实便是最好的证明：共青团支部开了一次支委会，讨论第二次合理化公债问题，出席会议的10位同志一下就认购了810卢布的公债。这种情况在我们组织下属的其他支部也有。我们的青年参加社会主义合理化运动到底有多大劲头，你们只要到我们工厂去看看就一清二楚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成就实质上也是你们的成就，我们的不足也就是你们的不足。但我希望你们相信，我们不仅善于在和平时期进行建设，我们也善于在必要的时刻拿起武器，给我们的敌人以回击。说明我们青年正在准备战斗，准备斗争的最好事例是我们组织的共青团进军。我们显示了高度的组织性和巨大的坚毅精神。姑娘们和我们的妇女团员，个个都不落后。我们还参加了军事行军。（鼓掌。）我们还研究军事问题。我想，我们将和我们的成年同志一样，成为有用的战士。请

转告你们的共青团员，转告全世界——西方和东方——一切国家的共青团，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了解他们斗争中的艰难，我们随时准备帮助他们。

祝你们工作顺利，祝你们意见一致。

无产阶级坚定不移的领导者——共产国际万岁！

未来的世界革命万岁！（鼓掌。）

勒麦列（会议主席）：

我们不可能把每天收到的大批贺电和贺信都直接向大会宣读。所有的贺电贺信都将予以公布。但其中有3份电报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我向大会宣读一下。

第一份电报写道：

“我们停泊在Z城港口的希腊轮船“NN”号部分海员祝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并向世界革命司令部的英雄代表们致以最热烈的祝愿，祝他们成功，向他们致以热烈的同志般的敬礼。”

第二份电报写道：

“为了庆祝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鲁布佐夫斯克县洛克捷夫斯克乡于7月20日成立了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命名的公社。谨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致敬。

公社委员会”

代表大会收到欧洲最大的化工企业“洛伊纳工厂”的德共工厂支部发来的贺信，信中写道：

“洛伊纳工厂”工厂支部向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祝大会获得圆满的成功。我们忠于我们永世不忘的领袖列宁的遗训，请大会相信，我们一定不倦地

工作，把“我们的”企业变成真正的共产主义堡垒，特别是要动员‘洛伊纳工厂’的数千工人起来反对威胁苏联的帝国主义战争。我们决不允许用‘洛伊纳工厂’制造的毒气去杀害红军战士。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我们的圣地。所以，我们以及和我们一道革命工人阶级，将用我们的身躯保卫苏联。

我们为在我国也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而深受鼓舞，谨向你们致以敬礼。

‘洛伊纳工厂’所属企业德共工厂支部

科恩 签字”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继续）

奥皮茨（德国）：

首先我想就库斯特齐瓦同志的发言谈几点意见。库斯特齐瓦同志企图利用台尔曼同志有关少数必须绝对服从多数的讲话，为库斯特齐瓦集团对华沙组织和共青团中央所采取的少见的荒诞措施服务。这种企图必须坚决予以批驳。不允许对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和台尔曼同志的发言作这种解释，因为它完全忽视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与纪律问题相联系并且是纪律的前提。少数派的任何错误，即使是波兰共产党少数派所犯的 error，也不能为采取类似波共采用过的那种手段辩解。而库斯特齐瓦同志的声明只能证明，她和她的集团有意坚持这种方针并企图为这种方针辩解。代表大会应当对此表示反对。

德国党在有关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辩论中也克服了很大的困难。那个时期，柏林党组织也曾反对过党的领导，反对过中央委

员会。但是，德国党否定了库斯特齐瓦集团在波兰党内采用的那种压服的办法。正因为这样，德国党才有可能团结一致地向前进。我们认为必须作以上说明，以便排除利用台尔曼同志的讲话去为库斯特齐瓦同志服务的可能性。

请允许我就共产党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态度问题同大家交换几点想法。我们认为，代表大会应当特别指出社会民主党内部发生的某种变化，况且各种选举的结果已清楚地证明，德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正在进一步左倾化。

通过前一时期的经济斗争和选举，德国党大大地加强了自己 在德国重要地区的政治影响。德共从中得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它将下列任务提到了首要位置：第一是深入开展企业部门和工会中的工作；其次是贯彻好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因为只有贯彻好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德国党和其他党才能按革命需要去利用工人阶级的左倾化。然而，在讨论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时却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甚至直接的抵制。埃韦特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就表现出类似的犹豫不决的态度。抵制情绪则表现于一些同志身上，他们对左翼社会民主党采取错误的方针，并且认为当前行动纲领的主要之点是对生产实行监督。蒂特尔同志在前阶段也属于对生产实行监督的口号的拥护者。蒂特尔同志在发言时企图冲淡这一点，说什么没有时间就这个重要问题发表意见。可是他却有足够的时间去污蔑党的领导，去否定德国党的工作。如果他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那就好了，因为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就会发现蒂特尔同志完全不像他在这里矫柔造作的那样谦逊，而是一个与右派集团有牵连的，并且也在进行反对德国党领导的派别活动的人。

监督生产的口号现在首先也是得到蒂特尔同志支持的，而在当前，这个口号与改良主义者提出过并且还在继续提的要求别无二致。我想证明这一点并向大会讲清你的（发言人转向蒂特尔同志）观点。在冶金工作者机关报《冶金工人报》1927年9月21日号上，有位名叫魏曼的写了一篇题为《经济独裁还是经济民主》的文章，其中写道：

“国民经济中的平等权利是宪法所保障的，据此工人阶级应当享有监督和参加督促其劳动成果是否为工人阶级造福的权利。工人阶级应当用‘对经济实行监督’的号召来同企业主提出的‘经济自由’的口号相抗衡。”

蒂特尔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了些什么呢？他在代表团的机关刊物上讲得相当详细。在一篇题为《行动纲领作用何在？》的文章中，蒂特尔同志就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改良主义者向工人阶级进行类似的欺骗，一方面提出什么‘经济民主’的要求，同时又要求对托拉斯和卡特尔实行监督。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像列宁在世时那样，坚决反对这种欺骗行为。”

蒂特尔同志接着写道：

“在开展争取提高工资和争取面包等斗争的同时，我们应当提出包罗万象的‘组织口号’。这并不是去寻找什么‘智慧之石’或‘奇迹’。我们应当给群众指明反对托拉斯统治的革命道路，同时又要坚决地揭露改良主义者鼓吹‘经济民主’的骗局”。

由此可见，我们应当辩证地提出问题，而不能像乌布利希同志那样，表面地、机械地提出问题。我们提出的一切当前政治口号和经济口号，都应当从反对托拉斯资本的角度提出来。这些口

号都应该与直接革命形势下最坚决的行动口号之一相适应，即与监督生产的口号相适应。”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对生产实行监督的口号并不像蒂特尔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所说的那样，是百分之百的列宁主义，这个口号在目前恰恰是百分之百的改良主义。

在贯彻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抵制和这类不正确的观点。我可以用许多例子来证明这一论断。蒂特尔的一位朋友在莫斯科时举手赞成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可回到德国后他却投票反对这些决议，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我掌握着一份曾向汉堡地区党委会会议提出的决议文本。顺便提一下，右派同志们在这个决议中提出了下列要求：

“共产党员要开展坚决的思想斗争，反对改良主义者的分裂企图，竭尽全力维护工会的团结。

共产党员应当在工会章程和决议规定的范围内开展自己在工会中的全部活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有超出这一规定的例外。”

由此可见，这些同志是要我们按工会官僚们的章程和决议所规定的范围开展活动。这种对改良主义工会规定所抱的毕躬毕敬的态度，使我们无法开展斗争，无法去领导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决议所要求的、反对改良主义官僚们为所欲为的斗争。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正需要大力加强反对上述错误观点的斗争，需要加强同左翼社会民主派的斗争。德国选举的结果同样表明，社会民主党如果没有这股左翼势力，是不可能顺顺当当地去欺骗工人的。几乎在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中，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分工；几乎在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中，我们都可

以看到，企图以漂亮的空话欺骗工人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恰恰是极右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倡导者和贯彻者。在德国的竞选斗争中，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扮演的也不是配角，而是主角。左翼的一位领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最能说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一切社会民主党中所担任的角色。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萨克森左翼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的利布曼。他毫不含糊地对中央委员会说：亲爱的中央委员会，你们应当为我们奉行这种政策感到高兴，假如我们放弃这种政策，你们在党内就不会有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了。这位利布曼不加掩饰地道出了社会民主党左翼所起的真正作用。但是，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德国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阶级配合德国工人大规模罢工行动而罢工举行的经济斗争中也要弄了这种假把戏。当右派推行分裂工会的政策时，他们不敢稍有反对。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企图用漂亮的革命词藻阻挡工人转向共产主义阵营。我们可以用事实说明这一点：5月1日，我们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在开姆尼茨组织了五一游行。联合发表了《告工人书》。这份也有开姆尼茨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签名的号召书写有下列内容：

“同有产阶级不可能有和平，同剥削者和压迫者不可能有全民的合作，同企业主不可能有认真的合作。强化阶级斗争——这就是口号！”

所以我们举行五一游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争取人应当享受的一切劳动报酬！

反对仲裁法庭的独裁，反对废除罢工自由！

争取劳动保护，维护青年权利！

反对巧取豪夺，反对重利盘剥！
反对资产阶级联盟，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国家！
反对帝国主义策划战争，反对新的血腥屠杀！
争取各国人民的和平，保卫苏联！
加强各 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
争取释放无产阶级政治犯！
争取社会主义！”

这就是德国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耍弄革命词藻的典型事例。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其他国家也要弄这些革命词藻。不少发言者都曾指出过这一点。

当我们问到这些左翼领袖该怎样看待联合的政策时，他们便支吾搪塞，不同意我们提出的要求了。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德国党的某些同志和少数部门上了这些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当。我这里有几张《法兰克福工人报》。在一篇题为《预兆》的文章中写道：

“开姆尼茨联合庆祝五一节，社会主义联盟号召选举共产党人，这就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即将战胜恶意分裂的两个预兆。”

在另一篇文章中却又写道：

“我们全文发表开姆尼茨市工人组织的联合号召书，为的是让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看到，社会民主党内部不仅在一系列策略问题上，而且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存在着多么深刻的矛盾。”

这样一来，同志们，由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签过字的号召书，实际上只是左翼社会民主党领袖耍的一个花招，《法兰克福工人报》却把这份号召书吹捧成是同社会民主党中左翼实行联合的一个步骤。其次，为了在这家报纸上强调一下社会民主党内部不仅存在

策略上的分歧，而且存在着原则分歧，发表这份号召书也就足够了。同志们，事实恰恰相反。左翼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压根儿不曾想过在社会民主党内实行分裂，相反，他们坚持的正是自己组织的统一。可以举出上百个例子来说明，左翼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是把这种统一置于一切之上的。

我们肯定战争威胁迫在眉睫（许多发言者也指出了这一点），所以低估左翼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作用就更显得危险了。每当工人阶级起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刻，总是左翼民主党人出来反对工人。这就是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所扮演的叛卖者的角色。他们并不像德国党内某些同志所认为的那样，代表着走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阶级，他们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障碍。我们德国代表团中发生的争论以及埃韦特同志发言后在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引起的争论，都与上面这一点有关。埃韦特同志指责德国党未能充分利用社会民主党内策略上的分歧。但是，埃韦特在发言中完全错误地阐述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及该党内部的现实状况。他首先指出，社会民主党在德国选举中获得的 900 万张选票证明，德国工人阶级倾向于联合政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工人投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的赞成票，不是赞成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策，而是赞成反资本主义阵线，所以我们应当从中得出有利于共产党开展工作的实际结论。不言而喻，如果我们在向社会民主党工人进行宣传鼓动时像埃韦特同志那样提出问题，那我们是不可能动员工人起来反对德国或其他国家的左翼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我们是不可能向前迈出具有重大意义的步伐的。埃韦特同志的看法建立在对德国选举结果的错误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他的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大党。根据埃韦特

同志的说法，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但是，要知道，这是对
社会民主党内状况极端无知的说法。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左翼社
会民主党在竞选运动中和竞选运动前确实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投
社会民主党赞成票的 900 万工人中，至少有 300 万人是投左翼社
会民主党的赞成票的。这一点必须强调指出，埃韦特同志还低估
了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能力。他对德国党在目前时期开展经济斗
争，包括违背工会官僚们的意志而进行的经济斗争的能力估计不
足。他不明白，德国党依靠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及自己
在企业 and 工会中的机构，有深厚的潜力去利用工人阶级的左倾化
以发展革命形势。所以我们认为，党的多数派奉行的政策，不仅
仅像埃韦特同志所说的那样，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而且是唯一正
确的政策，它为我们率领德国广大工人群众冲破改良主义头目的
意志去开展斗争提供了条件。这一政策使我们有可能去实现红色
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使工人群众脱离改良主义者，组织起
一个团结的、统一的党，一个能依靠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
会的决议，实行自己政策的党（如果必要的话，还要违背埃韦特
同志及其朋友的意志，违背蒂特尔同志及其朋友的意志）。我们将
怀着这种信心去开展工作，将以这种精神去行动。

格林鲍姆（西乌克兰）：

几分钟之前，格尔维克同志污辱了一位老布尔什维克、1897
年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十月革命的组织者之一米科洛斯同志。在
此我必须声明，米科洛斯同志是第一个提醒西乌克兰共产党和波
兰共产党注意西乌克兰共产党内民族主义倾向滋长的人。后来，又
是米科洛斯同志始终支持了西乌克兰共产党少数派反对叛徒集团
的斗争。这些都不是格尔维克同志，而是米科洛斯同志做的。我

以西乌克兰共产党的名义拒绝格尔维克同志离奇的指责。

库斯特齐瓦同志在发言中提到国际帝国主义正在战线的某一段——波兰策划对苏发动进攻。我想对她的发言作一点补充，即法西斯阶级敌人和波兰占领者在波兰人占领区内——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全部政策都是受这种策划战争的意图所支配的，对这两个国家是不加区别的。

我必须指出，法西斯政府的这项政策与波兰历届政府的政策大不相同。那就是，民族民主派只想对已占领地区实行波兰化，这对他们的胃口施加了某种限制，而毕苏斯基政府则给这种波兰化倾向加进了更贪婪得多的企图，提出了“从此海到彼海的波兰”，即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波兰的口号。这种思想意味着不仅要把对西乌克兰的奴役永久化，而且要奴役和压迫拥有3 000万人口的工农国家——苏维埃乌克兰。

事实上，法西斯对西乌克兰的全部政策自始至终就是服从于这一思想，即进攻各苏维埃共和国。

波兰法西斯政府懂得，为使斗争结局不致于给它带来灾祸，它必须把受它压迫的部分居民争取到自己一边，至少要使他们中立。

毕苏斯基政府的土地政策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即争取居民和使居民保持中立。这项政策对被占领区，主要是对被占领的农业区，是有一定影响的。它对合作组织和文化组织的财政政策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即从经济上，进而在政治上迫使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人服从法西斯政府的领导，把这些组织变成法西斯帝国主义手中的工具。土地划小和土地规划政策也是为此目的服务的，这项政策从表面上修改了毕苏斯基当时实行的所谓军民开

发边缘区政策，以此散布幻想，似乎法西斯政府有能力解决西乌克兰大多数居民感到最为重要的土地问题。最后，毕苏斯基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同样是为上述目的服务的。这项政策在于收买一小撮知识分子，而对广大劳动群众继续实行更为残酷无情的政策。只要提一下禁止文化组织“启蒙社”在整个沃伦选区的活动的例子，就足以说明上述问题了。这是以前任何一届波兰政府都不敢做的事。但是，在干这一切勾当的同时却唱出自由民主的高调，并对苏联和苏维埃进行恶意的诬蔑。

必须肯定，这项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乌克兰资产阶级日益丧失其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让位于我们党和西乌克兰共产党，它看到苏维埃乌克兰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因而对富农在苏维埃乌克兰的复活失去希望。为了挽救自己受到威胁的阶级利益，乌克兰资产阶级心甘情愿地投向波兰占领者一边。不但乌克兰资产阶级如此，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也可以找到一小撮叛徒，他们经不住敌对势力的攻击，于是屈服于敌人，转到了苏维埃共和国敌人营垒一边，投入阶级敌人的营垒，投入波兰占领者的营垒之中。

在选举战进入高潮之后，一直在西乌克兰共产党中起领导作用的瓦西里基夫—图里亚斯基集团实行分裂，与路特-费舍—托洛茨基分子开始勾结，面对波兰法西斯主义及其策划战争阴谋的现实，他们开始攻击西乌克兰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

但与此同时，我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党员群众毫无疑问是相当有水平的。当时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派在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依靠乌共（布），包括米科洛斯同志（而不是格尔维克同志）及共产国际的真正的、道义上的支援，并在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的直接领导和积极帮助下控制了局势，使一小撮叛徒孤立于党和工人之外。我举两个例子：在发生分裂后两个月举行的选举中，叛徒集团在利沃夫仅得票 106 张，而我们得票 3 600 张；在德罗戈贝奇地区（鲍里斯拉夫也属该区），叛徒们的候选名单是经当局批准的合法名单，可他们仅得 28 张赞成票，我们党的候选人名单是被当局宣布为无效的，可是投我们赞成票的达 4 300 张。我们能够获得如此无可否认的成绩，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了正确的路线，坚持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我要斩钉截铁地指出，连斯基同志昨天攻击波兰共产党的正确路线，那只是一种烟幕，企图以此为掩盖，攻击共产国际的路线），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困扰波共中央的派别活动蔓延到党的西乌克兰支部中去，而当时确实是存在着这种倾向的。

我有机会在此宣布，我们全党都理解并赞同我党中央委员会在处理和消除乌克兰共产党党内危险中所持的路线。这条路线与波兰共产党中央及其多数派的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连斯基同志也不可能否认这一点。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可以避免一切危险了。相反，日益公开化、日益尖锐化的战争威胁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特别是波兰共产党和西乌克兰共产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

我们的代表团代表着党的领导机关和全党的一致意见，我们意识到，整个形势无疑地要求我们集中注意右的主要危险，注意敌人正加紧活动，力图瓦解我们的队伍，甚至企图消灭我们的队伍。我们代表团认为，形势要求有一个统一的、享有威望并具有正确政治路线的领导机构。鉴于上述考虑，我们西乌克兰共产党力所能及地支持了波共中央和议会党团的正确路线，以必要的坚韧

态度同反对派同志们的右倾和“左”倾向进行了斗争。今后，我们仍将坚持反对一切倾向，而不管它来自何方，但我们认为，右的危险是最主要的。

连斯基同志昨天改头换面搬出了所谓库斯特齐瓦同志的集团“本质上无能”的老调。有鉴于此，我得声明，我们不承认任何集团有自封“左”派的特权。连斯基同志，你们的集团在五月事变之前，除了犯有全党性的一切机会主义错误外，在你们自己的花束中还有不少鲜艳的花朵，如自治的口号和勃罗诺维奇同志的民族布尔什维克理论，而且在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很短期间，你们的集团就暴露出一系列机会主义倾向。这些倾向都是严重背离党的正确路线的机会主义倾向。例如，库斯特齐瓦同志提到过的公开信；对波兰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实行统一战线的机会主义策略；发动整个农村（包括富农）与法西斯政府对抗的口号；在农村工人运动中依靠小资产阶级团体——所谓人民意志派，而不依靠共产党员；要求我们让出一张议会委任状给犹太人代表，理由是我们在华沙得到许多犹太人的赞成票，而且只有犹太人才能维护犹太人的利益。这个集团能挖空心思犯下这么多错误，我们岂能赋予它提出所谓“本质无能”论的权利。我们认为派别斗争使党的活动陷于瘫痪，使领导机关的指示得不到尊重和贯彻，它给党带来了灾难，在当前情况下，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我们要求在中央委员会中建立起坚强的多数，这个中央委员会应当贯彻正确的路线并吸收一切健康的革命力量积极参加党的工作。我们要求实行铁的布尔什维克纪律，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作出的决定。

总而言之，我们同意库斯特齐瓦同志的意见，希望能像对待德国党那样，运用 21 条的第 12 条来对待我们党，因为我们党在

目前状况下比共产国际任何其他支部更需要团结统一，因为只有坚强而统一的领导才能可靠地把日益逼近的帝国主义反苏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变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争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什捷恩（捷克斯洛伐克）：

我们代表团认为绝对有必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有关我国“红色节”的问题。我们同意青年共产国际一位代表发表的意见，即这一事件应当引起共产国际的严重注意。但是，我们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大可能按需要的那样十分认真和详细地讨论“红色节”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必须由负责处理这个问题的总书记处的一个委员会去处理，而且它们也会处理好的。所以我们只打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阐明党中央的，也即代表团大多数人的观点，与此同时我们要明确而公开地说明并承认，在中央委员会和我们代表团内部是存在着与这种观点不相同的看法的。伊列克同志在其报告中已经这样做了。但是，雷曼同志在谈到他对“红色节”的看法时却这样说：按照多数派的看法——诚然，他们只是代表团中微弱的多数，分歧完全被歪曲了。所以，我受委托在此向大家阐明，按照代表团这个多数派的看法，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团中派别情况究竟如何呢？

雷曼同志的发言首先给人造成一种不正确的印象，似乎在我们代表团和中央委员会中，基本的分歧，真正深刻的分歧，是中央委员会和雷曼同志所在集团之间的分歧。所以我也首先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按照我们的看法，真正深刻的分歧完全在另外的方面。我们党在对“红色节”的评价问题上有一种右的思潮，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萨波托茨基。我们看到，在这个数量不大，但

影响不小的集团与党之间，观点上存在着真正严重的矛盾，真正深刻的分歧。我可以对这种矛盾作这样的描述：萨波托茨基同志以及他的集团宣称，主要危险是右倾，最大的危险是机会主义倾向。但是，这个集团以“红色节”的结果为依据所作的批评，是从右的方面进行的批评。这种批评是说，同志们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太多了。而我们则认为，我们根本不是做得太多，发动本身并不是错误，而是我们做得太少，我们没有做好这次发动，没有采取能导致这次发动取得胜利的正确政策。

上述思潮对这个矛盾的表述不够清楚，所以这个矛盾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暴露得不够。例如，这个矛盾在另一个问题上也有所表现，这个问题虽非主要问题，但我还得谈一谈，因为它很有代表性，能说明我们党和这个集团在如何理解“左”、右倾问题上的不同看法。首先，这个集团中某些同志持有一种观点，认为根本的错误不是在“红色节”那天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帮助参加游行的6 000—7 000工人。确实，某些同志是讲过：是啊，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连这些同志也认为，这已经不可能使整个事态发生任何变化，已经毫无意义了。我们也持有这种看法，即不可能靠最后一刻的发动把已遭失败的运动变成大规模的群众性发动，事态已经不可能有根本的扭转了。但是，我们认为，严重的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哪怕是试一试，将已走上街头的六七千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示威游行，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使我们遭受失败的程度发生较大的变化。我们认为，对失败估价的根本不同之点就在这里。

如果要我们现在讲清楚中央委员会和雷曼同志在此发言时所代表的那个集团之间到底有哪些意见分歧，我们是会感到相当困

难的。这不仅因为，在我看来，问题涉及的并不是那么严重、那么深刻的原则分歧，而且还因为存在着其他的原因。这个集团中聚集着各种各样对中央的看法不甚满意的同志。因此，在这个集团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集团中一些同志的意见时时都有变化。例如，雷曼同志向代表团提出，他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一开始连属于该集团的一些同志也反对雷曼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和发表他最初的论点。我想，这一派代表中的多数人是不愿声明，雷曼现在代表他们所作的发言是符合他们的观点的。

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分析这篇发言，我们将在委员会中进行议论。我只讲下面一点看法：这篇发言的大部分（这也是可以得到证实的）只是重复党以前许多决议以及最近一次党代表会议决议和党中央关于我党当前路线的决议早已肯定过的东西。雷曼同志发言的另一部分则是赞成布哈林同志对于我党错误所讲的内容。不言而喻，我们是完全同意发言的这一部分内容的。我想，我们队伍中没有任何人会去否定这一批评的正确性。而且我们还要大大充实这一批评的内容，因为布哈林同志自然不可能把对我党活动批评时该讲的话全都讲完。

雷曼同志发言中这些部分的内容并不构成分歧的对象，实质上只是重复党本身已讲过的东西，尽管雷曼企图把这些说成是党似乎想回避的东西。但是，除了这些部分以外，雷曼同志的发言和这个集团中多数同志的发言一样，仍有许多夸大其词、牵强附会和错误之处。雷曼同志声称，正确的政治路线问题是基本的问题。我们同样认为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而且同样地坚持一种看法，即我们在遭受了这种失败之后，应对政治路线作一次

认真的检查。但是，我们不同意雷曼同志的下述说法：既然承认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那么政治路线无疑也是错误的。布哈林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涉及中国的那部分讲话中指出，那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所以，如果我们说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不承认在实践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提出关于检查政治路线的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将进行探讨，弄清我们错误之所在。

我们认为，我们党对捷克斯洛伐克形势所作的分析及由此分析而引申出来的任务，总的来说是正确的。我们说我们的政治路线一般来说是正确的，而在运用这条路线时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雷曼同志引证了报刊的某些反应，想说明党的路线似乎是错误的。但是他忘记补充一句：报刊上的片言只语往往与党的路线和实际相悖，而党作出的明确决议却与它完全不同。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把“红色节”的结果说成似乎有10万工人走上了街头。当我们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在报道中企图把责任推到广大群众身上的时候，我们当中谁也没有去掩盖错误。我们代表团曾开会一致否定那种把责任推到群众身上的观点，雷曼同志是出席了那次会议的。

雷曼同志企图把事情说成是，似乎我们所作的全部经济分析就在于说明，我们给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下了定义，因此他特别责怪伊勒克同志。这一点同志们可以自己去查看查看。伊勒克同志有充分的权利说，在一次简短的报告中当然无法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作出十分准确的分析，这件事要由委员会去做。在雷曼同志提到的那次党代表会议上，我们当然也不仅仅局限于给局势

下个定义。雷曼同志出席了这次党代表会议，并且同意代表会议对经济状况所作的分析。当然，我们在会上没有重复那些具有长期意义的一贯说法，如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不大的国家，等等。这自然不是现代史上的最新事实。在判断形势时，我们经常指出，作为一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缺乏活力，这就加剧了经济危机，增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依赖性。在党代表会议的主题报告中也指出了这一点。

雷曼同志就工会问题所作的批评也是言过其实的。我们自己对在工会中的工作也进行了批评，但是，雷曼同志声称，似乎党只是在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掀起了大规模的工资斗争之时，才看到组织跨国工会联合会的做法孕育着危险。这就使人难以明白了：在连3岁小孩都知道我们一开始就指出过这种危险的情况下，雷曼怎么会说得得出这种话来呢。至于说我们在这方面的斗争是否十分得力，那是另一个问题，但绝对不能如此夸大其词。

我们认为，尽管存在上述种种模糊认识，尽管存在上述种种分歧（当然不能都去责怪这个集团），作为这个集团活动基础的那些趋向和意图还是健康的。我们对这个集团的评价是，它所追求的东西同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是吻合的。在遭受了这次失败之后，对我们党的整个政策和整个党的状况应当认真地、仔仔细细地进行一次检查，而且不应当限于仅仅采取公开的自由辩论来检查我们党的状况，我们还应当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消除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和缺点。这些同志所追求的东西，作为他们的基本动机的东西，是一种正确的感受，即这一次不能再让事情像往常不止一次发生过的那样：批评了，而且像现在时兴的那样进行了“自我批评”，

可是大部分只是纸上谈兵，一切依然如故。

因此，这些同志希望这一次情况能有所改观，希望这次批评能转变为更新党组织（有人喊道：“还要更新领导”）的一种生动活泼的活动。由于这个集团所追求的东西正是中央委员会决议中所阐述的东西，而且也是必要的东西，所以，对我们党目前的状况抱悲观主义态度是毫无根据的。因此，我们同这个集团中的某些同志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即在我们看来，党内还没有发生危机，也许这种危险会爆发，这我们还不清楚，而党现在对此有所反应则是一种健康的和有益的现象。如果我们党内没有分歧，那倒是怪事。但是，不管分歧如何，党内这一次确实有一种要求自上而下彻底地、认真地更新党的机体的愿望，因为我们认为迄今为止的党的状况，是造成那次失败的原因。因为我们意识到，党没有达到其应达到的水平。所以我们渴望能通过无情地揭露和消除缺点的办法，帮助党顺利地、完成它在新的战斗中担负的任务。

申费利杰尔（奥地利）：

奥地利代表团已经阐明了自己对布哈林同志提纲的观点。我们同意这个提纲，但希望在评价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其他问题上能说得更明确些。作为奥地利党中央少数派代表，我想谈一谈某些有争议的问题。首先讲提纲。奥地利可以作为提纲的一个形象化例子，说明工人阶级中的分化现象一方面表现在共产主义影响的增长，另一方面表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暂时发展。7月15日以后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出现的消沉情绪不仅不会加强共产党，反而会削弱党的力量。为了避免产生幻想，必须记住，左倾化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曲折迂回的。它充满着矛盾，而且可能会同时出现社会民主党力量壮大的现象。

其次，我认为在提纲中必须更突出地强调指明，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发展，而不一定是军事行动的结果，也可能爆发革命运动和起义。

在去年的起义之后，奥地利党在关于党的策略问题上存在过分歧。其他一些支部对正确解决这一争端也表示关切：

1. 工人代表苏维埃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责备我党未提出这一口号。我同意纲领草案对这一口号所需前提的提法。然而，奥地利不存在这种前提条件。资产阶级处于联合过程中，他们行动坚决而且团结一致，谈不上动摇的问题。奥地利共产党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甚微，也未能在无产阶级最有影响的阶层中扎根。在社会民主党队伍中，不管是右派，还是貌似左派，都一致反对起义。尽管存在种种弱点，党还是公开地领导了起义，号召工人组织武装战斗队并试图从组织上实现这一目标。可是，党却没有能力在斗争蓬勃发展的阶段中去实现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

2. 起义被镇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向我党发出公开信，指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并把这种失败与社会民主党的失败等量齐观。执委会在公开信中说：

“由此可见，7月15日以前，社会民主党既有能力让工业无产阶级群众跟它走，也有能力让小资产阶级群众跟它走。”公开信接着写道：

“但是，在奥地利，7月15日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垮台之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垮台了，它丧失了继续阔步前进的土壤。”

确实，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垮了，7月15日后它的立足点也发生了动摇。但是，近一年来的发展却证明，它对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暂时还未减弱。7月15日后，社会民主党的影

响，无论是在无产阶级中，还是在小资产阶级中，都有所加强。可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我党中央指出的前景并未得到证实。

近一年来，共产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组织上甚至都有所退步。它对群众的影响也减弱了。

阶级矛盾的激化最初并非有利于奥地利共产党，而是有利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党中央多数派认为，尽管一年来，发生的事实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奥地利无产阶级确实出现了左倾化，共产党的失利完全是中央的错误政策所致，是组织工作上的缺点造成的。这种说法也是对的，因为党在组织工作方面确实存在着许多严重缺点，它确是犯过许多政治性错误。但是未取得成绩并不仅仅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我们大家，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共产国际执委会，都过高估计了奥地利的形势，没有考虑到在无产阶级遭受失败后的初期是会出现退步的。

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左倾化早在7月15日之前即已出现。7月失败后，左倾化进程速度放慢，但是，7月15日以前对左倾化起作用的基本因素，如对无产阶级日益严重的压制和日盛一日的法西斯主义，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更为严重，所以，左倾化速度再次加快，其中部分原因则是国际范围内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左倾化。十分明显，在这样的时期，迫切需要共产党明确地、强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径。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应当认真地检讨一下奥地利的形势，制订出符合我们力量和实际情况的路线。由于已制订的前景计划与事物的客观进程不相一致，最近几个月来党内滋长着一种悲观倾向，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严重背离党的共产主义方针的右倾倾向。中央同心协力地同这些危险展开了斗争，并且强调必须加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希塔罗夫同

志昨天发言时提醒大家注意奥地利共产党有被力量强大的社会民主党融化的危险。但他没有拿出任何一点证据来证明他的说法。不管党有多少错误和缺点，这种被融化的危险并不存在。

最好还是别作这种预测，因为它只能证明这种预测的发明人看法肤浅，结论轻率。不过，必须要求共产国际极大地注意并尽最大可能支持奥地利支部同共产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进行艰苦的斗争。

米茨凯维奇·卡普苏卡斯（立陶宛）：

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讲两个问题；波兰—立陶宛冲突和波兰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未提及波兰—立陶宛冲突。这一点必须在提纲中加以补充，因为波兰—立陶宛问题在准备反苏战争中是起很大作用的。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强迫立陶宛投入波兰怀抱，其主要目的在于组成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反苏统一战线。现在，波兰武装占领立陶宛的危险又起，十分尖锐。毕苏斯基倚仗英法帝国主义者的全力支持，再次策划对立陶宛采取激烈行动。目前又出现了去年 11 月底的那种形势。8 月中旬，特种军团联盟代表大会将在维尔诺举行，毕苏斯基打算到会发表演说，另有 4 个师预定在立陶宛分界线附近举行大演习。波兰、法国和英国的报刊正在为毕苏斯基的反立陶宛激烈行动制造舆论。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在为帝国主义报刊帮腔。在波兰国内，毕苏斯基的反立陶宛侵略政策不仅得到波兰地主们的支持，因为他们渴望夺回自己在科夫诺立陶宛失去的领地，而且得到资本家，甚至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资本家力图为波兰商品夺取立陶宛市场和经过立陶宛取得出海口，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立陶宛的态度则完全反映了地主和资

本家的愿望，以所谓波兰对立陶宛负有“伟大的”“历史”使命的胡言乱语欺骗群众。波兰整个所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舆论，波兰所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波兰社会党，在这个问题上都麇集到了毕苏斯基周围。只有以共产党为首的波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摆脱了资产阶级影响并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部分最贫困的农民反对帝国主义波兰夺占立陶宛的政策，首先把这种政策看作是发动反苏战争的一个步骤。但是，波兰共产党至今未能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活动来反对毕苏斯基对立陶宛的掠夺性政策。波兰法西斯政府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力图利用有利于它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它想通过对立陶宛事实上的兼并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波兰法西斯主义国内存在重重困难的今天，这一点尤其重要。不管是采取公开的还是经过伪装的办法占领立陶宛，都会大大有助于毕苏斯基的反苏战争的准备。因此，波兰法西斯主义目前正全神贯注于立陶宛。

共产国际各支部是否已准备给予帝国主义强盗们这种不仅针对着立陶宛的独立，而且首先是针对着苏联的阴谋以坚决的回击呢？

遗憾的是，尽管立陶宛地区的事态可能成为公开的反苏进攻的开端，共产国际各支部未必有此准备。波兰和立陶宛共产党是否已经做好应付这种事态的准备呢？我可以对自己讲的话负完全责任，我要说，他们并无这种准备。立陶宛共产党因遭受疯狂的法西斯恐怖统治的打击，目前正处于危机状态；波兰共产党虽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享有巨大影响，而且在选举中获得很大胜利，但却忙于派别斗争，也无力开展群众性抗议运动来反对毕苏斯基对立陶宛的侵略政策。

我想提醒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注意这一情况。

现在谈一谈波兰共产党内的斗争。我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党内是否存在两条路线，是否一派是右的，而另一派是左的呢？

共产国际早该对波兰问题作点研究了。波兰共产党内一度存在过严重的右倾和极左倾向。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曾严厉谴责过波兰共产党的右倾倾向，指出右倾集团可以向党提出种种动听的布尔什维克口号，却不会实行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策略。但是，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许多时日，党在这段时间里学到了某些东西。自那时起，我们看到波兰共产党内曾出现过以多姆斯基为首的极其危险的极左倾向，其实那也是一种右的倾向。后来，我们又看到了1926年5月犯的极其严重的右倾错误，这个错误是整个波共中央，包括库斯特齐瓦同志的一派和连斯基同志的一派所犯的错误。

1927年召开的波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的积极参与下仔细地研究和批评了波共1926年5月以后所犯的种种错误，并且得出结论，认为两派都有错误，但总的来说，党的路线，两派的路线，都是正确的。

波共在四大后犯的错误比四大前少。共产国际也承认这一点。联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六大主席团也认为波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无论哪一派都犯了一些错误。如果说现在还要多费口舌来谈论这些事情，那首先是因为波兰共产党内激烈的派别斗争仍在继续。在此种情况之下，一些早已认识到的并且已经消除了的错误又被搬到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来了。

波共中央少数派在议会选举时向波兰社会党呼吁建立统一战

线的错误，就属于这种已被认识并克服了的错误。那是一次右的错误。

少数派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督促下才认识那次错误的。但少数派并没有坚持错误，因此，波共中央少数派现在也无根据过多地去注意那次错误。可是，多数派却在这样做，这就说明，他们谈不出少数派还有更严重的错误。另一方面，原少数派这一严重右倾错误证明，认为左倾系少数派所独有的看法是相当错误的。

原少数派所犯的另一错误是，它建议所有跟随共产党的组织都与共产党结成公开的选举联盟。在波兰的条件下，这无疑是错误的策略，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虽不像承认第一个错误那样公开和坚决，但却承认了这一错误。

布兰特把关于“整个农村”的提法和所谓富农能干革命的错误想法都归咎于原少数派，这是严重地歪曲了西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原多数派（它属于整个波共少数）在“关于整个农村”的提法上的错误。我们将在委员会里详细谈到这一问题。多数派指不出中央少数派在党的四大以后还犯过什么严重错误。

现在谈少数派所犯的错误。少数派首先提出西乌克兰问题。波兰共产党内在这个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波共四大以前和四大期间，波共中央多数派无疑犯了极大的错误，开始时他们支持西乌克兰共产党原领导集团，后来又故意掩盖该领导集团错误的严重性，看不到西乌克兰农村中存在的深刻矛盾和西乌克兰富农已投向波兰法西斯一边，看不到瓦西里基夫—图里扬斯基集团反映着西乌克兰农村中这种变动情况和代表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事实。四大以后，波共中央多数派没有充分揭露和批判瓦西里基夫—图里扬斯基集团的错误。但是，波共中央少数派指责多

数派在四大后没有立刻承认西乌克兰原领导集团路线的错误以及该集团在四大前在路线上所犯的错误，这又是不正确的。应当说，四大以后波共中央多数派在对待瓦西里基夫—图里扬斯基集团的态度方面基本上是站在共产国际的观点一边的，而共产国际在波共四大以后曾不止一次地研究过西乌克兰问题。实际上波共中央多数派奉行的路线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最能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是：几年来一直独霸西乌克兰共产党领导权的瓦西里基夫—图里扬斯基集团，除了一小撮小知识分子以外，未能吸引任何人跟他们走。在西乌克兰主要中心城市的选举中，这个集团得票少得可怜，只有 108 票，这也是再好不过的证明。在瓦西里基夫—图里扬斯基集团于 1 月份分裂出去并投入反革命阵营以后，多数派和原少数派对它的评价基本上是相同的。这个集团现在完全垮台了。什么原因使它垮台了呢？是波共中央和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的正确政策呢，还是错误的政策呢？须知，波共中央少数派至今在西乌克兰共产党中几乎不享有任何影响，因此不可能把我们党在西乌克兰的成绩算到他们自己的账上。显然，这些成绩应当归功于波共中央的正确政策，也就是说，应归功于波共中央的多数派和与多数派关系比较密切的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另一个问题是布兰特同志的小册子问题。我同意一种看法，即波共多数派一些同志比较过高地估计了波兰扩大国内市场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了波兰资产阶级向外扩张的企图。布兰特同志在其小册子中论证说，波兰历史上存在过向外扩张的倾向，但扩张不是当前的问题。可是，像韦尔日比茨基一类波兰大资本的代表人物却写道，波兰资本向外扩张已成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

尽管如此，还是不能根据布兰特的小册子就得出结论，认为波共中央多数派对反苏战争的危險估计不足。我认为，不是根据布兰特的小册子，而是根据党为反对战争危險而开展的运动和日常工作，才应提出关于对反苏战争估计不足的指责。而在这方面，无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没有开展群众性的反对波兰占领立陶宛的抗议运动，都没有在军队中开展自己的工作。波共也好，西白俄罗斯共产党和西乌克兰共产党也好，其基层都十分明显地存在着过低估计这项工作的现象，对此，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支持者都负有责任。主管这项工作的同志也证实了这一点。

其次，少数派指责多数派似乎错误地估计妥协派政党并对妥协派政党采取了错误的策略。而且还举出瓦尔斯基同志在议会的发言为例。我要说，这种指责的根据是牵强附会的，是以某些表达欠当的言论和任何党都存在的个别错误为依据的。库斯特齐瓦昨日在会上谈及社会民主党时所发挥的观点，乃是党的路线，是波共原多数派的观点，所以毫无疑问也是正确的观点。

在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问题上情况也是如此。这方面最大的错误是原少数派在选举时所犯的错误。各地所犯的许多个别性错误，如在西白俄罗斯所犯的错误，都是与中央原少数派和多数派的支持者有关系的。

格尔维克同志紧跟华沙中央书记处少数派发表呼吁书之后，现在又对中央原多数派提出了新的指责：“放弃党在罗兹的独立作用，宣扬似是而非的理论，说什么只有在选举中获得多数赞成票的地方，党才能起领导作用。”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可真是犯了地地道道的、无可救药的机会主义了。但是，经验教会我们要慎重地对待这类声明。我也要提醒到会的成员，不要急于从格尔维克

同志的发言中作出轻率的结论。对他提到的有关罗兹的事实及他所归纳的情况需要进行仔细的核查。这项工作也要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有关委员会去做。

以上就是原多数派和原少数派指出的全部错误。这些错误主要属于右的性质。

十分明显，在波共和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如在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内一样，右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右的错误是当前的主要错误。应当特别注意集中力量开展反对这些危险和错误的斗争。这一点在波罗的海地区——在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尤为明显。

但是，能否说波共党内的一派是右派，而另一派是左派呢？共产国际依据对波共及波共党内斗争的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两派的错误主要是右的错误。因此，不久前召开的一次有两派显要代表人物参加的西白俄罗斯共产党的重要会议通过了一致同意的决议，认为无论是原多数派还是原少数派都不是右和极左危险的代表，这些危险首先来自党所处的客观环境，来自党的干部缺乏足够的布尔什维克的锻炼。对此建议，原多数派和原少数派都曾表示赞成。可是，几个小时以后，原少数派在另一决议案中却建议并赞成取消这一提法。这至少可以证明，少数派代表的原则性是不够的。

显而易见，用波共中央原多数派和原少数派都犯有某些错误来解释两派之间的尖锐的派别斗争是不可能的。我强调的是双方都搞了导致党发生分裂和崩溃的派别斗争。在不久前召开的那次重要会议上，波共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代表都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现在只看到另一方的错误和罪责。这是不能同意的。对华沙

发生的事，不是哪一派，而是两个派别都应负责。中央书记处仅以一票之多数便通过决定，采取了不可容许的、犯罪的步骤——解散了共青团全国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共青团全国委员会一直推行不服从中央领导政策，并且对中央多数派进行诽谤性的攻击，共青团中央站在波共中央少数派一边积极地参与派别活动。华沙发生的事情只能证明，波共党内两派的派别斗争已发展到何等严重的程度，证明绝不能让派别斗争继续下去，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斗争。基层都强烈要求停止派别斗争。不久前我们曾有机会同西白俄罗斯一些活跃的工作人员们讨论西白俄罗斯共产党和波兰共产党内的状况，他们中各派支持者都有，请听一听他们的声音吧。

格罗德诺区委书记、波共少数派的拥护者B同志说：“从去年以来的一年中，没有一位在下面工作的人被提拔。脱产担任工作的党员遭到逮捕后，一切都处于涣散之中。党员看到的只是争吵不休，对这种争吵反应十分强烈，认为是毫无道理的争斗。党在工人心目中的威望日减。最近以来实际工作开展得很差。没有一次会议做过一点新的工作。各派都不执行党的决议。这种党内纠纷不停止，我们就毫无出路。可现在没有做过任何积极的工作。”“如果派别斗争继续下去，我们将走向彻底垮台。”“我们将蜕化为普通派别，成为一个互相攻讦的派别集团，如此而已。”

一位来自布列斯特，不属任何一派的B同志说：“派别活动极大地阻碍了党的活动的开展。许多人现在把派别斗争置于党的原则和党的纪律之上。各派自订纪律并把它置于首位，而将政治活动置于次要地位。一开始就在区委中大谈派别斗争，到该通过指示的时候，时间不够了，于是指示也就没有时间去下达了。同志

们相遇时第一句话就是：‘你赞成多数派还是赞成少数派。’”

布列斯特区委书记 M 同志也不属于任何一派，他说：派别斗争发展到了公开化的程度。他这种说法是对的。他说：“我们党组织松垮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派别斗争。”“派别斗争造成我们组织内部的相互仇视。每个人都想去诋毁另一个人，这就是事实。”

西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 A 同志说：“派别斗争是主要的祸害。罢工斗争（指西白俄罗斯的罢工斗争）就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

平斯克区委书记、波共少数派的拥护者 T 同志说：“从派别斗争中得利者是派别分子。我们则深受派别斗争之害。派别斗争对工作妨碍极大。这是一种使党动摇的寒热病。如果我们不能治好党内的这种毛病，那将会十分糟糕。”“必须建立坚强的领导，什么样的坚强领导，这并不重要。但必须建立起一个能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采取坚决手段根除派别斗争的坚强领导。其他出路是没有的。”“如果不能在这里结束这场斗争，我真不想回国。必须结束它，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

我还可以从波共中央原多数派支持者的发言中引证许多这类话。他们都承认派别活动是双方都有的。

我毫不怀疑，在土生土长的波兰积极分子中也存在着这种情绪。罪恶的派别斗争在几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使波共动荡不定，党员群众和整个工人阶级对此都已感到厌倦。共产国际六大应当结束这种派别斗争。波兰共产党竟让其领导人不受惩罚地继续进行这种并非用内部分歧就可辩解的派别斗争，它负的责任实在是太大了。必须尽快解决问题，因为派别斗争非但没有停止，而且在继续发展。必须不等大会结束就建立一个委员会以消除波共党

内双方的派别活动。

陈宽（中国）：

我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提纲和报告。我只想简要地谈一点，即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国际任务。我们大家都知道，防止战争危险的斗争、保卫苏联、反对各帝国主义国家干涉和瓜分中国的斗争，是现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任务。但是，实际上，几乎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对这些中心任务都没有给予应有的注视。我指的不仅是共产主义运动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东方各兄弟党，而且是指对这些任务说得多而做得少的西欧各兄弟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同样可以看到，参加讨论共产国际任务问题的发言者，很少谈到如何实际地支援殖民地的革命运动。

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发生于所谓战后第二时期。在世界革命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革命具有更为重大的国际意义。但是，我们的兄弟党对此太不关心了。致使英、日、美等国的帝国主义者有可能在上海三次起义的时刻，畅通无阻地向中国派遣战舰和军队，轰炸南京，发动对中国革命的总攻击，此后又迫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新军阀投降，与此同时又镇压了上海工人的英勇起义。如果不把苏联劳动人民给予中国革命的全力支持计算在内，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全世界无产阶级有效地、有力地支持中国革命本来可能创造出—一个无比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全新形势的时刻，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兄弟党依然是通过支持中国革命的决议多，贯彻决议的行动少，而行动无疑地才是他们应尽的责任。因而帝国主义军队不仅至今仍有可能留在中国；而且正在想方设法企图着手瓜分中国。广州十二月起义虽然不过是劳动群众在革命失败时期的一种英勇抵抗行动，而且

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犯有一系列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错误，但它却开辟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新时期**。广州起义的国际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广州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工农兵和城市贫民在广州建立的苏维埃及深深扎根于南方和北方广大劳动群众心中的苏维埃思想，作为起义的成果，却给迅速发展中的土地革命以强有力的推动。西欧和美国的兄弟党不仅没有支持这次起义，甚至还有一些同志企图否定这场革命斗争的意义。我指的首先是佩珀同志，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上不遗余力地把十二月广州起义描绘成是一次过早的起义，把它说成是后一时期一切盲动错误的根源。这种观点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论点如出一辙，区别仅仅在于佩珀同志没有敢于将其结论系统化。

目前的国际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张。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或者是我们为保卫苏联，为中国革命，为防止战争危险而进行**必胜的斗争**，或者是帝国主义者取胜。帝国主义正在企图暂时缓和自己内部的矛盾，以期瓜分中国和挑起反苏战争。如果我们大多数兄弟党在这方面不能大力进行工作，依然满足于作决议，发呼吁，那么，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一旦爆发，就会使我们措手不及。

一些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问题，持有极其肤浅的错误见解。例如，佩珀同志在谈及广州起义和整个中国革命的时候，常用这样的理由来增强其结论的分量，似乎帝国主义、土豪劣绅、民族资产阶级和新军阀的联盟是铁板一块，牢不可破，似乎他们之间不存在矛盾。佩珀同志谈及此点时是如此地兴奋激动，就像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渲染美国帝国主义的发展时一样，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佩珀同志忽略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无可置疑的领导作

用，他对农村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发展也视而不见，他把这些都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他认为，在现存的反动制度下在农村发展农民自治运动的建议是可行的，这就不足为奇了。而在中国工农革命群众的眼睛里，这种看法只不过是第三党领袖——谭平山、邓演达的论调的翻版而已。

在最近一期《工人画刊》上（责任编辑是明岑贝尔格同志），由于疏忽大意，我们替国民党捧了场。这期杂志的封面上印有“第三党”领导人之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肖像。在照片背面扉页上还印有摘自孙中山《建国方略》的词句，而孙中山的学说是反对阶级斗争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现在的旗帜。在同一期杂志中的一幅照片下面还有这样的语句：“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青年将遵循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学说的精神，继续奋斗。”这类宣传不仅歪曲了中国革命的真正面目，而且会给各国工人造成一种不正确的、模糊不清的印象（明岑贝尔格同志说这是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出现的政治错误，已予以纠正）。这种无稽之谈比那些只看到中国的长辫子和裹小脚的资产阶级报刊有关中国的荒唐报道更为无聊。所有同志都知道，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是苏维埃革命，中国革命早已不是遵循孙中山精神，而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发展的。受孙中山思想熏陶的中山信徒们，无论是蒋介石之流的右派，还是宋庆龄、邓演达这样的左派，在中国劳动群众无往不胜的革命发展过程中恰恰是应当被击败的分子。

谈一点关于共产国际东方各支部之间党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在东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民族运动中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中国共产党和这些国家兄弟党的联系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革命群众，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极为关切

地注视着日本共产党的发展，注视着朝鲜共产党人在朝鲜和满洲的活动，注视着中东铁路的事态，注视着印度罢工浪潮的发展，注视着安南共产党未尽如人意的的工作，注视着印尼共产党与当地华侨的关系以及其他情况。这些兄弟党在过去给予中国革命许多帮助，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中国共产党和这些兄弟党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或者仅有极少接触，这个事实也是无可争议的。这个缺点应当坚决克服。

我们认为，只有当中国革命、日本无产阶级运动和印度革命——这是同一链条上的3个最重要的环节——同时获得发展的时候，东方革命才能胜利。共产国际东方各国的支部必须在这次大会上建立起实际的联系。共产国际和东亚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应当更加紧密。共产国际不仅应当一如既往地政治上和组织上领导运动，而且应当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给予更大的帮助。一方面必须向那里派出能实际胜任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另一方面要使各支部有更多机会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作。共产国际过去在中国的代表，有的不能胜任工作，有的犯了严重的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胜任如此繁重而复杂的工作。客观形势要求共产国际在东方革命运动的工作中更前进一步。

最后，对共产国际各支部内各种倾向的国际性质问题讲几点看法。联共（布）党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这已经是历史事实。不过，一个党内的其他右倾和“左”倾倾向也不可避免地会传播到其他兄弟党中去。布哈林同志谈到战后第三时期的特点之一是群众的左倾化。随着工人阶级内部力量对比的激烈变化，共产党的某些领袖恰恰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例如，中国就有一些人站到盲动主义一边，自我孤立，脱离群众，另一些

人出于对敌人的恐惧，过分强调合法斗争的意义，因此犯了明显的机会主义错误。例如，有个别中国同志坚持要由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又如某些德国同志认为，只有取得改良主义工会工人贵族的同意才能举行罢工。佩珀同志甚至断言，在中国反动的白色恐怖统治制度条件下必须开展农民自治运动。佩珀同志向我说过，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就采纳了他的政治路线。我看，那些犯右倾错误的同志可能采纳了佩珀同志的观点，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决没有接受他的观点。

一旦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爆发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这种右倾定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同志们，我们要记住1914年宣战时惨痛失败的教训，我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共同反对我们队伍中的国际性右倾危险。

科尔奇克（西白俄罗斯）：

同志们！在帝国主义世界策划对苏进攻和帝国主义集团将反苏战争的准备工作列为最紧迫的任务之一的时刻，在法西斯波兰正在这一集团中扮演十分活跃的角色时刻，在这样的时刻，西白俄罗斯作为未来的战场，作为法西斯专制势力在反苏战争中的浅近后方，其作用虽十分有限，却极为重要。西白俄罗斯起着西乌克兰所起的同样作用，波兰的法西斯独裁政权正确地估计到西白俄罗斯的这种作用，因此，正竭尽全力于摧毁西白俄罗斯的革命运动和加强其在西白俄罗斯的法西斯占领基地，力图使群众脱离革命斗争轨道，向法西斯主义妥协。西白俄罗斯法西斯政权全部政策所追求的正是这一目的，这在它的民族政策中表现尤为明显。法西斯政府的民族政策是它进行战争准备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政策的主要方面是对广大无产阶级和劳苦农民群众及民

族解放运动实行最野蛮的恐怖统治，以此瓦解群众的斗志，摧毁群众的革命组织，另一方面是对白俄罗斯农村的富裕农民，对富农和知识分子的上层作出某种让步，把这些人拉到他们一边去，并利用小恩小惠和耍弄各种手腕，在广大农民，特别是中农群众中散布幻想，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制造动摇情绪，进而瓦解这一运动。

法西斯独裁政权的这一政策在最近一段时期颇有收获。我们看到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白俄罗斯农村的上层——富农，已彻底投入法西斯阵营，走上坚决与革命运动为敌的道路，成了法西斯主义在西白俄罗斯的马前卒。

法西斯主义在某些农民阶层，首先是中农阶层中散布幻想的手法也颇为成功。引起的动摇范围相当广，其表现之一是：部分农民在议会选举时竟投法西斯候选人的赞成票，表现之二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成员放弃了革命斗争。可是，与此同时，法西斯专制政权对无产阶级、对农村贫苦农民以至中农基本群众的剥削和压迫政策却愈演愈烈。农村赤贫化的过程日益加快，农民基本群众的缺地现象更加严重。所有这一切更加剧了西白俄罗斯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推动了农民基本群众反对地主、波兰移民和富农的斗争。

在法西斯集团加强联合的同时，我们党的影响也在扩大和加强，革命运动在发展和深入，无产阶级和被剥削的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在加强，民族解放运动和波兰革命运动的联盟也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不断巩固。

我们党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残酷的法西斯恐怖统治环境中开展工作的。但是，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困难，我们党仍然取

得了重大成就。我们的党壮大了，党在无产阶级中间的影响虽还远远不够，但已经得到加强。党领导着西白俄罗斯强大的农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党领导过拥有 10 万成员的白俄罗斯劳动群众的组织，即白俄罗斯工农协会。法西斯主义曾多次打击这个组织，要消灭这个劳动群众的合法组织。

但是，西白俄罗斯的革命运动并未因遭受这些打击而减弱下去。法西斯力量在加强联合，革命阵营也加紧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加强自己的联合，不断得到巩固，我们的影响日益巩固和扩大。

在指出这些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工作中的一系列不足之处。主要的缺点之一是，我们党的成分主要还是农民。我们党内的无产阶级核心力量还十分薄弱。在西白俄罗斯无产阶级力量较弱且处于分散状态，而农民中已掀起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的情况下，这种状态更加危险，所以我们给自己提出的基本任务是，扩大我们在无产阶级中，特别是在大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影响，加强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核心力量。我们党是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包围中开展工作的，这种自发势力对我们党的压力相当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队伍中发生动摇的危险就更大，我们党内出现右的错误和右倾的危险就更大。因此，我们着重强调我们党应当同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右的危险作斗争。这个危险之所以迫在眉睫，还可从另一事实得到证实，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多半属于右的错误。不过，正如最近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指出的那样，我们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所犯的 error 都已经受到批判和揭发。所以，波兰共产党原多数派集团中某些同志在这里发言时说他们揭露和批判了我们的错误，这是完全不真实的。我要在这里指出格林鲍姆

同志所作的歪曲发言。他说格尔维克和连斯基派的错误在于他们支持了西白俄罗斯自治的口号。这是不真实的。诚然，我们党在1926年召开的第三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过支持自治的口号，从而犯了一大错误。但是，这个错误是整个波共中央犯下的，其责任也应由它来负。我们认识了这个问题并且自己予以改正，还在1926年，西白俄罗斯共产党第二次中央全会就承认了这个错误，撤销了第三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支持自治的口号。布兰特同志硬说，我们党似乎仍坚持把整个农村连同富农一起发动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观点。这是极其严重的歪曲，只能用布兰特同志对这一问题采取了派性态度来加以解释。我们从未持有引导富农进行革命斗争的观点。我们明白无误地提出过同富农作斗争的问题；不过我们犯了另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对民族运动中某些阶级因素估计不足，对西白俄罗斯农村因波兰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状态得到加强和法西斯政府的政策不断稳固而出现的变动估计不足，在已经发生法西斯政变之后仍然提出党应当引导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如有可能则引导整个农村同民族压迫作斗争的论点。这个错误受到第八次全会的批评并得到了纠正，后来，我党代表大会也对此进行了批评和纠正。布兰特同志在这里带着偏见批判我们的错误，可在他自己的小册子中却贩卖根本错误的观点，说什么法西斯政府的政治是想使整个农村富裕，使贫农发展为中农，使中农变为富农的路线。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观点，可波共中央多数派至今未与这一错误划清界限。

我们率先与西乌克兰共产党原领导瓦西里基夫集团的民族主义的机会主义方针作斗争，这一事实证明，对我们进行指责，说我们似乎认为必须引导整个农村连同富农一起走革命斗争的道

路，那是多么的缺乏根据和荒诞无稽。正是波共中央原多数派库斯特齐瓦集团，当时完全彻底地支持瓦西里基夫集团在建立统一的乌克兰民族阵线问题上的立场，支持该集团关于农村工人运动不得超出一般性乌克兰民族俱乐部的范畴的观点，以及该集团在农民“赎买土地”问题上的立场。瓦西里基夫集团用“农民按农民委员会规定的价格获得土地”的口号取代了“土地不予赎买”的口号，其原因就在于这个集团力图使我们的革命口号适应农村中富农上层的利益的需要。波共中央原多数派支持了这一右倾方针并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为其进行辩护。

我还想在这里谈一谈米科洛斯同志的发言。他不是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而且十分荒谬地指责波兰共产党原少数派和多姆斯基同志唱一个调子。米科洛斯同志在其反对波共原少数派的斗争中采用的这些方法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例如，他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就完全歪曲了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布哈林同志在同一代表大会作总结报告时驳斥了他的发言。在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会议上，米科洛斯同志同样歪曲了我们的观点，硬说波共少数派诽谤西乌克兰共产党，把西乌克兰共产党的全部历史看成只是掩护其民族主义实质的外衣。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指责的不是西乌克兰共产党，而是瓦西里基夫集团，而这个集团确实从未彻底克服其民族主义意识，现在更是陷入了与我们敌对的阵营之中，但我们从未将瓦西里基夫集团与西乌克兰共产党等同起来。

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完全赞同西乌克兰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同时指出了党在活动中所犯的那些早为我党中央批评过的错误。这项决议是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但在如何对待波共中央报告的问题

题上我们存在着分歧。同志们，我们承认，波共及其领导在波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的政治路线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我们肯定地说，在贯彻这条路线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右的错误和背离正确路线的错误。代表大会的多数人在指出这些错误时，并没有区分这些错误是波共中央原多数派所犯还是原少数派所犯。我们认为必须对所有的错误展开批判。这也是代表大会多数人的观点。但是，代表大会的少数人持另一种观点，他们拒绝批评库斯特齐瓦集团的右的错误并且投票反对我们为指出这些错误而提出的修正意见，在就波共中央报告的决议案（该决议指出了库斯特齐瓦集团的错误）举行表决时，他们也投了弃权票。

同志们，我的发言就要结束了，我只想再讲一点，即米茨凯维奇同志正确地谈到了西乌克兰共产党多数派中那些同波共少数派保持一致的我们同志的发言，这些发言指出了派别斗争的严重危害。我们大家都抱有这种观点并且强调派别斗争的害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米茨凯维奇同志未举出波共原多数派集团中任何一个发言。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派别斗争的危害，力图使我们党在波共四大和西白俄罗斯共产党一大制订的正确路线基础上团结一致。我们认为，应当通过我们党内反对右的危险的斗争，通过对右的错误的批判，而且是无情的批判，取得这种团结。我们不同意在组成我党未来领导机构方面所采取的那些方法和提出的建议。我们认为，只要西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的政策正确，只要党内大多数人支持中央委员会（这在代表大会已有表现），代表大会是能够选出一个反映代表大会和党的观点的中央委员会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观点却不是这样，它决定不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发挥作用。我们不同意这一决定，但是我们服从这一决定，

而且忠实地将这一指示贯彻于行动。但是必须指出，对波兰共产党的另一部分，即西乌克兰共产党却没有采取这种削弱其影响的政策。我们看到，以格林鲍姆同志为代表的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库斯特齐瓦同志一派完全沆瀣一气，他的发言是专门针对波共中央少数派而来的，是完完全全地为库斯特齐瓦同志那一派辩护的。

别涅基克特（奥地利）：

奥地利代表团多数派委托我就申费利杰尔同志代表少数派所作发言讲点意见：申费利杰尔同志就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七月起义的态度挑起了论战，他对在七月起义时刻提出工人代表苏维埃口号的必要性表示异议。申费利杰尔同志认为提出苏维埃口号是错误的。申费利杰尔同志否认当时存在提出这种口号的前提条件。按照他的说法资产阶级并未瓦解，它没有遇到深刻的危机，而共产党对起义没有起什么大的影响。同志们，就他提出的第一个理由去进行发挥是不值得的。难道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无产阶级举行起义使资本主义统治受到更大的震动吗？申费利杰尔同志说什么共产党对起义进程没有发挥多大影响，我要说，共产党在7月15日的表现是良好的，它在群众中是享有影响的。同志们，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共产党是为武装无产阶级的口号而斗争的。正因为无产阶级在7月15日自发地提出了这一口号，党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对运动的广泛影响。党享有影响，但它没有在组织上给这次起义制订广泛的措施，从这一点来看，它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它没有把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作为进一步发展七月起义的组织基础。党很快认识到了这一错误。还在12月，党就认识到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对于七月起义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在7月15日

以后党又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7月15日以后，奥地利共产党多年来第一次有可能着手克服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经过7月15日事件，社会民主党在群众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的面貌。如果共产党能表现出应有的主动精神，能全力以赴地开展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激烈斗争，党是能够使广大群众脱离社会民主党的。但是，党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党没有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同志们，7月15日以后党错误地提出了警察归市政机关管辖的口号，从而使群众对社会民主党燃起新的幻想。在维也纳的工厂委员会选举中，党提出的口号是拒绝提出单独的候选人，换句话说，党错过了与社会民主党相对抗，鲜明地表明自己原则立场的机会。

同志们，共产党和中央委员会曾试图纠正自己的错误。但是，在纠正这些错误的过程中，党内右的反对派力量开始增长，他们企图逼迫党重新回到过去的错误路线上。申费利杰尔同志声称，必须同右派作斗争。可是，同志们，从来没有一个右倾反对派不提出同右派作斗争的口号。申费利杰尔派在其分析中犯了什么错误呢？首先，申费利杰尔同志否认奥地利无产阶级在前一时期发生过左倾化，而且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有关决议表示异议。申费利杰尔同志的理由是什么呢？他首先指出的是社会民主党正在发展。而共产党呢，据他说，不仅数量没有增加，而且有所减少。此外，按照申费利杰尔同志所代表的某些同志的说法，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再好不过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正在右倾化。这些同志以为，伦纳取胜一事反映了群众的意志。那么，社会民主党力量增长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左倾化是一个十分复杂和相当矛盾的过程。它既有利于共产党，也有利于社会民主党。但是，转

向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是来自资产阶级阵营，是原先不关心政治的人。这就是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就是左倾化的过程。同志们谈到伦纳在社会民主党中取得的胜利。确实，他在代表大会上获胜了。但是，同志们，代表大会并非群众意志的反映。代表大会就曾把7月15日谴责为旁门左道，可是维也纳的无产阶级至今仍忠于7月15日思想。

伦纳胜利了，上层右倾了，但与此同时也发生了阶级力量两极分化的过程。而且出现了群众激进化和左倾化的过程。

同志们，申费利杰尔同志的态度是危险的，这一点可以从共产党在7月15日前夕的方针中看出来。由于我们在7月15日前缺乏足够的准备，由于我们没有觉察到这种左倾化的过程，所以我们没有能够按照需要和可能做到的那样将7月15日事件推向前进。

必须避免重犯这些错误。决不能闭眼不看左倾化的进程，必须意识到这一进程。

还有一点也是不足为怪的，即谈论关于出现了右倾化趋势的恰恰是申费利杰尔在这里所代表的那些同志。7月15日前夕他们就认为，在奥地利无产阶级中，退步倾向占着主要地位。经过7月15日事件之后再同这种理论进行辩论，是会令人发笑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悲观主义方针是多么的危险，这种束手无策的感觉又是多么的危险啊！不错，共产党没有得到加强，但不必对此感到奇怪。由于共产党发生了动摇，由于共产党没有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并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所以原先准备转向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中的动摇阶层，因看不出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区别而没有转向共产党，这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再就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问题讲几句。由于受到这次代表大会的影响，申费利杰尔改变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已经承认我们关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已破产的论断是正确的。然而他对有关七月起义的决议却表示异议，说什么：“不错，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破产了，但社会民主党成长了，因而，说社会民主党也破产了是不妥当的。”这里有两个概念交织在一起。共产国际执委会从未讲过社会民主党已经破产，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连同其虚假的革命行动，确已破产。至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它并没有破产，相反，它正在全世界其他明显的改良主义政党赖以发展的同样基础上得到发展。

我的发言就要结束了。奥地利共产党无疑是一个力量较弱的党。要胜任它所面临的任务就更困难了。这里反映出稳定中存在的矛盾现象和不稳定现象。我们应当强调指出，奥地利实行的合理化给无产阶级造成的损害比任何其他地方都严重，由于实行合理化而采取高压政策，由于法西斯主义和工厂中的法西斯措施日益加强，工人的斗争意志也日益高昂。我们需要一个能与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作坚决斗争的共产党。只有在党消灭了自己的错误，不再过高估计敌人，不再过低估计党的前途并进而克服本身的悲观主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我想，在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帮助下，共产党是能够克服自己的错误和悲观主义方针的。如果共产国际能比迄为止更好地帮助它，那么，共产党是能够胜任自己的任务的，它一定会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优秀的党，一定能够充分解决所面临的伟大历史任务。

少先队员^①（中国）：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青年共产国际活动的专门报告，这一事实本身说明，大会十分重视青年运动。但是，必须指出，各国共产党对共青团工作的指导和帮助很不够，这也是事实。

我们基本同意许勒同志的报告。但是必须指出，青年共产国际没有全部完成自己的任务。由于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正在发展，青年在生产中的作用和意义增大了。过去工作的一个主要缺点是：青年共产国际在贯彻新的工作形式方面，在深入开展青年群众工作方面，以及在组织青年争取自身利益方面，没有根据新的条件及时改变方针。

我们现在正日益临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青年的作用和任务尤为重大。青年共产国际的活动必须首先根据客观条件采取相应的新的工作形式，以便争取广大工农青年群众，引导他们进行积极斗争，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和强行瓜分中国领土。

许勒同志在其报告中指出，党对青年工作重视不够。不仅如此，有些地区参加工会的青年甚至不能享有与成年工人同等的权利。

如果这种轻视青年的态度还在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中存在，那只能是一种社会民主派的倾向。这不仅是错误，而且简直是耻辱。

瓦西里耶夫同志在讲话中指责青年共产国际过分热衷于政治，而对组织工作的意义估计不足。我们不能完全同意这个观点。

^① 关向应。——译者注

以中国共青团为例，事情不完全像瓦西里耶夫同志所想的那样。不错，中国共青团十分重视政治工作，但与此同时，我们从未忘记和轻视组织任务及对劳动青年群众的工作。此外，在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共青团积极支持共产国际的路线，帮助中国共产党纠正其领导成员的机会主义错误，积极参与完成党的迫切的政治任务。必须承认，中国共青团是做得正确的。

许勒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并强调了中国共青团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建立了特殊的政治功绩。报告人丝毫没有夸大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某些同志对此表示不满，说什么根据报告人对中国共青团的评价，似乎贬低了共产党的作用而抬高了共青团的身价。

不管这种观点有何来源，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不正确的。党应该把共青团看作是正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斗争的无产阶级青年的先锋队。共产党应把共青团的工作看作是自己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把共青团组织和党的组织对立起来的观点，不应该在我们队伍中存在。

不言而喻，中国共青团有许多缺点。特别是它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在与党的机会主义错误作斗争的过程中，这个缺点暴露得十分明显。在共青团队伍中还存在着“左”倾的毛病。加强对团员的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把这些任务和日常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共青团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中国共青团的全部活动应致力于实际执行争取广大工农青年群众的路线，吸引他们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并在这一斗争中把共青团变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青年的群众性组织。中国共青团的政治路线应当为广大工农青年所知晓。

布哈林同志在其报告中仅仅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内有“左”倾危险。但是，事实上，纠正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却又出现了右倾。不言而喻，我们应当继续同“左”倾危险作斗争，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右倾的危险。右倾比“左”倾更危险，它可能使机会主义的错误重演。

尽管中国共青团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但是，年轻的革命者在共产党领导下定能和前一时期一样顺利地完成任务。

台尔曼同志（德国）的声明

我必须向大会发表如下声明：

蒂特尔同志在这次会上的演说，看来一定是右派试图在德国采用的工作方法的一种表演，这种方法就是在作自我批评时诋毁别人和散布谎言。我不打算谈论蒂特尔同志许多荒谬绝伦的说法，但必须作如下两点驳斥：

第一，根据速记记录，蒂特尔同志说：

“台尔曼同志在报告中说，社会民主党的 900 万张赞成票多数是小资产阶级投的票。”

根据我的发言的速记记录稿（同样未经修改），我是这样讲的：

“据粗略的估计，我们还不掌握确切的数字，可以认为，社会民主党获得的 900 万张选票中约 300 万张是小资产阶级投的。”

由此可见，蒂特尔同志的说法是不对的。

第二，蒂特尔同志在发言中说（我仍按速记记录引述）：

“台尔曼同志说，德国的右派集团是一种近似叛党行为的危险。”

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我曾肯定地说（仍然按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引述），“地区的某些领导同志故意缩小和轻描淡写地谈

论右派集团理论倾向的作用，以及机会主义毛病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而这些毛病常常发展到了背叛德国共产党的程度。”

遗憾的是，我所说的是真实情况。一些同志在改良主义者的压力下，竟然发表声明谴责我们共产党的报刊去批判工会中的官僚和他们的叛卖行为，这些情况说明了什么呢？工会中的一些共产党负责人在开展竞选斗争中竟然拒绝公开表态支持共产党，同时却有一些共产党员公开地利用整个工会机构去为社会民主党效劳，这又说明了什么呢？一些同志违反党的指示，赞同改良主义者中止罢工的叛卖性行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总而言之，我的讲法是完全正确的，蒂特尔同志想偷梁换柱显然是办不到的。

希塔罗夫（青年共产国际）的声明

我不揣冒昧地提请大会注意如下声明：

我在就奥地利问题发表的讲话中说过，如果共产国际不设法使兄弟的奥地利共产党内部健康化的话，那么，与力量雄厚的社会民主党相比，奥地利共产党将越来越被排挤到次要地位。

申费利杰尔同志在其发言中指责我的看法是浮光掠影，还说我不如不作上述发言。由于时间关系，我当时发言时未举出多少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我的意见只是反映一种忧虑，即如果不迅速地向存在于奥地利共产党中的右倾思潮（这种思潮已相当明显）宣布无情的战争，党的存在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申费利杰尔同志本人的发言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我的意见丝毫不是什么“浮光掠影”。他的发言十分肯定地表明，我所指出的危险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

乌布利希同志（德国）的声明

埃韦特同志在发言中说，任何领导层中的多数派都可能蜕变

为一个集团。我曾对此表示异议并声明，这种观点很像托洛茨基的组织观点。我还就此说过，埃韦特同志赞成俄国代表团的提法是有保留的：当埃韦特同志认为这种或那种形势有利于他为另一种政策进行辩护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不受纪律的约束，因为多数派正在走向蜕变。”我当时还指出：“托洛茨基对联共（布）强大的多数派也讲过同样的话。”我的这些提法是绝对正确的。我还就同一个问题说过：“如果他（埃韦特同志）不想和中央携手并进，按纪律规定去贯彻已作出的决定，那么，他最终必然堕落为托洛茨基主义。”我认为这一提法不妥，所以现在收回这一提法并作如下改动：“到那时一切表现出脱离党的总路线倾向的人就会把埃韦特同志当成他们的聚合点。”

佩珀同志（美国）的声明：

罗明纳兹同志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荒谬绝伦的论点，说我把广州起义称作盲动。可他拿不出我的一篇文章、我的一次讲话来作证据。

我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各次讲话均已散发给出席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所有代表。我不得不在这里引述其中的几段：

“关于广州事件应该提出的第一个论点是：我们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广州起义持肯定的态度。这个论点应该是我们评价广州起义的原则性论点。广州起义的意义何在呢？在起义被镇压下去的当天晚上，也就是在我们还没有任何机会和那些直接参加起义的同志们交谈之前，我曾尝试着对起义作一个扼要的评价。当时，即在那天晚上，我写了如下几行字，并且至今仍持这个观点：

‘广州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是中国无产阶级最豪迈的业绩，标志着中国革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登峰造

极的程度。’

接着写道：

‘资产阶级只记革命失败的账，却不愿看到，在远东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是何等重大革命成就。广州，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摇篮，现在成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这个事实有着象征的意义。孙中山的广州现在变成了列宁的广州。’

作为评价广州起义的结束语，我写了下面一段话：

‘严重的失败，但不是最后的失败。它是未来胜利的源泉和保证。’”

请看我是怎样评价广州起义的。那是在遭受失败的时刻，而不是在胜利后的次日。我不认为我们现在有什么理由在任何程度上重新考虑对广州苏维埃意义的评价。

在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前夕，我在共产国际中国问题讨论会上的报告，开头也用了这几句话。这个讲话已印了几百份。我作报告时，罗明纳兹同志在场。我在那次讨论会的总结发言中曾直截了当地反对那种不仅谴责广州起义中的错误，而且谴责起义本身的观点。我是这样和洛佐夫斯基同志争论的：

“最后，对洛佐夫斯基同志的发言还有一点小小的意见。洛佐夫斯基同志方才关于广州起义的说法是不对的。他攻击了广州起义本身。这是不对的。可以而且应该抨击起义中的错误，但不应攻击起义本身，不应攻击工人的斗争。”

作这个总结发言时，罗明纳兹同志在场。因此，我敢断言，罗明纳兹同志刚才讲了假话，有意识的假话，硬说我曾经把广州起义说成是盲动。这是假话，是有意识的假话，而且不是第一次假话。但是，应该期望，这是罗明纳兹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短

暂的、然而不十分成功的巡回演出中的最后一次假话。

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里以五大洲和共产国际所有 50 个支部仲裁者面目出现的罗明纳兹同志是如何实行自我批评的。他在这里只字不提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曾经批评了他的中国不断革命论，曾把这一理论斥之为托洛茨基理论，是一种有害的观点，是一种同托洛茨基在 1905 年所犯的错误的相类似的错误。

罗明纳兹同志的声明

我在发言中说过，佩珀同志对待广州起义是这样一种态度：佩珀同志在广州起义发生前反对广州起义，广州起义过程中反对广州起义，在起义之后仍然反对广州起义。我敢断言，证据不胜枚举，无论是文字的，还是口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特别是全会前夕召开的讨论会的参加者，对这些都记忆犹新。佩珀同志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广州起义是盲动，他缺乏这个勇气。但是，佩珀同志设置了一些前提，从这些前提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广州起义是盲动，此外，不可能有其他结论。我今天并没有说过，佩珀同志把广州起义说成是盲动。我说过：我引用了雷贝尔格文章中的一段话。这位雷贝尔格断言：“广州起义遭到了而且不可能不遭到失败，因为起义的社会基础不够广泛，在广州和广东省举行起义要取得胜利的条件尚不成熟，革命和反革命军事力量的实际对比不十分有利于起义，起义的时机（12 月 11 日）也选择不当。”

在谈到这段引文时我说过，为了得出广州起义是盲动的结论，这段话里该说的全都说了，只是没有说出盲动这个词而已。随后，我还补充了一句，说这个雷贝尔格可能是佩珀同志随使用的一个化名，因为佩珀同志和雷贝尔格的论据在本质上，甚至在形式上都毫无区别。佩珀同志刚才说了什么呢？他引了自己发言中的几

段话，说在起义的时刻他是站在广州工人一边的。难道他应该站在张发奎将军一边不成？这还不够！但是，佩珀同志在他刚刚引用过的那篇讲话中和已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备案的他的不少发言稿中宣称过，他在起义之前就反对举行起义，并说他认为广州起义为期过早和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的看法是正确的。只缺一点上层建筑，那就是没有说出盲动一词。但这丝毫抹煞不了这样的事实，即实际上佩珀同志一贯将广州起义评价为一种盲动的行为。

佩珀同志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宣布，我离开共产国际这个事实应当被看作是共产国际的莫大幸运。这我不清楚。我的工作问题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更不是佩珀同志的事情，而是党的事情。是党，而不是由佩珀同来决定此事。但是，要说佩珀同志留在共产国际内工作是共产国际的莫大幸运，我倒表示怀疑。（鼓掌。）

佩珀同志还捎带要求我说一说关于不断革命的问题。我在第九次全会之前说过，中国革命正在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奇怪的是，佩珀同志竟就这个问题对我进行责难。佩珀同志在他宣读的那段引文中就曾说过，广州起义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笑声。）他比我们勇敢多了，我说的是正在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他却说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开始了。就这样佩珀同志现在和那时一样还竟敢恬不知耻地指责我是托洛茨基主义，等等。

我不得不再次重复我在在中国问题讨论会的辩论中说过的话：佩珀同志是一位能干的人，是一位有经验的人，只是他的作风，他那耍弄计谋的作风迫使人们不能像看待一个严肃的政治家那样来看待他。

会议休会。

第十六次会议

(1928年7月30日)

主 席：勒麦列

许勒作总结发言

几点总的看法

参加青年运动问题讨论的党的代表，即成年党员同志的人数不多，这是一大遗憾，从这一点来说，讨论情况不尽令人满意。问题不在于仅仅通过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青年问题并以我们的青年同志为主展开讨论，而是要使党本身更多地关心这些问题。从参加青年问题讨论的成年同志较少这一事实中，我看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结论之一是，成年党员同志对这些问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冷漠和不够关心。其次，各党和代表团显然不能或不愿意就青年运动问题提出与我在报告中所述基本路线和建议有重大分歧的建议。

虽说参加讨论的党内同志人数甚少，但仍应指出一个令人愉快的例外，即台尔曼同志作了发言。他的发言表明，他本人和德共领导对青年工作是多么的关怀。同志们，这一点并非偶然。确

实，在德国，尤其是在最近时期，党和青年之间的合作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和发展，相互支持的关系日益牢固。当然，还不能说在这方面已经尽善尽美了，但是，许多党都可以从中学到，德国党和青年是通过什么方法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的。

既然我提出了党和青年的问题，我想借此机会更突出地强调一下我在报告中只是略为提到过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党应更积极地支持青年团的问题。同志们，青年运动问题确实应当从这个观点出发加以阐述。必须使青年团从党的方面获得更大的支持。我举一个例子。会上有人批评青年团的工作，可是，同志们，批评青年团的工作也不那么简单。要知道，我们的青年团虽然首先属于青年共产国际的一部分，青年共产国际对其工作负有责任，但它同时又分属于各该国有党的党领导。如果共青团队伍中出了错误和缺点，那么，这既与青年共产国际有关，也与各该国的党有关。这一点再次证明，各党必须更深刻地理解青年运动问题。

以共产国际为例，它的代表大会曾不止一次地通过一项十分简单的决定，委托各党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要普遍建立青年组织，因为许多地方的党组织没有建立自己的青年组织。对于各国党来说，主动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派出几位年轻同志去建立青年组织，根本不是很难的事情。对党的支部来说，虽然问题要复杂一些，因为企业中的工作必须做得更扎实。但事情同样也是不难的。不过，即使是这样简单的决定，如能得到贯彻，青年的力量也会大大加强。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必须从这个观点，即从党应给予更大支持的观点出发，来提出青年问题。

我已经讲过，根据讨论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各代表团同意报

告提出的总路线和各项建议。确实，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本着这一精神表示了意见。我特别表示欢迎的是，会上没有提出任何企图削弱青年团政治性质或在共青团之外再成立广泛的、无一定形式的工人青年半政治性联盟的建议。由此可以得到证明，大会总的来说同意我们从列宁那里继承下来的原则和基本路线，青年团应当保持其作为政治组织、战斗组织和教育组织的性质。

还有其他几个问题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在报告中充分阐述，现在我来谈一谈。我不是说，我的报告过于简短了，但是，因为当时到了休会时间，某些问题阐述得比较简略。所以我想现在较详细地谈一谈。

首先是关于自我批评问题。某些同志认为，我们青年自我批评不够。同志们，我要断然宣布，这种假设是毫无根据的。我们青年果真反对自我批评吗？我们要毫不含糊地拒绝这种假设。我们完全懂得自我批评的革命作用和意义，我们知道，从列宁时代起，这就是对党的领导的一项指令和原则。而且我们也明白，从革命观点来看，在当前时刻，无论是对共产国际、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各支部而言，还是对青年共产国际而言，自我批评都具有巨大而迫切的意义。因此，我们赞成对我们的错误和不足之处进行尖锐的自我批评。至于我的报告，确实提到了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但是，第一，我只是在联系工人青年所处状况和斗争的总情况时谈到成绩，第二，谈到成绩也只是为了说明我们所得重要结论的依据。

我想根据报告的速记记录简要重复这几点结论：

“我们可以肯定，青年共产国际无可争辩地扩大了影响，并不断取得政治上的成果，这是第一位的积极因素。但是，与此同

时，我们也要承认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影响的扩大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转化为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组织上的发展壮大。需要着重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我们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而青年共产主义运动总的人数却呆滞不动，两者完全不相适应的问题。”

我还说过：

“固然，如我所说，现实情况不足以使我们感到高兴，如果我们以此为满足，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我们无条件地运用自我批评的武器。我们绝对不想夸大我们影响的增长和政治成果的发展程度。正因为如此，我们把人数稳定不变的事实看成是十分不妙的情況。我们认为，这一事实是我们存在严重弱点的征兆，克服这一薄弱环节是我们最为重要的任务。”

我想，根据这段引文，即使是没有听过我的报告或没有十分注意我报告的精神的人，也会相当清楚地看到，重点就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是在这个问题上。然而，却有一些同志把青年共产国际的状况想象得比实际情况阴暗得多，于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常常提出一些与我们的原则和事物客观情况的要求不相符合的建议。如果我们因此而不接受他们的建议，这些同志又会把这一点说成是我们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不能这样来看问题。青年运动的处境相当严峻，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一点并由此而得出相应的结论。但不能夸大其词。

有鉴于此，我想摘引列宁的一段话，看一看列宁是怎样谈论对青年运动进行批评的。列宁不止一次地亲自谈到青年运动问题，有时还十分尖锐地批评过青年运动，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青年共产国际作为一个整体是拥护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但是，也犯了错

误。当时，列宁论述了某些思想，我们应当把这些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方针继承下来，以避免两种极端的倾向：削弱对青年运动的批评或进行过火的批评。

列宁曾就《青年国际》的出版写了下述一段话：

“不言而喻，青年们的机关刊物目前还缺乏理论上的明晰和坚定性，也许永远不会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是热血沸腾的、异常激动的和正在进行探索的青年的机关刊物。但是，对于这些人理论上缺乏明晰态度的问题，必须采取完全另一种态度，而不是，也不应该采取我们对‘组委会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信徒们’头脑中的理论混乱和心目中毫无革命彻底性等等所采取的那种态度。把无产阶级思想搅混的成年人是一回事，因为他们总想去领导和教育别人。对于他们，应该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而青年组织是另一码事，因为它们公开宣布，他们还需要学习，他们的基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政党培养工作人员。必须帮助这些人，对他们的错误应该尽可能地采取宽容的态度，力求主要通过说服，而不是斗争的方法，逐步纠正他们的错误。由于客观需要，青年们不得不通过不同于他们父辈的途径，采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下接近社会主义，而中老年一辈往往不善于恰如其份地对待这些青年。因此，顺便说一句，我们应该无条件地赞成青年团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不仅仅是因为机会主义者反对这种独立性，而是依据事物本质的实际行事。因为，没有充分的独立性，青年不可能把自己培养成为专家，也不可能作好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的准备。

既支持青年团的充分的独立性，又要支持对错误开展同志式批评的充分自由！对青年人，我们决不能一味地奉承！”

列宁接着写道：

“再说一遍：这些错误必须予以驳斥并解释清楚，要尽一切力量寻求与青年组织接触和接近的途径，想方设法帮助他们，但必须恰当地对待他们。”

我想，列宁已经讲得十分清楚，党的领导和所有的成年党员同志在对待青年团的态度方面，无论是批评他们的错误还是对他们进行教育，究竟应当采用怎样的指导方针和方法。我认为，列宁关于组织上的独立性的论述对波兰党也是有用的。

在其他党内，例如在保加利亚党内，近几年来我们也不常看到他们令人满意地运用这一原则。

在即将结束我关于自我批评问题的开场白的时候，我还想补充两句话：我们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批评，我们认为这种批评是适当的、有益的和有积极意义的。我们不会生气，我们不反对批评，我们自己也不放弃批评，所以我们不反对对我们工作的批评，我们可以进行辩护，我们也有能力进行斗争。我们认为，会上开展的批评一定能给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给青年共产国际和整个共产国际带来积极的效果。

我们任务的重心何在

我们自己究竟怎样看待我们任务的重心所在呢？我已经说过，重心在于克服我们的缺点，首先是解决我们的数量与我们青年团日益增长的影响不相适应的问题。

我们又是怎样认识我们任务的政治重心所在呢？那就是，青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应当实行某种转折。关于这个转折，我

想稍微多讲几句。

这是什么样的转折呢？也许有必要举一些实例加以解释。能否说，这就是简单地“转向群众”，“转向群众工作”呢？如果这样提法，那我们就会离题太远了。不能不承认，在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即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青年共产国际就曾同共产国际一道实行了这种面向群众的转变，实行了争取群众的工作方针。我们青年团已经在群众中开展了这项工作，这是无可否认的。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这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不过，我们没有能够在组织上巩固这一成果。全部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在组织上扩大我们在群众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并继续改进我们的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方针虽早已制订，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充分地贯彻于实践之中，即使付诸实践，也缺乏十分具体的办法。

为了使同志们更好地理解这种转折的内容，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青年共产国际怎样探索通向这种转变的道路和怎样找到这条道路的情况，也许是合适的。有人认为我们只是现在才懂得这种转变的必要性，认为这种转变似乎是由外部强加给我们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赖斯特同志和布伦克勒同志在发言时已经举例说明，最近两三年来他们的青年团组织以及青年共产国际在这方面开展了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是，即使说我们早已理解实行这种转折的必要性，那也只是在少数青年团中实行这种转变，而且很不充分。所以，作为一项总的任务，这个转折依然是摆在我们大多数青年团，也就是摆在整个青年共产国际面前的一项任务。这个结论是从实践经验中得出来的，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基础是十分牢固的，我们今后仍可以此为基础开展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就曾十分明确地承认，作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青年共产国际就其规模而言尚不能令人满意。那次代表大会确认：

“尽管青年共产国际及其支部作出了相当的成绩。第四次代表大会仍要指出，青年共产国际目前还没有成为群众组织的联合体，除了俄国的共青团以外，我们青年国际中还没有任何一个群众性的组织。这表现在：与党以及整个劳动青年群众相比，青年团在人数上所占比例还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有时简直是微不足道。加入组织的工人青年对群众的影响也比党对群众的影响小得多。”

决议举出了一系列详细的例证，并接着写道：

“在此情况下，摆在青年共产国际面前的基本任务和以前一样，依然是争取最广大的工人青年群众和农村劳动青年群众，从数量上、影响上以及组织和活动等方面把共产主义青年团变成劳动青年的群众性组织。”

这就是我们第四次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地说，第四次代表大会已经看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道路。代表大会虽曾通过某些正确的决议，但总的来说并未正确地指出，我们应将注意力集中于哪些问题，集中于哪些主要问题。相反，在1925年初召开的全会上，青年共产国际还想靠提出几个呆板的口号来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例如，当时曾抛出两个口号，一个是年底前把团员人数增加一倍，另一个口号是，在3月至9月期间，即到国际青年节之前，所有的青年团都要根据生产支部的原则进行改组。这显然是以机械呆板的态度去解决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问题，因此，不必多说就可知道，这些口号，这些建议是不会得到贯彻的。

但是，青年共产国际通过实际工作也学到了有益的东西。例如，1926年3月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就曾通过几项重要决议。可以说，这些决议的实质内容现在仍然是适用的，也可以说，我们当时就曾规定了正确的任务。唯一觉得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些决议付诸实施。

例如，我们当时的全会在谈到青年共产国际不够令人满意的状况和青年团发展不快的情况时曾指出过：

“在许多青年团组织中都可以看到，成员流动性大，有时甚至达到50%。这种现象值得我们严重注意，应当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克服。它削弱了我们团组织的力量，使团组织的政治水平得不到任何提高。流动性过大的基本原因是，青年团的内部生活开展不够，范围狭窄，内容贫乏，不适应从政治上发挥号召力的要求，也未能使新参加组织的成员和团的日常工作发生联系。我们的团组织未能使青年工人的全部需要或至少是最重要的需要得到满足。这种现象必须坚决予以克服。”

这里所写的东西，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它的重要部分，今天同样是适用的。决议接着写道：

“某些青年团为了贯彻执委会扩大全会的决议，曾在充实宣传鼓动工作和教育工作的方法方面作过初步的尝试，采用过更多满足青年工人文化需要的方法，开展文体娱乐活动，演出政治讽刺剧和话剧，组织青年节活动、乐队、合唱团和青年之家等等。对于这种不断丰富我们的工作方法的行动必须予以欢迎。如果过高估计这种做法对于青年团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或者把它和青年共产国际开展斗争的其他方法对立起来，那是会带来危险的。尽管如此，这种充实我们工作方法的行动是生活本身的产物，对于我们吸引工人

青年并领导他们前进是很需要的。表面化、公式化的做法至今仍在我们的队伍中占着统治地位，它对采用任何新的方式去掌握群众都起着消极的作用，必须着手同这种做法进行有力的斗争。我们的团组织有足够的力量在争取青年和组织并领导青年（因为他们不在我们的组织之内）的斗争中去试验各种工作方式方法并在工作的各个领域运用这些工作方法和工作方式。在这方面的任何主动精神都应当受到我们的欢迎和仔细的研究。”

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在现在也是可以写进去的。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在今天也仍然是有用的。

再就辅助性组织和在群众组织开展工作的方式问题讲几句。对于这个问题同样有过重要的决议。该决议说：

“青年共产国际所属的一切团组织，一刻也不能忘记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提出的把所有工人青年都吸引到我们队伍中来的任务，必须十分重视工人青年中的所谓的非政治性组织（如体育组织、各种文化组织等等）并把领导与这些组织有联系的群众的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必须根除那种把这些组织看作是与我们的敌对组织的观点。我们应当掌握并领导这些组织。对于所有处于地下状态的青年团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德国青年突击队的经验表明，我们不仅应该和能够利用这类组织，而且可以和应该发挥首创精神，建立这类组织，以便影响广大的非党群众并领导他们。然而，利用各种机会对工人青年群众实施领导的做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抹煞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共青团应起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根除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存在的盲目崇拜的毛病。还应当克服过去对待工会青年支部的那种机械呆板的态度。”

此处所说的机械呆板的态度,指的是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曾经作出了错误的排斥工会青年支部和一概排斥工会各种青年组织的决议。1926年的全会纠正了这种错误。

这里所说的一切在今天仍然是可以加以强调的。所以我要再说一遍,应当感到遗憾的是,我们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以极严肃的态度去促使这些任务和指示得到贯彻,而这一点是青年共产国际的错误。不然,我们本来是可以赢得不少时间的。当然,发生这种事情不是因为存在不良意图,而是纯粹出于历史原因:将青年组织由过去的先锋队和青年党变为真正的群众性青年组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927年1月召开的全会又前进了一步,这主要表现在关于工会中的青年支部和青年委员会的问题上。全会就青年参加工会的形式问题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第五次代表大会改变原先的原则。按那条原则规定,我们不需要在工会内部建立任何特殊形式的青年组织。决定确认,青年需要有各种辅助组织、群众性组织和交叉性组织,应当建立这类组织。

由此可见,同志们,一年以前我们实际上已经对这一点作了很多研究,而且通过决议,要求在工会中发展这类组织。现在,我们已经在许多国家的工会中建立青年委员会,甚至建立革命青年支部,这是可以肯定的事实。

1928年3月的全会其实就是为第五次代表大会制定指示的会议,这次全会对上述决定的阐述更为明确,更为准确。全会彻底清除了在工会中建立青年组织方面存在的最后障碍,发出了要求广泛建立并利用这类组织的决定。全会还强调,在所有其他问题上都必须实行转变,以采取适合青年特点的、更生动活泼的群众工作

方法，如建立生产单位的青年支部，采取更活泼的宣传鼓动方法，建立体育组织和青年突击队等等。

对如何活跃我们的工作，也曾下达过明确的指示，而且这些指示是在全面地进行自我批评，同时又保持青年团政治性质的基础上形成的。

同志们，你们一定会说，我在这里讲述的一切都很好，而且证明，青年们进行了探索并且找到了它，可是，为了找到它，青年们花费了不少时间。

为了使这一点成为现实，我们需要花费许多时光。这是对的。是呀，我们探索正确的道路并且找到了它，但花去的时间可不少。原因在于过去不曾有过共产主义类型的群众性青年组织，而这一点是被某些同志所忽略了的。曾有过社会民主党类型的青年群众组织，也曾有过资产阶级类型的群众组织，可是，除了苏联之外，任何地方却不曾有过共产主义类型的群众组织。所以共产国际领导的青年运动没有可能去照搬某种模式，也无法模仿现成的榜样去建立自己的组织。青年共产国际仿效了1907年时期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某些原则。其实，青年共产国际应当作些尝试，以创造青年运动的新形式，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青年群众组织。由于历史的原因，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目前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况，即依靠我们的实践经验和我们的工作，我们能够清楚地想象得出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应当成为什么样的组织。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实行一定的转折，或者更确切的说，可以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支持业已开始的转折。这种转折应当在严格保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战斗性质和政治性质（其基础是参加政治斗

争)的情况下予以实现。我们正在实行的转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 是布伦克勒同志所说的“青年政策”,就是说,我们应当更多地注意青年运动的具体问题——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而不管这些问题出于一般性政治问题还是青年所特有的问题。总之是要更多地注意“青年政策”。2. 在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和为群众组织而开展工作。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工会中的工作问题,在这里开展工作需要有特殊的青年工作方式——建立青年委员会和青年支部。再其次是未参加组织的青年的联合问题。俄国代表团在重新加以阐明的提纲草案中提出这个问题是正确的。工会中有组织的青年人数十分有限,而且工会吸收的只是很少一部分青年工人。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些未加入组织的青年工人。我们同意应当探索新的途径,我们也十分清楚,必须把这批青年联合到或多或少比较独立的青年组织中去。这种联合究竟采用何种形式,是生产性青年组织或学生组织的形式,还是一般性的青年经济组织的形式,这个问题将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我们的新建议也是不超出在实行的工会工作方面的总的共产主义策略,即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所规定的策略范畴的。这样,我们就能更加不受那些阻碍革命斗争开展的工会官僚阶层的束缚了。这里讲的都是有关如何为未参加组织的青年的建立特殊的工会组织的问题。最后,还有体育问题以及如何在我们应当建立的辅助性组织中,如青年突击队中开展工作问题等等。

第三个基本问题是运用更加生动活泼的方法开展宣传鼓动工作问题。我反复看过多次全会的决议。我们将就这个问题向我们的代表大会提出详细的提纲。通过德国和俄国的共青团,我们已

经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个经验应当加以利用。我们应当竭力使团内生活适合青年人的需要，找到相应的方法。必须满足青年热切希望广泛交际的愿望。在不少国家中，支部和地方青年组织往往只搞纯组织性的工作。这在法国和英国，即重要的大国中尤为严重。青年工人去参加支部或地方组织的会议，从头到尾就是去听干巴巴的有关组织工作的议论，于是，他们再也没有参加类似的团的活动的愿望和兴趣了。青年团成员流动性大，也与这些现象有关。组织内部的生活应当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在发展工作和宣传工作方面，应当找到新的方法，如举行革命文艺晚会，利用电影、“兰衣剧”、“红色游览活动”、宣传鼓动队等等。分地区或举行全国性的青年集训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这些集训，犹如通过游行示威活动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行动的强大威力和团结，可以看到一定的纪律性。因此，我想提一提类似德国青年突击队和其他组织实行的统一制服问题，因为某些代表看到我们共青团代表穿着制服，也许感到奇怪。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制服对青年人是颇有吸引力的。我们打算运用德国共青团的这一经验，今后在其他国家的共青团中也实行类似的统一制服。由于穿着这种制服，我们的行动显得更有声势，也更有助于我们影响的扩大。这对于活跃我们组织的工作也是十分有利的。

综上所述，同志们，为了活跃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我们研究创造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我们参与了政治生活，更加注意了青年问题，开展了群众组织工作。

我们实施了“转折”的第四点是，改善了组织工作，加强了

技术工作。更加注意青年问题，向活跃工作方法方面转化，加强对群众组织的工作，使工作适应青年的需要和特点——这些就是我们打算向我们的世界代表大会提出并在会上加以肯定的基本任务。

青年共产国际——群众性的共产主义学校

瓦西里耶夫同志在发言中责备我们共青团过多地从事了党的活动。许多同志，如希塔罗夫同志、中国的少先队员同志以及布伦克勒等同志，对此作了答复。这种指责当然是毫无根据的。首先，把参与党的政治活动和青年工作对立起来，这是根本错误的。这两方面的工作是一个整体。必须正确地将两者结合起来，同时又要采取青年人易于接受的方法开展党的政治工作。其次，我们通过实例证明，除了一两个例外情况，我们青年团都是在正确的范围内参与党的生活的，是遵守了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共青团和青年共产国际对各共产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认为党的政治活动似乎在青年运动中作用过大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应当予以驳斥。

但是，瓦西里耶夫同志列举了两个似是而非的证据，在此值得一提。第一个证据说，我们的生产支部一无所获。可是，瓦西里耶夫同志，根据速记记录来看，情况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糟糕。他断言，1924年时有620个生产支部，而现在只有270个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现在又有600个支部了。这就反映了成员的稳定性。尽管瓦西里耶夫同志列举的数字不确实，但我们仍然承认，我们在生产支部的工作方面是有缺点的。但是，不管怎样，这些现象并不能成为瓦西里耶夫同志的论据。另一个所谓“证据”就更是绝

对错误的了。为了加强他的论点，即所谓我们给青年运动加进了过多的党的政治活动，瓦西里耶夫同志说，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将共产主义青年团变为群众性组织的决定尚未得到贯彻。我得请瓦西里耶夫同志原谅，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多少有些天真幼稚。瓦西里耶夫同志大概自己也没有注意他讲了些什么。他显然只想到把问题说得尖锐些。谁也无法想象，有哪个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或者随便哪个共产主义组织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能变成一个群众性组织。总该考虑到1924年后发生的历史事件和我们运动发展的具体条件吧。我已经说过，从来不曾有过共产主义类型的青年群众组织。群众组织不可能这样快建立起来。为此需要耗费大得多的劳动。我们的第五次代表大会面临着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将要通过一项纲领，这个纲领当然将包括我们过去曾作为指导原则的那些基本原则，但也将对我们的任务作出某些新的阐述。

在这个纲领中，我们将阐明整个共产主义青年的总的状况，指明他们现在应当成为怎样的青年和应当如何工作。新提纲草案的基本思想是我们从列宁那儿继承下来的提法，按照列宁的提法，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是工人青年的群众性共产主义学校。列宁不断地强调，青年的根本任务在于学习。列宁在对青年的演说中说过：

“如果根据这一点来看青年的任务，就应当说，全体青年的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一切组织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要学习”。^①

列宁不止一次地阐述过上述这些思想。1922年时我们曾邀请列宁同志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列宁同志未能到会，他给我们发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93页。——译者注

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我很抱歉，不能亲自向你们致意。谨向你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你们工作顺利。希望你们在享受崇高称号之时不忘最主要的任务——必须脚踏实地地将青年的训练和学习推向前进。

致以
最美好的共产主义敬礼

B. 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11月4日”

这就是列宁的话。他在讲到学习和培养的时候，总是马上作出详细的解释，说明学习的含义和怎样进行这种学习。列宁一再强调，要在争取工人青年各方面的利益的斗争基础上，在参加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列宁说过：

“这就是对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学习共产主义的回答。

青年们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无产者和劳动者不断进行的反对剥削者的旧社会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学习共产主义。……

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这样的青年一代，他们在有纪律地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中已开始成为自觉的人。在这个斗争中，他们中间一定会培养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应当使自己的训练、教育和培养中的每一步骤都服从这个斗争，都同这个斗争联系起来。培养共产主义青年，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我们要培养的并不是这些。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怎样生活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分担那些开始同剥削者作斗争的人们所受的痛苦的时候，当他们看

到为了继续这一斗争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付出了多大的牺牲，看到地主和资本家是多么疯狂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中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也就是共产主义培养、教育和训练的基础。这也就是对应该怎样学习共产主义的回答。”^①

把这个公式加以简化，那就是“共青团——群众性的共产主义学校”。这个公式极其明确地为我们指出了开展工作的指导方针。如果我们坚决遵循这一方针，我们一定能避免错误。不能只强调这个公式的一面，譬如说，只强调“共产主义”，而忘记了群众性。同样，也不能强调“群众性”，就忘了共产主义。我们也不能集中全力注意教育而忽略了教育的共产主义性质和运动的群众性。必须遵守这一公式的所有三方面因素：既要群众性，又要保持在参加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教育组织的性质，还要保持共产主义政治组织的性质。

列宁在1907年讲过三大口号（八小时工作日、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财产），这些口号曾作为党的根本口号。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也应当像提出三大口号那样，以“三大支柱”为基础。我们有我们应当坚持的“三大支柱”，不仅要密切注意，不使其中任何一根支柱被人偷换去，而且要注意不让其中任何一根支柱倒下。我们应当牢固坚持共青团作为工人青年的群众性共产主义学校的这三大要素。

在即将结束发言之前，我想表示一点看法，即总的来说关于共青团工作问题的讨论表明，在基本路线和我们应该实现的重要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06—307页。——译者注

设想问题上，意见是相当一致的。代表大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对我们的所有支部都具有重大意义。资本主义稳定中隐藏着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发生社会斗争和危机的土壤日益扩大。外部矛盾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战争危险已迫在眉睫。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青年都可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我们领导的这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斗争中，青年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在于争取工人青年，从而去争取未来。同志们，我们认为，只要遵循代表大会提出的坚定的指导原则，青年共产国际是一定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的。（鼓掌。）

布哈林作总结发言

一、辩论的优缺点

同志们！会上展开的讨论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同志就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作了发言，发言者近90名之多。这在过去历届大会上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尤其需要特别指出并强调的是，一些黑人同志、东亚国家和整个殖民地国家的代表，特别是中国同志在会上发了言。还有一点也相当重要，即一系列南美国家的共产党人积极地参加了讨论，规模之大，在共产国际存在的整个历史上还是首次。还须指出的是，许多一向不受重视的小党的代表也作了发言。

总结讨论的结果，我要说，这些讨论是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的。所以我也先谈一谈辩论中带有典型性质的积极面。

首先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涉及到我们的提纲、我的报告以及共产国际和不同党的实践活动。

对于我们工作中积极开展自我批评的风气，应当抱竭诚欢迎的态度。几乎所有的党的代表都参加了讨论，这也是一个积极因素。尤其令人高兴的是，我想再说一遍，一些“新”党（殖民地国家和南美的党）的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

在提出的意见中，许多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对于这些意见，无论是这次大会的决议，还是在共产国际会后的工作中，都应当加以考虑。诚然，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多数属于非原则性意见，是就次要问题提出的意见，但是，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仍然提出了不少有份量的批评意见。属于这类意见的有：对农民问题的批评意见；根据对资本主义目前阶段的分析而提出的必须更多注意失业问题的意见；殖民地工作的一系列问题；黑人问题；与某些党及共产国际执委会实践活动有关的，特别是涉及我们整个机构组织工作中缺点的许多意见。

但是，讨论也存在一些消极面。首先是在讨论的内容上存在着某种局限性。在会上发言的多数同志首先或者完全只谈“本”国的事，而不涉及运动中与当前形势相联系的基本的和根本性的问题。不言而喻，我不反对这个或那个代表团去分析和阐述与他们直接有关的问题。相反，这样做是大家所希望的，因为它有助于交流经验，使我们的经验为集体所有。没有这种经验的交流，是难以想象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大会怎样开展工作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我仍然以为，发言者发言时不涉及基本问题，这是辩论中的一大缺点。这是辩论的一个消极面。

我不打算去谈会上发生的少数冲突，它使我想起海涅的一段诗句：

“这既非勇士们的决战，也非对心上人的颂扬；

而是云游僧舞刀弄剑，同犹太教牧师相较量。”（笑声。）

我不认为有必要去细谈“云游僧”和“犹太教牧师”一对一的决战。

二、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关于“第三时期”的争论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关于稳定的问题

同志们！我首先谈基本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稳定问题，以及我们争论中最主要的问题——关于所谓的第三时期的问题。

在前一次代表大会，即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正如你们所知，还没有出现“稳定”这个术语。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对经济形势和一般政治形势作过何种估计呢？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其关于世界经济的提纲中首先肯定的是世界经济的衰落。提纲直截了当地提到了世界经济衰落、货币混乱、欧洲经济危机。我们当时在经济提纲中即已指出，欧洲经济处于恶性循环之中，而且不可能摆脱危机状态。我们还指出了世界性的土地问题危机。共产国际在其提纲中强调指出了资产阶级无力克服货币混乱状况，等等。

第五次代表大会根据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通过了一项有关策略的决议。这项决议所作的一般政治分析的实质是什么呢？它指出的基本点是存在一个叫做“民主和平主义的时代”。

总之，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之后，我们指出了世界经济衰退，欧洲经济经常发生危机和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存在着一个“民主和平主义时代”等事实。正如同志们所知，民主和平主义时代表现于：英国的“工党政府”，法国“左翼联盟”的胜利，丹麦的

“工党政府”以及其他国家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联合倾向。这就是当时的一般形势，就是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对形势的估价。它只字未提稳定的事。“稳定”这个术语是 1925 年才初次出现在我们这个圈子里的。

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我要再三强调，以便指出整个形势发生了某种转折，——并未谈到稳定的问题。强调这一事实有何意义呢？之所以必须指出这一事实，为的是清楚地揭示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客观形势发生的变化变化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提纲的第一部分提出了关于第三时期的观点。我们在联共（布）代表团中也讨论过关于三个时期的论点并作了某些修正。当然，联共（布）代表团接受这种三个时期的划分法，并不一定成为证明这一论点无可辩驳的根据。这一论点还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论证。

为什么否定第三时期的存在是错误的

提纲中的有关段落是这样说的：

1.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经历了一系列历史发展阶段，这些发展阶段反映了资本主义总的危机的不同阶段。

第一时期是无产阶级的直接革命发动时期，这个时期的顶点是 1921 年。这个时期的结束有两方面的标志，一方面是苏联战胜外国武装干涉势力和国内反动派，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共产国际宣告成立；另一方面是西欧无产阶级遭受一系列失败。1923 年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是这个时期的终结点。这次失败是第二时期的起点。第二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形成局部稳定的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恢复”过程，资本发动全面进攻和无产阶

级大军因遭受严重失败而力量大为削弱，不得不进行防御战斗的时期。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苏联出现迅速恢复过程和在社会
主义事业中获得重大成就的时期。最后是**第三时期**，这个时期从
根本上讲是资本主义经济超过战前水平的时期也是苏联经济几乎
在同时超过战前水平的时期（开始了称作“改造时期”的时期，社
会主义的经济方式开始在新技术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对于资本主
义世界来说，这个时期是技术迅猛发展，卡特尔、托拉斯和国家
资本主义化倾向加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按资本主义
总危机（市场的缩小，苏联的存在，殖民地运动，帝国主义内部
矛盾的加剧）前阶段整个进程所规定的方式运转中各种矛盾急剧
发展的时期。这个第三时期使发展着的生产力与日益缩小的市场
之间的矛盾大大激化，它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
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
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声势浩大的阶级搏斗的新
时期。这个时期使一切**国际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的矛盾，
对华北的军事占领——这是瓜分中国和帝国主义者互相争夺的
开始，等等）尖锐化，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工人阶级
群众的左倾化，阶级斗争的激化）尖锐化，使**殖民地运动**（中国、
印度、埃及）蓬勃发展。这个时期的发展进程必然是，经过资本
主义稳定中各种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走向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
动摇，走向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

反对三时期划分法的人断言，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毫无区别，
因而划分第二、第三时期没有任何道理，完全没有根据，是多此
一举。

假定不存在区别。那么，世界经济超过战前水平的事实应当

怎样看待呢？我以为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事实。为什么呢？请允许我用通俗的语言加以阐述。举出的这个事实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发展演变的进程。在战前水平未被超过的时候，可以认为，这个或那个国家生产力的增长带有偶然性质，这种增长并不一定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东西，不一定是与该时期存在有机联系的特点。但是，当世界经济或这个经济的资本主义部分开始超过战前水平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作出更谨慎细致的估计，就应当对我们原先的估计进行较为重大的修正。我们的目光不会短浅到看不见如此重大的事实和视而不见的地步。

由此可见，这种区别是客观存在的。它是由技术的和经济的因素所决定的。闭口不谈这种区别是不行的。

有人说，第二和第三时期之间没有区别。那就要问一句：为什么我们对总的形势的估计发生了变化了呢？要知道，问题不是我们的脑袋变聪明了，而是形势变化了。在这一进程的初期还只是出现了稳定的萌芽现象，所以我们那时确有充分的根据认为这些现象或多或少带有偶然的性质。现在我们失去了这种根据。情况变得更为明朗了，现在事实具有更大的说服力了。这就决定了对形势应当另作估计。

许多同志否认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之间存在区别，可是同时又说矛盾大大激化。

那么，这种“矛盾激化”又从何而来的呢？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这两种看法是无法调和起来的。总不能既说“形势不存在任何差异”，同时又承认矛盾在激化。因为人们要问，这种激化的基础是什么？有人说，形势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中国却在进行着新的战争。“区区小事”，难道真是这样吗？这是对战争危险和业已存在的战争

的严重的估计不足。“形势毫无不同之处”，可是，反苏战争正在加紧准备。这难道也是“区区小事”吗？我们过于天真，却认为这是世界历史形势的基本特点。如果我们这样无知，竟看不到这些“区区小事”，那我们可真是一钱不值，我们就不可能指望赢得领导权了。作为领袖看不到形势有任何变化，认为欧洲经济是处在最低点还是处在迅速发展之中，都无所谓，认为中国是否爆发还是没有爆发战争，帝国主义是否在准备进攻苏联还是并无此种准备，如此等等，一概无所谓，这样的领袖算什么领袖呢！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看到所有这些新的事实，那我们算是毫无出息的人了。那么，我们的策略路线（试比较英国、法国等等）也就无法理解了。既然我们在老地方原地踏步，那么策略路线也就是多余的了。

我列举了一些为反对第三时期提法而提出的最尖刻的论据。还有其他一些不太绝对的论据，例如说：第三时期看来是不存在的，但是，还是应该提到的。我想抱着良好的愿望但又是准确地对这种“论点”也进行一点分析。

先回答波兰代表团库斯特齐瓦同志的问题。库斯特齐瓦同志说：

“至于谈到战后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的问题，我们认为，区分第二和第三时期的界限不能以技术进步为特征，因为技术进步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总的恢复时期的前提。第三时期的特征究竟是什么？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在稳定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那些矛盾，现在开始表面化并震撼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坦率地讲，我不理解这种议论的逻辑。不是技术发展，而是矛盾！但是，矛盾本身又从何而来呢？库斯特齐瓦同志讲到与“生产

力的高度发展”相联系的矛盾。我要请问库斯特齐瓦同志,没有技术进步能否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呢?迄今为止,我和许多同志一样,都同意马克思的说法,认为生产力是劳动工具和劳动力的总和。因此,不能把“生产力的发展”同“技术进步”分割开来,那样做是错误的,在理论上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提出本时期生产力获得高度发展的论点的同时,却又否认该时期技术的巨大进步;坚持认为与生产力方面的变化有关的矛盾正在激化,同时却又排斥这一判断事物的准则。这种态度即使从最简单的逻辑常识来看,也是完全不协调的。

第二个谈到这个问题的发言者是斯特拉霍夫同志(中国)。他说,我们不太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相信,第三时期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赞成在提纲中提到这个第三时期。

谦虚是一种美德,对于某些共产党人来说,它是十分需要的。对此我可以完全表示同意。但是,同志们,我不能承认,这一切都是有根据的。当斯特拉霍夫同志讲到第二和第三时期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的时候,下面有人喊“讲得对”。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声音,但它不能证明发出这一喊声者具有特别的逻辑能力。如果说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依存关系的话,显然,在逻辑与发声功能之间不一定存在同样的关系。

斯特拉霍夫同志在发言结束时说到,提纲中还是应该提出第三时期。但是,既然第二和第三时期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亲爱的斯特拉霍夫同志,那又何必筑一道墙呢?或许是我们的纸张太多,无处去使?说第三时期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提纲中仍应提到第三时期,这种说法同样不是什么高明的逻辑。有时是存在这种情况:提纲中包含的某些东西,而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我同意。但是,说

这种提纲是策略高明的表现，恐怕我们谁也不会相信。因此，如果第三时期不存在，那最好把它从提纲中删去。但是，如果您建议在提纲中保留它，那就说明您内心有愧，您感觉到，这个倒霉的第三时期终究对您还有点什么“用处”。它当然是“有用处”的：它会帮助我们制订出正确的策略。

提出关于第三时期问题的意义是什么呢？“这篇大道理的用意”何在呢？用意在于我们以此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稳定不会一朝一夕就在世界经济中消失。这样的强调是必要的。我们的代表团在谈到第三时期时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三、战争问题是中心问题

战争危险是整个局势的中心

现在谈第二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引起的辩论比第一个问题更热烈。可惜的是，就这个问题发言的同志还不算多。我想先提一个题外的问题：对执委会报告人的要求是什么？是否要求他周游世界，然后来报告说：墨西哥发生的事如此如此，阿根廷又如何如何，尼加拉瓜的情况迥然不同，而合作化运动中又怎样怎样。是否要我走遍全球并且把一切都讲得那么彻底，既讲合作化运动，又讲墨西哥政府呢？喔，那样当然所有同志都会感到满意。例如，墨菲同志会得到充分的满足，因为我谈到了合作化运动。（笑声。）假如我再讲几句关于墨西哥的情况，墨西哥的同志也会感到满意。也许这是一种好办法，因为所有同志都会由于我提到了“他们的”运动而普遍感到满意。可是，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的核心是要从纷云繁杂的事实中把握住基本的趋向并根据这些基本趋向确定

主要的策略方针。我认为，这才是我的任务。那么，当前整个形势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指出了世界经济在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整个世界形式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我们策略的关键又何在呢？我在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坦率和明确的回答：战争问题是整个形势的中心问题。战争危险则是形势的核心。依我之见，战争危险是目前整个形势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

帝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反应

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我想首先可以同无产阶级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党人进行一番“辩论”。他们的报刊已经对我的看法作出了反应。首先讲一讲波兰的帝国主义报刊。半官方报纸《时代》发表题为《苏联的忠贞》的社论，对我的观点进行评论，其中写道：

“布哈林的报告证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是一码事。迄今为止，苏联政府一直是把自己同共产国际分开的，而希望无论如何都要同苏联保持正常关系的国家也一直是这样理解这种公式的。波兰也属于这样的国家。现在，这个公式站不住脚了。因为苏联政府不能宣布不承认布哈林是政治局，即苏联最高政权机构的委员。李可夫坐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主席团位子上（显然是把李可夫和美国人或印度人混淆了！——布哈林），所有的苏联报纸都刊登了布哈林的报告，这些情况证明，苏联政府不再把自己同共产国际分开了，它揭下了伪装。现在我们明白了，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是一码事，苏联政府正准备同波兰打仗，波兰共产党人将在这次战争中扮演间谍和破坏者的角色。”

另一家波兰报纸，即波兰陆军部机关报《波兰武装报》写道：

“布哈林关于波兰共产党在一旦爆发波苏战争时所起作用的声明并不使人感到突然。但是，令人注目的是，这位在目前统治着俄国的黑手党中担任一系列高级职务的政治家，在讲到可能同波兰作战时竟不认为有必要掩盖其计划和目标，使用了十分大胆的、可以说是极其蛮横的语调。这时我们才发现，仅仅是所谓共产主义制度存在这个事实以及对这种制度的宽容态度，就可能给每个国家的对内和对外关系带来多么严重的、毁灭性的破坏。布哈林的声明迫使那些至今一直要求让波兰共产党合法化的人们哑口无言了。因为共产党就是敌人。

毕苏斯基是共产主义制度最危险的敌人，所以，一切反对共产主义的人都应该团结到毕苏斯基的周围来。”

同志们，你们一定十分清楚，这些言论的含意是什么。从我的报告中特地挑出了关于战争危险这一点，这绝不是偶然的。

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也对我的报告作出了反应。国际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周刊（7月27日号）写道：

“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措词华丽的提纲被说成是对奇迹的一种政治信仰，这种信仰的先知先觉者就是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中，对奇迹的政治信仰曾以多种形式出现。一会儿说德国应当出现奇迹，一会又说巴尔干会出现奇迹，一会儿又说奇迹来自太平洋岛国。现在，布哈林又求助于中国，求助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矛盾，但首先是求助于战争。”

这家周刊接着发表“评论”说：

“老一套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兴起来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增长导致对市场的争夺，争夺市场的斗争则导致战争，一定如此，绝无可能避免这一前景。就像太阳必然升起那样千真

万确，战争必然爆发，而且很快，甚至极快爆发，也成了不可怀疑之事，因为布哈林讲了：战争乃是当前的迫切问题。一旦爆发战争，则必然有进一步的发展：帝国主义战争将产生国内战争、世界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的胜利！世界革命万岁！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因为这还是第二步行动——战争万岁！”

照此说来，我们的口号成了“战争万岁！”该周刊继续写道：

“他们竟然相信会出现奇迹：社会民主党发展的连续性及其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在政治实践中所采取的行动的继承性将会中断！历史将再次从1914年开始。即出现新的1914年，这就是给世界各国共产党散布的幻想，好让他们闭眼不看他们所面临的不很美妙的前景和当前毫无出路的处境。于是，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老的论点：战争乃一切创举之开端。”

同志们，请允许我从自己的角度对这些评论也作一番评论。首先讲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只要读一读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爆发前历次党代表大会的最后决议，就足以看清楚，社会民主党人是多么随随便便地抛弃了一度也曾被他们作为决定其在战争问题上立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的。我曾亲自出席过社会民主党在开姆尼茨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我记得这是1912或1913年的事情。哈泽宣讲了报告，所有这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都曾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在关于战争问题上的指导性理论。就连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也是以这个“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战争和革命

让我们看一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这些问题是怎样看的。

譬如，“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于1854年2月2日在《纽约论坛报》发表的题为《欧洲战争》^①的文章中写道：

“但是不要忘记，在欧洲还有第六个强国，它在一定的时刻将宣布它对全部五个所谓‘大’强国的统治并使它们个个战栗。这个强国就是革命。它已经长久地沉默和退却，但是现在商业危机和饥饿又把它召上战场……”

只要一个信号，这个欧洲最大的第六强国就会披戴灿烂的盔甲、手持宝剑昂然地走出来……这个信号将由快要到来的欧洲战争发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卡尔·马克思当时就是这样估计形势的。那么，大名鼎鼎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又是怎样估计的呢？恩格斯在1887年给西吉斯蒙特·波克罕的小册子撰写的序言中写道：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同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

^① 这篇文章系恩格斯所写，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9页。——译者注

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如果已达顶点的军备竞争制度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景就是这样。国王和国家要人老爷们，这就是你们的才略把旧欧洲所弄到的地步。如果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开始跳一场最后的大战舞，那我们是不哭的。就算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就算它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但是，如果你们放纵你们以后将无法对付的力量，那么不管那时情况如何，在悲剧结束时你们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取，就是终于不可避免。”^①

我读了这么长一段引文，为的是给大家听一听，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战争和革命之间的联系是怎样考虑的。不过，可能有人会说：不错，这是已经部分得到实现的预言。整个问题正好是这样：您引证的文字作为同社会民主党进行辩论，那是很好的论据。但是所有这一切能否都用来解释目前的形势呢？对此我想引证另一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同志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可能会繁荣起来。他写过，也设想过革命今后发展的前景。他在这方面说过些什么呢？列宁同志写道：

“我们不想忽视这样一种令人失望的可能性，即尽管群众的不满和骚动多次爆发，尽管我们很努力，但是仍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产生革命，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人类还会经历第二次帝国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1—402页。——译者注

战争。”^①

由于战争的结果，革命在某些国家中取得了胜利。苏联已经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无产阶级在苏联赢得胜利后，列宁仍看到爆发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前景。在去世前不久写的最后一篇遗作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一前景。他讲到并写到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和第二批伟大的革命**。我认为，他这样说是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一切真正能够理解世界形势的人们的传统的。

为什么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民主党人焦躁不安

现在我问你们，同志们，为何帝国主义者谈到战争就如此焦躁不安呢？社会主义党内就此问题出现的不安情绪又从何而来呢？为何正是对我报告中的这个问题会有如此激烈、突然和直接的反应呢？把这一点细细思考一下。为何首先遭到抨击的是关于即将爆发世界大战的论点呢？为何还在搞其他种种名堂来反对我的“蛮横的行为方式”和反对我的“蛮横的”言论呢？

这是因为，客观上关于战争危险的问题，是整个国际形势的**中心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敌人对我们的分析作出如此神经质的反应的原因所在。

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揭露了他们的罪恶活动**，撕下了这一活动的一切伪装，戳穿了一切假象，我们公开地指出了帝国主义者怎样策划和进行战争的真相。许多同志忘记了战争正在东亚进行的事实。难道能够一笔抹煞这个事实吗？也许我们应该说，这个战争是指对“不文明的”人民——中国人的，所以，对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78页。——译者注

于我们“文明的”欧洲人来说它并不存在？只有瞎子才看不到，战争已在中国进行。只有瞎子才看不见，日美矛盾激化到了何种程度。同时，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为了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了社会民主党的利益，为了一切希望维持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们的利益，就必然要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冲淡这个命题。帝国主义在行动。它在耍弄手腕。它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和平主义”条约，如凯洛格公约。它使出了巧妙的花招，譬如，美国政府最近向南京政府发出的照会。它还采用其他许多手法；组织国际联盟代表会议，空喊和平口号，总之，帝国主义正千方百计掩盖其罪恶活动的基本事实。社会民主党如何呢？社会民主党现在的主要作用何在呢？它的主要作用还是掩饰当前形势发展的这一基本事实，从思想上粉饰，甚至抹煞这一事实。他们高喊，资本主义大国渴望和平，只有“可诅咒的”无产阶级国家才是和平的破坏者，其原因就在于此。他们为国联和其他一切和平主义组织唱赞歌的原因也在于此。难道这还不清楚吗？我们可是千百遍地讲过这一点。真正奉行和平政策的国家只有一个，这就是苏联。建议认真地实行普遍裁军的国家只有一个，这就是苏联。对任何重新瓜分世界，对任何殖民地和“委任统治”都不感兴趣的国家只有一个，这就是苏联。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才竭力破坏一切有效的相互关系。

四、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外矛盾

低估战争危险是对共产国际威胁最大的危险

帝国主义在说：我们不需要战争，是苏联需要战争。连那位

毕苏斯基也在一本正经地说，我不要战争，是苏联要战争。可与此同时，他们都在发狂似地加紧准备对苏联发动进攻战争和相互之间的战争。我绝不是想说，几个月后这场战争就一定会爆发。我绝对无此想法，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人，他能够准确地断定何年何月爆发战争。问题也不在于早几年还是迟几年爆发战争。反正战争危险每月都在增长。我认为，这是一清二楚的。帝国主义关切的是如何冲淡这个命题，社会民主党人关切的同样是这一点。我们却毫无必要去掩盖事实。所以，我不同意以任何形式去缓和这一事实的严重性，哪怕是采取把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分割开的形式也罢。

某些同志——我们代表团中也有孤零零的几个人而且到末了还是孤家寡人——他们在一只口袋里装着内部矛盾，在另一只口袋里装着外部矛盾。这样做对吗？不，这是不对的。这是对战争危险估计不足的表现。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这是存在于共产国际中的右的危险的表现。对我们形成威胁的主要危险是对战争危险估计不足。由于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相反，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有责任采取最通俗的方式讲清这个问题，以避免产生一切误解，并尽可能地作出清楚的说明。

那么，首先要问，我们共产国际内部是否存在低估战争危险的现象呢？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很多同志如多列士、塞马尔、艾尔科利等都谈到过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谈到了这一点，并且强调指出，在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党的实践中，诸如中国革命、日本侵华战争等，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但是，客观形势表明，战争危险日益增长，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党人的立场已经一清二楚，所以，我们应当十分严肃地对待低估战争危险的问题。而产生这

种低估战争危险的原因在于，把战争危险问题与其他许多问题一样看成是很平常的问题。我们没有把其他问题与战争危险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使其他一切任务服从于反对面临的战争的斗争。而正是这样地提出问题才符合客观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因此，我想较为广泛地阐述这个命题。

同志们，你们也知道，列宁在就海牙会议撰写的文章中曾经说过，战争时期或即将爆发战争的前夕，总有一部分共产党报刊要出丑的。当然，也可以说列宁是位“悲观主义者”，但事实如此，白纸上写着黑字，列宁确实是这样写的。这就是说，列宁确实是这样描述形势的，确实是这样“不谨慎”地表达的！我不知道，这些预言是否实现，但我清楚，由于对战争估计不足，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所以我要问一声，有什么危险可以和这种危险相比呢？几乎没有，因为这是整个形势的基本问题。

应该怎样提出关于内部和外部矛盾问题？

我请你们审议一下，这是否确确实实是基本问题。如果你们承认它是基本问题，那就很容易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依我的看法，如果有人试图将重心从这个战争危险问题上移开，转到内部矛盾或其他什么东西上面去，那就意味着他们不懂得形势的全部严重性。而所以那样提出问题，是与某种过低估计业已开始的对华武装干涉有关系的。我认为，我们在谈到各党缺乏足够的国际主义精神时指出的那些缺点也是同这一点有关系的。

与此同时，关于内部矛盾及这些矛盾和外部矛盾处于何种联系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我已经说过，某些同志的做法是，一个口袋里装着内部矛盾，

而另一个口袋里装着外部矛盾。这种观点不符合事物的客观状态，必然导致错误的策略结论。我们不妨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我首先要问，没有战争是否可能有革命形势？这个问题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回答是，当然可能。断言只有爆发战争才会出现直接的革命形势，那是十分荒谬的。诚然，从历史上看，大的革命多半是因为存在战争而爆发的。普法战争时期诞生的巴黎公社、紧接日俄战争之后爆发的俄国第一次大革命、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欧亚两洲因世界大战而爆发的一系列革命，都可以作为例证，这些革命都与战争密切相关。但是，能否断言，在我们的时代，甚至在德国或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中，也只有发生战争才能出现直接的革命形势呢？这种看法将是十分荒唐的，它在实践中将意味着我们应当“等待”战争的爆发或在自己的工作中只考虑这一种前景。试问，我们是否应当作为一种主观因素，作为一种肯定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作好迎接革命形势的准备呢？当然，毫无疑问是应该的。我再说一遍，提出其他的策略将是荒谬的。但是，爆发革命的可能性的程度（我们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在不同情况下是各不相同的。我觉得可以这样来表述：直接的革命形势，譬如说在欧洲，我看，即使没有战争，也是可能出现的。但是，在存在战争的情况下，直接革命形势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一旦爆发战争，直接革命形势将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机会。战争必然伴随着革命。因此，否认在单一的内部矛盾发展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直接革命形势，那将是根本错误的。

为了驳斥一些同志把内外矛盾完全孤立起来的折衷主义观点，现在有必要阐明关于这些矛盾互为作用的问题。

这两类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赖以作为出发点的关键何

在？在进行这种分析时应得出何种结论？我们策略方针的基础应该是什么？依我看，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是世界性的经济矛盾，是大的世界性冲突。就以英国为例吧。那里的内部矛盾是否在激化呢？当然在激化。但是，英国这种矛盾的加剧是与世界性的大英帝国的衰落过程相联系的。而大英帝国衰落的根源难道不是多半在于国际形势吗？难道衰落的原因不是由于美国的竞争、英国自治领和部分殖民地存在离心力，以及其他一系列国际因素吗？如果英国资本主义处于另一种国际环境，那你看，结果也将会是完全不同了。

现在举另一个例子，即以德国的内部矛盾为例。谁个不知，德国的稳定是美国资本主义促成的呢？能否把这个国家的内部关系同国际因素截然分开呢？假如美国稍一停止给德国贷款（佩什描绘过这种前景），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内部的崩溃。

现在我们谈另一类事实。为何我们仅仅局限于涉及经济学的方面呢？我指的是政治学，部分地也指政治经济学方面。例如，我们谈到“工业稳定”、“蒙德主义”、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为以及它同国家机构融合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你们试试看，能不能单纯地从内部矛盾增长的观点来解释这些情况呢？你们就办不到了。“工业稳定”是什么意思？这是最明显的所谓国内和平的方式，也就是准备战争的最好的手法。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无视问题的实质。产生英国工会法的原因是什么呢？无视外部问题和完全忽视准备战争的活动，那样能否理解英国的这个“内部”法案呢？如果无视这一切，那我们连比较勉强的反对这一法案的宣传鼓动活动也搞不起来了！社会民主党这一新的方针是同所谓建立国内和平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一

方针难道不是更突出了社会民主党在对外政策方面所扮演的叛徒角色吗？这一点难道不是连3岁小孩也一清二楚的吗？社会民主党正将其整个方针的重心摆到这一方面。能否找到这种怪人，他会否认邦古的战争法案与法国国内形势及其外部形势之间存在着联系呢？我还可以列举一系列这类事例，但上述所引事例已经相当令人信服地说明，一切其他的问题都是服从于战争危险这个中心问题，服从于战争问题的，内政问题如此，内部矛盾问题也是如此。对内政问题及与内政相联系的策略问题采取任何其他的态度，都将是缺乏根据的，也决不会是革命的态度。

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应当贯穿于 我们整个日常工作

我们大家都认为，必须加强日常的群众斗争。某些党在实践中却在这方面大有问题。可是在理论上大家都是同意这一点的。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工作区别何在呢？我想是应该有区别的。那么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共产党人必须将大众关心的问题（而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关心这些问题）同所谓“大的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拿一个英国共产党员来说罢。当他面临着组织一次哪怕小范围的罢工任务的时候，他该怎样开展鼓动工作呢？必须把反对限制工会自由的斗争和群众迫切的要求，和反对工会法的斗争联系起来。把这个工会法同“蒙德主义”和战争准备活动摆到一起，把反对战争的斗争同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联系起来。他就应当这样开展活动，否则他就不成其为共产党员了。无产阶级中极其广泛的阶层参加过上一次世界大战，他们知道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强加给人类的这场灾难的“代价”及

其无法形容的卑鄙无耻的程度。我们开展日常工作时，应当结合群众所关心的哪怕稍带某种重要性的问题，指出战争的危险性。丢掉自己手中的这张王牌，从技术上讲是可能的，但从政治上讲，那将是极端不明智的。我想毫不含糊地向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好好考虑考虑。依我看，我们对形势可能有两种估计，而且不同的分析会产生不同的策略方针。一种方针是总的问题和日常工作问题互不配合，另一种方针是坚定地把一切日常要求同战争问题——我们时代的中心问题联系在一起。共产党人的策略应当是，坚定地把一切局部的当前的迫切问题同总的大问题联系在一起。当然，这种联系要求有很高的技巧：高谈阔论，空喊一阵是不行的，必须采取巧妙的方法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不能孤立看待各种问题，而要统筹兼顾，使各种问题从属于目前的基本问题——战争问题。我们批判社会民主党人（右的和“左”的），因为他们是最有害的欺骗工人阶级的能手，同时还要强调指出，所谓“经济民主”和“仲裁”不单是在经济上起作用，而且是一种准备战争的活动。必须让无产者，让贫苦农民看清这一点，必须这样来开展我们的全部宣传活动，必须按这个方向来制定我们整个的策略方针。不需要杂乱无章地罗列一大堆事实，而应当从种种事实中，从一切发展着的倾向中抓住中心，抓住战争危险这个中心问题。在统筹解决局部要求和战争问题及反对战争的斗争的关系问题时，我们应当把这些活动同宣传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当然，即使不发生战争，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斗争也会被提到首要地位上来的。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即便如此，也必须指出，战争已经给未来投下了不祥的阴影。总之，我已经分析了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强调指出了不能采取折衷主义态

度对待这个问题。这个分析说明，必须制定坚定果断的方针，必须集中注意战争问题，注意把其他一切问题同它联系起来，注意开展专门的宣传鼓动工作，使无产阶级作好同资产阶级，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的准备。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策略方针。这是共产国际唯一可行的方针。

五、共产党的某些局部性工作问题

必须为工会问题上的正确路线而斗争

现在我们谈几个局部性问题，但每个局部性问题都有其本身相当重要的作用。请允许我先就我们的工会策略问题，就我们在工会中的工作问题讲几点想法，因为这个问题在会上曾引起辩论。共产国际各个执行机构曾通过决议、通告、信件和其他文件，一再强调必须联系统一战线策略，在工会中开展艰苦的工作。这是人人皆知的。我在会上描述并分析过的世界形势，更加尖锐地突出了这个问题，再次把争取群众的任务提到了首位。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若要顺利地反对战争危险，反对这种危险的战争，前提就是要争取群众。不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就不可能争取群众。从我们的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重申我们原先说过的话：加紧开展工会工作是极其需要的。

我们不应当丧失争取实现工会统一斗争中的主动权。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尤其强烈地感到需要有群众根据地。这就是加强整个工会工作，特别是加强工会国际的工作之所以成为各国共产党基本工作任务之一的原因所在。在这次会上讨论工会问题时冒出了各种倾向。一些同志提出，必须把未加入组织的人组织起来，必

须建立独立的组织与反动工会相抗衡，在前提条件十分明确的情况下，应当将从改良主义者那边争取过来的组织合并到工会国际所属工会中来。这就是我们所捍卫的路线，就是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基本通过的那条路线。但是，我们在会上听人讲到，存在着种种抵制上述决议的倾向，说工会工作缺乏共产党本身的面貌，由于害怕被开除出工会，有的人完全屈服于改良主义等等。不过，也有另一种倾向，有人甚至企图从理论上为这种倾向寻找根据，这就是否认有必要在反动工会中开展工作的倾向。这类倾向往往来自下面，原因是在反动工会中开展工作实在困难，因为我们确实会被开除出反动工会，所以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工作，必须对我们的路线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产生退出反动工会的倾向，还有一个原因，即在许多国家的工人中都存在着大量未加入组织的工人。在美国，甚至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中，都有这种情况。多烈士同志发言时说，在法国，参加组织的只是工人中极小的一部分。十分清楚，把未加入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是当前的基本任务之一。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此而放弃在反动工会中，包括在工会运动已发生分裂的国家的反动工会中开展工作的口号。某些同志企图从理论上证明，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工会等等是根本无法争取过来的。他们把工会机构和国家机构进行类比。说什么争取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也好，恩格斯也好，还是后来写过《国家与革命》小册子的列宁也好，都曾指出过，把国家争取过来，就是要打破国家机器，用新的国家机器取而代之；争取国家的过程即在于此。

这些同志对工会状况的判断也是按这种类比办法进行的。说什么工会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有组织的官僚机构，这是一部类似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机器，据他们说，这种机器只能加以摧毁，而不可能争取过来。而只有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之后，才有可能摧毁这部机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夺得政权之前，不可能控制反动工会。从这种前提出发，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否定在由改良主义者领导的工会中开展工作的结论。但这并不能证明，反动工会无法争取过来。不错，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在许多国家中很可能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在夺得政权之后，才能在这方面取得彻底的胜利。我国也有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从未放弃对孟什维克工会的工作。光说不可能争取过来的话，这是对形势过于悲观主义的估计。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不是由工人构成的。工会的情况则是，上层是一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而下层是按职业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争取”不到整个机器，但可以争取下层，争取工厂委员会和这个机构的某些环节。一处突破，就可以向纵深发展。只要依靠群众，在这条工会战线的某些地方打开缺口是可以做到的。是否可以把这称作是打破或摧毁了机构呢？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的。撤掉改良主义领袖，用我们的人取而代之，我们就改组了这个机构。对这个或那个机构的任何占有，都意味着对这一机构的某种“清洗”，意味着对它的改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但是，从理论上把工会和国家进行对比是没有根据的。

列宁在其光辉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十分尖锐地提出了必须对反动工会开展工作的问题。列宁举出的论据是大家所熟悉的。不应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必须依靠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反对派进行斗争。会上曾有人讲到德国共产党发生的令人愤慨的情况。我

们也应当反对那种脱离革命形势提出（这样做孕育着严重的危险）的诸如工人监督生产那样的口号。必须首先反对这种真正的右的倾向。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应该陷入另一极端，否认对反动工会开展有效工作的可能性本身。

对群众组织的工作

我们在讨论青年工作问题时提出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工会工作。我们要求青年带着自己的信仰，到一切有工人的群众组织中去，而不要顾虑这些组织的非共产主义或非革命的性质。在我们加紧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没有这种斗争就不能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时代，在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前景的情况下，深入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是我们夺取胜利所绝对必需的前提。不实现这个前提，我们共产党的存在都是难以想象的。对我们影响的增长抱单纯的乐观希望是不够的。我们对这种增长表示祝贺，但是，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党日益增长的影响和组织上巩固这种影响之间，存在着众所周知的不相适应的情况。要清除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就需要我们对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展开强有力的工作。威廉·明岑贝尔格同志讲得十分正确，他说我们应当极其注意群众组织。这些组织的形式多种多样，然而我们到处都应占有自己的阵地。顺便说一句，明岑贝尔格同志指责我低估反帝同盟的意义，这是完全不公正的。我在报告中和一些同志展开论战所反对的正是这些同志对反帝同盟的取消主义倾向。他们企图从理论上肯定这些取消主义倾向。赞成这种倾向的人说，这不是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甚至也不是无产者的组织，那里面有许多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明天就会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叛徒，等等。反对在这些组织中开

展工作的人担心，这种不定型的非共产主义组织会“取代”了共产党。被归入这类组织的有：反帝同盟、“统一小组”，还有苏联一些有知识分子或没有知识分子参加的工人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等等。某些同志担心共产党会被这些组织排挤掉。当然，把这些组织想象成是取代共产党的机构，那将是对共产主义的出卖。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是，有谁这样去看问题呢？我们不是把这些组织看成共产党的替代物，而是把它当成向广大群众施加影响的据点。明岑贝尔格同志说，布哈林同志也许因为手头缺乏情报资料，所以没有指出同盟在墨西哥的大规模活动。确实，同志们，我没有谈及这个问题。但是，墨西哥难道就能洗清一切过失吗？譬如，我就没有看到同盟在中国问题上做过有益而必要的工作。它在这方面做得太少了。明岑贝尔格同志比别人更清楚同盟在组织上的弱点。我提到同盟的缺点，不是为了建议撤销我们对它的支持，而是为了帮助它。不是威廉·明岑贝尔格一人，而是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对同盟的帮助太少了，我们没有给这个组织派出足够的力量。我们的党没有给同盟以应有的协助。这是毫无虚饰的事实，应当据此事实作出结论。

群众组织问题属于最重要的问题之列，即将召开的全会应当制订一系列实际措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路线清楚了，但实际行动不够。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就这个问题通过决议，也不知讨论过多少次了。这些决议可以拿出来显示一番，但实践不符合这些纸面上的决议，这是事实。

关于失业问题

一些人在会上谈到失业问题是不无根据的。许多同志，特别

是英国的汉宁顿同志都谈到这个问题。提纲中的有关部分应当加以发挥，给这个问题以极大的注意。

昨天，由于某些涉及美国的特殊问题的缘故，会上就失业问题展开了辩论。罗明纳兹同志对瓦尔加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指责。一方面，他说瓦尔加同志在谈到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人数下降时修正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这种情况，据他说，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另一方面，罗明纳兹同志声明，他不同意我的下述说法，即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类似的东西，因为马克思曾列举过无数这样的事实。

我想应当从这两个论点中选择一个：或者是类似的情况过去和现在都存在，或者是不可能有任何类似的情况。（罗明纳兹插话：“不存在发展的规律。”）

不错，不错，不存在发展的规律。（罗明纳兹插话：“我这是针对瓦尔加讲的。”）可您也是同我进行辩论的呀。

第二个论点是排斥第一个论点的。罗明纳兹同志在这里是一箭双雕，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情况究竟如何呢？一般来说，工人数量是否可能减少呢？可能的。这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列举的那些少数情况那样，是可能发生的。不是“某某人”，而是罗明纳兹同志提到的那位颇有名气的法国经济学家汉尼尔发挥了一整套理论：资本主义愈发达，工人数量愈会减少，而资本家的数量增长得愈快。如此说来，工人会变成资本家了！马克思说，这是一派胡言，这种理论是腐朽而令人发笑的。但是，难道在涉及“美国”情况时谈过这类话吗？难道瓦尔加同志和卡维尔（以及加尼耳）持同一看法吗？难道瓦尔加说过，工人会成为资本家吗？天晓得！瓦尔加

讲的是工人成为**失业者**。因而根本没有加尼耳的一点影子！因此也不必去惊动加尼耳。其次，马克思列举了个别工厂的个别例子，说那里的工人数量在减少。那么现在是否可能在某一个国家，哪怕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发生（首次！）同样的情况呢？我想是可能的。可能会有某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发展特点**，就像马克思时代英国工业中那些与众不同的个别工厂或个别部门那样。如果我们现在提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自然法则”，那会是极不慎重和极其不当的。首先，我们极少占有经过验证的资料，作不出这样的归纳。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谈论已有的事实。有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就是美国。

一个拥有如此雄厚经济实力而且技术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的国家，它的前进速度不同于总的平均数而一时出现飞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美国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

这意味着什么呢？从整体上进行全面分析来看，这意味着产生失业的过程是多种多样的，有着各不相同的过程：由于不景气、危机，可能造成失业人数增加；由于实行合理化，可能使失业人数上升。最后，还有像美国出现的那种情况，即由于技术的飞跃式发展而使工人的绝对数量时而出现缩减。

我绝不同意许多同志在会上提出的那种论点，说什么美国帝国主义的内部潜力已经“枯竭”。这种潜力并没有挖尽，而且我从根本上反对这种观点，因为这在理论上和原则上都是不正确的，这是卢森堡的理论。（有人喊道：“这是瓦尔加讲的！”）是的，瓦尔加也讲过这种话，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瓦尔加的看法。这种观点不对，这是罗莎·卢森堡理论的翻版。在目前这样的市场关

系中，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每次补充投资不可能像在南美那样获取那么多赢利。而这个问题不像某些同志想的那样简单，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总的结论是：产生失业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对于这些原因必须进行分析。有萧条时期发生的失业；有合理化引起的失业，甚至在发展曲线上上升时也会出现失业；还有在技术发展速度极快的情况下，与发展曲线迅速上升同时出现失业曲线的迅速上升。譬如说，英国和美国的失业，就是不同类型的失业现象。我们共产党人把所有这些失业现象看成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产物，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应当利用这些矛盾的发展，促使阶级斗争的激化。

农 民 问 题

现在讲几句关于农民的问题。我认为，科拉罗夫同志以及意大利、巴尔干、南美、波斯的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批评性意见是很有根据的。但从我自己这方面讲，我也可以指责所有这些同志，说他们只字未提到农业无产阶级。而这个问题在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现在，整个农民问题情况如何呢？我认为，我们在1925年的有关决议中对这个问题的总的提法至今仍然是正确的。随着资本主义暂时稳定时期的出现，我想，在高度发达的西欧国家中，我们在农民中开展工作从客观上讲，将比较困难。

广大农民群众（不是中国型、俄国型或罗马尼亚型的那种处于赤贫状态的农民，而是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西欧式的“中农”和“下中农”）在整个资本主义机体发生巨大震荡时是处于巨大的骚动之中的。不能把中国的农民和德国的农民类比，也

不能把我国的中农和德国的中农类比。这是完全不同的类型，这是另一种农民。

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讲过这一点，而且强调指出了这一差别。由于受到战争和西欧发生的巨大动荡的影响，这些阶层同样发生过摇摆。但是，在目前稳定时期，我认为，要在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这类农民开展工作，将是十分困难的。

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强调在农业工人中开展工作的重要性。在不同的国家中，农业无产阶级现在正遭到全面的进攻。与此同时，在另一类型的许多国家中，土地问题日益尖锐：巴尔干国家，特别是罗马尼亚爆发的事件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在这些国家中我们应将这一问题作为我们最重要的政策问题提出来。对那些在最近的将来可能出现直接革命形势的殖民地国家，我们也应当采取同样的态度。譬如在中国，农民问题就是革命的最迫切的中心问题。对南美各国的农民问题，我们也应当给予特别的重视。南美各国的国家政权几乎都有其特色（执掌政权的是大土地占有者、大地主）。其中某些国家是大地主执政，实行一种兼有资本主义剥削和封建奴隶关系的制度。在某些实行种植园制度的外国殖民地国家，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些国家立有专门对付黑人的特别法规。在印度尼西亚、印度、南非（黑人被剥夺了土地），农民问题起着极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我们某些党来说，在这些国家中，农民问题是主要的、基本的问题。以欧洲国家为例，这个问题在波兰同样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然而，就这个问题发言的同志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在提出的具体建议中，我只举一条，这条建议归纳起来是，我们

应当重新考虑我们在 1925 年对农民政党的看法。这条建议的发起人认为，在具备上述客观前提的情况下（在某些国家中农民问题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我们应当组织农民政党。

我不同意这项建议，并且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要接受这项建议。为接受这项建议而列举的理由是缺乏说服力的。有人对我们说，既然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农民问题，特别是各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及南美国家的农民问题，那么，据他们说，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即必须组织农民政党。但是，为什么呢？我们已经审议了这个问题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提出必须组织农民协会，争取扩大在该协会中的影响及通过我们的党团来监督协会活动。在我看来，这个方针过去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仍然是正确的。有什么必要再成立一个特别的农民政党呢？如果从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可能发展和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来考察这个问题，那么，成立新的政党将意味着什么呢？要知道，那将意味着同共产党争夺无产阶级。因为你总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在某时某刻之前我们“允许”这个党存在，时候一到，我们就二话不说，要“消除”和取消它。不，同志们，这个党会发展起来，最终成为同共产党竞争的党。当然，如果农民党已经存在，那么，我们应当努力地争取它，使它接受我们的影响。但是，在首次提出组织农民的问题的地方，我觉得建立农民协会要好得多，因为通过这种途径，我们可以把更广泛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通过更可靠的方法引导劳动农民阶层跟我们前进。这种农民组织形式可以吸引更多的成员，也更容易使它接受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影响。可见，所有这些政治考虑都说明，不能接受上面那种建议。我们以前就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说明我们制订路线的

依据的。

在南美开展工作的意义

请允许我再谈几个问题。

首先我要强调一下南美国家的的问题。我已经讲过，南美各国党派出如此广泛的代表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这还是首次。这当然说明了我们的运动在南美各国已得到发展。这些国家现在对我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在世界政治中起着一种颇为独特但十分巨大的作用。我们已经指出过美国资本主义在南美日益严重的侵略性，也指出过尼加拉瓜反对北美合众国帝国主义入侵的解放战争。我们大家清楚地知道，墨西哥的抵抗具有何等巨大的意义，我们也知道，这种反抗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强大的人民运动现在正在一系列南美国家中发展起来。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个问题是和各该国的某些内部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在对南美国家的策略方针问题上，我们中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潮。我现在无法回答这些有争论的问题。我只想强调一点，从反对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总之，从发展强大的人民革命和强大的土地革命（其中也可能表现出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的倾向）的观点来看，南美各种问题从整体来说将日益具有更大的意义。

黑人问题

接着还必须强调一下黑人问题的意义。共产国际曾就这一问题通过一系列决议。然而，有关的党至今对这一问题未给予特别的重视，这也是事实。此外，几乎所有的黑人同志都说，在对待

他们的态度上，种族沙文主义的残余仍未根除。我不否认这一事实。既然在比较小的民族问题，如西欧的民族问题上我们共产党内部还时常发生各种摩擦，那么，怎么可能设想如此巨大的文化和种族上的差异会不在我们共产党内部留下任何痕迹呢？可以看到，在讨论这个或那个涉及黑人问题的议题时，甚至在共产国际的委员会中有时也会出现不正确的调子，在讨论关于南非的问题时我就亲眼见到过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应当坚决地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要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在我们提纲中给所有我们的同志加上一条义务，即要求他们在这方面贯彻正确的路线，毫不留情地反对任何“种族沙文主义”的表现。对于黑人问题，必须不仅从北美形势的角度，而且从南部非洲局势的角度来加以研究。

关于印度局势问题

讲几句关于印度的问题。某些印度同志同我发生了争论，所以我得给他们一个答复。例如，拉贾同志反对我对印度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他说我毫无道理地只字未提到印度的工业化。但是，我必须向同志们指出，印度同志在创造“印度非殖民地化”理论时，企图拿我的一次发言作为依据，我在那次发言中确实没有讲到印度的非殖民地化，但却指出过，我们在印度看到大量的外国投资。

现在谈我的报告。难道我真的没有谈到印度的工业化吗？我没有使用“工业化”这个词。但既然我讲到战时和战后时期都有大量投资，那么，这也就是指工业化的问题了！况且这也不是分析当前印度局势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下面的问题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即现在英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否发生了转折？英

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否出现了变化？我认为，恰恰在近几年中，英国资本的输入势头大大减弱了。现在我们看不到以前那种发狂似的投资速度和投资大幅度上升的曲线。因此，印度不存在原先那种高速度的经济发展过程。最近时期那里发生了某种转折。正因为如此，出现了贫困化和赤贫的过程，农民不是变成为城市工人，而是沦落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受尽剥削和奴役的半乞丐；在这种土壤之上，国内市场繁荣不起来，工业则除此之外还要受到英国竞争的压力，所以也处于停滞状态，而且英国本土在“权利和优惠”等许多方面享有特权。这就是印度形势的独特之点。拉贾同志说，英国企图收买农民中的上层。这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拉贾同志夸大了这种过程。实际上是赤贫化过程在进一步发展，而这才是将来点燃革命火星的基础，这也是资产阶级掀起对抗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运动的基础。至于我们在印度的策略问题，我已经在前面讲过了。

关于维也纳起义和“左”翼社会民主党问题

关于较小的党的方面，我认为有责任对奥地利问题讲几句。某些同志问我，我对维也纳七月起义保持沉默是否证明，我们改变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每个同志都知道，我们当时讨论过奥地利问题，而且相当激烈地反对过兄弟的奥地利共产党的立场。在我们通过的决议中，我们曾指出，维也纳起义确实是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我们的党应该提出苏维埃口号，并在这一口号之下领导起义，等等。大概所有的同志都熟悉这一决议。依我看，我们没有任何根据改变当时的观点。至于说这个运动在它当时所达到的阶段上是否有些孤立，这是另一个问题。当时，要号

召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无产阶级群众举行总罢工是不行的，要在他们中间掀起重大的群众性行动也是办不到的，从这个观点来看，维也纳起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孤立无援的。但是，在事态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取得另一种形势。这是完全可能的。谁能保证事态进一步发展不会引起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更大骚动呢？这种可能性在事前是无法排除的。不能把关于孤立，甚至是相对的孤立的论点作为反对我们在奥地利的革命策略的理由。从奥地利党的观点来看，我们当时是否有可能使这个运动继续发展呢？我想是有可能的。党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帮助建立起苏维埃形式的群众组织。它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它错过了这样做的时间，因而犯了极大的错误。我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的决议是绝对正确的。至于说在目前情况下是否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这是另一回事。我不认为这种前景有什么特别的可能性。但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奥地利事件特别有力地说明了关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所起作用的论点的正确性，说明他们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

六、几个策略问题和党内问题

策略的转变和右的危险

现在就某些党内事务说几句。同志们，大家十分清楚，在代表右的和极“左”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击败之后，右的危险无疑是主要危险。无论从当前任务看，还是从将来的观点看，这个危险都是很严重的危险。会上不止一次地从当前任务的观点谈到这种危险，在谈到德国党，谈到工会工作、捷克党和红色节的时候，

在谈到反对派反对我们在法国的“新策略”的时候，都提到了这一点。右的危险是既成事实，无论从当前利益还是从未来的观点看，右的危险都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危险。

以捷克问题为例。党曾力图把群众动员起来，可是力不从心。面对未来的事态，好像是搞了一次不成功的预演。对内部毛病的诊断书说明，这个毛病还相当严重。我们现在应当十分冷静地思考一番。我并不特别赞成喊叫右的危险和“左”的倾向。我认为，最近一年来共产国际实行了大的转变，确实是大的转变，而不是小的转变，首先是在英国党和法国党内。罗明纳兹同志不知因何缘故认为有必要声明，发生的向左的转变是不大的转变。他这样做是完全不对的。我觉得，实行的转变是向左的大转变，特别是在英国党内。熟悉英国党内部生活的人都晓得，我们同英国工人运动中一贯存在并且对我们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一切旧传统实行了决裂。（喊声：“法国也是如此。”）是的，法国也是如此。但我不能同时讲两个国家。我继续讲。英国工人阶级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就是所谓统一的“有组织的劳动”传统。这种“统一”是改良主义者手中的一张王牌，他们可以采取欺骗手法利用这个口号，同革命思想，同革命党进行斗争，等等。这种“统一”（革命工人同披着羊皮的改良主义恶狼的统一）是无产阶级摆脱改良主义者影响的巨大障碍。而这些改良主义者一面依靠警察的庇护，一面高喊统一，公开推行令人愤慨的开除和分裂的政策。这个传统在英国无产阶级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我们某些优秀的同志对同时反对鲍尔温政府和反对工党的思想也感到不可理解。他们说，鲍尔温政府是主要危险，只有整个工人阶级组成统一战线才能同它斗，而整个工人阶级是由工党控制的，这就是说，只

有和工党一起并在它的帮助下我们才能推翻鲍尔温政府。这就是最初的方针。由此而产生了党代会通过的那个口号，即建立“在工党执委会监督下的工人政府”的口号。后来，英国同志来了个陡转弯，当然不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帮助。因此，在取得了这种转变的时候，怎能不看到这对于全党生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实行这个转变时既没有不必要的喧嚷，也没有谴责那位同志，我们采取的办法，是说服和长时期的诚恳的同志式的辩论。当然，发生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转变将因此而更牢靠。这个策略上的变化是英国工人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法国党内也存在过根深蒂固的议会传统。仅仅几个月之前，议会传统就在对国家态度是否忠诚的问题上（关于逮捕问题）有所暴露，这难道不是事实？这是否是偶然事件呢？是否是表面现象呢？不，这些传统已经牢固地植根于党的骨干头脑中了。可是，过了不几个月，我们陡然实行了转折，提出了“阶级对阶级”的口号，提出了不投社会党票的口号，同志们，这在法国党的策略上可不是小的转变，而是一次大的转变。在实行这次转变中同样没有不必要的空喊，但却牢牢地依靠党的下层，对动摇者采取同志式的说服方法，只对顽固不化者开展了斗争。在实行这个策略过程中不是没有摩擦，不是没有内部冲击，也不是没有内部的困难，但是，法国共产党实行的转变确实是一次根本性的转变。这是法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最根本的转变。我当然不是想说，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建立了什么“功勋”。但是，如果客观地看问题，难道这两个大党在策略上实行的转变还不大吗？我想，是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否是对右的危险的重大打击呢？当然是重大打击。这一策略上的转变是

否是一面照妖镜，靠它便可以使隐蔽的右的危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呢？当然是的。产生右的反对派，对这一策略的正确性发生种种怀疑的原因也在于此，心须同右的反对派进行斗争的原因也在于此。同法国党和英国党内右的思潮进行斗争的最犀利的武器，就是始终不渝地运用这一“新的策略”。

我已经说过，右的危险今后还可能扩大。为什么呢？因为列宁同志在我上面引证的文章中所说的那种现象还不能排除，就是说，我们一部分报刊的水平还不高。这种可能性完全不能排除。至于说不正确的态度将发展到何种程度，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要知道，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报刊。不仅是报刊，而且某些党组织同样会发生这种情况。谁能保证在发生直接的战争危险的时期，当我们必须在策略上和其他方面实行种种转变时，不会出现某些“脱离”现象呢？在我们的策略上和组织问题上，在对公开活动和秘密活动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许多方面，会发生一系列转变。谁能保证个别的党内不会发生脱党，不会出现某些危机性的事实和现象呢？发生这种脱党现象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种脱党现象首先将发生于各党的极右人士之中。因此，如果我们能将现实形势和我们的发展前景进行一番分析，那么，我们就会在党内活动方针问题上得出结论：必须对右派展开全面的全线出击。

党 内 问 题

各种破坏纪律的现象掩盖着右的危险，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必须强有力地反对这种现象。但与此同时我得说一句，对党内的右的危险展开强有力的斗争，甚至开展毫不留情的战争的问题，绝不是排除党的统一问题，绝不是取消妥善地开展这一斗争

和保持党内斗争“分寸”的问题。我们发现德国存在右的危险。我们就建议在提纲中提出开展强有力的斗争反对这种右的危险，建议在提纲中写上有计划地克服对右的危险的调和态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方法团结那些站到党的埃森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决议立场上来并答应要对右的危险展开无情斗争的同志。（下面有人喊道：“这是已在做的事了。”）

联共（布）代表团，譬如说，委托我表明态度（因为现在谈到德国党），我们反对把埃韦特同志排挤出党的领导层的任何企图。不过我要说明，德国党的领导同志并无这种意图。我们想在会上创造这样一种前提，使现在的领导机构中不出现任何裂痕。所有的同志都应当在严守纪律和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活动。没有这个前提是根本无法进行政治斗争的。脱党现象进一步发展，领导层四分五裂，党内发生分裂等，将造成极其不幸的后果。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工作要获得成功，基本的前提是纪律。我们特别明显地感到，这个问题在波兰是多么的尖锐。团结、统一、纪律，这是使革命顺利向前推进所绝对必需的。最近以来，我们在共产国际内部看到各种各样的危机现象。某些党所出现的这类危机现象给工人阶级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只有在明确的而且得到坚决贯彻执行的政治路线基础上才能消除这些危机。这是今后一切发展的前提。例如，在德国党的少数派中间存在着某种改变党的领导的思想。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们不该这么干，因为这将导致德国党发生内部的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完全彻底地支持历史形成的，以台尔曼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核心领导。我认为，诸如党内民主、新的党的骨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活跃党的基层支部以及开展群众工作等等问题，应当作

为党的重大问题提出来。党必须更多地学会开展真正的政治生活，杜绝一切无原则耍弄政客手腕的因素。

以波兰这样的党为例。党内并不存在重大的政治分歧，可是派别斗争却十分激烈。再以现在的美国党为例。就在最近，至少我们都知道，美国党已着手消除和克服内部摩擦，可是，我们看到，那里又燃起了斗争之火。这种斗争是如此的“活跃”，已发展到想利用当前的局势，以最激烈的方式继续这场斗争的地步。是否存在重大的政治分歧呢？依我看，美国党内的分歧是不很大的。这种分歧是否严重到了有足够理由组成不同派别的地步呢？看来还不是。就以出了名的关于如何对待美国帝国主义的问题为例。一部分人说，美国帝国主义大大加强了，另一部分人则断言，他们的对手，也就是发表上述意见的同志，是在给美国帝国主义作广告。这种话是不该讲的。这种讲法不会带来好处，也说明不了问题。老实说，我对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革命的形势并不抱什么希望。我可以完全公开地讲这一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像美国的那样强大。资本主义在美国发展到了它的极盛时期。当某个同志说，直接革命形势不可能出现，这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呢？但是，如果有人说在美国工人中开展工作是没有任何根基的话，那当然是不好的。可是，据我所知，并没有人讲过这种话。存在失业，这是事实，美国工业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事实，非熟练工人发生骚动，这同样是事实。是否存在着共产党发展的土壤呢？是的，是存在的。然而，能否因此而为尖锐的派别斗争找到理由呢？当然不能。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防止这种斗争的继续。

在我看来，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问题是最棘手的问题。可能我

们还不掌握足以对局势作出正确分析并制订相应措施的全部材料。但是，红色节事件是颇具代表性的。捷克斯洛伐克党内的事情不妙，不仅反映在领导层中，而且反映到党的基层，反映到全党，不仅从政治路线的角度，而且从党的基本方针和存在严重的社会民主党思想残余来看，都是不妙的。所以亟需执委会在代表大会之后或在大会期间专门研究一下捷克问题，以便不仅就捷克党的领导机构方面，而且就该党的整个方针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最近以来，我们看到捷克党犯了一系列错误，如在关于工厂委员会的法令草案的问题上以及准备在总统选举中投马萨里克的赞成票和其他许多可以看出该党消极态度的问题上。但是，现在看到的还不过是消极态度而已。

这就给我们加上了一项任务：必须特别细致地进行分析并深思熟虑地制订振兴该党的措施。

现在，当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加强自己队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面临着一项极为重大的任务，即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在党的思想教育方面，我们的工作开展得不够有力。依我之见，加强思想工作，开展思想斗争和思想讨论等等，是我们各个党的任务之一。这与我们整个发展的总路线是一致的。譬如，我们要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这就意味着我们既要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而且要对我们党自己的工人开展大量的思想工作，而我们的宣传鼓动读物却很少，靠一味地空喊口号是不可能让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接受我们的影响的。因此，在战争向我们日益逼近的时候，绝对必须加强我们党的内部生活，必须提高普通党员的积极性，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为培养新的骨干分子创造条件。纪律，这是我们的信条。但是，同志们，我想向你们公布一封未发表过的列宁

同志给我和季诺维也夫的信件，列宁同志在这封信中给我们写了下面一段话：“假如你们把一切不很听话但很聪明的人赶跑，而把只知顺从的混蛋留在身边，那你们一定会毁了党。”

我认为，列宁同志这条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各党的领导机关中需要有坚强的人物，需要有敢于把一切工贼赶出我们运动的那种人物。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人——我希望我们能有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充分掌握分寸去争取每一个“并不愚蠢”的党员，使这些党员回到党和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上来。

七、结 论

同志们，我的报告就要结束了。毫无疑问，国际形势将日益紧张。我们正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这不是说，明天就会爆发反苏战争。但是，如果要问，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有多少，那我得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少的。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对于这仅有的一点时间，这难得的喘息时机，我们应当用全副精力和革命的拼搏精神加以利用，以便巩固和团结我们的党，把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我们一边来，并把广大农民阶层吸引过来。

这是极其艰巨而重要的任务。没有艰苦卓绝的工作，没有我们每时每刻毫不间断的艰苦工作，我们是无法完成这些任务的。大家都知道列宁在给出席海牙会议的同志的指示中所说的一段话：重要的事情不是高喊举行总罢工等等。要紧的是必须有步骤地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有步骤地同战争危险作斗争，有步骤地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有步骤地揭露它的诡辩，有步骤地训练组织等等。如果我们的党不作出高度紧张的努力，我们是无法做到这一

点的。我们应当要求我们的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加强思想工作，付出更大的精力去征集党员，改善我们党的机构，改进处理日常问题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党的队伍，加紧我们青年组织吸收新成员的工作，更有力地开展对殖民地的工作和军队的工作，作好转入地下状态的准备。以为我们可以像现在这样，继续过比较“平静”的日子，那等于是陷入幻想。除此以外，我们还应当采取一切措施，防止我们各党发生类似捷克斯洛伐克党红色节那样的糟糕事情。

同志们，共产国际诞生于战争年代。共产国际不止一次地获得过重大的胜利。苏联的成立就是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成就。如果资产阶级竟然放出战争恶魔，那么，无产阶级最终必将占有全世界。我们共产党人将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道正告整个统治阶级：先生们！试试看，你们敢挑动一切战争势力，把你们的战争恶魔放出来！共产国际的回答将是团结自己的队伍，进行革命，进行国内战争，夺取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热烈鼓掌。全体代表起立，向报告人欢呼。）

埃韦特（德国）：

我得作如下声明：

有人在会上说，我和其他许多同志赞成联共（布）代表团对有关国际形势的提纲的建议是有保留的。我们必须声明，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我在发言中阐述的想法完全是针对德共中央多数派在党内问题上的方针的。这一方针表现于德共代表团的大会发言中，也反映于乌布利希、奥皮茨和罗明纳兹等同志的会上发言。部分发言是受代表团核心小组的委托而作的。这些发言表明，我们的担心，即担心党的领导机关中的多数派可能违背联共（布）代

代表团建议的原意，利用贯彻决议之机，为其改变埃森代表大会通过的党内方针的目的服务，这种担心还是有根据的。乌布利希和罗明纳兹同志在德共代表团多数派赞同下荒谬地和违背良心地指责我奉行托洛茨基主义和反苏的方针，也属于这种反映。乌布利希同志后来的声明丝毫没有消除这种指责。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说我们似乎成了党内的主要危险，甚至当台尔曼同志在德国代表团会议上发表声明和解释之后，这种说法也丝毫没有停止。

我提请大家注意布哈林同志受联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委托所作的关于不允许旨在将我排挤出党的领导机关的倾向存在的发言。如果我或者其他同志果真代表着党内的主要危险，那自然应当把我们排挤出党的领导。

上面提到的那种说法不仅证实了我们对德共党内方针存在的担心是合乎情理的，而且也说明了他们所采用的斗争方法。

根据我们的看法，这类斗争方法是同决议的内容和精神相违背的。决议要求党的领导促进党的团结，贯彻把一切站在共产国际和德共埃森代表大会决议立场上的人团结起来的政策。我们反对他们那种方法，其原因就在于此。

乌布利希同志说我似乎企图采取迂回手法否定党的埃森代表大会的决议，这种说法只能被认为是存心将大会引入歧途。我将向大会说明乌布利希同志所提到的各项事实。

科拉罗夫：

许勒同志在其总结发言中提到，波兰和保加利亚的共产党没有给予青年以应有的注意。因为问题涉及保加利亚，我认为有必要声明，这种情况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情况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共青团之间一直存在着十分正常的关系。党一贯注

意共青团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听取青年们的种种要求并全力支持共青团的工作。许勒同志作此发言可能是出于某种误会。为了避免产生一切误会，我认为有必要作上述声明。

格尔维克（波兰）：

米茨凯维奇同志认为有必要对我所提供的关于党在罗兹罢工期间所犯错误的材料表示怀疑。我在此声明，我掌握有这一问题的全部材料，我将向大会提供这些材料。

许勒：

就科拉罗夫同志的意见讲几句。我向大会作报告时谈了青年共产国际最近以来的整个发展情况，也谈到了最近几年来青年共产国际对各国党的态度，在回顾过去时顺便提到保加利亚党同样不够注意青年团组织上独立的原则。这方面过去是有不少例子的。我不妨给你们举一个事实，在党的代表会议上确实出现过这种主张从根本上改变党与青年团之间关系的思潮，并且打算据此作出某些组织上的结论。如果从科拉罗夫讲话中能够得出结论，证明最近时期在这方面发生了变化，那我们将会首先表示欢迎。

台尔曼：

布哈林同志关于德国党领导机构的讲话以及埃韦特同志的声明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德共领导中有些同志持有不让埃韦特同志参加领导机构的意见。我谨向第六次代表大会声明，德国党全体领导人从未持有这类看法。实际情况是一个时期以来，埃韦特同志一直在很窄的小圈子里发表意见，认为必须改变德国党的领导成员，改变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以及俄共和德共代表团联席会议所承认的并经俄共代表团同意和批准唯一正确的德共领导机构。

第二个事实。埃韦特同志声明说，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上发表的那些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可以看出埃韦特同志那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保留）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我认为，尽管埃韦特同志在今日发表的声明中断言，他对俄国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意见并无保留，可是，他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发表的言论中确实存在着某种矛盾。埃韦特同志方才的发言从内容上看是一次全面的攻击，毫无和解之意，而我，譬如说，在发言中是主张和解的。

第三个事实如下：我要提醒注意，工人运动队伍中以及党内的右的危险是最严重的危险。如果埃韦特同志在当前情况下继续坚持其政治方针和党内方针，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斯大林同志在俄共和德共代表团联席会议对他所说的那种命运：他将成为一切不满者和一切右派的中心，这些人必将聚集到他的周围去。

斯特拉霍夫同志（中国）的书面声明：

我发言的第一部分结构十分清楚，其基本思想如下：

（1）我想“第三时期”是存在的。

（2）对于缺乏国际知识和经验的中国同志和其他同志（我指的不仅是我个人）来说，第三和第二时期之间的差别讲得不够清楚和明了。

（3）这也就是说不足以解释我在发言中列举的那些问题。

（4）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也就是说由于对这些问题解释得不够清楚，所以许多人不清楚第三时期同第二时期有何区别。

（5）我建议哪怕是在代表大会之后也要通过撰写一批小册子等办法，较全面地讲清这些问题。我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出于我的政治观点）建议从提纲中删去第三时期。

谨声明如上。

斯特拉霍夫

勒麦列（会议主席）：

我们对这一议程最后几项任务的讨论就要结束了。各位手头都有有关这个问题的提纲。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以俄共代表团的提纲为基础，连同许多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意见，一并交委员会进行讨论，以便形成代表大会的最后文件。

是否还有那位代表想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没有。现在进行表决。谁赞成将本提纲作为委员会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好，建议一致通过，无人反对。

德共代表团提出下列内容的建议：

“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赞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和青年共产国际前一时期的活动。”

现将这一建议提交大会讨论。

有谁想发言？

谁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及我方才提到的各机构的活动，请举起代表证。一致同意，无人反对。

现在选举负责讨论提纲和修改意见的委员会。主席团向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建议下列同志参加委员会：

布哈林、斯大林（由莫洛托夫代表）（苏联），台尔曼（德国），塞马尔（法国），艾尔科利（意大利），墨菲（英国），伊勒克（捷克斯洛伐克），库斯特齐瓦（波兰），洛夫斯顿（北美合众国），李光（中国），洛佐夫斯基（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党党团），希塔罗夫（青年共产国际），基尔博姆（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柯拉罗夫（巴尔干），库西宁（边区国家），马纳瓦尔（印度尼西亚），海德尔（近东），拉塞尔达（南美），片山潜（日本），西坎杰尔

(印度)。

召集人台尔曼同志，秘书雅布翁斯基同志。

无代表参加委员会的代表团可以书面形式向委员会提出修改意见，并有权为自己的建议进行口头辩护。

谁想发言？

没有。现在表决。

请举起代表证。好！一致通过主席团的建议，无人反对。

这样，议程的第一项已全部审议完毕。

乌克兰代表团的洛维茨基同志想作一点解释性发言。

洛维茨基：

同志们！我们乌克兰共产党（布）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坚决抗议波共少数派代表格尔维克同志对最老的布尔什维克、联共中央委员、乌共（布）领导人之一米科洛斯同志进行的政治攻击。

格尔维克同志在涉及米科洛斯同志在西乌克兰共产党中的工作时竟然把米科洛斯同志称作“接受犯严重错误者忏悔的牧师”，并且贸然宣称，米科洛斯同志对西乌克兰共产党内部问题的观点与共产国际的观点是矛盾的。

为了回答这一攻击，乌共（布）代表不得不肯定地指出，米科洛斯同志多年来在西乌克兰共产党中所开展的对该党布尔什维克化具有重大作用的工作，是完全受共产国际委托并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的，受到了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好评和支持。

米科洛斯同志对西乌克兰共产党出现危机的原因及瓦西里基夫集团的叛变的看法，是同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观点相

吻合的，这一观点反映于乌共（布）中央三月决议之中。

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格尔维克同志的政治性攻击和他在7月28日的大会例会上的发言是针对乌共（布）中央委员会的。

米茨凯维奇同志在同一次例会上的发言再次肯定了众所周知的事实，即最近一年半来一切有关西乌克兰问题的重大决定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的，格尔维克同志及其同伙攻击的实际上不是波共中央多数派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路线，而是攻击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样，我们就再无必要就这一问题同格尔维克同志进行任何对话了。

我们不揣冒昧地向第六次代表大会大声疾呼，只是想说明，因对前不久所犯严重民族机会主义错误（勃罗诺维奇的小册子、布德津斯基的宣言和其他一些精彩杰作）负有责任而背着沉重包袱的波共少数派成员，特别是格尔维克同志，现在正将自己置于可笑的境地——完全不自量力地想教训乌共（布）中央和米科洛斯同志，什么是正确的民族政策。

会议休会。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